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十字军史

[英] 乔纳森·赖利-史密斯 著

欧阳敏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十字军史

[英] 乔纳森·赖利-史密斯 著  
欧阳敏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军史/(英)乔纳森·赖利-史密斯著;  
欧阳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ISBN 978-7-100-12384-6

I. ①十… II. ①乔… ②欧… III. ①十字军东侵—  
历史 IV. ①K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189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 十字军史

[英]乔纳森·赖利-史密斯 著  
欧阳敏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384-6

---

2016年8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33.25  
定价:98.00元

##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编辑委员会

- \* 陈 恒（上海师范大学）
- 陈 淳（复旦大学）
-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
- 董少新（复旦大学）
-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
- 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
- 刘津瑜（美国德堡大学）
-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
- 刘耀春（四川大学）
- 刘永华（厦门大学）
- 陆 扬（北京大学）
- 孟钟捷（华东师范大学）
- 彭 刚（清华大学）
- 渠敬东（北京大学）
- 宋立宏（南京大学）
- 孙向晨（复旦大学）
- 杨明天（上海外国语大学）
-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 张广翔（吉林大学）

### \* 执行主编



乔纳森·赖利-史密斯

---

### 作者简介

乔纳森·赖利-史密斯 (Jonathan Riley-Smith, 1938— ), 英国十字军史研究专家, 十字军与拉丁东方研究学会创始人。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剑桥大学伊曼努尔学院荣休教授。另编著有《牛津插图十字军史》《十字军地图集》《十字军简史》《十字军、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等数十部与十字军和拉丁东方相关的作品。

### 译者简介

欧阳敏, 毕业于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 现为东方出版中心编辑。主要译作有《新加坡史》, 参与翻译的作品有《象征之林》《人类学的四大传统》《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

## 总 序

“人文”是人类普遍的自我关怀，表现为对教化、德行、情操的关切，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对崇高境界的追慕。人文关注人类自身的精神层面，审视自我，认识自我。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其有人文，有自己特有的智慧风貌。

“时代”孕育“人文”，“人文”引领“时代”。

古希腊的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揭示了人文的核心内涵。一部浩瀚无穷的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认识自己”的人文史。不同的时代散发着不同的人文气息。古代以降，人文在同自然与神道的相生相克中，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发展印痕，并把高蹈而超迈的一面引向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是科技昌明的时代，科技是“立世之基”，而人文为“处世之本”，两者互动互补，相协相生，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技在实证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测量来研究整个自然界。它揭示一切现象与过程的实质及规律，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包括人的自然生命）提供工具理性。人文则立足于“人”的视角，思考人无法被工具理性所规范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超越。它引导人在面对无孔不入的科技时审视内心，保持自身的主体地位，防止科技被滥用，确保精神世界不被侵蚀与物化。

回首二十世纪，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这两对时代主题深刻地影响了人文领域的发展。两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矛盾以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方式得以缓解。空前的灾难促使西方学者严肃而痛苦地反思工业文明。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刺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与人文之互相渗透也走向了全新的高度，伴随着高速和高效发展而来的，既有欣喜和振奋，也有担忧和悲伤；而这种审视也拷问着所有人的心灵，日益尖锐的全球性问题成了人文研究领

域的共同课题。在此大背景下，西方学界在人文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和干预了这一时代，进而为新世纪的到来奠定了极具启发性、开创性的契机。

为使读者系统、方便地感受和探究其中的杰出成果，我们精心遴选汇编了这套“二十世纪人文译丛”。如同西方学术界因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而提出的“漫长的十八世纪”“漫长的十九世纪”等概念，此处所说的“二十世纪”也是一个“漫长的二十世纪”，包含了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一世纪早期的漫长岁月。希望以这套丛书为契机，通过借鉴“漫长的二十世纪”的优秀人文学科著作，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人文”本身，并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注入更多人文气息、滋养更多人文关怀、传扬更多“仁以为己任”的人文精神。

本丛书拟涵盖人文各学科、各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既注重学术性与专业性，又强调普适性和可读性，意在尽可能多地展现人文领域的多彩魅力。我们的理想是把现代知识人的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紧密结合，不仅为高校师生、社会大众提供深入了解人文的通道，也为人文交流提供重要平台，成为传承人文精神的工具，从而为推动建设一个高度文明与和谐的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我们殷切希望有志于此项事业的学界同行参与其中，同时也希望读者们不吝指正，让我们携手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做好。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编委会

2015年6月26日于光启编译馆

致

多米尼、哈密什、普罗斯珀、特里斯特拉姆、  
塞巴斯蒂安和托奎尔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诗篇 132（133）：1）



## 地 图

- 一 战争涉及的地区
- 二 欧洲与近东（1094—1291）
- 三 巴勒斯坦、叙利亚、西里西亚、塞浦路斯和埃及
- 四 希腊、色雷斯和小亚细亚西部
- 五 法国西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
- 六 波罗的海地区
- 七 意大利
- 八 北非
- 九 欧洲与近东（1292—17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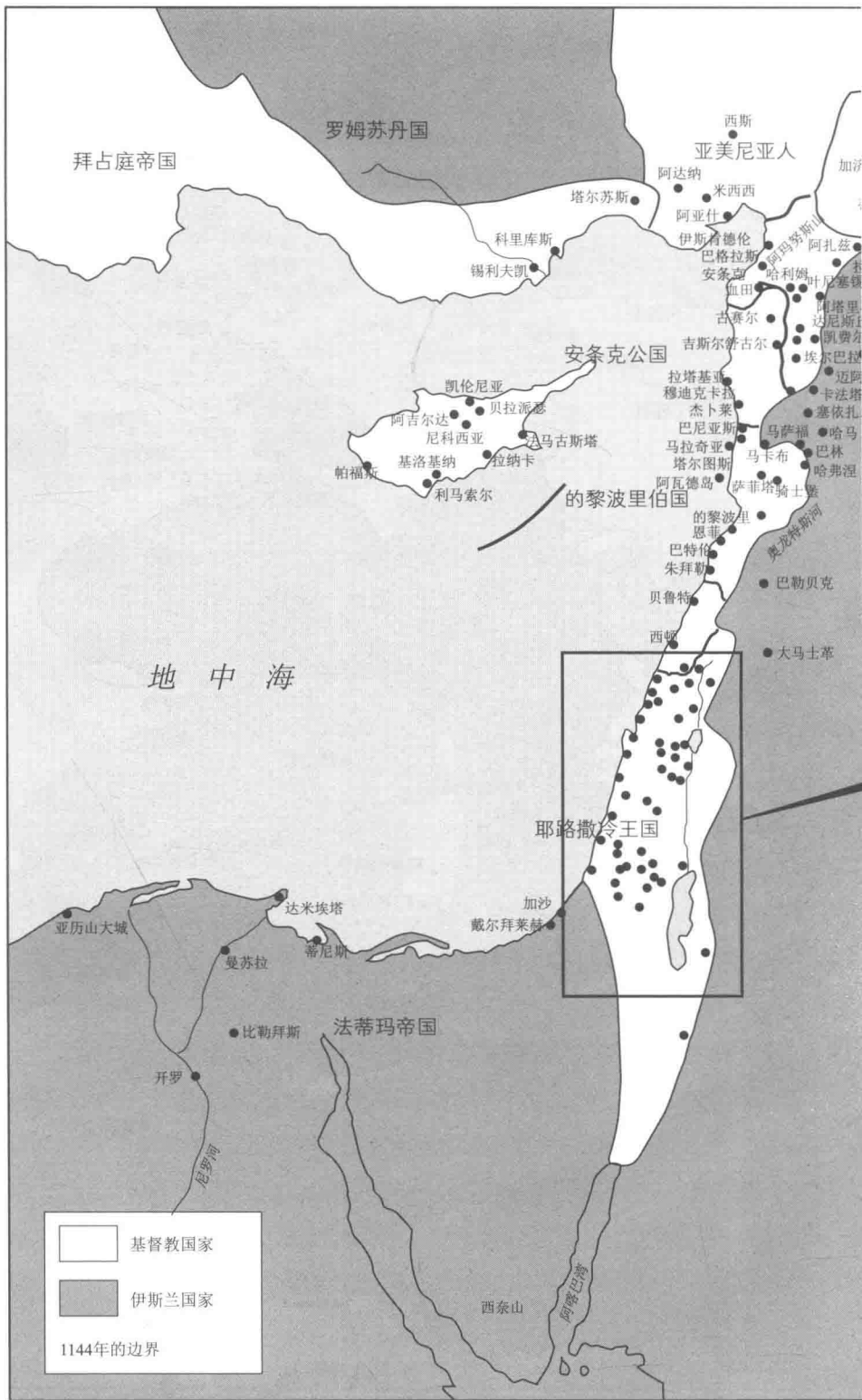


一 战争涉及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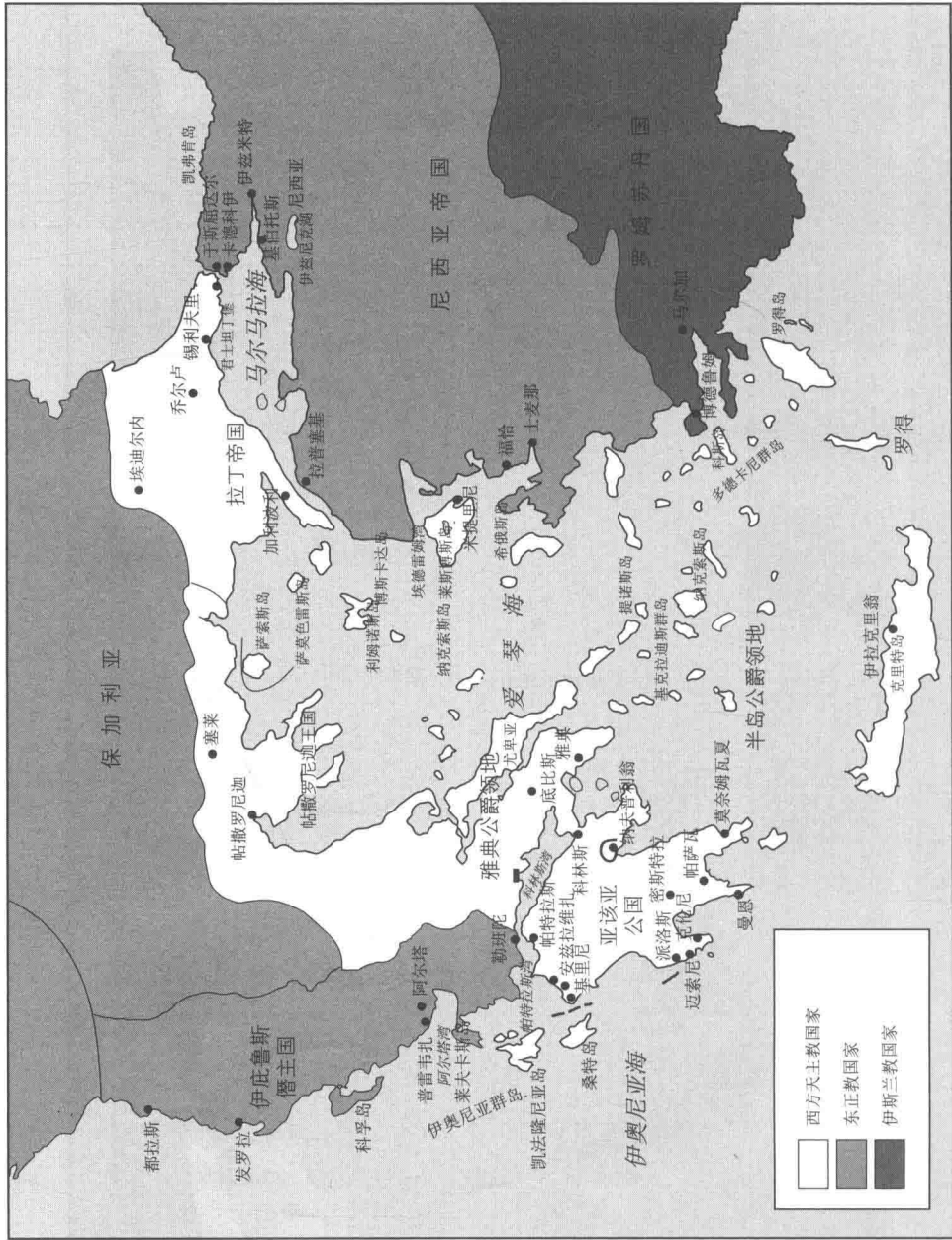


二 欧洲与近东 (1094—1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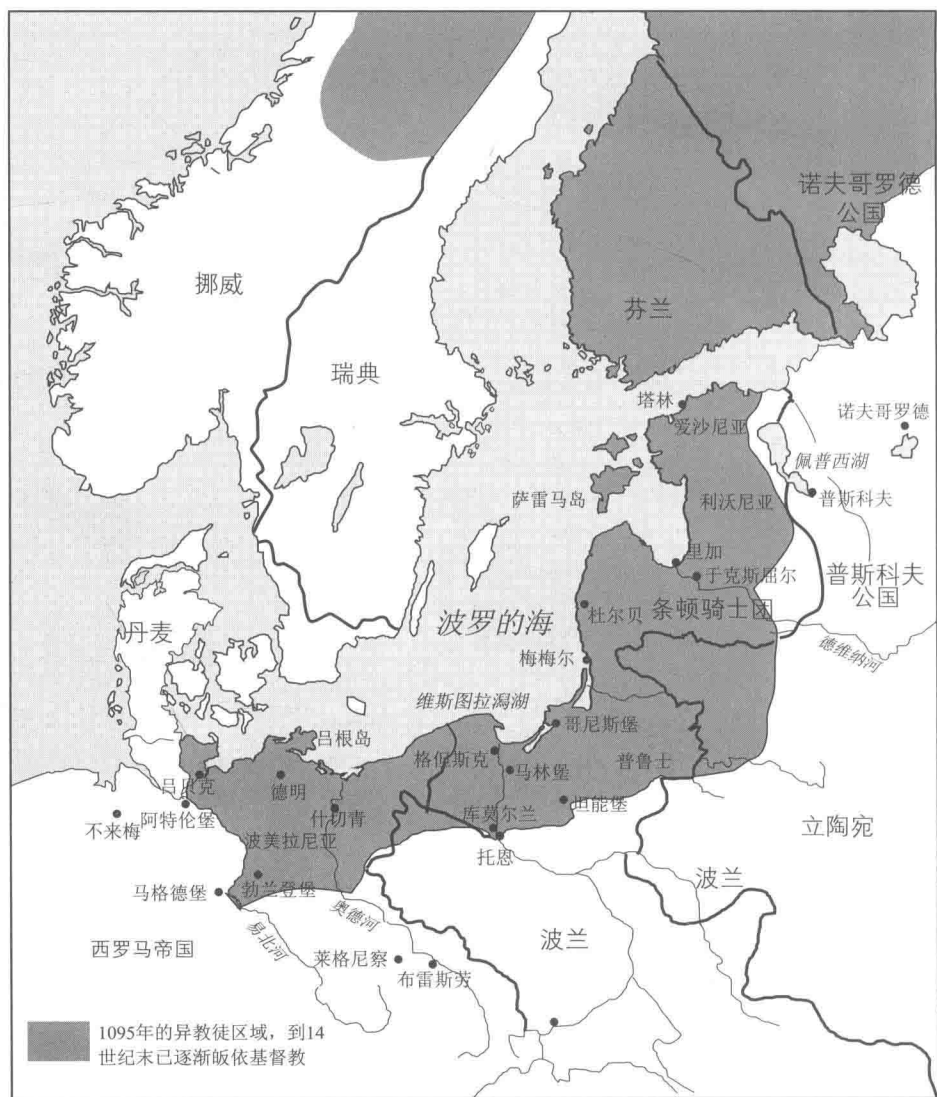
三 巴勒斯坦、叙利亚、西里西亚、塞浦路斯和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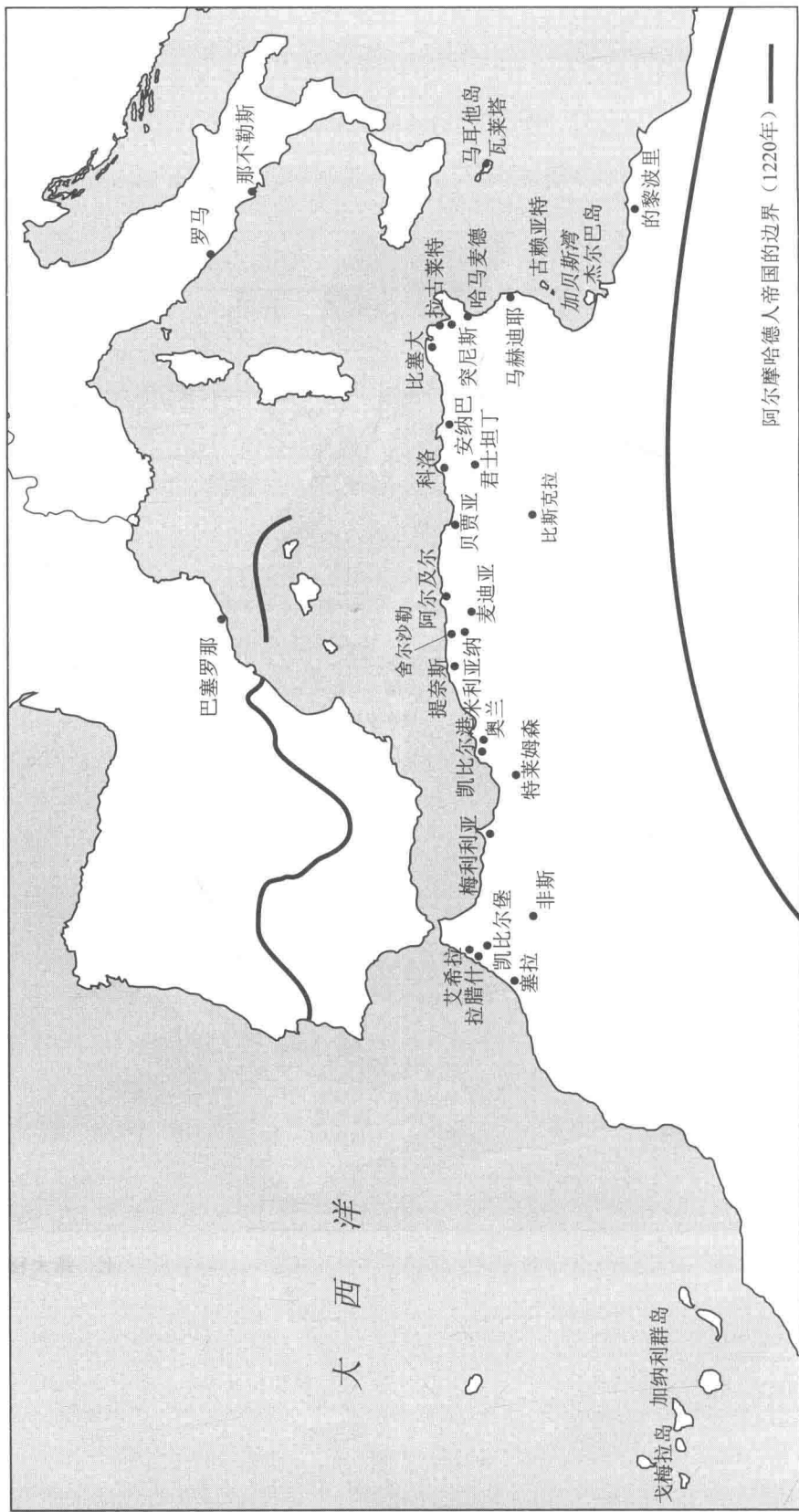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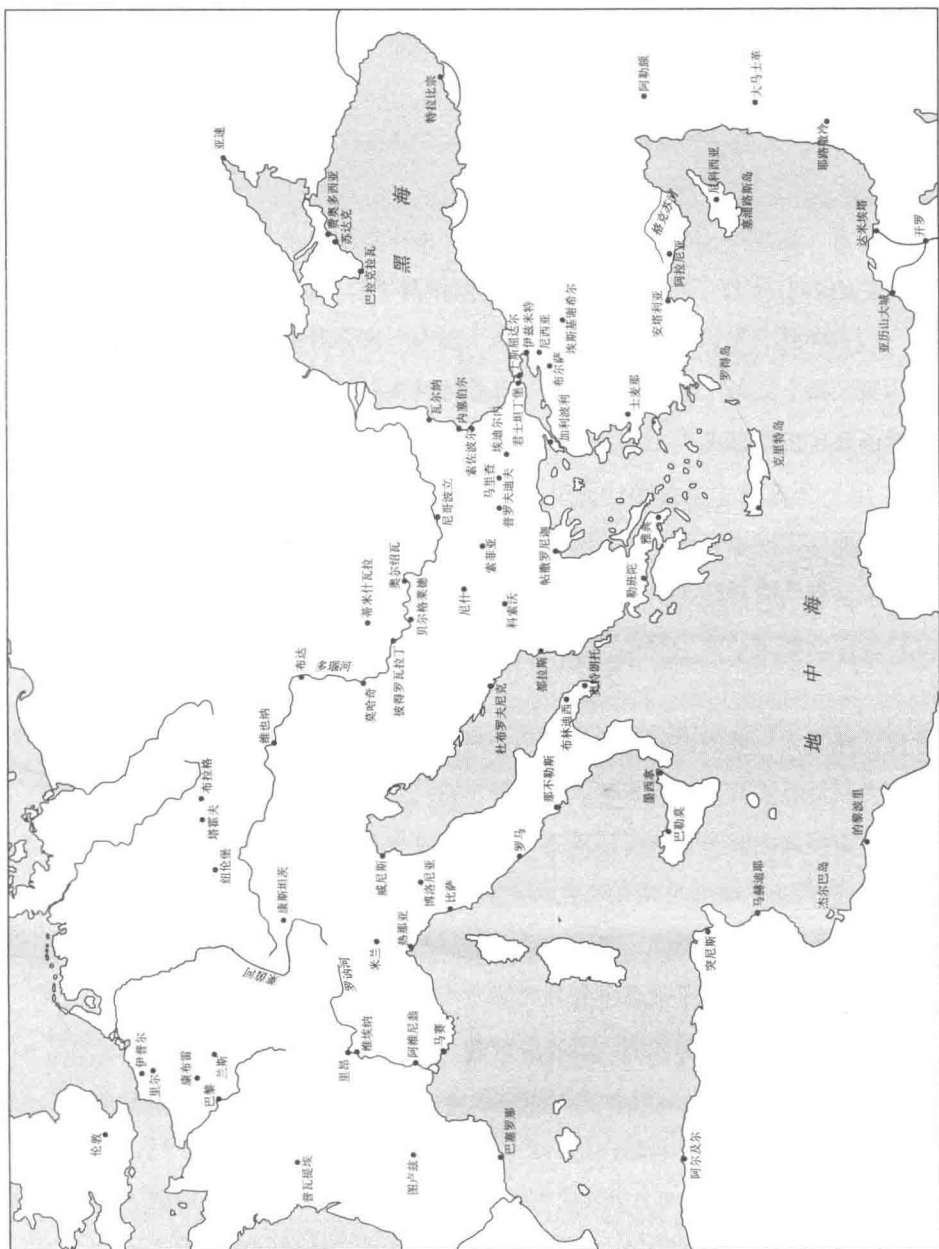
五 法国西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



六 波罗的海地区







事实证明，准备出版本书第二版比我预想的更麻烦。我知道，在过去的17年里，史学研究有了诸多新的进展，但我没有料到，这会让本书有那么多地方需要重写。在我看来，在这一研究主题上出现了以下几种动向：

- 20年前引发我们关注的种种争论，如今几近平息。这或许部分是因为参与争论的各方已经争得有些累了，但还由于大多数历史学家的优先关注点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些争论中有一种是关于定义的。“多元主义”是一种曾激发大量关注的立场，如今也非常有影响力。而且，它在本书的导言和后记当中都有涉及，指导着本书的写作方式。尽管如此，其实多元主义的领军人物已不像从前那样，很笃定地知道这种立场的一般应用方法了。
- 东方的拉丁定居点到底是不是殖民地？关于这个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似乎也不再感兴趣了。这可能是因为学界普遍对马克思主义失去兴趣的结果。但在此仍然必须指出，在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某些研究圈子里，关于那些定居点就是早期殖民主义的例证的论断仍然近乎公理。
- 人们对十字军战士们的动机越来越感兴趣。同样，越来越令人信服的是，仅用物质利益来解释十字军的成功招募是不够的。人们已经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十字军所具有的赎罪本质，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当时的布道词，而这些布道词提供的证据正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另一类记录礼拜仪式的文献材料也开始引起学界重视，可以预期它将构成对布道文献的补充。
- 在历次大规模东征间歇期发生了若干次小规模十字军征讨行动，其细节如今也更加清晰可辨。因此，我曾经想要修正传统上界定的大规

模东征的数量。但最终我放弃了，因为我觉得这会把读者搞糊涂的。

- 随着对西方人在东方定居点的社会构成和文化状况的研究逐步增多，其呈现出来的历史面貌开始发生改变。这导致 19 世纪时曾谈论的文化同化图景再次重现，只不过形式有所修订。但只要更深入地考量耶路撒冷王国的各种体制，就会发现其中有些显得非常具有实验性质，很有创新意义。基于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把耶路撒冷和西方人征服的类似地区——想到这类地区，最先浮现的是阿拉贡和西西里——加以比较。在所有这些地区，统治者似乎始终都自觉地意识到，有必要关注外族臣民的需要，并因此做出相应调整。与此同时，对耶路撒冷王国的历史发展做“宪政演化”式的解释曾经非常有影响，但如今这种解释方式已经不再时兴，因为出现了一些对其政府的统治形式和手段的细致研究。
- 从 15 世纪直至 16 世纪初，农民武装复兴，这让大众重新在十字军历史中活跃起来，历史学家们现在已开始关注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对骑士团历史的兴趣也出现爆发性增长。其结果之一是，主流观点开始对骑士团在近代初期的作用做更正面的描绘。而另一种结果是，普鲁士、罗得岛和马耳他这几个骑士团国家也开始引起一大批人的关注。

xxvi

本书中较长段的引文分别出自下列著作：第 xxxiii、12—15、79、112—113、116、122、124—125、131、134、137、148—149、163、170—172、174、185—186、192—193 页的引自 L. and J. Riley-Smith, *The Crusades: Idea and Reality, 1095—1274* (1981)；第 71 页的引自 Usamah ibn Munqidh, *An Arab-Syrian Gentleman and Warrior in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tr. P. K. Hitti (1929)；第 71—72 页的引自 Rabbi Jacob ben R. Nathaniel ha Cohen, ‘Account’, tr. E.N. Adler, *Jewish Travellers* (1930)；第 184 页的引自 P. J. Cole, *The Preaching of the Crusades to the Holy Land, 1095—1270* (1991)；第 277 页的引自 Pius II, ‘Commentaries’, in *Memoirs of a Renaissance Pope*, tr. F. A. Gragg (abridged edn, 1960)；第 302 页的引自 E. Siberry,

*The New Crusaders: Images of the Crusades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2000); 第306页的引自 E. Sivan, "Modern Arab Historiography of the Crusades",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8 (1972)。

乔纳森·赖利-史密斯

2004年7月



## 第一版前言

十字军在很多地区进行过战争，而且，很多卷入这些战争的地区在几个世纪内曾多次易主。因此，这些地区大多都拥有好几个名字。我认为，本书的一些读者可能会想去拜访那些比较重要的地点。因此，基于这样的假设，在地名方面我尽量遵照《泰晤士世界地图册》(*The Times Atlas of the World*, 1984年第六版)中的名称。但有些地方的某个名字对英语圈的读者来说实在太熟悉，如果改掉的话会让他们觉得别扭，所以对这样的地名，我没有采用上述地图册的名称（比如我采用了“格但斯克”[Gdansk]而非“但泽”[Danzig]，“菲兹”[Fez]而非“菲斯”[Fès]，“马林堡”[Marienburg]而非“马尔堡”[Malbork]）。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在第一次出现时把他的拼法加括号列出来，在索引里也是这样处理的。

《泰晤士世界地图册》采用的是一种在英美广泛应用的拼写体系，而历史学家们并没有采用这种体系。我认为，如果我试图按照这本图册的标准把阿拉伯人名都重新拼一遍，反而会引起混淆。因此，我在地名上用的是一种拼写体系，而在人名上用的又是另外一种。研究阿拉伯的学者估计不会喜欢我的这种处理方式，但我的主要目的是让普通读者能够尽可能方便地去理解。

每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都知道，他最应该感谢的是他本科生和研究生。因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位学生：彼得·埃德伯利（Peter Edbury）博士和诺曼·豪斯利（Norman Housley）博士。他们阅读了本书的打印稿，并为我指出了若干硬伤和不妥之处。不过，我并没有完全听取他们的建议，因此，本书所有的阐述和观点都由我负全责。在此，我还要感谢珍妮特·戴恩斯（Janet Daines），是她为我录入了最终的稿件。

乔纳森·赖利-史密斯

13世纪早期，维特里的雅各（James of Vitry）<sup>①</sup>曾为圣殿骑士团布道。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东方完成这次布道的，可能正是在他担任主教的阿卡城（Acre）<sup>②</sup>。圣殿骑士团的总部就设在阿卡城海边一座规模庞大的修道院中，布防严密。一开始，他就呼吁人们注意以下事实：圣殿骑士和他们的基督徒战友们英勇战斗，虽然其伟大程度不及使徒和殉道者们等第一批“上帝的战士”，也不及在末日来临前最后的审判中灵魂能够经受考验的最后一批“上帝的战士”，但他们负有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去抗击魔鬼及其代理人，如偶像崇拜者、异教徒、异端和绥靖主义者（这最后一类试图阻挠他们完成使命）等对基督徒构成的近在眼前的真实威胁。他用神学上的论据来证明基督徒使用武力的合理性，其依据几乎全部出自教会法的标准教材、格拉提安的《教令集》<sup>③</sup>。但他的这些言论必定会让听众们听得很吃力，因为大多数圣殿骑士都没有受过教育，就算有人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是很模糊地思考过动用武力的理性依据。不过，接下来他们就听得轻松多了。因为按照雅各的惯例，他开始绘声绘色地讲一些故事，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一名圣殿骑士的，情节发生在“圣殿骑士团还很清贫，但在宗教上却最为狂热而虔诚的年月里”。显然这很能打动听者的内心。最后，他以敦促骑士们不要顾虑自身

---

① 法文写作 Jacques de Vitry（约1160/1170—约1244）。法国修士，当时著名的神学家。1214年当选阿卡主教。卷入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并参与1218至1220年对达米埃塔的围攻。1229年成为红衣主教。——译注

② 或拼作 Akko，以色列北部古老的海港城市，自腓尼基时代起一直有人居住于此。——译注

③ 格拉提安（Gratian），12世纪的教会法学家，被誉为“教会法之父”。他编纂的《教令集》（*Decretum*）又译作《葛氏律》，开了教会法协调分歧、统合编定之先河，后来作为六部分中的第一部分收入由教皇亲自颁布的《流传律例集》（*Extravagantes*），成为1917年《天主教法典》颁布前教会法的基本依据。——译注

的荣辱而只需一心相信上帝结束了这次布道。

这篇布道词，现在读来似乎写得不是太成功。文章前三分之一引经据典，引用了圣经和早期教父们的一些论述，之后则是一些逸闻以及结尾处传达的非常简单的讯息。前后两部分之间糅合得有些生硬。这篇布道词仅仅成功地说明了一点：在神学家们的理性概括和推动普通男男女女们行事的各种力量之间，总是存在着深深的鸿沟。教皇和教士们必须把支持暴力的神学理论用容易理解的词汇讲给普通基督徒们听，可惜他们从没能令人满意地架出沟通的桥梁以跨越这条鸿沟。他们确实激发起了人们的热情，但却无法彻底加以掌控，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十字军运动<sup>①</sup>的兴起，却是以当时大多数有教养的人群对暴力持上述类似观点为背景的。在本书开篇处，我们必须着重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背景，教会绝不会启动这一危险的进程，去贸然发动广大俗众（更不用说圣殿骑士团这样的宗教组织）拿起武器。应对当时社会中的种种无序动荡，已经够让教会焦头烂额的了。

xxx

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基督教对战争合理性的论证基于两个前提。第一个是暴力，它被粗略地定义为一种可能导致（故意或无意地）人伤亡的力量显示行为，并非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在给实施者的意图定性之前，暴力行为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如果其意图是利他性质的，就像外科医生为病人截肢一样，那么，哪怕他可能违背了受施者的意志，且即使这种行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里都可能危及受施者的生命，这种暴力行为也应被视为积极的和善的。第二个前提是，上帝为人类所做的设想与世间的某种政治体系或政治事件的发生进程是相关联的。关于十字军，上帝的看法隐藏在基督教共和国（Christian Republic）这样一种政治观念中，即一个由上帝统治的独一无二的、普世的、超越凡俗的国度。这个国度在尘世间的代理人是教皇、主教、皇帝和国王们。个人致力于捍卫这

① 本书谈到十字军时一般用“crusading”或“(a) crusade(s)”，前者为统称，有时后面还会加“movement”，因此译为“十字军运动”，后者则指各场具体的征讨活动，有单、复数之变，因此译为“十字军行动”，请读者注意。——译注

个国度，被认为是具有战斗能力的人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而宣传布道者们则用虔信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宣扬这种理论：在上帝之普世国度于尘世间的延伸地带中，圣地是他的祚土或资财；波罗的海沿岸的利沃尼亚（约相当于今天的拉脱维亚）则是祭祀圣母马利亚的私人封地，就相当于皇太后的领地。

上帝，无论是以圣父还是圣子的化身出现，都会赞赏为捍卫他的设想而使用武力的行为；不过，这仅在这些行为遵守了早在公元4世纪就制定的一系列标准的前提下。参与行动的人必须表现出良好的意愿，即其行为要始终表达对上帝和邻人的爱。参与者为之奋斗的事业必须是正义的，而且要获得公认权威宣布的合法性。这个权威通常应该是上帝的使者，比如某位君主。但人们也相信，上帝也会亲自首肯对暴力的实施。据说，圣经旧约中就记载了基督在多个场合（新约中也记载了若干）赞同暴力的举动。其中就有在最后的晚餐时，他显然赞同使徒持有两把剑（路加福音 22:38）。并且，他并不介意百夫长从事的职业（马太福音 8:5-13；路加福音 7:1-10），这表明他所持的仁慈和宽恕的观念并没有完全与旧日律法中存在的武力惩处相冲突。据信，通过在尘世中的主要代表——教皇，基督曾亲自授权了十字军行动，而这正是十字军的典型特征之一。

无论他或她是否志在苦修（**penance**），每一位十字军战士都必须在宣誓后才能加入。这是一种自我惩罚的举动，其中包含了为自己的罪而向上帝求取赎罪宽恕的意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每一个人才都获准可以放手使用武力。这场朝圣之旅（自1200年起得到全面发展），加上出发之前就得到的免罪声明，使十字军运动与基督教圣战的其他形式区分开来。对十字军战士个人而言，参加十字军首先关乎自己个人的福祉，因为他参与的是让自我神圣化的一种行动，只在次要意义上它才是为上帝或教会或基督教的福祉而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在骑士精神影响下更古老的为上帝服务观念的渗入，这种非常激进的理念后来被稀释了，但苦修观念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始终贯穿于十字军运动的历史中。据13世纪的传道者罗芒的安贝尔（**Humbert of**

Romans) ①所说，为上帝的服务只有在具有苦修赎罪的性质时才是有效的。因为十字军运动具有苦修赎罪的性质，且最初它是与到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相关联的，十字军战士们于是通常都同时具有朝圣者的身份，人们也经常使用与朝圣相关的术语来描述他们。十字军战士们享有的某些特权，尤其是自身、家人和财产可受到保护这一条，与朝圣者所享有的非常类似。

十字军与被视为基督教世界内部或外部敌人的群体作战，旨在恢复基督教财产，或者捍卫教会或基督徒。基督徒和教会受到的损害，为十字军战士们提供了机会，得以借一项正义的事业来表达他们对被压迫、被威胁的弟兄的爱。而这些受损害者始终与整个基督教世界紧紧相连。因此，即使某支十字军事实际上仅由一个地区的人组成，也会被视为具有普世性质。在历任教皇看来，东方和西班牙的穆斯林占据了基督教的领土，并对生活在这些领土上的基督徒施加了异教的专制统治，而这些领土是神圣的和由基督亲自授予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异教徒也威胁着新建的基督徒定居点。朗格多克(Languedoc) ②或波西米亚的异端教派背叛了其教会母亲，拒绝履行上帝交给教会而教会又托付给他们来执行的教化重责。他们和教会在意大利的政敌一道扰乱了正常的秩序。历任教皇们相信，针对这些威胁而发起的所有十字军行动都是合情合理甚至是关乎根基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这么认为。虽然人们公认十字军东征行动通常具有较高的威望，提供了衡量其他十字军行动的标杆，但教皇们对十字军的定义（我们将其描述为“多元主义的”）能否反映当时普遍的看法，能否对现在的研究有用，对此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下文会提及）。当然，本书是由一名多元主义者写就的，所以他的立场自然与教皇类似。但我们的确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有如此多的天主教徒参与了在欧洲或其边境地区展开的十字军行动，因此，如果有研究者想要全面均衡地考察这场运动，就不能忽略在西部的战场。教皇会对特定时期内各种行动选择孰轻孰重做出判断。有时一个战区的事态发展可能影响

① 1190 或 1200—1277，法国人，多明我会修士，1254—1263 年间曾任该会第五任总会长。——译注

② 古时法国南部的一个省份。——译注

到另一个战区事件的进程，比如西班牙人宣称，到达耶路撒冷的最佳路线就是将再征服运动扩展到解放北非；有时两个地方还会直接相关，比如条顿骑士团将普鲁士视为进攻巴勒斯坦的练兵场。

现代多元主义是一种模型。而所有的模型，当其标准被过于严格地应用时，都会不可避免地崩溃。现代多元主义适用于十字军的很多行动，如十字军东征，自 14 世纪以降保卫欧洲免受土耳其人侵扰的十字军行动，西班牙再征服时期的某些征战，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的长期征战，在芬兰—俄罗斯边境进行的某些征战，以及针对阿尔比派（*Albigensians*）<sup>①</sup>、胡斯派（*Hussites*）<sup>②</sup>、蒙古人还有教皇及其盟友在意大利的反对者的十字军行动等，但却无法涵盖在本书中必须加以考察的许多其他相关行动。骑士团的成员们按理来说根本不是十字军战士，因为他们没有发过十字军圣誓，哪怕这只是暂时性的承诺，但他们却表明自己具有宗教虔诚，始终为保卫基督教国度而战。拉丁人占领的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的世俗宗主和骑士们也不是十字军战士，他们保护自己的家园和财产的斗争通常也并不算十字军战争。14 至 17 世纪为抗击土耳其人而形成的多个联盟的行动，从严格意义上讲也不算十字军运动，因为尽管拥有教皇的授权，很多参与者也都曾发过十字军圣誓并获准使用武力，但这些由独立的基督教国家组成的联盟，即使在其境外也进行着鼓动人们支持的宣传活动，仍缺乏十字军行动所具有的跨国界影响的特征。当然，这些也都与十字军运动密切相关，如果不一并考虑进去实在有些荒唐。我相信，将它们全部视作一场潜在的十字军运动的表现形式最为恰当，该运动一直到 1798 年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投降并将马耳他岛拱手让给拿破仑·波拿巴时才最终落幕。

xxxii

十字军运动是根据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敌意得到界定的，这个假设存在了

① 中世纪反对正统教会的一支派别，纯洁派（*Catharism*）的一支，否认三位一体、圣礼和炼狱等教义，被教会定为异端，因在 12 至 13 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图卢兹的阿尔比（*Albi*）而得名。——译注

② 15 世纪早期于捷克发动宗教改革运动的一支派别，因其发动者扬·胡斯（*Jan Hus*, 1369—1415）而得名。——译注

个世纪之久。在本书接近完结处，我将触及多元主义对它的挑战：吉尔斯·康斯特布尔（Giles Constable）教授曾指出，多元主义并不会“问某次十字军行动的目的地是哪里……[而是]问某次十字军行动是如何发起和组织的”。而在我看来，多元主义取得的另一项成就是，它鼓励了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看待不同类型的材料。在多元主义的引导下，一些人把目光转回欧洲，深入布道者及其听众的思想中，深入社会关系网络的运转和草根阶层观念的表达中，深入在罗马展开的有关战略和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深入在西方的骑士团总部（正是这里为在东方作战的骑士团提供了人力和物力）的管理状况中。这些学者的研究对原有解释路径造成了冲击，尤其动摇了对十字军运动做物质主义解释的基础。因为，对于这样一项充满艰辛、误导重重、令人望而生畏且花费不菲的事业，如果仔细研究过人们参与的原因，无论是谁，都会开始质疑对于获利的预期最终会有多大推动力，毕竟最终能够获利的证据实在太少了。

xxxiii

意识形态（尽管是与我们自己大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从历史上教会对十字军运动的态度中得到了确认。从12世纪到17世纪，天主教会的主教们达成的共识是，符合条件的人们负有自愿加入十字军的道德义务。这一观点先后得到一系列被公认为圣徒的男男女女们的支持，因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这些圣徒包括：克莱沃的贝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sup>①</sup>、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瑞典的圣布里吉特（Bridget of Sweden）<sup>②</sup>、锡耶纳的圣凯瑟琳（Catherine of Siena）<sup>③</sup>、卡皮斯特拉诺的圣乔瓦尼（John of Capistrano）<sup>④</sup>，甚至还有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sup>⑤</sup>。从1095年

① 1091—1153，法国修会改革者，对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起了很大作用。——译注

② 1303—1373，又称为瓦斯泰纳的布里吉特或圣布里吉塔（特），为至圣救主会（布里吉特修会）的创始人，1391年被封为圣徒，是欧洲六大守护圣徒之一。——译注

③ 1317—1380，多明我第三会修女，经院哲学家，神学家，与阿西西的方济各并称为意大利两大守护圣徒。——译注

④ 1386—1456，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修士，传道者，神学家，曾于70岁高龄时率十字军在贝尔格莱德之围中抗击奥斯曼土耳其人。——译注

⑤ 1181或1182—1226，方济各会创始人，提倡过贫穷的生活，是当时浮屠教会中的改革者。——译注

的乌尔班二世 (Urban II) 到 1684 年的英诺森十一世 (Innocent IX), 一位又一位教皇曾书写或授权发布包括众多通谕在内的各种谕令, 号召虔信者们参与十字军东征。如果虔信者们积极响应号召, 教皇就提供给他们精神方面的特权; 而如果不响应, 就用神圣惩罚来加以威胁。这些谕令构成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连贯一致的教诲体系, 其主题关乎十字军运动的神学和伦理价值。教皇们还赞同成立一种新的宗教机构——骑士团, 并赋予其特权。托马斯·阿奎那则为这种机构的功能提供了合理论由。其中的马耳他主权骑士团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 和条顿骑士团 (Teutonic Order), 作为教会的修会组织留存到今天, 不过都已经失去了其军事功能。条顿骑士团还有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分支叫乌得勒支辖区团 (Bailliwick of Utrecht), 马耳他主权骑士团则有英国国教和路德宗或加尔文宗的分支, 分别为至尊至圣约翰骑士团 (Most Venerable Order of St. John) 和三个德意志地区的圣约翰骑士团 (Johanniterorden)。以十字军名义召开的大公会议<sup>①</sup>至少有五次, 其中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 (1215) 和第二次里昂会议 (1274) 分别颁布了名为《所谓自由》(Ad liberandam) 和《为热情的信者》(Pro zelo fidei) 的法令, 二者均属于对十字军运动具有界定意义的文件。这一系列神学理论和情感上的支持, 绝不能被忽略或轻描淡写地对待。在 13 世纪 70 年代早期, 有一种观点认为, 如此众多身份尊贵的人士因十字军的征战而丧生, 对基督教世界造成了伤害。而为了回应这种观点, 布道者罗芒的安贝尔写了一份报告。我在本书的第一版中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话:

基督教的目的不是让人们在世间繁盛, 而是让人们在天堂繁盛。如果尘世间基督徒的数量是因为上帝献身而减少, 那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 因为, 通过这种牺牲方式, 那些或许根本没有其他方式可以上天堂的人们上了天堂。

<sup>①</sup> Ecumenical Council, 或简称 Council。大公会议 (或称公会议、普世公会议、普教会议) 是传统基督教中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世界性主教会议, 咨审表决重要教务和教理争端。——译注



这其中的遣词造句曾让一些读者感到震惊，但安贝尔所讲述的不过是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的观念。当时有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都准备为一项他们认为正义甚至是带有救赎性质的事业而牺牲财富、健康甚至生命，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他们的行动体现了个人的虔诚，对我们来说这种虔诚的心态可能很陌生，但对他们来说却是非常真实的。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CRUSADES: A HISTORY**

© Jonathan Riley-Smith 1987, 2005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本书根据康蒂纽姆国际出版集团 2005 年版译出。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授权商务印书馆独家翻译、出版，并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 目 录

地 图 / 1

第二版前言 / 15

第一版前言 / 18

导 言 / 19

## 第一章 十字军运动的诞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传道工作 / 1

开战的原因 / 1

教皇乌尔班二世 / 3

为解放而战 / 7

一场苦行赎罪的战争兼朝圣之旅 / 12

耶路撒冷 / 15

作为赎罪者的十字军战士 / 18

回 应 / 23

“第一次大屠杀” / 32

## 第二章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程 / 35

伊斯兰世界的状况 / 35

第一波浪潮 / 36

第二波浪潮：行军至君士坦丁堡 / 40

第二波浪潮：从君士坦丁堡到安条克 / 45

第二波浪潮：围攻安条克及其后果 / 52

第二波浪潮：解放耶路撒冷 / 58

第二波浪潮的成果 / 60

第三波浪潮 / 61

十字军圣战观念的发展 / 64

### 第三章 耶路撒冷和安条克的圣地及大主教辖区 / 67

定居点建立 / 67

装点圣地 / 71

拉丁教会成立 / 82

1110 年以后与当地人的关系 / 88

拉丁教会的贡献 / 100

### 第四章 拉丁东方地域的建立、管理和防卫（1097—1187） / 111

乡间与城镇 / 111

管 理 / 115

王室与领主们 / 120

从鲍德温一世到鲍德温五世 / 126

保卫定居点 / 135

哈丁之战与耶路撒冷失守 / 145

### 第五章 成长中的十字军运动（1102—1187） / 149

十字军战士还是朝圣者 / 149

12 世纪最初的十字军运动 / 154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 160

士气低落 / 175

传统的发展 / 179

## 第六章 十字军运动的成年礼（1187—1229） / 183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 183

1197年的十字军行动 / 194

教皇英诺森三世 / 196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 198

波罗的海的十字军运动 / 212

针对安维勒的马夸德的十字军运动 / 215

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运动 / 216

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 / 224

儿童十字军运动以及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宣道活动 / 226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历程 / 233

腓特烈二世的东征 / 238

## 第七章 成熟期的十字军运动（1229—约1291） / 241

13世纪中期的十字军思想 / 241

伯爵们的十字军行动（1239—1241） / 246

圣路易的第一次东征 / 249

普鲁士和利沃尼亚的十字军行动 / 257

第一批针对蒙古人的十字军行动 / 261

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 / 261

针对异端的十字军运动 / 263

政治性的十字军运动 / 264

圣路易的第二次东征 / 272

教皇格列高利十世 / 278

1276年后没能再发动大规模东征 / 280

## 第八章 拉丁东方（1192—约1291） / 283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 / 284

塞浦路斯 / 284

希腊 / 286

意大利人 / 295

阿尤布王朝 / 298

定居者们对伊斯兰世界政治的了解 / 299

安条克—的黎波里 / 300

耶路撒冷王国内的制度性冲突 / 302

马穆鲁克王朝崛起 / 312

亚洲贸易路线的变迁 / 313

马穆鲁克王朝的征服 / 315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定居点被毁 / 316

## 第九章 十字军运动的多样化（约1291—1523） / 321

可选择范围 / 321

十字军理论家 / 323

圣殿骑士团的瓦解 / 325

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 / 329

圣约翰骑士团在罗得岛 / 333

骑士团国家的特征 / 337

塞浦路斯 / 338

希腊 / 340

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 ( 1302—1354 ) / 343
意大利的十字军运动 ( 1302—1378 ) / 345
阿卡陷落后导致的十字军东征行动 / 347
十字军东征行动 ( 1323—1360 ), 以及同盟的出现 / 350
塞浦路斯的彼得一世 / 353
对土耳其人的关注 / 354
大裂教危及十字军运动 / 356
马赫迪亚和尼哥波立的十字军行动 / 357
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行动 ( 1397—1413 ) / 359
针对胡斯派的十字军行动 / 360
瓦尔纳的十字军行动 / 362
对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多种反应以及农民军的再次出现 / 363
庇护二世 / 365
征服格拉纳达与进攻北非 / 367
十字军行动筹划 ( 1484—1522 ) / 368
<b>第十章 旧时代与十字军运动的消亡 ( 1523—1798 ) / 373</b>
改 革 / 373
骑士团 / 376
北 非 / 378
东部的场景 / 382
圣约翰医院骑士团与马耳他 / 388
十字军运动的消亡 / 393
后 记 / 397
批判性的罗曼史 / 397

浪漫的帝国主义者 / 399

新帝国主义者：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锡安主义和穆斯林 / 403

新帝国主义史的伊斯兰化 / 407

历史学传统面临的挑战 / 409

参考文献 / 413

索引 / 435

译后记 / 489



# 第一章

## 十字军运动的诞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传道工作

### 开战的原因

在 1095 年 3 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教皇乌尔班二世主持召开了一次大会议，地点是在意大利北部的皮亚琴察。拜占庭皇帝亚历克塞一世的一位使节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请求西方世界帮助抗击突厥人。突厥人正在小亚细亚大举扩张，如今离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仅咫尺之遥。以这次请求为序幕，一系列事件将相继发生，最终导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启动。

到 8 世纪初，基督徒在与穆斯林的拉锯战中，已经失去了北非、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边界线至此也基本固定下来。但到了 10 世纪下半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统治着罗马帝国东部遗留的半壁江山的拜占庭（或希腊）皇帝们开始发动攻势，导致边界又开始出现变动。伊斯兰势力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表现相对处于劣势，这部分源于以下事实：130 年前，他们的信心就已经被动摇。当时，古老的塔尔苏斯（Tarsus）<sup>①</sup> 和安条克（Antioch，即安塔基亚 [Antakya]）<sup>②</sup>

---

① 圣经中译为大数，地中海沿岸商贸城市，罗马帝国时期为西里西亚省首府，亦是使徒保罗的出生地，故保罗常被称为“大数的保罗”，该城今位于土耳其境内。——译注

② 圣经中译为安提阿，地中海沿岸商贸城市，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塞琉古一世所建，亦是军事要塞，今位于土耳其境内，是使徒在公元 1 世纪重要的传道根据地。——译注

城被基督徒夺回，拜占庭的边界线推进到了叙利亚北部。伊斯兰世界上下都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公元963年，600名基督徒志愿兵从呼罗珊（Khorasan）行进到了相距1200英里之遥的摩苏尔（Mosul）；三年后，又有两万人抵达那里。基督教世界的节节胜利又恰好与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变动同时发生。这些内部变动改变了伊斯兰世界西部的状况。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们的权威已经瓦解，沦落到受什叶派王公们摆布的地步；而逊尼派则视这些什叶派王公为异端。公元969年，埃及几乎完全不加抵抗地接受了另一个什叶派王朝——法蒂玛王朝，一个与巴格达分庭抗礼的哈里发政权就此建立。法蒂玛王朝曾从阿拔斯王朝手中夺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但在11世纪六七十年代却被迫在突厥人面前退却。突厥人利用埃及17年内乱之机，夺走了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的大部分领地，使得法蒂玛王朝只掌控了巴勒斯坦的部分区域，而且就连这种控制也并不牢固。但也正是突厥人，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界线一带重振了穆斯林的声威。

在更远的东方，在咸海以东突厥草原边缘地带，一些说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于10世纪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一个规模较大的群体由名为塞尔柱（Selchük）的酋长统领，他们作为雇佣军进入了定居的伊斯兰区域。到公元1037年时，他们已经控制了呼罗珊，而公元1040年在丹丹坎（Dandanqan）战役中的胜利又让伊朗的大门向他们敞开。公元1049年，塞尔柱的孙子图格鲁勒（Tughrul）<sup>①</sup>率领着由几乎不受控制的游牧突厥民族以及更正规的军队混杂而成的队伍，渗透到亚美尼亚一带。公元1055年，图格鲁勒进入巴格达；到1059年时，他已经是伊拉克的主人，其势力范围远及拜占庭和叙利亚的边境地区。他以阿拔斯哈里发的名义建立了一个苏丹国，统辖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部分地区。在皈依伊斯兰教时，这些塞尔柱突厥人皈依的是伊斯兰边疆地带那种带有攻击性的、更为严厉的派别。他们为自己的西进所找的正当理由是：抗击伊斯兰世界中的腐坏行为。他们相信这种行为就

---

<sup>①</sup> 约990—1063，塞尔柱王朝的创建者。——译注

体现在一个多世纪以来正统的逊尼派哈里发受什叶派王公摆布的丑闻中。在西进完成后，他们的关注点则转移到对抗埃及的异端哈里发上。

而塞尔柱突厥人早期对基督教世界发动的袭击都是偶发的，并没有什么一贯目的。从 11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游牧族群深入到拜占庭控制的亚美尼亚地区劫掠；而到 11 世纪 60 年代末，他们的身影又出现在西里西亚和安纳托利亚一带。跨越边界之后，这些游牧族群就出了图格鲁勒的侄子兼继承人阿勒卜·阿尔斯兰（Alp Arslan）<sup>①</sup> 的控制范围，这迫使他不得不开始干预这些地区的事务，而这又激起了拜占庭的武力回应。1071 年，阿勒卜·阿尔斯兰发动了一次战争，虽然出于巩固边界的目的他攻占了几处基督徒控制的城池，但他的本意却是为了征服穆斯林控制的阿勒颇。他顺利攻占了这座城市后，却听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第欧根尼（Romanus IV Diogenes）正准备向他发动进攻。于是，阿勒卜·阿尔斯兰对希腊人发动突袭，消灭了他们，并在曼奇科尔特（Manzikert）战役中俘虏了罗曼努斯四世。

与此同时，拜占庭的军事力量正在衰退。曼奇科尔特战役向突厥游牧族群打开了通向拜占庭帝国领土的大门，而希腊将领们忙于内斗、争夺皇位的短视行为更加速了游牧族群侵袭的进程，因为他们在争斗中招募突厥人为自己服务，从而让这些族群在帝国内部站稳了脚跟。拜占庭帝国迅速失去了对小亚细亚的控制，这正是 1095 年它向西方求助的时代背景。

## 教皇乌尔班二世

教廷对基督教世界东部边界瓦解的担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早在 1074 年突厥人渗透的消息传来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就提出要亲自率领一支由多达五万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前去“解放”东部的基督教

---

<sup>①</sup> 约 1029—1072，原名穆罕默德·阿尔·舒贾比，此为他的称号，突厥语的意思是“勇猛的狮子”。——译注

同胞。他还说，依靠这支军队，他甚至可以推进到耶路撒冷的圣墓（Holy Sepulchre）<sup>①</sup>去。而乌尔班二世从上任伊始就一直和拜占庭皇帝保持着联系，其目的是改善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说乌尔班二世在皮亚琴察大公会议之后的举动完全是对此前希腊人请求的自然反应，这其实不太可能。更可能的是，他其实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了。

- 3 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发觉，乌尔班二世的成长经历和事业路线为他走出这一步做好了准备。大约在 1035 年，乌尔班二世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可能是香槟伯爵的一个封臣。乌尔班二世在兰斯（Reims）<sup>②</sup>大教堂附设的一所非常有名望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后来在那里受戒并成为领班神父（archdeacon）。1067 年后不久，他离开那里前往勃艮第伟大的克吕尼修道院，其动机可能是希望过更加严格的宗教生活。同一种动机将推动他的导师圣布鲁诺（St Bruno）创立加尔都西修会（Carthusians）<sup>③</sup>。到 1074 年，曾使他年纪轻轻就当上领班神父的出众能力，又使他成为了克吕尼的副院长（grand prior）。克吕尼修道院在教会事务中的作用非常关键，其僧侣们屡次应召前往罗马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服务。乌尔班二世接替一位前任克吕尼副院长，被任命为奥斯蒂亚（Ostia）红衣主教，这是红衣主教团中的一个高级职位。他在 1080 年前往罗马，卷入了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sup>④</sup>。尤其是在 1084 年至 1085 年的冬天，他试图重建德意志对格列高利七世支持的行为，更体现出了他对这场争斗的卷入之深。于是，他作为格列高利七世提名的三名接班人之一，在经历了维克托三世（Victor III）的短暂任期之后，于 1088 年 3 月 12 日被选为教

① 据传说是安葬耶稣的坟墓遗址，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 335 年于此处建造圣墓教堂，原教堂几度毁坏，多次重建。今教堂一部分为东正教耶路撒冷主教座堂，方济各会、科普特教会、叙利亚教会、亚美尼亚教会各占据一部分。——译注

② 法国东北部历史名城，位于香槟-艾登区的马恩省。——译注

③ 为天主教隐修会，因创建于法国格雷诺布尔北部的加尔都西山中而得名。——译注

④ 指 11—12 世纪时，因教皇挑战和指责西欧的君主们所掌握的圣职任命和授予权而引发的争斗。——译注

皇。在乌尔班二世于兰斯修行以及于克吕尼修行并担任副院长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到教会改革运动中众多的顶尖人物和重要事件，这也让他了解了与克吕尼修道院颇有渊源的某种观点，即世俗的骑士可具有为教会服务的功能。乌尔班二世在意大利以及在德意志担任教皇使节的经历，则让他知晓了最新的改革理念及其在教会政治中的应用方式。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出身让他能够很好地了解西方骑士们的心态。

在皮亚琴察待了一个月后，乌尔班二世在出发前往法兰西之前，开始悠游于意大利北部地区。1095年8月15日，他在勒皮（Le Puy）<sup>①</sup>。勒皮主教蒙泰的阿代马尔（Adhemar of Monteil）后来在十字军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乌尔班二世在那里向法兰西的主教们发出召集令，让他们在11月到克莱蒙（Clermont）<sup>②</sup>召开一次大公会议。随后他继续向南行进到圣吉尔（St Gilles）<sup>③</sup>，来到圣吉尔的雷蒙的领地。雷蒙是图卢兹伯爵，也是未来十字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之后，乌尔班二世沿罗讷河谷上行，大约在10月18日抵达克吕尼。他到访法兰西的原因之一，是为克吕尼新建的一座大教堂的圣坛揭幕。他在11月15日或16日抵达克莱蒙，于18日主持召开了会议，27日他向一大群主要是教会人士的听众宣称要启动十字军。然后，他开始巡游法兰西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但刻意绕开了由国王直接控制的区域，因为克莱蒙大公会议确认了以通奸罪罪名开除国王的教籍。一路上，乌尔班二世应该亲自为十字军做了不少布道动员工作，我们能找到的佐证文献中有提及他于1095年圣诞节在利摩日（Limoges）<sup>④</sup>的布道词，1096年2月在昂热（Angers）<sup>⑤</sup>和勒芒（Le Mans）<sup>⑥</sup>的布道词，以及1096年7月在尼姆（Nîmes）的布道词。他还主持过骑士接受十字架参加十字军的仪式：可

① 法国中南部城市，为奥弗涅大区上卢瓦尔省的省会。——译注

② 法国中南部古城，今已并入克莱蒙费朗。——译注

③ 今比利时布鲁塞尔地区的一座城市，以隐修士圣吉尔（650—710）为名。——译注

④ 法国中部内陆城市，为利姆赞大区的首府。——译注

⑤ 法国西部城市，法国大革命之前为旧省安茹的首府，今为曼恩-卢瓦尔省省会。——译注

⑥ 法国西北部城市，为卢瓦尔河大区萨尔特省省会。——译注

能在勒芒举行过，但 1096 年 3 月肯定在图尔（Tours）<sup>①</sup> 举行过。8 月，他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此时，十字军已经在组建中。对于一个 60 多岁的人来说，其精力之充沛实在令人感到吃惊。他此前的行程超过了 2 000 英里。他还专程进入一些乡间的城镇，那里的居民在有生之年还没有见过国王或与之类似的具有如此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因为教皇的来到，随行有一大批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主教，驮运的行李必定非常多；而整个行进的队伍必定会在乡间绵延数英里，让居民们印象十分深刻。乌尔班二世还特意安排，让自己抵达各个城镇的时间与大型的圣徒纪念节日相吻合：他在圣吉尔的纪念日来到圣吉尔；圣母升天节（feast of the Assumption）<sup>②</sup> 时在当时最大的圣母祭坛所在地勒皮；圣希拉里（St Hilary）<sup>③</sup> 纪念日前后则在普瓦捷（Poitiers）。一路上，乌尔班二世都戴着自己的三重冠。他亲自为当时法国教士们在各地雄心勃勃营建起的大教堂和修道院中的礼拜堂揭幕，并借这个场合为十字军运动做布道动员。

很多文献都描述了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大公会议及之后的法国巡游中试图传达给众人的信息。但这些描述大多不足采信，因为它们都是在十字军解放耶路撒冷之后写就的，而此时没有哪位作家能不受一种普遍的欢欣鼓舞情绪的影响，于是会倾向于为之前的种种行为都笼罩上传奇的光环。不过，流传下来的与乌尔班二世同时代的资料也足够多，尤其是他自己的信件。这些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他所呼吁的大概内容。在克莱蒙及之后的整个布道之旅中，乌尔班二世强调自己是在代表上帝宣讲。他将十字军战士们描绘成受激励的上帝的代理人，他们将出于对上帝的爱而为之服务。他还宣称十字军战士们是基督的追随者，他甚至可能将他们称为“基督的骑士”。虽然这位教皇采用的劝诫方式其实早已为一些教会改革者所用，以激励他们的军事支

① 法国中西部古城，今为安德尔-卢瓦尔省省会。——译注

② 天主教和东正教纪念马利亚去世后身体升天的节日，公元 600 年前后，东罗马帝国皇帝莫里斯将这一天定于 8 月 15 日。——译注

③ 315—368，出生于法国中西部的普瓦捷，曾任普瓦捷主教，因对神学的贡献和虔诚、神圣而获封教会博士，其纪念日为 1 月 13 日或 14 日。——译注

持者，但十字军战士们毕竟是原原本本地接受了他所宣扬的信息，从而确信自己将为上帝而战。

## 为解放而战

乌尔班二世号召人们为解放而战，这场战争将由那些为寻求赎罪而自愿发誓战斗的人们发起。他所传递的这部分信息其实早就反映在寻求变革的教士们的观点中。法兰西的中央权威此时早已分崩离析，国王并不拥有真正的权威，许多大权贵们也不享有。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至今还不得而知，但可能与下列事实相关：到10世纪时，一个为战争而构建的社会已不再具有原有的功能，因此别无出路，只能内部相互攻伐，导致许多省份分裂为仅由各个城堡及其周边地域组成的更小的单位。城堡主及附属骑士们以武力威吓着邻人，成为该地区唯一的权威。这种权威很暴力、很随意，但也让人渴求，而且是人们知道的唯一一种权威。这种分裂的过程，不管是全国还是各省范围的，都往往伴随着无法控制的暴力活动。教会的反应是开始领导一场“为了上帝的和平”运动，这表达了自由民们在大规模集会上喊出的大众心声。当时这些集会通常围绕着从各地教堂收集到的神圣遗物举行，宣扬教士和穷人应免受暴力和剥削，并禁止在每年的某个时节或每个星期的某几天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他们共同做出努力，希望迫使城堡主和骑士们和平地接受这些条款，但最终却只能通过武力达成。因此和平运动本身产生了针对破坏和平者的军事行动。而这些军事行动是以教士（如果他们是主教或修道院院长，本身就拥有自己的骑士）的名义招募并发起的。

到11世纪90年代，这种和平运动在法兰西退潮，但已经蔓延到德意志，因为那里同样四分五裂。不过，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这种和平运动也在法兰西复兴，这反映了乌尔班二世及其他人的忧虑，即担心在大领主们到东方战斗时法兰西国内会陷入群龙无首的无序状态。但无论如何，从这场和平运

动中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能把俗众组织起来，将他们的精力导引到为教会服务上面来，导致社会分裂的攻击行为也能用来为善，去从事上帝赋予的事业。于是，在欧洲各地，教士们都在把俗众变为自己的军事支持力量；而当他们想要用这些俗众及其家人能听得懂的言语来传递上帝的信息时，他们依赖的则是圣经旧约和基督教圣徒传中的那些英雄和战斗传说，因为这些对他们的听众极具吸引力。教士们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得到了回报：11世纪末的社会虽仍然动荡不安，但程度已经比之前缓和了很多。很多武人变得越来越虔诚，并且越来越公开表现出愿为教会奉献的举动。如果我们不能说在1095年之前，教会呼吁人们武力支持已经相当成功的话，那我们至少可以说，此时，在对乌尔班二世号召的回应中，似乎教会的想法与俗众的抱负终于交会：教会早已向俗众伸出的手，终于被紧紧握住。而启动了这次交会的教皇乌尔班二世，正出身于教会最想发动的那个阶层，这绝不是巧合。

6 当是时，教士们正受到一场改革运动的驱动。这场运动主导了过去的50年，并使这半个世纪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时期之一。教会改革家们希望让教会摆脱各种腐败行为，而究其根源，他们认为问题出在俗人对教会事务的影响力过大。他们希望教会能更加纯净，能更像他们在读使徒行传的章节时感受到的早期教会。而且，由于他们大多数是僧侣，曾参与此前发生的与教会更宽泛改革相伴随的隐修制度改革，因此他们是从僧侣的视角来看待早期教会的。他们想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修道院化，这绝非夸张。他们梦想由不被世俗价值观玷污的、独身禁欲的教士阶层来领导世俗的男女，而这些俗众则会尽其所能地按照修道院的模式生活并表现他们的虔诚。为了推动这项事业，僧侣们付出了大量精力。这些改革家们还以同样的热情去推动改变教会在欧洲各地的物质形态，其方式是修建众多教区教堂，每一座都像是坐落于各个俗众社区中的大型修道院。此外，他们还热情百倍地投身学术研究，尤其是通过对语法、历史和教会法的研究来论证改革运动的合法性。而其中最显著的则是教皇参与的程度。这一时期的教皇大多数都是僧侣出身，这绝非巧合。因为在其两千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教皇这个角色一般并不处在改革的最前沿。他虽然



会支持改革者，会在改革开始之后接管或控制改革，但只有在 11 世纪后期的这一次，我们才能说，教皇们会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能非常激励人心但也过度前沿的危险位置上：成为教会中一个激进派别的领导人。

当乌尔班二世呼吁“自由解放”(liberation)时，他所使用的这个概念因过去半个世纪中改革家们的使用而变得丰满起来。这些改革家们所持有的“自由”(liberty)概念外延相当宽广，是在克吕尼这样拥有极大豁免权的修道院中孕育的。此类修道院已经习惯于享受由教皇们授予的“自由”，从而免受主教和国王权威的左右。在西方，这种解放带来的压力已经导致了暴力冲突。40 多年来，教皇一直在支持武力对抗那些反对其新观点的势力。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 1080 年前后，一群德意志权贵把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拉进了他们与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待任皇帝(emperor-designate)<sup>①</sup>亨利四世的战争中。这场战争蔓延到意大利，格列高利七世被赶出了罗马，一位敌教皇(anti-pope)<sup>②</sup>取而代之。乌尔班二世正是在流亡中继位的，并受到欧洲一些强大势力集团的反对。但乌尔班二世成功地重建了支持自己的力量，这集中体现在 1094 年他重回罗马，以及皮亚琴察大公会议上的情形：大量主教以及大批强大世俗势力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鉴于拉丁教会对“自由解放”的号召已经启动了具有解放力量的武力的使用，那这种武力的使用进一步延伸到其他地方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在这些地方，基督徒们所受到的阻碍比他们的西方同胞更强大。乌尔班二世也用“自由解放”一词来形容诺曼伯爵罗杰对西西里的进攻，以及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基督徒开始重新占领在 8 世纪时失陷在穆斯林手中的领地)——1085 年托莱多被基督徒攻占，这引起了轰动。而格列高利七世在 1074 年的提议也表明，作为僧侣，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赞美诗中不断提到耶路撒冷。因

---

① 指已当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但还没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状态。亨利四世 1084 年才加冕。——译注

② 即僭称的罗马教皇，其是由非合法手续选出的对立教皇，故不予正式承认，历史上此类教皇共有 29 位。——译注

7 此，当改革家们想到东方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圣城。从这方面来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根本不需要什么具体的开战原因，因为这场改革运动所具有的内在动力迟早会把它带向那里。

1095年，乌尔班二世宣布发动一场具有两个明确解放目标的战争。战争的第一个目标是解放东方尤其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使之免受穆斯林的野蛮暴政压制。这也是对人的解放，是要解救那些受过洗的教徒。乌尔班二世显然将伊斯兰教统治下的生活描述得相当悲惨，并夸大了突厥人当时对君士坦丁堡构成的威胁（他们的前进势头在1092年已经停止了），尽管这一切在希腊人听起来似乎还相当真实。很显然，他还将此目标与整个教会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一点上乌尔班二世与他的前任们一样，总是把某个特定群体的解放与整个教会的需求和革新联系在一起。但还有另一个原因让他无法孤立地看待十字军运动。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并非唯一被撼动的边界，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南边界同样出现动摇。在科尔多瓦的伍麦叶哈里发政权于1031年瓦解后，摩尔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裂分出多个小王国。11世纪后半叶，随着基督教势力施加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小国的君主们试图向位于北非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当时的统治者伊本·塔西芬（Ibn Tashfin）寻求帮助。阿尔摩拉维德人（Almoravids）起源于柏柏尔人中一支军事化的逊尼派力量，随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以马拉喀什（Marrakech）<sup>①</sup>为中心。阿尔摩拉维德人特点鲜明，信仰狂热，强调回返早期宗教的纯洁性，而且很不宽容。他们跨海来到西班牙，占领了这里，并于1086年在萨拉卡（Sagrajas）大胜基督教军队。此役后，他们用装满死难基督徒头颅的推车环游西班牙和北非各处，以向虔诚的穆斯林们证明基督徒不足为惧。作为回击，一支法国远征军（其中包括若干未来的十字军战士）前往西班牙作战，但仅在1087年打了一场影响力不大的战斗。

---

① 摩洛哥西部城市。——译注

因此，毫不奇怪，西班牙应该也是乌尔班二世的关注点之一。而且几乎在进行十字军布道伊始，他就曾热情地支持（有些证据还确实表明正是他本人启动）了一次旨在夺回塔拉戈纳（Tarragona）<sup>①</sup>的行动。这是一座位于西班牙沿海无人区的死城，在巴塞罗那以南 50 英里处。巴塞罗那伯爵在众人的鼓励推动下领导了这次行动，他在对民众的讲话中把这个城镇称为“圣彼得的土地”。乌尔班二世任命了一名大主教以推动移民垦殖活动，与该地区的贵族们一道重建城镇；而作为“苦修赎罪”之举，他建议那些计划展开朝圣之旅的人，哪怕原本打算去往耶路撒冷，也不妨考虑转而为塔拉戈纳的重建出钱出力。他向人们保证，这么做会使他们得到同等的精神收获。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在他为十字军布道动员完毕之后，当得知加泰罗尼亚人也打算参加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征战时，他命令他们留在家乡。他许诺称，他们在那里就能够实现为加入十字军而立下的誓言，“因为如果只在一个地方将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解救出来，却坐视他们在另一个地方承受穆斯林的暴政和压迫，这算不上什么善举”。乌尔班二世的劝诫收效甚微，因为在他接触过的四位西班牙伯爵中，至少有两位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虽然如此，他仍然继续将东方征战与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相提并论。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并没有把乌尔班二世有关西班牙的言论视为十字军运动转向另一个战场的标志，但至少认为，伊比利亚的十字军行动的基础是由十字军运动的发起者奠定的，这源自他对保留之前一种渴望的关注。

十字军运动的第二个目标是解放耶路撒冷的圣墓。这个地点清楚明确，对十字军战士们非常有吸引力，其号召力远高于去解放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空泛的目标。曾经有人认为，解放耶路撒冷的目标是次要或者说长远的，乌尔班二世的直接关注点是帮助希腊人抗击突厥人，并改善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关系。然而，在有关乌尔班二世布道之旅的各种描述中，我们能找到大量证据表明，在克莱蒙会议的决定中，以及出发前往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战士们

① 西班牙东北部港口城市。——译注

所持的纲领中，这从一开始就是首要目标。如今我们知道，对耶路撒冷的热望（或者说是对于该城中心的基督空坟的热望）在那个时代几近迷狂，就连拜占庭皇帝亚历克塞本人多年来也曾亲自与西方的贵族们接触，诱使他们产生对解放耶路撒冷的期望。

### 一场苦行赎罪的战争兼朝圣之旅

乌尔班二世号召十字军战士拿起武器来斗争，这种苦行赎罪的思想根源起于叙任权之争。在此期间，尽管这么做使得教皇们必须直面当地罗曼贵族的贪婪和野心（过往的经验表明，除非受到钳制，他们能将教廷玩弄于股掌中），但卷入斗争的各位教皇还是勇敢地迈出了放弃西方皇帝<sup>①</sup>庇佑原则的第一步。面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纷争，对邻近地域的贵族们又疑虑重重，教皇们于是试图在意大利寻找盟友，并在欧洲全境培养一批世俗拥护者。他们还求助于博学之士，试图为基督徒使用暴力寻找合法性依据。在这方面围绕在托斯卡纳公爵夫人玛蒂尔达（*Countess Mathilda of Tuscany*）周围的一群杰出人士作用尤为突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称的“智囊团”。玛蒂尔达是教会激进改革最忠心的支持者之一，她身边的这群学者致力于复兴并发展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的观点。作为讨论基督徒武力最权威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长期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在智识推理上令人叹服的讨论积极武力的理论，以及有关使用武力为上帝服务的合法性论证。卢卡的安瑟伦（*Anselm of Lucca*）<sup>②</sup>将奥古斯丁的有关论述编纂成一本文集。曼图亚的约翰（*John of Mantua*）则以客西马尼园发生的事件为依据展开了论述：当时，圣彼得拔剑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结

① 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在东方的拜占庭帝国皇帝相对。——译注

② 1036—1086，此处应指小安瑟伦或安瑟伦二世。与之相对的是其叔父，即后来成为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老安瑟伦。小安瑟伦是意大利的一名主教，是叙任权之争中的重要人物。——译注

果遭到基督的斥责。<sup>①</sup> 约翰认为，虽然圣彼得身为神职人员不得亲自挥剑，但他和他的继承者——教皇们却拥有指挥剑的权力，因为基督只是对圣彼得说把剑收回剑鞘而没有让他扔掉。苏特里的博尼佐（**Bonizo of Sutri**）<sup>②</sup> 则重拾了“在战斗中为信仰殉难”的观念。从 9 世纪开始，教皇们就不时会谈到这一观念。其中有两位主张，怀着正确信仰而在对抗不信者的战斗中牺牲的战士将会得到永生。有一位更进一步给出承诺称，死者将因此得到彻底的宽恕。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那段时间教会法学家沙特尔的伊沃（**Ivo of Chartres**）<sup>③</sup> 撰写了自己的著作，上述先例似乎说服了他，使他认为在与虔信者之敌的战斗中牺牲者将会得到奖赏。与此同时，1053 年，教皇利奥九世（**Leo IX**）带领的军队在奇维塔特（**Civitave**）战役中被诺曼人击败，他在谈到此役中的殉难者时使用了“殉道”（**martyrdom**）一词，从而扩大了“殉道者”这一称号的外延。

尽管玛蒂尔达身边学者们的言论令人吃惊，但十字军运动并不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意味着拿起武器为上帝服务，因为教廷将要宣扬此乃苦行赎罪（**penance**）之举。而且，正如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让布卢的西吉贝（**Sigebert of Gembloux**）<sup>④</sup> 指出的，这偏离了基督教会之前有关暴力的教导。甚至直到 12 世纪，有关战斗是否光荣（无论战斗者最终命运如何）这一问题仍是众说纷纭。从怀疑任何战斗行为都不可能避免犯罪，到确信利他的暴力是善的，种种观点不一而足。苦行赎罪战斗的观念具有革命性，不仅因为它终结了当时的争论，而且也因为它把战斗能带来的荣耀与祈祷、善行与斋戒相提并论。过去人们曾认为，教廷圈子中最初出现这一观念的证据，是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为将在 1063—1064 年前往围攻伊斯

① 事见约翰福音 18:10-11。——译注

② 约 1045—1090，位于意大利中部的苏特里主教，在叙任权之争中是格列高利七世的坚定支持者。——译注

③ 约 1040—1115，沙特尔主教，当时的一位著名教会法学家。沙特尔位于法国北部，距巴黎西南方向 96 公里。——译注

④ 约 1030—1112，叙任权之争中的保皇派历史学家，反对教皇权力的扩张。——译注

兰要塞巴瓦斯特罗 (Barbastro)<sup>①</sup> 的基督教士兵颁发“特赦令”。不过，最近有人主张，认为亚历山大二世颁发“特赦令”给这些士兵毫无根据，手谕可能是写给朝圣者的；因此格列高利七世才更可能是这方面的先驱，是他首次宽泛地谈到参与某种类型的战斗将是善行，将得到荣耀，并断言这样的举动能赎罪。让布卢的西吉贝写道：这种观点是格列高利独有的。他想说的是，正是格列高利七世开了先河。

格列高利七世与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神交已久，两人身边的人也经常交换看法。正是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赎罪战争的观念出现，并导致一位反对改革者指控格列高利七世“煽动流血事件……煽动那些寻求摆脱罪恶的俗人们”。让布卢的西吉贝写道，格列高利“命令……玛蒂尔达，为了赎清罪过，应起而与皇帝亨利抗争”。此举使得格列高利七世首次提出了战争可以是赎罪性质的这一观点。“赎清罪过”这个词响应了“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sup>②</sup> 中对洗礼的定义，其用意再明显不过。格列高利七世的观点也体现在卢卡的安瑟伦的实际经历中。安瑟伦手下的一名神父曾描述过，安瑟伦在 1085 年如何向玛蒂尔达的军队传递了福音：“为了赎清他们的罪责，我们将让他们承受即将到来的战斗造成的危险。”因此，安瑟伦以这样的论证方式说明了赎罪战争的合理性：为正义事业而战的举动之所以可以赎罪，是因为这非常危险。

这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战斗类型。有一段时间，十字军运动虽然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但并非唯一的表现方式。人们相信，比萨人在 1087 年对马赫迪亚 (Mahdia)<sup>③</sup> 发动进攻是“为了赎罪”；而在耶路撒冷获得解放后一片欢欣鼓舞的气氛下，教皇帕斯卡尔二世 (Paschal II) 呼吁刚结束东征回乡的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 (Count Robert of Flanders) 与反对改革者再打一

① 今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韦斯卡省的一个市镇。——译注

② 产生于公元 325 年于小亚细亚北部尼西亚城召开的大会议上，是传统基督教会三大信经之一，是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一项基本决议，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译注

③ 突尼斯古城，在地中海马梅特湾沿岸。10 世纪时，伊斯兰法蒂玛王朝曾建都于此。——译注

场赎罪战役。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的前十年中，战斗是赎罪之举的观点在教皇支持者们的亲戚朋友中间必定已然传遍，并且它又从赞同这一观点的修道院群体那里传播到邻近的乡间地带。仅仅因为参与赎罪之战的人们全然不顾可能经历的种种不愉快，毅然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凭此就想将承受痛苦甚至牺牲生命说成是赎罪之举（并因此可能歪曲了作恶者的内在本性），这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乌尔班二世的成就在于，他为这一观点设置了一种更令人信服的背景：他把它与所有传统赎罪之举中最具吸引力的一种联系起来——去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

## 耶路撒冷

86年前，也就是1009年，耶路撒冷的圣墓被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哈基姆（Hakim）下令摧毁。基督的这座洞穴坟墓几乎被完全夷为平地，只有地表部分和矮墙还残留。当圣墓被毁的消息传到西方世界时，法国爆发了针对才形成不久的犹太人社群的大规模迫害浪潮，有大批人被杀。激烈的反犹情绪爆发，并再次与对圣墓的关注相连，这将构成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早期阶段的特征。但同时，圣墓被毁和巴勒斯坦发生的迫害基督徒事件也阻碍了人们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此之前，朝圣浪潮几近泛滥。朝圣人群的增加或许反映了当时人们心中的焦虑情绪：随着公元1000年的到来，最后审判日即将来临。因为正是在耶路撒冷，末日来临的最后征兆即将出现：敌基督现世，救世主回归，坟墓开始裂开，尸骨与尘土重新组合，死者全部复活。数个世纪以来，朝圣者一直都在前往耶路撒冷，与其信仰相关的中心在西欧也已经确立，但当时普遍的虔诚却更激起了一股对圣地近乎狂热的迷恋。在一些神圣的遗物从耶路撒冷运回分放在各地教堂之后，人们的热情更加高涨。其中，罗马的拉特兰宫（Lateran Palace）和朗格多克的穆瓦萨克修道院（abbey of Moissac）收藏的圣物尤其著名。在11世纪期间，很多新建

起来的教堂被敬献给圣墓或真十字架（True Cross）<sup>①</sup>，或者按照圣墓所在圣殿的形制建造，有些甚至直接将所有权献归圣墓。

这种热情是对“负罪”几近病态的一种关注带来的副产品。尘世间的男男女女都深深地意识到，他们所所处的社会具有先天负罪的特征。这不仅因为这个社会充满暴力，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标准和路径由尚武的阶层控制，而且也因为在僧侣们的影响下，教堂致力于向俗世宣讲福音，并对俗众提出了高得不切实际的行动标准。在一个人们倾向于公开表现虔诚的社会里，对大多数人而言，参加弥撒和前往朝圣都是自然而然会选择的方式，用来展示宗教热情和因负罪而感到的悲苦。在各地的朝拜中心地点之间，来往的人流频繁，俗众与地方宗教社群间的密切联系促进了这种流动，而这种流动反过来又强化了相互联系。这些宗教群体通常是圣殿的守护者，使得俗众与圣殿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不过，还有许多朝圣者走得更远。驱使他们这么做的动机，不仅包括暂时的主动自我放逐之举所具有的虔诚和赎罪意义，而且也包括朝圣中心供奉的圣徒遗骨及与之相关联的圣徒们曾行过的奇迹。这些圣徒包括康克斯的富瓦（Faith at Conques）<sup>②</sup>、弗勒里的本笃（Benedict at Fleury）<sup>③</sup>以及达勒姆的卡斯伯特（Cuthbert at Durham）<sup>④</sup>，从非常特别、有时显得有点任性甚至带有报复性质的保护举动到治愈病人等，他们所行奇迹不一而足。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奇迹有时发生在路途遥远的最伟大的朝圣中心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sup>⑤</sup>、罗马和耶路撒

① 据传说是耶稣被钉于其上的十字架，但根据新约希腊语原文，处死耶稣的刑具并无十字架之意。直至公元4世纪，十字架才因君士坦丁的主张而与基督教相关联。——译注

② 法语写作 Sainte Foy，据说为阿基坦地区阿根的一个年轻女子，3世纪末或4世纪初在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期间因拒绝改信而被折磨致死，后被封圣。9世纪，其遗骨被偷运至康克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中，而那里遂成为朝拜她的中心。——译注

③ 约480—约550，西方隐修制度的创始人，创建了苏比亚科修道院和卡西诺山修道院，制定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本笃会规”，后成为欧洲的守护圣徒。弗勒里自7世纪起宣称存有其遗骨。——译注

④ 约634—687，英格兰僧侣，主教，死后成为中世纪英格兰北部的守护圣徒。——译注

⑤ 位于西班牙西北角海岸，据说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雅各安葬于此。——译注



冷一带，但为求神助而前往这些地区的举动也并不常见，人们如此长途跋涉往往是出于虔诚和求得宽恕。

大体而言，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或许最为常见）是为了完成由告解神父为其定下的赎罪苦行。就其本质而言，苦行赎罪并不需要起誓。第二种往往很难与第一种清楚地区分开来，因为它也含有苦行赎罪的成分，被称为“*peregrinatio religiosa*”（宗教之旅），即一种可能事先曾起誓，但没有告解神父参与的、自愿实施的虔诚举动。第三类是前往耶路撒冷度过余生。耶路撒冷在天国中占有特殊地位，这使得虔诚的基督徒们都想埋骨于此。

12

在 11 世纪哈基姆毁坏圣墓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朝圣活动一度陷入低潮，但它注定会再次复兴。有证据表明，11 世纪 20 年代中期，大量朝圣活动正在进行，有时人们的热情还会高涨到白热化的程度。1033 年被认为是耶稣复活的千年纪念，而在 11 世纪 30 年代拜占庭的皇帝也部分修复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于是在这整个十年中，来自西欧很多地方的朝圣者都汇聚到了耶路撒冷。到 11 世纪 50 年代，似乎又一波朝圣热潮席卷了东方。随后，在 1064 年，法兰西和德意志一带组织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朝圣运动。而推动其产生的因素是，人们确信，1065 年的复活节在日期上将与公元 33 年的那次完全一致。到 11 世纪 70 年代，由于突厥人已经遍布小亚细亚，穿越该地区的旅程必然变得比之前困难得多，但朝圣活动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在 80 年代及 90 年代初肯定还出现了增长。因此，于 1096 年出发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其实是已经兴盛了 70 年的东方朝圣活动的最后一波浪潮。

当然，正是其目的地耶路撒冷，让相关的十字军行动兼具了战争和朝圣的性质。乌尔班二世一方面使用了朝圣的术语“*iter*”“*via*”“*labor*”，但另一方面他也采用了具有军事意味的词“耶路撒冷远征”（*Jherosolimitana expeditio*）。而用一位十字军战士的话来说，这不仅是“到耶路撒冷朝圣”，而且也是“基督徒们如此……伟大的……一场远征，目的是前往耶路撒冷为上帝而战，抗击异教徒和穆斯林”。有两兄弟都宣誓参加了十字军：

一方面，为了朝圣的荣耀，另一方面，为了在上帝保护下，扫除异教徒造成的乌烟瘴气以及他们过度的疯狂，在这种野蛮脾性的驱动下，不计其数的基督徒遭到他们的压迫、俘虏和残害。

## 作为赎罪者的十字军战士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同时也是一场去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这一事实强化甚或合法化了它作为赎罪战斗的现实形象。克莱蒙大公会议颁布决议称，任何人“只要是出于全然的奉献精神，而不是为了赢得荣誉或金钱，加入了十字军……就能够以此次旅程抵消所有的罪过”。乌尔班二世本人也向十字军战士们许诺：

13

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去往东方不是为了求取尘世间的利益，而仅仅为着自身灵魂的救赎和教会的解放，那我们，既代表自身的权威也代表在高卢人中的所有大主教及主教的权威，仰赖全能的上帝及天主教会祈祷者们的慈悲，免除他们因自身罪过（对此他们已做了真正彻底的告解）而背负的所有罪责。

有些历史学家显然对乌尔班二世言论中明显的自相矛盾感到困扰。他是否仅仅免除了告解神父规定他的斗士们须照做的赎罪苦行呢？或者其实是十字军战士们自己假设教皇免除了他们因在今生或来世犯下的罪过而须受的惩罚呢？然而，依照当时的赎罪神学理论看，这其中并没有矛盾，因为乌尔班二世使用的多个术语其实所指相同。他对十字军的“特赦”其实根本不算是特赦，而其实是权威的语气从神父的立场断定：十字军战士们主动承担的赎罪苦行将是非常沉重的，因此它将能彻底“赎罪”；上帝不仅将消除他们因近期犯下的罪过而带来的本应承担的惩罚，而且还会消除他们之前因不够

充分的赎罪苦行而遗留下来的惩罚。乌尔班二世并不是在发动一场精神上的朝圣之旅（这是特赦观点意指的类型），因为他假设，即使事实上它或许并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上帝也将先期视一种英勇善举为“彻底赎罪的”。他其实是在宣告一场战争，而参与其中的战士们将自动自发地为自身施加适当的惩罚，以达到彻底赎罪的目的。

事实上，乌尔班二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朝圣。它与“*peregrinatio religiosa*”类似，因为是出于虔诚自发而为的。但它又与赎罪性质的朝圣类似，因为其举动构成了正式的苦行赎罪；他把它放到了告解后进行苦行赎罪的语境里。《卡西诺山纪年》（*Monte Cassino Chronicle*）的作者（可能是一位能了解到乌尔班二世想法的教廷人士）相信，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是为了提供一种可满足“王公们苦行赎罪的要求”的方式，“……因为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过，在当地根本无法赎清，而作为俗人，如果不携带有武器的随从，又会很不自在”。他接着写道：贵族们“仰赖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权威和建议，起誓上路前往海外，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主的圣墓，以作为赎罪苦行消除自身的罪责”。换句话说，号召人们参加十字军其实是一种向神父告解的举动，是在给甲冑不离身的武人们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这是一种重大的赎罪苦行，但不需要像普通赎罪者那样以海外朝圣通常要求的、令人感到羞辱的放弃社会地位的方式去完成：不能带武器，不能带各种装备，不能骑马。十字军运动是特意发明出来的，不仅为了教会，也为了他们自身，让贵族和骑士们能够作为战士去战斗。对这一观点的评论，可在当时的历史学家诺让的吉贝尔（*Guibert of Nogent*）修士<sup>①</sup>非常著名的一段言论中找到：

上帝在我们的时代创制了圣战，于是争相参与其中的骑士团和俗众们……就能找到一种新的寻得救赎的途径。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比较

14

① 约 1055—1124，本笃会修士、历史学家、神学家。他在当时名气并不大，但因著有大量自传性质的回忆录，近年来引起不少研究中世纪生活的学者的关注。——译注

自由地在追求自身事业的同时也多少获得上帝的恩典，穿着自己习惯的衣服，而不需要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迫完全弃绝世俗事务，选择隐修生活或其他宗教圣职。

毫无疑问，十字军战士们明白，他们是在苦行赎罪，他们所承担的事业将有助于在未来获得救赎。他们留下的大多数誓词状都弥漫着带有悲观色彩的虔诚情感，具体体现在对邪恶及其造成的后果的恐惧和担忧，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乌尔班二世强调人们必须因罪过而悲伤，而作为回应，十字军战士们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宽恕的渴求。正如一份誓词状中写道的，加入远征“是为了上帝能宽恕我的罪过”。而在另一份誓词状中，同样的情感表达得更加明确：

我的罪孽深重，我主耶稣基督却是那么有爱、宽厚和仁慈，因为他本富有，却为了我们甘愿贫穷。想到这些，我决定，虽然我是如此微不足道，但仍要做点什么来报答他无私给予我的一切。所以我决定去往耶路撒冷，去往上帝以人的形态生活并与人交谈的地方，去瞻仰他曾踏上过的土地。

1096年5月22日，普罗旺斯地区沙托勒纳尔的富尔克·唐（Fulk Doon of Châteaurenard）来到莱林斯（Lérins）修道院，院长交给他朝圣的象征物，并嘱他“加入前往耶路撒冷的队伍作为赎罪的苦行”。而当香槟地区布赖的米莱斯（Miles of Bray）离开家乡去往东方时，人们说他“是苦行赎罪去了”。

相应的结果就是，参加十字军可以被视作皈依修道生活的一种替代。当时的人在描述十字军时，倾向于将之描述成一座流动的修道院。其白天和黑夜由庄严的礼拜仪式来划分，士兵们都严守戒律和弟兄情谊，“正如原初的教会那样，分享一切”，承受宗教要求的放逐。在当时来讲这一切都是真实

的，正如一位作家所说，“从简朴和苦修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军中生活，而是修道生活”。在一个几乎是以修道院生活的标准衡量其他一切好坏的时代，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在解放耶路撒冷后的评述中，将这种战争生活的隐修化视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能奇迹般取胜的合理原因之一。因为如果不是至少其中三人本想皈依修道生活，却在听到关于十字军的宣道而改变主意，加入前往东方的军队，并认为这种军事服务已足以与修道生活相提并论，那么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因此，早在十字军出发之前，人们就已经把参加十字军与隐修生活相提并论了。 15

十字军战士们把自己看作朝圣者，他们在行军途中举行朝圣途中典型的表达虔诚的仪式和礼拜仪式。武装朝圣者在当时还很新鲜，因为此前那些赎罪的朝圣者们被禁止携带武器。但不管怎么说，十字军本来就是一种新奇的朝圣行动。乌尔班二世试图将参与者限定为武人，他不准僧侣们参加：

[他写道，] 我们是在激起骑士们前去远征的意愿……至于那些已经放弃尘世且宣誓只专注于心灵上的争斗的人，我们并不希望他们拿起武器或踏上这次旅程；我们甚至要禁止他们这么做。

他希望限制参加十字军的神父人数，并且越少越好，除非实在有必要。他还说，虽然在征得教会权威允许的情况下，女性显然能陪伴她们的丈夫或兄弟前往，但女性和老人、体弱者其实都不适合参加十字军。当然，他指明若干类别的俗众不适合参加的言论只能说是建议，而不是禁令。朝圣是所有想要苦行赎罪者都可采取的表示虔诚的举动，不论他们自身状况如何，更何况那些前往具有治愈神力的圣殿的人都是病人。很明显，要让一场朝圣之旅仅局限于健康的年轻人参加，这根本不可能。这也是有如此多“不适合参与者”逐渐参与到十字军而来的原因。

引入宣誓制度则是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创举。宣誓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

知，但肯定涉及宣誓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并声明要以武力解放耶路撒冷。因为从来没有哪项普遍义务规定朝圣者要起誓，所以，我们必须假设大多数朝圣者从未宣过什么誓。因此，认为十字军宣誓的制度源自朝圣者的习俗，这种错误的观点或许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从12世纪后半叶开始，在留存下来的主教仪典书和仪规手册中，此前曾分立的一些举动已经混合在了一起，因此十字架、宣过誓的标志以及朝圣的象征物都是同时授予受礼者的。而解读这些文献会让人觉得，宣誓参加十字军的仪式肯定是从为朝圣者赐福的仪式发展而来的。但我们可以断定，在十字军运动的最早期，宣誓加入十字军和向朝圣者赐福并授予钱粮并不合一，而是两个仪式，要分别举行，可能时间上也有先后间隔。

16 引入宣誓接受十字架的制度实在是天才般的创举。据曾在克莱蒙听过乌尔班二世宣讲的人的说法，他将宣誓接受并佩戴十字架的制度抬得很高，并用基督的言论作为依据：“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 16:24 或路加福音 14:27）在场者留下的记录表明，教皇知道他所行的事是全新的，而且希望让佩戴十字架变得很独特。十字军战士也确实很显眼，他们与同时代人甚至其他朝圣者都区分明显，因为其他朝圣者与十字架之间通常没有固定的联系。我们很容易以为佩戴普通的用布制成的十字架不太显眼，于是忘记佩戴者因此有多么独特。洛林的贝尔瓦尔女修道院（the priory of Belval）有一尊12世纪的雕塑，刻画的是一名十字军战士，胸前佩戴着用两块约一英寸长布条制成的十字架。但在雕塑上，十字架显得好像有6英寸×6英寸那么大。十字军战士必须始终佩戴着十字架，绝不能摘下，直到他们实践了誓言为止。

对当时的人来说，能够以这种方式把十字军战士清晰地区分出来非常重要。早期十字军的领导者们渐渐确信，只要教会能够让那些落后分子（这些人应该清晰可辨）也宣誓并践约，那西方世界就还有很大的人力资源可待开发。他们也会时不时做出努力，试图搞清楚不愿作战人群的规模有多大。比起让“误入歧途”的十字军战士去实践自己的誓言，斥责甚至惩罚他们显然

容易得多。但施加在十字军战士身上的压力和他们享有的公众关注度，都有利于强化他们许下的誓言的庄严性质，从而驱使他们认真践约。

乌尔班二世宣称十字军运动是荣耀的仁爱之举，特别适合俗世人参与。他甚至还进一步提出十字军是“十字架（的行事）之道”。而在此之前，“十字架之道”仅指遁入隐修院，弃绝尘世。但对许多人而言，隐修生活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因为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乱世，他们的家人必须依赖他们留在尘世中，成为家庭的支柱。而现在，这些俗人终于得到一种几乎可以两者兼得的选择。教皇的这一举措，向着导致教会承认俗世中也存在圣职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 回 应

除了在穿越法国的旅途中亲自布道外，乌尔班二世还送出亲笔信或派出使者前往佛兰德斯、热那亚、博洛尼亚、比萨和米兰。十字军的事宜也在他举办的会议上得到了讨论，比如1098年10月在意大利巴里，以及1099年4月在罗马。在克莱蒙，可能也包括随后夏季在尼姆举行的会议上，乌尔班二世鼓励所有与会的主教们亲自去传扬十字军之道。有一些人遵循了他的指令，其中最著名的是迪的于格（Hugh of Die）<sup>①</sup>——莱昂大主教、坚定的改革派。但也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并没有这么做。克莱蒙大公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十字军的法规，但仅有一部关于免罪的教典以当初的形态留存至今。而关于克莱蒙会议决议的各份手抄稿（这些手稿由与会主教下令抄录，仅收录每位主教各自认为重要的教法），鲜少收录这部教典。有一份确实收录了，它是为阿拉斯的朗贝尔（Lambert of Arras）主教准备的，但却可能根本没有反映出主教本人的关注点。因为朗贝尔留下的他本人对这次会议的

17

<sup>①</sup> 约1040—1106，驻法国的教皇使节，1080—1106年为莱昂大主教。——译注

描述中，根本没有提到十字军。对朗贝尔来说，这次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教皇确认了他的主教驻地。相比之下，僧侣们则表现得更热情，有很多修士群集之处也成了招募的中心，在积极响应者中还有像“隐修者”彼得（Peter the Hermit）这样的游方修士。

但教皇呼吁组织十字军的消息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通过口口相传而迅速蔓延的。据当时人所言，由于传播相当快，所以根本不需要再额外传道了。很显然，该消息还在家族内部由一个成员告知其他成员，因此，利穆赞（Limousin）<sup>①</sup>、佛兰德斯、洛林、普罗旺斯、法兰西岛、诺曼底和勃艮第的骑士家族都有大批成员纷纷加入。比较突出的例子有勃艮第伯爵家，以及法兰西岛的蒙莱里（Montlhéry）城主家。勃艮第伯爵威廉·泰特-阿尔迪（William Tête-Hardi）有五个儿子，其中三个是十字军战士，更有一个以教皇卡利斯图二世（Calixtus II）的身份为1120年的十字军行动做了布道动员。他的一个孙子和孙女也加入了。蒙莱里家有三位成员参加。令人惊奇的是，同时加入的还有一连串与其有亲戚关系的家庭的成员：肖蒙-韦克辛家族（Chaumonten-Vexin）出了四名十字军战士，圣瓦莱里（St Valéry）家族有三名，布卢瓦（Broyes）家族、勒泰勒的布尔克（Bourcq of Rehel）家族以及勒皮伊塞（Le Puiset）家族各有两名，库特奈（Courtenay）家族和蓬特-埃尚弗雷（Pont-Echanfray）家族各有一名。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在这个关联家族活跃的两代人中共出了23名十字军战士和在东方定居者，他们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其中有六人还成为拉丁东方的重要人物。据此，我们可以描绘出响应十字军的热情在法国北部传播的路径。

为什么有些亲族群体会如此热情地响应参加十字军的号召呢？我们可以确认出一些推动因素，其中包括：到耶路撒冷朝圣的家族传统，遵奉克吕尼隐修主义和教皇推动的改革，以及对某些圣徒的供奉。此外，似乎女性还会

---

<sup>①</sup> 今法国27个大区之一，位于西北部。——译注



把相关信息传播到夫家。勃艮第伯爵家的四姐妹中，有三个的丈夫参与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剩下那个的儿子也是十字军战士。尽管上述勒皮伊塞家族自身就有相关的传统，但女性带来的影响可能也很大：女家长是蒙莱里家四姐妹之一，而这四姐妹不是十字军战士之妻，就是十字军战士之母，她们的女儿也是如此。

对十字军号召的回应相当热烈，足以引起时人的议论，但我们很难断定规模到底有多大。如果略去第三波参加十字军浪潮（即所谓 1101 年的十字军，这次浪潮受到耶路撒冷解放消息的推动）的数据不计，我们可以谨慎地做出如下判断：在 1097 年 6 月尼西亚（Nicaea，即伊兹尼克 [Iznik]）之前，第二波浪潮大约召集了 5 000 名骑士。当然，我们还应该把这个数字乘以 4，即把他们的随从也算进去（包括马夫、持盾者，等等），还要加上一些步兵的数量。因此，战斗部队的人数约为 2.5 万人，这个估计值应该比较合理。另外，还有很多穷人会追随十字军，从而可将其规模再扩展到接近 4 万人。虽然在耶路撒冷被围时十字军的人数下降到了 1.5 万，但直到耶路撒冷陷落后，还陆续有十字军战士赶来；这部分人数应该大约也有 5 000 人。第一波浪潮组建的军队规模至少应该与第二波相当，因此可能也是约 4 万人。这样的话，十字军的总人数约为 8.5 万人，其中或许有 7 000 名骑士。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接受了十字架，但并没有真正踏上东征的旅程。或许有 4.2 万，即一半的人动摇了，这一说法可能比较合理。于是，我们最后的估计值是，招募的总人数约为 12.7 万人，其中大约有 10% 为骑士。

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但即使是比这低得多的估计值，在当时来看也已经相当可观。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响应呢？欧洲的人口此前一直在稳步增长，到这时候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而继承体系和婚姻制度都开始承受重压。到 1096 年，连年的旱灾导致法国粮食歉收，食物供给不足，还引起了麦角中毒病症的流行。这种病症可能致人疯癫甚至死亡，起因是食用了没有去除麦角的黑麦制成的面包。这是一个在边境地区甚至森林和老欧洲的边缘地带大殖民的年代，于是，当时的一些评论家以及

此后的许多历史学家就自然而然地认定十字军运动是一种殖民努力。圣经中提到的“流着奶与蜜”的地方以及在拥有传奇般财富的地域获取新领地，这一前景深深吸引着农民、无地未婚的儿子们以及一大家子仅能分享越分越小的一块领地的家族的成员们，驱使他们前往开拓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当时的大多数评论家以及当今的少数历史学家则坚称，十字军运动的主要动力是真正的理想主义情怀。

在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各支队伍中，穷人都占到了很大的比重。很可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想抓住机会为自己开创新的生活，但我们对他们的情况所知甚少，更不用说了解他们的观念和抱负了。他们可能死亡率极高，而且很难想象幸存下来的人能有办法或精力在东征运动结束后返乡。因此，在队伍南行时，有一部分人留在了叙利亚北部；而另一些人可能在有能力返乡的十字军战士离开后，继续留在了巴勒斯坦。

如果认为从一开始这些战士们参加十字军就是有意地将其作为一次殖民努力，那么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是非常稀少的。我们可以举例说明某些人怀有借此开疆拓土的野心，其中包括塔兰托的博希蒙德（Bohemond of Taranto）和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win of Boulogne），但也仅此而已。就连出了如此之多十字军战士的蒙莱里家族，似乎主要也是受到这项事业所具有的精神价值吸引才投身其间的。我们必须牢记，虽然十字军运动开启了西欧人征服地中海东部领土并定居下来的进程，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教皇和十字军的领导人曾以为，只要军队一抵达君士坦丁堡，他们就会融入一支规模更大的队伍去接受拜占庭皇帝的领导，因为耶路撒冷曾经是这个帝国的属地。而此后，如果这场运动成功的话，将会恢复希腊人对黎凡特（Levant）<sup>①</sup>的统治。但后来西欧人发现，拜占庭皇帝并不想领导他们，除了一支相对规模很小的希腊武装外，他也不准备再付出什么。直到此时，他们才决定要独自奋斗。当然，这一决定也并不排除建立殖民地的可

① 在中古法语中，Levant即“东方”之意。这是一个范围不太明确的古地区名，大致指托罗斯山脉以南、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地中海东岸区域。——译注

能，但事实是，这场运动结束没多久，大多数十字军战士就返回了欧洲。

对人们参加十字军动机的另一种常见解释是，早期的十字军行动只不过是一些大规模的打劫远征罢了，西欧的骑士们通过之前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行动，对这类远征已经非常熟悉。参加克莱蒙会议的主教们肯定会顾虑有些人“为了钱”参加十字军，而且毫无疑问这项事业也确实会吸引一些想趁机抢劫的暴徒参与。当时除了地方权贵能判定自家是什么状况外，没有什么办法能借助筛选只留下符合条件的应募者。而且也不能这样筛选，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作为朝圣之旅，十字军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即使是精神病患者。随着十字军队伍一边烧杀抢掠一边向东方行进，那些暴徒的暴力倾向必然会因方向不明、恐惧和压力而更加明显。某些十字军队伍在启程时，就是以迫害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犹太人为开端的，在此期间烧杀抢掠的行为屡见不鲜；而十字军在巴尔干半岛行进时，大洗劫的举动也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因为十字军没有配备恰当的补给体系，他们要一路生存下去，就必须抢劫，这也是事实。他们在基督教领土上时还可以依赖当地统治者的捐助，但小亚细亚当时饱受战乱蹂躏，已经变成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带，在抵达安条克之前，十字军实在找不到好的会合点能集中接受欧洲船只提供的补给。而且，即使到了那里，他们能获得的补给也十分有限。十字军中大大小小的将领都必须接受这一事实：追随者们的最低期望值不过是获得能维持生存的给养。但仅此一点就能为迷恋打劫的举动提供充分的理由。

十字军运动之所以具有如此大吸引力的第三种常见解释是，人口的增长迫使拥有土地的家庭采取措施来防止他们的地产被不断细分：或者采用长子继承制；或者采用相当原始的生育控制方法，让每一代男性中仅有一人可以结婚，鼓励其他年轻男性不要后代。因此，离开家乡参加十字军远征是一种防止多余男性对家庭造成负担的好方法。

然而，各种文献提供的画面却与第三种解释截然不同。十字军战士既不是应征入伍的，也不是为履行封建义务而加入军队的封臣。大多数人是自愿加入的，而且也并非出身于富有的权贵家族，无法得到家族的经济支持。此

前已经有很多西欧人前往朝圣，也有相当数量的骑士在拜占庭的军队里当雇佣兵，因此大家知道前往巴勒斯坦的路途有多么遥远。那些一贫如洗的人可能不会被遥远的路途和相应的费用吓退，因为他们本来就没什么好付出的，而且或许还指望自己的景况能因此得到改善。但对骑士们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要参加十字军，人们就会期望骑士们可以带着必要的装备、马匹、驮畜和仆人踏上旅途。半个世纪后，当莱茵兰（Rhineland）<sup>①</sup>的一位骑士应召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到意大利作战时，他必须花费自己年收入的两倍。一位法国骑士为十字军东征之旅所需的花费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因此只能猜测，但花费四到五倍年收入的估算大概不会很离谱。这就让传统看法勾勒的无地骑士毫无负担说走就走的画面显得很荒谬。教会是当时十字军战士筹款可求助的主要对象。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在修道院和大教堂的档案资料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表明十字军战士和他们的家庭为了准备踏上征途所需的资金采取了哪些方法。土地及其产出是最大一笔可变卖的财产。但在连年的旱灾之后，土地价格低迷。抛售土地所得的钱款并不多。1096年的春季雨水充足，歉收的势头在这一年被一场大丰收打断，似乎切实表明了上帝对这次征程的赞许，但对许多十字军战士来说，这一切显然来得太晚，他们当时已经出售或抵押了自己的土地。而且，由于抛售者众多，而能准备充足现金买下这么多土地的个人或机构又如此之少，据说这导致法国的地产价格大为下跌，他们的处境于是更加艰难。

对领主和较富有的骑士而言，一种似乎很有吸引力的应对方法是，通过放弃对有争议地产的权利或主张来获得现金。人们在参加十字军后放弃有争议的权利或主张在当时经常发生——作为朝圣者，他们可不想在身后留下他人对自己的一片怨恨。但可能他们也说服了某些宗教群体买入他们的地产，为他们提供金钱。以这种方式捐钱给十字军的举动大大增加，因为这不但能分担他们的旅途成本，而且可以让他们带着更清白的良心出发。不过，有些

---

<sup>①</sup> 旧地区名，又名“莱茵河左岸地区”，指今德国境内的莱茵河中游地区。——译注

领主的解决方法非常粗暴。梅津克（Mezenc）城堡的共同所有人一直与莫纳斯捷的圣沙弗勒修道院（St Chaffre du Monastier）的僧侣们有纠纷，现在他们要“踏上前往耶路撒冷抗击野蛮人的征途”了，他们最初筹钱的方式是洗劫“住在我们村子里的穷人，拿走属于他们的所有东西，如传闻所言，不放过一点面包屑”。这类纠纷必定让人筋疲力尽而且精神高度紧张。教士们似乎认定，订立以金钱换取放弃权利的协议是结束这类纠纷的极好方式。而骑士们在书写协议条款时往往态度非常谦卑，这可能是宗教团体为提供金钱规定的必要条件。弗雷特瓦勒的尼弗洛（Nivelo of Freteval）在放弃权利的协议中引用教皇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I）<sup>①</sup>的说法，称自己“出身于贵族，但这一阶层却产生了许多心灵并不高贵的人”，并称他此前的权利主张为“压迫性的行为，源自某种坏习气，这种主张不是祖辈传给我的，而仅来自我父亲的时代。我父亲只是个小人物，他开启了以这种压迫行为控制穷人的方式”。

地产还可能被抵押或出售。有些人出售了大量地产，甚至包括整块领地。但大多数似乎属于活质（*vifgages*）<sup>②</sup>，即合同规定，贷方不收取利息，但会占有借方抵押的地产，享有其产出，直到贷款被偿还。这种方式能防止产生高利贷，被认为比较易接受，但对十字军战士及其家人来说，其缺点在于，在抵押取消之前，所抵押的地产不再受他们控制。不言自明的是，把地产交给教会将是最后的选择，因为地产可能因此流入市场而再也收不回来了。但矛盾的是往往只有教会和宗教社团拥有所需的资金，因为他们很富有，又或者只有他们可以通过变卖圣坛上的珍宝来筹措足够的现金。不过，在留存至今的抵押交易中只有 16% 不是与教会而是与俗世人进行的，同样，出售案例则只有 13%。这些比例似乎并不怎么可观。但我们应该牢记，

① 约 540—604、590—604 年在位。——译注

② 意同拉丁词组 *vadium vivum*，对应的英文为“living pledge”。当某人向他人借款时，将某一地产授予他人，直到该地产的租金或收益清偿全部借款本息。而在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时，所授予之地产即归于无效。对于借款人而言，因为在这种担保方式中无论是金钱还是土地均未丧失，且以借款人之土地收益清偿债务，故而得名。——译注

留存下来的记录几乎完全来自教会，因此俗众之间的交易自然很难在其中反映出来。在世俗世界中，发生了大量围绕十字军远征的筹钱活动。所有抵押案中的 10%、出售案中的 9% 涉及十字军战士的近亲。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些是女性，包括十字军战士的姐妹，因为在家族中男性成员缺乏现金相助时，她们还可以利用丈夫的财产。

22 地产的处置往往涉及十字军战士家族中的所有成员，因为此时让渡的是每个人都多少对其拥有现实或潜在利益的祖传财产。他们可能就已达成的协议制造麻烦或激烈争吵，但此类事件极少发生。事实是，亲属们常常慷慨解囊（尤其是舅舅们，因为保护自己姐妹的孩子对他们而言是利益相关的。而叔伯们则不同，他们可能与这些孩子是潜在的竞争者），以防止祖产的消亡。令人吃惊的是，在留存下来的与教会的交易协议中，至少有 43% 用来换取现金的地产的价值是存疑的，因为其所有权存在争议或疑问，又或者它们其实已经被抵押了。这说明，在涉及权利让渡时，许多家庭采取了一些比较狡猾的做法。透过许多文献，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亲属们在专门召开的家族会议上的讨论声音。他们讨论这些地产能否保留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应该选取哪些地产进行抵押或出售。在布列塔尼的一份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场家族会议的相关记录。十字军战士普洛斯基的蒂博德（**Thibald of Ploasme**）告诉自己的兄弟威廉说，如果他得不到经济上的援助，就不得不卖掉自己那份遗产。威廉不希望蒂博德丧失所继承的那部分地产，于是就变卖了自己对一座磨坊的共同所有权（其实已经抵押过一次了），然后从昂热的圣尼古拉修道院的僧侣那里筹到了一笔钱。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十字军战士们返回家乡时的境况，就能确认，参加十字军成本很高，所得却并不多。只有极少的证据表明，他们能衣锦还乡。考虑到从黎凡特返回的路途花费不菲，而如此长途的旅行使得携带大量金银细软也不太现实，因此，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有大量报道称，许多在 1099 年秋天离开巴勒斯坦返乡的人，在到达叙利亚北部时就已经一贫如洗了。当然，大多数人在回到故乡后地位大为提升，这肯定能帮助他们缓解经济上的窘境。而

在十字军征途的艰难险阻中，与某位大领主建立的密切联系能带来升迁。并且，在当时那个时代，家族的命运也可以通过婚姻得到改善；曾参与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们会发现，凭借这种经历，他们能为子女安排更有利的婚姻。

虽然如此，变卖地产，长途跋涉 2 000 英里后抵达东方，在如此遥远的殖民地进行投资，或希望借此提升地位，这些看起来都像是一场愚蠢的赌博。如果考虑到若是留在家乡，只要耐心等待农业萧条结束及地产大量抛售导致的波动消失，厄运就会慢慢消减，情况就更是如此。因此，毫不意外的是，我们唯一能找到证据的应对策略是，如果某位亲属接受十字架参加十字军，那其他亲属就会合力将因此带来的损失最小化。可惜我们找不到证据来证明，某些成员参加十字军有利于减轻家庭的负担。相反，大量证据却表明：各个家庭为了帮其成员实现出征誓言，不得不背上一定的负担。

所以，合理的看法是，十字军战士及其家族主要是受理想主义驱动才踏上征途的。这是一个充斥着令人目眩的夸张慷慨捐赠的时代，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团体都从中获益颇丰。如果说隐修主义令人瞩目的增长既要归功于大批虔诚修道者，在同样的程度上又至少要归功于未加入修会却给予大量捐赠的人们，那么十字军运动的发展也是如此。在众多十字军战士的身后，站着一大批支持他们的男男女女，时刻准备着付出巨大的牺牲，同意处置地产来帮助他们踏上征途。但是，十字军运动的受欢迎程度可能被夸大了，而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这项运动吸引了生活在西欧许多不同地域的人们，让他们怀着各式各样的观念、设想和情感投身其间，但大多数的人仍然并不准备参与这样复杂、危险和昂贵的事业。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层面上在寻找对人们动机的解释。即使对我们掌握资料最多的骑士来说，积极响应的 1.2 万人（其中可能有一半并没有真正付诸行动）也只是整个阶层总数的一小部分。仅英格兰一地就有约 5 000 名骑士，而法国和讲法语的帝国领土上至少有 5 万名。因此，我们谈及的响应其实不是整个阶层的，而只是其中一部分人的反应。我们是在讨论这部分人对教皇发出号召的响应，及其亲属的大力支持。

## “第一次大屠杀”

乌尔班二世发出的号召大获成功，因为世俗骑士们可以根据自身想法来解读这种号召。这可能意味着，在他们看来，这种号召其实会带有一种教士们并不喜欢但也无力控制的色彩。西欧社会由许多彼此间联系紧密的小圈子构成，其组成元素可能是一个个的家族，其成员知晓彼此之间是亲属，因此也是“朋友”，有义务维护彼此的利益，所以紧紧地抱成了团。其组成元素还可能是封建群体，由环绕在领主周围的封臣组成，它们对其成员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家族和封建关系要求男性承担“血仇”（blood-feud）责任；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拔剑捍卫自己的亲人、领主或封臣同僚的利益。号召组建十字军的呼吁，首先诉诸的是类似这样亲密的甚至是家族式的表述。传道者们号召男性起而帮助受压迫的“兄弟”——东方的基督徒，这是他们必须去爱的人们；同时，号召他们起而帮助自己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受到了侮辱和轻视，丧失了自己的“继承权”和祖产。这其实就是号召人们去复仇。

我向父亲们、儿子们和兄弟们讲话。如果一个外人要把你的某位亲属打倒在地，难道你不会为你的血亲复仇吗？当你看到他们被驱赶，被逐出自己的领地，被钉上十字架，当你听到他们在呼喊，凄凉而沮丧地乞求援助，又该以怎样的行动来为你的上帝、你的父亲、你的兄弟复仇呢？

24

十字军运动是一种复仇之举，而这一观念可能使它变得血腥。在克莱蒙大公会议召开后不久，法国爆发了反犹太人的暴力活动。随后这一趋势又蔓延到德意志和东欧，并在那里与第一波出发前往东方的十字军浪潮结合在了一起。1096年5月3日，施派尔（Speyer）<sup>①</sup>的犹太人社区被卷入一场迫

<sup>①</sup> 位于今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莱茵河畔的一座城市。该城及第一、二章中提及的其他城市的位置均可参考正文前所附地图二。——译注



害风暴，一支德意志南部的队伍随之聚集到最残酷无情的迫害者弗隆海姆的埃米希（Emichi of Flonheim）<sup>①</sup>麾下。接着埃米希的队伍行进到沃尔姆斯（Worms）<sup>②</sup>，那里的屠杀在5月18日拉开帷幕。随后，他们又来到美因茨（Mainz）<sup>③</sup>，更多的德意志人加入进来，同时一支人数众多的法国、英格兰、弗莱芒和洛林的十字军队伍也和他们会合。美因茨的犹太人社区的规模在欧洲曾是数一数二的，但却在5月25日至5月29日间被消灭。部分十字军战士之后北上至科隆，这里的犹太人之前就已经被驱赶到邻近的各个定居点里，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他们被追杀殆尽。另一伙十字军似乎往西南方向去了特里尔（Trier）<sup>④</sup>和梅斯（Metz）<sup>⑤</sup>，大屠杀随之又蔓延到了那里。而“隐修者”彼得的队伍可能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sup>⑥</sup>强迫整个犹太人社群接受了洗礼。波西米亚的布拉格和威瑟利（Wesseli）的犹太人社区则遭受了另一支十字军队伍的迫害，这支队伍可能是由一名叫福克马（Folkmar）的神父领导的。

当时有些人把这些屠杀事件的发生归结于人们的贪婪。十字军战士当然对犹太人社群索要了财物，并对他们进行了盘剥。但希伯来人留下的记述更多地谈到了当地主教及其手下还有镇民们的贪婪，而对十字军战士却很少这么说。十字军的主要兴趣似乎是强迫犹太人改信。在每一个地方，犹太人面临的选择都是：要不改信，要不去死。犹太会堂、犹太经卷和墓地被毁，这让犹太人担心十字军会在沿途所过的地区扫清犹太教的踪迹。关于十字军这么做的动机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复仇的渴望。十字军战士似乎觉得很难清楚地区分犹太人和穆斯林，因此，既然他们应召来为基督的遗产流失和受辱

① 11世纪末莱茵兰地区的一位伯爵，是1096年“德意志十字军”的领导人，又被称为“莱宁根的埃米希”（Emicho of Leiningen）。——译注

② 位于今德国西南部，莱茵河左岸。——译注

③ 位于今德国西南部，莱茵河左岸，沃尔姆斯以北40公里。——译注

④ 位于今德国西南部，近卢森堡边界。——译注

⑤ 位于今法国东北部，近卢森堡边界。——译注

⑥ 位于今德国东南部。——译注

而向穆斯林复仇，那为什么他们不应该为基督本人当年被钉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更加深重的羞辱而向犹太人复仇呢？尤其当考虑到当时流行的传说中还认为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曾呼唤虔诚者为他复仇。第二种解释是千禧年主义的。教会法和德意志的主教们禁止强迫异教徒改信，而且他们都试图阻止这种行为，虽然有的成功了，有的则收效甚微。对有教养的教士们来说，公元 33 年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 638 年穆斯林占领耶路撒冷这样久远的事件，不足以构成复仇的理由。只有穆斯林仍然占领着圣地这一眼前的伤害事实，才是发动十字军的理由，而不是荣誉在过去受损之类的模糊概念。然而，一旦他们宣扬参加十字军是表达对上帝和弟兄的爱，那么教士们就控制不了因此而激起的人们在情绪上的连锁反应。

其他的动机可能也起了作用。将复仇的号召与改信的需求相协调很难：一个是一种报复行为，另一个则应当被实施者看作是在传播福祉。此外，集中的迫害并没有发生在十字军的征途中，而是发生于准备阶段。情绪化的反犹主义似乎主要爆发在欧洲，而不是在西亚（至少不那么严重）。在西亚，在 1110 年后，十字军占领下的巴勒斯坦无论怎么说相对而言还是宽容的。这种矛盾可以通过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圣战总有一种矛头掉转向里的趋势。参与者渐渐相信，如果发起圣战者本身不曾悔悟、不够纯洁，那这场战斗就永远不能获胜。与伊斯兰教的吉哈德（*jihad*）<sup>①</sup>一样，基督教的十字军也很容易就导向对本土宗教一致性的要求。犹太人应该始终处在天定的见证人这一卑微的地位上乃是神意计划的一部分，虽然这种信念使得教会领袖不能容忍人们对他们暴力相向；但无论如何，犹太人都组成了社会内部一个疏离的群体，而十字军强迫他们接受洗礼的目的很可能是希望消灭其宗教，从而创建一个在宗教上协调一致的基督教社会。

---

① 指穆斯林维护伊斯兰教的责任。在阿拉伯语中，其字面意思有“努力奋斗”“尽心尽力”“克服困厄”等。该词在古兰经中频繁出现。一般将其译为圣战，其实曲解了其原意。——译注

## 第二章

###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程

在 1096 至 1101 年间，共有三波人流离开欧洲前往东方。在此期间，往东方去的人流断断续续一直不曾间断，因此，第二波浪潮送出的军队始终都在接纳新来者；直至那些成功收复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战士踏上返乡路途时，新来者还在不断进入巴勒斯坦。此外，逆向的潮流也存在着，早在 1096 年冬天，感到幻灭、患病和恐惧的人们就开始陆陆续续返回西欧。

#### 伊斯兰世界的状况

虽然没有人知晓将面临什么情况，但其实十字军是在朝着一扇敞开的大门行进。我之前已经指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逊尼派的势力正在复兴，其代表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建立了一个苏丹国，以巴格达哈里发的代表的名义施行统治，武力对抗开罗的法蒂玛哈里发王朝。而在过去的—个世纪里，开罗一直是积极推行改奉什叶派运动的中心。1071 年，塞尔柱人攻下耶路撒冷。但在 1098 年 8 月 26 日，当十字军到达叙利亚北部时，法蒂玛王朝又把它夺了回去。此时，连遭灾祸的伊斯兰世界实力已大为削弱。1092 年，塞尔柱王朝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维齐尔（Vizier）<sup>①</sup> 尼扎

① 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对宫廷高官的称谓，其位相当于宰相，阿拉伯语原意为“帮助者”“支持者”“辅佐者”。——译注

姆·默尔克 (Nizam al-Mulk) ①，这位 30 年来历任苏丹背后的实权人物遭谋杀。一个月后，塞尔柱苏丹马利克沙 (Malikshah) ② 也暴毙，死因成疑。此后，步其后尘的不仅包括马利克沙的妻子、孙子和其他强权人物，还包括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克塔迪 (al-Muqtadi) ③。这种全军覆没的态势导致塞尔柱苏丹国分崩离析为多个公国，觊觎权力者与王室家族的成员们展开了争夺。随后在 1094 年，曾与塞尔柱人激烈对抗的法蒂玛王朝苏丹穆斯坦绥尔 (al-Mustansir) ④ 在统治了 58 年之后也撒手人寰。他的维齐尔巴德·贾马里 (Badr al-Jamali) 亦如是。

## 第一波浪潮

十字军东征的第一波浪潮出发得很早，事实上是在 1096 年春天，有些太早了。其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传道者，人称“隐修者”彼得。甚至在克莱蒙大公会议之前他就开始在法国中部招募十字军。这使得少数历史学家试图重弹老调，重提彼得的一两位同代人所持的观点，认为十字军计划是彼得设想出来的（而且可能也是彼得本人极力宣扬的）。彼得招募到了数量可观的追随者后，于 4 月前往莱茵兰地区。在他行进路线的前方，而且可能也是遵循他的指令，一大批步兵在以沃尔特·桑萨瓦尔 (Walter Sansavoit) 与通常认为的不同，他并不能被称为“穷汉”沃尔特。桑萨瓦尔则是根据历任普瓦西领主驻地得来的名号 ⑤ 为首的八名骑士的领导下，于 5 月 21 日进入匈牙利，并以相当井然有序的方式一路行进到君士坦丁堡。途

① 波斯人，原名阿卜杜勒·哈桑，尼扎姆·默尔克是他的荣誉头衔，阿拉伯语意为“王国治世”。他曾先后担任艾勒卜·艾尔斯兰和马利克沙两任塞尔柱王朝苏丹的维齐尔。——译注

② 1055—1092，塞尔柱王朝苏丹，1072—1092 年在位。——译注

③ 1075—1094 年在位。——译注

④ 1036—1094 年在位。——译注

⑤ 有这种误解的原因是，Sansavoit 在法语里有“身无分文、贫穷”之意。——译注

中，除了在贝尔格莱德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暴力冲突（可以想见是因劫掠而起），就没发生过其他的麻烦事。沃尔特一行人如此早抵达，让拜占庭方面也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还毫无准备。因此，考虑到这一点，这支队伍一路上能平安无事实实在值得关注。

在君士坦丁堡，有几支意大利朝圣者队伍也加入了沃尔特的队伍。“隐修者”彼得的队伍则于4月20日离开科隆，由于随行众人毫无纪律，他们穿越巴尔干半岛的旅程要艰难得多，最后在8月1日到达君士坦丁堡。这支队伍在匈牙利境内最初没惹什么麻烦，但之后在这个王国中，他们在所经过的最后一座城镇泽蒙（Zemun）引发了骚乱。泽蒙这座要塞城镇宛如遭遇了一场风暴，有大批匈牙利人被杀。而犯下这些暴行后，十字军战士们当然想避免遭到报复，希望尽快渡过萨瓦河进入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一支拜占庭军队曾试图限制他们的行动，结果遇到抵抗。当抵达境况凄凉的贝尔格莱德城时，十字军战士们的情绪很糟糕，很可能因此洗劫了这座城市。尽管如此，尼什（Niš）<sup>①</sup>的拜占庭总督虽然没料到他们会突然来临，还是尽量与之合作，允许他们购买各种补给品以交换被俘的人质。后来在即将离开时，一些德意志人攻击了城外的一座磨坊，于是总督派兵袭击了殿后的部队。彼得的很多追随者罔顾他的命令，回身反击，结果被击溃，四散逃离。这支十字军因此人员损失惨重，而且丢掉了所有的现金。但幸运的是，当他们抵达索菲亚时，希腊人已经做好了接待他们的准备。此时他们得到了很好的补给，没再惹事，一路顺利行进到了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皇帝亚历克塞妥善接待了沃尔特和彼得，并建议他们就地休整，等待其他十字军队伍的来临。因为拜占庭方面知道，其他队伍正在欧洲集结。但彼得的追随者们缺乏耐心，洗劫了周边的乡野，于是希腊人认为尽快送走他们才是上策。8月6日，拜占庭派船把他们送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

① 位于今塞尔维亚东南部的城市。——译注

接着这支队伍行进到基伯托斯（Kibotos）<sup>①</sup>这个理想的会合地点，他们可以在这里等待后续十字军的到来。但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拧成一团，选了一位名为雷纳尔多（Rainaldo）的意大利贵族作为自己的领导人，携起手来反对法国人。当时法国人从基伯托斯出发，一直劫掠到了突厥人控制的尼西亚，而雷纳尔多的手下也想仿效并超越他们。于是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离开了大队人马，选择距尼西亚较远处建立了一个据点。但在9月29日，这群人被突厥人围攻，八天后投降。同意改宗的人被送往东方，其他所有拒绝的人都被杀。当大队人马得知这一惨剧的消息时，“隐修者”彼得身在君士坦丁堡，法国十字军战士们不顾沃尔特·桑萨瓦尔务求谨慎的劝诫，于10月21日突入内陆，遭到突厥人的伏击，最终全军覆没。

沃尔特和彼得至少还抵达了小亚细亚。而其他三支大约差不多时间踏上征途的十字军，却最远只走到匈牙利境内。福克马率领的撒克逊人和波西米亚人在尼特拉（Nitra）覆灭。另一支队伍由一位名叫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的莱茵兰神父领导，毫无纪律性可言，最后被迫在帕农哈尔玛（Pannonhalma）向匈牙利人投降。而由弗隆海姆的埃米希领导的队伍阵容强大，包括来自莱茵兰、施瓦本、法兰西、英格兰和洛林的十字军战士。他们曾在莱茵兰大举迫害犹太人，但最终却止步于匈牙利边境上的维瑟尔堡（Wieselburg）。他们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在这座镇子前的河上架起一座桥，可第一次进攻就落得四散溃逃的下场。

如果认为这些所谓的“民众十字军”几乎完全由农民构成，与1096年晚些时候从欧洲出发的后续队伍差异明显，那你就错了。显然，这是当时的人们炮制出的一种解释，用来说明为什么他们会残杀犹太人，在巴尔干那么无法无天，最后又在小亚细亚溃败。但我们却不能受这种过于简单圆滑的说的诱惑，以为这些队伍都只是农民团伙，很容易发生暴乱，而且也不擅长长途行军。与之后的队伍相比，尽管这几支十字军中平民的人数

---

① 今土耳其的阿帕梅亚。——译注

比例相对较高，但骑士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沃尔特·桑萨瓦尔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骑士；“隐修者”彼得手下的将领们也是如此，尤其是其中的沙特尔的富歇（Fulcher of Chartres）后来还作为一名领主终老于最早建立起来的拉丁殖民地埃德萨伯国（County of Edessa）<sup>①</sup>。并且，弗隆海姆的埃米希是德意志南部一位有影响力的贵族，在美因茨加入他的队伍的迪林根-基堡伯爵哈特曼（Hartmann of Dillingen-Kybourg）也是如此。而与他们一道同行的或许至少还有四位德意志的伯爵。法兰西、英格兰、弗莱芒和洛林人组成的那支十字军也在美因茨与埃米希会合，他们显然队伍庞大、装备精良，并由一群杰出的法国骑士领导：凡都尔的克拉朗波（Clarembald of Vendeuil）、库西领主马尔勒的托马（Thomas of Marle lord of Coucy）、默伦子爵“木匠”威廉（William the Carpenter viscount of Melun），以及内勒的德罗戈（Drogo of Nesle）。他们可能属于从法国出发的先头部队，因为在埃米希的队伍覆灭后，他们加入了法王的弟弟韦芒杜瓦的于格（Hugh of Vermandois）<sup>②</sup>的队伍，并与他一道到达了东方。

第一波十字军进发屡遭厄运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在教皇定下的出发日期1096年8月15日之前就早早地离开了欧洲。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这年夏天的大丰收还没有到来，西欧仍然饱受饥荒之苦，因此他们从出发开始就缺少粮草。在巴尔干半岛，当他们从市场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就只能劫掠。而即使能通过市场获取，他们对保障供给的渴望也会非常强烈，相关争论往往会一次又一次地引发骚乱。此外，拜占庭当局也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引导十字军的相应机构，也还没有为他们准备好粮草。而福克马、戈特沙尔克，尤其是弗隆海姆的埃米希的队伍没能成功抵达，也就意味着“隐修者”彼得和沃尔特·桑萨瓦尔无法在小亚细亚聚集起足够的

29

① 位于今土耳其境内。伯国（county）的字面含义是伯爵（count）的封地。作为拉丁殖民地，埃德萨伯国系布洛涅的鲍德温所建，鲍德温接替了埃德萨的亚美尼亚统治者托罗斯（Thoros）之后成为第一任埃德萨伯爵。而埃德萨伯国因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其自主性高于一般的伯爵领地，故译作“伯国”，本书后文提及的黎波里伯国亦属此情况。——译注

② 1057—1102，法王亨利一世与基辅的安娜之子。——译注

兵力来作战。

## 第二波浪潮：行军至君士坦丁堡

1096年8月中旬，在教皇设定的日期前后，第二波十字军开始陆续离开西欧。在这一阶段，他们是分批行进的。首先在某个地区各自集结，大多由当地的大领主率领。韦芒杜瓦的于格在8月中旬离开法国，取道罗马前往巴里，然后从那里经海路航向都拉斯（Durazzo，即Durrës）<sup>①</sup>。可是他的舰队途中被一场风暴驱散，他所乘的船只被迫在离都拉斯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靠岸。在那里他被短暂软禁，随后被一路护送到君士坦丁堡。大约就在同时，下洛林公爵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和他弟弟布洛涅的鲍德温及一众洛林贵族也一道上路了。戈弗雷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最著名的人物，但也是我们了解得最少的一位。他大约生于1060年前后，是布洛涅伯爵尤斯塔斯二世（Eustace II of Boulogne）与洛林的伊达（Ida of Lorraine）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尤斯塔斯三世此时也踏上了十字军东征的路途。尤斯塔斯三世在略晚于1070年的某个时间继承了布洛涅伯爵领地及其家族在英格兰的广袤地产。六年后，戈弗雷的舅舅把下洛林公国、安特卫普侯爵领地、凡尔登伯爵领地及布永和斯特奈（Stenay）<sup>②</sup>的领地留给了戈弗雷，但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迟迟没有授权他继承下洛林，因此戈弗雷一直到1087年才得到这个公国。在此期间，为了牢牢掌控其他的领地，戈弗雷又不得不断断续续与舅妈——气势惊人的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及其盟友凡尔登主教和那穆尔伯爵（Count of Namur）展开了长达十年的争斗，因为玛蒂尔达并不打算放弃自己对丈夫领地的所有权。在接受十字架踏上征途之前，戈弗雷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虔诚的举动；而且，从他1096年

① 亚得里亚海东南侧，今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港口城市。——译注

② 位于法国东北部，属于洛林。——译注



写下的誓言书中，我们也找不到他打算定居东方的确切证据。此外，在叙任权之争中，戈弗雷一直坚定地站在亨利四世这边，反对坚持改革的教廷。他的外祖父和舅舅都是保皇派，而阻碍他继承的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凡尔登主教等人物则都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那一派的。戈弗雷曾亲自为亨利四世出征，可能也参加了1094年攻占罗马、驱逐格列高利七世的战斗。

对于戈弗雷的弟弟鲍德温的性格特点，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他出生于1061至1070年间，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几个哥哥，于是注定要领受圣职。鲍德温原本已接受了兰斯、康布雷（Cambrai）和列日（Liège）的有俸圣职，但在教会改革带来的新风气中，人们认为这样的多方受职是不能允许的。可能正因为此，他被迫放弃了若干有俸圣职。但不论实际原因是什么，到1086年时，他最终离开了教会，而家中的遗产已经由几个哥哥分割继承。这可能也有助于解释后来鲍德温对改革派及其主张的敌视。因为没有了圣职和遗产，他一贫如洗。大约在1090年前后，鲍德温娶了托斯尼的戈德海尔德（Godehilde of Tosny）为妻，其动机很可能就是为了钱，因为戈德海尔德出身于一个显赫的盎格鲁-诺曼家族。她后来死于十字军东征期间。鲍德温很有头脑，精于算计且冷酷无情。他算不上一个让人感觉很舒服的人，但他强悍的性格和敏锐的思维对前往东方的十字军战士和早期定居者而言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30

两兄弟带着手下穿越德意志南部，在9月抵达匈牙利边境。匈牙利国王此前已经灭掉了三支十字军队伍，而他们也迟迟无法获得过境的许可。最终众人说服鲍德温留下来做人质，为十字军的行动担保，而戈弗雷则下达了严厉的禁止劫掠的指令。11月末，戈弗雷抵达拜占庭的领土。因为听到传言说皇帝拘禁了韦芒杜瓦的于格，戈弗雷于是允许手下洗劫锡利夫里（Silivri）<sup>①</sup>周边地区，直到他确信于格已经被释放。12月23日，戈弗雷终于抵达君士坦丁堡，并在城外靠近金角湾（the Golden Horn）<sup>②</sup>湾口的地方扎营。

塔兰托的博希蒙德带领一小支由意大利南部诺曼人组成的队伍穿越亚得

① 位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省，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城市。——译注

② 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最重要的海湾，今称哈利奇湾（Haliç）。——译注

里亚海前往东方，出发时间比韦芒杜瓦的于格晚两个星期。博希蒙德此时大约 40 岁，是阿普利亚公爵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的长子，在其父 1081 年入侵拜占庭所辖阿尔巴尼亚的战斗中起了关键作用。罗贝尔把自己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征服成果留给了博希蒙德，但当时诺曼人正在失去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权，而博希蒙德的弟弟却已经继承了阿普利亚，因此，博希蒙德发现自己等于被剥夺了继承权。尽管到 11 世纪 80 年代末，博希蒙德已经为自己在意大利南部打下一块相当大的领地，但毫无疑问他还是想要一个大公国，而方式则很可能是让希腊人遭受损失，因为希腊人夺回了他本来在阿尔巴尼亚享有的领地。一位对博希蒙德并不友善的当代人认为，这就是博希蒙德接受十字架的唯一原因。而他的一位仰慕者则认为，他“总是在化不可能为可能”。希腊人相信，博希蒙德也继承了其父对整个拜占庭帝国的图谋规划，并承认他确实非常有能力。事实上，在此后的征战中，博希蒙德将证明自己是十字军运动中最出类拔萃的将领之一。并且，他还很有头脑，也很虔诚，而且可能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教皇改革意图的十字军将领。拜占庭官方已经做好了迎接博希蒙德的准备，但当地的居民不久前才经历过一场诺曼人的入侵，拒绝提供补给。于是他的手下只能靠抢劫获取补给，直到拜占庭当局保证，一旦他们越过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ki），就为他们供应补给。博希蒙德这支队伍还毁掉了一个他们认为被异端占领的小村庄，并和试图催促他们尽快前行的拜占庭帝国军队发生了一些冲突。为此博希蒙德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约束手下。他们甚至也在色雷斯抢劫，当一行人快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他们最后在 1097 年 4 月 10 日到达），博希蒙德的侄子唐克雷德（Tancred，此后将证明他才是东方殖民地早期统治者中最有能力的人之一）允许诺曼人洗劫了离拜占庭首都不远的乡间。

紧随博希蒙德之后动身的是图卢兹伯爵圣吉尔的雷蒙（Raymond of St Gilles）<sup>①</sup>。他此时约 55 岁，按照中世纪的标准已经算是老人了。雷蒙花

<sup>①</sup> 约 1041—1105，即图卢兹的雷蒙四世，他同时还是纳博讷公爵、普罗旺斯边疆伯爵等。——译注

了30年的时间耐心地一点点收回散落在其他人手中的家族领地；到出发前，他在法国南部已拥有13块领地。他的亲属关系非常复杂，这是因为他的母亲拉马什的阿尔莫迪（Almodis of La Marche）<sup>①</sup>曾数次联姻，先后嫁给吕西尼昂的于格五世（Hugh V of Lusignan）、图卢兹的庞斯（Pons of Toulouse）<sup>②</sup>和巴塞罗那的雷蒙·贝伦加尔一世（Raymond Berengar I of Barcelona）。她为吕西尼昂的于格五世生了两个儿子，其中塞浦路斯国王于格四世是大儿子；为图卢兹的庞斯生了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其中圣吉尔的雷蒙是二儿子；为巴塞罗那的贝伦加尔一世生了两个儿子。而且她一直与前两次婚姻所生的子女保持着联系：1066至1067年间，她前往图卢兹参加了女儿的婚礼。一个世纪后，人们评价她是一匹悍马，但事实上或许只是因为她的历任丈夫们发现不知如何与她相处。她的性格似乎相当霸道。由于鼓励丈夫雷蒙·贝伦加尔一世挑战其祖母对他封地的所有权，教皇维克托二世开除了她的教籍。最终，阿尔莫迪被自己的一个继子谋杀。但值得注意的是，她与三任丈夫所生的后代有一个共同特点：大都是教会改革和十字军运动的忠实拥护者。吕西尼昂的于格六世和圣吉尔的雷蒙都是“圣彼得的信徒”（*fideles beati Petri*），即教皇认可的支持者；他们，或许还有他们同母异父的兄弟巴塞罗那的雷蒙·贝伦加尔二世，都接受十字架参加了十字军东征；而他们的两个侄女图卢兹的费丽帕（Philippa of Toulouse）<sup>③</sup>和莫尔盖的埃尔莫森（Ermessens of Melgueil）的丈夫也是如此。

通过联姻，圣吉尔的雷蒙还与西班牙王室扯上了关系。虽然不能确定，但他可能参加过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那他是不是真正理解教会改革事业的意义呢？这一点很难搞清楚。不过，我们能明确知道的是，乌尔班二世视

① 约1020—1071，拉马什伯爵贝纳尔一世之女。拉马什是中世纪法国的一块伯爵领地，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克勒兹省。——译注

② 991—1060，即庞斯二世·威廉，为威廉三世与普罗旺斯的爱玛的长子兼继承人，1037年起为图卢兹伯爵。——译注

③ 约1073—1118，1098—1101年间和1109—1114年间为图卢兹女伯爵，约1094—约1116年间为阿基坦公爵夫人。——译注

雷蒙为盟友，还没在克莱蒙会议上宣布发动十字军的消息之前，就已经选定他为十字军的领导人。在克莱蒙会议召开前夕，教皇到访圣吉尔，或许两人在当地就讨论了这次远征；因为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宣布发动十字军的消息仅一天后，雷蒙的使节就抵达了克莱蒙，表示其主人愿意投身这项事业。这一切必定是事先就已经安排好的戏剧化情节 (*coup de Théâtre*)。有传言说，雷蒙已发下誓愿，将永不再返回故土。不论这些传言是真还是假，这位老人确实已决定放手自己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巩固下来的领地，把它们交给长子管理，而自己则与妻子一道踏上前往东方的艰辛旅程。与其他队伍的领导人相比，雷蒙所做的准备更加充分，因此，在此后将遇到的严酷考验面前，他们一行人的处境会稍好一些。不过，雷蒙似乎受病痛折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雷蒙与勒皮主教阿代马尔共同领导着可能算是规模最大的一支十字军队伍。自11世纪80年代起，阿代马尔就一直积极在法国南部推动教会改革事业，并被乌尔班二世任命为跟随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使节。他本来一直在十字军各位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可惜却过早去世了。雷蒙和阿代马尔一行人穿越意大利北部，绕着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弧形行进，并穿越了敌意重重的达尔马提亚 (*Dalmatia*)<sup>①</sup>。在拜占庭帝国军队（随时准备以武力处置任何偏离既定路线的人员）的护送下，他们于4月初抵达帖撒罗尼迦。雷蒙本人在该月的21日到达了君士坦丁堡，但显然他手下的人却因为和试图阻止他们抢劫的希腊护卫队发生了冲突而受到重创，六天之后才姗姗来到。

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和布卢瓦的史蒂芬伯爵则于1096年秋天离开法国。他们取道罗马和卡西诺山来到巴里。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几乎没做停顿就渡过了亚得里亚海，差不多与博希蒙德同时抵达君士坦丁堡。诺曼底公爵罗贝尔和布卢瓦的史蒂芬在意大利南部过冬，此后一路平安无事地穿越拜占庭帝国领土，大约在5月14日到达君士坦丁堡，与其

① 今克罗地亚境内的四大历史区域之一（其他三个为克罗地亚本部、斯洛沃尼亚和伊斯特里亚），大致为亚得里亚海东部沿海的一块北宽南窄的条状区域。——译注

他队伍会合。后者能如此令人吃惊地平安抵达，可能是因为拜占庭官方已经认识到之前派出护卫队实行暴力手段的行为产生了反作用，因此相应做了调整，采取了更加合情合理的措施。

## 第二波浪潮：从君士坦丁堡到安条克

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的经历影响了此后的行动。没有人能够确定希腊人到底会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似乎大多数十字军领袖都希望他们能全面参与，甚至希望皇帝亚历克塞能亲自掌控全局。1097年春，亚历克塞与布永的戈弗雷、佛兰德斯的罗贝尔、博希蒙德，或许还有韦芒杜瓦的于格，一道讨论了他亲自领导十字军远征的可能性。从亚历克塞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只是一种政治事务，而当圣吉尔的雷蒙抵达并声称他不会宣誓服从，除非皇帝领导东征，此时，其政治性就更确定无疑了。亚历克塞给自己找的借口是，君士坦丁堡离不开他。在围攻尼西亚的战斗中，希腊人和拉丁人有过合作，随后希腊人还派了一个人一直陪着拉丁人到安条克。此人名为塔第吉奥斯（Tatikios），是希腊化的突厥人，军事经验丰富。作为拜占庭当局的代表，此人的陪伴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而且给了十字军很多帮助，并受到了欢迎。虽然如此，塔第吉奥斯在1098年2月就撤走了，此后仅有少量希腊官员和文吏留在十字军中。而一支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却一路跟在十字军的后面，集中力量重建拜占庭对小亚细亚沿海地区的控制，远至安塔利亚（Antalya）。直到1098年6月，亚历克塞亲自带兵姗姗来迟，而且只行进到处于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之间中点位置的阿克谢希尔（Akşehir）。在那里，他得到了关于安条克局势的错误情报，还听到传言说有一支庞大的突厥军队正在安纳托利亚集结。这些消息促使他从阿克谢希尔又退了回去，自此之后便任由十字军自生自灭。到1098年夏天，形势已经很明朗，即便希腊人说得再好听，也不过是三心二意地参与一把而已。

对亚历克塞而言，另一件事更为重要。他之前想要得到的与突如其来的帮助其实完全不一样。这些十字军战士们在穿过巴尔干半岛向君士坦丁堡行进的途中就已经给他惹了很大的麻烦。因此他对这些人抱有深深的怀疑，尤其是对塔兰托的博希蒙德。而且他必定感觉到，需要找到某些控制他们的方法。1096年深秋，就在软禁“客人”韦芒杜瓦的于格期间，他或许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的策略是，孤立各个十字军领导人，然后分别对付他们。亚历克塞的女儿安娜·科内玛（Anna Comnena）在为父亲写的颂词里称，他担心一旦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可能会袭击君士坦丁堡。亚历克塞要求每个人发下两个誓言，而作为回报他会向宣誓者提供大笔金钱。但这份馈赠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丰厚，因为他要求他们从市场上购买必需品时一定要付钱。当然，十字军急需补给，因此明显处于劣势。再加上事实摆在眼前，如果拒绝皇帝的要求，那就只能打道回府，这就让他们实在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十字军领袖们需要发的第一个誓言是：如果他们解放了原属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应立即归还。这就让亚历克塞拥有了合法性，可宣称对接下来可能赢得的领土拥有治权。因为很显然，十字军并不打算征服原来并不属于基督徒的土地。第二个是表示忠诚与顺从的誓言，类似于西方的非家族封臣（*vassali non casati*）发下的誓约，但却不享有后者封地赏赐的福利。这让亚历克塞得以具有一定的（必须承认，是相当有限的）控制力。而各位领袖对发誓要求的反应不一。韦芒杜瓦的于格（据我们所知）、诺曼底的罗贝尔、佛兰德斯的罗贝尔和布卢瓦的史蒂芬没表示什么异议；布永的戈弗雷和圣吉尔的雷蒙表示恕难从命；而虽然塔兰托的博希蒙德没表示什么，他的副手唐克雷德却极力反对，或许这才揭示出博希蒙德真正的态度。有人认为，提出反对者恰恰是最终在东方定居下来的，这绝非巧合。而领袖们在君士坦丁堡时就出现的分歧，在此后的十字军征程中也持续存在。不过，在这个阶段，根本就不可能看清楚到底谁会定居在黎凡特。更合理的分析路径应是，依次来分析一下各位领导人当时面临的困境。

当皇帝要求他起誓时，韦芒杜瓦的于格的处境相当于一名囚犯。而且他

事实上几乎就是个光杆司令。至于戈弗雷，前文中就已经指明，他在1096年出发时就已经打定主意要返回欧洲，至少是在东方不能给他提供更诱人好处的情况下。因此，这些誓言不会因为可能限制他们未来的行动自由而让他们觉得糟糕。不过，考虑到韦芒杜瓦的于格立下誓约完全是被逼迫的，他也没法采取任何措施征询一下即将抵达的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他所发的誓其实很不可信。而这种发誓要求其实威胁到了戈弗雷队伍的生存，他对此的回应就是授权弟弟鲍德温洗劫君士坦丁堡的四郊。皇帝于是恢复了对他们的补给。接下来是三个月的相对和平期，可是，当亚历克塞听说更多支十字军将抵达后，便再次切断了补给。而戈弗雷队伍的回应是再次使用武力，这也是他们唯一的武器。濯足星期四（**Maundy Thursday**）<sup>①</sup>那天，戈弗雷的十字军攻打了君士坦丁堡城，让冲突达到高潮。但他们的进攻被希腊人击退。戈弗雷必定已经认识到，武力并不能迫使拜占庭方恢复补给，于是，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和他手下的主要将领一同发了誓。接下来，他们一行人很快被护送上路，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所以，当塔兰托的博希蒙德抵达时，亚历克塞已经成功地让韦芒杜瓦的于格和布永的戈弗雷发下誓言。博希蒙德因此实在不好断然拒绝，不过唐克雷德却成功地溜出君士坦丁堡，没有发誓。博希蒙德的境况并不太好，他带领的队伍规模也很小。有传闻说他要求担任拜占庭的兵马大元帅（**Grand Domestic**），即帝国军队的总指挥。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其实做了明智的抉择。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保证得到足够的希腊兵力来支持其队伍。

而圣吉尔的雷蒙已经发誓永不回归故土，有鉴于此，他很可能希望在东方能有一个公国。不过，令他感到为难的与其说是归还领土给拜占庭皇帝的誓言，不如说是表示效忠的誓言。他似乎认为，宣誓效忠皇帝有违他许下的侍奉上帝的十字军誓言，所以，尽管其他十字军领袖试图说服他发誓，并因为他的顽梗不化而生气，雷蒙却仍然不改变主意。但他也做了妥协，许下了

---

① 复活节星期日前的那个星期四。——译注

一个没那么宏大的誓言，称将尊重皇帝并捍卫皇帝的生命和荣誉。这在法国他家乡所处的那块区域，是有先例可循的。我们对佛兰德斯的罗贝尔的反应一无所知，但当诺曼底的罗贝尔和布卢瓦的史蒂芬来到君士坦丁堡时，先行者已经树立了发两个誓的榜样，所以不论他们是否喜欢，都实在别无选择，只能依样而为。从1097年4月开始，各路人马被陆续送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6月初他们在尼西亚城下合兵一处。这是他们在征途中碰到的突厥人在小亚细亚所占据的第一座重要城市。

35

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一切让十字军的诸位领导人感到沮丧和幻灭。长途跋涉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东方，但粮草短缺，并且也无法确定希腊人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发现，拜占庭皇帝根本不愿意担负起领导重任，显然只对收复帝国领土感兴趣——但平心而论，这也是他一开始想要的——而且打算运用一切可运用的手段：从赠礼分配到拒不给予粮草，迫使每一位十字军领导人在未等到后续同伴抵达的情况下分别许下两个誓言。虽然亚历克塞慷慨地赠予他们大量金钱，但这仅仅让他们得以从帝国市场上购买补给品而已。因此，毫不奇怪，从此时开始，大多数十字军战士已经不再信任和爱戴拜占庭帝国官方了。

虽然尼西亚的居民大多是基督徒，但这座城却是安纳托利亚实力最强大的突厥王公、塞尔柱人出身的罗姆苏丹乞力奇·阿尔斯兰（Kilij Arslan）的大本营。十字军想要沿着旧日去往东方的行军路线走下去，夺取这座城市具有关键意义。希腊人之前为这座城市修筑了绝佳的城防工事，城中还有强大的突厥驻军。但此时，乞力奇·阿尔斯兰却刚好带着军队主力出征去了，前去与本国最主要对手、一个叫达尼什曼德（Danishmend）的埃米尔（emir）<sup>①</sup>王国争夺马拉提亚（Malatya）<sup>②</sup>。因此城中守军根本联系不上他。等到他的第一支援军驰援抵达时，整座城市已经被团团围住。5月21日，阿尔

① 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受命的人”“掌权者”，是阿拉伯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谓。——译注

② 今土耳其南部城市。——译注



斯兰的大军主力回师，重创十字军，但却没能解开包围圈。乞力奇·阿尔斯兰就此撤兵，任这座城市、自己的妻子、整个家族以及大部分财物自生自灭。不过，要一直等到希腊人的船只自伊兹尼克湖（Iznik Gölü，即阿斯卡纽斯湖 [Lake Ascanius]，尼西亚就在湖岸旁）发动攻势，这座城市才彻底陷入孤立境地。守军这时开始与拜占庭人谈判。6月19日本是预定的总攻日，但就在这一天，十字军将士们看到城市上空飘起了拜占庭帝国的旗帜。亚历克塞要尼西亚直接向其投降，因此避免了与拉丁人相争的尴尬。他还利用这个机会，要求还没宣誓的十字军领袖（其中包括唐克雷德）向他发誓。他又成功了。

十字军将士们必定早已勇敢地下定决心，要在没有足够支援也得不到补给的情况下，孤军杀入小亚细亚，直到抵达叙利亚。在6月26日至28日之间，他们兵分两路启程穿越小亚细亚。第一路为博希蒙德所率领，由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诺曼人组成，其中也包括佛兰德斯的罗贝尔及布卢瓦的史蒂芬两支队伍，以及若干希腊人。第二路为圣吉尔的雷蒙所率领，由法国南部人、洛林人以及韦芒杜瓦的于格的队伍组成。结果两路人马走散了，失去了联系，其原因即使在当时也不得而知；而十年后在叙利亚，人们还在为此争论不休。在靠近多利留姆（Dorylaeum）<sup>①</sup>的地方，乞力奇·阿尔斯兰的军队在其他突厥王公援兵的支持下，在夜间包围了博希蒙德这路人马。7月1日黎明时分，他们发动了进攻，迫使基督教的骑士们败退混入后方有武装或未武装的朝圣者人群中。这个鱼龙混杂的朝圣者人群虽然没有袭击敌人的能力，但却能有效地自保，于是战斗僵持了两三个小时，直到第二路人马分成一支支小分队匆匆赶来，回应博希蒙德的求救尽力赶来支援。援军把突厥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并乘势将其击溃。

十字军就地休整了两天，之后取道阿克谢希尔和科尼亚继续前行。沿途经过的是一片已经荒废的区域，其罪魁祸首是突厥人的入侵及其敌对方采取的焦土政策。在105天（包括15天的就地休整日）的行军中，他们平均每

① 安纳托利亚的一座希腊古城，在今土耳其埃斯基谢希尔城附近。位置可参见本书地图二。——译注

天只行进 8 英里。考虑到随军行进的还有大量非战斗人员，这样的速度已经不错了。9 月 10 日前后，在埃雷利（Eregli），他们把一支阻挡去路的敌军打得四散奔逃。接下来，唐克雷德和布洛涅的鲍德温脱离队伍前往西里西亚劫掠。其有利条件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混乱无序状态中，一系列小的亚美尼亚公国乘乱建立起来。两支十字军人马并没有相互合作，而是不断起争端。尽管他们这样边抄边行进，仍然受到了在该区域定居时间并不久的亚美尼亚人的欢迎。他们顺利夺取了塔尔苏斯、阿达纳、米西西和伊斯肯德伦，然后才与大部队会合。鲍德温几乎马上又率领一小队人马再次出发，随之前往的还有一名投靠他的亚美尼亚幕僚。他们一路向东，沿着亚美尼亚公国分布的方向前行。在当地亚美尼亚人的帮助下，鲍德温攻占了拉万达（Ravanda）和蒂尔贝沙（Tilbeşar）两个要塞，随后收到埃德萨（乌尔法）亲王托罗斯（Toros）的邀请，来到埃德萨，成为托罗斯的养子兼助手。托罗斯之所以这么做，乃是因为他的地位刚刚确立没多久，还立足未稳，希望得到有力的支持者。可惜他最终引狼入室。鲍德温在 1098 年 2 月 6 日抵达埃德萨，一个月后城里的亚美尼亚人就发动了暴乱（很可能是鲍德温煽动的）。3 月 9 日，托罗斯在试图逃跑时被暴徒所杀，次日鲍德温完全接管了控制权。鲍德温就此在东方建立了拉丁人的第一块殖民地——由埃德萨以及拉万达和蒂尔贝沙两个要塞组成；几个月后，比雷吉克（Birecik）、叙吕奇（Sürüc）和萨姆塞特（Samsat）也被囊括在内。

这一地区很富庶，从 1098 年秋天开始，大批金钱和马匹从这里流向在安条克的十字军。布永的戈弗雷得到了蒂尔贝沙的城堡和地产，相比其他人，到十字军运动后期，他显然很有钱。依靠这块地方，戈弗雷就有能力犒赏自己的手下，而这显然大大不利于圣吉尔的雷蒙。也可能正是凭借这种物质笼络的手段，戈弗雷被选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我们还将看到，鲍德温在埃德萨的斩获还将在另一个关键时刻拯救十字军。不过，十字军后来拒绝履行诺言将安条克交还给拜占庭帝国，这让希腊人感到非常气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此还应该着重指出，虽然塔尔苏斯、阿达纳、米西西、伊斯肯德

伦、拉万达、蒂尔贝沙和埃德萨过去均是拜占庭的属地，但鲍德温却没有试图采取任何措施将它们交还给希腊人统治，甚至也没有做出任何承认其宗主权的表示。当然，希腊人距这些地方十分遥远，他们派出的唯一一支小分队这个时候还在与十字军主力一道行进（所以，奉命驻守科马纳的西方骑士是以上帝、圣墓、[十字军]诸领袖和[拜占庭]皇帝的名义施行统治的）。而唐克雷德和鲍德温甚至拒绝在名义上承认拜占庭的主权，这是具有喻示意义的。

与此同时，领导十字军主力部队行进的王公们可能事先听取了相关建议，认为从托罗斯（Taurus）山脉在西里西亚境内的山口，尤其是从叙利亚境内切断了安条克以北阿玛努斯（Amanus）山脉<sup>①</sup>的贝伦山口行进的路线，如果所过的这些关隘防守严密，就几乎无法突破。因此，他们决定多走大约175英里的路，向北绕道开塞利（Kyaseri），然后折向东南取道科马纳、格克孙（Göksun）到马拉什（Maraş，即卡赫拉曼马拉什 [Kahramanmaraş]），从而绕过阿玛努斯山脉的主体部分。这条路线把他们带到了安条克北面开阔的平原地带，最终他们在10月21日来到安条克城下。就补给方面而言他们当时的状况还算可以，而且一支热那亚舰队非常有先见之明地7月15日就从欧洲出发，于11月17日抵达安条克的港口马贾拉西克（Mağaracik，即苏韦迪耶 [Suwaidiyah]，又名圣西门港 [Port St Simeon]），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给养。不过，就在穿越荒凉的小亚细亚腹地的征途中，马匹和驮畜大批死亡。这是一场灾难，尤其是对骑士们来说，因为他们既需要依靠战马来发挥战力并显示地位，还需要驮畜来驮运行李。等到十字军主力来到安条克城下时，幸存的战马还不到1000匹；也就是说，每5名骑士中就有4名没有坐骑。到了夏天，这个数字进一步下滑，萎缩到100多匹。于是，大多数骑士，甚至包括很多在欧洲本土势力非常强大的领主，如今也只能徒步、骑驴或骑骡子作战。就连布永的戈弗雷和佛兰德斯的罗贝尔，在1098年6月安条克之战打响前，也必须请求调配马匹给他们。此外，驮畜大量折损意味着，骑士们

① 参见本书地图三。——译注

必须亲自扛自己打仗夺来的武器、盔甲等沉重的战利品，而这在他们穿越反托罗斯（Anti-Taurus）山脉延伸山系那陡峭的山脊时，常常导致惊险混乱场面的发生。

## 第二波浪潮：围攻安条克及其后果

38 这支由大概 3 万名男女组成的军队，现在开始了一场将要一直持续到 1098 年 6 月 3 日的围城战。安条克坐落在西尔皮乌斯山（Silpius）和奥龙特斯河（Orontes）之间，其内堡建在比外城还高 1 000 英尺的山顶上。因此，这座城市完全不可能被彻底围困。在围城期间，十字军在河对岸及城的北门和南门处扎营，建立要塞。但这几处的驻军通常必定都很少，因为军中的主力正忙于四处“打猎”，补充口粮。十字军在没有任何可靠补给制度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制度）突进亚洲，必须依靠劫掠才能保证给养。因此，毫不奇怪，城外近郊一带很快就被洗劫一空。十字军战士们于是不得不越走越远，分成一个个洗劫小分队走上 50 英里远，并在离安条克有相当距离的地方建立劫掠中心：向北突进西里西亚，向东北突进埃德萨，向东突进叶尼谢希尔（Yenişehir）和哈利姆（Harim），向南突进鲁耶（Ruj）和拉塔基亚（Latakia）。这场围城战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不是它的战事，而是不断四处寻找食物的过程。可以想见，饥荒必然会发生，饿死和病死的例子屡见不鲜。除了本就患病的圣吉尔的雷蒙，其他一些十字军领袖似乎也开始患上慢性病。贫困也在逼近，甚至一些原本在西方还很有地位的领主也被迫投奔势力更大的领袖旗下寻求庇护。因此，随从们的数量是不固定的，总是随着可获得食物的多寡而增减，但为他们提供食物的任务却让各位领袖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早在 1098 年 1 月，博希蒙德就威胁说不再参加围城战了，因为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支撑下去。到了接下来的夏季，布永的戈弗雷和佛兰德斯的罗贝尔也都一度陷入兵粮断绝的境地。因此，毫不奇

怪，在这样充满压力的情况下，思乡的情绪和恐惧的表现都时有泛起，导致了恐慌事件发生，并不时有逃兵出现。

安条克之围持续了七个半月，其中还包括一个让十字军死伤惨重的冬季。在1097年12月末和1098年2月初，伊斯兰援军两度前来，后一支还曾与城中驻军协同发起了一场进攻，但均被击退。不过，在5月间，带着来自伊拉克和伊朗地区的新鲜血液，第三支规模更大的援军在摩苏尔总督科伯嘉（Kerbogha）的率领下自该城向安条克进发。这支队伍徒劳无功地花了三个星期时间想要铲除埃德萨公国——再次证明鲍德温当初的举动对十字军的生死存亡意义重大——此后在路途上又吸纳了阿勒颇来的援兵，最终于6月5日抵达安条克近郊。可是到此时，十字军的境况已经大为好转。博希蒙德想要亲自占领安条克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他与城中守军的一名头目（可能是一名改信伊斯兰教的亚美尼亚人<sup>①</sup>）展开了谈判，后者同意把城市交给博希蒙德。除了圣吉尔的雷蒙之外，博希蒙德说服了所有的十字军领袖，如果他的军队率先进城，而此后拜占庭皇帝也不亲自来宣示主权，那这座城市就归他所有。6月2日日落后，十字军各支队伍进行了一场复杂的分组演习，天黑之后才各归其位。6月3日日出之前，在那名叛变者的引导下，博希蒙德手下的60名骑士翻越了西尔皮乌斯山半山腰的要塞双妹塔（tower of Two Sisters）的护墙，然后冲下山，打开了圣乔治门，让大队人马一股脑儿涌进了安条克城。到傍晚时分，虽然内堡还没被攻陷，但城市其他部分已经到了十字军手中。安条克总督仓皇出逃，结果从马上摔下来，被几个亚美尼亚农民砍下头颅。

39

十字军就这样占据了这座被围困几个月之久的城市。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科伯嘉率领的穆斯林援军已经抵达并在河对岸扎营，而这回轮到他们被

① 多数亚美尼亚人为亚美尼亚教会信徒。基督教于公元301年成为亚美尼亚国教，公元303年亚美尼亚贵族照耀者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 Illuminator）建立该教会。该教会教义和仪式接近东正教，但隶属基督一性论派，反对基督神人二性论，于公元564年正式脱离了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关系。——译注

围困了。科伯嘉与固守内堡的守军取得了联系，内堡在6月9日向城中发动了一次进攻。10日，十字军突袭内堡失败，那天夜里他们的士气跌落到谷底。有大批逃兵离去，还有很多人也试图开小差。各位领袖怕队伍就此分崩离析，于是封死了城门。布卢瓦的史蒂芬不久前被选为总负责人，但就在安条克陷落之前，他因为生病退到了伊斯肯德伦修养。逃跑的人大都跑到了他那里，这让他十分惊慌，居然也开始逃跑。在一路逃到拜占庭帝国驻军设在阿克谢希尔的总部之后，他和同伴一起使亚历克塞相信十字军已经没救了。而皇帝担忧突厥人会就此向安纳托利亚发动反攻，于是再次率军向北回返，班师回到安全的君士坦丁堡。

然而，在安条克，十字军的士气正在回升。有两个自称受到神启的人求见了十字军众位领袖。其中一位声称在6月10日晚上见到了基督，基督向他保证，十字军将大为兴盛，只要他们赎清自己的罪。另一位声称圣安德烈（St Andrew）<sup>①</sup>曾数次来访，向他指明了圣枪（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刺穿他侧腹的长矛头）隐藏的地方。6月14日，十字军在一座新建天主教堂的地下挖战壕，结果在底部发现了这件圣物。虽然十字军各位领袖，包括教皇使节在内，都对此事将信将疑，但普通的战士却因此而欢欣鼓舞。他们认定，消除眼前困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勇敢求战。十字军最后一次派使者前往与科伯嘉议和。之后，在6月28日，十字军在博希蒙德的率领下杀出城外。他们分成四队进攻，每队均由两行骑兵和两行步兵组成：考虑到幸存的马匹实在寥寥，能骑马的骑士必定数量极少。各个分队都进行了复杂的队形变换，从纵队变作横排，最终每三人并排行进，步兵在前掩护少量的骑兵，且两翼均有天险的保护：右侧为奥龙特斯河，左侧为高山。第四分队由博希蒙德亲自领导，反向行进。十字军按梯队发动进攻，以步行方阵行进。结果穆斯林被打得四散奔逃，内堡守军也向博希蒙德投降。这场大捷的原因始终没有得到解释，不过，有可能是因为，科伯嘉根本不应该让基督

---

① 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为西门彼得（圣彼得）的弟弟——译注

徒的军队能全部从同一个门出来，再跨过同一座桥到河对岸，然后摆好阵势；因为等到他想要阻止时已经来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队伍被一点点切碎，一小股一小股地被拖入近身肉搏战中。十字军方面给出的解释是，一支由天使、圣徒和十字军战士亡灵组成的天兵出现，加入了己方阵营作战。

这场胜利事实上成为这次十字军东征的转折点，但在当时其意义还并不明显。领袖们明智地决定先不乘胜继续进军，而是在安条克休整到 11 月 1 日，到那时，暑热就会过去，天气会更有利于行军。但就在此时，一场可能是伤寒的瘟疫爆发，夺走了勒皮的阿代马尔的生命；其他十字军领袖则四散逃往各个劫掠中心营地，直到 9 月才返回安条克，并且在两件事上出现争论迹象。到 11 月份，争论开始清楚地浮现。

第一件事是该由谁占领安条克。博希蒙德认为应该由他自己。而圣吉尔的雷蒙当时仍然占据着城中的若干区域，包括总督的宫殿和一座横跨奥龙特斯河、通往港口并修有堡垒的桥梁。雷蒙指出，各位领袖此前曾向拜占庭皇帝许下双重誓言。他可能是想自己占据安条克，并认为，要达成这个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由帝国授权。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于是在安条克城陷落之前，各位领袖曾达成一致：只要亚历克塞亲自前来宣示主权，该城就归降于他。在安条克战役结束以后，他们也派遣了一支由韦芒杜瓦的于格和蒙斯的鲍德温（Baldwin of Mons）率领的全权使团，前去邀请亚历克塞亲自来安条克接受十字军的领导权。皇帝的回复直到次年 4 月才传达到十字军那里。他承诺将在 6 月与他们会合，并要他们放缓行进节奏，等他抵达。他要求把安条克返还给帝国，其使者还严厉地抨击了博希蒙德试图违背誓言篡夺安条克的行径。与之相对，博希蒙德的支持者们则辩解称，拜占庭皇帝对十字军漠不关心，甚至还心存敌意，没有尽到作为十字军领袖们的封建领主应尽的义务；他们所许下的双重誓言，是亚历克塞武力强迫所致；塔第吉奥斯离开十字军，以及亚历克塞在十字军最需要援助的时候率军从阿克谢希尔撤回，这些都说明希腊人自己根本没有恪守约定；而对于 1098 年 7 月的使节团，

亚历克塞回复迟缓，则说明帝国军队根本就缺乏准备。

当然，这些都是辩解之词。但十字军确实被希腊人撇在了一边，他们也确实面临许多紧迫的需求。他们知道，当初有很多人起誓接受十字架东征，但最终却没有从欧洲出发；而这个预估的庞大数字让他们十分在意，甚至可以说痴迷。他们时时记得有这样一批储备力量存在，而随军的主教们会开除那些未能履行诺言的人的教籍，并承诺说欧洲的主教们也会这么做。与此同时，仍然不断有一些新来者从欧洲出发来到东方，与先行者会合。这些新鲜力量大多由陆路前来，十字军战士们因此也期望还会有更多人循着他们的路线抵达。这一切后来在 1101 年的十字军东征中也确实发生了。安条克扼守着从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的山口，而且据守着朝向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势力的北部沿海道路。因此，这座城市必须由值得信赖的人据守。亚历克塞之前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并不值得信任；而且与此相反，在十字军战士们看来他非常令人厌恶，他想操纵他们来达成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需要记住的是，尽管博希蒙德此后就留在了安条克，并直到圣墓解放五个月后才实现其解放并朝拜圣墓的誓言，但在西方却没有人为此责备他。事实上，他在 1106 年对法国的访问相当成功。这说明，十字军领袖们知道，据守安条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件事是到底什么时候启程继续前往耶路撒冷。作为推动行程继续的一个步骤，广大十字军战士们共同迫使领袖们同意进攻安条克以南 60 英里处的小镇迈阿赖努阿曼（Ma'arret en Nu'man）。该镇于 1098 年 12 月 11—12 日被攻陷，但指挥十字军的领袖们还是下不了决心是否继续征程。1099 年 1 月初，他们在鲁耶开了一次会，但仍然没达成一致。

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十字军群龙无首。他们曾四次试图选出一位总负责人。1097 年春，亚历克塞搁置了推举他为总负责人的提议；1098 年春，布卢瓦的史蒂芬被选为全权指挥，但没过多久他弃军逃跑了。1098 年 7 月从安条克出发前往拜占庭帝都的使团再次向亚历克塞提出这项建议。1099 年 1 月，圣吉尔的雷蒙迫于属下要求继续征程的强大压力，向其他领袖提出以大笔金钱为酬劳请他们为他服役，但大多数人表示拒绝。事实是，这些领



袖中没有一位强大到足以号令其他人。人们通常认为是他们在领导“军队”，但事实并非如此。追随他们的是各自的家户，其中包括亲戚和一些依附者；而且他们在给养不足时会接收到更多的随从，因此需要供养更多的人。不过，那些真正有战斗力的主体——小的领主们，大多数都独立指挥着自己的小小武装。骑士们也是独立的，他们效忠的对象会随着环境以及领袖们给予报酬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这些随从来来去去，数量总在消长。十字军内部效忠关系的变化非常惊人，因为那些小的领主总是不时在这一队或那一队人马之间摇摆。没有哪位领袖的属下有足够的凝聚力或稳定性，从而能为他提供一个可以号令群雄的稳定基础。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十字军是由委员会和议事会集体领导的。每位领袖要先与他主要的随从议事，全军上下还有大大小小的由普通士兵组成的议事会，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领袖议事会。勒皮的阿代马尔还在世时情况则大不相同，因为他具有足够的人格魅力和权威来掌控领袖议事会。但自他在1098年8月1日去世后，领袖议事会失去了唯一具有客观性和足够权威的领导人，常常陷入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的僵局。

这种僵局也体现在十字军纪律的崩溃上。而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让平民士兵最受罪，烧杀抢掠总会波及他们；而且，如果十字军老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止步不前，那他们就有遭遇饥荒的危险。1098年11月中旬，领袖们还在犹豫不决时，平民士兵们的怒气开始高涨，情绪激昂，并威胁说再这样下去就要选出自己的领袖。他们迫使圣吉尔的雷蒙和佛兰德斯的罗贝尔率领他们进军迈阿赖努阿曼。接着，大约在1099年1月5日左右，圣吉尔的雷蒙的手下人听说鲁耶会议毫无进展，于是他们推倒了迈阿赖努阿曼的城墙，让雷蒙没了营地。雷蒙别无选择，只好在13日继续向耶路撒冷行进。仍然留在安条克的平民十字军战士们也开始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布永的戈弗雷、佛兰德斯的罗贝尔和博希蒙德也不得不屈服于民意的压力。他们在2月2日召开了一次大会，决定全军于3月1日在拉塔基亚集结，然后从那里出发继续前行。

## 第二波浪潮：解放耶路撒冷

与小亚细亚的情况一样，叙利亚对十字军的到来毫无准备，当地各股势力如一盘散沙，缺乏有组织的应对。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突厥统治者彼此之间有空隙。控制着塞伊扎尔（Seijar 或 Shaizar）和的黎波里的阿拉伯王国对待突厥人比基督徒更充满敌意。因此，十字军没有遭遇到什么抵抗，一路高歌猛进。而埃及人刚刚收回耶路撒冷的控制权，面对逐渐袭来的威胁，他们的反应是诉诸外交手段。早在 1098 年，一位埃及使节就来到了基督徒们位于安条克的营地里，待了几个星期后他带着回访的基督徒使节团返回开罗。这些使节随后被迫在埃及羁留了一年之久，直到 1099 年春才得到释放；而这一次他们带着另一个埃及使节团回到了十字军中。此时，十字军正在围攻距的黎波里 15 英里远的阿尔卡（'Arqah）。圣吉尔的雷蒙取道卡法塔（Kafartab）来到阿尔卡，与诺曼底的罗贝尔、唐克雷德以及哈弗涅（Rafniye）会合。3 月底前，雷蒙又迎来了其他十字军的领袖们，只除了在后方留守安条克的博希蒙德。对阿尔卡的围攻进行得不太顺利，久攻不下影响了士气。同样让士气低落的还有彼得·巴托洛缪（Peter Bartholomew）的死亡，他就是那位指明了圣枪所在地的受到神启的人。在做出此项发现之后，巴托洛缪接下来的各种预言非常荒谬，惹恼了军中一大批人。于是他自愿接受火刑的试炼，可惜没能活下来。不过，让十字军停止围攻阿尔卡的最关键因素似乎是与埃及人谈判的破裂。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迟迟不进军耶路撒冷，就可能在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腹背受敌，而遭到一支令人生畏的援军从背后发动的袭击。另外，他们也知道，现在正值丰收季节，沿途到处都能提供充足的补给，因此，5 月 13 日他们放弃了攻打阿尔卡，选择继续南下。

43 到此时为止，从围攻尼西亚算起，两年时间已经过去，在这段时间里十字军行进得相当慢。这是因为，出于掩护后方的考虑，他们沿途要消灭一些主要的要塞，以免它们妨碍自己通过安条克和小亚细亚与君士坦丁堡保持通畅的联系。然而现在，他们抛开了所有的谨慎思虑，再次大胆决定：绕过挡路

的大型要塞，向着耶路撒冷快速行进。于是他们的进军速度突然从龟速转为大跃进。离开阿尔卡仅六天后，他们就渡过了贝鲁特以北的狗河，取道泰尔<sup>①</sup>迅速向南推进，在雅法以北突进内陆，并于6月3日抵达拉姆拉。6月7日，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城外。也就在前一天，唐克雷德攻陷了伯利恒<sup>②</sup>，此时的他已经抛弃了圣吉尔的雷蒙而带着一众意大利南部的诺曼武人转投布永的戈弗雷。

与安条克一样，耶路撒冷太大而无法被完全包围。但安条克围攻战持续了七个半月，最后靠耍了些计谋才攻下，而耶路撒冷的战事仅持续了五个星期。十字军首先集中力量攻打西城墙，但随后分兵两处：一处为北城墙的西段，由诺曼底的罗贝尔、佛兰德斯的罗贝尔、布永的戈弗雷和唐克雷德定点进攻；另一处是南面的锡安山，因为唐克雷德（可能也包括他手下一些人）变节的事情和戈弗雷闹得很不愉快，于是圣吉尔的雷蒙独自在这里驻扎。当时热那亚和英格兰的船只抵达了雅法，一支远征队还北进到撒马利亚，因此提供了足够的木材和其他物资，可用于建造两座攻城塔、一座攻城槌以及若干投石器。但尽管如此，围攻开始时并不太顺利。此外，有消息传来，耶路撒冷的守军（也包括攻城者）一直在期待的埃及援军正在赶来。7月8日，遵循一个受到神启的人的指示，十字军战士们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赎罪游行，队伍走遍了城外的圣地，最后聚集在橄榄山聆听圣训。14日，十字军战士们紧张地在南面的壕沟中就位，到傍晚时分，圣吉尔的雷蒙的攻城塔已经接近城墙。但到了15日，布永的戈弗雷的手下放弃了攻击东面，转而猛攻今天靠近希律门以东位置的平地，并成功把攻城塔架上了城墙。两名来自图尔奈的骑士率先爬上城墙，之后是洛林人。涓涓细流之后变成了洪流，十字军战士们纷纷翻过城墙，或经由攻城槌砸出的豁口涌入城中。一些人来到

① 位于今黎巴嫩南部，一般认为即今天的苏尔城（Sur），在圣经旧约中是以色列的邻国，在公元1世纪成为地中海的一个重要的中途港，耶稣曾在该城附近治好一个被邪灵附体的女孩。（马太福音 15:21-29；马可福音 7:24-31）——译注

② 位于今巴勒斯坦中部，耶稣在此地诞生。（路加福音 2:4-7）——译注

圣殿区域。一些人则越过圣殿区域一直来到西南角，此时抵抗圣吉尔的雷蒙所发动攻势的穆斯林们已被迫撤退到这里。耶路撒冷本身的人口并不多，当时城中的人大多是周围地区逃进来的难民，他们这时只能听天由命，任由洗劫降临。尽管唯一一份存世的伊斯兰文献资料表明，此役中遭屠戮的人数并没有通常想象的那么高，但亲眼见证了这场战事的基督徒们却总是夸张地描述己方是如何大肆屠杀的。

- 44 7月22日，布永的戈弗雷当选为这一新据点的统治者。他的第一项使命就是组织城防，以对抗埃及人的反攻。他费了不少劲才说服其他十字军领袖率领部众全力参战。到8月11日傍晚时分，基督徒们全军出动，来到阿什杜德（Ashdod），截获了埃及军队的全部粮草。到第二天黎明时分，他们又突袭了仍然驻扎在阿斯卡隆（Ascalon/Ashqelon）北面的埃及军队。这些欧洲的骑士们之前已经得以重新配备了马匹，此时，他们骑着马迅速猛攻，终于打得敌军落花流水。

## 第二波浪潮的成果

对中世纪西欧的骑士们来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这第二波浪潮是近年来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之一。它在一系列广为流传的史诗中得到歌颂，在壁画、挂毯甚至镂花鼓面上得到刻画，很快成为传奇；而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也被推崇为英雄。昂布瓦兹（Amboise）的领主、卢瓦尔河畔肖蒙的于格（Hugh of Chaumont-sur-Loire）的冒险事迹，在几十年后仍被他的后代们铭记。阿尔德雷的阿诺德二世（Arnold II of Ardres）的家人，在一个世纪后坚持认为他参与了这次东征，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至于为什么史诗《安条克之歌》（*La Chanson d'Antioche*）所列的骑士名单中没有阿诺德二世的名字，他们的解释是：他拒绝为了让自己榜上有名而贿赂史诗的作者。从很多方面来看，十字军东征的军事行动确实具有一种英雄主义色彩，其间涌现出了多

场伟大的围城战役，如在尼西亚、安条克、迈阿赖努阿曼、阿尔卡、耶路撒冷；而在向耶路撒冷进军的路上，为了尽快达成目标，当时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围城工具纷纷被投入使用。在行进途中，十字军在多利留姆和埃雷利取得大捷。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击败各支敌人援军的战斗：一次在尼西亚，三次在安条克，一次在攻陷耶路撒冷之后。因为普遍公认，军队所处的最可怕险境，无过于在围城战时遭到敌人从后方的袭击。更何况这一切胜利都是由一支给养不足以至于常常只能靠四处劫掠维持生存的军队取得的。这支军队失去了带来的马匹，大部分时间只能徒步作战，没有固定而强力的领导人，时不时乱成一盘散沙，并因此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对十字军伤亡情况的最新估算认为，有几近 40% 的战士死亡。而那些随军东征的平民的死亡率肯定更高。

### 第三波浪潮

在这次胜利之后，大多数十字军战士打算返回家乡。从 1099 至 1100 年的那个冬天开始，他们逐渐重新在欧洲现身，但带回来的不是财富而是圣骨和棕榈叶。他们把圣骨送给了教堂，棕榈叶则是他们特意采集带回证明自己已实践誓言的信物。然而早在 1099 年春天，甚至还在他们抵达耶路撒冷之前，教皇乌尔班二世就已经开始委派米兰大主教到伦巴第重新宣扬组织十字军了。乌尔班二世于 1099 年 7 月 29 日去世，没能听到耶路撒冷解放的消息，但在伦巴第的布道工作得到了热烈的响应。随着耶路撒冷解放的消息传遍西方，新的十字军纷纷被招募起来。乌尔班二世的继承者教皇帕斯卡尔二世的做法与前任如出一辙，威胁说将开除那些不履行誓言者的教籍，而审查任务由各地的主教们承担。帕斯卡尔二世还威胁说要开除中途开小差的人的教籍。韦芒杜瓦的于格和布卢瓦的史蒂芬因此陷入了难堪的境地，于是决定重新踏上前往东方的路途。当然，那些中途逃跑的人不仅抹黑了自己，也让亲友们蒙羞。布赖的米莱斯及

其子居伊·图索（Guy Trousseau）在1098年中途折返，但其后来莱斯又追随1101年的远征队再次启程，并且还有家中其他的年长者——他的兄长罗什福尔的居伊（Guy of Rochefort）和他一道前往。这种安排显然并非偶然。

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众多此前并未接受十字架的男男女女们，如今蜂拥至十字军的旗下。教皇使节团受命前往法国。他们于1100年9月在瓦朗克（Valence）召开了一次会议；其后又前往利摩日，在那里，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及其众多封臣都宣誓加入十字军；此后他们又来到普瓦捷，一场大公会议于11月18日在那里召开，而这一天也正是克莱蒙大公会议召开的五周年纪念日，他们借此时间、场合布道宣扬十字军。

第三波浪潮的规模可能与1096年出发的那波相当。但由教皇大使节兼里昂大主教迪的于格率领的神职人员队伍则更庞大。出征的世俗领袖们的级别与之前相当，甚至更高：阿基坦的威廉、布卢瓦的史蒂芬、韦芒杜瓦的于格、讷维尔的威廉（William of Nevers）、勃艮第的奥多、勃艮第的史蒂芬和巴伐利亚的韦尔夫。队伍中洋溢着一种轻快愉悦又充满侠义的精神，这可能是受阿基坦的威廉热情奔放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但即使在这种光芒之下，也有迹象表明此次出征带有某种庄重的宗教目标，而且还试图从先辈们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吸取教训的迹象之一是十字军战士随身携带了大量珠宝和现金，从而让此次行动得到了奢侈的恶名。

首先出发的是伦巴第人，他们在1100年9月13日离开米兰。他们在保加利亚过冬，并于1101年春在君士坦丁堡城外扎营待了两个月，等待德意志和法兰西的十字军队伍到来。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表现得混乱无序。和之前一样，亚历克塞不允许他们购买给养，以迫使他们尽快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像前人所做过的一样，伦巴第人的反应也十分激烈，还对皇帝所在的布拉海耳奈宫发动了一次袭击。但这让他们的领袖们感到尴尬，于是同意乘皇帝提供的渡船前往亚洲。在伊兹米特（Izmit，又称尼科米底亚 [Nicomedia]）<sup>①</sup>，伦巴第人与最

---

① 位于今土耳其西北部的马尔马拉海伊兹米特湾东端的城市。——译注

先抵达的一小批德意志军队会合，另外还包括布卢瓦的史蒂芬以及圣吉尔的雷蒙率领的勃艮第和法兰西北部的队伍。圣吉尔的雷蒙于1100年夏天携家带口抵达君士坦丁堡，很不情愿地答应以顾问身份同行。但他的顾问做得并不成功。新来的十字军罔顾他、希腊人以及布卢瓦的史蒂芬的建议，决定不等其他部队前来，径直行进到尼克萨尔（Niksar）。去年夏天被东安纳托利亚达尼什曼德埃米尔国的突厥人俘虏的博希蒙德当时就囚禁在此地。也许是被大捷的夸大消息所激励，在新一批十字军中，这些伦巴第人可能是唯一没那么想救援圣地而更想征服更多地域的，甚至他们有可能正计划要从北面进入伊拉克，直指哈里发的都城巴格达。6月，他们从伊兹米特行进到安卡拉，然后朝东北方向进军昌克勒（Çankiri/Gangra），随后再次东进。8月上旬，在梅尔济丰（Merzifon）附近，他们与一支由众突厥王公（他们终于成功不计前嫌，联手作战）联合召集的军队遭遇。战斗持续了好几天，最终十字军被击溃，四散逃离。

另一支由讷维尔的威廉率领的队伍在1100年6月抵达君士坦丁堡，与阿基坦的威廉的先遣部队会合之后，他们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于24日出发追赶伦巴第人。到达安卡拉后，他们放弃了追赶，转而折向南面去往科尼亚，并在经历了一场持续三天的战斗后于8月中旬来到那里。讷维尔的威廉由于没能夺取这座城镇，于是转往埃雷利。而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一座空城，水井也被堵塞。十字军战士们在城中忍受了几天干渴之后，被打垮赶了出来。与此同时，由阿基坦的威廉率领的第三支队伍于3月中旬离开法国后，与韦尔夫带领的巴伐利亚人会合，一路乱哄哄地穿越了巴尔干半岛，在6月初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在城外停留了五个星期，购买给养并听取希腊人的建议。但一部分德意志人明智地选择了经海路直接前往巴勒斯坦。7月中旬，阿基坦的威廉和韦尔夫沿着第二波十字军浪潮曾走过的路线出发东进。但这条路沿线已经被突厥人和来来往往的十字军搞得荒败不堪，因此，虽然之前做了精心的筹划准备，他们还是很快断了粮。到埃雷利附近时，这支队伍遭到伏击，死伤殆尽。

阿基坦的威廉和韦尔夫逃了出来，讷维尔的威廉、勃艮第的史蒂芬、布

卢瓦的史蒂芬和圣吉尔的雷蒙也在之前的兵祸中幸免。韦芒杜瓦的于格在塔尔苏斯因伤过世，他手下的部分幸存者在叙利亚加入了圣吉尔的雷蒙的队伍，共同夺取了塔尔苏斯。该市镇此后将成为雷蒙的大本营，他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另一块十字军领地。之后，各路人马大多齐集耶路撒冷，兑现了曾许下的誓言。但也有一部分人因遭遇恶劣的风暴天气而延误了出发的日子，到达后便与当地的守军一起经历了又一场埃及人的进攻。很不幸的是，他们在1102年5月17日大败，可怜的布卢瓦的史蒂芬在战斗中被杀。

## 十字军圣战观念的发展

1097至1099年发生的种种事件确立了一个观念：十字军运动是一场朝圣之旅，但骑士可以在其中发挥他们作为武人的基本功能。十字军拥有繁复的仪轨：赎罪仪式程序和斋戒礼仪。让人惊叹的是，在每一次重要的行动之前，这些饥肠辘辘的战士们还必须要进行斋戒。这也让当时那些文士们（大多数是僧侣）颇感震惊，因为十字军仿佛在行军途中具有了准修道院的性质：俗世之人发下誓言踏上征途，于是在某段时间内他们取得了类似修道院圣职的身份，因为征途艰辛严酷，让他们像修道院中的僧侣一样遭受贫穷，也被迫独身。与僧侣们一样，十字军战士是远离平凡俗世的“放逐者”。他们接受十字架，追随基督，因对上帝的爱而把妻子、孩子和土地抛在身后，因对弟兄的爱而让自己的肉身暴露在极大的风险之下。与僧侣们一样，他们参加定期的群体祈祷活动，并恰如僧侣们经历了一趟前往耶路撒冷的“心灵”之旅，他们则以肉身实地前往耶路撒冷。有鉴于教会改革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整个教会都修道院化，这场十字军运动似乎最终让俗众们也达成了这一目标。确实，在言辞和意象上，人们异乎寻常地很快就转而用通常与隐修主义相关的一切来描述十字军圣战：基督的骑士，十字架之路，通往耶路撒冷天国之路，灵性之战。对十字军圣战的隐修式诠释虽不会持续太久，但



却为教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点用以构筑自身的立场，以应对这种革命性的新战斗形式不可避免地将带来的诸多问题。

因十字军圣战而变得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控制力。教区神父们受命规范招募过程，任何想要接受十字架加入十字军的人都必须先向他们那里听取建议。但教区体系并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的群众招募活动。在必要的情况下，主教们被认为有责任确保人们履行誓言，但事实上几乎不可能判定，在第三波浪潮中履行了誓言的人们，到底是因为害怕开除教籍的威胁，还是因为因听到耶路撒冷解放的消息而不由自主地为自身未能践约感到羞愧。教皇使节团和教士们本应在十字军东征途中对情况做出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这些教士大多素质不高，而作为显贵的家族神父，他们也没有能力挑战或约束自己的雇主。教士们没能阻止 1096 年夏秋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也没能阻止 1099 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世俗王国。此外，我们在参加东征的俗众中也可以察觉到某种独立的态度。显然，与其说吸引他们的是对东方基督教弟兄之爱的某种表达，还不如说是为了占领圣墓这处神圣的遗迹。而且，教皇也没办法让他们相信，那些在践约之前就已经逝去的人也能享受到罪责的赦免。1100 年接受十字架参加十字军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近亲在第二波浪潮中还没抵达耶路撒冷就已经身亡，而他们希望能帮亲友完成救赎。迟至 13 世纪中叶，仍有若干虔诚者还在纠结于这个问题，而托马斯·阿奎那则试图解决他们的疑虑。

48

十字军战士们在第二波浪潮中的种种灾难性经验，对人们发展出“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这一观念是非常关键的。在穿越小亚细亚后，他们似乎确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应归于上帝仁慈但严厉的控制。神圣遗物的发现，瞻仰在每个基督徒心中都早已相当熟悉的各处场所，以及夜空中偶然出现的霞光、流星、彗星等各种征兆（1120 年前后迎来一个大规模的天体活跃期，而这些迹象大多为其前奏），都强化了这一观念。十字军战士们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么艰难。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成功地熬了过来。因此，除了是上帝曾施加干预之外，他们实在找不到其他令人满意的答案来解释这种状况。于是，在穿越小亚细亚的途中，十字军中的预言家们开始看

到基督本人、天使们、圣徒们以及他们队伍中的亡者等各种显圣迹象，而他们的死也开始被视为殉道，这一切也都不足为奇了。1101年第三波浪潮的失败实际上反而强化了这一观念，因为人们提出，1097至1099年那种一败涂地的经历比这次还惨。阿基坦的威廉及其同僚们经受的灾祸可以归结于他们自身过于奢靡、骄傲和罪孽深重，所以才会遭到上帝的审判。

十字军东征是神启、神导的战斗，这种观念在十字军战士们所写的信件和见闻录中经常可以发现，但其表达是很粗略的，有时其论调也并非神学的。而完善的任务会由下一代的评论家们继续完成，主要是法国的三个本笃会修士：“僧侣”罗贝尔（Robert the Monk）<sup>①</sup>、诺让的吉贝尔和布尔盖的鲍德里（Baldric of Bourgueil）<sup>②</sup>。他们的著作写于东征十年后，把十字军东征放到了整个天启史的背景之中。从这方面看：在罗贝尔看来，十字军运动是自创世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救赎人类以来最明显的显圣证据。在吉贝尔看来，十字军战士们比旧约里的以色列人等级还高。这些本笃会的评论家还把所有元素都牢牢地置入神学的背景之中，例如将殉道与对基督的爱联系起来。之前，十字军运动作为一场为基督而战的战斗的观念只是由十字军战士们自己粗略地进行了表达，而如今，在评论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神学上的阐述。

然而还有很多东西是捉摸不定、难以名状的。十字军圣战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个世纪才成熟。而且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回答：是什么使十字军运动区别于其他圣战或武装朝圣的？在什么情况及怎样的战场设定下才可能出现十字军圣战？是不是只有教皇才能发起？教会对十字军战士们拥有怎样的控制力？如何真正确保赎罪，而其又将应用于何人身上？昂贵的十字军东征是如何得到资助的？12世纪将承担起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的任务。

① ? —1122，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家，他重新改写了由参与第一次东征的匿名作者所写的见闻录《法兰克人事迹》( *Gesta Francorum* )。——译注

② 约1050—1130，布尔盖修道院院长，都尔大主教，也重新改写了《法兰克人事迹》一书。——译注

## 第三章

# 耶路撒冷和安条克的圣地及大主教辖区

### 定居点建立

12 世纪初，西欧拉丁人建立的四块定居点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出现。它们的未来还很不确定，其统治者们的等级仪轨也很不清晰。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布永的戈弗雷真的使用过“圣墓守护者”头衔，他似乎仅曾自称为“亲王”（prince）或“公爵”（duke）。他的继承人鲍德温一世有时自称为“耶路撒冷拉丁族群的国王”，但也曾以夸张的方式自封为“巴比伦与亚细亚的国王”。而未来的的黎波里伯爵们则自称是“亚细亚的基督徒军队的统帅”。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第一块确立下来的定居点是埃德萨伯国。它沿着幼发拉底河展开，从西面的加齐安特普（Gaziantep）和拉万达等要塞延伸至东面还不太固定的边界线。埃德萨位于安条克东北 160 英里、幼发拉底河以东 45 英里处，这一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伊斯兰和希腊势力交界的边疆地带，而埃德萨伯国则是这里的一块拉丁飞地。这里的土地非常肥沃，但城市却缺乏防护。而且西欧人的定居点非常零散，仅局限于若干孤立的要塞中。这里的人口大多为基督徒、雅各派<sup>①</sup>和亚美尼亚人。该国的伯爵相对而言一

---

① 即叙利亚教会，主张基督一性论，反对基督二性论，属聂斯托利派，被正统教会判为异端。雅各·巴拉底乌（Jacob Baradeus）于公元 541 年任叙利亚教会主教，并领导教会工作。公元 787 年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后，希腊正教会贬称其为雅各派，而他们拒绝接受此称谓。——译注

直比较富裕，与其臣民的关系大体而言较和睦。

在埃德萨和海洋之间是安条克公国。它对西里西亚的控制并不牢固，但却掌控了往南直至巴尼亚斯（Baniyas）的叙利亚沿海地带。在内陆，它向东北延伸到了马拉什和阿扎兹（‘Azaz），其边界就在始终被穆斯林占据的阿勒颇城的外围地区，并延伸到东南的阿塔里布（el Atharib）和迈阿赖努阿曼。安条克公国大部分领土的获取，既损害了穆斯林的利益，也损害了希腊人的利益。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诺曼底的罗贝尔和圣吉尔的雷蒙曾把南部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和巴尼亚斯移交给拜占庭官员管理。在1099至1100年间，皇帝亚历克塞因博希蒙德拒绝承认其对安条克的主权而大受刺激，遂出兵重新以武力占领了西里西亚，还攻占了马拉什。但希腊人的占领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099年，一支比萨舰队送来了新任教皇使节比萨的丹波特大主教（Daimbert of Pisa）。该舰队一路上劫掠了众多希腊人控制的岛屿，还与前来阻止的一支拜占庭舰队干了一仗。

51 8月，博希蒙德在这支舰队的协助下包围了拉塔基亚城。但这一次拜占庭人得以继续占领这座城市，因为圣吉尔的雷蒙、诺曼底的罗贝尔和佛兰德斯的罗贝尔在从耶路撒冷回乡的路上刚好抵达这里，他们出面进行了干预。几个月后，博希蒙德被达尼什曼德人囚禁。但在又经历了几个月危险的动荡过渡期后，博希蒙德的侄子唐克雷德出面摄政，立即启动了扩张政策，收复西里西亚，并再次攻打拉塔基亚，1103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围困后，拉塔基亚落入他的手中。

十字军早期与拜占庭人的冲突在1108年达到高潮。1103年博希蒙德被穆斯林释放，但他却不得不面对1104年夏秋拜占庭人的再次来袭。这一次他们重新占领了塔尔苏斯、阿达纳、米西西和拉塔基亚。与此同时，伊斯兰势力也自东面逼近。博希蒙德回到欧洲，在后面我们将看到，他在那里凭一己之力组建了一支新的十字军，并公开表示要与拜占庭人为敌。1107年10月，他的十字军攻入拜占庭帝国内，但整整一年无所作为；最后他被迫投降，同意签下《德沃尔条约》（*Treaty of Devol*）<sup>①</sup>。该条约界定了安条克公国

① 德沃尔是中世纪拜占庭的一个要塞城镇，大致位置在今阿尔巴尼亚的东南角，但确切位置未知。——译注

的领上范围，博希蒙德承认公国为皇帝领导下的封臣国。

但从更早的时候开始，任何向南扩张的尝试就已被圣吉尔的雷蒙的行动所阻断。因为他正在逐步建立的黎波里伯国。可能雷蒙早从第一次进入这块地区时起，就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在安条克和耶路撒冷接连受挫之后，他似乎曾尝试在巴勒斯坦南部以阿斯卡隆或阿尔苏夫（Arsuf）为中心建立一个公国。1102年在南进的途中，他带领第三波浪潮中残余的十字军部队包围了塔尔苏斯。严格来说，他这么做其实违反了当年曾被迫向唐克雷德许下的誓言。当年，在小亚细亚遭遇灾祸后，<sup>①</sup>雷蒙曾发誓不会在安条克和阿卡之间攫取一寸土地。但毫无疑问，他认为这个誓言是迫于压力才许下的，因此无效。塔尔苏斯很快陷落。虽然此后针对库尔德人城堡（Husn el Akrad，后来被称为骑士堡 [Crac des Chevaliers]）<sup>②</sup>和霍姆斯（Homs）的行动都失败了，但雷蒙仍然怀着作为十字军行动的意图，他又在离重要港口的黎波里3英里远的高地上建起围城营地，并逐步将其扩展为蒙佩勒恩城堡（castle of Montpelierin）。的黎波里要一直等到1109年才会被攻陷，而此时雷蒙早已去世。但在1104年，雷蒙与热那亚人合作夺取了的黎波里以南的朱拜勒（Jubail）。

这就将我们带往了耶路撒冷王国的所在地。1099年7月22日，布永的戈弗雷当选为统治者。整个事件黑幕重重。正式的决定似乎是由十字军的诸位领导人在经过争论后，最终当着全军的面做出的。但在这之前，非正式的决定已经将选择范围圈定为诺曼底的罗贝尔、圣吉尔的雷蒙和布永的戈弗雷。在这几个人中，罗贝尔又似乎是最受青睐的。我们关于罗贝尔当时状况的了解非常简略，因为他麾下没有人留下关于此次十字军东征的记叙。但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巴勒斯坦最初任命的在军中和教会中都有相当重要影响力的两位天主教主教，都是他的随军神父。甚至在十字军还没到达耶路撒冷之前，诺曼底的罗贝尔的随军神父鲁昂的罗贝尔（Robert of Roen）就

52

① 参见原书第37—42页围攻安条克时期的情况。——译注

② 是今叙利亚境内保有最完整的十字军城堡。——译注

被任命为卢德主教（Lydda 或 Lod）<sup>①</sup>，并获授权控制处在要道交会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拉姆拉（Ramle）<sup>②</sup>；而他的总管大臣绍克的阿努夫（Arnulf of Chocques），则被选为耶路撒冷的牧首。后世有传言说，出于“担忧相关事务太繁杂”，诺曼底的罗贝尔回绝了拱手送上的耶路撒冷，因此让“他的高贵沾染上了永不磨灭的污点”，并招致圣罚。圣吉尔的雷蒙也回绝了任职，但他可能只是故作姿态而已；因此，布永的戈弗雷接受耶路撒冷的统治权后，他肯定很不高兴，人们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把耶路撒冷的战略要地大卫塔交给埃尔巴拉（el Barah）的天主教主教。埃尔巴拉主教是雷蒙本人的随从之一，但他很快就把大卫塔交给了戈弗雷。雷蒙当时年事已高，一直病痛缠身，而戈弗雷在其兄弟鲍德温的帮助下相对较富裕。

1099年8月，大多数十字军战士都离开了巴勒斯坦，戈弗雷此时控制着耶路撒冷以及从拉姆拉到沿海的雅法的一块带状领土。到第二年，他的其他三块领土似乎委托给了和他一起留在东方的几位核心人物管理。加尔德马尔·卡佩奈尔（Galdemar Carpenel），一位来自里昂附近的富裕贵族，已决定要将余生奉献在保卫耶路撒冷的事业上。他掌管着东南边疆，包括希伯伦和耶利哥<sup>③</sup>两大城镇。耶路撒冷以北纳布卢斯一带的领土可能委托给了来自布拉班特的格雷伯爵加尼耶（Garnier）。他与戈弗雷是亲戚，后来又成了姻亲，是戈弗雷队伍中一位出众的人物。再往北，唐克雷德控制着贝特谢安（Bet She'an）和提比里亚（Tiberias）。提比里亚可能是戈弗雷在1099年9月初占领的，首先作为城堡主领地赐给唐克雷德，后来则升格为正式的封地。以上就是戈弗雷1100年7月18日去世时征服地域的极限了，不过他还迫使阿斯卡隆、阿尔苏夫、凯撒里亚<sup>④</sup>和阿卡诸港市向自己进贡，

① 今以色列中央区的一座城市，距离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约15公里。——译注

② 位于今以色列中部，是中央区的首府。——译注

③ 位于约旦河西岸河谷，耶路撒冷东北偏东约22公里的苏丹丘，据圣经约书亚记记载，是以色列在迦南人居住区征服的第一座城。——译注

④ 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希律大帝在地中海岸边建造的一座重要的海港城市，位于耶路撒冷西北偏北约87公里。据圣经使徒行传，使徒们在此地帮助了许多外邦人成为基督徒。——译注

并正计划与一支刚抵达此地的威尼斯舰队联手对海法发动一场战役。

戈弗雷的兄弟鲍德温和博希蒙德是很明显的两个继承人人选。他们都曾在十字军东征中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也都已经巩固了各自对相当大一块领土的控制权。至于其他可能的竞争者，圣吉尔的雷蒙此时去了君士坦丁堡，戈弗雷的长兄尤斯塔斯三世已经返回欧洲。这时，在这块小小的定居点内，人们分裂为两派。唐克雷德当然支持自己的叔叔博希蒙德。新任耶路撒冷牧首比萨的丹波特也持此立场。毫无疑问，从教会改革者（丹波特正是其中一员）的角度来看，鲍德温出自一个在主教叙任权之争中站在皇帝那边的家族，而且，后来的事态也表明他对教会改革毫无热情；相比之下，博希蒙德显然更受青睐。而另一派阵营是戈弗雷的家族，支持鲍德温。他们在巴勒斯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两方的拥护者都呼吁他们积极争取继位。牧首丹波特随同唐克雷德前去围攻海法，并在大约8月20日将其攻陷。但洛林人却趁牧首不在的良机先发制人，攫取了耶路撒冷的控制权。而丹波特送给博希蒙德的消息被圣吉尔的雷蒙（他当时还待在拉塔基亚）家中的人截下。8月，博希蒙德落在了突厥人手上，最终出局。鲍德温本人亲自带兵驰援安条克公国，解其危局，还增兵巩固了马拉提亚的亚美尼亚军事要塞，使之阻挡住了达尼什曼德突厥人前进的道路。在10月2日南返之前，鲍德温安排自己的侄子布尔克的鲍德温（Baldwin of Bourcq）掌管埃德萨伯国。11月9日，鲍德温进入耶路撒冷。13日，他采用国王头衔，并于圣诞节那天在伯利恒的主诞教堂加冕。

53

## 装点圣地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收复耶路撒冷及其圣地。最初的设想是将一切都交还给拜占庭。但结果却大不相同。第一批西方的定居者们人数极少，孤立无援，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定居的正当理由正是维护和保护这些圣所，

但对于眼下面临的任务却有些措手不及。他们发现，这些地方都已荒废。在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似乎少数拥有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教堂圣所是圣墓建筑群、伯利恒的主诞教堂、橄榄山的升天教堂以及十字修道院，可能还有埃因·卡里姆（‘Ain Karim）的圣约翰教堂。此外，就在圣墓南边拉丁人的圣马利亚修道院（the abbey of St Mary of the Latins）里，已经有了一个天主教本笃修会群体——一群来自意大利卡西诺的僧侣。布永的戈弗雷在圣墓派驻了20名在俗的持戒教士；在圣殿（圣石穹顶清真寺）和锡安山也派驻了一些在俗教士，但数量不详（这些人 与橄榄山上的神职人员一道，此后都转为正式的奥古斯丁会修会分支）；在主要的圣母马利亚祭祀圣地约沙法谷的圣马利亚修道院里，他也派驻了一些本笃会僧侣。持戒教士进驻圣墓、圣殿和锡安山，必定使得将形形色色跟随十字军来到这里的神职人员纳为已用变得更加容易。而拉丁人圣马利亚修道院的僧侣们，连同他们后来建起的大圣马利亚和圣约翰女修道院的人员，可能都被迁往了约沙法谷，从而为一个新社群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核心：到1103年，他们与来自圣墓修道院的教士们一道，已经在的黎波里郊外的蒙佩勒恩建起了新的修道院所。虽然如此，新的统治者和高级教士们必定还是觉得，要为这些圣所配备足够的人员非常困难。

54

我们已知最早选择在东方定居的89名十字军战士中，有21名教士，这实在不足为奇。然而，在10位出发前往东方的主教中，却仅有一位留在了巴勒斯坦。而且他还退出了公共生活，仅作为一名隐修士在那里生活了10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留下来的教士们素质并不高。在东方最早得到任命 的两位重要教士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第一任拉丁裔耶路撒冷牧首绍克的阿努夫是一位相当著名的学者，也是诺曼底的罗贝尔的姐姐英格兰的塞西莉亚（Cecilia of England）的导师。还在诺曼底的时候罗贝尔就已经答应一有主教职位空缺就授予他。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传道者，但也顶着好色之徒的名声，因此其牧首之职很快被比萨大主教丹波特取代。约沙法谷圣马利亚修道院的第一任院长名叫鲍德温，他在欧洲也曾当过修道院院长，是布永的戈弗雷的随军神父。此人也是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在自己前额上烙了一



个十字，假装是天使盖下的印记，依靠虔诚者为此呈上的祭品凑足了参加十字军的路费。除了这些人自己不觉得外，对旁人而言非常显而易见的是，这支队伍亟须补充新鲜血液。

1131年之前，可确认定居在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中，超过51%是教士。从他们来自巴塞罗那、巴雷（Barres）、博韦（Beauvais）、布里迪耶（Bridiers）、布列塔尼、布尔（Bure）、沙特尔、绍克、加斯科涅（Gascony）、勒芒、梅森（Messines）<sup>①</sup>、皮基尼（Picquigny）、普雷旺谢尔（Prevenchieres）、鲁昂、圣奥梅尔（St Omer）等地方就可以看出，他们大多直接从法国来。有些高级教士则是受教皇派遣而来，包括前文中已经提到的比萨的丹波特。阿尔勒的吉伯兰（Gibelin of Arles）<sup>②</sup>大主教作为教皇使节于1108年抵达，也成为了耶路撒冷牧首。其他教士则可能是由十字军的诸位领导人召集到巴勒斯坦来的。勒皮伊塞的吉尔迪安（Gilduin of Le Puiset）是鲍德温二世国王的一个表兄弟，在1120年的危机时刻来到东方并成为约沙法谷圣马利亚修道院院长之前，他曾是克吕尼修道院的一名僧侣，曾任吕尔西莱布尔克吕尼修道院分院的院长。他可能是应国王之邀来到东方的。沙特尔的斯特凡，系沙特尔的谷中圣让（St-Jean-en-Vallee）修道院的院长，他也是鲍德温二世的表兄弟，于1128年朝圣来到东方，很快就被提升为牧首。

十字军维护众圣所想达成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让伟大的圣所都得到恰当的建筑物庇荫。耶路撒冷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很多在经文中记载过的事件都在空间上得到了精心的展现。其中包括：基督在加略山被钉上十字架；基督在圣墓中复活；最后的晚餐举行的房间，同时也是五旬节时圣灵降临到使徒们身上的地方；在圣殿基督与导师们交谈，对放贷者发怒；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受辱的地方，离他被逮捕的地方不远；马利亚从约沙法谷的墓中升天的地方（这是一个复活圣地）；还有马利亚的父母约雅金和安娜的家，靠近耶稣治好瘫痪病

55

① 位于今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的一座城市。——译注

② 约1045—1112。——译注

人的羊群饮水池。有很多场所的位置早已经确认，但有些地方则纯粹是“发明”出来的，如圣约翰骑士团将他们的总部设在一家收容所中，因为他们认定这里是由马加比人创建并由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管理的。基督经常造访这里。但确认地点的确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一个可确定的场所、一个散发着力量并与圣人们紧密相连的场所，朝圣者们的祈祷才能真正有效。

当十字军到来之时，大多数圣所的状况都非常糟糕。有些已成为废墟，其他一些也需要重建或至少加以维修。而修筑计划似乎启动得非常缓慢，但在梅丽桑德女王（Queen Melisende）<sup>①</sup>的支持下，于12世纪40年代达到高峰。规划者们似乎没有公开表明过他们的规划目标。无论如何，没有任何此类文献留存下来。但很明显的是，他们的规划首先是由自身对如今由他们照管的圣所的敬意驱动的。其次也注意了回应朝圣者们的要求，因为这些朝圣者的虔诚敬拜将更为圣所增光添彩。如今，越来越多的朝圣者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想要在明确的地点敬拜基督及其他圣徒的遗迹，这将保证他们的祈祷由其他同在这个宗教圣所的人强化和补充，而这样一个充满共同情感的地方将使他们的虔诚之光更加闪耀。但这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这里的气氛必须神圣而静穆。12世纪是个充满戏剧色彩的年代，每一种可能的技术都被利用起来调动公众的情绪，如利用神迹剧的表演、仪式和某些情境。一座处于一段漫长而艰辛旅途终点的圣所建筑，更应该像是一个舞台，其纪念的事件或人物的神圣特质应该戏剧化地得到重现，以激发起公众狂热的激情。

在耶路撒冷，神迹剧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体验到。比如，从复活节到降临节，圣墓教堂每个星期六都有晚祷游行。这座教堂最具戏剧感染力的朝圣剧目是每年的圣火奇迹<sup>②</sup>表演，即小神殿（一座环抱着圣墓的独立小教堂，在一座建于11世纪的圆形大厅下方）的七盏灯之一自动点燃。这项奇迹发

① 1105—1161，鲍德温二世与亚美尼亚公主莫非亚之女，1131年其父去世后继任为耶路撒冷女王，并与其夫婿富尔克共同执政。1153年她退位，让其子鲍德温三世继位。——译注

② 指公元33年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有火一样的舌头停留在他们头上，使他们可以行各样的神迹，见使徒行传2:1-4。——译注

生在圣周六。在圣火刷期间，在基督教世界的各个地方，其自然使用的是火石的碰撞。在很多个世纪中，无论是对穆斯林还是基督徒而言，火石碰撞产生火一直是一个奇观。到受难节那天，小神殿的灯火会隐没，大门深锁，一直要到神迹剧展演时才再次打开。不过小神殿有小小的窗户，透过窗户还是能看到烛光的隐隐摇曳。神迹剧会于上午九点钟时在人潮拥挤的教堂里开演。虽然火焰到底什么时候到来时间并不固定，因为我们还听说它可能在城中其他某个圣所忽然点燃，比如在圣殿或圣约翰教堂，但它通常会在下午来到圣墓。在大约下午三点钟，指定的经文朗读以及相关的赞美诗唱诵和祈祷结束后（交替着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完成），一位希腊人领唱者站在圆形大厅的一角，开始唱诵献给圣父、圣子、圣灵的《求主怜悯》（*Kyrie eleison*），而众人回应，这就是火焰出现的先声。与此同时，牧首将走向小神殿。他手持一根蜡烛，前面由真十字架的遗物引路。等火焰腾起的奇迹发生之后，牧首就走进来，用灯火点燃手中的蜡烛，然后将火光传递给在场者所持的蜡烛，并带领他们穿越耶路撒冷行进到圣殿。

56

在西方，用石材重建圣墓作为背景，见证并象征耶稣在棕枝主日（*Palm Day*）<sup>①</sup>进入耶路撒冷，以及其后在复活节三日中受难、死亡又复生的礼拜仪式，这很常见。当然，在这些西欧的例子中，其真实目的不是为了精确重现公元1世纪时耶路撒冷的景象，而是关注如今包裹着旧日遗存的建筑结构。中世纪中期的男男女女们，他们的意图是要表征而不是模仿昔日。他们的真实意图更像是偶像所体现的那样，目的在于提供通往隐藏在偶像背后的亘古真相的路径。因此，耶路撒冷的新统治者从没打算在戏剧性的场景中精确重现这些地点所代表着的往昔情境。他们想做的是，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让人能感觉到昔日的印象，而以其他元素来强化眼前实景的感染力。在某些场所，他们的目的已经充分达到了：那些建筑物已经变得让人非常熟悉，以致如果再大幅度改建，反倒会适得其反。他们把圣石清真寺改成了一座教堂，

① 圣经时代，棕榈树盛产于加利利海沿岸、约旦河谷等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群众手拿棕榈树枝去迎接他，呼喊他是“以色列王”。（约翰福音 12:12, 13）——译注

但对其以及伯利恒的主诞教堂的建筑形式都基本没做任何改动，而只是在内部加了一些装饰。在伯利恒进行了一场被描述为地中海世界最全面也最复杂的马赛克镶嵌、壁画创作和雕刻装饰工程。

基督的墓地或者说遗迹，在4世纪时由君士坦丁的工程师们从石墙中挖出来，放入小神殿中。12世纪的小神殿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在哈基姆毁掉那座洞穴坟墓后希腊人于11世纪30年代重建的那座。希腊人一手重新设计建造了这个洞穴：小神殿一直是一座貌似洞穴的小教堂。当然，它被以恰如其分的方式装饰得富丽堂皇了；在东边的隔间里还有一条直通道，以便朝圣者们能从一边的门进、从另一边的门出。所以，拉丁定居者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用马赛克装饰一下这座小小的建筑物，给它包上银，并加盖一个圆顶；  
57 毕竟，上次重建距离他们来到这里才过了60年的时间。

对于受难教堂，他们采取的方式也如出一辙。这座教堂位于一座石柱上方，这座石柱是君士坦丁的工程师们将骷髅地（Golgotha）<sup>①</sup> 削凿而成。如同圣墓的石块一样，骷髅地的顶端仍然是可见的，但用大理石围了起来。与小神殿不同的是，出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人们从未尝试重现栩栩如生的岩石顶端的场景，而仍让它在中部或废弃石墙的边缘敞开着直面天空。在教堂内部，一切都很昏暗，这是特意为之。当朝圣者们从阳光灿烂的室外进入，对比就变得非常强烈；在摇曳的烛光中，他们可隐约看到头顶以及四周马赛克的景象。于是，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到受难石顶端，它被一座祭坛包围着，并保留了一丝原来的形态，即当年十字架所插入的那个孔；这一切是可见又可触的。

虽则如此，如果觉得有必要，这些拉丁人也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程，而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他们的想法。锡安山上耶稣用最后的晚餐的房间，同时也是五旬节时据说圣灵降临的场所，其具体地点在数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得到确认。经文的叙述清楚地指出，它就处在一幢两层小楼中。但在1099年时，这座两层的圣母安眠堂已经变成废墟。于是拉丁人必须在这里开展重建

---

① 又译为“各各他”，位于耶路撒冷城墙外，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译注

工程。这里除了用最后的晚餐的房间外，其他残余的建筑物很少，此后将建成一座 12 世纪晚期哥特式风格的画廊教堂。显然，当时的人肯定会对一座原封不动的公元 1 世纪教堂感到失望，因为它很小，很昏暗，等级也很低。而拉丁人在将其重建起来之前，至少进行了两次重新设计。有四个纤细的穹顶，由细圆柱支撑着，显然代表了当时的人认为适合最后的晚餐之气氛的房间。而一位朝圣者曾对之前的一个改建版本做过评论，他指出，这才够大，可容纳基督及其门徒用餐。此次重建非常成功，这一点可从之后西方的奥古斯丁训言中列明的修道院食堂建造范式窥见一斑。

建造者们一个关注要点，是要让持续不断的祈祷声能传向天国，从而增强朝圣者们誓愿的力量。将一个高高的祭坛或唱诗班席位恰好建造在放置有圣人遗体的地下墓室或一个特别的圣所之上，这种方式在西欧很常见，而在巴勒斯坦也经常可以发现，比如在耶路撒冷的一座稍欠规整的罗曼式教堂——圣安妮教堂，刚好就在被认为是童贞女马利亚降生的那个地下室之上建起来的。一项颇具雄心的此类建筑计划也可以在城外近郊的伯大尼看到，据说很多使徒行传中记载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这里是基督在棕枝主日荣耀地踏入耶路撒冷的起点，也是马大和马利亚（与抹大拉的马利亚为同一人）两姐妹居住的村庄。而也是在这里，麻风病人西门的茅屋曾经伫立着，马利亚曾在这里为基督抹油。<sup>①</sup>还是在这个村庄，基督让两姐妹的弟弟拉撒路死而复生。<sup>②</sup>这里已经紧密地融入了耶路撒冷的礼拜仪礼程序当中，在棕枝主日和一年内的其他一些日子里，总有游行队伍在城中和这里之间来来往往。这里已经有了一座建于 6 世纪的教堂，据说就屹立在麻风病人西门屋子原先的所在地上。在教堂的西面，相隔约一米的距离是一处洞穴墓地，据说是拉撒路的。1138 年，此处遗址移交给了伯大尼的圣拉撒路女修道院。该院由梅丽桑德女王兴建，并作为一个恰当的社区交由她的妹妹伊韦塔（Yveta）担任院长管理。修女们在拉撒路墓穴正前方造了一间有宏伟的筒形穹顶的屋

58

① 见马太福音 26:6-13；马可福音 14:3-9；约翰福音 12:1-8。——译注

② 见约翰福音第 11 章。——译注

子，但在后面的岩石上造了一间带三面耳堂的十字教堂。其东端则有三个半圆壁龛，由三个圆顶支撑着，位于中央的一个是通往拉撒路墓穴的入口。这所修道院的教堂在 1187 年被萨拉丁毁掉，几乎没有什么细部物件遗存下来，但相当重要的一点是，修女们的唱诗班席位就设在墓穴上方，因而她们的歌声将能感染并加强这个地方的神圣性。

当然，重中之重是圣墓教堂。1149 年 7 月 15 日，耶路撒冷解放的 50 周年纪念日，教堂虽然还没有彻底完工，但已被正式敬献给了主。当年十字军进城时，这里还没有教堂，只是在一块空阔的地块内零星分布着几处圣所，包括圣墓、附近的基督受难处，以及稍远一点君士坦丁所建十字教堂（据说就建在他母亲于公元 320 年发现真十字架之木的地方，虽然对十字架的真假还有争议）的废墟。来自西欧和亚洲的石匠、雕刻师、镶嵌师和画师们参与了拉丁定居者们此处的建筑工程，其创造性令人震惊。来到这里的朝圣者肯定都很熟悉叙述基督受难并复活的若干经文的细节：基督被带出城墙外，来到骷髅地即受难处，据说这里也正是很多个世纪之前埋葬了第一个人——亚当的地方。行刑人在竖起十字架的时候，基督被允许待在附近一小块区域内。随后，他被钉上了十字架。断气之后，他的遗体被匆匆忙忙地用香料抹了油放入附近一个空的墓穴之中。圣墓俯瞰着一处花园，复活节的早上，抹大拉的马利亚发现墓穴空了，就询问一个在花园里碰到的人基督的遗体被移到哪里去了。马利亚以为这个人是园丁，但其实他就是复活的基督。近三个世纪后，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处洞穴里，君士坦丁皇帝的母亲发现了钉死基督的十字架遗存。

59 拉丁人决定给整块空阔地加上顶盖。于是，基督离世和复活的场所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同一个屋顶下彼此相连，并处于同一座装饰华美的建筑物之中。它将拥有欧洲人所熟悉的教堂网络（road-church）的诸多元素，包括一个回廊，并还额外涵盖了众多相连的圣所。这些场所若在西方，每一个本来都将能成为崇拜的核心场所：亚当教堂、圣伊莲娜教堂和十字架洞穴、关押基督的监狱，还有他为病人抹油的地方。整个工程必须在城区里完成，在一

个已经历过多次建设的场地上，其间还散布着之前君士坦丁时期和拜占庭时期的若干建筑物。而其中涵盖的圣所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因为它们都已经得到了确认，所以不能为了建筑施工的方便而随意移到其他地方去。

最开始做出的是关于什么要保留、什么要拆除的决定，以及制订整个平面建筑计划。拜占庭环绕墓地所建的圆形大厅被保留了下来，不过东面的圆形后殿被拆掉以与东面新建的一座在两处圣所间过渡的哥特式教堂相连。正如我们能看到的，小神殿和受难教堂都得以保留，但进行了重新装饰。拜占庭时代的基督牢狱也被保留了，而可能是出于审美上的考虑，这又导致一座拜占庭时代的拱廊和一堵君士坦丁时代的围墙被保留了下来。另一方面，人们决定拆除原先在广场东面的三处小的神龛，代之以回廊发散出来的三个小礼拜堂。

事实上，最能反映拉丁定居者所专注意图的是圣墓教堂。他们决定要给整个广场加上上盖，并利用一处整体建筑把使徒行传中提到过的各项原本分散的元素整合起来。这就意味着，他们将创建一处闭合的情境，让访客能在其中按照意愿四处游逛。这样做的优点非常明显。因为在从一处圣所到另一处圣所的路上不需要再穿越露天的广场，朝圣者们在朝圣的全程中就不会再受到干扰。并且，在一个闭合的空间里，更容易让人们做到专心致志，因为各种元素都被调动起来以创造一种有利于此点的气氛：圣香的气味、钟声和唱诵的声音，这一切都完全处于掌控之中。对此，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拉丁人把最能唤起与神圣相融通感的唱诗班席位安置在了教堂的正中位置，即在圣墓以东、受难处以北、牢狱以南、真十字架洞穴以西。

一来到圣墓教堂，朝圣者们就会看到两重门坊。不过他们往往不是从这里进入教堂，而会从一组外部的楼梯往上行进到受难堂。在那里朝拜了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之后，他们会往下走，进入教堂的主体。中间会穿越亚当堂和一道岩石裂缝，据说这道裂缝是基督死时裂开的，上面依然洒着已经风干的基督的血。朝圣者们此后将直接穿越到达圣墓小神殿，这段路途大概长 85 英尺，在他们头顶上是一道穹顶，它连接的是补充着拜占庭在圆形大厅上建筑的那道穹顶，并且恰巧处于据说是基督的遗体在下葬前涂膏油的地

方。这之后，朝圣者们可以四处看看教堂，据说其所在地原先是客西马尼园（树形廊柱植物枝叶状的柱头暗示了这一点）。他们可以瞻仰关押基督的牢狱，并经过回廊进入发散开去的那三所礼拜堂，其中有两所供有真十字架的遗存。接下来，他们可以拾级而下，去探访最初发现真十字架的洞穴；或者往上，去看看连接着新建教堂与圆形大厅的画廊。

但不论他们去到哪里，铭文、雕刻、马赛克和壁画都会时时提醒他们正在瞻仰的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对大多数朝圣者来说，马赛克和壁画中呈现的画面比铭文更有意义，而且，似乎当时这些画面都力求表现得简单直白。不过，所有这一切后来几乎全部被毁，我们仅能依靠残留的一些片段来进行推断，而所得极少。这里要再一次强调，拉丁人并没有毁掉在圣所已经有的那些他们欣赏或认为有用的建筑，他们甚至还花费功夫把一尊拜占庭时代的宏伟复活像从圆形大厅移到了新建的东面后殿，并放置在高高的祭坛上。他们喜欢补充完善，而不是全部替换。在教堂入口处的两重门坊的其中一重上面，有一处马赛克镶嵌的门楣，展示的是在其坟墓附近的客西马尼园复活的基督出现在抹大拉的马利亚面前。复活神迹的第一个见证者是一位皈依了的罪人，这一事实的重要性绝不会被那些为赎罪而踏上朝圣之旅的人们所忽略。在门楣下方则是一根雕花横梁，展示了从拉撒路复活到最后的晚餐的场景。据说人们可能本来还打算在另一重门的门梁上继续雕刻耶稣受难的场景，若果真如此的话，这项工程可能并没有完成，因为上面雕刻的是一幅展开的藤蔓镶边卷轴，内容为若干人物和花鸟。从入口到圣墓的路途上都是马赛克镶嵌画，刻画了坟墓中的基督、贞洁圣母马利亚和三位马利亚<sup>①</sup>拿着涂膏油用的玻璃瓶站在空空如也的圣墓前的情景，在她们面前的是刚刚移开了墓石的天使。拉丁人并没有打破受难教堂中传统的装饰形象主题，包括祭坛上拜占庭式的十字架，但他们增加了若干圣经旧约中的先知和国王的形

---

① 指耶稣死后第三天清早，几个妇女一起到耶稣的墓穴去，要用香料涂抹他的遗体，根据马可福音 16:1，有抹大拉的马利亚、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和撒罗米。马利亚是当时犹太妇女中非常常见的名字。——译注



象，还增加了那幅神奇地保存至今的升天图马赛克镶嵌画。在据说是圣伊莲娜发现真十字架的地方，他们画了一幅描述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壁画。曾有人留下这样的记录：“我们必须想象圣墓教堂是这样的金碧辉煌，充满着我们在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所熟悉的那种富丽堂皇的装饰。”

虽然他们也雇用了拜占庭和本地的工匠，但拉丁定居点各处的教堂和修道院区域的设计都具有可辨识的西欧特征。欧洲一流的工匠应募前来承担特殊的修筑任务，比如建造拿撒勒<sup>①</sup>大教堂的柱头和门廊，或在东方创建半永久性的作坊。他们因此与其他西欧移民交流切磋。比如耶路撒冷的“圣殿工坊”，活跃于大约 1170 至 1187 年间，以普罗旺斯的工匠为核心，聚集起一批手艺人。这些大教堂的宏伟反映在它们的各种装置设备上。教堂中有一大批仪礼用书保留了下来，其中有一本非常好的供梅丽桑德女王本人使用的，而其他用书的精美程度也反映出一大批工艺大师曾参与圣墓工程的建筑雕刻工作。

61

修复圣所的花费必定不菲，因为当时各处拉丁定居点都在不断进行这样的工程。相关经费不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王国内部筹措的，因为王国本身的存在都一直饱受军事威胁。而它也不可能来自对朝圣之旅征收的税费或纯粹出自朝圣者们的捐赠。虽然相关捐赠批次和捐赠到达的记录都没能留存下来，但大量的经费必定来自国外。不过，最终的修复成果让一切的艰辛和花费都是值得的。在 12 世纪，人们对天主教控制的耶路撒冷的印象是，一个得到非常明智管理掌控的朝圣中心。西欧的朝圣者们早已熟悉的那些圣所没有遭到破坏，但却得到了进一步的美化。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已通过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彼此相连，也因此和周边一些小的圣所联系在了一起。这座大教堂融合了一个朝圣中心所应有的一切一流特征，包括确保信徒祷告的进行。最后的晚餐的屋子和伯大尼也都得到了很好的修葺扩建。耶路撒冷的修筑工程显示出拉丁定居者们对朝圣者的需求和性质有着非常清楚的感知，而正是朝圣者

① 位于今以色列北部，历史上的加利利地区，距耶路撒冷以北约 100 公里。耶稣在地上时，与其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一起在此地度过大半生，故耶稣常被称为“拿撒勒人”。——译注

们一年两次的到来让这座城市有了存在的理由 (*raison d'être*)。

## 拉丁教会成立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拉丁教会是在征服之后的 20 年间建立起来的，并一直存续到 13 世纪末，而这就决定了它的发展特征。十字军战士们进入的这个区域，是许多不同宗教信条以某种方式达到和谐共存的区域。在北部，当地人口大部分还是基督徒，主要是持基督一性论主张的亚美尼亚人和雅各派；不过这里也有较多的东正教群体，主要在安条克一带。在南部，除了数目不详的皈依天主教的人群外——自 12 世纪 80 年代开始，包括整个联合东方 (Uniate) 教群、马龙派，以及一部分亚美尼亚人——当地的人口中还包括其他各个派别的基督教群体：大多讲阿拉伯语的东正教希腊人和不同派别的基督一性论者，尤其是雅各派、亚美尼亚人和科普特人，以及聂斯托利派。南部穆斯林数量也多于北部，分属逊尼和什叶的各个支派，包括德鲁兹人 (Druses)。但有人认为穆斯林在当地仍不算是多数派。这整个区域中还有各个支派的犹太人以及撒马利亚人，以及少量琐罗亚斯德教教徒。

拉丁定居者们迟早会学会如何与如今臣服于自己的不同宗教族群相处，但在最开始，他们却决心要把所有异教徒从重要的宗教或军事中心驱逐出去，不管是穆斯林还是犹太人。早在 1097 年至 1098 年的冬天，这类政策实施的迹象就已经能看到了。在蒂尔贝沙、拉万达和阿尔塔，穆斯林均遭到屠杀或驱逐，而当地的基督徒却获准留下。十字军战士们在 1098 年 6 月攻克安条克时也采取了相同的政策，不过据说当时在黎明前的微光中，他们很难分清城中居民谁是基督徒谁是穆斯林。1099 年 7 月占领耶路撒冷时，他们也是同样处理的。幸存下来的穆斯林和犹太人遭到驱逐，此后也不允许在耶路撒冷定居，但他们仍然可以作为朝圣者来朝拜；事实上，到了 12 世纪后期，才有少数人定居下来。耶路撒冷当地的基督徒获准留下，但人数相对而

言非常少，因此后来当权者采取了大量措施增加这里的基督徒人口，包括将外约旦的基督教村民移居到此。总之，其他地方只要有本地基督徒，不论属何种派别都可留下；而如果本地没有基督徒，那就让西欧人移居到这里。

在早期的一些例子中，比如叙利亚的埃尔巴拉于 1098 年秋被圣吉尔的雷蒙攻占，十字军于 1099 年 6 月抵达巴勒斯坦的拉姆拉，以及凯撒里亚于 1101 年 5 月被拉丁定居者攻占。这些定居点一旦建立，天主教主教区也会马上建立；而依据西欧某些边疆教区的方式，它们还掌管着军事权。与此同时，十字军战士们也非常谨慎，尽量注意不冒犯已经存在的东正教主教们，而对他们的合法性和权威加以承认。安条克的东正教牧首约翰四世，在围城战期间一直在城中，还受了不少苦。当城市陷落后，他的主教座堂重新祝圣完毕，他就立刻被迎了回去，继续享有牧首所拥有的权力和荣光。但克莱蒙大公会议的一则裁定——解放后的教会将“属于”征服者在该地建立的公国所有——虽是针对西班牙的，却被用来证明在没有东正教牧首或出现空缺的地方，拉丁定居者任命天主教主教是正当的。耶路撒冷的天主教牧首是在该城解放 14 天后任命的，而任命的前提正是人们知道该职位出现了空缺。因为东正教在此地的牧首西美昂陪同十字军征战了一段路程后，于途中在塞浦路斯逝世。

一旦人们清楚西欧移民的数量根本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纯粹基督徒的国家时，出于疯狂和隔绝的心态而出现的种族清洗行为就很快不能得到坚决执行了。1110 年西顿（Sidon/Saïda）被攻克后的情形标志着政策上的转变：在较大城市中开始接纳非基督徒定居者。但另一方面，对既存东正教主教们的接纳却渐渐难以为继。在 1099 年的圣诞节，时任耶路撒冷牧首的丹波特为塔尔苏斯、米西西和埃德萨任命了天主教大主教，为阿尔塔任命了一位天主教主教。这些城镇都有相当数量的本地基督徒人口，因此很难相信其原有的东正教主教职位居然全都空缺。此外，所有这几个地方都在安条克牧首区内，可能是因为东正教牧首约翰已拒绝任命他们，所以丹波特就凭借自己教皇使节的身份做出了上述任命。这些新任主教随他们当时的领主安条克的博

希蒙德、埃德萨的鲍德温以及丹波特本人一道，南下前往耶路撒冷；对他们的任命和祝圣显然是有意为之。六个月后，东正教牧首被强迫离开安条克，一位天主教牧首取而代之。显然约翰的存在已经变得不可容忍，他最终隐退到了奥萨亚（Oxeia）修道院。而拉丁人把约翰的举动视作主动退位。在对待东正教驻地主教政策上的转变，一般都被归因于据说丹波特有恐希腊的情绪，但这种情绪的背景却是拜占庭入侵西里西亚，以及其皇帝明确表示要夺回安条克的控制权。塔尔苏斯和米西西分别扼守着出入西里西亚的路口。阿尔塔守望着安条克东面的道路。埃德萨则在1098年夏天就已经证明了其战略价值。在博希蒙德落到突厥人手中之后，在诺曼底有传言说拉丁定居者们害怕牧首约翰会背叛而把安条克拱手交给拜占庭皇帝。因此，用一系列天主教主教替换东正教主教，是对拜占庭军事和政治压力做出的反应。而在12世纪初，天主教教区在叙利亚的确立比在巴勒斯坦快得多，这也绝非巧合。在没有承受那么大压力的巴勒斯坦，直到1120年，除了牧首之外，全区域也仅有四名天主教主教。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早期任命的天主教主教们的素质都不怎么高。征服带来的政治影响力也无助于改善定居点教会的低水平。向十字军布道的是改革派的教廷，但教皇的主要代表勒皮的阿代马尔1098年就过世了，而耶路撒冷的第一批统治者在当年的叙任权之争中都是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都绝对不支持改革派的观点，因为很多保皇派其实自身也持改革立场，分歧只在于达成改革目的的手段而已。不过，无论是布永的戈弗雷，还是鲍德温一世，都没有表示出赞同改革观点的倾向；而鲍德温一世最初曾接受培训打算担任教职，他必定对那一场争端有所了解，可他表现出的态度显然也是不赞同改革的。

正是要考虑到这种背景，我们才能很好地分析鲍德温与丹波特之间的矛盾。教皇乌尔班二世任命丹波特为自己的首席使节，以接替勒皮的阿代马尔。正是这种授权，使得丹波特在1099年圣诞节前夕来到耶路撒冷时，有资格立刻主持召开一场会议，否决任命绍克的阿努夫为耶路撒冷牧首。而丹

波特本人随后被选为牧首并主持了一场仪式，由他将公国分别授予戈弗雷和博希蒙德。当时在这三人的脑海中的想法可能是，诸公国都是教皇国的封国，而丹波特是教皇国全权代表；或者与在欧洲的属于圣彼得的土地<sup>①</sup>一样，诸公国都是圣墓王国的封国；但又或者，这场仪式仅仅意味着由教皇的代表来确认王公们的统治权，因为他有资格这么做。如今我们已无法确定当时在场的人们到底持哪种想法，但未来的耶路撒冷和安条克的统治者们在无法被视作教皇或牧首们的诸侯。

丹波特似乎决心要采取激进的措施来解决他治下教会的权益问题。他想要创建一种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牧首权力世袭制度，这多少有些类似于意大利那种教皇权力世袭制度。为了供养已经被安置在圣墓的 20 名天主教持戒教士，那里的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剥夺了相关权益；但戈弗雷当时手头很紧张，对于教会要在耶路撒冷恢复往昔享有的一切财产和权利的主张，他可能不太愿意迁就。最终丹波特说服了他，在新牧首祝圣就任之时恢复了教会往昔的物产。但戈弗雷列出的清单上的物产显然比丹波特要的少得多；六个星期之后，他将雅法四分之一的领土给了教会。在耶路撒冷的神职人员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 1100 年的复活节，丹波特迫使戈弗雷把整个耶路撒冷城都交了出来，包括其防御要塞以及雅法剩下那四分之三的领土。不过戈弗雷对资源的需求也得到了认可，因此，在他的领地得到扩张之前，他将享有上述领地的用益权。人们还相信，戈弗雷曾许诺，如果他死后无嗣，耶路撒冷和雅法都将直接留给牧首；而在戈弗雷临死前，他又曾再次确认了这一承诺。但据说由于戈弗雷的家族行动太迅速，才确保了丹波特未能如愿收到其承诺带来的一切，而让鲍德温占有了这一切。耶路撒冷教会在 30 年后又短暂地重提了自身对耶路撒冷和雅法所享有的权利。但无论上述传言的准确度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丹波特野心勃勃。尽管他取得的唯一成果只是让牧首对位于耶路撒冷城西北部的圣母教堂拥有了主权。

① 指教皇国。——译注

戈弗雷的去世和博希蒙德的未能继位，大大撼动了丹波特的地位。此外，教皇帕斯卡尔又任命了一位新的教皇使节波尔托的莫里斯（**Maurice of Porto**）。莫里斯于1100年9月抵达拉塔基亚，并在鲍德温南下前去继承王国的途中与之会晤。丹波特在1100年的圣诞节亲自将鲍德温加冕为国王，但鲍德温显然不打算因此放弃已视为已有的种种权利。第二年春，当新任教皇使节抵达巴勒斯坦后，鲍德温即发动了攻击。他指控丹波特犯下了多重罪行，包括在戈弗雷去世后企图暗杀自己。他还通过牧首的事务署让丹波特停职。之后，他允许丹波特赎买其尊严，并要求丹波特出钱支付骑士们的俸金。当时，拉丁定居点的处境十分危险，一支埃及大军正在南部边界集结。丹波特拿出了一笔钱，但鲍德温嫌太少了。他为此勃然大怒，要丹波特再多出一些。而丹波特则求助于教会自由原则，质问鲍德温说：既然基督都已经赋予教会自由，那鲍德温怎么胆敢把它变作纳贡者和女奴。他还威胁说要请教皇开除鲍德温的教籍。但鲍德温仍然坚持己见。波尔托的莫里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但未能奏效，因为丹波特没有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鲍德温此后无情地展开了攻击，指控丹波特贪污了西西里的罗杰带到东方的钱财，迫使丹波特流亡到安条克。尽管在1102年时丹波特一度重新掌权（满足了唐克雷德的条件，因此得到了安条克的军事援助），但他很快又遭到由另一位教皇使节巴黎的罗贝尔主持的大公会议的审判，并被废黜。丹波特上诉到教皇那里，并于1104年随同博希蒙德回到西方陈情。丹波特牧首之位的继任者埃夫马尔（**Evremar**）被召唤前往教廷以说明其当选的正当性，但埃夫马尔和鲍德温都没有派代表前往罗马。案件的结果最后由于当事人未能出庭而不了了之，丹波特则在返回东方的途中在墨西拿（**Messina**）<sup>①</sup>去世。埃夫马尔这时才来到意大利为自己陈情，但绍克的阿努夫又接踵而来，带来了几封要求罢黜埃夫马尔的信件，而写信人恰恰是此前曾为埃夫马尔撑腰的那些人。教皇感到受了羞辱，遂另选了一名使节阿尔勒的吉伯兰前

---

① 位于西西里岛东北端的城市。——译注

往处理此事。1108年，吉伯兰宣布埃夫马尔的当选无效，因为丹波特是迫于耶路撒冷王室的压力才被废黜的。随后吉伯兰被选为牧首。

丹波特在意大利时是成果卓著的改革派政治家，但遇到鲍德温算是碰上对手了。历史学家们对丹波特的评价都不太高，因为他们所依赖的历史文献大都对他持否定立场。不过，我们也可以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丹波特行动的动机。一来到东方，看到新成立的教会权益缺失，充斥着素质不高的教士，若干教区同时还兼有边疆兵站的功能，这让人回想起西欧昔日的黑暗年代，而这一切必定让他感到恐惧。而且，耶路撒冷的掌权者并不是像博希蒙德那样的改革派、教皇的支持者，却是一个与他们的主要敌人德意志的亨利四世更为亲近的人，这一点也必定让他震惊。他的补救措施都被鲍德温挫败，尽管教皇帕斯卡尔做出的决定是向着他的，但两位被派往东方的教皇使节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支持他。当然，问题主要在于当时定居点的形势十分危急，无论是两位使节，还是教皇本人，都不敢轻易首肯任何可能有损定居点稳定的举措。

帕斯卡尔于是采取措施认可了鲍德温继承王位，并且之后他还进一步有所表示。泰尔大主教的辖区及其下属教区，包括阿卡、西顿和贝鲁特，都是安条克牧首区的一部分，对于这种局面鲍德温自然不可能放心。再怎么讲，其王国北部领土上的教会当然不应该臣属于另一个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牧首区。因此，他和牧首吉伯兰均向罗马提出变更的请愿。1111年，帕斯卡尔裁定，安条克与耶路撒冷牧首区的边界应该是耶路撒冷与北方定居点之间的政治边界，因而也就把古老的安条克牧首区最南端教省<sup>①</sup>的很大一块地方割离出去并入另一个牧首区。在此过程中，泰尔失去了北部的黎波里、朱拜勒和塔尔图斯的三个辖区，它们转为直接臣属于安条克。对此，安条克牧首区提出了抗议，而帕斯卡尔似乎也表现出想改变主意的迹象，但他未及改

66

① 英文为 province，公元4世纪起，基督教国教化，教会遂仿照罗马帝国行政区划划分教省，由大主教（archbishop）负责，级别在教区（diocese，由主教 [bishop] 负责）之上，在重要地区（如安提阿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等，由宗主教 [patriarch] 负责）之下。——译注

变便去世了。1128年，耶路撒冷的权利得到教皇洪诺留二世的确认。这一牵涉繁复的决定始终都不能令各方满意，至少直到这个世纪中期都一直争议不断，但它却表明了教皇帕斯卡尔为了满足国王们的愿望而甘愿做到什么程度。有关帕斯卡尔对世俗统治者的依顺程度并非独此一例，但这其实也表明拉丁定居点需要强有力的世俗政府，这一需求因而凌驾于其他各项考虑之上，成为当务之急。

### 1110年以后与当地人的关系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拉丁教会的特征之一，是教众规模相对较小。在整个近东区域，到十字军东征结束时至多也只有2 000至4 000名西欧拉丁人。尽管其后这个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巴勒斯坦可能渐渐有了15万多的西欧拉丁人口，但整块定居地的规模仍然很小。也有当地人皈依了天主教，数量可能也比较可观（由于法律规定，只有天主教徒的证词在法庭上才具有效力，而只要查看法律文书中记录下的当地证人的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要估计出其全部数量是不可能的，因为皈依者的家庭很自然地会倾向于使用拉丁圣人们的名字，从而在姓名上与原来的天主教群体融合在一起。比如，1122年阿拉比（Arrabi）家族成员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当时缪塞·阿拉比（Muisse Arrabi）是雅法的一名骑士。缪塞的一个儿子名叫乔治，而乔治的四个孩子又分别叫亨利、彼得、约翰和马利亚。如果他们保留了自家那富有特点的姓氏，那仅从名字来看，我们就再也察觉不出这个家族的源流了。此外，阿卡的一个名叫萨利巴（Saliba）的市民在1264年留下一份遗嘱，其揭示出他是一名天主教徒或马龙派教徒，因为他对几所拉丁教堂都做了遗赠。他的一个姐妹叫纳耶姆（Nayme）。他的兄弟史蒂芬当时已经辞世，其妻子名叫瑟特达尔（Settedar）。他有两个女儿：凯瑟琳（Katherine）和哈特涅（Haternie或Hodierna）；四个侄女：



维斯塔 (Vista)、卡奥菲 (Caolfe)、博纳文图拉 (Bonaventura) 和伊莎贝隆娜 (Isabellona); 以及六个侄子: 莱昂纳德 (Leonard)、托马斯努斯 (Thomasinus)、乔治、多米尼克 (Dominic)、尼古拉斯和莱昂纳迪努斯 (Leonardinus)。

非天主教徒在法律上的劣等地位 (我们在下文还会更详细地谈及) 显然鼓励了人们的皈依。13 世纪时,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团和使节团劝人改宗的行动十分活跃, 在政治上施压的举动也屡屡出现。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 67 在圣地都十分活跃, 阿卡的多明我学院就是专门培养传教士的学校。最显著的一次臣服联合事件是一整个马龙派教群的皈依。马龙派是一个单志论<sup>①</sup> 教派, 拥有自己独立的牧首和主教, 是的黎波里一带大多数本地基督徒效忠的教派。大约在 1181 年, 马龙派在宗教上与罗马彻底联合; 30 年后, 不再属于异端。马龙派成为第一个具有自身礼仪、教法和教阶的联合东方教会的派别, 可不经由当地的天主教主教而直接臣属于教皇。尽管其教群内有一派对联合怀有敌意, 但马龙派始终在情感上归附于教皇, 即使在拉丁人被赶出黎巴嫩后也没有改变。而其他一些例子就没有那么显著了。如 1198 年, 亚美尼亚教会中的重要一支——处于西里西亚的一支与罗马正式联合。这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代表们扶植起来的统治者促成的。但由于联合的达成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亚美尼亚主教的同意, 而这些主教都居于西里西亚地区之外, 因此该联合遭到大多数亚美尼亚人的误解, 并引起了知情者的焦虑, 最终教廷要求进行的改革根本未完成, 没有取得什么实质结果, 亚美尼亚人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又如雅各派的牧首和耶路撒冷大主教在 1237 年向多明我会修士做出的改宗天主教信仰的告白, 以及聂斯托利派大主教做出的告白, 就更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因为都纯粹是个人行为。事实上, 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们揭示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尽管在形式上是异端, 但雅各派和聂斯

① 7 世纪产生的一种基督论异说, 认为在基督内只有一个“位格”(hypostasis/person), 因而只有一个(神性)意志; 并且由此唯一意志只能产生一个(神性的)行动方式(因而又称为独作说[monergism]), 其人性只是个工具而已。故此派否认了基督内有人意志。——译注

托利派教群全是一些所受引导不当但非常虔诚的人，他们其实根本不太了解也不太关心导致教派分裂的那些神学上的争论。但这种对真实情况的洞察来得实在太晚，而裂痕已形成，很难弥合。

即使算上皈依者和与罗马联合的联合东方教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天主教徒数量仍然很少。这一事实也通过通常每一块定居地有一个拉丁教区教堂的数量之少反映出来。而同样具有揭示作用的是下列行事方式：让大教堂规模扩大些，成为较大城镇上唯一的教区教堂；甚至在耶路撒冷，唯一具有教区教堂性质的就是圣墓教堂。1168年以后雅法有两个教区，阿卡和安条克在13世纪有多个教区，但这些都是极少数的例外现象。完整的天主教教会体制逐步在拉丁定居点建立起来，但它所依据的基数其实很小，而它所掌控的范围又因为各种例外体系而变得更加狭窄。根据例外体系，较大的修道院和宗教修会，以及13世纪某些意大利商人社区的教堂，都不归主教制度体系管辖。

68

当然，天主教的主教们在形式上对其他基督教派别的成员具有权威，这一点是确定的。不过，在东正教和其他教派之间需要做一个区分。至少在12世纪末东正教还被视为一个比较坚实有力的派别，而其他教派则肯定是异端。东正教徒拥有自己的教会和修道院社群。还没有很确实的证据表明他们被驱逐出了重要的朝拜中心地区，尽管他们在这些地方的神父确实被剥夺了俸金，仅靠虔信者的供奉来养活。在圣墓教堂中确实有东正教的神职人员，他们还亲眼目睹了1101年小神殿复活节圣火自燃失败的事件，而这件事之前曾被错误地归咎于他们没能出席。在整个天主教徒占领期间，东正教的仪礼似乎每天都在圣墓前一个高高的祭坛上举行，这在教堂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也在约沙法谷圣马利亚教堂的一个祭坛前举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出钱让希腊的马赛克镶嵌工匠装饰伯利恒的主诞教堂时，“以及圣子”(*filioque*)<sup>①</sup>这个东正教和天主教为要

① *filioque* 是拉丁文，意思大致为“以及圣子”。这里的争论指《尼西亚教法》中有一句话里面，在圣父之后是否要加上“以及圣子”。对此，天主教和东正教各执一词，天主教主张要，而东正教主张不要。——译注

不要加而一直争论不休的语句，被根据墙上篆刻的圣灵游行程序所规定的东正教实践方式抹去了。名义上的安条克牧首和耶路撒冷牧首都在流亡（不过在1165至1170年这短暂的几年间，东正教牧首阿塔纳修 [ Athanasius ] 曾短暂地回归安条克复位），但许多东正教的主教仍然留在了其驻地，而有些教区的主教职位在空缺了几百年后，必定又重新任命了继承人。在安条克牧首区，这些东正教主教的地位似乎没有得到承认，天主教的主教们认为自己才是使徒们合法的继承人，还派密探监视这些东正教主教。在耶路撒冷牧首区，东正教的高级教士们还似乎被天主教教士们当作共治者：我们知道，在加沙或者还有西顿和卢德，其主教都属于这种情况。不过，唯一一位被拉丁人公开承认对教区拥有完全掌控权的东正教高级教士是西奈的大主教，因为这个地区在南边很远的地方，已经超出了拉丁人的直接控制范围。

至于其他基督教教派，人数最多的是雅各派和亚美尼亚人。事实上他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北部是他们聚居的主要区域，雅各派的牧首和亚美尼亚天主教会也驻扎在那里。大多数天主教主教都不会对他们加以干涉，不过那些受命监视东正教主教们的密探们，至少在某一个教区中也监视着这些派别。在南部，他们被视作处于天主教牧首的权威范围内，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大主教们则被视为天主教牧首的臣属，但这似乎不过是从法律上讲讲而已。上述两个教群在耶路撒冷都拥有自己的大教堂。雅各派教徒不被允许参拜圣墓教堂，但获准在入口处拥有一个礼拜堂，其处于外墙上的大门完全独立于圣母教堂。而亚美尼亚人在教堂以南天井区域一块空地上拥有一个礼拜堂。

69

如同香蕉共和国<sup>①</sup>的军队一样，拉丁教会中“将军”比“士兵”还多。由于有如此多的圣所被授予修道院社群负责守护，再加上俗众的数量本来就并不多，这就意味着直接归属主教们管辖的天主教徒极少，主教们其实没什么事可做。在1216至1217年冬，维特里的雅各作为阿卡主教负责掌管东方最大的天主教社群，他这样描述了自己一天的日程：早晨的第一件事情是做弥

① 美国作家欧·亨利（1862—1910）在《白菜与国王》一书中创造的词，用来指代那种经济上靠初级产品出口（比如香蕉）而政治上相当不稳定的寡头当权国家。——译注

撒；在中午之前都在听人们告解；吃完饭后（他声称自从来到巴勒斯坦，胃口就一直不好）走访病人到第九时辰甚至晚祷时分<sup>①</sup>；之后是坐堂处理各种事情的时间，基本上一天剩下的时间都用在上面。他写道，除了在弥撒或者夜祷时看看圣经文选外，根本没有时间阅读；他只能把夜晚的时间留出来供自己祈祷和冥想。但因为这座城市挤满了从内陆流亡来的各种神职人员，会导致各种权益纷争和事端，所以雅各十分忙碌，这个案例绝对算是例外。

在雅各留下上述记录的年代，东方的形势变得很乱。随着基督徒的领土不断被穆斯林征服，逃亡的主教及其教堂内的全体教士都蜂拥挤入沿海的城市，尤其是阿卡，他们大多数就一直留在那里。这或者因为他们的教区，比如希伯伦和塞巴斯蒂亚教区，一直没能收复；或者像拿撒勒、卢德、提比利亚和耶路撒冷自身一样，因为城市太缺乏防护，即使重新占领也不稳固。有些主教区序列就此消亡，并入其他教区，但有些却仍然延续着，这大部分是因为它们的教堂在沿海地区和西欧本土都得到了大批的财产捐赠。圣墓大教堂、塞巴斯蒂亚大教堂、拿撒勒大教堂和伯利恒大教堂，拉丁人圣马利亚修道院和约沙法谷圣马利亚修道院、锡安山修道院，以及各个骑士团，都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得到大量地产捐赠，一直源源不断地产生收入。管理这些产业就为一批持戒教士和教会服务人员提供了营生。1251年为拿撒勒教堂的全体教士编订的法令指出，如果大主教自身在加利利<sup>②</sup>的领地无法养活他及其教堂中的随员，那么：

只有大管家将跟随大主教待在叙利亚。其他教士将以合适的方式得到

① 中世纪时天主教传统的时辰礼仪（*Liturgia Horarum*）。它是根据时间划分的礼仪模式，主要包括八个重要的礼仪时辰：夜祷（*Matins*，子夜时分）、晨曦祷（*Lauds*，清晨或凌晨三点）、第一时辰（*Prime*，早上六点）、第三时辰（*Terce*，上午十点）、第六时辰（*Sext*，正午）、第九时辰（*None*，下午三点）、晚祷（*Vespers*，点灯时分或下午六点）、睡前祷（*Compline*，睡前或晚上九点）。——译注

② 位于巴勒斯坦北方、约旦河西岸的地区，据圣经福音书记载，耶稣在此区域度过了他在地上的大部分时间。——译注

就近安置，或者送到海外各地去管理属于拿撒勒大教堂的修道院和教堂。

即使没有大教堂本身的教堂和教区事务，这些博学的教士们也像现代的牛津和剑桥的学院一样格外地收到捐赠，并仅凭这一点就能存活下去。于是出现的一个奇特景象便是，在13世纪的阿卡城内，除了有本城的教士及骑士团的修士外，还有从耶路撒冷流亡来的圣墓教堂里的奥古斯丁会全体教士、来自锡安山和约沙法谷圣马利亚修道院的教群，以及从异教地区（*in partibus infidelium*）来的空有头衔的主教及其教堂教士们。

无所事事的主教比比皆是，这仅是当时教会的奇景之一。经历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残酷清洗其他种族的举动之后，作为在一个潜藏着敌意的地区代表一个少数民族群的机构，它被迫表现得宽容，不仅针对其他基督教派别，也针对其他各种信仰派别。这些异教派别继续在这一地区公开延续着。旅行家伊本·朱巴依尔（Ibn Jubayr）<sup>①</sup>提到了泰尔的若干座清真寺。在纳布卢斯附近的村庄贾迈勒（Jamma'il），在部分人于1156年迁走之前，罕百里（Hanbali）派<sup>②</sup>的穆斯林农民在星期五祷告的时间，会聚集在一起聆听教义宣讲（*khutba*），唱诵阿拔斯哈里发之名。他们迁走是因为税负实在高得离谱，也因为他们的星期五祷告活动受到了威胁：他们的拉丁领主明确告诉他们，这个点钟应该是工作时间。这确实是表明存在歧视的一个案例，但仅是由一位领主的个别行为引发，而且碰巧这个区域又有一位穆斯林导师非常具有影响力，让掌权者有些忌讳。反过来，这也表明，在此之前，宗教活动是不受干扰的。当地的神龛继续兴盛发展着，这让穆斯林访客们非常吃惊。在论及纳布卢斯地区时，伊马德丁（'Imad ad-Din）<sup>③</sup>评论说，法兰克人“没

70

① 1145—1217，安达卢斯的地理学家，旅行家，诗人。其旅行日志记载了他于1183至1185年前往麦加朝圣往返路途中的见闻，对社会风俗和地理风貌都观察深刻，对中世纪其他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影响很大。——译注

② 伊斯兰教逊尼派法学四大派别之一。——译注

③ 1125—1201，即“伊斯兰罕的阿德丁”。波斯历史学家，学者，修辞学家。曾随萨拉丁多次出征，在萨拉丁去世后撰写了这位苏丹的传记。——译注

有改变（穆斯林居民的）任何一条法规或任何一种崇拜礼仪活动”。这一措辞得到地理学家亚古特（*Yaqut*）<sup>①</sup>和旅行家伊本·朱巴依尔的响应。亚古特在谈及伯利恒的一座清真寺时写道，“法兰克人占领这个地区时没做任何改变”。伊本·朱巴依尔在描述阿卡的牛泉的一座神龛时称：“在基督徒手上，它的神圣性仍然得到延续，真主使它仍然是能让穆斯林祷告的地方。”12世纪30年代，撒马利亚犹太人在纳布卢斯新建了一座犹太会堂。大约1240年前后，一位犹太旅行者描绘了采法特（*Safad*）附近地处梅隆（*Meiron*）的一座犹太会堂之雄伟壮观。犹太人前来敬拜圣殿的西墙和锡安山上诸王的陵墓，尽管后者已经被封印起来。而穆斯林和犹太人均前来敬拜的一些当地圣所，比如卡尔卡纳（*Kar Kannah*）的约拿之墓，严格来讲不能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非基督徒肯定还是会作为朝圣者前来造访的。在圣殿建筑群中，穆斯林们会去圣石穹顶（此时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一座教堂）以及阿克萨清真寺（此时是圣殿骑士团的总部）。1119年，成立不久的奥古斯丁修会在希伯伦发现了可能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墓地，这则消息引起了轰动，犹太人和穆斯林如果交一笔贿赂（*douceur*）给守卫，就能在基督徒朝圣者离开之后进入墓地敬拜。同样的安排也存在于塞巴斯蒂亚，因为穆斯林想要前往施洗约翰位于教堂地下室的坟墓前祷告，那里的教士们凭收受贿赂而小赚了一笔。

在近东，各教共同敬奉的圣所很是常见。在耶路撒冷王国境内，表明存在同化甚至折中主义的证据很多，其中就包括提比里亚附近一座与叙利亚基督徒共享的教堂。在阿卡，在一座清真寺原址上修建起来的圣十字大教堂，其内部专门辟出了一个区域供穆斯林祷告。而就在城墙之内，在牛泉，有一座清真寺—教堂，它东部的半圆形拱顶是法兰克人式的，其中刻有阿里（先知的女婿）的口谕（*mashhad*）。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都造访这个地方，

① 1179—1229，全名亚古特·伊本-阿卜杜拉·罗姆·哈马维。希腊裔伊斯兰传记作家和地理学家，因其著作对伊斯兰世界做了百科全书式的记载而闻名。著有《诸国词典》《作家词典》等。——译注

他们相信这里是主为亚当降下牛的地方，“穆斯林和不忠者齐集这里，各自转向他崇敬的场所”。旅行家阿里·哈拉维（‘Ali al-Harawi）<sup>①</sup>把此地的人气之所以旺盛归因于，阿里在这里显过灵并且让法兰克人惊恐不已。在耶路撒冷，圣殿骑士团允许穆斯林在属于他们的一所靠近阿克萨清真寺的教堂中祷告。乌萨马·伊本·蒙基德（Usamah ibn Munqidh）<sup>②</sup>对自己在那里的经历的描述就是很著名的例子：

每次去耶路撒冷，我都会去阿克萨清真寺。它的近旁原有一座小清真寺，法兰克人已经改为一座教堂……我的朋友——圣殿骑士们，会清空教堂里的各色人等，让我可以在里面祈祷。一天，我走进寺内……站着准备祈祷，这时，一个法兰克人向我跑过来，扭着我让我的面朝东方，说：“你应该这样祷告。”一群圣殿骑士赶忙跑过来抓住他，把他从我身边赶走。我继续祈祷 [那个法兰克人又跑了过来]……圣殿骑士们……再次把他赶开。他们向我道歉，说：“他刚从法兰克人的地方来到这里，初来乍到，不懂规矩，从来没见过有人还能不向着东方祈祷。”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没有那么广为人知了。这是由犹太旅行家雅各·本·纳撒尼尔（Jacob ben Nathaniel）记录下来的，发生在提比里亚附近的拉瓦·卡哈纳（Rav Kahana）之墓。这是一个具有治疗效果的圣所，吸引着基督徒和犹太人前来朝圣。

一个来自普罗旺斯的骑士看到未受割礼的人们 [基督徒] 在墓前

① ?—1215，又称为“赫拉特的阿里”，12至13世纪时著名的波斯旅行家，足迹之广，为当时所罕见。其著作有《访地见证书》和《教谕书》等。萨拉丁的儿子非常器重他，为他在阿勒颇修建了一座城堡，阿里最后在这里去世。——译注

② 1095—1188，穆斯林诗人，作家、外交家。出身于叙利亚北部的夏萨埃米尔王朝，后足迹广泛，辗转效力于当时兴起的多个伊斯兰政权中的重要人物如赞吉和萨拉丁，并与十字军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其著作《例习集》和《沉思录》中均有大量有关十字军的篇幅。——译注

点了很多盏灯，就问：“这是谁？”人们回答道：“这是一位正直的犹太人，他治愈病人，帮助不育者。”他于是对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要敬奉一个犹太人呢？”接着便捡起一块石头扔向墓地，随后又打算抬手扔另一块。他本来骑在马上，但忽然跌下来死了。一众僧侣立刻在管事者的带领下 [根据另一个翻译版本：教士和主教们] 聚集起来，称他 [这位普罗旺斯骑士] 不是因为犹太人才受惩罚的，而是因为他伤害了基督之师的荣耀，基督对他感到愤怒便击杀了他。他们是当着众人的面这么说的。

72 这明显是一出“奇迹剧”(miraculum)的戏码，但报道中揭示出教士们用基督教的方式委婉解释这位过激骑士之死，是急切地想避免麻烦，而这也证实了此地是某种折中主义崇拜的中心。因此，敬拜场所的共享，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带大众宗教的特征，并得到拉丁教会的宽容对待。这些圣所有些在偏远的乡间，但有些就在城中或城郊一带。

出于对这种普遍折中主义的回应，宽容的态度必定出现，但它显然是有限度的。只有天主教徒才拥有全面的法律权利，因为只有他们的证词才在法庭上充分有效；而其他族群成员的证词则根据其信仰分成不同可信等级。所有基督徒天生就有自由权，非基督徒则没有。这严重阻碍了人们皈依，因为领主们（即使本人是教士）不愿意让自己的奴隶受洗并获得自由，因此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发布谕令，称受洗不会改变主仆之间的服务关系，这一谕令也适用于西班牙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非基督徒还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这似乎是借由对伊斯兰第米(dhimmi)<sup>①</sup>法规的修订来推行的。十字军战士们来到此地后发现存在这样的法规。严格说来，第米身份在伊斯兰法律中只指可被分入“经书之民”类别的人：犹太人、基督徒和塞巴人(Sabaeans，特意加以说明诠释将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也包括了进去)。每位成年、男性、自由、

---

① 指伊斯兰国家的非穆斯林国民，意为“被保护的人”。——译注



理智清醒的第米都必须缴一种人头税吉子亚 (*jizya*)。他的地产可以 (但也不是一定要) 转给整个伊斯兰社群, 不过他拥有使用权。但无论以何种方式, 他都必须为这块地产及其上的产出缴纳一笔卡拉吉土地税 (*kharaj*)。他还可能为了供养穆斯林军队而承担其他的赋税。他必须在服饰上与基督徒相区分。他不得骑马或携带武器。他的法律权利受到限制, 表现在: 证词在法庭上的效力、受刑法和婚姻法保护的程度。他和他的家族不是伊斯兰国家的公民, 而是一个半自治性质社群的成员。这个社群由自己的首领如拉比或主教负责管理, 但重大事项以及涉及其他信仰群体的事务仍必须由伊斯兰教法庭来处理。另一方面, 第米得到安全保证和切实的保护, 可以自由信仰和实践自己的宗教, 但不应为此冒犯公众。他们可以修葺甚至重建既有的敬奉场所, 但不可新建圣所。

在耶路撒冷王国内, 我们发现卡拉吉土地税仍然在征收, 虽然考虑到其在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而且拉丁人延续了前人的税收系统这两点事实, 我们知道收取的额度并不高; 犹太人和穆斯林需支付人头税, 但基督徒不用; 犹太人和穆斯林需在服装上将自己与其他群体相区别, 而且, 除了证明拉丁人的年龄或出身, 或为土地边界提供证据外, 不得在与拉丁人有关的案件中出庭作证。不过另一方面, 他们可以继续实践自己的宗教。拉比法庭和犹太学院在阿卡和泰尔都很繁荣兴盛, 尽管没有现存的记录表明王国内设有喀迪 (*Qadi*, 伊斯兰法官) 的职位, 但在 12 世纪 80 年代安条克公国境内的杰卜莱 (*Jeble*) 有。凯达尔 (*Kedar*) 教授指出, 缺乏表明巴勒斯坦存在喀迪的文献的现象并不应让我们感到惊讶, 因为, 如果不是由于拉比法庭实在太声名显赫才让其《问答集》(*Response*) 得以流通并保存下来, 我们今天不会知道它们的存在。

拉丁定居者们在原有制度基础上做了两方面的创新。一是针对非拉丁基督徒做了调整, 对这些人来说第米制度的限制似乎只是部分取消了。没有证据表明基督徒需要缴纳人头税。他们也确实不需支付什一税, 因为这是针对天主教徒的; 在实际征收中, 这意味着只有归属于领主的那部分村庄收获

物才需缴纳什一税。但非天主教基督徒作为证人提供的证词可信度是分等级的，从不具有与拉丁人的证词同等的效力。他们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有社区自治权，其主教仍然是他们的领袖。1216年，维特里的雅克来到阿卡时写道，他向希腊人和雅各派都发表了讲话，因为他们各自的主教都驻扎在这里，能够方便地把人们召集起来。“遵照他们的主教的谕令”，希腊人聚集起来听他宣讲，但“我没能把聂斯脱利派、格鲁吉亚派和亚美尼亚派召集起来，因为他们〔在本城〕没有主教或其他领袖”。

皈依正教的讲阿拉伯语的苏里阿尼（*Suriani*）群体似乎是耶路撒冷王国中数量最庞大的本土基督教社群，在对待他们的方式上拉丁定居者们做了更大的创新。被称为叙利亚法庭（*Cours des Syriens*）的特别法庭是专门为他们设立的，遍及王国各地。在13世纪，人们相信，在拉丁定居点的早期岁月中，这些法庭是应苏里阿尼群体的要求而设立的，旨在按他们的习俗来审判。与其他第米群体的法庭一样，它们没有最高司法权，也不能就自由人的财产做判决。在13世纪的阿卡以及其他一些城镇，一种市场法庭（*Cour de la Fonde*）把当地的叙利亚法庭涵盖在内，但有证据表明，叙利亚法庭在耶路撒冷、纳布卢斯、泰尔和伯利恒仍然继续存在。可能除了纳布卢斯外，所有这几个城镇都拥有大批正教人口。无论苏里阿尼群体是否曾要求开设这类小型法庭，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必定处理了那些按照伊斯兰法律本应由他们的主教来裁决的“世俗”案件。这可能表明，天主教徒们将尘世权力应与神圣权力相分离的西欧改革观念强加到了当地这个基督教社群身上。

74

市场法庭的普遍设立是第二项创新。定居者们似乎利用既存的官署来收取市场税，并额外加上了判定涉及各个当地社群的小型商业案件的职责。在阿卡，巴耶（*bailli*）<sup>①</sup>、两个拉丁法官和四个当地人法官组成的市场法庭会受理关于债务、抵押或租赁的案件，以及

① 原为法国北部古代政权时期国王派驻地方的全权代表，后引申为驻地长官。——译注

之前叙利亚或犹太或伊斯兰或撒马利亚或聂斯脱利或希腊或雅各派或亚美尼亚派法庭所做的事情。请清楚铭记，这个权力机关判定并指导我们，任何上述人群在涉及小案件时都不应到别处申诉，而应到市场法庭。

犹太原告可以向托拉教谕书起誓，撒马利亚人可以向“摩西五经”，穆斯林可以向古兰经，雅各派和希腊人则可以向着十字架画像和用他们的文字写就的福音书。“血”案，包括谋杀、背叛和抢劫等，则仍必须由更高级别的拉丁法庭受理。

小案件特别法庭的设立，以及王国的高等法庭、拉比和主教裁判法庭与喀迪法庭的并存，就与原来的第米法规体系有了区别，因为在伊斯兰国家中所有的社群间案件（不仅是重大案件）都必须由当局的法官受理。涉及犹太人时，据称他们非常不愿意向本社群之外的当局法庭申诉，因此只有当案件涉及其他宗教群体时才会这么做。但也有证据表明，尽管在埃及基督徒和犹太人社群的领袖极度不赞同案件在超出自己管辖的社群外审理，但那些认为自己能因此获得好处的人确实会向伊斯兰法庭申诉。无论如何，有证据表明，在拉丁人统治的东方地区，不同社群的人们之间存在商业合伙关系，而市场法庭设立的首要原因必定是解决社群间的纠纷。

以试验新方法的态度来管理非拉丁人群，不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并保持审慎的宽容态度，这一切在 12 世纪非常普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在 13 世纪还是得到了延续，尽管面对着教皇法令对基督教世界实现一致性的要求。这种要求始于教皇英诺森三世颁布的谕令，首先针对意大利南部，其后扩展到希腊地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但不包括塞浦路斯）的天主教会阶层抵制了进行改变的压力，可能是因为主教们不想惹怒当地人群。因此虽然皈依现象存在，联合东方教会建立起来，黎凡特大陆上的教会仍消极无

表现出臣服的态度。

## 拉丁教会的贡献

12世纪时，耶路撒冷的拉丁牧首区还是拉丁基督教世界中最没有改革气息的地区之一。毫无疑问，这是由于第一代教士们素质不高，也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这里的早期世俗统治者都不倾向于改革。主要依赖于麦耶教授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我们获知某些相关情形，这些情形与我们在欧洲较为落后的地区发现的不无类似。在巴勒斯坦，迟至12世纪中期还存在着归世俗人士所有的私属教堂（proprietary church）。要到1120年的纳布卢斯大公会议（Council of Nablus）之后，国王和领主们才被诱使着放弃他们对什一税的掌控权。直到12世纪末，与欧洲的王公们一样，凭借所享有的荣誉教职头衔，国王们能够介入教会选举，因此还牢牢控制着主教选举。他们的方式是对参与者施加影响，或者利用名声不佳的双重设定制（dual postulation）：选举团虽然表面上进行的是公开公正的选举，但却会私底下向国王提交两个名字。12世纪90年代，教廷裁决谴责双重设定制，此后它逐渐消亡。而13世纪欧洲的主教们在这则裁决送往东方教区的翻译版本中（此事只有主教才能做）省略了其中的国家干预，因为此地的君权消极无为，往往也确实很无力。但这就让人们目睹了一种悖论现象：改革派教廷发起的最伟大事业之一，却创建了一个老式的、毫无改革气息的教会。

尽管占据着众多宏伟的建筑物，而且接受了千里之外大批数量可观的土地捐赠，这个教会却始终品质不高，偏僻落后。诚然，圣墓教堂于1130年设立了一位学院导师。到12世纪晚期，安条克也有了一个。到1218年时，阿卡已经开始教授神学课程，教会法或许还有民法在13世纪中期时已在的黎波里开始教授。到12世纪20年代，拿撒勒已成为一个较为重要的文化中心，1145年的一份教廷文献称之为一个“著名的宗教社区”；这里还生活着

两位小有名气的文化人物：罗尔戈·弗雷特鲁斯（Rorgo Fretellus）和拿撒勒的杰拉尔德（Gerard of Nazareth）。当地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得以保留至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与西方学院的藏书目录类似。但真正有才气的年轻人，还是必须远赴欧洲求学。比如泰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他在法国和意大利最好的学院里由最好的导师指导学习，一待就是近 20 年。直到 13 世纪，这种情况也仍然没有改变。尽管如今与原先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这里的社会较好地传播了阿拉伯文化知识，但这里的定居者在学术和文化上仍然以欧洲为圭臬；从他们感兴趣的文学作品来判断，世俗的贵族们在兴趣上与西方同阶层的人并无二致。一位在此地教会获封圣职的教士应安条克亲王雷蒙之命写作的《弱者之歌》（*Chanson des Chetifs*），描写了被穆斯林俘虏的十字军战士的传奇故事，其在文学种类上说是西方式的。

76

虽则如此，如果完全否认这个受 12 世纪的国王们掌控的小小的、封闭落后的教会对整个教会做出了贡献，那也是错误的。除了圣墓和伯利恒的兄弟会形式的修会外，这里的拉丁王国还为基督教世界贡献了圣衣会（Carmelite）<sup>①</sup>和两种新的宗教生活组织形式——医院修会和军事武装修会；这两种形式其后都流传开来。

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巴勒斯坦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大量狂热的西方人士，他们想要在耶路撒冷附近，或加利利一带，或安条克以北的阿玛努斯山脉中的洞穴里过隐士生活，了此余生。在这些地方，一些这样的人组织起了戒规严格的社群。也有人隐居到了迦密山（Mt Carmel）上，这是一座起伏不大的小山丘，一直延伸到海法附近的海岸边；他们仿效先知以利亚在那里定居下来。在 13 世纪初，牧首耶路撒冷的阿尔贝（Albert of Jerusalem，又名维塞利的阿尔贝 [Albert of Vertelli]）为一群圣衣会隐修士订立了一条规则；这一规则其后得到教皇洪诺留三世的认可，成为圣

① 字面意为“迦密会”，于 12 世纪在迦密山建立。迦密山系圣经中所载先知以利亚与巴利神的假先知对质的地方（见列王记上第 18 章）。据传说马利亚曾于 1251 年向英国的迦密会修道院院长显圣并赐予其圣衣，故汉语称其为“圣衣会”。——译注

衣会修会的第一原则。这个修会不久就转型为一个托钵僧的兄弟会修会，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培育出了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位圣人。

医院骑士团的生活方式与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修会<sup>①</sup>紧密相关。这个团体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不久便诞生。当时，由拉丁人圣马利亚修道院运营的一所朝圣者收容所的管理者们与其运营者脱离，得益于民众对于赴圣地朝圣的普遍热情，它在东方和西欧均获赠了地产。1113年，该修会获得教廷的承认，成为独立机构。早期医院修会的伦理规则直接源于11世纪教会改革者们的关注点：鼓励建立致力于慈善和关怀事业的机构。医院修会敬奉“神圣的穷人”，认为这是他们的“领主”。他们自视为“基督的穷人的农奴们”。他们的会规规定，服饰必须朴素，“因为我们的领主穷人，我们自视为他的农奴，他赤裸着或衣衫褴褛地漫游。如果农奴光鲜亮丽，他的主人却寒酸卑微，实在不成体统”。他们的自甘卑微和对穷人的热爱与尊敬，是后来方济各会的先声。他们在穷人生病时照看他们，在穷人去世时埋葬他们，以此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据我们所知，医院修会所创医院的历史，在西欧  
77 仅从11世纪开始可不间断地延续下来。早期医院中最伟大的几所均在耶路撒冷；此地还另有一所规模很大的孤儿院，由圣约翰兄弟会（和姐妹会）运营，其规模相当宏大，豪阔程度在当时几乎难以想象。我们对该孤儿院所知甚详，一方面是因为该修会的多座雕像都提到了它；另一方面还因为12世纪80年代一份论基督徒之爱的契约，该契约的起草人曾在该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在契约中对它多有谈及。

医院修会的护理有一个特点：因为非常穷困的男女便是基督，他或她不应得到很好的治疗，还应该享受到最好也最奢华的照料。当然，这是出于宗教动机，但它也运用了基本的护理原则，即：如果病人们吃得好，感觉心满意足、十分舒适，那他们就会好起来。耶路撒冷的医院接收穷人时，从

① Order一词一般应译为“修会”，指有特定修行规则的团体。“骑士团”其实只能译为“武装修会”，即具有军事功能的修会，但此译法已约定俗成，除这两页解释起源的页面外，他处仍随之。——译注

不问他们患有什么病（除了麻风病）、来自哪个国家、是什么性别。

[医院的]这件圣屋，知道召唤所有人获得救赎的主并不希望任何人消失，他仁慈地接受信奉异教者[穆斯林]和犹太人……因为主为折磨他的人祈祷，说：“我父，原谅他们吧，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这间得到祝福的屋子漫溢着天国的信条：“爱你的敌人，善待恨你的人。”因此，“上帝爱朋友，但为了上帝也爱你的敌人”。

接收穆斯林和犹太朝圣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病人如果不吃猪肉的话会给他们吃鸡肉；而为什么文献中会提到医院里有另外一个私人厨房（*coquina privata*），因为这里是用来烹制鸡肉的。这或许是因为医院骑士们尊重非基督徒病人的饮食习惯。

如果穷人病倒在城中的路上，甚至没有力气来到医院，医院的仆役就会搜寻到他们并送他们到医院。入院时，每位病人都做告解并得到宽恕，此后他或她似乎会得到鼓励，尽量参加星期天的盛典。每天，都有人依次巡查每一间病房，并用圣水净化祝祷。病房一共有 11 间，但整所医院可以扩容到接收 2 000 名病人，达到其通常容量的两倍。那位契约书作者写道，很多次，当医院的病人太多时，修士们的宿舍里也住进了病人，而他们自己则不得不睡在地板上。女病人有专门的病房，由女性仆役照料。有一间是专门的产房。新生儿刚一落地就先洗一个澡，如果有谁的母亲因为贫困或疾病而没有奶水喂养他们，医院还会提供专门的乳娘。在那个只有最高级别的领主才有单独病床的时代，病人们在这所医院里已经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在产房里，婴儿还有自己的小床，这使他们不需要和母亲挤在一起而受到影响。床上铺着羽毛垫子和床罩，每 14 天更换一次。房中还为病人准备了外套和拖鞋，他们上厕所的时候就不会着凉了。

每间病房由一位修士负责，助手为 12 名仆役，他们负责铺床，照料病人，为病人提供红酒、冷水和热水、毛巾，喂病人吃饭。病人们的饮食也十

分可观。当时还很少有人吃饭时能吃到白面包和肉，病人们却每天可以吃到白面包片，一星期有三天可以吃到肉。可供选择的食物品种也让人叹为观止，除了猪肉、羊肉和鸡肉外，骑士团还提供鸽子、山鹑、羊羔、鸡蛋、鱼、石榴、玉米饼、鹰嘴豆、桃子、李子、栗子、杏仁、葡萄、无花果干、生菜干、菊苣、小圆萝卜、马齿苋、石欧芹、欧芹、黄瓜、柠檬、葫芦和甜瓜。不过，遵照医疗原理，有些食物却绝不会出现在食品单中，比如豆类、虾子、海鳗以及人工喂养的母猪的肉。

医院雇用了四位医生、四位外科手术师，另外还有数名放血师。几间病房被分别分给几位医生负责，因此每位医生都全权负责一批病人。医生必须每天早晨和傍晚都去走访病人，查看他们的尿液，检查他们的脉搏。外科手术师不仅要照看位于耶路撒冷的医院，当基督徒军队与穆斯林作战时他们还成了军医，组建成一个流动帐篷医院。如果伤员在战场上没办法得到有效的治疗，外科手术师就会用驮畜把伤员送往耶路撒冷的医院或离战场最近的其他医院。如果驮畜不够，“伤员就会骑上〔全副武装的〕修士们的坐骑；而修士们，甚至连出身贵族者，也徒步返回”，由此公开表明，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病人。

在这样的一个机构中，其护理的标准必定使工作十分繁重，而且其照看的病人数量肯定比现代医院允许接纳的要多得多。它的后勤工作有多繁杂，如今我们只能靠想象来揣测了。这些病人可能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单独睡在一张床上，也肯定从来没有如此经常地吃过这么好的食物，或者也没有得到过对他们这么周到的心灵的关怀。常有人提出，这所医院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它的病房制反映了拜占庭的传统，用药方法则是阿拉伯式的。但医院里的医师似乎都是拉丁基督徒，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其标准和实践方式除了西欧传统之外另有起源。这里的护理方式似乎基于萨勒诺（Salerno）<sup>①</sup> 传授的医学理念，那里有西欧当时最伟大的医学院。

---

① 位于今意大利西南部的城市。——译注



这所医院的开支肯定非常大。而更值得指出的是，创立几十年后，这些医院修士又为自己增加了新的职能，开始把自己的机构转型为一个军事修会，即骑士团。这种转变沿袭了圣殿骑士们已经采取的方式。这个骑士团起源于1119至1120年间，当时一名来自香槟的骑士佩恩的于格（Hugh of Payns）将八名随从组织成一个常设的在俗修士社群，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到耶路撒冷这段路途上保护朝圣者，因为当时这条路仍然非常不安全。圣殿骑士们得到了国王鲍德温二世的支持，国王把处于圣殿建筑群中的王宫的一部分区域赐给了他们。他们还获得了圣贝尔纳（西多会克莱沃修道院的院长，德高望重）的支持。圣贝尔纳说服教皇使节团（包括两名大主教和十名主教，前往参加1129年在特鲁瓦举行的大公会议）承认了圣殿骑士团，并为之订立了会规。

在圣殿骑士们身上，原本作为一种短暂表示虔诚的行为方式的战争，转变为毕生表示虔诚的方式。十字军战士们是在某段时间内调动自己日常的各种技艺来为一项神圣事业而战，而如同其他宗教机构中坚持祈祷的修士们一样，圣殿骑士们却是以始终准备作战的方式来体现其宗教性。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捍卫他们的人，都承认他们是一种新类型的宗教修会的成员；尽管他们自己坚称，这种修会的根源早在经文中就得到了预示，因此是具有合法性的。他们佩戴着十字架，采用了具有修道院色彩且兼具十字军圣战色彩的头衔——“基督的骑士”。这种新型骑士通过投身一场有价值的战斗事业而拯救自己的灵魂，其与传统的那种诉诸暴力的恶人之间的区分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就已经出现，圣贝尔纳则再次予以提及：

哦，这是一种真正神圣与安全的骑士身份，它必定会让那类武人们免受通常且习惯于遭受的双重危险。这种危险，只要他们不是为基督的事业而战，就必定不能幸免。因为你啊，为尘世琐事而战的骑士，你是否常常被困在一种最危急的情境中：要不就是你杀灭了敌人的肉身，但事实上却杀灭了自已的灵魂；要不就是你的肉身被敌人杀灭，而你的灵

魂与之俱灭。

圣贝尔纳相信，因为是为大爱而战，圣殿骑士们一旦牺牲，就成为了殉道者。

从战场凯旋的胜者是多么荣耀！在战场上牺牲的殉道者是多么受主垂怜！欢欣鼓舞、勇气十足的勇士们，如果说你们沐浴在主的光辉里，为主折服，那如果你们牺牲了，则更感狂喜和荣耀，因为你们已与主合为一体。生是硕果累累的，胜利是荣耀非凡的，但根据神圣的法则，死亡却甚于这一切。因为如果说能沐浴着主的光辉而逝去是蒙主垂怜的，那为主而舍生的人又该多么蒙主圣眷？

80 虽则如此，无论是早期的各种辩护之词，还是教皇英诺森二世为他们颁布的谕令《各样美善的恩赐》(*Omne datum optimum*<sup>①</sup>，如今将其年份定在1138年)，都无法掩盖他们的所作所为令某些人群感到厌恶这一事实。建立一个宗教修会，告解过的成员们许下众人熟悉的虔修誓言，而经过这样的惯例程式，随后却策马外出杀敌，这样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一如40年前赎罪战争这一形式横空出世一般。战斗对宗教事业而言具有的重要性与照顾病人是相当的，这样一个命题实在具有颠覆性。令人震惊的是，神职人员中对上述观点表示不赞同者却并不算多，尤其当我们考虑到圣殿骑士团的建立可以说摧毁了以下主张：十字军运动非常适合世俗人士参加（保守派必定已接受了这一观点）。事实上，由于对圣殿骑士团的反对之声是如此微弱、如此漫不经心，以致我们甚至无法获取任何明确批评者的名单；关于骑士们存在的状况，我们完全是从其辩护者的角度来了解的。

其原因之一是，圣殿骑士们很快赢得了一批有权势的支持者，不仅在东

① 语出雅各书 1:17。——译注

方定居点，也在西方本土。他们非常受欢迎，又收到了随之而来的各种捐赠，这使得他们很早就东方肩负起重要使命。早在 12 世纪 30 年代，他们就在安条克以北的阿玛努斯山脉一带获得了自己的首批重要边区领地。在 12 世纪，圣殿骑士团自基督教世界各处获得的捐赠，或许超过了圣约翰医院修会的所得。因此，医院修士们自 12 世纪 20 年代开始亦采纳了某些武装修会的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阿斯卡隆是穆斯林在巴勒斯坦沿海地带最后一个要塞。1136 年，耶路撒冷的国王富尔克（King Fulk）出于制约阿斯卡隆的目的，把巴塔·古夫林（Bet Guvrin，亦拼作 Beit Jibrin、Bethgibelin）众多堡垒中的一座赐给了圣殿骑士们。最近的考古学发现已经揭示出这座堡垒的规模有多么大。我原先认为圣殿骑士团只派了一些雇用来的骑士驻扎在这里，但如今我确信这项使命非常重要，绝不能不加监管地任由一些雇佣兵来完成。在这之后圣殿骑士团又得到了其他堡垒，特别重要的有骑士堡（Crac des Chevaliers, 1144）<sup>①</sup>、贝尔沃（Belvoir, 1168）<sup>②</sup> 和马卡布（Marqab, 1186）<sup>③</sup>。在 1163 至 1170 年间，军事行动快速增加，但随着圣殿骑士团开始负债，时任团长因焦虑而精神崩溃，这一势头便中止了。但武装修会的势力还在继续增长，尽管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对此表示了忧虑。1206 年一次全体骑士大会（chapter-general）颁布的一项法令表明，此时的圣约翰医院修会已经完全军事化了。将医院修士武装起来的方式又被条顿修会模仿。这个组织成立于 1198 年，我们会在稍后的章节中加以讨论。到 13 世纪 30 年代，另一个医院修会圣拉撒路修会也仿效了这种模式，这个修会起源于位于耶路撒冷城墙拉撒路后门处的一所麻风病医院。这所医院的规模似乎相当大（我们可能还能想起之前说过圣约翰医院唯一不接纳的病人就是麻风病患者），成为患麻风病的骑士们固定的避难所。这可能正是如同其他驻扎在阿卡的修会一样，圣拉撒路修会在 13 世纪开始承担军事功能的原因。它的麾下既有患麻风

① 位于今叙利亚境内地中海沿岸地带，是目前仍存于世的最重要的中世纪城堡之一。——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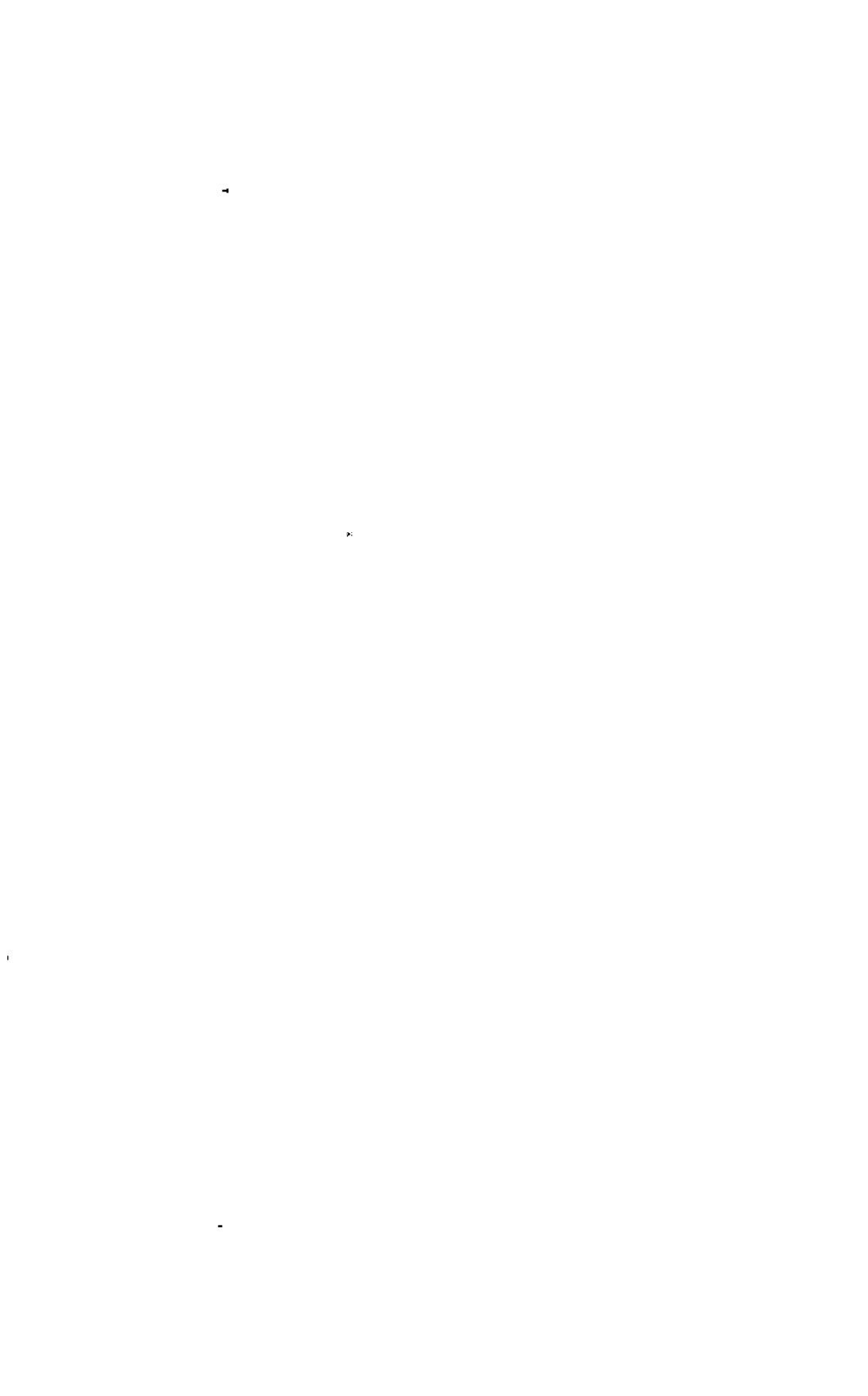
② 位于以色列北部，在加利利海以南 20 公里的一座小山上。——译注

③ 位于今叙利亚境内地中海沿岸地带，现已残破，于 2007 年开始整修。——译注

病的骑士，也有身体健康的骑士，但总体规模非常小。到此时，这个武装修会遵守的是奥古斯丁修会的规则，获赠了一批西欧的土地和麻风病医院。骑士们从教廷获得了特权，但13世纪60年代时他们试图使西欧所有麻风病医院都归其管辖的尝试没有成功，而随着巴勒斯坦的拉丁定居点的丧失，他们与十字军运动的关联也消失了。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其他的武装修会也陆续成立，尤其是在西班牙和德意志。英国人也有一个这样的修会：阿卡的圣托马斯修会。

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是一种宽泛的宏大体制（第一种真正的教会中央集权修会制）的一部分。拥有教廷授予的特权后，它们不受教区主教们的管辖，开始直接向罗马汇报。在东方，它们越来越多地担负起了防务重任。有人把它们描绘成权势过于显赫的“国中之国”，加速了最终让耶路撒冷王国一蹶不振的权力分化趋势。但这样描绘它们有些言过其实了。从制度上来说，它们的地位与拉丁基督教世界中其他的教会机构并无不同；这些其他机构也大多拥有地产，而且根据相关规定，不需要尽封建纳贡义务，也不受世俗法庭的管辖。当然，差异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它们相对而言更加强盛。它们非常有竞争力，有时显得有些自私，偶尔让人感到厌恶。它们的领导人虽然一般都是很棒的领袖，但往往心思都不太细密，不够深思熟虑。不过，它们也认识到，东方基督教定居点的存活是它们存在的理由。哪怕在13世纪它们势力鼎盛的时期，黎凡特一带的医院骑士也不过300人左右，而圣殿骑士也多不了太多。但它们肩负的使命却使它们付出甚多。它们指挥着一支雇佣兵军队，这是驻扎在它们的各处军营和战地哨卡中的主力；这支队伍需要支付薪金，而各处堡垒的维护也花费不菲。圣殿骑士团在巴勒斯坦最大堡垒之一的采法特，在13世纪40年代进行了重建。修会内部对重建花费的估计为110万萨拉森比赞特金币（Saracen besant），远远超过它们从附近的村庄可获得的收入。此后城堡每年的维修费用达到4万萨拉森比赞特。数年后，雇佣兵在阿卡服役的薪资大概是每年120萨拉森比赞特，要维持这支军队和整个复杂的运作机构，意味着每年要支付9000多名骑士的

薪资，还要供养 333 名常设的骑士。当时圣殿骑士团还拥有和这座城堡规模差不多的另外六座城堡，医院骑士团则有三座，因此而导致的花费所带来的压力非常大。虽然它们在西欧拥有大量地产，而且也建立了精密的机构加以运营，这些骑士团还是被所承担的沉重使命压得喘不过气来，经常遭遇财政危机。



## 第四章

# 拉丁东方地域的建立、管理和防卫（1097—1187）

### 乡间与城镇

十字军战士们定居下来的这块区域，从北到南大约长 600 英里，地貌比较统一。山脉，有时是两列平行的山脉，在离海岸有一段距离的陆地上延伸，其走向与海岸平行，但时不时地会有尖锐的凸岩或平缓的山坡向海岸靠近，而奥龙特斯河、利塔尼河和约旦河的水流流经的低地不时打断山脉的走势，点缀在山地之间。由于西风盛行，冬季的雨水都储存在能留住水分的山地上（因为树木远比现在多，储水能力要比现在好得多），在干旱季节时则慢慢自上而下流回海中。因此，山脉和海岸之间的平原相对而言都比较肥沃，人口稠密。山脉另一边的有些地区，在还没有融入东面和南面与之接壤的沙漠地带时，土地也很肥沃，比如加利利海以东的地方。

当地的村民严格来讲都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通常是不可以离开或放弃他们负责耕作的土地的。每个村庄似乎都由一个长老委员会负责管理，由一位首领统一监管。欧洲人把这位首领称为拉伊（Ra'is），这是一个常用的阿拉伯语单词，用来指称在某个社群中具有权威并在统治当局与被统治者之间充当中介的人物。他的“官署”比其他村民的居所附有更多的土地，面积也更大。他负责掌控全社区的农事安排，从地主拿到的税收中抽成，而且几乎总是社区中的法官。

这种村庄一般包括一个核心居住区——一圈杂乱分布但紧靠在一起的房屋，加上一个蓄水池，或许还有一个磨坊、一个大灶和一处打谷场，周边环境由村民们各自拥有的葡萄园、花园和橄榄树林。再远处是农田，农田都是集体耕作的，延伸范围非常远，以至于为了耕作这些土地，人们一年中有几个星期会住到离村子很远的一些废弃定居点中。至少在某些区域，人们实行两年轮作制，土地被分为 11 月中旬播种小麦或大麦的，以及部分休耕直到次年春天种植芝麻等夏季作物或种植蔬菜的。收获的作物在村中的打谷场脱粒，打下的谷粒然后分成几堆，根据对村中农田的某种划分比例，每个家庭分得一份。在分给每户人家之前，领主的那份先要留出来；如果该村有几位领主的话，这一份也要再细分一下。领主税还是传统的卡拉吉土地税，一般为农业收成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葡萄园、橄榄树林和果园收成的一半或四分之一。除此之外，穆斯林和犹太人还要缴纳一份人头税，这也是非常古老的税种，叫作 *mu'na*，意思是“个人献礼”，即向那些拥有山羊、绵羊、蜜蜂以及其他多种小的所有物的人征收的。所有这些税经常综合起来以现金的方式支付，但以实物方式支付的也不少见，因此，我们在乡间仍然偶尔可以看到大型谷仓的废墟，这些就是若干村庄缴来的税收物储存的地方。

这里也有欧洲农民的定居点，它们的外观则与此大不相同，却非常类似于西欧的“新镇”(*villeneuves*)。我们看到的不是杂乱分布的房屋，而是沿着一条主街规划分布着的房屋，村中有一座塔楼、一处村管会和一座拉丁教堂。在屈巴巴 (*Qubeiba*)，我们还可以看到非常高级的两层石制房屋的地基，这些房屋每座还都带着一个设计精密的蓄水池。我们对此地欧洲人殖民规模的看法最近发生了改变。之前我们觉得大概有 20 处这样的殖民点，但艾伦布卢姆 (*Ellenblum*) 博士已经确认了 200 处，包括从村庄到独立的农场等各种形态，周边有复杂的灌溉系统和其他表明存在先进的土地管理方式的迹象。这些定居点大多被发现分布在本地球教徒占人口大多数的地区，说明定居者们感到住在与自己同信仰者为主流的地方更加安全。

这些定居者来自欧洲各地。比如，12 世纪中期在巴塔·古夫林，我们



能在这些人中确认来自法国、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的，他们均是被丰厚的移民条件吸引而来。每位移民可以得到一份相当合理的大块土地供其耕种，可以自由转让。需要回馈的东西也不会让人感到负担（收成的10%，外加每个定居点特定的某些赋税），这些被视为租金。移民的社群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像在西方一样由一位官员统辖（称为管家 [ *dispensator* ] 或驻地代理 [ *locator* ]），他负有法庭主管及为定居点领主代理宣传和处理土地份额的双重职责。目前已经确认的所有这样的新镇都创建于12世纪。到13世纪时，随着基督徒控制的领土逐渐丧失，殖民运动的势头必定日益衰减。但在1200年前后，还是有一些官员很活跃，一些建立时间较长的社区在13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持续存在。

不管是本土的还是移民的村庄，都具有一个与西欧村庄大不相同的特征：村中极少有领主的领地，即在西方那种领主的家宅所在封地，这会让领主积极参与村中的农事，也让村中的农民要为领主干些体力活。在东方，领主的土地通常只存在于沿海一带的花园和甘蔗种植园中，很少有村庄地处沿海地带。村民们也不需要承担多少体力劳动义务，通常每星期不会超过一天。在很多地区，这些体力活似乎也就是把领主应得的那份收成送到集中地去，以及干点修路和水渠维修的事。这样导致的结果之一是领主没有什么理由直接插手所属村庄的农事安排，因为他只要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收成就好。尽管有些村庄中的某些建筑物已经被确认是“庄园主住宅”，但这些领主一般都不住在乡间，而倾向于聚居在城镇当中，他们大多在那里拥有带俸金的封地。

事实上，这个地区的城市仍然有繁华的城市生活。其内陆地区有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样的大城市，基督徒们掌握的沿海港口是它们必要的对外输出口岸。而此地的物产，尤其是糖，在地中海及更远的地方都有需求。它处于一条通往远东的重要商路的中段。大型的挖掘工作已经揭示出这些港口城市中最伟大的一座——阿卡的城市规划是多么纯熟：精美的建筑与复杂精细的下水道和供水系统都已经被发现。大多数欧洲人去往的正是这样的城镇：巴勒斯坦的大约15万拉丁居民中，约有12万人住在城镇中，其中大多

数人是自由市民。这些市民既包括殖民村庄中的欧洲人，也包括住在城镇中的欧洲人，他们的所有物被称为资产（*borgesies*），他们有权自由地对其进行买卖，不需为此缴纳臣仆承担的贡赋，而只需交租金。牵涉到他们的案子将由他们专属的法庭——市民法庭（*Cours des Bourgeois*）审理。他们不是封臣，因此不受封建义务的束缚。他们受公共法律《市民法令》（*Assises des Bourgeois*）的管束。这类法令因地而异，因为每个定居点都自行制定了相关法令。但存留至今的只有两部：一部是安条克的，保存不太完整；另一部是阿卡的，那里的市民群体规模最大。后一部大约编订于13世纪40年代早期，受到了一本阐释罗马法的普罗旺斯著述的强烈影响，这本书在欧洲传播甚广。

85 虽然早期发生了多次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的行动，但在许多城镇中这两类本土社群仍然数量不少。他们不仅包括无产者，也有商店主、商人和艺术家。在12世纪，六大城镇的染坊都由犹太人控制，不过其中最著名的、泰尔的那几家归叙利亚人所有，即上一章提到的苏里阿尼人。犹太人在泰尔的大规模玻璃工业中作用甚大，他们还参与了高利贷生意和店铺经营生意。此地还有穆斯林船长，某位耶路撒冷国王为他们颁布的一份安全通行令保存至今，其中允许他们在埃及和泰尔之间进行贸易。13世纪时，泰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从事商贸的叙利亚人社群。表明当地人的商业参与程度的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一家合伙公司在1268年成功地向热那亚政府上诉，为他们五年前被热那亚舰队劫走的一艘商船赢回了赔偿。热那亚市政府同意支付14900镑热那亚金币作为补偿。这家合伙公司似乎是在摩苏尔（那里是伊斯兰领土的腹地）组成的，共有23名合伙人，全部是东方本土人士。其中，4人住在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阿亚斯（*Ayas*，即尤穆尔塔勒克〔*Yumurtalik*〕），5人住在安条克，2人住在泰尔，4人住在阿卡。其中一人是自由市民、皈依者，或者是上一章提到过的马龙派萨利巴人。他显然非常富有：他的遗嘱表明他有1275萨拉森比赞特用于投资；1156萨拉森比赞特和10王国标准镑阿卡金币现金；但他的资产应该还不止这些，因为他出于某种未列明的重要原因，把自己的住宅遗赠给了圣殿骑士团。而他的一个

女儿什么也没得到，于是为了这笔遗赠起诉了骑士团。

## 管 理

在历史上，征服者们往往都沿用而不是废除所征服土地上原有的制度。十字军占领的是一个早已习惯于接受颇为先进的政府管理的地区。由于大多数本地人口都继续留在本地接受十字军的统治，之前管理体制的大框架部分保留了下来，仅偶尔做些修改以适应西方人的习惯和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被穆斯林占领之前，先后为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所统治。事实上，叙利亚北部大部分到很晚都还处于拜占庭控制之下。在拉丁人统治后，这里设立了公爵、执政官、法官，这些都是11世纪晚期的各级长官，尽管安条克公爵的角色更像耶路撒冷的代理人<sup>①</sup>，主要负责市民司法事务。在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以来的变化比人们想象的更少。罗马时代的基本行政单位是市（*civitas*，一个城市及其周边郊区），若干个市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罗马行省。拉丁定居点大概涉及七个行省。在经过了一定调整之后，罗马的行省转化为伊斯兰时代的军区（*jund*）；而迟至985年，旧日罗马行省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辨。行政区划的稳定性可以拿拉丁巴勒斯坦做例子来加以说明。凯撒里亚领主区的范围与穆斯林入侵前夕的凯撒里亚市范围几无二致，应该是一直作为一个政治单位保留了下来。阿斯卡隆和阿尔苏夫领主区的情况也大体相似。而巴勒斯坦地区的加利利公国的边界，也大致与罗马的巴勒斯坦二部（*Palaestina Secunda*）行省重合。

在新来的拉丁领主和村民之间协调斡旋的是两种官员。其一叫作吏官（*scriba*），是对阿拉伯语中 *katib* 一词的精确翻译。吏官是伊斯兰国家

86

① 此处原文为 *viscounts*，但所指并非世袭贵族头衔“子爵”，而是非世袭的官员。之所以用此称谓，乃是取其拉丁词源之意，“vis”源于“vice”，意为“代理”，“count”源于“comes”，意为“伴侣”。——译注

财政部门中的官员，负责收税，这是其最传统的职能，另外还负责监管土地划界。在我们知道名字的这类官员中绝大部分（25人中的14或16人）是当地人，但其中还有些人被称为主吏（*scribani*），即在自己的封地上担任该职；这种情况可能正相当于伊斯兰的达曼（*daman*，即包税）制度。第二类官员叫作译员（*dragoman* 或 *interpretes*），这表明其名称乃是伊斯兰词语 *tarjuman*（翻译）的变体。它可能沿袭自伊斯兰时代的穆塔吉姆（*mutarjim*）——法官的助手一职，协助后者管理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各个族群，似乎主要负责司法方面的事务。在世俗封地中，这一官职也像吏官一样由领主担任主管（*sergeantry*）。

在城镇中的情况也一样，从前的税种和贡赋还在继续收取，其中包括在泰尔向猪肉屠夫征收的一项税收，这应该是伊斯兰时代向处理不洁肉类者所征收的特别税的遗存。此外，毫不意外的是，我们再次发现吏官的大量存在，尤其是在人们进出城的地方（城门，或者港市的港口），以及市场上，因为市场中的商品都要登记并相应征税。出口商品要征收出口税。进口商品似乎一开始就已经登记过了，而进口税的征收是与商品销售税一同征收，在入市后才实现。管理港口的官员在阿卡称为链官（*chaine*），其名称源自升起来封锁港口入口的那道铁链。他负责经营港口，征收停泊费和根据船上船员及乘客数量征收的人头税；这在一个与朝圣之路相关的港口必定是笔可观的进项。有些市场，比如售卖猪肉、鱼肉和皮革等供当地人使用商品的市場，是独立运营的。但在大型城镇中，那些涉及国际贸易的重要市场是由被称为市场官署（*Fonde*）的机构集体管理的。在这些市场中，商品由官方提供的秤称重，税在交易完成后以两种方式收取：一种情况是，商人之间直接讨价还价达成交易，然后根据官方列出的商品价格来纳税，这个价格可以在官方列出的实时更新的价格单中查询到；另一种情况是，官方拍卖者组织公开拍卖，成交后，在把利润分给各销售商之前，先把税金抽成出来。这些税大多是按照价格百分比征收的（只有葡萄酒、油和谷物似乎是按照数量收取），在阿卡，其征收比例从4%至25%不等。

这些管理方式在拜占庭和伊斯兰时代都很典型，表明了旧体系与新体系之间的连续性。负责各项职能的官员有各种纯熟的会计方法可资利用。他们不仅收税，也向那些由国王或领主赐予年俸或租金的人发放相应金额。拥有年俸的人甚至可能利用自己的收入设立抚养金或救济金，这将以其名义由相关机构发放。这些机构向地方和中央国库缴纳贡赋，被称为秘库 (*Secretes*)。整个国库系统中最重要的是王国的大秘库 (*Grant Secrete*)，负责记录、登记和监管税收及收集工作；其形制非常类似于伊斯兰政权的中央国库 (*bait* 或 *diwanal-mal*)，因此同时代的穆斯林就直接用伊斯兰式的名字来指代它。

虽则如此，旧日的伊斯兰体系也并非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让西欧人感到非常难接受的是，在拜占庭和伊斯兰体制中，司法和经济是分开管理的。而在西欧，这两者是混合起来管理的。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发现欧洲定居者至少赋予了链官和市场官两类税收官员以额外的司法职能。阿卡的链官署至少从 12 世纪中期开始就具有了海事法庭的职责，也处理与海洋和海上商务有关的案子；不过所有的大案子，涉及标的超过一马克的，都由市民法庭处理。市场官署也负责处理有关商务和债务的小案件；但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在阿卡，由四名本地人和两名拉丁人裁判官组成的审判团，在一位典吏 (*bailli*) 的统管下也组成了一个针对当地人事务的法庭。

市民法庭将非封建的司法体系组合在了一起，一如国库体系将经济体系组合在一起。任何男性或女性，只要他们不是封臣，与他们相关的大案件就由市民法庭处理。而各个小型法庭，如链官署、市场官署和叙利亚法庭，在将案件往上移交之前可以先举行初步的听证会。只要当地有一定数量的欧洲人口，市民法庭就会成立。这是一个公共法庭，拥有完全的司法权力，包括最高司法权；可以判处死刑，可以管辖所有非封建体系内的人口及所有涉及市民租约的财产案件。它根据所处地的特定法律审判，由国王任命的一名官员——一般称为代理官——或在属地中的领主（领主还负责安保事务）监管，而市民司法官负责判决。阿卡有 12 位这样的司法官，他们都是城中颇有声望和地位的人物。

至此我们讨论的都是如何调整一个古代的、相当纯熟的体系，以此来应对西欧定居者涌入的状况。但同样重要的是自上而下将封建主义加诸此地的举动。这一过程开始于布永的戈弗雷为期一年的统治期内。有人提出，拉丁人的征服带来的是全面自由，拉丁巴勒斯坦存在的全权所有地（*allod*）、自由拥有的土地就是证据。但根本没有证据表明这里存在全权所有的土地。即使在 1099 年十字军进军耶路撒冷期间确实存在不受控制的随意攫取土地现象，等到戈弗雷当选统治者之后，这种现象就即刻停止了。戈弗雷本人的资源并不足以让他承担起防卫所有已占领土地的沉重负担。我们之前已经谈到，处于耶路撒冷通往海边要道上关键位置的拉姆拉被封给了一位主教。戈弗雷还分封了另外两个地区——希伯伦及耶利哥一带和加利利，他可能还在纳布卢斯一带创立了第三块封地。在去世前他还许诺要在海法创立第四块。戈弗雷还启动了分封带俸金封地的进程。

对于封建体制早在 1100 年就已经存在的观点，雷诺兹教授最近提出了质疑，理由是当时的术语还并不像此后使用得那么精确。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她的论证并不足以令人信服，不能驳倒既存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巴勒斯坦，从最开始就存在着封建制，至少是其雏形。其存在的理由也非常明显：只有少数十字军战士留在了东方。到 1100 年夏，据说在戈弗雷直接控制的地区内，只有不到 300 名骑士和同等数量的步兵。戈弗雷控制的地域扩张得很广，其掌控着耶路撒冷及自此一直延伸到海边的一块舌形区域。他需要得到手中有兵或者有能力招募士兵的人的支持。唐克雷德获得了对加利利的控制权，加尔德马尔·卡佩奈尔获得了从希伯伦到耶利哥的东南部边疆。他们都与戈弗雷通力合作捍卫这块殖民地，但他们自然也需要有足够的自由来犒赏自己的人马并为之提供安全的基地。只有以封地的形式赐予土地，才能给予他们这样的自由权力。事情发展的顺序在加利利体现得很明显。唐克雷德似乎最初被任命为这个地区的主要城镇提比里亚的城主，但当他试图将基督徒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加利利海以东时遇到了障碍。几个月后，提比里亚（换句话说就是加利利）被重组为一块封地。显然，在决定如何处

理与穆斯林邻居的冲突和如何处置其领地内的财产方面，这些领主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戈弗雷在自己的领地之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由于他全权控制的地域就够他忙的了。在西欧，这样的体制已经有先例，即德意志、西班牙和英国设立的边区领地的领主，通常都比更和平地区的绅士领主拥有更多的特权。

这个过程的结果之一是，虽然在拉丁统治者以下先前的管理体制还有所留存，但整个国家已经分裂。这种情况在安条克没那么明显，安条克公国设置了某种形式的分省管理体制，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公爵的直属领地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几乎包括了国中所有重要的城镇。但在耶路撒冷王国，大的领地都成了“国中之国”，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不受王室控制，领主们通过领主法庭和公共法庭能够处理所有的司法事务，几乎没有什么案件需要提交给王廷审理。只要封建权利义务体系没有受到威胁，国王们就无力加以干涉。领主们还能自主制定外交政策，在不咨询中央政府的情况下自行与穆斯林邻居开战或议和。到12世纪末，领主们享有的这些特权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有人认为，这些特权是随着贵族自1130年前后开始逐步巩固和获取大权而一点点累积起来的；但有些许证据（“亲王”[*princeps*]这个头衔的使用、他们所掌握的市民法庭[*Cours des Bourgeois*]的存在、他们在处理与穆斯林邻居的关系时自主采取的行动）暗示这些特权是从一开始就享有的。还有人认为，这些拉丁定居者总体上都来自一个像法国这样不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地区，他们其实只是把他们所理解的事物应该具有的自然秩序带到了这里；但其实当时的人非常清楚中央集权政府的好处，诺曼人在英格兰和西西里的事业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更可能的是，在一个边疆地区，唯一被认为可行的体系就是边疆领主制，而这种体制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下来的，因为如果当时统治者想要寻找能解决所面临问题的其他方案的话，必定承受强大的内外压力。

封建法则的运作强化了边疆社会的感觉。当然，封地领主们需要承担的义务中必定有军事义务。在欧洲，以付钱的方式替代出兵已经相当普遍，在英格兰这被称为兵役免除税。但东方仅有一个实行兵役免除税的例子留存

下来，那是在的黎波里伯国。没有证据表明耶路撒冷国王曾允许这样一种方式，即便在这个地区的村庄以货币形式缴纳赋税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显然，军事服务是相当珍稀的商品，没有办法以其他方式替代。国王们还有权要求年龄在 20 至 60 岁之间的女性领主履行结婚的义务，以保证有合适的男性人选能够承担起护卫本封地的骑士角色。另一方面，在西方具有如此重要作用的领主附属权利（feudal incident）在东方却极少能见到。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头衔购买费，即向领主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以获得领地继承权。尽管与此相关的习惯法非常复杂，对此 13 世纪巴勒斯坦的律法书已做了最详尽的阐述，但领主们，包括国王，似乎对继承事务都没有控制权。同样，在耶路撒冷王国中，他们也无权监护弱小之辈。任何妨碍潜在的封地所有者继承 90 头衔并承担责任的举动，都是不被允许的。早期还存在这样的立法，意在保证领地确实有人居住管理，而不是被生活在西方的不在地继承者掌握着。把上述规定与这种立法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就能想见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社会：它总在担忧着家底殷实的定居者数量过少的问题，总在关注着保障领地有人居住管理的问题，以及军事义务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了履行。

## 王室与领主们

耶路撒冷国王监管着一个由领主组成的联盟，但每位领主与联盟确立关系的纽带不尽相同。在最北面，安条克从法律上讲是独立的，它不是耶路撒冷的封国，而是君士坦丁堡的封国。但这并不是说耶路撒冷的国王们对那里毫无权势可言。1105 年 2 月 28 日，圣吉尔的雷蒙去世引发了一场继位争端，鲍德温一世对此进行了干预，并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拉丁东方诸事务中的仲裁者地位。雷蒙在新建立的的黎波里伯国的继承人是他的侄子塞尔达涅伯爵（Count of Cerdagne）威廉·若尔丹（William Jordan），但在 1109 年 3 月初，雷蒙的儿子圣吉尔的贝特朗（Bertrand of St Gilles）带着一支



规模不小的军队从法国赶来，要求继承父亲的领地。威廉·乔丹向已当上安条克亲王的唐克雷德请求支持。而贝特朗则向鲍德温求助。鲍德温以耶路撒冷教会的名义召唐克雷德前来，不仅是为了处理的黎波里的前景问题，也为了处理埃德萨伯爵的投诉；唐克雷德此前已经与他发生了武装冲突。唐克雷德同意承认埃德萨伯国的领土完整，以换取一大块耶路撒冷王国的封地，包括整个加利利（这是他之前曾占有过的）、海法，另外还有对耶路撒冷圣殿的所有权。至于圣吉尔的雷蒙的领地，威廉·乔丹将保留包括阿卡和塔尔图斯的北部区域，并将成为唐克雷德的封臣；而贝特朗将保有的黎波里及其周边区域，并将成为鲍德温的封臣。威廉·乔丹没过多久就去世了，贝特朗的统治范围扩展到原先割给前者的领土上。这场争端及其解决方式，突出反映了始终困扰着拉丁定居点的若干问题。由于政府管理和防卫力量不足的问题始终非常尖锐，“明确的继承人”，即本人在东方且能马上接管领地的继承人会被看得很重要，哪怕他的继承要求会损害一位刚好身在欧洲、从法律上来讲更靠前的继承人的权益。但这场争端及其解决也显示了耶路撒冷王室的权威，因此即使安条克的统治者并非其封臣，也不能轻易加以忽略。

事实上，只要安条克的亲王们还一直与他们法律上的宗主拜占庭皇帝存在矛盾，他们就不得不认真对待耶路撒冷声称拥有的统辖权。在1110年、1111年和1115年，鲍德温一世准备动用南方的军事资源用于北方的防御，而安条克和的黎波里的统治者在1113年和他共同参与了巴勒斯坦的保卫战。1119年6月，血田（Field of Blood）<sup>①</sup>战役中安条克公国的军队全军覆没，鲍德温二世刚一继位就不得不匆匆赶往北方去为博希蒙德二世——塔兰托的博希蒙德尚在襁褓中的幼子担任摄政。鲍德温摄政七年，从1120至1123年的每一年（此时他被阿勒颇的贝莱克监禁），以及获释后在1124至1125年间，还有1126年，他都不得不前往北方作战；虽然此举将巴勒斯坦的兵力抽空，引起了他在耶路撒冷的封臣们的不满。1130年博希蒙德二世

91

① 即犹大用出卖耶稣所得的钱购买的地，又称“亚革大马”，参见使徒行传 1:18-19。——译注

死后，鲍德温又只能再次出面干预，而他的继承人富尔克在 1131 至 1132 年以及 1133 年也这样做了。1149 年，另一场军事惨剧发生后，鲍德温三世紧急驰援北方以挽救安条克公国和埃德萨伯国残余的领土；1150 年、1152 年、1157 年和 1158 年他又多次前往。当然，这若干次到访，都只是作为一位拥有统辖威望的首领、作为联盟的首领，而不是作为实际的宗主。

另一方面，虽然埃德萨和的黎波里均为独立于耶路撒冷王室创立起来的，但都是其封国。埃德萨的前两任伯爵都当上了耶路撒冷的国王，并保证其继承者效忠王室。而对黎波里而言，之所以表示效忠是因为鲍德温一世在 1109 年帮忙仲裁解决了继位争端；不过黎波里的庞斯伯爵（1112—1137）在位期间还是态度坚决地尝试取得独立。宗主权让国王们对这两个伯国既享有权益也负有责任。例如，当黎波里伯爵被穆斯林囚禁时，阿马尔利克国王担任的黎波里的摄政长达十年。但由于这两个伯国都是独立创建的，因此它们都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它们一般不被视作王国的组成部分，至少在 12 世纪是这样；而且似乎耶路撒冷国王被视为伯爵们个人的宗主，而不是整个王国的国王。

耶路撒冷王国的范围始于贝鲁特以北的纳赫勒穆阿勒梅坦（Nahr el Mu'almetein）。在其南面，宗主权就属于巴拉丁人了。如果（看起来有极大可能性）王国从一开始就分割成独立的公国，其领主均为王室的封臣，但却像边疆伯爵一样对自己的领地拥有完全的主权，那么，12 世纪前三分之二时间里那种强大的、有宪法保障的王室权力就不可能成立。对宗主权的详细研究表明，由普拉维（Prawer）教授提出的立宪模式在草根层面无法成立。一部可能制定于鲍德温二世在位期间（1118—1131）的法律，旨在赋予国王在多种情况下不经正式审判便废黜封臣的权力；但如今有人认为，事实上它只是确认了对本来应该以常规方式受审的重罪犯既有的惩罚方式。这远远没有使国王摆脱在自己的宫廷中正式听审案件的负担。实际上我们认为，即使是公开的叛乱罪在当时也必须走常规法律程序：国王须作为宗主参加；但其其他封臣也要参与，以在这最高法庭上给国王提供建议。

同样确定的是，国王非常依赖于大封臣。因为他并没有公共的法庭机构，因此除了在宫廷内部，其他地方并没有设立公共司法机构，他只能通过大封臣为中介才能触及其大多数臣民。另一方面，通过彼此订立的封建契约，国王又对封臣们负有法律义务。特别重要的是，除非有人可在宫廷公开证明他们没能履行对国王的职责，不然国王就有责任维持他们在封地的统治。国王的宫廷作为最高法庭，尽管在处理某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时只是更大一个集群、一个由王国各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的议事会（*parlement*）的核心部分，仍集全国法庭和针对王室的君主法庭之功能于一身。国王负有的封建责任意味着其权力的合法性建基于该制度，而由此带来的影响之一便是宪政建设毫无进展。尽管1166年和1183年时议会进行了普遍征税，但东方从来没有像西方一样发展出经一致同意而建立的常规国民税收体制，因此也就没有第三等级。国王的中央政府架设在先前阿拉伯式的官僚体制之上，始终非常初级，由若干还沿袭着古老头衔的重要官员如外务总管（*seneschal*）、内务总管（*constable*）、兵马大元帅（*marshal*）、司膳官（*butler*）、财务总监（*chamberlain*）以及大臣（*chancellor*）组成；不过外务总管控制着大秘库，这个机构具有在传统的西方术语中所指称的意义。

领主们的权力因封建体系的本质以及12世纪封建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强。在这个地区，没有实际封地的领薪封地非常普遍，因为现金利润和换汇都非常方便。因此封地的形式并不统一，非常多元。例如1261年列在阿尔苏夫领主名下的27块封地中，只有一块完全以土地的形式，也只是一块是完全的领薪封地；而其他的都是以薪俸、产出、税收、土地和职位收益的各种组合形式构成的。与此类似，1243年，泰尔附近的一位领主拥有三个村庄，同时享有另一个村庄三分之一的收益，还拥有两处果园和城郊的一些土地以及泰尔城中的一所宅地，一处炉子以及一份每年60萨拉森比赞特的租金收入。大领地也是混杂型的。阿尔苏夫是其中较小的一块，它沿巴勒斯坦南部的海岸从南边的奥贾河（*el 'Auja*）到北边的瓦迪-法里克（*Wadi Faliq*），一直向内陆延伸到撒马利亚山脚下；但除了这块领地外，其领主在

纳布卢斯的王室控制地区拥有土地，还在阿卡拥有一座宅邸以及可能的若干货币封地（*money fiefs*）<sup>①</sup>。在 12 世纪 80 年代早期封给国王之叔的一块大封地（这是唯一一块我们保有许多创立宪章资料的封地），包括了在加利利北部的若干领土和城堡，以及在阿卡和泰尔的租金收入。这种资产的多元化配置，使得这些权贵在经济上能享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有助于他们熬过 12 世纪 80 年代后期领土不断丧失的情况。

有些律法本应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谋利益。如有一部法律禁止有赖于若干名骑士提供服务的封地持有人将大于自身保有领地的土地再次分封出去。所有再分封地相加的总和是否会少于封地总价值的一半，或一位领主是否其实会让自己所掌握的领地大于手下最大封臣的领地，就这些问题，13 世纪的法学家们没有达成一致看法。这部法律又得到了被称为“平等服务”（*service de compagnons*）的习俗的支撑。这一习俗规定，封地所有者可以组建一支雇佣军来替代常设封臣；这必定意味着君王分封地不能通过让渡而消亡。在耶路撒冷王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依此行为的，但到了 13 世纪，随着不断将领地封赐给骑士团和宗教修会以换取急需的现金，领主们自有的领地已经大为缩减。领主们所需承担的支出必定让人有不堪重负之感，因为大多数城堡及其随员的花费都归他们负责。

早期曾有一段局势不稳且移民潮一浪一浪来袭的时期，在此期间封地转手的速度非常快。此后，较大的领主权都牢牢控制在了若干家族手中，时间达数代之久。大约在 1130 年之后，领地传承的规律变得稳定，领主的谱系变得很有延续性、很清晰。通过联姻和相关的继承，领地逐步集中到少数几个家族手中。到 12 世纪过了四分之三的时候，24 个最重要的领主权仅由不到 10 个家族掌握着。稳定性既体现在阶级意识上，也表现在国王早期享有的特权的逐步消散上。起初，只有国王可以造币、征收沉船所得，掌控国际

① 一般的封地指的是领主向封臣授予的地产及其附属物，以换取对方的效忠和服役（通常是骑士役），以及其他封建义务。不同于此，货币封地指的是领主向封臣以货币年金的形式支付的现金，以换取与一般封地类似的封建义务。——译注

化的港口以及从他们的领地延伸到内陆去的道路。他们可能控制着各条交通要道。虽则如此，早在鲍德温二世时期，就只有造币权和控制港口及交通被认为是王室的特权，而几十年之后就连这些权力也受到了挑战。海法和凯撒里亚的领主发展起了自有的港口。或许在1187年之前，外约旦和西顿的领主就已经开始自己铸币。在12世纪60年代，沉船都是由国王阿马尔利克经正式程序予以没收；但到了13世纪，各路权贵似乎已经篡夺了之前国王们在他们掌控的交通要道上享有的权力。

但如果认为12世纪的国王们表现得无能为力，那就错了。首先，他们毕竟是国王，国王就意味着他们不仅仅是封建制度中的宗主。不论现实情况到底如何，这仍然通过他们所使用的仪式法衣和王袍象征性地得到了揭示，说明他们是上帝的代理人，这还表明他们具有君临所有臣民（不论他们是不是封臣）的公共权威。国王可以立法。无论是对于被控犯有盗窃罪的小民，还是对于被控劫掠另一位封臣的封臣，他们的宫廷都把审判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可以在危机时刻向全体大众征税（*levée en masse*）。他们在任命主教事宜上也有很大的发言权。此外，他们还占据着基督教世界中最神圣的城市，即使它在经济和战略意义上无足轻重。他们坐在大卫的王冠之上，这让他们拥有显赫的威望。而且他们是自治的。1100年鲍德温一世继位为王时曾主动征得教皇的同意，但耶路撒冷绝不是教廷的封国。尽管我们可以确定，1171年时，当阿马尔利克野心勃勃的征服埃及的计划破灭并导致危机之后，他曾承认过拜占庭皇帝的宗主权，但事实上这并无影响。国王也比其手下的封臣更富有。与其他封地相比，王室领地非常广大，它包括耶路撒冷、阿卡 and 泰尔，以及三城周边的土地；在某段时期也曾包括阿斯卡隆、雅法、撒马利亚、贝鲁特、希伯伦和白丘（Blanchegarde/Tel es Safi），不过这几处地方有时是属地，有时又是独立的封地；还有戴尔拜莱赫（Deir el Balah<sup>①</sup>/Darum）。阿卡城和泰尔城可以通过向贸易征税为国王们带来财富。而由于比

① 阿拉伯语，意为枣椰寺。——译注

封臣们更富有，国王们就可以花钱雇佣佣兵来充实自己的军队，这让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依赖手下臣子的服务，虽然这种服务仍然十分重要。他们还可以很好地利用货币封地制来拥有一大群直接从属于己的封臣。这让他们拥有了一群政治庇护者和政治权力。在1186年的继位危机中，其中一名竞争者拥有大部分的王室属地和若干名重要权贵的支持，可以调动王国中近一半的封建骑士。后面我们还将看到，比起封臣来，12世纪80年代的那些灾难对国王的影响相对小些，因为阿卡和泰尔这两个港口的日益繁盛带来了收益的日益增长，这能够抵消领土丧失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 从鲍德温一世到鲍德温五世

只要端详一下这一时期的拉丁东方，我们就能明显观察到一种在西方已经快速消亡的社会类型，这种类型主要取决于国王个人的能量和军事才能。在这个鲜少防护的边境地区，国王个人左右事件发展的能力非常大，他的政治地位也取决于像军事领导力这样的老式德行。鲍德温一世性格强硬，他是一名征服者，对分封以及对教会的态度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战士们的利益，他毫不留情地压榨埃德萨伯国。他极大地扩展了布永的戈弗雷留给他的地域，其威望日隆，在拉丁东方全境都被公认为最高统治者。但他可能是一名同性恋；尽管有过三段婚姻而且还犯过一次重婚，且均是为了获得子嗣，他最后还是无所出。他于1118年4月2日去世，这让王国再次陷入继承危机，并给了蒙莱里家族（贡献了如此之多早期十字军战士和拉丁定居者的家族）发动一场实质上的政变的机会。在棕枝主日（4月7日），国王的遗体被带回耶路撒冷安葬的日子，布尔克的鲍德温（蒙莱里家族的一员，同时也是国王的亲戚，还从国王那里得到了埃德萨伯国）突然不请自来。他是来复活节朝圣的，但在路上听说了国王的死讯。王国中的封臣和教会要人马上集合起来，组成类似于日后所称的议会来

商讨该让谁继位。以布尔克的鲍德温的第一代堂兄弟库特奈的若斯兰和牧首绍克的阿努夫为首的一派，主张王位应该授予布尔克的鲍德温。若斯兰认为，布尔克的鲍德温现在人在东方，与前任国王有亲戚关系，而且已经表明自己具有成为一名好国王的潜质。不过，大多数参加集会的人却更青睐已逝国王的长兄布洛涅伯爵尤斯塔斯，但他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已经返回家乡。于是有一个使团很快被派往西欧。在使团离开后，若斯兰又要求议会召开了第二次集会。由于尤斯塔斯的部分支持者缺席，这次集会推翻了之前的决定，布尔克的鲍德温在复活节当天受膏成为国王，是为鲍德温二世，但他直到 21 个月后才正式加冕。得知其受膏的消息时，尤斯塔斯和耶路撒冷派出的使团已经走到了阿普利亚。使团成员感到愤愤不平，但尤斯塔斯本来就对继位热情不高，为了避免纷争导致丑闻，他返回了故土。

毫无疑问，库特奈的若斯兰身为加利利的领主，乃是王国中最显赫的权贵，他肯定利用自己的权势操纵议会，让自己的第一代堂兄弟当上了国王。他和蒙莱里家族的其他成员毫无悬念地得到了重赏；而对一位其合法性存疑的新国王而言，对他“天然的朋友们”委以重任也是至关重要的。若斯兰在 1119 年夏末获封埃德萨伯国，而另一个堂兄弟伊维特河畔比尔的威廉（William of Bures-sur-Yvette）则替代他成为加利利的领主。家族中的另两位成员不久后也来到东方，毫无疑问是被赶忙送过来为国王巩固其地位的。克吕尼修道院的副院长勒皮伊塞的吉尔迪安马上被任命为约沙法谷圣马利亚修道院院长。在阿普利亚度过童年的勒皮伊塞的于格，在 1120 年 1 月接管了雅法，同时见证了国王任命他的叔叔吉尔迪安的仪式，虽然吉尔迪安甚至“还不是一名骑士”。承认一个应该还不到 13 岁的男孩拥有王国中最重要战略边城的领主权，这表明布尔克的鲍德温有多么依赖他的亲戚们。在他后来的统治期里，布尔克的鲍德温嫁了一个女儿给安条克的新任亲王，可能还让另一个与的黎波里伯爵的儿子订了婚，因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巴勒斯坦发生的一场政变会马上引来身在欧洲的亲戚们的支持，其方式表明将拉丁定居者们与其身在 2 000 英里之外的家族成员联系在一起的纽

带有多么牢固；而西方的亲戚们应该也期望因此获得政治上的庇荫。新任国王比起前任更加和善，他真的非常虔诚，婚姻也很幸福。他行事积极，是个负责任的领导人。但布尔克的鲍德温确实吝啬得不得了，似乎也不怎么受大家欢迎。他的统治始终不太稳固，也一直受到继承人问题的困扰，因为他只生了几个女儿。血田战役的惨剧发生之后，鲍德温对安条克的事态进行了干预，耶路撒冷的贵族们对此表示出不满。纳布卢斯大公会议则标志着他对教会的屈服。1122年，他不得不动用武力让的黎波里的庞斯伯爵（Count Pons of Tripoli）承认自己的宗主地位。在他被穆斯林囚禁期间，王国内有一派人甚至可能曾提议让佛兰德斯的查理伯爵（Count Charles of Flanders）继承王位。他可能还面临过外约旦领主发动的叛乱；而在其统治后期，又陷入与耶路撒冷牧首的冲突之中。牧首依据可能是布永的戈弗雷对丹波特许下的承诺，狮子大开口，要求让雅法立即划归牧首管辖；如果阿斯卡隆陷落的话，还要求控制耶路撒冷城本身。

可能是为了转移批评者们的注意力，布尔克的鲍德温对穆斯林邻居们采取了高度敌视的政策。从1124年开始的七年间，大港口泰尔被占。针对开罗和大马士革两方主要的敌人，战事同时铺开，其中针对大马士革及其领土的主要攻势发生在1126年和1129年；他还曾两次派兵突袭埃及占领的阿斯卡隆城郊，随之又把该城授予了封地离此最近的基督徒边境领主雅法的于格。在1126至1132年间，却没有任何出兵或可能出兵的相关记录留下，这对通常非常具有侵略性的阿斯卡隆埃及人来说很能说明些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埃及政府希望采取和平措施。1130年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阿米尔（al-Amir）遇刺身亡。他的儿子此时才几个月大，被宣布为继承人，但很快也被谋害。下一位继承人——阿米尔的侄子摄政哈菲兹（al-Hafiz），被新任维齐尔阿布·阿里·艾哈迈德·伊本·阿夫达尔（Abu Ali Ahmad ibn al-Afdal，又名库塔依法特 [Kutaifat]）囚禁。由于法蒂玛王朝已经没有直系后裔，哈里发空缺，埃及帝国被置于隐遁的伊玛目（the Hidden Imam）治理之下。库塔依法特认为处于隐遁中直至末日才会出现的伊玛目是



第十二位，即伊玛目派的马赫迪，但有人指出这就在事实上废止了埃及的国教，因为法蒂玛王朝声称其源自第七位伊玛目伊斯玛仪。1131年12月，库塔依法特被忠于法蒂玛王朝的卫兵所杀，但在死前三个月他派了一个使团到耶路撒冷，不过，当时已继承王位的安茹的富尔克拒绝了使团的所有提议。

布尔克的鲍德温竭尽所能试图保证继位能和平进行。安茹的富尔克五世与布尔克的鲍德温的长女梅丽桑德的联姻经历了漫长的谈判，谈判的焦点在于布尔克的鲍德温地位的合法性，以及梅丽桑德作为王位女继承人的合法性。每个人都想到了这方面，因为英格兰的玛蒂尔达的例子刚好与此类似，正是另一例女性继承权遭到质疑的例子。1127年夏天玛蒂尔达与富尔克的儿子杰弗里订婚，并于1128年6月完婚，就在富尔克决定接受十字架参加新一次十字军东征不久后。有人提出，1127年1月1日国王亨利一世宣布玛蒂尔达为自己的继承人，这一来自英格兰的先例在巴勒斯坦得到了回应：梅丽桑德被承认为“被认可的继承人”(*heres regni*)，这就克服了富尔克本可能有的对自己前途的所有疑虑。

富尔克是个较有权势的贵族，而且由于第一任妻子过世了，他可以自由选择续弦对象。在他于1120年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后，他就已经表明自己是拉丁定居点的热情支持者。但他被选中成为继任者还不只由于这一点。布洛涅的尤斯塔斯，那位在1118年被布尔克的鲍德温挤走的“正当继承人”已经在1125年过世；但那一年，他的女儿兼继承人，另一位叫玛蒂尔达的姑娘，嫁给了布卢瓦的史蒂芬。史蒂芬继承了布洛涅伯爵的头衔，并将自己的长子命名为尤斯塔斯，意在声明所继承的布洛涅的权利。史蒂芬是参加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那位布卢瓦公爵史蒂芬<sup>①</sup>之子，由其叔父英格兰的亨利抚养长大，而且颇得亨利的欢心；史蒂芬也是有权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候选人之一，且最后决心要好好争一争。但布洛涅的玛蒂尔达的婚姻肯定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忧虑，史蒂芬肯定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对梅丽桑德未来继位的

① 参见原书第32至35页。——译注

威胁。这可能说服了布尔克的鲍德温及其幕僚向富尔克提议继位，因为他们肯定已经知道富尔克与史蒂芬交过手，而且曾在一场发生在诺曼底的边境地带的小型战役中击败过史蒂芬；这场战役曾困扰过法兰西的政治生活。

98 蒙莱里家族再次深深卷入了这一事件中。与梅丽桑德联姻的提议是由蒙莱里家族的一员伊维特河畔比尔的威廉带到法兰西的。而且，与1118年的实质政变一样，随后发生的1129年十字军东征也与蒙莱里家族的活动密切相关。1127年，奥布河畔的丹皮耶尔的居伊一世（Guy I of Dampierre-sur-l'Aube，其母出自蒙莱里家族）出现在东方，同行的还有他的表兄弟勒皮伊塞的居伊。1128年，沙特尔谷中圣让修道院的院长沙特尔的史蒂芬——系布尔克的鲍德温的亲戚——来到巴勒斯坦朝圣。在他等待回乡的船只到来期间，耶路撒冷的牧首过世了。他很快就被推上牧首的位置，但没有成功，因为他希望重申自己认为属于教会的权利，这导致他与国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到1129年3月时，布尔克的鲍德温的妹妹玛蒂尔达之子勒泰勒的居提耶来到东方。在时任牧首（他的表亲）出席的情况下，他与自己的表妹耶路撒冷的梅丽桑德、勒皮伊塞的吉尔迪安以及雅法的于格一道，见证了其叔父的认可仪式。那时沙特尔的子爵于格三世正参加十字军来到这里，如果他是与富尔克伯爵和安茹人一起来的话（这很可能），那富尔克就是在两位蒙莱里家族成员的陪伴下来到东方的；因为伊维特河畔比尔的威廉也和于格三世一道返回了东方。选择富尔克为继任者，似乎是蒙莱里家族为颠覆1118年成立的那届政府所采取的一项举措。

1129年的十字军陪同富尔克来到了巴勒斯坦，除了上面的活动外，还在另外的方面体现出其为蒙莱里家族的创举。泰尔的威廉（他当时是耶路撒冷王国的总理大臣，接触到政府的许多记录文书，但他留下的记述是在此后很多年才写下的）讲，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佩恩的于格（他受布尔克的鲍德温的恩惠极深，可以说是其一手栽培出来的）前往西方的布道之旅完全是出于布尔克的鲍德温及其幕僚们的授意。至于教皇洪诺留二世，虽然根据他在的一封信中提及安茹的十字军招募事宜，可以肯定他知道这次十字军的事情，

但他在招募过程中似乎没起什么积极作用，也没有证据表明此事是由教廷推动或有教皇使节参与的。

富尔克在布尔克的鲍德温二世于 1131 年 4 月 21 日逝世之前，一直对其忠心耿耿。但此时，梅丽桑德已经为富尔克生了一个儿子。梅耶教授提出，毫无疑问是为了确保他的继承后事，国王做的最后一件事可能就是稍微改变一下未来政府的格局，将王权同时授予三个相关的人：富尔克、梅丽桑德及其幼子——另一个鲍德温。然而，毫无疑问，从统治期一开始富尔克就决心要改变王国运行的方向，扭转 12 世纪 20 年代实施的政策。他表明这一意图的举动为：没有选择像两位前任一样在伯利恒加冕，而选择在耶路撒冷加冕，就在圣墓穹顶之下。这或许是因为选择为他加冕的日子是 9 月 14 日，是真十字架现世的庆典日。但无论这背后还有什么意义，他的加冕都表明其与前任的断然决裂。他起用忠于自己的新人，而变迁的迹象在他的宫廷法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让蒙莱里家族感到不满，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统治早期出现的一场叛乱。雅法的于格卷入其中，并被富尔克指控犯下叛国罪。泰尔的威廉后来说，是于格与梅丽桑德（威廉当然知道他们都属于蒙莱里家族）有染的传闻导致了于格与国王交恶。然而于格和梅丽桑德被怀疑有可能是在进行家族密谋：家族内部讨论如何扭转正在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局势。无论原因为何，于格在一位被废黜的外约旦领主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不过最后他只被判了三年流放，这样的处罚其实相当轻。很可能于格的叛乱不仅是源于国王起用新人替代旧家族官员的决心，还因为富尔克拒绝考虑埃及使团的提议。如果库塔依法特因为感到太孤立无援而打算将阿斯卡隆这个滩头堡拱手相让，而这一提议却被拒绝的话，已经被授权领有阿斯卡隆的于格肯定会感到不满。

富尔克于 1143 年去世，但一直到其子鲍德温三世 1145 年成年之后，梅丽桑德女王仍然掌握着大权。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她大力赞助艺术事业；但同时她也是一个纯粹的蒙莱里家族成员，在另一位堂兄弟耶尔日的马纳塞（Manasses of Hierges）的协助下执政。在于 1152 年强势重申自己的权威

之前，年轻的国王正处在日益靠边站的境地。他要求将王国正式一分为二，由自己与母亲分而治之；因为她在1150年可能阻止了自己的封臣听从他的召唤出兵北叙利亚。此后，年轻的国王又质疑划分的方式有失公允，他迅速行动占领了其母的领土；到这年春末，他已经大权在握，而梅丽桑德掌握的范围仅限于纳布卢斯一带她陪嫁的土地。而蒙莱里家族，这个控制了拉丁东方的法国中等贵族家庭，这个可能促成了一次甚至两次十字军东征的家族，其垄断地位就此终结。

大权在握之后，鲍德温三世马上回应了来自北方的一次求助：穆斯林攻占了塔尔图斯。城市被夺了回来，来自王国、的黎波里伯国和安条克公国的一众贵族在的黎波里举行了一次集会。虽然集会劝说安条克的女继承人康斯坦丝结婚的主要目的没有成功，但它验证了年轻国王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他成功地召集了领主们在王国治域之外举行一次大集会。事实证明，他也是一位聪明而精力旺盛的国王，在他的领导下，对海岸城市阿斯卡隆的征服最终得以完成。但他很早就去世了，在1163年2月10日。这让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自己野心勃勃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联合东地中海地区所有的基督教势力征讨埃及。

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兄弟阿马尔利克，与他一样有能力，也一样精力充沛。阿马尔利克统治期间最大的壮举是尝试攻占埃及，这将在后面讨论。但这位国王还试图扫除王室控制权上的一个主要法律阻碍，即大封地享有的牢不可破的特权壁垒；而这导致它们无法被干预。他最重要的立法举措是一部名为《效忠法》(*assise sur la ligece*) 的法律的出台，这是为了应对其前任统治期间的一场危机：西顿领主热拉尔没有经过君主法庭的裁断就夺取了手

100 下一名封臣的领地。鲍德温三世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消解这位封臣所受的苦难；热拉尔被迫屈服，归还了封地，并就之前造成的损失对这名封臣做出了补偿。而阿马尔利克国王则郑重召开最高法庭会议，宣布今后所有的次级封臣不仅要向自己的直系领主尽忠，还要向国王尽忠，国王则有权要求任何一片封地上的自由人向自己尽忠。从长远来看，这部法律其实鼓励了臣属之间

的团结，因为这些人都要向国王、大领主以及次级领主尽忠；他们彼此境况类似，又因为都许过相同的誓言而休戚相关。这种团结后来体现在利用这部法律来反对王权本身的多种方式上，而这一切都是阿马尔利克预见不到的。不过，在颁布伊始，它起到了强化王权的作用。从理论上说，在直系领主与国王发生冲突之时，国王有权要求这些次级领主的支持：如果他们的领主反叛或打算反叛，或者不听召唤到最高法庭应诉，在40天之后他们必须站到国王这一边，而条件是在此后的40天之后，他们必须重新拿到自己的领地。更为重要的是，一条正式与统治者沟通的途径由此敞开，因为次级领主现在也是最高法庭的成员，可以以领主的身份直接向国王提交涉及不公的案件。在基督教世界各处，王室裁判权一般都需要在原告的请求下才启动；相应地，只有在一个普通男女都能凭借省区法庭机制很轻易地将案件提交国王审判的国度，国王才能发挥自己的潜在作用。而在耶路撒冷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大领地都拥有司法自主权，出了王室直辖区域就不再有由王室掌控的法庭。因此阿马尔利克只能采取自己唯一能实施的措施：让原告可以把案件带出领地直接呈递给他。可能是通过虔诚许诺的方式，他也为非封建主自由民设立了类似的渠道。

与许多其他强势的国王一样，阿马尔利克留给继承人的是苦涩的遗产。他曾娶了最后一任埃德萨伯爵的女儿库特奈的阿格尼斯，和她生了两个儿女西碧拉和鲍德温。继位时，在劝说之下，他宣布这段婚姻无效，理由是近亲结婚。之后他娶了拜占庭皇帝的侄孙女玛丽亚·科内玛，她为他又添了一个女儿伊莎贝拉。有证据表明，在他的统治期内，贵族们以及宫廷内的意见分化为两派：一派同情阿格尼斯；另一派支持国王或者在国王及其希腊妻子手下谋发展，这一派中必定也包括了伟大的历史学家泰尔大主教威廉。1174年7月11日阿马尔利克刚一去世，两派的差别立即爆发出来。新任国王鲍德温四世还没有成年，阿马尔利克委托了两个人作为摄政并监护自己的儿子，可是他们一个被暗杀，一个被排挤到靠边站。的黎波里伯爵雷蒙三世是鲍德温四世在王室世系中最近的男性亲属，他成为了摄政，直至国王

于1177年成年亲政。鲍德温四世自然更青睐追随他母亲的人；事实上，他为自己的舅舅库特奈的若斯兰三世在加利利北部设立了一大块封地。与玛丽亚·科内玛走得近以及在阿马尔利克当政后期活跃的人物，发现自己被剥夺了权力和影响力。但大家已经知道，新任国王一直受着麻风病的困扰，他肯定活不长，还经常病得不轻，只能请人代为处理政事，而且他肯定不会有子嗣。

1176年，他的姐姐西碧拉嫁给了蒙费拉的威廉。这可能是耶路撒冷王室成员至此结下的一门最好的亲事，因为威廉与西方的皇帝以及法国国王都有亲缘关系。威廉于次年去世，给西碧拉留下了一个儿子，就是未来的鲍德温五世。但这个孩子也有病，因此以两位女继承人为核心，两大派系此时已经形成：一派拥护库特奈的阿格尼斯之女西碧拉，一派拥护玛丽亚·科内玛之女伊莎贝拉。国王鲍德温四世比较倾向于西碧拉及其第二任丈夫吕西尼昂的居伊。但在1183年，居伊代其执政期间，居伊对鲍德温四世想要获取足够王室收入的要求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加上居伊的政敌们又一直处心积虑地诋毁他，最后鲍德温四世取消了居伊的代理权。鲍德温四世随后将鲍德温五世立为自己的共治者，直接跳过了西碧拉的继承权；并将代理执政权赋予了黎波里的雷蒙，期望他在自己过世后担任摄政。鲍德温四世还额外派了一名耶路撒冷牧首手下的人作为使节前往西方。这个使团的举动非常大胆，他们甚至提出把耶路撒冷的大宗主权拱手赠予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鲍德温四世甚至还同意了这样一项提议：如果他的外甥鲍德温五世早夭，教皇、西方皇帝以及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应该决定由他的哪个女儿继承王位；他似乎恨吕西尼昂的居伊至极，甚至不惜让自己的姐姐、因此也包括他自身的合法权利受到质疑。

1185年鲍德温四世去世，1186年8月鲍德温五世去世。这个总是非常需要强有力人物执政的王国，此后经历了12年的无效统治期；因为两位同父异母的姐妹为了继位而争斗，两人各有拥趸。可这偏偏又是穆斯林势力重又变强势而且变得比之前更加团结的时期。

## 保卫定居点

在这样一个边疆社会中，生活必定为军事上的必要性所左右。除了绝对需要控制住海岸线之外，拉丁人对这一地区的占领似乎并没有什么非常宏大的战略原则。如果出现了可以攫取领土或者占领某条可以征税的贸易路线的机会时，区域占领的范围就会扩大一些。是否有效地对某块地区的行使权威，依赖于对城堡或有围墙的城镇的占领，这样行政管理和防御事务才能展开。这些因素，以及人力长期不足，导致要求防御工事必须坚固到只用很少的人力就能够完成，这使得修建城堡的工程非常多。乡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城堡，从简单的一室加一塔城堡（一般环绕着一道外墙），到带有大片围墙围住区域（当地居民及其牲畜可以躲进来避难）的山顶城堡，再到城镇的中央城堡以及先进的多层同心圆城堡。艾伦·布鲁姆博士最近提出，同心圆城堡的出现，是为了应对穆斯林开始将投石器用于进攻的情况，而这原先是仅用于防御的。一旦入侵，敌人的第一目标肯定是夺取这些要塞，因此最重要的是留一支军队在城外以对入侵者构成骚扰和威胁。另一方面，如果控制住通往某战略要地——比如阿勒颇或阿斯卡隆——的各条道路，并建立堡垒不断向城中的防御者施压，时间一长，攻城目标自然就能实现。

102

因此，拉丁人的攻占与穆斯林的反攻之路都以占领要塞并修建或加固防御工事为特点。但这一过程非常随意，只要随意浏览一本地图册就能发现。埃德萨很早就被占领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拉丁定居点的东北角会凸出一块。到1153年，南至戴尔拜莱赫的整条海岸线都已被占领。而往内陆去，由奥龙特斯河、利塔尼河和约旦河勾勒出的裂谷则只在某些点上越了过去，尤其是在北面通往阿勒颇的道路，以及南部的外约旦领地，这片领地一直延伸到了亚喀巴（‘Aqaba）湾<sup>①</sup>。在其他地方，定居点局限在了沿海一带。

---

① 红海伸向东北方的海湾，在阿拉伯半岛和西奈半岛之间。——译注

攻占进程缺乏任何战略考虑也体现在下列事实中：想要证明定居者们有统一的边境防御体系的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有些重要山口穿越山脉通向沿海平原，比如吉斯尔舒古尔（Jisr esh Shughur）附近，以及骑士堡周边一带，在这些地方城堡的数量多得超乎寻常；但在其他一些地方，比如从大马士革通往泰尔和阿卡的主要道路上，大部分时期都没什么防护。

来自西方的定居者们所依赖的资源始终不足。在一份不太完整的约1180年为耶路撒冷国王服务的骑士名单上，有675位骑士的名字；如果我们估计总数在700人左右，应该不会错得太离谱。在早期，安条克公国似乎能招募到大致与这个数目相当的人员；不过随着12世纪中期领土的大量流失，这个数字肯定会下降。埃德萨的骑士数量大概是500人。的黎波里肯定能招募到100人。在整个王国的封建体系内，能提供服务的骑士人数，在拉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整块区域的鼎盛时期可能也不超过2000人。对这样一块暴露程度如此之高的定居地来说，这个数量是严重不足的。更何况，大多数时候，即使要召集起全部人员中的一大半也不太可能。从相对而言很早的时候开始，耶路撒冷王国的领主们就表现得非常厌恶到“国外”去服役，他们甚至把安条克也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要召唤他们去参与这样的军事行动往往都需要经过扯皮谈判，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必要性，根本就不能强制他们出兵。这已经形成惯例。即使是在王国内的服务，虽然理论上说可以长达一年，但没有哪位国王会忽略领主们是否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一问题。更何况，无论在何时，总有一些封地是由未成年人或过了能服兵役年龄的老人，或者是还没结婚的女继承人，或者是正在生病的领主所拥有，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出兵。如果耶路撒冷依赖的各块领地能够一次性派出大概500名骑士上阵，那就已经非常让人吃惊了。

此外，耶路撒冷的骑士们还可以征召教堂、修道院和城镇的护卫们来帮忙。在1180年前后，这股军事力量可能有5025人。但事实是，他们只在紧急情况下才偶尔应召服役。这表明他们并没有接受什么很好的训练。在危机时刻骑士们也可以对全民发出征召令，但我们几乎无从知晓以这种方式征



召来的队伍到底质量如何，或者派上了什么用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12世纪的时光慢慢流逝，武装骑士团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前面我们就已经谈到，骑士团的骑士及仆从数量一直都不太多，他们通常只是充当雇佣军的指挥官，而且他们所承担的沉重军事责任往往都几乎把他们压垮。

显然，定居者们拥有的作战资源非常少。他们得到支持的方式有五种。第一，雇佣兵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中有很大一群人是以穆斯林的装备方式战斗的，被叫作“突厥之子”（*Turcopoles*）。拉丁东方是他们的主要雇主，但这当然还要取决于定居者们是否能够筹集起足够的现金付给他们。但这一直没能实现。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会定期往这里送大批金钱的原因——例如，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会送来金钱，酬谢他们帮忙谋杀了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sup>①</sup>——以及为什么耶路撒冷王国会在1183年向全国开征一项专门税。第二，有一批短期军事力量（*milites ad terminum*），即短期十字军战士，他们在最早的定居点时期就已出现，并贯穿十字军运动的始终。这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虔诚而前来服役一段时间。他们创设的传统和十字军运动延续的时间一样长，他们的继承者就是日后在14、15和16世纪背井离乡，为支持普鲁士、罗得岛和马耳他岛的条顿骑士团及圣殿骑士团而战的人们。第三，每年从欧洲前来的朝圣者们也往往响应召唤，在紧急状况下施以援手。但我们后面会看到，他们朝圣之旅的性质带来一个前提条件，即他们只有在敬拜过圣地之后才可拿起武器。第四，意大利商业社群，尤其是来自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的人们，有时候也会回应求援呼声，尤其是当某座沿海城市有陷落危险之时。第五，还有一股力量就是我们在下一章里将要谈及的那些十字军战士。和此处有关联的是，定居者们定期就会向欧洲求援。而且从12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用以强调自己求援之重要性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但却不总能定期地得到回应。

当然，定居者们相当孤立，因为他们已经疏远了近在身边的唯一一股强

<sup>①</sup> 亨利二世的大法官，原本和亨利二世关系密切，但在当上坎特伯雷大主教后，作为教会的代表与亨利二世反目。——译注

大的基督教力量——拜占庭帝国。他们也没办法影响伊斯兰世界中各种政治事件发生的进程，然而他们的生存却取决于此。在12世纪早期，近东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安条克和埃德萨起初面对的是阿勒颇和摩苏尔的势力；在1133年之后又加上了一个由阿萨辛派建立的独立要塞，这个据点虽然小但非常有杀伤力。阿萨辛派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的分支，以暗杀作为手段来推动自身目的的达成。在黎波里的边境地区，有一群较小的城市及公国塞伊扎尔、哈马（Hama）和霍姆斯。耶路撒冷则要在东面面对大马士革，在南面面对埃及。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造成的最初那股震撼效应之后，虽然过程并非全然和平，大多数小的伊斯兰国家的反应都是与定居者们达成暂时妥协（*modus vivendi*），因为基督徒们已经将自己嵌入了当地本已复杂且充满暴力的政治体系中，而且当时正处于进攻的一方。但埃及马上开始了反攻，从1110年开始，伊拉克的塞尔柱苏丹国也发起了反攻。伊斯兰势力一方也很快发展出了吉哈德圣战的概念，虽然最初仅有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少量宗教领袖在宣扬，但很快就在1119年血田战役与基督徒对阵的军队中得到普遍体现。1124年在阿勒颇，这种观念再次显现，当时该城遭到基督徒围攻，但得到摩苏尔总督阿克松古尔·伯苏基（Aksungur al-Bursuki）带兵解围。伯苏基随即将阿勒颇并入自己正着手创立的大王国，可惜他于1126年11月被阿萨辛派刺杀身亡。1127年5月，他的儿子马苏德（Ma'sud）又突然去世，伯苏基创立的联盟岌岌可危。幸好此时伊马德丁·赞吉被任命为摩苏尔的总督。赞吉于1128年6月进入阿勒颇，随即发动了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其对象不仅限于基督教领土；比起叙利亚来，他其实更关注伊拉克。但在1135年，他夺取了阿塔里布、泽尔丹（Zerdan）和迈阿赖努阿曼。1137年，他夺取了位于黎波里伯国边境地区的巴林（Ba'rin）。1144年，埃德萨伯爵和一个伊斯兰近邻结成防卫同盟，掺和进了对抗赞吉的战事。赞吉遂乘机占领了埃德萨伯国东部的一些要塞；又借伯爵若斯兰二世不在国中、防卫虚弱之机，于11月24日兵临埃德萨城下。圣诞前夜，赞吉攻入城中，大肆洗劫。两天后，城堡主塔亦陷落。

我们后面会看到，拉丁人在东方建立的第一个国度的首都陷落，这在西方引起了极大反响。但在穆斯林一方，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广泛而自发的反应。在汹涌而来的赞誉和大肆推崇潮之中，吉哈德的观念彰显起来，而这在赞吉进军之前只能偶尔听到。赞吉得到哈里发授予的诸多荣誉，他借机反攻本土，攻占叙吕奇，围攻比雷吉克，但在1146年9月14日晚上他被自己的一名奴隶刺杀身亡，而他的领土被自己的两个儿子一分为二。幼子努尔丁得到了阿勒颇。因为他没有继承摩苏尔，所以他也不会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因东边肥沃新月地带的政治形势而分散精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手握的资源也更少。虽然他年纪尚轻、经验不足，但当基督徒们想要利用他父亲逝世的机会夺回埃德萨时，他却迅速带兵驰援埃德萨守军，充分显示了自己的不凡气概。随后，他与塞尔柱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结成进攻同盟，共同攻打安条克；他们攻占了扼守着自阿勒颇平原通往安条克干道的哈卜和凯费尔-拉塔（**Kefer Lata**）。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努尔丁又重启战端。他的军队在得到大马士革援军支持的情况下，于1149年6月29日大败一支人数处于劣势的安条克军队。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在他自己眼中，同时也在他的同代人看来，他成了信仰的宣扬者。他尽一切可能利用和宣扬吉哈德，如通过诗歌、信件、条约、教谕和铭文的手段。它主要体现在两个主题上：一是从基督徒手中重新征服沿海地带的义务，尤其是耶路撒冷；二是确信要达成这一目的，穆斯林必须在宗教和政治上团结起来。作为重新兴起的道德力量的领袖，努尔丁采取措施打击什叶派及其他被他认定为异端的教派；他还积极鼓励建立学校、清真寺和苏菲派修院。

1149年初秋，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乌努尔去世；努尔丁的兄长——摩苏尔的统治者也在这年过世。努尔丁收取摩苏尔的企图受到阻挠，他的另一个兄弟被立为那里的统治者。他直到1170年才得到这座城市。不过，努尔丁却迫使大马士革承认了自己的宗主权，并联合罗姆国苏丹占领了埃德萨伯国残余的领土。这个伯国幸存的最后一个要塞蒂尔贝沙，在1151年7月12日投降。1154年4月，努尔丁终于直接控制了大马士革；而随着1155年6月

巴勒贝克 (Ba'alhek) 陷落，伊斯兰叙利亚的统一完成。接下来的数年里，他忙于巩固自己的帝国，不过他也利用耶路撒冷集中关注埃及的时机劫掠了北部定居点，围攻哈利姆，并于 1164 年 8 月在阿尔塔让基督徒们蒙受了一场惨痛的失败。此战中，安条克的博希蒙德三世、的黎波里的雷蒙三世、拜占庭王公科勒曼和西方的来访者吕西尼昂的于格八世都沦为了阶下囚。几天后，哈利姆投降。不过，努尔丁也非常关注阿马尔利克国王对埃及的入侵，而且最终努尔丁在那里取得的成功比在耶路撒冷王国境内的还要大。1164 年、1167 年和 1168 年，他手下的将领谢尔库 (Shirkuh) 带头干预埃及的局势，并于 1169 年成为那里的维齐尔。埃及开始承认努尔丁的宗主权。

1174 年 5 月 15 日，努尔丁去世。他的统治让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图景发生了改变。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小国家已经被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叙利亚所取代，埃及也处于其庇荫之下。基督徒一直以来都非常害怕近东的穆斯林会联合起来。不过，正如我们可以预想到的，努尔丁死后，他手下的官员爆发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打的旗号是为了护卫他年幼的儿子。这些官员中的一个就是萨拉丁。他此时已接替自己的叔父谢尔库出任埃及的维齐尔，并遵循努尔丁的命令于 1171 年 9 月在那里废黜了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尊奉正统的逊尼派阿拔斯哈里发。以统一伊斯兰世界为名，萨拉丁在 1174 年 10 月占领了大马士革，随后取道霍姆斯和哈马进军阿勒颇。他在霍姆斯遭遇了顽强抵抗，费了很大劲才控制了哈马。第一次攻占阿勒颇的尝试也失败了。但在 1175 年 4 月，他在哈马角战役中大胜自己的穆斯林反对者。哈里发正式授予萨拉丁埃及以及他所占领的叙利亚领土的管理权，之后，他继承了努尔丁的旗号，号称要进行针对基督徒定居点的吉哈德圣战，以实现宗教和政治上的统一。

萨拉丁是个务实的人，做事脚踏实地，他的主要目标——重新统一努尔丁的领土，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实现。到 1183 年 6 月他攻取阿勒颇时，部分摩苏尔的附庸也已经掌握在他手中。1186 年 2 月，摩苏尔自身也承认了他的宗主权。在这些年间，他频繁发动针对基督徒的战事，但它们似乎并没有

像统一事业那样占据他那么大的精力和资源。1177年，他计划对阿斯卡隆和加沙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袭，但却于11月25日在吉萨（Gisard）山意外受阻而退兵。1179年春夏，他的军队在哈拉丘（Tell el Hara）和迈尔季欧云（Marjayoun）取得大捷，之后，位于吉瑟巴纳雅库布（Jisr Banat Ya'qub）的一个尚未完工的基督徒要塞被夺取并毁坏。但在1182年，他侵袭贝鲁特却没有成功。1183年，他劫掠加利利期间，没能引得耶路撒冷王国的军队与其交战。那一年的11月外约旦的卡拉克（Karak）抵御住了他的攻势，1184年的八九月间又再次让他无功而返，尽管后一次进攻时他率领着当时他所能召集的规模最庞大的军队。在1170年、1171年、1173年、1177年、1179年、1180年、1182年、1183年和1184年对拉丁定居点的侵袭中，萨拉丁少数拿得出手的成果就是1170年攻占了红海沿岸的亚喀巴，以及1179年毁掉了位于吉瑟巴纳雅库布的那座未完工要塞。

然而，他的野心让他绝不会就此止步，因为他所致力战事只有依靠进一步征服才能获得经济上的支持。据说，他利用埃及的财富征服叙利亚，利用叙利亚的财富征服半岛（Jazira），利用半岛的财富征服沿海，而沿海的财富当然就用来征服拉丁定居点。他的财政状况始终非常紧张，因此，不言自明的是，他的“帝国”的根基非常不稳固，完全依赖他个人人格的力量与阿拔斯哈里发政权的微妙关系。但是，他的事业却可以在此时达到巅峰，其实可以说是因为运气，因为基督教势力在此时非常虚弱而且四分五裂。

107

因此，这一地区纷争战事的政治背景大体可以概括如下：直到1128年，安条克、埃德萨以及在较轻的程度上也包括的黎波里，它们都要与拜占庭帝国对峙。拜占庭从来没有完全原谅拉丁人占领安条克和西里西亚的部分领土，曾派兵在1099年、1100年、1104年、1137年、1138年、1142年和1158—1159年进入这一地区。耶路撒冷还必须面对一系列的伊斯兰小国，但从中渐渐崛起了摩苏尔和阿勒颇的联盟、小亚细亚的罗姆苏丹国，以及阿萨辛派建立的怪异但独立的小公国。另一方面，直到1169年，耶路撒冷都

面对着大马士革和埃及这两大主要势力。随着努尔丁把埃及纳入一个已经将大马士革囊括在内的帝国，拉丁定居点在东面和南面边境上都面对着一个统一的敌对联盟。无论这个联盟内部的连接纽带多么脆弱，它都切实地威胁到了拉丁人。

拉丁定居者们自身的军事行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到 1130 年前后，以两位领袖的死亡以及赞吉的掌权告终。这两位领袖——耶路撒冷的鲍德温二世和埃德萨的若斯兰一世——都是第一代定居者中的幸存者。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拉丁人高歌猛进。当然，在最开始，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们必须要击退埃及人的多次反攻，这些埃及人誓要夺回失去的领土。在 1101 年、1102 年、1103 年、1105 年、1106 年、1107 年、1110 年、1113 年、1115 年、1118 年和 1123 年，基督徒们都遭遇了埃及人的侵袭，而且往往是以阿斯卡隆作为推进的大本营。1107 年之后，这类进攻主要是由阿斯卡隆守军发动的劫掠。但这种劫掠构成了切实的威胁，因此，在 12 世纪 30 年代，牧首和耶路撒冷的市民们在犹大山脚下修建了一座城堡艾尔瑙堡（Chastel Hernaut），以保护通往本城的道路免受埃及劫掠者骚扰；而富尔克国王则修建了一连串的堡垒来制约阿斯卡隆的驻军，其中就包括他赏赐给圣殿骑士团的那座。

基督徒们还试图减少不受控制的沿海港口的数量，这一策略主导了此后的 25 年，一直得到稳步的推进。沿海的安条克公国及其广阔的腹地往南延伸直至巴尼亚斯。而从巴尼亚斯至贝鲁特之间的空隙又因的黎波里伯国的建立而填满。在南边，布永的戈弗雷死后，海法陷落。阿尔苏夫和凯撒里亚在 1101 年被夺取，阿卡在 1104 年，贝鲁特和西顿在 1110 年，泰尔在 1124 年，最后是阿斯卡隆，在 1153 年。至此，基督徒们控制着从伊斯肯德伦到加沙的整条黎凡特海岸。这就保证了他们可以从陆路返回安条克，再从那里进入小亚细亚。但从长远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其对海上交通的影响。

东地中海的地理状况由几个因素决定：盛行的西风以及西北风；由从达达尼尔和直布罗陀海峡流出，再流经希腊沿海以及北非沿海异常凶险的水流

造成的各股洋流；还有就是南岸和北岸截然不同的海岸线。非洲的海岸非常危险，离陆地很远的地方就有浅滩，而且没有容易辨识的地理特征。而岩石丛生的地中海北岸之所以对航海者们充满吸引力，却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特征。因此，传统上，从西部驶来的船只总是尽可能沿着地中海北岸航行，最后才转向黎凡特。穆斯林手中握有的一样潜在武器就是埃及的大帆船舰队，它可以骚扰西来的船只，并切断这条越来越成为定居者与西方来往主要道路的航线。当然，想要有效实行骚扰，这支舰队需要有规律的淡水供应，但海岸线被基督徒占领使得它没有办法得到充足的供水，也就无法发动足够规模的针对地中海北岸航线，尤其是各条航线的交会点——塞浦路斯周边海域——的侵袭。

在北部，安条克和埃德萨的定居点逐步扩张，双方开始接壤；不过在某些靠近海岸的地区，进展十分缓慢。通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路在1118年时仍然不够安全，西顿和贝鲁特的腹地直到12世纪20年代后期才逐渐纳入掌控范围。与此同时，定居者们也在向内陆突进。早在1099年秋，唐克雷德就已经推进到了加利利海以东。而从1115到1116年间，阿拉伯谷（Wadi Araba）的东岸，直至红海一带都有拉丁驻军。拉丁人在加利利海以东的扩张引发了大马士革方面的担忧。直到1115年，东部边境一直有小型的战事发生。1119年，对抗重启。1113年，鲍德温一世在辛纳布拉（es Sinnabra）大败；同年，以及在1121年和1124年，穆斯林都侵入了加利利。

从1110年起连续五年，北部的拉丁定居者都遭受了打着伊拉克的塞尔柱苏丹国旗号的敌人的反攻。除了1112年和1114年反攻规模比较小外，其他三年面对反攻时，基督教统治者们都合力经受住了进攻，对敌军形成了威胁，但并没有形成大规模攻势。只有在1115年，安条克的摄政萨勒诺的罗杰打了穆斯林一个措手不及，在达尼斯丘（Tell Danith）附近取得了一场胜利。这终结了伊斯兰势力前一阶段的攻势，但在1119年的血田战役中，罗杰在没有盟友掩护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最终致使对阿勒颇形成威胁的多个

基督徒要塞失守，虽然其中有几个之后又收复了。基督徒对内陆地区中颇具吸引力的两大战利品阿勒颇和大马士革都持续施压。阿勒颇在 1100 年遇到险情，在 1125 年被围攻；而大马士革则在 1126 年和 1129 年遭到攻击。充分体现这一时期基督徒们确实充满信心的事例包括：1118 年，鲍德温一世在入侵埃及途中去世；而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鲍德温二世在两条战线上都向穆斯林挑起了战端。

第二阶段从大约 1130 年持续到 1153 年。这个阶段中拉丁人总体处于劣势，但是他们还是有能力偶尔瞅准机会发动几次进攻。有人已经指出，这个时期的一大特征是，基督徒已无力收复丧失的领土，这与第一阶段形成鲜明对比。埃德萨、穆迪克堡（Qalaat el Mudiq，即阿法米亚 [ Afamiyah ]）已彻底失去；哈利姆和巴尼亚斯仅收复了一小段时间后又失去了。此外，基督徒只发动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进攻，而且都是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完成的：1137 年与希腊人合作针对塞伊扎尔，以及 1148 年与第二次东征的十字军合作对战大马士革。

第三阶段从 1153 年到 1169 年，以鲍德温二世占领阿斯卡隆为开端，以阿马尔利克与希腊人联手侵袭埃及为最大特征。这些行动自然会让基督徒们进行多次围城战：1163 年、1164 年和 1168 年对比勒拜斯；1167 年对亚历山大城；1168 年对开罗；以及 1169 年对达米埃塔（Damietta，即杜姆亚特 [ Dumyat ]）。这些进攻耗尽了王国的资源，还让基督徒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从 1164 年开始，他们的每次进攻都遭遇了从叙利亚派往埃及的援军的阻挠，基督徒最终的失败则把这个国家留给了努尔丁。

第四阶段从 1169 到 1187 年，是定居者们收缩防守的时期。萨拉丁定期（虽然并没有全神贯注）侵袭耶路撒冷王国；而基督徒们发动的唯一一次大规模攻势是 1177 年对哈马和哈利姆的进攻，利用了佛兰德斯的菲利普公爵来到王国，以及一支拜占庭舰队抵达此地的情况。这些年里的英雄是患有麻风病的年轻国王鲍德温四世，他虽然在病中，但仍然确保了每次受到进攻都有相应的基督徒军队来应对。基督徒们应战的任务不是要和敌人一决高下，



而是为了阻止敌人夺取城堡或城镇的尝试。

## 哈丁之战与耶路撒冷失守

然后是萨拉丁 1187 年发动的入侵。就在此前，耶路撒冷的政治危机达到了顶峰。1186 年 8 月鲍德温五世死后，当选的摄政的黎波里的雷蒙通过联姻成为加利利的领主，王位争夺者伊莎贝拉这一派的领袖被说服前往提比里亚，而小国王的尸体则送往耶路撒冷由圣殿骑士照看。西碧拉派占领了阿卡和贝鲁特，而西碧拉本人及近侍骑士则匆匆赶往耶路撒冷，在那里与他们会合的是外约旦领主沙蒂永的雷纳德（Reynald of Châtillon）。西碧拉还得到了圣殿骑士团团长以及牧首的支持。她在圣墓教堂接受加冕，之后她又亲自加冕了自己的丈夫吕西尼昂的居伊。

伊莎贝拉的拥趸们遭遇了挫败，但他们随即公开挑衅式地聚往纳布卢斯，甚至计划要加冕伊莎贝拉及其丈夫托伦的汉弗雷为王，但汉弗雷撼动了他们的根基，因为他选择了逃跑，到耶路撒冷向居伊和西碧拉投诚。这一事件结束了这场反叛，到 10 月时已终结。大多数封地都选择了和平过渡，但的黎波里的雷蒙在盛怒之下没有接受和平条款而迁往提比里亚，并一直在那里坚持到次年夏天；之后，因为发生了一场他必须要负责任的灾祸，他实在无法再坚持自己的立场。此前，基于自己作为领主的权力，他曾独立与萨拉丁缔约。1187 年 4 月末，根据和约规定，他允许一支穆斯林侦察队进入加利利。但恰在此时，居伊派来一个使团。该团由玛丽亚·科内玛的第二任丈夫、纳布卢斯领主加利利的巴里安率领，其他领导人还包括泰尔大主教以及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团长。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无视雷蒙要他们待在阿弗拉城堡内直至穆斯林军队离开这个区域的警告，莽撞地发动了袭击，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两个骑士团的团长全都被杀。

与此同时，萨拉丁一直在寻找机会打破他 1185 年与基督徒缔结的和约。

外约旦的雷纳德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雷纳德多年来一直坚持己见，对穆斯林实施极为冒险而激进的敌对政策，发动穿越西奈深入阿拉伯半岛北部直至泰马（Tayma）<sup>①</sup>地区的袭击。他甚至还派遣了一支海军舰队进入红海劫掠商船，送一支军队在汉志（Hijaz）<sup>②</sup>的拉比格（Rabigh）<sup>③</sup>登陆；这支队伍显然行进到离麦加仅有一天路程的地方才被阻截。雷纳德此前刚刚袭击了一艘从开罗驶往大马士革的大帆船，并拒绝归还劫掠的战利品。在1187年5月末，萨拉丁在浩兰（Hauran）<sup>④</sup>的阿什塔拉（el‘Ashtara）阅兵。到那时为止，这是他指挥过的规模最庞大的军队，大约有3万人，其中有12000名重骑兵。6月30日，他率军在加利利海南缘穿越了约旦。基督徒们按照常规的反击方式组织了防卫，将军队集中部署在色佛黎（Zippori）<sup>⑤</sup>。虽然其规模小于萨拉丁的，但也比平常的规模更大。基督徒们集中了王国的资源，派出了约2万人上阵，其中有1200名骑士来自耶路撒冷、黎波里和骑士团，另有50人来自安条克。遵循在危急关头的一贯做法，他们携带了绍克的阿努夫于1099年在耶路撒冷发现的王国中最神圣的遗物——真十字架的碎片。

萨拉丁接下来分兵行进。7月2日他袭击了提比里亚。城墙上的一座瞭望塔很快就被炸开，城镇被攻占，不过守军带着的黎波里的雷蒙的妻子艾斯奇瓦（Eschiva）退入了城堡主塔。萨拉丁军队的主力并不在提比里亚，而是驻扎在了大约6英里开外的卡费-萨布特（Kafr Sabt）。在拉丁人的阵营中，一场激烈的争论发生了。黎波里的雷蒙此时完全不被人信赖，但他建议居伊国王不要继续进军，甚至建议他坐着提比里亚陷落。除了作为一

① 位于今沙特阿拉伯西北部塔布克省境内的绿洲古城，从青铜时代起就有人居住。——译注

② 位于今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地区。——译注

③ 今沙特阿拉伯的城镇，位于该国西部红海沿岸，由麦加省负责管辖，处于吉达以北约100公里。——译注

④ 今叙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区域，其地理特征是火山活动形成的高原。——译注

⑤ 今以色列城市，位于加利利地区，在拿撒勒西北方6公里，是一座历史古城。在这里充满了希腊化时代、罗马、拜占庭、伊斯兰时期、十字军时期、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译注

位封建宗主对处于危难中的封臣负有的义务外，居伊四年前的经历可能也促使他放弃了这一合情合理、公正无私的建议。四年前，居伊还是鲍德温四世的代执政官，但在萨拉丁于1183年9月入侵加利利时他没有与其正面交锋，这使得他遭到了猛烈的责难和抨击。而这一系列批评又导致了一场针对居伊的恶意抹黑运动，最终导致他失宠，致使他的妻子失去王国的继承权，也使得黎波里的雷蒙代替他成为鲍德温五世的摄政。无论原因如何，居伊最终决定继续进军。7月3日，基督徒军队开拔，取道距提比里亚大约9英里远的图然泉（spring of Tur'an）。在行军途中，军队打了一场持续两天的战役。好不容易得以继续前行了，又与穆斯林军队的侧翼交锋，结果被切断了后路，无法再返回图然的水源地。而萨拉丁却占据着绝佳地势——此地与延伸向提比里亚的陡坡之间的高地。到傍晚时分，基督徒们被迫停在了一个离既定目标很远的地点，而且没有水源。第二天早上，他们又热又渴，试图继续前行，却逐渐被逼迫着偏离了大路，进入北面的一块荒地。黎波里的雷蒙和一小队人马，包括西顿和纳布卢斯的领主，成功穿越穆斯林的防线突围逃脱；但大多数基督徒围绕在居伊身边、毫无希望地被困在一座名叫哈丁之角的双峰小山上。士气低落的幸存者最终沦为阶下囚。真十字架的碎片也被夺走，而且被倒挂在一根长矛上在大马士革巡展了一番。

这场惨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众多城镇和要塞此时都已经没有了守军，萨拉丁如狂风骤雨般扫遍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各地，兵不血刃。到9月，黎波里以南所有的重要港口，除泰尔以外全部落入他的手中。巴勒斯坦沿海的内陆地区，到1189年1月时只有博福堡（Beaufort，又名沙奇夫堡 [Qalaat esh Shaqif]）还在基督徒手中，但它也在1190年陷落。在黎波里伯国，只有首府、塔尔图斯市镇、两座圣殿骑士团城堡以及医院骑士团的骑士堡还在基督徒手中；在安条克公国，只有首府及古赛尔（Quseir）和马卡布两座城堡幸免。耶路撒冷城在遭受了长达14天的围攻后于1187年10月2日陷落。负责守城的纳布卢斯的巴里安，只得让所有年满16岁的贵族少年充当

骑士，并且另外依靠了 30 名市民，才苦苦支撑至此。萨拉丁允许城中众人（因收容了周边地区的大量难民而规模急剧膨胀）以十分宽容的条件赎买自由，因此至少有一部分人得到了释放，尽管其中大多数人为尝试在仍由基督徒控制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城镇中寻得庇护，还得经历更多的艰难险阻。圣殿区域重归伊斯兰教。圣约翰医院改建成了一所什叶派学院。基督徒占领耶路撒冷仅仅 88 年后，又再次失去了这座城市。

## 第五章

### 成长中的十字军运动（1102—1187）

#### 十字军战士还是朝圣者

在西欧人对 1187 年巴勒斯坦蒙难的消息做出的各种反应中，十字军运动渐渐走向成熟。此时距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已有 90 年，而在 12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运动始终都处于起步阶段。前面我已经谈到，在 1107 年前后，针对十字军的胜利，三位博学多识的法国僧侣“僧侣”罗贝尔、诺让的吉贝尔和布尔盖的鲍德里是如何将早期十字军战士做出的非常粗陋的解释，转化为在神学上可以接受的解释的。在这种新解释中，各种事件被揭示为上帝施行神迹进行干预的证据，十字军战士则被刻画为暂时过起修道院生活的俗人，他们在一定时期内脱离了俗世，加入到一个流动的宗教社群里；这个社群的成员们自愿奔波迁徙，出于对上帝和邻人的爱而往远方去作战。他们因兄弟情谊而团结一心，遵循一种十字架所指引的生活方式，这能够让他们献身殉道。这种表述方式对教会来说非常有用，罗贝尔和鲍德里所著的史书得到了广泛的阅读，但却不能就俗人之角色这一神学问题提供一劳永逸的解答。这需要依赖在 12 世纪的进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对他们所负“圣职”的更深入理解。用好像他们并不是俗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并不能真正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无论如何，这种理论化是从较高层次提出来的。如果观察一下十字军运

动的实际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含糊不清的地方，以致历史学家可以质疑这一运动是否真的存在过。个人可以在任意时刻接受十字架，而不需要教皇发布公告这一先决条件，这是有可能的。就在耶路撒冷解放前夕，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将十字军运动的概念及宏大阐述运用在任何其推动者和参与者觉得很重要的冲突事件中。曼恩的埃利亚斯（**Helias of Maine**）伯爵非常虔诚，也发下誓愿要加入十字军，但他拒绝加入第一次东征的队伍，因为英格兰的威廉二世对他的封地构成了威胁。据说他在反击时就身佩十字架，好像他个人就是在进行一场圣战似的。另一则值得注意的宣传材料是1108年在马格德堡编纂的，文中试图将德意志对易北河对岸的文德人发起的战争描绘成十字军行动：

113 效法高卢的居民们立下的好榜样，并将此付诸实践……他，凭借勇武之力率领高卢人从遥远西方进军，战胜那身在最遥远东方的敌人。愿他赐予你意志和力量，去征服近在身旁的这些最无人性的异教徒〔文德人〕。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赎罪战争的观念从叙任权之争中发展出来。趁它受十字军胜利的推动而风头正劲，教会改革的倡导者们也迅速对这一观念加以再利用，将其用在了之前更早的与买卖圣职者（**simoniacs**）<sup>①</sup>的斗争上。

另一方面，十字军战士是很容易辨识的。看到那些“接受十字架”（这表明他们已经许下了誓言）的人，所有人都会知道，一场远征正在筹备中，或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往往并没有关于当时的男女的视觉图像资料，而只能依赖于文字证据。这些证据通常含糊不清，有时候我们很难把十字军运动与朝圣行动区分开来。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与赎罪和携

① 据圣经记载，使徒们在撒马利亚传道时，巫师西门（**Simon**）十分羡慕使徒们所拥有的授人圣灵的权柄，想用钱买通使徒来获取，受到了彼得的斥责（使徒行传 8:9-25）。故英语中将买卖圣职的行为称作“**simony**”，将买卖圣职者称为“**simoniac**”。——译注

带武器有关的规则已经有所更改。在这之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被认为不应该携带武器，这种观念深深地渗入了时人的思想，因此一待阿斯卡隆战役确保了耶路撒冷的安全之后，原先普遍的赎罪朝圣观念就又流行起来。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做，但很多十字军战士扔掉了自己的武器，只带着能证明他们完成了朝圣之旅的棕榈叶踏上返乡的路途，而罔顾这样的事实，即返程之路至少在其起始阶段，也必定像东征本身一样充满了危险，虽然此时的危险已并非主要由穆斯林造成。一位诺曼人十字军战士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图示，描述了可能存在的危险。他和其他 1 400 多人一起，在海法挤上了一艘大船。在向北航行的途中，船遭遇了风暴，在塔尔图斯沿海失事。此时的塔尔图斯已经是一片废墟，空城一座。乘客们在城中搜劫了一番，但因为担心会遭到穆斯林的袭击，有近 100 人登上了一艘驶向塞浦路斯的亚美尼亚船只。

重新遵循为赎罪者设定的传统规则，也体现在一封著名的信件中。这封信是沙特尔的伊沃主教在 1102 年写给教皇帕斯卡尔二世的。十字军中一名英雄兰博·克罗同（Raimbold Croton）让一位僧侣管理他在附近占领的一座修道院，并允许（可能是命令）修道院的仆役将其改换用途，堆放从旁边一块兰博已据为己有的田地中收割的干草。伊沃在信中描述了他的决定及其影响：

我们拿走了兰博的武器，并对他施以苦行赎罪惩罚，为期 14 年，方式是他不应吃任何堪称奢侈的食物……他起先顺从地接受了，但之后，他不断请很多要人来为他求情。他诚挚地恳求说，他允许使用武器是因为他的敌人一直在骚扰他。这让我们实在困扰。

因为兰博在夺取耶路撒冷的战斗中失去了一只手，他实在不太可能非常灵活自如地用剑。关键在于，如果他在 14 年内都不能武装的话，他的地位肯定会受到影响。不堪其扰的伊沃让兰博带着这封信前往罗马朝圣；他写道，朝圣之旅的苦行赎罪性质可能会让教皇心生怜悯。一个稍晚些的例子是 1172 年“狮子”亨利的朝圣之旅。亨利可能带了多达 1 500 人的队伍，当发

现自己在保加利亚被一支塞族军队阻挡去路时，他们重新拿起了武器——但却是在很不情愿且并不坚决的情况下，因为塞族人很快就逃走了。这些德意志朝圣者们觉得他们必须以所面临的威胁来说明他们的举动是合理的。

确定无疑的是，在 1100 年以后，被描述为朝圣者的人们经常在巴勒斯坦参与军事行动。其中有一些人的确是十字军战士，比如圣吉尔的雷蒙之子贝特朗，他最终在 1108 年参与了占领黎巴嫩沿海的行动，并发誓侍奉“上帝和圣墓”。但也有一些人并不是十字军战士，而是明确的朝圣者，不过时刻准备参与战斗。沙特尔的富歇（Fulcher of Chartres）当时正在巴勒斯坦，他在 1105 年时说埃及人正在准备入侵，“因为我们的数量如此之少，还得不到普通朝圣者的帮助”。而在 1113 年他写道，“在这些海外领土，这段时期以来，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增长，这是常态，因为朝圣者们的到来”。

因此，朝圣者们是可以拿起武器的。但事实表明，他们的军事服务遵循一种特定的模式。他们似乎要等到完成了自己的宗教义务之后，才会志愿服务。一群英格兰人、弗莱芒人和丹麦人来到这里，在朝拜了各处圣地之后，他们帮忙筹划了对西顿的进攻。这群人可能就是朝圣者。与他们情况相同的是 1107 年组织了一支庞大舰队从卑尔根出发的一群挪威人，其首领是与两位兄弟共享王位的国王西格德（Sigurd）。在优游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西西里之后，他们在 1110 年夏天抵达阿卡。西格德被说服了，决定帮助鲍德温国王夺取西顿城。但挪威人只在去过耶路撒冷之后才同意相助，因为基督命令“他忠实的追随者们先要寻求上帝的国，然后才去寻找他们各种有益之物”<sup>①</sup>。1153 年，当王国的军队在围攻阿斯卡隆时，朝圣者们都被禁止返回西方，除非他们已经出手帮助过围城的军队。1183 年 10 月，就在返乡旅途即将开启之时，另一些应该已经去过耶路撒冷的朝圣者被号召作为步兵服役，加入与萨拉丁在耶斯列谷（Jezreel Valley）对阵的军队。因此，12 世纪的朝圣者的行动恰好与最初的朝圣者相反：他们拿起了武器；而之

---

① 语出马太福音 6:33。——译注



前的朝圣者在解放了圣墓之后，马上就自觉地放下了武器。

所以，在基督徒控制耶路撒冷期间，大体而言有两种行为模式。一种是加入十字军，就比如1101年和1147至1148年的那些战士，只要他们朝拜过各处圣所了，一旦有需要，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长途跋涉到东方作战。还有一种是纯粹的朝圣者，他们只在敬拜了圣墓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之后，才会感到能自主地拿起武器。这种区分非常重要，因为似乎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的半个世纪里，对欧洲的武人来说，朝圣之旅更有吸引力，而参加十字军只偶尔激起人们的热情。虽然确实也有一些区域始终对这项事业抱有极高的热情，比如紧邻安茹以北的那片区域涌现出许多贡献了相当多领袖人物的城堡主家族；但在其他地方，这种参加十字军传统的确立仍有待时日。地处利穆赞地区的布莱的贝尔纳家族（Bernard of Bré family）在1096年派了三人参与，在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派了四人参与，但在这之间没有人前往。勃艮第的威廉伯爵的后裔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非常活跃，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也至少派出了十个人，但似乎在1102至1146年间只有一人前往，即使宣告1120年十字军东征开启的人正是威廉的儿子教皇卡利斯图二世。虽然大多数十字军战士都觉得没有必要再次参加远征，但其中有一些人作为朝圣者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对作为朝拜中心的耶路撒冷热情并没有消散，旧日11世纪往那里朝圣的传统已经得到复兴。这一事实只要观察一下地区内的活动便能确认。利穆赞地区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投注了大量的热情，但在1102至1131年间它只为我们提供了一名十字军战士的姓名，而且其身份也仍然存疑。不过，在同一时期，这里却涌现出了众多朝圣者，对耶路撒冷的强烈情感依恋也依然非常明显。在1103至1147年间，普罗旺斯没有一名确定的十字军战士，虽然这里在1096年曾对这一运动报以热烈的回应。不过，去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非常多，尤其是马赛地区的贵族们。在1096至1102年间送出了大批人马前往东方的香槟地区，其情形也大体相同：在1102至1147年间我们几乎找不到这里有十字军战士，但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热情却在高涨，引领热潮的是香槟伯爵于格一世。

这让我们不禁有了这样一种印象：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掀起的浪潮之后，在西欧的大部分地方十字军运动进入了休眠状态。对许多武人而言，那次远征看来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让他们能以合适的形式建功立业。但此时，他们放弃了先前的热情。他们要等到 1146 年才被再次唤醒；这一年，克莱沃的贝尔纳开始推行新的十字军运动，宣扬这是另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寻得通往天堂的道路：

116

[上帝]将自己放在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上，或看似不可撼动的地位上，但与此同时，他始终准备在你需要时出手相助。他希望人们把他视为债主，这样他就能赋予那些为他而战的人们以奖赏：免除罪责和永恒的荣耀。正是因此，我将你们称为受眷顾的一代。因为你们正处在免罪机会如此之多的年代，生活在主如此看重的这个年份，这个真正的大赦之年。

## 12 世纪最初的十字军运动

尽管如此，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之间的岁月也并非平淡无奇。它们见证了十字军运动在西班牙的大扩张，尽管其中一场最为重要的战役根本不能算在其中。1118 年，教皇基拉西乌斯二世正式授权了一场战役，由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一世领导，征讨萨拉戈萨。这座城镇可以算是攻陷托莱多后最大的战利品了。该城于 12 月 19 日被攻陷，参战的庞大军队中包括了很多参加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士，如贝阿恩的加斯东和比格的森图勒（Centulle of Bigorre），还有出生在叙利亚的图卢兹伯爵阿方索·约旦，以及卡尔卡松（Carcassonne）<sup>①</sup>子爵、加巴尔雷（Gabarret）子爵和拉维丹

① 今法国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区奥德省的一个镇，分为新旧两个城区，分别坐落于奥德河东西两侧。西部的新城区地势较低且占地较广，而东部的老城区则有城墙围绕。卡尔卡松的防御工事最早可回溯到罗马时代。——译注

（Lavedan）子爵。值得一提的是，领导这场战役的国王能够全权支配本王国的资源，他最后的成功没有牺牲那些已经不堪重负的小王国，而是直指阿尔摩拉维德人——他们当时控制着摩尔西班牙的大部分领土，但在12月8日的战斗中被击败。教皇基拉西乌斯二世称这场攻势为十字军运动的言论没有流传下来。不过之前的教皇帕斯卡尔二世却开创了一个先例，他授权参与1114年进攻巴利阿里群岛的穆斯林战士们可使用十字架做标志，并可完成救赎。这场进攻是由加泰罗尼亚人和比萨人发起的，由巴塞罗那的雷蒙·贝伦加尔伯爵领导，随后在1116年转向欧洲大陆沿海地区继续发展。

我们对教皇卡利斯图二世发起的十字军运动则拥有更坚实的证据。这场运动同时在东方和伊比利亚半岛进行。1123年4月2日，卡利斯图二世发布了一封手谕，号召西班牙的十字军战士践行自己的誓言，授予他们与前往东方的十字军战士相同的免罪权利，并任命塔拉戈纳大主教奥莱格为教皇使节。这封手谕是在第一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召开期间发布的，因此，这次会议对十字军发布的谕令同时涉及耶路撒冷和西班牙两地。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召开的一次大公会议上也讨论了十字军的事宜，这次会议是由大主教迭戈·赫尔米雷斯（Diego Gelmirez）主持的，他可能与奥莱格一道被任命为教皇使节。迭戈发布了一项激动人心的召集令，这是对西班牙进行的十字军运动的首份合法认定宣言；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它将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援引：

基督的骑士们和神圣教会虔诚的子孙们历尽艰辛，挥洒血汗，打通了去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如同他们一样，我们也应该成为基督的骑士，在打败了他邪恶的敌人穆斯林后，从西班牙打通去往同一所主的圣殿的道路。而这条路将变短，也没有那么艰辛。

117

以圣彼得、圣保罗和圣雅各的慈悲，十字军战士们获得了免罪的权利。最终，是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从半岛的另一端，在一场时人交相称赞的勇武

行动中，于 1125 至 1126 年冬率领一支部队突入西班牙南部，依次进军特鲁埃尔（Teruel）、巴伦西亚、穆尔西亚（Murcia）、高迪（Gaudix）、格拉纳达和马拉加，并在马拉加登上一艘船表明他已经横穿半岛。返回萨拉戈萨时，他带回了 1 万名安达卢西亚的基督徒及其家属；这些人决定要迁徙，他把他们安置在了埃布罗河谷。

不到十年，另一处十字军对另一块地城的征讨至少也提上了商讨日程。从 12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教廷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陷入争斗；由于西西里的罗杰支持敌教皇安纳克雷图斯二世（Anacletus II），这一矛盾激化，教廷的宣传人员在攻击诺曼人时开始使用的语言让人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教会改革派们。1135 年 5 月，教皇英诺森二世在比萨主持了一次大公会议。这次会议发出教諭称，为了教会的解放而在陆地或海上抗击教皇的敌人的人们，应获得与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上授予第一次十字军战士们的免罪权相同的权利。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战士也需要许下十字军誓言，但这项将十字军特权授予抗击教廷政敌者的授权，却将 11 世纪时改革派们的斗争与 13 世纪的“政治十字军”联系在了一起。这在之后的数年中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一方面有人持猛烈抨击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有人极力提倡。力挺派的代表之一是伟大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受尊敬的”彼得，他的论调是，针对同为基督徒的敌人使用暴力，甚至比对异教徒使用暴力更为正当。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前往东方的十字军运动也启动了，预示着 1202 至 1204 年各项事件的进程。塔兰托和安条克的博希蒙德从 1100 年夏到 1103 年春一直是达尼什曼德突厥人的阶下囚，但获释后，在 1106 年初他来到了法国。在被囚期间，他曾许诺要去敬拜囚徒的保护神——圣莱昂纳德的神龛。在一场极富戏剧性的参拜之后，他开始以凯旋者的姿态巡游法兰西，向大批民众发表演说。他每到达一处，均向那里的教堂赠送圣人遗物和丝绸，因为在离开时他把安条克的财宝也席卷一空。法国的许多贵族都想让他当自己孩子的教父，但据说英格兰的亨利一世却不怎么愿意他到访自己的王国，唯恐他把手下最好的骑士都诱走了。1106 年四五月间，他娶了法

国国王菲利普一世的女儿康斯坦丝，足见他此时声望之高。他还派遣代理人前往自己无法亲自去的地区，甚至也派到了英格兰。他或许也利用了文本传播。由匿名作者撰写的有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记录《法兰克人事迹》（*Gesta Francorum*），其作者可能就是他的一名随员。这本著作传播到了法国各地。还有一封假托皇帝亚历克塞写给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一世的信件可能也在此时广为流传，信中暗示希腊人在11世纪90年代已经陷入绝境，他们已经准备接受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有关博希蒙德被穆斯林囚禁期间经历的传奇故事，也很快被加入到圣莱昂纳德神龛的《奇迹录》（*Miracula*）中。

在普瓦捷召开的一次大公会议上，博希蒙德和教皇使节塞尼的布鲁诺（Bruno of Segni）正式宣布启动一场新的十字军运动。博希蒙德在巡游途中遇到了教皇帕斯卡尔二世，此次宣言也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他们以类似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将这次行动描述为去往圣墓的路途，目的是帮助东方的基督徒，迫使穆斯林交还他们囚禁的基督徒。但博希蒙德本人的意图比这更远大。他之前曾来到西欧为自己那受到希腊人以及穆斯林威胁的安条克公国求助。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就在他获释不久，他就面临着拜占庭对西里西亚和叙利亚的入侵。在1104年6月，他东部的边疆属地大多落入阿勒颇的里德万（Ridvan of Aleppo）之手。他在安条克召开了一次商议会，最后决定，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向西欧求援。博希蒙德对希腊人的战略考虑应该与针对穆斯林的不相上下。在前往法国的路途中，他还带着一名假装为拜占庭皇帝的人，甚至还带着希腊随从。有一份关于博希蒙德在结婚当天，在沙特尔大教堂的圣母祭坛前的讲台上发表演说的记录。他一开头讲的是自己的冒险历程，然后呼吁启动向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东征；他还提出要进攻拜占庭帝国，并向愿意跟随自己的人许下丰厚回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进一步推动自己的计划。就在出发前夕，他给教皇写了一封信，提到亚历克塞篡夺了拜占庭的王位，并认为进攻希腊人是具有合法性的，既是为了报复他们对待十字军的方式，也是为了结束天主教与东正教教会的分裂。

1107年10月，博希蒙德的队伍在阿普利亚集结，其中包括若干他在第一次东征时期的追随者。其规模应该也还比较可观，足以使得修士历史学家奥德里克·维塔利（Orderic Vitalis）称之为“往耶路撒冷的……第三次远征”；奥德里克应该是将1096年和1100至1101年的两批人马分别视为了第一次和第二次。9日，一行人在发罗拉（Valona）登陆阿尔巴尼亚海岸，随后向都拉斯进军。25年前，意大利的诺曼人曾经短暂占领过都拉斯。博希蒙德围攻了都拉斯，但希腊人切断了他穿越亚得里亚海的运输补给线，并于1108年春对他形成合围。随着夏日临近，军中开始出现疫情。9月，博希蒙德投降，并被迫签下《德沃尔条约》。这一点我们前文中已经提到过。他手下的一些十字军战士行进到了东方。但大多数人觉得失去了方向，只能返回西欧。受到这次失败的打击，博希蒙德没有回到叙利亚，而是退隐到了自己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庄园中，1111年，他在那里去世。

八年后基督徒在叙利亚北部遭遇的那场灾难，即导致安条克大公被杀的血田战役，该消息在1119年的秋天传到了西方。教皇卡利斯图二世在巡游法国的途中听闻了这一惨剧，并立刻宣布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他的反应如此迅速并不令人惊讶，只要想一想，他不仅来自对十字军运动投注了极大热情的勃艮第伯爵世家，而且还是耶路撒冷的鲍德温二世的侄子，因此也就与蒙莱里家族有关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蒙莱里家族的成员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了教皇身边，因为他回应了拉丁人统治权在东方受到的威胁，因此也相当于回应了本家族遭遇的危机。而回应方式是，宣布新一拨十字军将继续1107年的那批之后再次开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次十字军行动似乎从未打算要涉足叙利亚这个西欧人已经被击败的区域，而是打算直接前往在其以南400英里的圣地。那里是鲍德温二世的治所。

卡利斯图二世在很大程度上一手筹划了这次行动。他给威尼斯当局去信，很可能也去信德意志和法兰西；这可能表明，他写了一封针对大众的普发信件，号召广大信徒接受十字架。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他还决定同时推动在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并宣扬第一次拉特兰大公会议的教谕，即允诺十

十字军战士将可获得免罪的权利和教会的保护。他还对直到 1124 年复活节时还未动身去往耶路撒冷或西班牙的战士施加惩罚。威尼斯是鲍德温二世直接发出求助请求的对象，此时做出了积极回应。总督和主要的市民领袖都宣誓参与十字军，并得到教皇赠予的一面圣彼得旗帜。1122 年 8 月 8 日，一支庞大的舰队启程前往东方。在途中，威尼斯人袭击了归拜占庭所辖的科孚岛 (Corfu)<sup>①</sup>，以报复皇帝约翰·科穆宁 (John Comnenus)，因为他削减了他们在拜占庭帝国内享有的特权。但获悉鲍德温二世已经落入穆斯林之手后，他们不等战事结束就匆匆继续赶路，并于 1123 年 5 月抵达巴勒斯坦沿海。他们在阿斯卡隆沿岸摧毁了一支埃及舰队，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度过了圣诞节，援助了围攻泰尔 (在 1124 年 7 月 7 日被攻陷) 的战斗。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泰尔及其周边领土的三分之一，还享有了非常重要的商业特权。为了吸引他们参与十字军，鲍德温二世必定早已许诺要赋予他们这些特权。威尼斯人取道爱琴海回国，一路上洗劫了希腊各岛各地。他们的劫掠活动终于让拜占庭屈服，1126 年 8 月约翰·科穆宁承认并扩展了他们的特权。不过，威尼斯人并非当时在东方的唯一一支十字军。他们的船只上还搭载了其他十字军战士。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有从波西米亚、德意志和法兰西来的，很可能还有一支热那亚的海军小分队也参与其中。

120

若干年后，当鲍德温二世的女儿梅丽桑德被许配给安茹的富尔克时，黎凡特的定居者们开始寻求更多十字军战士的帮助。圣殿骑士团团长佩恩的干格在西欧各处巡游招募十字军战士。1129 年富尔克前往巴勒斯坦时有相当数量的人随同前往。在那里，他们与定居者们一起，发动了一次围攻大马士革的战役，但没有成功。新的远征的发起人似乎就是鲍德温二世自己，他并没有获得教皇洪诺留二世的授权，因为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教皇袖手旁观。这其实就凸显了早期那些还比较没有规则的远征行动与 13 世纪各次远征的区别。到 13 世纪时，教皇对发起远征所具有的权威认可地位已经牢

① 位于今希腊西北部、伊奥尼亚海上的岛屿。——译注

固确立。早在 1103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曾在不经教廷认可的情况下试图独立发动一场在东方的赎罪战争；他还授权维尔茨堡的主教为这场战争讲演布道。亨利四世这么做必定是为了试图重申自己作为基督教世界捍卫者的传统权威地位；之前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基督徒们奋起战斗光复耶路撒冷，实质上剥夺了皇帝的这种权威。但亨利四世最终没有成功。不过，一手创造了十字军运动的教会，此时也还并未确立对这项运动的控制权。其原因之一在于，宣传动员、招募和监控工作让教士们必须担负起前所未有的沉重责任，他们必须面对许多并不熟悉的事务，而这常常让他们感到茫然失措。

从长远来看，格拉提安的《教令集》的问世在这方面意义非凡。它将成为教会法编纂的标准版本，对教会确立领导十字军运动的权力也颇有助益。其中篇幅很长的一个条款，即第 23 条，是关于暴力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该条的阐述起始于以武力镇压异端的问题，格拉提安并没有谈到十字军运动，但在一系列的说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其隐有所指，因为它为读者们提供了诸多理由支持教会授权使用暴力。读者们在众多权威的引导下会得出结论认为：战争并不一定是罪恶的，也可能是正义的，也可能得到上帝的授权，或者得到作为上帝的代表的教皇的授权。格拉提安为未来宣扬十字军者提供了依据。

##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我们之前已经提过，1144 年圣诞前夜赞吉攻占了埃德萨。1145 年 11 月，就在教皇尤金尼乌斯三世当选后不久，一支由主教杰卜莱的于格率领的拉丁东方使团抵达了设在维泰博（Viterbo）<sup>①</sup>的教廷。亚美尼亚主教们组成的一

---

<sup>①</sup> 位于今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大区的城市，罗马以北约 100 公里处。——译注



个使团也接踵而至。12月1日，教皇发出一封名为《吾等之前辈》(*Quantum praedecessores*)<sup>①</sup>的通谕。信中，他在提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成功以及东方目前的严峻形势后，呼吁再组十字军，并许诺比之前乌尔班二世所允诺的更为全面的免罪权利。他还下令保护十字军战士的财产，宣布他们有权延期偿付所欠债务的利息；并像乌尔班二世一样，为他们变卖土地筹措路费大开方便之门。

因为卡利斯图二世之前可能已经发布过一份类似手谕，所以如今人们已经不认为尤金尼乌斯三世的这份是第一封十字军教令。但它细致地描绘了十字军战士们能享有的特权，因此也就为后世的此类通谕定下了基调。这封信是针对法兰西民众写的，但没有证据表明在下述这件事发生之前它就已经传播到了法国。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使团都分别把东方发生兵祸的消息传到了法国。法王路易七世是最有魅力的中世纪法国国王之一，他慈悲、有礼、虔诚、庄重，是教会忠诚的儿子。但他并不软弱，尤其是涉及王权时。在很多方面他都表现得既正直又强势，而这一点在他的孙子路易九世身上也体现得最为明显。可能当时路易七世已经在考虑要去耶路撒冷朝圣一次。他可能担心如果他不去，蒙莱里家族的人可能会去，因为埃德萨的伯爵们是他们的亲戚。在自己位于布尔日的行宫的圣诞宴会上，路易七世邀请了比以往更多的主教和显贵，并向他们宣布了自己想要驰援东方基督徒的计划。朗格勒的主教进行了一段布道，呼吁大家协助国王的这项事业。但众人的回应并不怎么热情，最后决定，在咨询了克莱沃修道院的院长贝尔纳之后，这件事情将在下一个复活节再讨论。

正是贝尔纳改变了这种状况。此时他已是西方教会中的领袖人物。以西多会形式改革的本笃修会主义是当时最为盛行的修行方式，而这正是他一手

① 本谕令与大多数的教皇通谕一样没有专门的题目，此题目其实是谕令第一句开头的两个单词，其整句原为“*Quantum praedecessores nostri Romani pontifices pro liberatione Orientalis Ecclesiae laboraverunt, antiquorum relatione didicimus, et in gestis eorum scriptum reperimus*”，大意为“吾等之前辈罗马教皇们为东方教会做出了多少努力，吾等已从古人及其记载中获知”。——译注

推动的。教皇英诺森二世能够战胜对手安纳克雷图斯二世与贝尔纳密切相关，而新教皇尤金尼乌斯三世则曾是贝尔纳修院中的一名僧侣，还是他的学生。贝尔纳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传道者，无所畏惧，口才和文笔俱佳，他此时的声望正如日中天。因此毫不意外，路易七世“把他当作某位神谕者般”咨询了他的意见。贝尔纳倾向于支持，毕竟他已经动用自己的影响力给予了圣殿骑士团不少支持；但他还是以自己典型的方式回答说，这样重要的事务必须提交给教皇，因此也就保证了教皇拥有的启动权力。尤金尼乌斯三世的回应是：在做了一些小修改之后，他于1146年3月1日重新发布了一次之前那份通谕，并授权贝尔纳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动员发起十字军。3月31日在韦兹莱（Vézelay）<sup>①</sup>，在城外的一块田野中，如同当年在克莱蒙一样，贝尔纳上演了一场声情并茂的演出；他向在场民众宣读了教皇通谕，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次十字军布道，之后他又发表了多次。当时路易七世就在他的身边，还佩戴着教皇送的十字架。听众反响热烈，贝尔纳很快就没有布条可以用来制作十字架分发给大家了。这时，可能是刻意设计的一个高潮场景，贝尔纳开始不得不从自己的长袍上扯下布料来制作十字架。在韦兹莱布道之后，贝尔纳积极地通过信件和现场布道来推动十字军招募。其留存下来的信件堪称是史上最有力的十字军宣传文本；其中，发展完善的免罪观念与一种令人叹为观止、引人入胜的对十字军的描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种描述中，十字军被说成是上帝为有罪的和犯下暴行的人们提供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年代，天堂降下了新一浪的圣恩。生活在这个年份的、得上帝悦纳的人们有福了，生活在这个免罪的年份、这个确凿的大赦之年。让我告诉你吧，主从未为之前的任何一代人做过这样的事，他也从未赠予我们的父辈们如此丰厚的一份恩赐。看一看他用来

① 位于法国中部勃艮第大区约纳省境内的库雷河左岸小山上的一座小镇。——译注

拯救你们的方法吧。有罪的人们，思量一下他的爱意之深，被深深震慑吧。他创造了一种需要：他或者创造了它，或者假装拥有它。他渴望救你们的急、解你们的需。这不是一项人类创制的计划，而是来自天堂，出自圣爱之心。

在下面这段文字中贝尔纳将圣地的形象描绘为出自基督本人：

大地已摇撼、颤抖，因为主使他的国失去领地。我要强调，是他的国，是他曾被看到过的土地，是他在人们中间生活了30多年的土地。他的国，他以降生于此而使其荣耀，充满了他创下的奇迹，浸润着他的鲜血，埋葬着他的遗骸。他的国，在这里，童贞女之子赞颂贞洁的生活之时，人们听到了斑鸠的声音。他的国，在那里，他复活后的最早花朵出现。

乍一看这段描述似乎非常传统，但其中令人惊讶的地方是，“他的国”（*Terram suam*）这两个词反复出现在每一句的开头，如同鼓点。贝尔纳必定是想要提醒听众们注意他们自己自由拥有的地产是多么重要，因此，也有必要保护基督的遗产。

一位名叫拉道夫（Radulf）的西多会僧侣进行了未获授权的活动，他的布道唤起了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出现的类似的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这驱使贝尔纳进入法兰西北部和德意志，去抑制这种危险的情绪。11月，他抵达法兰克福，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的宫廷当时就设在这里。康拉德三世也是一位值得景仰的统治者：精明、真诚、智慧、虔诚、英勇、刻苦。而且他已经表现出了对十字军运动的热情，因为他在1124年已经宣誓参加十字军，但由于德意志一直受内部封建斗争的困扰，而且某些强大的外部势力（这是他始终没能战胜的）也一直反对他继位，他才始终抽不开身。过去，人们认为他起初拒绝参加十字军并领导人数已经相当可观的应募德意志人，

但历史学家们如今却不那么肯定了。不过，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布道唤起的热情已经蔓延到了意大利和英格兰，这股潮流已经具有了自身的动能。在施派尔圣诞庭宴的弥撒活动上，贝尔纳声情并茂地宣讲了一段教义，直接明确地指向了德意志国王，提请他注意，如果不听从基督的召唤，在最后审判日时他的命运将相当悲惨。之后，康拉德三世加入了十字军。

现在，西欧两位最有权势的统治者都已经投身十字军的队伍，这似乎真是一场伟大的远征了。这场远征也开始具有了 20 多年前卡利斯图二世勾勒的那种雄心勃勃的性质，似乎还更为宏大。尤金尼乌斯三世首肯了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七世的请求，将十字军运动的范围扩展到西班牙，并允许热那亚和法国南部港口城市的公民参与这一征战。此后，1147 年 3 月 13 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场集会上，一些德意志十字军战士，主要是萨克森人，公开讲出了自这个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在萨克森流行的一些想法：请求得到允许，不去讨伐穆斯林，而是去讨伐易北河以东的异教徒文德人（Wends）<sup>①</sup>。贝尔纳同意了他们的请求；4 月 6 日他在克莱沃与尤金尼乌斯三世会面，又说服教皇正式批准了萨克森人的请愿。贝尔纳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准允了新开辟的十字军战场，声称禁止战士们与文德人媾和，“直到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的宗教或民族彻底消亡”。这一激越的言论以更为含糊的方式在尤金尼乌斯三世正式批准针对文德人的十字军行动的文本中得到了回应，它似乎是宣布开打一场传教大战，与德意志人长期以来渴望东进的动机相呼应。这一宣言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在另一个场合下贝尔纳曾反对强迫的皈依。在十字军相关的宣传声势中，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其中潜在的一种矛盾，即对皈依的渴望，或者说确信十字军远征的成功能够为皈依创造合宜的政治环境，与基督教认为不信者不应被强迫而只能靠说服来纠正其错误的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而当面临要唤起一群并不特别深究内涵的听众的任务时，贝尔纳和尤金尼乌斯三世并不是仅有的选择为动员德意志十字军

<sup>①</sup> 居住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西斯拉夫人，由多个部族构成。——译注

行动而发表许多在神学上有争议言论的宣传家。

尤金尼乌斯三世于 1147 年 4 月 13 日在特鲁瓦发布的一份名为《神圣豁免》(*Divina dispensatione*) 的通谕, 就揭示了正在形成的这种策略。因为在其中, 教皇在提到东方和伊比利亚半岛远征的同时, 也授权德意志人发动针对文德人的战役。此时, 筹划中的十字军运动的规模已经相当庞大。有五路人马逐渐在东方会合: 法兰西的路易七世、德意志的康拉德三世、萨伏伊的阿梅迪奥、图卢兹的阿方索·约旦, 以及一支曾在半路上帮助葡萄牙国王攻取里斯本的盎格鲁—弗莱芒联军。另有四路人马在东北欧作战: 一支丹麦军队, 后来加入了萨克森的“狮子”亨利及不来梅大主教麾下的那支, 由勃兰登堡的“大熊”阿尔伯特 (*Albert the Bear*) 领导的一支, 还有一支由波兰大公的一位兄弟领导。在伊比利亚半岛发动了四次行动: 热那亚人攻打米诺卡岛, 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七世攻打阿尔梅里亚 (*Almeria*)<sup>①</sup>, 巴塞罗那伯爵攻打托尔托萨 (*Tortosa*)<sup>②</sup>, 以及葡萄牙的阿方索·恩里克斯 (*Alfonso Henriques*) 攻打圣塔伦 (*Santarem*)<sup>③</sup> 和里斯本。当时的人把所有这些行动都看作同一个事业的组成部分: “在发动者们看来, 似乎一部分军队应送往东部地区, 另一部分应送往西班牙, 第三部分则去攻打住在我们附近的斯拉夫人。”与此同时, 虽然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十字军的组成部分, 但一支诺曼人西西里王国的舰队则将西西里的罗杰的统治扩展到了从的黎波里至突尼斯的北非海岸。自从罗马帝国瓦解后, 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 而且在此后的历史中也并不多见。

从很多方面来看, 这次十字军远征的准备都是相当谨慎细致的。教皇与贝尔纳一道进行了传道和招募工作; 尽管他们在所持的苦行赎罪理论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但两人共同提出了一种相当前卫的免罪观念。我们已经看到, 乌尔班二世的免罪观念仅仅是保证说, 十字军运动是如此艰辛, 因而它完全

① 位于今西班牙东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城市。——译注

② 位于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南部的城市。——译注

③ 位于今葡萄牙中西部的城市。——译注

就是一种十足的苦行赎罪方式。而在尤金尼乌斯三世和贝尔纳那里，强调的重点则从赎罪者自我施加的惩罚转到了上帝的仁慈上来，其确认的方式就是教会拥有的司钥权（the Power of the Keys）<sup>①</sup>。凭借这种权力，教皇可以因有罪者参与了某些行动而免除他们的罪责。

如果你是一位审慎的商人，如果你是一位喜好获取世间奇货的人，那么我将许你见到某些巨大的市场；千万别让机会溜走。接受十字架吧，你将无一例外地免除心怀悔悟犯下的所有罪。如果布匹卖掉了，你得了什么；但如果它在虔信者的肩膀上穿旧穿烂，那它肯定可换得天国。

125 他们还利用了人们因前几代人参与十字军的经历带来的荣耀感，因为这已经牢牢地印在了这些后代子孙的集体记忆里。

如果你们的父辈靠努力获取的东西得到了你们的积极捍卫，那将是高贵与正直的有力标志。但如果这种精神传承不当，那么父辈的勇武将在子孙身上消失，愿上帝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

他们的宣传非常成功，这不仅可以通过获得的热烈回应来衡量（我们所称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规模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最大的一次），也可以通过曾经在前代贡献过十字军战士的家族如今积极应募的人数来衡量。这表明，到12世纪中期时潜在的十字军战士数量已经比较可观了，主要来自那些对此项事业十分投入的亲属集团；他们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就有不少人应募，虽然此后热情曾相对蛰伏。到了这个阶段，整场运动已经喷薄欲出，不仅浮现在某些贵族和骑士家族的集体记忆中，也体现在行动以及神学

① 天主教会根据马太福音16:19，认为基督赐给彼得、因此也赐给教会的权力，包括绝罚权、制定教义和教会政策的权力、解释神圣文本的权力，以及施加或免除罪责的权力。——译注

家们的各种考量中。

尤金尼乌斯三世任命红衣主教波尔多的提奥德温和红衣主教圣克里索戈诺的奎多为法兰西军中的教皇使节，并由几位主教利雪的阿努尔夫（**Arnulf of Lisieux**）、朗格勒的戈弗雷（**Godfrey of Langres**）和阿拉斯的阿尔维（**Alvis of Arras**）协助。哈费尔伯格的安瑟伦（**Anselm of Havelberg**）主教被任命为文德十字军的首席使节，由奥尔米茨的亨利（**Henry of Olmütz**）主教（他原本被任命为康拉德三世率领的德意志十字军的教皇使节）和斯塔沃洛的威波德（**Wibald of Stavelot**）协助。尤金尼乌斯三世和路易七世写信给匈牙利和西西里的国王以及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将自己的计划知会他们，并寻求提供补给并保证路途通畅。曼努埃尔的回复很谨慎。他在一封给教皇的信中提出，要求十字军战士们许下他们的前辈曾向亚历克塞许下的那种效忠誓言；又在另一封信中要求法国人保证不会损害他的帝国，并且将原属于帝国的城市归还给他。路易七世采取了一种比较可行的手段来筹措路费：开征一项赋税，可能是以封建封臣纳贡的形式。这开了13世纪里将改变十字军运动的各种名目的资助和税收的先河。康拉德三世首先确保横穿德意志的各条道路和各座桥梁得到修复和加固。法兰西和德意志各地举行了多场壮观而肃穆的集会来讨论行动的计划。但这种种准备却终究还是很扎眼地疏漏了一项：没人咨询过东方的拉丁统治者。12年后，教皇阿德里安四世（**Adrian IV**）将强有力地向路易七世挑明这一点，指出这带来了怎样的危害。而对于这种百密一疏，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尽管路易七世和康拉德三世肯定会以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结束他们的进军，但两人打算直接穿越安纳托利亚前往埃德萨，甚至不经过安条克公国。

126

1147年2月16日在埃唐普参加了法国十字军聚会的人们，他们的脑海中必定都有着上面的打算。这次聚会将最终敲定去往东方的路线。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走陆路，取道巴尔干半岛、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二是走海路，途经西西里。德意志的康拉德三世和西西里的罗杰交恶，

显然只会考虑走陆路。而如果这次东征的首要目标是埃德萨，做这样的选择也更为合理。在埃唐普，人们的意见存在分歧，争论激烈。似乎有一派在罗杰的使者的支持下，警告法王不要去往君士坦丁堡，因为那样就把自己置于任由希腊人摆布的地步。但走陆路的意见终于还是获得了通过，出发日期定在6月15日。3月13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德意志十字军聚会已经知晓了法国聚会的决定，最终宣布取道匈牙利。为了比法国人早几个星期出发，动身的日子定在了5月中旬。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各支队伍一样，这两队人马中既有十字军战士，也有大量手无寸铁的朝圣者随行，并预定在君士坦丁堡会合。

德意志人在预定的日期出发了，他们途经雷根斯堡和维也纳进入匈牙利。他们说服了匈牙利的国王，称只要他通过向当地教会征来税款并向康拉德三世支付一大笔金额用于购买补给，十字军必定能和平穿越匈牙利。有一些十字军战士非常熟悉自己前辈们的经历，因此，这项措施必定是他们坚决主张的，这样就能确保不出乱子。德意志人就这样顺利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边境地区。曼努埃尔和康拉德三世关系不错，因为他们结成了对抗意大利南部诺曼人的联盟，而且他最近还娶了康拉德三世的养女苏尔茨巴赫的贝尔塔（Bertha of Sulzbach）。曼努埃尔似乎并不像对待法国人那样畏惧或质疑德意志人，他的使者只要求德意志人发誓不会以任何一种方式损害皇帝的利益。在许下诺言之后，德意志人就得到承诺可保证获得补给。他们取道尼什、索菲亚、普罗夫迪夫（Plovdiv）<sup>①</sup>和埃迪尔内（Edirne）<sup>②</sup>来到君士坦丁堡，一路上没出什么大的事故，当然，几起小的劫掠和与帝国军队的冲突总是免不了的。

虽然和康拉德三世关系还不错，但曼努埃尔并没有放松戒心。与祖父亚历克塞一样，他决心要隔离各位十字军领袖分而处之，一旦他们抵达君士坦

---

① 今保加利亚第二大城市。——译注

② 历史上被称为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曾是奥斯曼帝国在1363至1453年的首都，位于今土耳其西北部。——译注



丁堡，就尽快把各支队伍海运到小亚细亚去。他甚至还曾经想让康拉德三世不经过君士坦丁堡，直接从塞斯托斯(Sestus)<sup>①</sup>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第一次听到这个提议的时候，康拉德三世表示反对，可能是因为他不想错过与路易七世会合的机会。但在9月末，在君士坦丁堡待了大概三个星期之后，他同意让希腊人把自己的队伍运送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或许是因为西西里的罗杰当时入侵了希腊，拜占庭人要求他出兵相助，这就让他处境比较尴尬。但无论原因为何，他的队伍在与一队业已抵达的来自洛林的人马会合之后，渡过了海峡，向小亚细亚腹地前进。在尼西亚，他们开始为进军科尼亚准备补给。但这支队伍太庞大了(康拉德三世曾警告手下，非战斗人员应该独立组队被送往耶路撒冷，但他们忽略了他这个合情合理的意见)，因此行动十分缓慢，补给很快耗尽。就在1097年多利留姆大捷的战场附近，他们遭到伏击而大败。本来的战略性撤退演变为大溃逃，突厥人则在后面半心半意地吓唬他们。11月初，残兵剩勇们抵达了相对安全的尼西亚。此时，大多数十字军战士决定返回家乡，只留下康拉德三世和一支规模大大缩水的队伍。于是他送信给法兰西的路易七世请求援助。

路易七世在6月11日举行了盛大的启程仪式，地点在圣德尼(St Dennis)<sup>②</sup>修道院的教堂，教皇也出席了。路易七世敬拜了圣德尼的遗物，认为自己将在这位圣人的庇佑下走过十字军东征的全程；他接受了自己王国神圣的战旗“金色火焰”(oriflamme)<sup>③</sup>；并由尤金尼乌斯三世亲自授予了朝圣者的褙褌。法国十字军的会合地点是梅斯，他们从那里出发，途经沃尔姆斯来到雷根斯堡；已经有船只等在那里替他们把行李顺着多瑙河一直运到保加利亚，而人马则沿着德意志人已经走过的路线继续行进。正是依靠着匈牙利人(路易国王和他们关系很好，但他个人也花费不少)提供的补给，路易

① 一座古希腊城镇，由来自莱斯博斯的艾奥里亚人建立，位于今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半岛上，在赫勒斯滂海峡地区与阿拜多斯隔海相望。遗址在今土耳其埃杰阿巴德附近。——译注

② 公元3世纪的基督教殉道者，曾任巴黎主教。——译注

③ 源自拉丁语 *aurea flamma*，意为“金色火焰”，是中世纪时法国国王的战旗，底部为燕尾形。——译注

七世才得以支持自己的队伍有足够的给养穿越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并于10月4日抵达君士坦丁堡。和康拉德三世一样，路易七世也拒绝绕过君士坦丁堡。在整个行军途中，他都被迫不断地与曼努埃尔拉锯谈判。曼努埃尔的使节在雷根斯堡就已经与他会面。曼努埃尔对法国人又怕又疑，他知道他们与西西里的罗杰有合作。事实上，有一支法国十字军就是取道意大利南部来到君士坦丁堡的。他也必定很清楚法国人与拉丁东方的定居者在情感和民族归属上关系亲密，比如安条克的大公就是法国王后的叔父。这支法国十字军内部以朗格勒的戈弗雷主教为首的一派对希腊人满怀敌意，他们发表的种种言论也必定经由各位使节很明确地传到了曼努埃尔的耳中。因此，曼努埃尔对法国人的要求比对德意志人要苛刻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路易七世的幕僚们打算同意不占领拜占庭境内的任何一座城镇或城堡，但他们却不准备许诺归还任何一块曾属拜占庭统治的领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收复埃德萨，而该地在很久以前就是位于帝国境内的。在距离君士坦丁堡还有一天路程的时候，法国十字军战士们得知曼努埃尔与科尼亚的突厥苏丹签署了一份协议，但科尼亚正是十字军需要途经的地区，这个消息让他们觉得非常疑虑。在他们到达君士坦丁堡城外并驻扎下来之时，曼努埃尔已经加固了城中的防卫，而朗格勒的戈弗雷主教这一派人甚至提议说要进攻拜占庭帝国的这座首都。

128

法国人在这里待了14天，为的是等他们所知的其他路人马从西方抵达此处。有传言说走在他们前头的德意志人取得了胜利，但这个消息最后却被证明是假的，这引起了骚动，路易七世不得不同意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可是因为要继续与希腊人谈判，路易七世只能在亚洲沿岸再次停住，以等待增援队伍到来。他与曼努埃尔的最终协议还是没有明确说要把拜占庭帝国曾经的领土归还。十字军表示臣服，还同意不夺取任何处于帝国治下的领土；作为回报，他们得到帝国的允诺，帝国将为他们提供向导和给养。而且希腊人还认可了在无法获得补给的地方劫掠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在尼西亚，法国十字军听说了德意志人惨败的消息，并与康拉德三世及其余部会合。在埃

瑟隆（Esseron）<sup>①</sup>，他们转而向着海边行进，希望顺着沿海岸的拜占庭领土行进能更好地保证给养，虽然这意味着要放弃收复埃德萨的目标。在以弗所（Ephesus）<sup>②</sup>，生病的康拉德三世脱离了大部队前往君士坦丁堡养病，但法国人继续行进，无视突厥人正在集结准备进攻他们的忠告。1148年1月3日或4日抵达埃斯基希萨（Eskihisar）<sup>③</sup>时法国人的补给已然严重不足，其后往安塔利亚的进军（于1月20日抵达）更是糟糕得很。在安塔利亚，靠近拜占庭领土边境的地方，法国人已经没有办法保证给养，尤其是他们的马匹很多都饿死了。希腊人曾承诺派一支舰队将他们全部运到安条克，可是事实证明，这支舰队的规模实在太小，只能运送很少一部分人。

路易七世竭尽所能确保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足够的补给，可以经陆路前往安条克，之后他再登船前往该城。但事实上，只有很少的人马熬过了陆路的旅途顺利抵达。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在行军的大部分路程中路易七世率领的人马都是在应该由拜占庭控制的地区行进，但他们并没有从当地的人民、政府或官员那里得到什么帮助；幸存者们记得的只是无尽的失望和不断落空的承诺。最近史学界的论断是，曼努埃尔对法国人的忧惧实在太深，以至于他其实预谋要消灭他们。而法国人早在离开法国之前就已经非常不信任拜占庭人。法国人在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种种表现又证实了之前对他们的前辈们的怨言，使得他们更加面临着刻骨的敌意。

路易七世在3月19日抵达安条克。他拒绝参与在叙利亚的任何军事行动，只想向耶路撒冷行进，兑现自己的诺言。康拉德三世和其他德意志十字军战士已经在那里了，还有一些新近从西方来的人马。6月24日在阿卡举行的战争会议有大批来自黎凡特和欧洲的基督教统治者及贵族参加，会议决定尝试攻取大马士革。这项提议是会上讨论的众多提案之一，它其实并没有

129

① 位于今土耳其西北部城市巴勒克希尔附近的堡垒。——译注

② 公元前10世纪由雅典殖民者建立的伊奥尼亚希腊城市，在公元1世纪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中心，今位于土耳其境内。——译注

③ 位于今土耳其代尼兹利附近的村庄。——译注

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愚蠢。十字军队伍在小亚细亚遭受的毁灭性打击已经使得夺回埃德萨变得毫无希望。拉丁定居者们在 1126 年和 1129 年已经进攻过大马士革，后一次还得到了十字军的帮助。夺取叙利亚的这座重镇，既有有力的宗教和战略原因，也有坚实的政治理由。赞吉的作为已经表明被穆斯林统一的叙利亚将变得多么危险，而赞吉的儿子刚娶了大马士革总督的女儿，如果不率先阻止赞吉的话，他迟早会接管这座城市。

7 月中旬，拉丁人至此召集的最大规模的军队在提比里亚集结，由路易七世、康拉德三世和耶路撒冷的鲍德温三世率领。众位领袖决定袭击大马士革，而该城则向努尔丁及其兄弟求助。基督徒们从西面逼近大马士革，那里的郊外有果园，可以为他们提供木材、食物和水。7 月 24 日，他们在巴拉达河畔击退了穆斯林，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发动攻势的有力据点。但接下来，他们却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基督徒们知道大马士革的东墙防守较弱，也知道穆斯林援军很快就会来到，必须速战速决；因此，7 月 27 日，他们把营地转移到了一块开阔的场所，那里没有水源，食物极少。他们于是顺理成章地被围困了。东墙可能确实还没进行加固，但抵御这群围攻者已经足够。十字军已经无法回到西侧，而穆斯林迅速重新占领了那里。他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只能撤退的位置上，也确实这么做了。

撤退结束了这场东征，人们开始激烈地相互指责，指控对方是叛徒。拉丁东方的领导人及各个团体更是被集中攻击的对象。当然，希腊人受到了一边倒的指责，因为他们在小亚细亚那样对待十字军战士们。让敌意更深的是，法国国王及其随从乘坐西西里的一支舰队返乡时，由于拜占庭帝国此时仍然与西西里的罗杰处于交战状态，这支舰队在途中遭到了拜占庭舰队的攻击。路易七世好不容易才逃脱，但他的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乘坐的另一艘船结果被希腊人扣押了一段时间。埃莉诺在此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行为表现得非常糟糕，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并最终致使他们的婚姻破裂。抵达意大利后，路易七世就与西西里的罗杰及教皇尤金尼乌斯三世—道开始筹划新一—次的东征，而这一次的计划和塔兰托的博希蒙德曾设想的一—样，在进军东

方的途中将报复希腊人。

与此同时，在德意志东北部，由“狮子”亨利领导的一支庞大部队于1147年7月中旬从阿尔滕堡（Artlenburg）出发，先与丹麦人会合，其后包围了文德人的要塞多宾（Dobin）。这次围攻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的成果，唯一可提的就是文德人的奇袭把丹麦人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双方签订了一份和平协议，文德人放弃偶像崇拜，文德人的王公尼克洛特（Niklot）成为荷尔施泰因的阿道夫（Adolf of Holstein）伯爵的盟友和贡臣。但其在十字军跳出来搅局之前，他们的关系本来就不错。8月初，由“大熊”阿尔伯特率领的规模可观的主力部队从马格德堡出发，渡过易北河，侵入敌方领土。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围攻代明（Demmin）<sup>①</sup>，但没有将其拿下；另一路往什切青（Szczecin，即斯德丁〔Stettin〕）<sup>②</sup>进军，但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皈依基督教。

在西班牙取得的成果则更为显著。第一支踏上征途的十字军来自低地国家<sup>③</sup>、莱茵兰、法国北部和不列颠，他们于达特茅斯从海路进发，在1147年6月抵达葡萄牙的波尔图。葡萄牙人三个月前才从摩尔人手里夺取了圣塔伦，此时说服十字军与他们一道围攻里斯本，并于10月24日将其攻陷。在半岛东部，安达卢西亚与非洲及近东开展贸易的主要港口阿尔梅里亚，在10月17日被卡斯蒂利亚人、阿拉贡人、法国南部人、热那亚人和比萨人的联军攻下。在1148年底，法国南部人和热那亚人又继续攻取了托尔托萨。1149年秋，他们占领了穆斯林在加泰罗尼亚的最后一批前哨站莱利达、弗拉加和梅基嫩萨（Mequinenza）。

但在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是唯一取得成功的。当时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为自己的同胞感到骄傲的英格兰人，很快就指出了这一点。在其他的地方，这场蓬勃发展的运动却毫无成效，致使整场十字军运动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① 位于今德国东北部的小镇。——译注

② 位于今波兰西北部波德边境的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译注

③ 指欧洲西部沿海的几个国家，覆盖了今属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地区。——译注

直到 15 世纪才逐渐走出阴影。但像如此规模的作战却再也没有出现。两名德意志的评论者甚至提出，整场运动已经受到了诅咒。在一位维尔茨堡的编年史家看来，这是魔鬼在使坏，是对上帝的正义责罚的背叛，是“假先知、彼列（Belial）<sup>①</sup>之子、敌基督的见证者所激发的，他们用愚蠢的语言让基督徒误入歧途，用空洞的布道引诱人们往错误的道上前行”。在赖谢尔斯贝格的格尔霍（Gerhoh of Reichersberg）看来，所发生的灾祸与敌基督者临世有关。拉丁定居者们贪得无厌，十字军战士们也偏离了正道，因此，上帝允许他们被传道者欺骗、被虚假的奇迹欺骗，最终消失在东方。其他一些评论者则响应之前对 1101 年灾祸的解释，将在东方的败绩解释为对十字军战士本身 131 的惩罚，是他们的恶行导致上帝收回了对他们的眷顾。而这些评论者也倾向于将在西班牙的成功归于那里的十字军战士够谦卑。就在这股对抗与责难的风潮中，两位参与了十字军行动的西多会领袖的庄重与宽容就显得特别醒目。福莱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主教是康拉德三世同父异母的兄弟，领导了去往小亚细亚的一路德意志人马。他把十字军的失败归结于上帝神秘但通常友善的行事方式：“尽管我们的远征无益于领土扩张或身体的愉悦，它却有益于众多灵魂的救赎。”克莱沃的贝尔纳也持类似观点。他就是那位受到最多攻击、也必然会受到如此多攻击的“假先知”。贝尔纳受此责难激发，写下了基督教文献中有关顺从上帝旨意的最佳文本之一：

人类怎敢如此莽撞，竟敢对他们根本毫无了解的事情妄下论断？对我们来说堪称坦然的是，上帝的判断是经年累月形成的……因为……确实属实情的是，速朽的人类的心灵是这样形成的：当我们需要它时我们忘记了它，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不需要它……上帝的允诺从来不会歧视上帝的正义。

① 希伯来语中指无用、卑劣、全无好处的品质和情况。在哥林多后书 6:15 中，使徒保罗将彼列作为撒旦的别称使用。——译注

## 士气低落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开启了近 40 年的基督徒士气低落时期，这反映在十字军运动的蛰伏上。此时，教廷对这场运动的主导权已经由贝尔纳和尤金尼乌斯三世确立，但这是福是祸连教皇们都拿不准。法兰西的路易七世回到西欧后就开始筹划一场新的东征，但没有取得成效。东方的危机还在延续，每次无一例外地都会导致使团来到西方求助。菲利普博士就曾表明，在阿马尔利克国王在位时，他就进行了一些在公共关系方面的有趣试验，包括把耶路撒冷城门的钥匙送给法王路易七世，从而让人回想起三个半世纪前牧首送给查理曼的礼物。作为回应，像在 1120 年和 1145 年一样，1157 年、1165 年、1166 年、1169 年，可能还有 1173 年、1181 年和 1184 年，教皇都发布了通谕，正式号召虔诚的信徒踏上去往东方的十字军征途。如果说这些召唤全都毫无成效，显然是错误的。1166 年，英格兰的亨利和法国的路易七世都准备征收一笔财产税和人头税，与 1188 年萨拉丁征收的赋税类似；其中的一部分钱最终被送往了耶路撒冷。小规模远征军，如 1177 年佛兰德斯的菲利普率领的那支也确实抵达了东方。但总体而言，教皇的呼吁被人们忽略了，而且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耶路撒冷以及这个世纪前半叶占领的大部分领土此时仍然在基督徒手中，东征的十字军，那种规模庞大的短期军队，实现诺言后就会返回家乡的短期军队，却并不是定居者们想要的，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征服更多领土，而是希望长久驻防现有领土的守军能增加。这也是这些年里特别强调采取措施增加守备力量的原因。比如英格兰的亨利在 1172 年时为了抵赎谋杀托马斯·贝克特的罪责，承诺会派 200 名骑士驻防耶路撒冷一年。此外，直到 1170 年，耶路撒冷王国在欧洲的公众看来都还很强大，因为它正在准备独立实施领土扩张运动。

132

曾徒劳地呼吁人们去往东方服役的教皇们，极少干涉其他战场的事务。在那些地方，战事仍然间或爆发，有的冠以十字军之名，有的则没有；而当

历史学家们想要在这些经年的战事中分清哪些是十字军行动、哪些则不算时，就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比如，免罪权特许有时候也在没有得到教皇正式授权的情况下就颁布。驻西班牙的教皇使节，甚至还有西班牙的主教们，都会自行颁布这种特许。1166年塞戈维亚的大公会议就打算授予与之前授予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一样的免罪权，而对象则是愿意对抗显然也是基督徒的入侵者从而保卫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人们。这些年里参与了摩尔战争的巅峰之战、1172年保卫韦特（Huete）<sup>①</sup>战役的人们，也得到了免罪权，但并没有相关的明确成文授权通谕。阿尔摩拉维德人的势力崩溃之后，让位给了另一场北非宗教运动的代表阿尔摩哈德人。他们在1145年占领了摩洛哥，渡海来到欧洲，占领了科尔多瓦、哈恩（Jaén）<sup>②</sup>、马拉加和格拉纳达。他们在1157年重夺阿尔梅里亚，还夺取了乌韦达（Ubeda）和拜萨（Baeza）<sup>③</sup>。1157至1212年是55年惨烈的交战期，基督徒被迫转为守势。在北方，丹麦人在国王瓦尔德玛尔一世（Valdemar I）的统治期间，受到沿海地区文人奴隶贩子劫掠活动的刺激，频繁发动战事，而且往往与萨克森的“狮子”亨利结成联盟。他们的种种努力在1168年以夺取吕根岛（Rügen）<sup>④</sup>为标志达到高潮。他们随后开始袭击住在奥得河河口处的族群；在征服波美拉尼亚（Pomerania）<sup>⑤</sup>后，一系列修道院建立，成为积极的传教活动的中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皇的通谕除了针对向东方的十字军运动外，鲜少涉及其他战区。这实在让人惊讶，但也表明当时的士气确实低迷。关于西班牙，教皇只颁布过三次授权令，分别在1153年、1157至1158年以及1175年。而关于北欧的十字军授权仅有一次，这份授权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布的，可能是在1171年。它只授予了很有限的免罪权，而且从其措辞可以看

① 位于今西班牙中部昆卡省的城镇。——译注

② 位于今西班牙中南部的城市。——译注

③ 此二城均位于今西班牙南部哈恩省。——译注

④ 波罗的海近波美拉尼亚海岸的岛屿。——译注

⑤ 即波罗的海南岸地区。——译注



出，教皇认为与斯拉夫人的冲突已经结束，接下来的敌人应该是更东边的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不过，直到1184年，丹麦人才开始认真考虑将战事扩大到波罗的海东部；而且即使到此时，他们的计划最后也没有付诸实践。

这一时期，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势态中，最重要的发展是国内的武装修会组织即骑士团的建立。这一方面是受到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促动；另一方面是受到由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建立的一些临时团体的促动，这包括1122年为保卫萨拉戈萨而建立的，以及约1128年为保卫蒙雷亚尔德尔坎波（*Monreal del Campo*）<sup>①</sup>而建立的。第一个西班牙骑士团成立于1157年；这一年，圣殿骑士团把暴露在前线地带的卡拉特拉瓦城堡（*castle of Calatrava*）归还给了卡斯蒂利亚国王桑乔三世。在国王位于托莱多的宫廷中，有一名廷臣叫雷蒙多（*Raimundo*），他是西多会菲特罗修道院的院长。他手下的僧侣中有一名叫迭戈·委拉斯克斯（*Diego Velázquez*），这人原来是一名骑士。他说服雷蒙多向国王要求得到这座城堡，并招募了一批志愿者来保卫这座城堡。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一起组建了一个兄弟会组织。1164年，他们获准加入西多会，并得到了专门经过些许修订的西多会会规。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建立之后，又有几个骑士团相继成立，如：埃武拉（*Evora*，后来被称为艾维斯 [*Avis*]) 骑士团，1166年后不久，与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建立从属关系；1170年，圣地亚哥骑士团；蒙特高迪奥（*Montegaudio*）骑士团，约在1221年和1173年被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吸收；1176年前夕，圣胡里安德尔佩雷罗（*San Julian del Pereiro*）骑士团，它也与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建立了从属关系，并在13世纪改名为阿尔坎塔拉（*Alcántara*）。这些骑士团在卡斯蒂利亚、莱昂和葡萄牙都很兴盛，但在阿拉贡却不太兴旺，因为圣殿骑士团在进行了长期自我反思之后于1134年决定在西班牙战斗，而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在这里一直是主导势力。这些武装修会的功用是防护来自阿尔摩哈德人领土的潜在来袭的路线，不过他们也会发

① 位于今西班牙东北部特鲁埃尔省的城镇。——译注

动一些军事战役，羁押囚犯索要赎金，与处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基督徒农民一道垦殖边境地区。这些武装修会的出现表明了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正在形成的一种特征，即民族性。半个世纪前，参加十字军的既有西班牙人，也有翻过比利牛斯山而来的众多志愿者；但此时，志愿者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这部分是因为西班牙人不希望他们来。1159年2月，阿德里安四世只能劝阻法兰西的路易七世和英格兰的亨利不要前去半岛作战，告诉他们除非得到了那里的国王们的许可。他还直白地指出，如果之前没有经过商谈，他们肯定不受欢迎。西班牙再征服运动正在演变为一场民族解放运动。西班牙的十字军，除了少数例外，都具有民族性，且由当地的统治者控制。

134 而在教皇发布的免罪宣言中，不论是针对去东方的十字军还是其他地方的，在语气上总有所保留，不够明确，这可能进一步表明了人们缺乏士气。两种关于苦行赎罪的概念形成了拉锯。一种是老式的观念，认为如果某项苦行足够严厉，比如，进行六个月只吃面包和水的斋戒，或徒步前往罗马朝圣，就能获得“完满”；也就是说这能让上帝觉得满意，可以赎罪。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不论哪一种苦行都未必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因此，有罪者只能仰赖上帝的仁慈，以弥补所有的不足，得到慷慨无偿的免罪机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无关本人为赎罪施行的苦行的性质如何，教皇都可以代表上帝授予免罪权。在最早期的“免罪令”中盛行的是第一种观点，这体现在乌尔班二世1095年为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授予的完全免罪权。第二种观点则变得越来越流行，它在克莱沃的贝尔纳于十字军东征时期写作的文本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在尤金尼乌斯三世发布的谕令《吾等之前辈》（可能就是在贝尔纳的影响下撰写的）中也能找到。1157年、1165年和1166年，阿德里安四世和亚历山大三世则利用了尤金尼乌斯三世的谕令中发展得较完善的观念的各种变体。但到1169年时，理论界又决心重返旧观念，认为十字军只是一种完满的苦行赎罪方式；这必定让教廷感到忧虑。在那一年亚历山大（三世）就此事发表的呼吁中，就指明是“由众所周知的由乌尔班（二世）和尤金尼乌斯（三世）创立的教会管理制度实施的免罪权授予”。在此

后的30年间教廷将始终坚持这种保守的态度，尽管赎罪神学在这些年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迟至1187年以及推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伟大通谕《闻此严判》(*Audita tremendi*)<sup>①</sup>发表之时，这种观念还得到了坚定地表达：

那些怀着悔悟的心和谦卑的灵魂，肩负起这次旅途的艰辛的人们，为赎罪而亡。以正义的信念，我们承诺他们将可以完全赎清罪责，获得永生；不论存活还是故去，他们都将知道，凭上帝的仁慈和使徒彼得与保罗的权威，以及我们的权威，他们将完全摆脱他们一切的罪过所施加的禁锢，因为他们已经恰当地做出了告解。

当时的一位十字军宣传者布鲁瓦的彼得，则把这解释为征战的价值构成了完满的苦行赎罪：

凭借使徒彼得的特权和教会拥有的普遍权威，上主意在以这种标志[十字架]来提供一种解决之道；于是，践行决心，踏上前往耶路撒冷的征途，就应该成为最高形式的苦行赎罪，能完满地救赎犯下的罪责。

## 传统的发展

因此，从1102至1187年的这些年间，经历了一段朝圣与东征混淆的模糊期、一段充满雄心壮志的惨败期以及随后一段低潮期，尽管此时在各个战区仍有些活动在继续。即使经历了如此之多，十字军运动却仍然不够成熟，不过它一直在发展。它开始多元化，开始延及在伊比利亚半岛与穆斯林的战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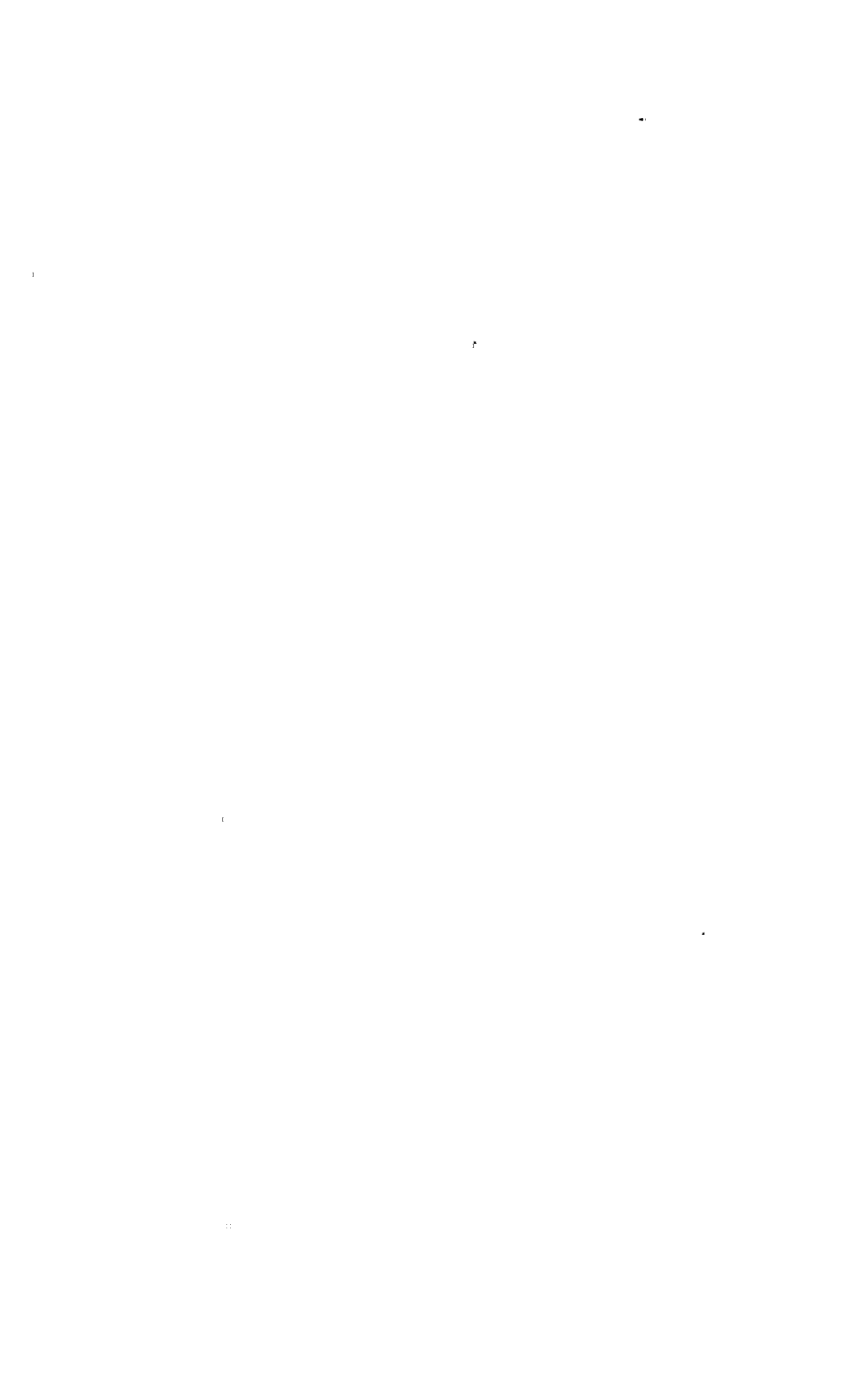
<sup>①</sup> 此题目也是谕令首句的开头两个单词，其原文为“*Audita tremendi severitate iudicii, quod super terram Jerusalem divina manus exercuit...*”，大意为“闻此严判，获知耶路撒冷之地已遭圣手重击……”。——译注

争，以及在基督教世界东北边境之外与异教徒的战争。它还对欧洲内部教皇的对手施压。在西班牙，十字军运动开始有了其独特之处。欧洲的统治者们参与进来，开始出现有组织的经费筹措方式。教皇们确立了自己授权开战的权威，他们也习惯于发表通谕，阐述并重申免罪的权力。不论这些通谕遭遇了怎样的冷遇，它们让教廷中起草这些信件的人熟悉了怎样勾勒十字军将享有的保护权、法律免责权以及精神上的获益，而这一切在13世纪时已经有了精确的论述。与此同时，武装或不武装的朝圣者，在极少有十字军战士相伴的情况下，仍然源源流向巴勒斯坦。这表明，虽然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让基督徒们士气低落，很难被激励起来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远征，但他们对圣地的信念和眷恋并没有被动摇。

此外，正是在12世纪期间，欧洲的贵族和骑士家族开始确立参与十字军的传统，这将在13世纪中对十字军运动的发展形成助益。这方面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比如，曾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发挥很大作用的罗贝尔伯爵的侄子佛兰德斯伯爵蒂埃里（**Thierry of Flanders**），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而且还在1139年、1157年和1164年到访东方。他的妻子安茹的西碧拉是耶路撒冷的富尔克国王第一次婚姻中所生的女儿，最后在伯大尼（**Bethany**）<sup>①</sup>的修道院里出家，度过了余生。他的儿子菲利普在1177年率领一支武装力量来到东方，并死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他的孙子鲍德温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一名领袖，还成为君士坦丁堡的首位拉丁皇帝。茹安维尔的约翰（**John of Joinville**）在1248年陪同法王路易九世前往东方，这表明，他的祖先们在1187年之前树立的先例是如何在其后结出硕果的。不过我们也要指出一点，这个家族为香槟历任伯爵提供了多名大管家，而香槟家族则非常执着于十字军事业。茹安维尔的若弗雷三世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若弗雷四世死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若弗雷五世曾陪同父亲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后来又参加了第四次并为此献身。约翰的父亲西蒙参加了讨

① 据约翰福音第11章，伯大尼是离耶路撒冷约三公里的村庄，耶稣曾在此地施行奇迹，使拉撒路复活。——译注

伐阿尔比派的战斗，又参加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在这些家族传统形成的过程中，欧洲的俗世中人开始为自己找到十字军运动的合适定位；而与此同时，教会人员则开始越来越推崇在俗圣职的观念。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就在1099年耶路撒冷夺回后不久，一批神学家就开始考虑要使这项运动修院化，并视十字军战士为短期修道的僧侣。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我们也能找到这种观点的回应。考虑到均属西多会的尤金尼乌斯三世和贝尔纳对这次东征的影响，这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到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之时，这场运动所具有的俗世中人表达虔诚的特征就已经变得非常明确了。而宗教圣职的因素则逐渐延续进入武装修会的精神之中，骑士精神的观念和实践则开始稀释十字军作为一种赎罪苦行的观念。在1187年之前建立起来的家族传统意味着，如今十字军运动已经成为俗世关注的家族世系、荣誉和家族传统中的一部分。以这种以及其他一些方式，西欧开始无意识地为自己承受萨拉丁夺取耶路撒冷做心理准备了。



## 第六章

# 十字军运动的成年礼（1187—1229）

###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187年秋，哈丁之战的惨败以及耶路撒冷沦陷的消息传到了西方。老教皇乌尔班三世于10月20日过世，据说是因为悲伤过度。不到十天，他的继任者格列高利八世就发出一份通谕，号召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这份名为《闻此严判》的通谕，是十字军史上最能动人的文献之一。它应该是乌尔班三世在过世前起草的，因为从格列高利八世于10月21日当选到已知的这份文献最早版本问世的日期之间仅有八天，实在不足以撰写、通过、修正并印制分发这样一份重要的文献。它以哀悼巴勒斯坦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为开端，随后是一段神学色彩浓厚的段落，将这种灾难归结于惩罚拉丁定居者们乃至所有基督徒们犯下的罪过，并号召所有这些罪人采取行动赎清罪责：

此外，面对那片土地所遭受的巨大苦痛，我们应当不仅考量那里的居民的罪责，也考量我们自身乃至全体基督徒民众的……因此，反省罪责并以自愿惩罚和苦行及虔诚的举动向我们的上主求助，是我们所有人应该做的；我们应当首先弥补自身犯下的罪过，然后再把注意力转向敌人的背叛和恶意。

接下来，它提醒基督徒们这个世界是转瞬即逝的，呼吁他们“以感恩的姿态，接受忏悔和行善的机会”，要“依据上帝的旨意”去驰援拉丁东方，因为“上主以自己的行为教导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弟兄舍弃自己的性命”。在结尾处，它按照惯例列出了一长串十字军战士享有的特权，其中包括传统的免罪权，另外还包括一则禁奢令。通谕中的言辞在此后十字军运动的宣传活动中不断得到回应，到处都在强调悔悟。这标志着十字军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因为如今教皇直接把战争的胜利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健康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思想以大公会议的形式反复出现，直到16世纪。这种为了改革基督教而召开的会议，往往与确保十字军运动成功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138

相关的消息是由热那亚商人带到罗马的。接踵而至的是泰尔大主教乔西乌斯（Joscius）。泰尔是巴勒斯坦沿海地区唯一一座仍然在基督徒手中的城市。人们在蒙费拉的康拉德的领导下积极防守这座城市。康拉德是耶路撒冷的西碧拉第一任丈夫的弟弟，就在哈丁战役前夕来到巴勒斯坦。他本人曾多次向西方求助。乔西乌斯大主教在夏末乘船抵达西西里，那里的国王威廉二世立即做出回应，派出了一支舰队增援。1188年春夏，这支舰队挽救了的黎波里，还为安条克和泰尔提供了补给，从而为这些地方的坚持战斗做出了重要贡献。乔西乌斯应该是在10月中旬抵达罗马。随后，他在冬季前往法兰西，1188年1月22日与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及法兰西的菲利普二世在日索尔会面。这个地方处于诺曼底公国与法兰西王室领地的交界处，当时两位国王正在商谈签订一份停战协议。在他的当面请求下，两位国王，还有佛兰德斯菲利普，以及其他在场的显贵们，当即同意接受十字架，并着手制订计划。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之时，一种新的实践方式开启了。当时讨伐文德人的十字军佩戴的是与众不同的十字架；而人们达成共识，此后各国的十字军战士要佩戴不同颜色的十字架：法兰西是红色的；英格兰是白色的；弗莱芒则是绿色的。亨利二世和菲利普二世还决定为十字军向全民征收一项税，这是这十年里第二次征收的专门税，被称为“萨拉丁什



一税”。

可是随后，西欧险恶的政治局势就开始起阻碍作用了。亨利二世活着的儿子中最年长的一个——普瓦图的理查（Richard of Poitou）伯爵与图卢兹伯爵之间爆发了战争。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均卷入其中。理查转投法王，并于1189年公开反叛，这让两位国王的关系降到冰点。7月6日，就在刚与菲利普二世达成一项与十字军东征有关的决定之后不久，亨利二世去世。9月3日，理查加冕为英格兰国王。十字军东征因此延迟，这导致了一波反对的浪潮。理查比他父亲还更早宣誓接受十字架；舆论认为，即使他确实有意为之，他也绝不能再拖延远征了。11月，理查同意于1190年4月1日带兵与菲利普二世在韦兹莱会合。集合的日期后来又延迟到了7月1日，但英法十字军终于还是启程了。

与德意志的反响比起来，英格兰和法兰西的犹豫不决就显得很糟糕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此时已经年近70岁，统治德意志已有36年。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老人，精力无穷，精明强干，善于灵活应变。他个性鲜明，爱好寻求刺激，虽然这有时候会让他遭受打击。40年前，他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此后的时间里，他有时候也会盘算着重踏征途。他对这场运动的执着，到底是出于一向的虔诚之心，还是更为深谋远虑地与皇帝保卫基督教世界的职责相关，甚或由于认为自己可能成为敌基督临世之前统治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位基督教皇帝这种末世论观念的影响，现在已经很难确定。但他已经打算要响应马西的亨利（Henry of Marcy，即红衣主教阿尔巴诺的亨利 [Cardinal Henry of Albano]）的号召了。亨利是一位著名的十字军理论家，受教皇格列高利八世派遣来到德意志宣扬十字军运动。1187年12月，腓特烈一世被斯特拉斯堡的亨利主教（Bishop Henry of Strasbourg）一次宣扬十字军的布道深深打动。不过，身为皇帝，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做出决定，因为他首先要确定德意志在他不在国内的情况下也能够治理得很好。随后，他以一种传统的戏剧化方式，召集了一次特别宫廷会议——耶稣基督的元老院（*curia Jesu Christi*），由基督而非他本人主持。在莱塔利星

期日<sup>①</sup> (Laetare Sunday, 1188年3月27日), 当弥撒的赞美诗响起时: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 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 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sup>②</sup> 他和众多德意志贵族一起, 在马西的亨利的见证下, 宣誓接受十字架; 这也预示着一场反犹骚乱将要发生。他们出发的日期定在1189年4月23日圣乔治 (St George)<sup>③</sup> 节那天, 并再次选定从陆路进发。他们将自己的计划告知了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 甚至科尼亚的突厥人。希腊人得到保证, 德意志队伍将和平地通过帝国内, 于是他们也随之承诺将提供向导和补给。最后的准备工作是在雷根斯堡完成的, 十字军战士们按照预定的日期来到这里集合, 1189年5月11日全军出发。

这支队伍中囊括了德意志教会和贵族中的众多领袖人物, 应该是有史以来队伍最庞大的德意志十字军了。它组织完善, 纪律严明。一切似乎都进展顺利, 但在穿越拜占庭控制的巴尔干地区时他们开始遭到盗匪的骚扰。希腊人承诺的集市并没有开放, 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为德意志人的到来做了什么准备。事实上, 拜占庭皇帝艾萨克·安格鲁斯 (Isaac Angelus) 刚与萨拉丁签订了一份和约, 同意要拖住并毁掉这支队伍。他们在他们行进的路上刻意设置了重重障碍, 但没有多大成效。艾萨克愚蠢地扣押腓特烈一世派来的使节作为人质, 而他派去阻挡其进程的军队则无功而返。到8月26日德意志人占领普罗夫迪夫时, 他们已经不可阻挡了。艾萨克拒绝渡他们过达达尼尔海峡, 声称除非腓特烈一世送来更多的人质并承诺将未来战利品分一半给他; 但他的要求被无视了。德意志人转而以劫掠来寻求补给。腓特烈一世当时正在与反叛拜占庭的塞尔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保加利亚人<sup>④</sup> 谈判, 他开始认真

① 指大斋节的第四个星期日。——译注

② 出自以赛亚书 66:10。——译注

③ 约公元260年生于巴勒斯坦, 为罗马骑兵军官, 因试图阻止戴克里光皇帝治下对基督徒的迫害, 于公元303年被杀。公元494年被教宗葛拉西乌斯一世 (Gelasius I) 封圣。在西方文化中常与屠龙的传说联系在一起。——译注

④ 瓦拉几亚—保加利亚即保加利亚第二帝国 (1185—1396 或 1422), 曾在巴尔干半岛称雄一时。瓦拉几亚人即今天罗马尼亚人和摩尔多瓦人的祖先。——译注

考虑要不要进攻君士坦丁堡。11月16日，他写信给自己的长子亨利，要其说服意大利的港口城市招募一支舰队，并于次年3月前来到君士坦丁堡城下与他共同围攻该城。

10月底，艾萨克被迫交还了德意志的使节，但他却拒绝以恰当的头衔称呼腓特烈一世，这让此后的交涉又趋恶化。但后来在这一点上艾萨克也不得不屈服。腓特烈一世将自己的冬季总部移到了埃迪尔内，并占有了色雷斯一块很大的区域。拜占庭当局越来越惊恐不安，而双方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1190年2月14日，艾萨克最终同意配备船只送他们从加利波利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不过，与其前任们不同的是，至少他说服了德意志人绕开君士坦丁堡），开放市场，提供给养和人质，释放羁押的西方囚徒，并做出一定赔偿。他还接受了这点：在给养无法到位的地区，德意志人将开展劫掠。

3月1日德意志人离开了埃迪尔内，22至28日间他们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不过，在拜占庭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地区，他们遭遇了在其欧洲领土上曾遇到过的相同的阻碍和不合作状况。4月22日离开阿莱谢希尔（Alaşehir）<sup>①</sup>后，他们进入穆斯林的领地，径直向科尼亚进发。在行军途中困扰他们的是其前辈们也曾遇到的问题：战马和驮畜大量死亡，粮草也耗尽。不过，5月18日，科尼亚被他们征服。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新的补给：突厥人急于让他们离开，也答应给他们提供充足的补给。之后，在30日，他们抵达了位于西里西亚边境地区的卡拉曼。他们再次进入了基督徒的领地，亚美尼亚人友好地欢迎了他们。腓特烈一世用事实证明，率军穿越小亚细亚是可能的。可是，6月10日，情绪高昂的腓特烈一世因为炎热，禁不住冲动的诱惑，又做出了一次壮举，结果这却成为最后一次，搭上了他的性命。腓特烈一世跑到格克苏河（Göksu）里游泳，但这条河又深又宽。在河的中间，他出了意外，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了。无论如何，等手下的贵族把他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因病或因溺水而死亡了。

① 位于今土耳其中西部的城镇。——译注

此前一直表现良好的德意志十字军，曾把拜占庭设置的阻碍毫不留情地碾碎、以整齐的军容有序横穿突厥人控制下的小亚细亚的德意志十字军，在腓特烈一世死后却溃散了。一些人立刻就启程返乡。剩下的人马中，有一部分乘船去往安条克和黎波里，另一些则沿陆路去往叙利亚；两路人马沿途都有不少损兵折将的情况。在安条克，疾病的袭击又让人数进一步减少。8月下旬，这队人马接着又开始沿海岸南下，并于10月初兵临阿卡城下。基督徒已经围困这座城市长达八个月之久。1188年夏，萨拉丁释放了耶路撒冷的国王居伊；但在次年春季，蒙费拉的康拉德却拒绝承认居伊是国王，不让他和西碧拉进入泰尔。居伊的回应倒是勇气十足。他带着数量极少的军队南下围攻阿卡。他的举动迫使麾下的大封臣们放弃之前中立甚至与康拉德为伍的立场，带兵前来助攻。到秋天时，他们大多数已经站在了居伊这一边。这大大削弱了康拉德的力量，因此，到1189年春时他不得不与居伊和解，并得到一块位于巴勒斯坦北部包括泰尔在内的封地。在围攻的数月中，不断有各路十字军来援助居伊，其中就包括1189年9月来到的一支由德意志人、尼德兰人和英格兰人组成的联军，以及1190年7月来到的一支法兰西十字军，其领导人是香槟、布卢瓦和桑塞尔三位伯爵。人们可能会认为，德意志十字军主力的到来能大大增强攻城军队的实力。可事实上德意志人此时士气低落，军中又疾病肆虐，并没有太大战斗力，人数还在不断减少；而去世老皇帝的儿子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也于1191年1月20日去世。到次年春天时，这支队伍剩余的力量大部分已经返乡。

与此同时，法王菲利普二世遵循43年前其父的仪礼，在圣德尼教堂接受了战旗“金色火焰”，随后与英王理查在韦兹莱会师。1190年7月4日，他们开始向地中海沿海地带行进。理查此时年近36岁。他的勇气、充足的后备资源以及领导能力，在各处战场的战斗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事实将证明，他是自塔兰托的博希蒙德之后最优秀的十字军领袖，而且可能比博希蒙德更好。他非常英俊，很自负，但也确实很有效率，还很有幽默感。他继承了一个高效且充满活力的政府机构；从他父亲同意参加十字军开始，这个机

构就已经开始全力为此做准备。坎特伯雷大主教组织了全国性的系统布道动员活动。此外，尽管遭遇了激烈的反对，萨拉丁什一税还是顺利完成了征收。作为补充，理查卖掉了能卖掉的一切，还毫不迟疑地利用每一种能取得现金的关系，抓住每一个能筹措到大笔现金的机会。因此，他的处境非常好，在这次东征的全过程中，这种财政上的优渥状况一直体现得非常明显。菲利普二世更年轻，才25岁上下。他长相平平，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治理法兰西的这十年让他变得谨小慎微，充满疑心，愤世嫉俗，焦躁不安。他不太聪明，也没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很敏锐，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智慧；而且他非常勤奋，不惧艰辛，自控能力极强，谨慎，公正。虽然有些冷酷无情，但他通常也铁面无私。他统治的国家远没有理查治下那么中央集权，因此，他没办法战胜反对征收萨拉丁什一税的势力。他被迫公开宣布该税只征收这一次，下不为例；而且，在王室直辖领地之外，大封臣们征收来的税款将用于他们参与十字军所需的费用。因此，菲利普二世率领的军队规模虽然比理查的大，约有2000人，其中有多达800名的骑士，但他的财政状况比理查紧张得多。

理查早先以为自己到达马赛时可以见到自己的英格兰舰队，但舰队中途停在了葡萄牙，这时还没有到来。理查租用了其他船只，于9月22日抵达西西里的墨西拿，发现自己的英格兰舰队和法兰西的菲利普二世都已经在那里了。在西西里，理查还有些买卖可做，能为他的十字军运动筹措到更多的资金。他的姐姐琼是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的遗孀，他想从夺取了王位的莱切伯爵唐克雷德手中拿回她的嫁妆，以及威廉二世留给他父亲的一份遗赠。理查动用了武力，占领了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城镇巴尼亚拉（Bagnara），此城隔海峡与墨西拿相望。10月4日，他又占领了墨西拿，大肆洗劫。唐克雷德被迫向理查支付了4万盎司的黄金，一半作为琼的嫁妆，另一半作为他自己女儿的陪嫁，因为她已经许配给了理查的继承人布列塔尼的亚瑟。不过，菲利普二世成功地从中拿到了三分之一，理由是根据他与英王在韦兹莱达成的共享战利品的协议。

1191年3月30日，菲利普二世起航前往东方。理查则留下来等他的未婚妻纳瓦拉的贝伦加利亚（Berengaria of Navarre）。这桩订婚实在微妙，因为之前他已经与菲利普二世的妹妹爱丽丝有婚约。最后理查于4月10日起航。他的舰队途经克里特岛和罗得岛前往塞浦路斯，于5月6日抵达那里。岛上的希腊统治者艾萨克·科穆宁（Isaac Comnenus）在12世纪80年代宣布脱离君士坦丁堡独立，此时扣押了一些英格兰十字军战士，他们的船只（其中包括一艘王室宝库的运输船）在该岛的南岸失事了。贝伦加利亚和琼乘坐的大船不敢登陆，一直在岛的沿岸徘徊。理查抵达后，立即要求归还自己的兵士和财物。但艾萨克拒绝了。理查入侵该岛，到6月5日他继续航行前往阿卡时，该岛已经归他所有。此后，塞浦路斯由拉丁人控制了长达近400年。

143 菲利普二世于4月20日抵达阿卡，理查则在6月8日。他们发现城中已人满为患。1190至1191年的秋末至初春，各支十字军陆续到来，其中包括一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率领的英格兰先遣军。与历次十字军的队伍一样，这些军队也都是由不同领袖领导的各路人马的混杂体，他们对耶路撒冷王国的政治发展前景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1190年秋，西碧拉和她为居伊生的两个女儿都过世了。而这就理所当然地意味着，虽然居伊是受过膏的耶路撒冷国王，但耶路撒冷的女继承人现在只能是西碧拉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嫁给了托伦的汉弗莱。我们应该还记得，正是汉弗莱的叛逃粉碎了1186年的反叛计划。一群贵族领袖，其中包括纳布卢斯领主暨伊莎贝拉的母亲玛丽亚·科内玛的丈夫伊贝林的巴里安（Balian of Ibelin）<sup>①</sup>、西顿的领主及海法的领主，计划让伊莎贝拉与汉弗莱离婚，再让她嫁给蒙费拉的康拉德。康拉德人脉很广，已经通过各种事件证明自己能力很强，性格坚忍。伊莎贝拉从她位于阿卡城下的营帐中被人劫走，一个由支持康拉德的教皇使节和康拉德的表兄弟博韦主教主导的神职法庭判定她与汉弗莱的婚姻被解除。代表孱弱的耶路撒冷牧首区参与宣判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并不同意这一

<sup>①</sup> 伊贝林原为耶路撒冷一座骑士城堡的名字，后成为一大显贵家族。——译注

举动。但伊莎贝拉还是被匆匆嫁给了康拉德。之后，这场婚姻被认为犯了重婚罪，而且严格来讲还是乱伦的，因为康拉德的兄弟娶了伊莎贝拉同父异母的姐妹。她随即正式要求得到王国。这项要求被王国最高法庭接受，人们向她表示效忠。而吕西尼昂的居伊似乎就这样完全被晾在了一边。

可以肯定，两位来自欧洲的国王必然会应请求对此事进行干预（理查在塞浦路斯见到了居伊、托伦的汉弗雷及他们的支持者）。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两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各自所处的西欧封建关系和亲属关系圈并不相同。康拉德是法王菲利普二世的表亲。而居伊所在的吕西尼昂家族，虽然极难相处，但毕竟是理查掌管下普瓦图伯国的封臣；而且他们还是理查的父亲所占的那一份利益的竞争者。我之前已经提过，第一代十字军战士吕西尼昂的于格与圣吉尔的雷蒙是同一个母亲拉马什的阿尔莫迪生的。居伊和理查都是她的后代，理查是通过其母阿基坦的埃莉诺的谱系。1177年12月，出自沙尔鲁（Charroux）家族的最后一任拉马什伯爵，在独子过世而其女无所出的情况下，以很低的价格把封地卖给了英格兰国王亨利。有传言说，是亨利强迫他这么做的。居伊的哥哥吕西尼昂的若弗雷，以自己年幼的侄子于格九世的名义，代表家族提出要求，认为根据从阿尔莫迪的长子吕西尼昂的于格六世传下来的谱系，他和他的兄弟们应该得到拉马什，而阿基坦的埃莉诺的谱系关系只能追溯到阿尔莫迪第三个女儿的女儿。若弗雷试图以武力夺取拉马什，但没有成功。不过，吕西尼昂家族的人并没有就此放弃，始终拒绝承认理查对这个封地的控制权。1199年，他们绑架了年事已高的阿基坦的埃莉诺，扣押她直至最终得到这块封地。考虑到他想要安抚这个对自己满怀怒意的家族，我们也就不会奇怪，为什么理查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会对吕西尼昂家族的人表现得特别友善了。

法王和英王同意充当耶路撒冷王位之争的仲裁人，而事态的发展也增加了他们说话的分量。尽管萨拉丁最后关头派兵驰援，但在7月12日阿卡还是沦陷了。作为征服者，菲利普二世和理查根据之前签订的战利品分享协议，瓜分了这座城市。这就意味着，他们把什么划分为王室财产将实质性地

144 影响到谁将在王位争夺战中取胜。7月28日，他们宣布了一个折中方案。居伊将在有生之年继续担任国王，但在他死后，伊莎贝拉和康拉德将继位。所有的王室财产的租税所得将共享，居伊的哥哥若弗雷在南部的雅法和阿斯卡隆得到一块领地，康拉德则在北部的泰尔、西顿和贝鲁特得到一块领地。菲利普二世随后不顾理查的意见，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半阿卡领土给了康拉德，然后于7月31日启程返国。一大群法兰西十字军战士在勃艮第公爵的领导下留在了巴勒斯坦，他们在之后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接受阿卡投降的条件是：缴纳20万第纳尔的赎金，则守军可以获释；将在哈丁被夺的真十字架遗物归还原主；一大批基督徒俘虏获释。十字军将羁押俘虏，直到各项条件得到满足。但当第一笔赎金没有如期到位时，理查怒气冲天，下令当着仍驻扎在阿卡附近的穆斯林军队的面屠杀大部分降军，总数约2700人。与萨拉丁的谈判因此破裂。理查随即决定袭击耶路撒冷。这就意味着，首先要进军沿海岸南下70英里处的港口城市雅法。理查的军队在8月22日出发，并得到基督徒舰队的定期补给。骑士们被分为三大部分，呈纵队行进。在他们的左侧内陆一方，有一支起防御作用的步兵，负责击退大部分进攻。步兵队伍中的一半人马定期轮换休息，转到处于骑兵队和海岸之间的运输队中去。这种方式被描述为“法兰克军队最佳军事策略的经典阐释”，借此，这支军队尽管不断面临穆斯林的伏击和轻骑兵攻势，仍然保持了稳步而有序的推进。步兵队展示了在那个年代极为惊人的有序自制，这是基于理查的命令，因此也表明理查是一位非凡的战地指挥官。9月7日，在阿尔苏夫以北一处于森林与海洋之间仅有一条路宽的地方，萨拉丁成功地引得理查与其交战。萨拉丁采取的是传统战术，以射箭和骚扰侧翼及后部的方式试图打乱理查的队形。殿后的圣殿骑士因为马匹大量伤亡而失去理智，轻率地进击，理查不得不在还没有准备就绪时下令总攻。但他在这次进击达到目的后有效地迅速终止攻势，重组阵列来应对穆斯林的反攻。这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指挥才能。穆斯林军队最终撤退，理查的军队占领了这块地区，而且伤亡也不太大。

三天后，十字军抵达雅法，开始修复防卫工事。摆在理查面前的有三个



选择：与萨拉丁议和；立即推进到耶路撒冷，但此举十分冒险，因为那一带驻扎着大批穆斯林军队；或者攻占阿斯卡隆并加固防守，这样就可以限制萨拉丁从埃及派来援军的能力。起初，理查没有放弃其中任何一项。他开始在雅法集结所有兵力，但也开始与萨拉丁就将巴勒斯坦割让给基督徒这一问题展开谈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议把自己的姐姐琼嫁给萨拉丁的兄弟为妻。但萨拉丁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一项严肃的提议。到10月下旬，理查已经决定要进军耶路撒冷。不过，他推进得相当谨慎，到12月23日时才走了一半路程，刚抵达位于中点的拉特伦（Latrun）。到1月3日时，他来到了贝特-努巴（Beit Nuba），距耶路撒冷仅有12英里。但之后，在听取了当地基督教领导人的建议之后，他决定退兵，返回阿斯卡隆加固防守。20日，理查抵达那里，加固城墙的工程一直延续到6月初。5月23日，他奇袭夺取了更南面的要塞戴尔拜莱赫。这时，理查决定再尝试一下进攻耶路撒冷。6月7日，他率军进发。11日再次来到贝特-努巴。军队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当月末，但因为与雅法之间的补给线受到威胁，而且他意识到自己的军队规模不够大，不足以牢牢守住耶路撒冷，因此，在考虑了事后要进攻埃及之后，理查再次选择退兵。7月26日，他返回了阿卡。

理查的撤退给了萨拉丁机会。27日，萨拉丁向雅法发动攻势，这座城市的防卫还相当弱。到30日，守军开始考虑投降，但理查已经海路前来解围。次日，理查抵达该城，发现穆斯林已经占领了市镇，守军正打算放弃城堡投降。理查从海上发动炮击，守军配合从城堡发动突围战，终于把丧失士气的穆斯林军队赶出了城。理查带来的援军规模很小，可能只有50名骑士，其中最多只有十人有坐骑，另外还带了数百名弓箭手。8月5日，萨拉丁试图奇袭这支军队，但穆斯林们一看到基督徒们以一种坚不可摧的防守阵型现身迎敌时，他们的攻势瞬间瓦解。

但在处理当地的政局方面，理查就没有在战场上那么成功了。他支持吕西尼昂的居伊，打算把自己的征服成果都给他，但蒙费拉的康拉德、法兰西十字军以及当地的领主们都拖他的后腿，因为他们从没有真正接受过1191年

7月28日的折中方案。他们开始着手阻挠理查的军事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理查夺取的领地都会交给居伊。他们还背着理查和穆斯林谈判，希望能直接从萨拉丁那里得到土地授权。1192年2月，他们试图为康拉德占领整个阿卡，但没有成功。理查开始意识到，居伊在政治上实在没什么指望了。于是，大约在4月13日，他在自己军中召开了一次会议，接受了康拉德应成为国王的提议。作为补偿，理查让居伊当上了塞浦路斯的领主；之前理查已把这座岛屿卖给了圣殿骑士们，但在发生了一次反抗他们统治的起义之后，他们急于想把岛退回来。可是，还不到14天，康拉德却在泰尔被阿萨辛派刺客刺死了。我们至今不知道到底是谁要阿萨辛派这么做的，不过，在理查返国的途中，曾参与过围攻阿卡的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五世扣押了他，皇帝亨利六世又囚禁了他。这两人都是康拉德的表亲，说明他们都认为理查是幕后主使。不过，这种种遭遇也可能是因为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联系密切的利奥波德五世和法王菲利浦二世认为自己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遭到了他的羞辱。无论如何，尽管并非出于理查的提议，但毕竟是在他的同意下，伊莎贝拉此时嫁给了十字军战士香槟伯爵亨利。亨利统治耶路撒冷王国直至于1197年去世。

1192年8月中旬，理查生病了。他的十字军已经没什么目标了，西欧发生的事件也让他忧心忡忡。9月2日，他的使者与萨拉丁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其效力将持续三年零八个月。根据协定，基督徒将控制从泰尔到雅法的沿海地带。阿斯卡隆的要塞将拆毁，然后该城将归还给萨拉丁。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可以在巴勒斯坦自由通行。大多数英格兰十字军战士都敬拜了耶路撒冷的各处圣所，但理查却极力阻止法兰西人前往，因为他不会原谅他们对他作战的阻挠。10月9日，理查从阿卡扬帆踏上归途。

## 1197年的十字军行动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还有一段尾声。德意志的腓特烈一世的继承人是其长

子亨利六世。他野心勃勃，想要将西方帝国变为世袭君主国，还想平息西西里的骚乱。通过他妻子的谱系，他宣称有权占有西西里，但最终还是动用了武力才成功。这些目标可能促使他考虑，等理查与萨拉丁的停战协定效力一过，进军东方可能有利于他的国际地位。当然，他必定也身处当时蔚然成风的投身十字军运动的热潮中，他可能也觉得有责任帮因突然去世而没有实现诺言的父亲完成遗愿。他在1195年圣周<sup>①</sup>期间宣誓接受十字架；复活节当天，在巴里举行的圣餐会期间，他号召众臣子参加十字军，并承诺要组织3000名的雇佣兵骑士充实十字军的兵力。6月，他离开德意志，四处推动这次行动，8月1日，教皇塞莱斯廷三世（Celestine III）发布了新的十字军通谕，号召德意志的教士们为十字架的事业做布道动员。分别于10月和12月，在格尔恩豪森（Gelnhausen）<sup>②</sup>和沃尔姆斯，亨利六世亲自见证了众多德意志贵族的宣誓加入。在格尔恩豪森，他还同意了塞浦路斯的一项提议，使其成为帝国的一个封国。不久，一系列谈判也拉开序幕，最终促使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统治者也成为帝国的封臣王。

1196年3月在维尔茨堡的一次圣餐会上，十字军东征的准备工作就绪。一年后，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德意志军队开始在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的港口城市集结。这支军队由美因茨大主教维特尔巴赫的康拉德（Conrad of Wittelsbach）率领，因为亨利六世此时身体不太好，而且还要处理意大利南部再次发生的骚动，已经放弃了亲自率军东征的所有希望。1197年9月22日，德意志主力舰队抵达阿卡。德意志人占领了西顿和贝鲁特，但其实是穆斯林主动放弃了这两座城市。接着，他们又围困了托伦。可随后，国内传来的消息使得军心涣散。9月28日，亨利六世在墨西拿去世，只留下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因此德意志王国和帝国的继承事宜必定引发争议。1198年7月1日，十字军与穆斯林达成停战协定，基督徒对贝鲁特的占领得到承认。到夏末时分，大多数十字军领袖都离开了东方，返国去捍卫自己

147

① 即复活节前的一周。——译注

② 位于今德国中部的城镇，距法兰克福以东约40公里。——译注

的领地和权利。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及 1197 年的十字军行动表明，如果真的发生危机，十字军运动能在欧洲激起怎样的热情回应；而在那样一个年代，又能召集起多庞大的一支军队。从前往东方的人员以及运往东方的物资来判断，这些年里的相关记录实在令人赞叹。在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开局之后，十字军的成果相当引人瞩目。1188 年，基督徒手中只剩下泰尔城和内陆一两个孤零零的要塞；可到 1198 年时，他们几乎掌握着整个巴勒斯坦沿海地带。这就保证了耶路撒冷王国能够继续存活一个世纪。因为当时阿卡正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商贸港口，而对沿海地带的掌控使得王国与欧洲之间的航海路线不再受到来自尼罗河三角洲的舰队的威胁。十字军似乎首次开始大规模使用雇佣兵。1191 至 1192 年间，他们必定在巴勒斯坦得到了雇用，这里总是充斥着他们的身影。而在 1197 年，亨利四世打算从西方运送一支规模相当大的雇佣军。入侵埃及，这个自始至终都盘踞在十字军战士及黎凡特的定居者脑海里的念头忽然就成了优先考虑项。1192 年 6 月，就在即将结束在东方的逗留之时，英格兰的理查发起了一场关于最后一个征服目标的讨论。由骑士团的骑士们、定居者们及十字军战士们组成的议事会把目标锁定在了埃及，但法兰西的菲利普二世留在东方的军队却不接受这项提议。

这次东征的十字军显示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精神，没有在做决定时甘冒一切风险夺取犹大山地<sup>①</sup>，但结果是，他们仍未能获得耶路撒冷。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欧洲社会各个阶层仍然持续表现出对十字军运动的执着。

## 教皇英诺森三世

德意志人开始从巴勒斯坦撤军之时，一位新教皇当选了。1198 年 1 月 8

---

① 犹大山地又称中央山脉，位于巴勒斯坦中部，耶路撒冷就在其北部丘陵中。因此，这片山地可泛指圣城一带。——译注

日，罗塔里奥·德伊·康蒂·迪·塞尼（Lothario dei Conti di Segni）当选，称英诺森三世。他当时可能才 37 岁或 38 岁，所以相对来说还很年轻。他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因此对旁人做出判断或做出各种决定，甚至是立法决定时，都可能有些草率。他对自己作为基督的教区领袖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认为它拥有统摄教会各方面事务的权威，对世俗事务也拥有最终决定权。不过我们也应该强调，他关注的主要还是教会事务，他做出的决定也通常都很务实——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的前任们在向世俗大众传道，启动十字军之后，一般都满足于把筹划和组织工作交给俗众自行完成。但英诺森三世所持有的观念和个人的性格，让他比自己的前任们都更加关心十字军的组织管理事务。在 12 世纪，十字军运动的战地指挥权在国王们手中，如法兰西的路易七世和德意志的康拉德三世，法兰西的菲利普二世、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和德意志的腓特烈一世。人们常常认为英诺森三世特意把国王们排除在了他发动的十字军运动的组织工作之外，但这种观点是具有误导性的。当时的情形更应该这样看：此时德意志的亨利六世刚刚去世，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和法兰西的菲利普二世都并不急于再次接受十字架；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英诺森三世积极地着手亲自操持一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将表明，教廷没有足够的合法的力量或组织能力来成功地开展一场十字军运动。

虽则如此，英诺森三世对这场运动做出的贡献除乌尔班二世之外无人能及。他并没有打算亲自领导一场十字军东征。早在 1198 年 8 月时他就坦言，他的职位事务繁忙，不可能允许他亲自前往东方。但十字军运动无论是从思想还是政治层面都非常契合他的性格。似乎没有哪位教皇像他一样为这场运动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也没有哪位教皇像他一样为十字军四处布道呐喊。可能也没有哪位教皇会像他一样如此莽撞地为了宣扬十字军的需要，甚至使一条教会法的基本原则也退居次要：他甚至宣称，由于圣地形势危急，男人可以不经自己妻子的同意就接受十字架参加东征。这一宣言违背已婚女性的天然权利，也违背了婚姻伴侣双方拥有对等权利的原则。而他的理由也让教会律师们感觉很不舒服。英诺森三世利用了与世俗世界的类比提出，

既然妻子的反对不能改变世俗君主提出的服兵役的要求，那这种反对同样也不能阻碍天国君王的命令。以此，他发展出了一个在他的信件中能够找到的主题，即：尽管从本质上讲是自愿的，但宣誓参加十字军具有道德上的强制性。这是上帝对合格的基督徒提出的要求，因此，拒绝参加的人不可能完全不受惩罚地就对此置之不理：

对于那些拒绝参加的人，如果偶有人确实对我主特不敬，我们将代表使徒保罗庄严地宣告他们……将就此事，在末日审判的那天当着威严的审判官的面，对我们做出回应。

149

另一方面，如果说对这场运动的关注已经占满了英诺森三世的思想令他无暇他顾，那也是错误的。他属于那种激情派，有能力全神贯注于目前面对的任何问题。他在位期间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例，也能表现他的领导才能和个人风格。有人指出，英诺森三世在继承教皇之位前并没有打算要推动十字军运动。只是到1198年夏天，在他当选的六个月后，相关的迹象才首次出现。这可能是对德意志十字军溃败做出的回应。

##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198年8月，英诺森三世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份通谕《在悲痛之后》（*Post miserabile*）。他呼吁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和法兰西的菲利普二世签署一份五年停战协议，并要求他们向菲利普二世提供雇佣军。不过他也明确表示，这次十字军行动早期的指挥权将完全由他掌控。招募的十字军要准备服役两年，直到明年3月。教皇使节将先期被派往巴勒斯坦，为他们的抵达做好准备。教会的高级教士都领命要派出骑士或提供相应的钱财。关于免罪的观念也有了新的说法。英诺森三世选择了现代神学的赎罪观，以及在克莱沃

的贝尔纳和尤金尼乌斯三世的文字中已经预示出的那种免罪观。通过这一举动，他牢固地确立了天主教此后所知的那种“宽容”观念。教皇不再单纯地宣称苦行赎罪本身是令主满意的。因为如今他是在代表上帝来承诺赦免罪责，强调的重点不再是有罪者做了什么，而在于仁慈的上帝通过授予人们从事某项荣耀事业（在告解和斋戒之后）的机会，体现出让有罪者能够补偿一切的仁爱意志：

我们，相信上主的仁慈和受眷顾的使徒彼得和保罗的权威，凭着上主赋予我们的管束和许可的权力，尽管本不配得，却能凭此授予所有亲自承担起这次旅途的辛劳和花费的人们以完全的罪责赦免权。对于所犯下的罪，他们已经用声音和心灵进行了救赎。而且，作为对正义者的奖赏，我们承诺他们能享受更大的永恒救赎。

这种观念让当时的人们印象非常深刻。在此次十字军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雷（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写道：“因为这种宽容大爱是如此伟大，人们的心灵深受触动。很多人宣誓接受十字架，正是因为这种大爱至伟。”

150

起初，英诺森三世并没有打算进行一场大规模远征，因为他预计的准备期只有短短六个月。但后来到了秋季，他写信给所有的大主教，扩展了之前关于人力和财力的要求。他希望他们召开教省会议来商讨此事。此类会议举行了至少一次，是1198年下半年在第戎。众多出席的主教都承诺，将捐出本教区收入的3%提供给十字军。一年后，在1199年12月31日，英诺森三世发布了另一份通谕《加重东方的负担》（*Graves orientalis terrae*），除了少数例外，全教会均需捐出2.5%的收入，“因为最伟大的需要要求这样的贡献”。在俗人士也被鼓励积极捐献，为此各个教堂都设立了募捐箱。这些捐款将提供给无力承担东征花费的十字军战士，但他们要承诺在圣地至少待上一年。不过，派兵替代自己前往也是被许可的。

这开启了复杂的教会税收体系形成的序幕。确实，由于十字军运动已经变得如此花费不菲，比12世纪时君主们偶尔征收的税款更有效率的资源支持体系迟早都需要建立。但就在16个月的时间之内，原先向广大公众普遍发出的号召捐钱支持一场意义特殊的远征的呼吁，就转变成了针对整个教会的税收体制。这说明，起初的十字军行动计划已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野心勃勃的计划。事实上，就在《在悲痛之后》发布大概一个月后，英诺森三世必定听闻了一个新动向，这迫使他改变了主意。1198年7月1日，耶路撒冷王国与萨拉丁家族还活着的最高级别的成员阿迪勒(al'-Adil)签署了停战协定，将停火期定为五年零八个月。这就使得挥师东征巴勒斯坦变得不合时宜。当从西方来的十字军抵达后，耶路撒冷王国方面首先就很明确地禁止他们采取军事行动。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应该在1198年9月末或10月传到了意大利。于是起初的计划似乎重新进行了修订和扩展，修改后的内容在1201年春以十字军领袖代表与威尼斯签署的一份协议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威尼斯承诺运送4 500名骑士、同样数量的马匹、9 000名侍从和20 000名“装备良好的”步兵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这在了一项秘密的附件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这支军队的规模相当大，13年后在这一时期西方最重要的战役——布汶战役中，双方的战斗兵力加起来也还不到20 000人，而此后历次走海路的十字军东征行动也再未达到过这样的规模。派遣20 000名步兵这个数量尤其庞大，而且非常详细，因此很难相信

151 派往威尼斯的使者（可能有4人，已经是十字军战士）会认为这完全由志愿者组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一结论：在租下这么多舱位容纳步兵时，谈判者们应该都默认大部分的兵力是雇佣兵。

这似乎表明，亨利六世在1195年所做计划中预示的那种十字军，在这次行动中得到了实现：一小群核心的十字军将指挥规模较之大得多的雇佣军；兵力将全部招募自西方，从西方运输到东方。如此大规模使用雇佣兵的决定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征收教会税，因为这肯定与招募大量雇佣兵带来的现金需求有关。乍一看这非常古怪（如果考虑到运输的高昂费用，也显得很夸



张），为什么要在欧洲招募人员？如果直接在巴勒斯坦招募，肯定会更便宜。但这么做的理由是，他们设想的是直接派一支从欧洲起航的军队去攻击亚历山大城，如果目标直指埃及的话，那么在巴勒斯坦招募人员就不是上选了。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十字军进入圣地以来，埃及就一直在基督徒们的视线范围之内。这个国度将成为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和法王路易九世第一次东征的目标；在14世纪，它也一直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在十字军运动谋划者们的蓝图边缘徘徊。对埃及怀有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到那时为止，它都是整个地区最富裕的国度。它与旧约和新约里的众多事件相关。它曾是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此时也仍然有大量基督徒臣民。因此，征服埃及可以收复被不当占据的领土为由，堂而皇之地进行。占领埃及还将有利于西方商业的发展，这不仅因为它处在国际贸易路线上的重要位置，也因为其舰队始终对与西方的交通构成了威胁。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确信，在埃及取胜最终能带来耶路撒冷的光复；而且只要西欧人牢牢掌握着此地，穆斯林就只能处于防守态势。时人知道，尼罗河的洪水当年没有泛滥，而埃及正遭遇经济危机。他们相信，如果亚历山大城陷落，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将无力抗拒入侵。

尽管亚历山大城的商业重要性此时正受到阿卡的挑战，但它仍是从远东开始的、最固定的香料运输路线上的中转站，是地中海商人们所知的最大的贸易中心。人们实在难以想象出比这更丰厚的战利品，而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攻击目标，它显然很弱。亚历山大的港口不难攻破，1174年7月29日一支大规模的西西里军队在城前登陆，基督徒的船只在港口里肆意冲撞，这向人们表明要攻击这座城市简直是易如反掌。西西里人在8月1日突然撤退，但这座城市的防守之弱又再一次得到证明：下面我们将谈到，1365年塞浦路斯国王彼得一世的十字军又短暂地占领了这里。1202年，十字军约定4月在威尼斯集合，初始计划是6月从这里起航。这就意味着他们会在7月末或8月初兵临亚历山大城，而此时正值尼罗河通常的水患时节，这就让埃及人无暇救援该城，也给十字军在10月末洪水退去之前发动一系列进攻、攻入该国其他区域留出了时间。

大多数的筹划工作必定都是在幕后悄然进行的。有相当一大批人响应了十字军传道士讷伊的富尔克（Fulk of Neuilly）的讲道。人们通常认为，贵族和骑士们虽表现出热情，却显得比较迟缓。但这可能是一种错觉，1199至1200年之交的冬季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接受十字架的浪潮，看似说明武人们响应得较晚，但都似乎例证了中世纪中期典型的、事先精心设计掌控的戏剧舞台式的隆重行事方式。1199年11月28日，在艾克雷（Écry，今阿斯菲尔德城 [Asfeld-la-Ville]）举行的一场比武大会上，两位年轻的伯爵——香槟的蒂博德（Thibald of Champagne）和布鲁瓦的路易都宣誓参与十字军；一同加入的还有他们的众多封臣，以及法兰西岛<sup>①</sup>的两位重要领主：蒙福特的西蒙和蒙米赖的雷纳德（Reynald of Montmirail）。其后，在2月23日，圣灰星期三<sup>②</sup>，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即蒂博德三世的姐夫<sup>③</sup>，也宣誓参加十字军；同时加入的还有他的兄弟亨利和尤斯塔斯以及手下的众多封臣。

这三位伯爵彼此之间关系密切，而且都出自有着悠久十字军传统的家族，因此自然就成了这次行动的领导人。他们一同进行了筹划。在苏瓦松举行的一次会议决定，把准备时间延长到应募者数量有所增加的时候。两个月后，另一次在贡比涅举行的集会上，每位伯爵选出两人，组成一个六人团队，授予他们尽力与几座航海贸易城市谈判以争取最优条件的权责。这六名代表，其中两名是赫赫有名的北方游吟诗人（trouvère）<sup>④</sup>贝蒂讷的科农（Conon of Béthune）<sup>⑤</sup>和日后为十字军写史的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雷一世，决

① 以巴黎为中心，俗称大巴黎地区，历史上法兰西王室实际控制的区域。——译注

② 大斋节首日，因耶稣在星期三被出卖，所以每次所在的日子均为星期三，当天教会要进行涂灰礼，作为悔改的象征。——译注

③ 鲍德温娶了蒂博德的姐姐香槟的玛丽。——译注

④ 有时也拼作 *trouveur*，是朗格多克方言中 *trobador*（游吟诗人）一词在法兰西北部方言中的对应形式，指与其大致同时期（中世纪盛期）并受其影响的一批用法兰西北部方言作曲演奏的流浪诗人、歌者。——译注

⑤ 1150—1219 或 1220，生于阿图瓦，著名北方游吟诗人，曾为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与海璐的伊莎贝拉的婚礼献唱，也为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皇帝的鲍德温的妻子香槟的玛丽献唱。他参加过第三次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第四次东征期间任鲍德温的发言官，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又在拉丁帝国里担任了不少重要职务。——译注

定前往威尼斯。他们在仲冬时节翻越阿尔卑斯山，于1201年2月把谈判书呈递给总督委员会和总督恩里科·丹多罗（**Enrico Dandolo**）。丹多罗此时年事已高，还瞎了一只眼睛。但他阅历丰富，修养深厚，精明强干，坚韧不拔。他们最终达成了我们之前已经提及的协议，将费用总额商定在了85 000科洛涅银马克（这个价格并不过分），所有钱款将在1202年4月之前分期付清。在圣马可教堂举行的一次集会正式批准了这个协议，一份复本很快呈送给教皇请予批准。

使者们回到法兰西的时候，发现香槟的蒂博德三世已经奄奄一息。在勃艮第公爵和巴勒迪克伯爵都拒绝接管他的指挥权后，1201年6月末在苏瓦松举行的一次会议决定将指挥整支军队的权力授予蒙费拉侯爵卜尼法斯（**Boniface of Montferrat**）。卜尼法斯此前没有参加过十字军，但我们在十字军中已经见到过他的两位兄弟：一位是威廉，娶了耶路撒冷的西碧拉；另一位是康拉德，娶了西碧拉同父异母的姐妹伊莎贝拉。他的第三个兄弟雷尼耶娶了一名希腊公主，1183年遭暗杀之前，在拜占庭帝国中已经升至凯撒头衔。我们之前也已经提到过，蒙费拉家族的成员关系网十分强大，是法兰西和德意志王室家族的侄子辈。确实，法兰西的菲利普二世也可能提议让卜尼法斯担任这次东征的领导人。卜尼法斯是当时最有名的军事将领之一，他的宫廷是骑士们来往的中心。他还是施瓦本的菲利普（已故皇帝亨利六世的弟弟）的好友兼臣子。菲利普曾竞争西方帝国的皇位，并于1198年4月当选。因此，他在利益上与教皇有冲突，因为教皇当时垂青的是他的竞争对手布伦斯威克的奥托（**Otto of Brunswick**）。菲利普与拜占庭帝国皇室有姻亲关系，因为他的妻子是伊莲娜·安格卢斯（**Irene Angelus**），其父皇帝艾萨克被她的叔父亚历克塞废黜、弄瞎，与她的兄弟亚历克塞·安格卢斯一起被囚禁。卜尼法斯在1201年夏末来到苏瓦松，接受了军队的领导权，宣誓参加十字军。他随后取道西多（当时那里正好有一次重要的宣誓接受十字架仪式与西多会的大集会同时举行）去往德意志，参加施瓦本的菲利普在海格瑙举办的圣诞宫廷宴会。

菲利普的妻弟——年轻的亚历克塞·安格卢斯也来到了这次宴会现场。他逃离了叔叔的监视，逃到西方代表自己的父亲来求援。延迟攻击亚历山大城，转而把兵力用于迫使君士坦丁堡产生政局变动的提议，很可能在海格瑙得到了讨论；次年2月，又由亚历克塞·安格卢斯呈愿给了教皇。3月中旬，卜尼法斯也向教皇进言。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英诺森三世必定否定了他们任何相关的提案，因为当1202年仲夏十字军开始陆续抵达威尼斯时，先前的决定并没有发生变动。

154 进攻亚历山大城的提议已经变得尽人皆知，消息也传到了埃及，据说埃及政府试图买通威尼斯人。但埃及人并不需要担心。招募20 000名步兵已经超过了十字军领袖们的能力和资源许可范围，更何况没有证据表明教会的四什一税<sup>①</sup>已经在征收，更别说是大家的捐献了。由于阻力巨大，在英国此类税种直到1217年才征收。到1208年，在意大利一些地区根本就还没开始征收。即使招募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是可能的，从欧洲直接入侵埃及的计划也实在太野心勃勃了。确实，西西里人曾在1174年到了亚历山大城，但他们的军队规模小得多，而且他们的进攻并没有得手。相关教训在1204年后得到了吸取，第五次东征和路易九世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都没有选择直接从西欧向埃及发动进攻。在1218年发动进攻之前，第五次十字军先在巴勒斯坦集结。1248至1249年，路易九世的十字军则是在塞浦路斯过冬。

1202年4月，英诺森三世仍然充满希望，至少在表面上。但他正在日益变得绝望的迹象必然表现在了他发布的下列教谕中：允许十字军战士在不经妻子同意的情况下宣誓加入十字军，这发布于1201年9月。据说，很多十字军战士对他的安排并不满意。有些人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有些人决定不取道威尼斯，而选择自己走，直接去往巴勒斯坦。最终没有成行的那些人中，肯定有很多人都认为，因为领导人没能招募并筹集足够的款项组

① 即原书第150页所说的教会收入的2.5%。——译注

成要求的雇佣军，直接从欧洲入侵埃及的计划肯定要泡汤。没有人准时抵达。到1202年早秋时节，人们发现，预想的33 500人中只有三分之一（包括大约1 500至1 800名骑士）集结到位。其结果就是，尽管各位领导人竭尽全力做出各种努力，还自掏腰包慷慨捐献，但十字军最后还欠威尼斯人34 000科洛涅银马克来支付已经准备好的各项航运工作。威尼斯人此前是从自己的商业贸易利润中抽出钱来作为成本，进行大规模的造船准备，以凑够一支有500艘船只左右的舰队。因此，他们决心一定要拿回应得的报酬，甚至还威胁说要切断驻扎在潟湖与亚得里亚海交汇口的大岛利多（Lido）岛上的十字军的补给。冬季正在逼近，一旦来临就意味着航海季节的结束。因此，还没等到离开欧洲，军队就陷入了十字军运动最典型的困境——极度缺乏现金，尽管英诺森三世此前做出了革命性的创举，尝试为这项事业对教会征税。

就是在这时，威尼斯总督提出十字军可以延期偿付债务，直到他们可以用战利品来抵还，但条件是十字军要帮他从小匈人手中夺回达尔马提亚沿海的扎达尔港。十字军接受了，随后他们发现，这一趟十字军东征的起点竟是攻击一座由十字军同伴控制的基督教城镇，因为匈牙利的国王阿梅里克也宣誓接受了十字架。不论阿梅里克占领扎达尔是对是错，教会都理应保证他继续占有这座城镇，正如必须在攻击扎达尔的十字军离开家乡期间保护他们在家的财产一样。十字军中许多人都为此忧心忡忡。而当威尼斯人拒绝接受教皇使节彼得·卡普阿诺（Peter Capuano）呈递的教皇谕令，还迫使他返回罗马之后，这种情绪越发浓烈。于是脱队事件不断发生。在离开威尼斯之前，彼得·卡普阿诺似乎已经打算对攻击扎达尔的计划睁只眼闭只眼，却被迫坚持让一些主要的教会人士压下自己的疑虑，留在队伍当中，以充当精神上的引导者。就连蒙费拉的卜尼法斯也觉得最好还是先离开十字军前往罗马。他直到扎达尔陷落之后才返回军中。

一旦他们的条件被接受，恩里科·丹多罗和众多威尼斯领导人就宣誓接受十字架出征。一支由200多艘船只，包括60艘桨帆船在内的舰队，于

1202年10月初从威尼斯出发。这些船只很多都进行了特殊的设计，专门用来直捣亚历山大城。一位当事者回忆说，“这些圆船上装满了大大小小的投石器，以及大量工程所需的装置”。船只还能排成一列构成浮动炮台。除了投掷石块和希腊火的装置之外，上面还带有爆破梯和云梯。有些船只还能携带马匹，并能利用斜道把已经全副武装的马匹运送上岸。他们慢慢地沿着海岸航行，特意要炫耀武力，震慑其他臣服的城市。11月10日，他们来到扎达尔沿岸。十字军登陆了。但就在此时，他们收到一封教皇的来信，禁止他们攻击基督教城镇，信中明确提到了扎达尔的名字。一些十字军领导人物，以西多会修士沃德塞尔奈的居伊（Guy of Vaux-de-Cernay）和蒙福特的西蒙为首，公开表示他们代表教皇反对攻城，他们甚至还送信给扎达尔的守卫者，鼓励他们坚持抵抗。随后，这批人后撤一段距离，没有参与后续行动。11月24日，该城陷落，遭到洗劫，战利品被十字军和威尼斯人瓜分。

当时人们已经决定在扎达尔过冬，因为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实在已经过了航海期。就在他们驻扎在这里时，蒙费拉的卜尼法斯于12月中旬归队。接踵而至的是施瓦本的非利普派出的使节，代表亚历克塞·安格卢斯提议，如果十字军在东征途中能够帮助他和他的父亲重夺拜占庭的皇位，那君士坦丁堡教区将遵从教皇，另有20万科洛涅银马克可供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分享，希腊人还会为十字军额外提供一年的给养。如果需要的话，亚历克塞·安格卢斯本人也会加入十字军，并贡献一支10 000人的希腊军队；而且在他有生之年，都将自掏腰包在巴勒斯坦保有一支500名骑士的军事力量。

进攻亚历山大城的计划此时并没有被放弃，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只是被推迟了而已。八个月后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城外时，圣波勒伯爵于格（Hugh of St Pol）还报告说，十字军派遣了一个使团到埃及，威胁要开战。他在写给布拉班特的亨利的信中说：“你应该知道，我们会在亚历山大城前与埃及的苏丹比试。”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为蒙费拉的卜尼法斯服务的游吟诗人瓦克拉斯的兰伯特（Raimbaut of Vaquerias）还谴责新任拉丁皇帝没有发动入侵埃及的战事。大约与此同时，1204年5月27日，耶路撒

冷王国的 20 艘船只溯尼罗河的支流罗塞塔河而上，在两天之内洗劫了福沃（Fuwah）。因此耶路撒冷国王本人也参与了这项计划，而且他应该还在期盼计划实施，而这场劫掠应该是作为大规模入侵的先声来策划的。他不可能认识到形势此时已经发生了大转变，想要对埃及发动全面攻击只能一直等到 1218 年。

考虑到他们还执着于亚历山大城，亚历克塞的提议必定看来如同上天的好意，因为这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让十字军摆脱由于推迟进攻埃及而陷入的进退两难境地。能够经由与拜占庭皇室结盟而在君士坦丁堡享有特权，随后又能在皇帝的物质支持下继续进攻埃及，这个机会，至少对威尼斯人而言，实在是千载难逢，绝不可错失；尤其考虑到它的舰队本来就装备有可威胁到任何一个防守森严的港口的装置。威尼斯人和十字军的大多数重要领导人都接受了亚历克塞·安格卢斯的条件，可是，由于这意味着公然违抗教皇，军中大多数人实在无法轻易忽略这一点，他们最终选择接受，实在是因为另一个选项——解散十字军更令他们无法想象。不满和焦虑的情绪在蔓延，脱队现象更加严重，其中还包括蒙福特的西蒙。

由于他们的不服从，十字军已经自动遭受了绝罚（*excommunication*）<sup>①</sup>。军中的主教们准备为大家实行暂时的赦免，同时派一个使团到罗马解释行为动机，乞求原谅。英诺森三世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的目光仍然还聚焦在埃及。他心心念念的十字军终于出发了，但如果此时他不灵活行事，这支队伍可能就要解散。他打算赦免十字军，条件是他们归还非法取得的物品，而且此后不再攻击基督教的领土；但他拒绝赦免威尼斯人，还发布了一项针对他们的正式绝罚令。可是现在，本来应该直接归他管辖的人们却完全违背了他的指令，并且打算继续在诸种事项上违抗他。扎达尔没有还给匈牙利。蒙费拉的卜尼法斯拒绝全面公布对威尼斯人的绝罚令，他瞅准了英诺森三世最忧虑的一点，解释说我不想十字军因此瓦解；如果教皇坚持的话，他也只会把绝罚令单独拿给威尼斯人。而当英诺森三世在 1203 年 6 月回信坚称教皇

① 原意为断绝往来，是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信徒的一种处罚。被处罚者轻则不能领圣体，重则不能进入教堂、不能接受圣事。——译注

谕令必须公之于众，并重申十字军不能再攻击基督教的领土——这次是特指拜占庭帝国领土——时，十字军的舰队已经逼近君士坦丁堡。

1203年4月末，十字军从扎达尔起航，亚历克塞·安格卢斯在科孚和他们会合。5月24日他们离开科孚岛，来到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城防前，并于6月24日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对面的卡德柯伊（Kadiköy）登陆。他们随后北上到达于斯屈达尔（Usküdar，即斯库塔里 [Scutari]），于7月5日渡海到达加拉塔，位于君士坦丁堡的主要港湾——巨大的湖区金角湾的另一边。6日，他们猛攻加拉塔的主要防守工事，突破了从入口处延伸到湖区的防守链。此时十字军开始沿着金角湾的海岸行军，绕到它的顶端，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外安营扎寨，地点选在城墙与水域之间。威尼斯舰队占领了港湾，准备猛攻岸上的防守工事。7月17日，一场大规模攻击发动，威尼斯人占领了城墙的四分之一，但当听说希腊人要突袭十字军时，他们又放弃了新占领的阵地，虽然这支突袭队没怎么真正交火就撤退了。尽管攻城战失败了，但皇帝亚历克塞三世于当晚逃离，失明的艾萨克·安格卢斯获释。他不情不愿地同意了自己的儿子订下的条款，8月1日，年轻的亚历克塞·安格卢斯被加冕为他的共治皇帝。

到此时，由于大规模的脱队现象，非威尼斯人的十字军战士数量已经大大减少。1203年1月，只发现有12个与威尼斯人一道宣誓航行到君士坦丁堡的人。到次年5月，只有不到20人，<sup>①</sup>甚至可能少于10人，还公开表示愿意继续这次征途。而且，毫不奇怪的是，十字军队伍的大失血还在继续，大约在1203年8月1日圣波勒的于格所写的一封信中，于格提及在君士坦丁堡一战之前，法兰克人战斗队伍的兵力只有500名骑士、5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于格的估计得到了另一名当事人克莱里的罗贝尔（Robert of Cléry）的确认。罗贝尔在估算大约同一时期的状况时说，法兰克人的队伍中骑士不超过700名，其中有50人还是步兵。因此，1202年从威尼斯出

---

① 原文如此。——译注



发的骑士当中只有 33% 留了下来，仅占到 1201 年预估值的 11%。另一方面，十字军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东征的序曲终于接近尾声了，尽管他们同意在亚历克塞·安格卢斯承担费用的情况下留在这里过冬。亚历克塞·安格卢斯此时想借助他们的力量作为自己执政初期的稳定支柱。他们给教皇以及西方诸王写信，解释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并宣称要将征途推迟到明年 3 月。与此同时，亚历克塞·安格卢斯向英诺森三世保证，他确实打算让东正教会归属罗马。英诺森三世再次迟疑了，直到次年 2 月才做出回复，但他只不过重新肯定了十字军和威尼斯人的行动，并命令他们继续东征之路；他还告诉军中的主教们，要确保各个领导人都切实做出了苦行赎罪。

然而，冬季时分，君士坦丁堡的形势却日益恶化。亚历克塞·安格卢斯支付了他所承诺的钱款的头期，但希腊民众和教士们非常厌恶西欧人的到来，城中不断爆发骚乱和派系斗争。亚历克塞·安格卢斯逐渐疏远了自己的赞助人，后续钱款不见踪影。11 月，十字军和威尼斯人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向他呈递了最后通牒，敌意爆发。1204 年 1 月末，一场政变推翻了亚历克塞·安格卢斯和他父亲，一波仇视拉丁人的浪潮汹涌助推亚历克塞一世的一个玄孙登上了王位，是为亚历克塞四世。

158

十字军此时既无法前进，又没法返回西方。他们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中，而且缺少补给，不得不诉诸劫掠。3 月，他们做出决定，眼前只有一种行动可能：攻占君士坦丁堡，兼并拜占庭帝国，即便这一行动让许多人感到焦虑和紧张。就在攻城前夕，军中的教士们指出希腊人罪恶深重，谋杀自己的皇帝，并且一直企图分裂教会；他们希望能以这种详尽的合理说法让人们心里感到舒坦些。恩里科·丹多罗代表威尼斯，蒙费拉的卜尼法斯、佛兰德斯的鲍德温、布鲁瓦的路易和圣波勒的于格代表其他各路十字军，签署了一份就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瓜分战利品的协议：在仍拖欠钱款的数额之内，威尼斯人可以占有全部战利品的四分之三，剩余的则均分。威尼斯确保了自己会继续拥有之前拜占庭皇帝们授予的特权；设 12 位选举官，威尼斯和十字军各选一半；选举出一名拉丁人皇帝，他将拥有四分之一的帝国领土，包

括君士坦丁堡的两座皇宫，剩下的四分之三将由双方均分。没能赢得皇帝之位的一方的教士阶层，将有权为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提名一个教堂委员会，并由这个委员会选出一名天主教牧首。双方将各自为自己的教堂选择教士，教堂获得的捐助将正好够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其余所有一切都将被视为战利品。双方同意都会在这个地区待上一年，以帮助巩固新的拉丁帝国；共同组建的联合委员会将负责分配头衔和封地（两者既可通过母系也可通过父系继承），并安排各项服务。威尼斯总督本人不需为皇帝行军事服务，但威尼斯领土上的封地所有者有此义务。任何与威尼斯交战的国家的公民都不许进入帝国。皇帝将宣誓遵守这份协议，由威尼斯总督、蒙费拉的卜尼法斯和两方各派出的六名委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将负责在必要情况下调整协议条款。双方都同意为自己的抗命之举向教皇自请绝罚。人们经常指出，这份协议奠定了拉丁帝国的组织构成，使其拥有一个权势很弱的皇帝，而国中威尼斯的势力却过于强大。

159 关于参加最后攻城战的兵力到底有多少，人们存在争议。在圣波勒的于格给出的 3 000 名战斗人员之外，还应该加上大约 1 000 名仆从和营地随员。普莱尔教授认为威尼斯军队的数量大约为 27 000 人，因此就让此时幸存的兵力达到了大约 31 000 人，其中大约有 12 000 名战斗人员。在这之外，还可补充算入在 1203 年 8 月被希腊人驱逐出君士坦丁堡后到十字军中寻求避难的西方定居者——大约 15 000 人。据一位在场者所言，这批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多达 6 000 人可以使用武器。据称，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部队“全部算起来在 20 000 人以下”，想象这样一支军队并不困难。

战斗在 4 月 9 日拂晓时分开始，进攻目标是海湾护墙：前一年的战斗已经证明陆上护墙十分坚固，而威尼斯人从金角湾海域发动的进攻则更有成效。这次进攻失败了，但在 12 日攻势再起，在浮动炮台将云梯扔向塔楼顶端时，军队乘机登陆攀上城墙。到傍晚时分，十字军已经控制了一段护墙，开始向城内渗透。日落之后，战斗结束，十字军战士们枕着武器在德意志人钻木得来的微弱火光下入眠，但这星星火苗最后却点燃了城镇一些邻近街区

的木制建筑物。清晨，十字军预计会有新的抵抗浪潮，但却没有出现，因为皇帝已经逃跑了。接下来的三天里，君士坦丁堡被洗劫。当然，这是被攻占的城市常有的宿命，可希腊人不会忘记或原谅这样的行为。凡事都要有个限度。军中对洗劫的执念因十字军没能还清欠威尼斯人的债款而加剧，再加上攻城部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被赶出来的以前城中的居民，他们怨气冲天，急于报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极端过分的行为会出现。此外，君士坦丁堡以拥有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圣物宝库而闻名，而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一直有偷盗圣物（*furta sacra*）的传统，偷盗圣人遗骨（如果成功的话）被视作合理的行为，只要盗窃者能证明所关涉的圣人有意愿想让自己的遗骨移居别处。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可以被看作一次大规模的圣物偷盗，其背景是1187年哈丁之战中真十字架遗骸失落之后，西欧因此而弥漫的对圣物的狂热渴望情绪。

战利品瓜分完毕之后，十字军接下来可以着手选举一位新皇帝了。蒙费拉的卜尼法斯早已占据着布科莱昂帝国皇宫，而且他又与艾萨克皇帝的寡妻匈牙利的玛格丽特订了婚，此时必定期盼获得这个头衔。但最后他却发现自己因六名非威尼斯人选举官的人选而无法如愿。选出的六人都是教士，只有三人属意于他，这就使他没法当选，因为威尼斯人本就反对让他做候选人。经过漫长的争吵，选举官们达成一致，于5月9日午夜宣布，他们的选择是佛兰德斯的鲍德温。16日，鲍德温由聚集起来的天主教主教们集体加冕，因为当地还没有拉丁牧首。

160

征战目标怎么会转为君士坦丁堡？这一问题引出了无休止的而且相当漫无目的的历史争论。这是一场阴谋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谁牵涉其间？恩里科·丹多罗、施瓦本的菲利普、蒙费拉的卜尼法斯，甚至还有英诺森三世，都榜上有名。这是不是多个世纪以来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不和情绪累积的结果？事实上，攻占君士坦丁堡似乎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叠加的结果，起因是进攻亚历山大城的最初计划被推迟了。毫无疑问，这一事件永久性地导致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关系恶化，但其毋庸置疑的神学重要性却致

使它在十字军运动历史中的地位被忽略了。尽管从某些方面来看，就比如其内部的指令体系所体现的，它反映了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的某些家族的主导地位和集团特征；但从另一些方面来看，这次运动又开拓了新的局面。最初的计划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一支庞大的军队将乘船横渡地中海，并在亚历山大城城下登陆。计划中还打算雇用并运送大批雇佣兵，教皇则试图为此向教会征税。它还吸引了一种新型的热情支持者，他们准备好要在不同的战场上征战多次。

把英诺森三世的名字也包含在应对目标转移负责的人的名单里，这显得非常不友善，但又确实有一定道理。整场事件中，出错的策略正是他制订的。他当然知道，也同意了进攻亚历山大城的计划，他也与拜占庭方面就舰队征途中的补给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整个计划就是他想出来的话，那只能说这是他又一次过于野心勃勃的尝试。从一开始，事件的进程就让他非常恼火，不遵从指令的行为接二连三发生。十字军中的大部分人，无论他们内部如何分裂，有怎样的个人私怨，但在忽视他的建议和禁令方面倒很是一致。他当然决心在木已成舟之后让事情尽量向好的方向发展，而罗马不断发出的指令也是希望利用拜占庭帝国沦陷之机来促成（即使是强制的）教会联合；他仍然意识到，对于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联合这件他内心非常关切的事情来说，十字军的所作所为只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他写道：

受过如此折磨和迫害的希腊教会，当他们在拉丁人身上只看到毁灭的例证和黑暗的行止，当他们因此憎恶他们胜过憎恶恶狗，又如何能回到教会联合和献身教廷的轨道上来呢？

## 波罗的海的十字军运动

在准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同时，英诺森三世还宣扬推动了另外两场十

字军运动。第一场是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的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这是从其前任那里继承的事业。而最初的发端则是不来梅大主教哈特维希扶持的一项派往德维纳河（the river Dvina）<sup>①</sup>畔利夫人（Livs）中间的传教活动。他预见到，在于克斯屈尔（Üxküll）<sup>②</sup>建立一个主教辖区将扩大他的教省范围。尽管他们得到了教皇塞莱斯廷三世个人的支持，但传教团没取得什么进展。1193年和1197年，他们说服了塞莱斯廷三世，向为新建的利沃尼亚教会的利益而战斗的人们授予免罪权；但在1198年，他们遭遇了挫折，主教被杀。大主教任命自己的侄子布克斯特胡德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Buxtehude）继任。此人精力充沛，性情残暴，他在之后的30年时间里主导波罗的海的十字军运动，并将直接依靠罗马，在里加周边的异教社群中间建起一个教会的国度。他还招募了更多的十字军战士，并从新任教皇那里赢得了认可。

1199年10月5日，英诺森三世号召德意志北部的基督徒起而捍卫利沃尼亚教会。他认为，为了保护受到异教邻人迫害的皈依基督教者，使用武力是正当的。不过，参与此地战斗的十字军战士似乎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免罪权，只有那些打算到罗马朝圣的人才被允许以参与战斗的行为来减免罪责。1204年，英诺森三世颁布了一份更加重要的通谕，在其中，他允许阿尔伯特招募已经宣誓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教士以来此地履职作为代替，并授权“因为贫困或身体羸弱”无法前往耶路撒冷的世俗人士可以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做一定变通，与利沃尼亚的蛮族作战，并同样可以获得完全的免罪权。他授权给阿尔伯特的代理人，每年在不来梅教省发起招募运动，兴建教堂，即使当时刚好有相关禁令在实行。这份谕令的效果是启动了一场“长期的十字军圣战”；尽管在此后的40年里发展得还不够充分，但这却逐渐成为北方战争的一个显著特征。阿尔伯特把自己的主教驻地沿河从于克斯屈尔迁到了里

① 发源于今俄罗斯中部瓦尔代丘陵中的小德维纳湖，先后流经今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最后在里加注入波罗的海。——译注

② 德语古地名，今位于拉脱维亚。——译注

加。从吕贝克（Lübeck）航来的圆形帆船可以到达里加。他还推动了里加的圣母崇拜，以及利沃尼亚乃圣母嫁妆的观念；这种观念肯定是为了让到此地朝圣具有合法依据而改编创制的。直至1224年，他每年都会返回德意志为夏季的征伐战事招募人员。在这之外，一个小的军事骑士团——持剑骑士团的兵力是辅助军力。这个骑士团是他在1202年创立的。该团的人数或许从未超过120人，分布在六个修道院里，但他们负责组织夏季的十字军行动和冬季各大要塞的驻防：基督徒们采取了一项策略，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防卫工事的社区和小型城堡。到1230年，通过一系列每年上演的残酷征伐，十字军击败了虽在人数上占优但战术上处于劣势的各个族群，征服了利沃尼亚。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更北面的爱沙尼亚，这里的战事是在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由丹麦人发动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早在1184年，丹麦人就把目光投向了波罗的海东部。尽管在1216年之前他们都在集中精力征服从吕贝克至格但斯克（Gdańsk，但泽 [Danzig]）的波美拉尼亚沿海地区，但他们的舰队在1191年和1202年袭击了芬兰，在1194年和1197年袭击了爱沙尼亚，在1206年袭击了萨雷马（Saaremaa，德语和瑞典语中称为Ösel），在1210年袭击了普鲁士。对萨雷马的袭击显然被描述成了一次十字军行动，而十字军圣战观念（我们之前已经发现，这是一种回荡在克莱沃的贝尔纳和尤金尼乌斯三世的言辞中的传道之战观念）的北方曲解版也能在英诺森三世于1209年写给丹麦的瓦尔德玛尔二世（Valdemar II）的一封信中找到。信中，教皇劝勉瓦尔德玛尔二世“根除异教的谬误，拓展基督教信仰的疆界……像一名活跃的基督之骑士一样，在这场战争中勇敢而坚定地战斗”。在同一天写给布伦斯威克的奥托和丹麦教会的信中，英诺森三世将瓦尔德玛尔二世的行动称为“与朝圣一样神圣”，并提到了免罪权；与贝尔纳一样，他也在顺势而为，试图将十字军东征与北欧的传教事业融为一体。不过，一直等到1219年，瓦尔德玛尔二世才应身在里加的布克斯特胡德的阿尔伯特以及教皇洪诺留三世的请求，攻入爱沙尼亚北部，并

在塔林（雷瓦尔 [Reval]）建立了一个据点。阿尔伯特当时因为一次来自俄罗斯诺夫哥罗德（Novgorod）<sup>①</sup>的侵袭而警钟大作，而洪诺留三世则许诺瓦尔德玛尔二世可以保有从异教徒手中夺取的土地。次年，丹麦人与持剑骑士团一起吞并了爱沙尼亚北部，但这就造成了与德意志人的竞争，因为他们正从南面的利沃尼亚向爱沙尼亚进军；还有瑞典人，他们正在攻占西北部沿海地区。瓦尔德玛尔二世毫不留情地利用了对波罗的海的海上军事控制以及对发自吕贝克的航运形成的威胁，成功迫使他的基督徒同伴们同意他对爱沙尼亚北部的控制权，尽管当地的定居点中德意志人远比丹麦人多。

到13世纪20年代时，“长期的十字军圣战”观念已经扎根。十字军战士们都佩有十字架标志，被称为朝圣者或十字军（分别为 *peregrini* 和 *crucesignati*），享有完全的免罪权。为了他们的行动而向教会征税的举措被采纳了。他们之为十字军运动的合理依据在于对传教团的防卫援助，并获得了与前往东方的十字军相同的特权。

### 针对安维勒的马夸德的十字军运动

英诺森三世的另一项早期十字军运动是针对安维勒的马夸德（Markward of Anweiler）发起的。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名官员，在亨利六世死后试图在意大利占得一席之地。这类“政治性十字军运动”的先例已经由英诺森二世于1135年的比萨大公会议上创下，但英诺森三世采取的措施显然相当极端。英诺森三世决心要恢复教廷在意大利中部的管辖地，而且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事态都表现得相当敏感，因为他是此时尚未成年的腓特烈国王的摄政。所以他对马夸德及其德意志追随者们的举动感到非常震怒。1199

163

<sup>①</sup> 中世纪的俄罗斯公国（1136—1478），地域从波罗的海至北乌拉尔山脉。——译注

年 11 月 24 日，听闻马夸德已经渡海进入西西里后，英诺森三世写信给那里的人民，将马夸德称为“另一个萨拉丁”以及“比不信者更恶劣的不信者”。英诺森三世声称，马夸德与此时仍然生活在这个岛屿中部的穆斯林结盟（人们认为这些穆斯林非常凶恶），而且他还威胁到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准备工作。因此，所有反抗马夸德的人都获得了与前往东方的人们相同的免罪权，因为西西里的众港口对即将展开的行动至关重要。其他一些证据表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教皇一直在策划一次针对马夸德的十字军运动作为最后的举措，但这些计划没有导致什么实际行动。只有少数人参与其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布里埃纳的沃尔特伯爵。但比起圣战，他更关心的是自己对塔兰托封地的权益。巧的是，年轻的圣方济各却短暂地参与了这次运动。1203 年马夸德死亡，也就终止了发动这次运动的理由。但无论是 1199 年 11 月的这封信，还是英诺森三世去世之前对叛乱的英国贵族们“比穆斯林还坏”的指责，都很能反映事态的发展。英国的约翰王具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度，因此选择接受十字架，而这些贵族们的叛乱则被认为阻碍了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准备工作。有人提出，对抗与法王路易结盟的叛军，捍卫英国的举动，事实上已经成为某种十字军行动。基于同样的原因，年仅 9 岁的亨利三世在其 1216 年 10 月 28 日加冕的时候选择接受十字架。

### 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运动

1208 年，英诺森三世开始认真考虑要发动另一次十字军东征，并向法国、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发出了呼吁。不过，唯一明确的回应来自对十字军事业充满热情的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六世（Duke Leopold VI of Austria），他此后将在西班牙、朗格多克和埃及参加十字军行动。英诺森三世的回复是一封泼冷水式的信件，而他十分乐于以这样的方式对待竭尽全力的人：



钉死基督的十字绞刑架中所蕴藏的荣耀，远胜过你所佩十字架承载的……因为你接受的是一种柔和轻盈的十字架；他所负载的则是痛苦而艰辛的。你只是将其肤浅地佩戴在衣服表层；他却最终将其真切地融入了血肉中。你用亚麻线和丝线把你的十字架缝上；他的却是用坚硬的铁丝捆绑在了身上。

与此同时，法国西南部的事态发展则在那里酿成了一场危机。近几十年来，教会一直非常担忧地看着异端教派的发展。因为异端否认教会具有上帝赐予的作为神启监管者的功能，因此，他们被视为背叛者，有意背弃了真理，选择扰乱基督创设的秩序。因此，异端被视为一种正在积极行动的势力，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在很多人看来，他们与结队雇佣兵（*Routiers*）相关。这些人是雇佣兵组成的帮派，在其势力强大的地区，秩序已经被他们搅乱，而针对他们的惩罚措施糅入了十字军圣战的观念。教会尤其忧心的是清洁派教徒数量的增长。他们是一种新摩尼教的追随者，信仰心灵和物质世界有两大原则或神灵，并以让自己的灵魂挣脱禁锢它们的事物为己任。他们几乎否定世间的一切，包括婚姻及食肉、奶和鸡蛋这些被视为在起源上与生育或物质相关的事物。在他们看来，教会的秩序和存在都是虚无的，对三位一体的信仰是一种谬误，因为基督根本没有物质实体。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教阶和神职团体来替代教会。由于他们的宗教对信徒提出的要求非常严格，因此，只有内部核心的一小群人，即所谓的“完美者”，才完全得到接纳。大多数的追随者都只是“信者”，是在有生之年致力于获得启示和接纳的人。到12世纪末，清洁派，还有新教徒的先驱瓦勒度派（*Waldensians*），是教会不得不面对的人数最多的两大异端教派；他们的势力在没有强大中央政权的意大利北部和法国西南部两个区域尤其强大。

这最后的一点对我们理解英诺森三世的想法最为关键。从4世纪以来，教会通常都要依靠世俗权威来制造让异端望而却步的威慑力量，而且这也被证明是最为有效的。因此，在中世纪中期，具有强有力统治者的民族国家

很少出现异端问题，这并非偶然。而图卢兹的历任伯爵，作为我们上而提到的大多数领土的领主，对这个就政治凝聚力而言在法国最为落后的地区，所拥有的控制力实在有限。此外，就算他们还有些势力，由于他们自身自相矛盾的效忠取向，这种影响力又进一步大受限制。因为他们就大部分领土而言应该是法国国王的封臣，但就西部领土而言又是英格兰国王的封臣，就南部领土而言则是阿拉贡国王的封臣，就东部领土而言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臣。再加上历任伯爵的权益要求和野心又让他们介入了朗格多克的内部纷争，导致卷入残酷的、破坏性极大的战争。凡此种种，让图卢兹伯爵实在无法采取什么有效措施。而他的各位宗主们也同样如此。尤其是法国国王，就算他有力量处理这里的事务，但因为忙于就北部领土与英格兰国王争斗，实在无暇顾及南部的异端问题。英诺森三世于是就不得不陷入一种典型的两难境地。异端势力已经形成了严重的挑战。在朗格多克，它已经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贵族阶层，每过一年，它就发展得更加根深蒂固而难以消除。尽管在1200至1209年间这个地区只有不到1000名完美者，但其中相当多的人出自贵族家庭。在我们已知的名册中，有35%的完美者是贵族。同样重要的是，占到更大多数的、达到69%的是女性，而且主要是贵族女性。富瓦伯爵的一个姐妹是完美者，而另一个姐妹、他的妻子以及儿媳都是信者。天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们都有信仰异端的亲戚，而教皇可以倚仗的世俗势力对此却完全无能为力。

在12世纪期间，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教会诉诸了一系列方法。传教使团被派往朗格多克。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大公会议的第27封教谕呼吁所有基督徒都前往帮助他们的主教，如果主教们决定诉诸武力的话。基督徒们要是这么做了，就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免罪权；而如果因此牺牲，就能获得完全的免罪权。在离家期间，他们的财产领地将获得与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相同的保护。随后在1181年，在教皇使节马西的亨利指挥下，一场小规模军事行动在朗格多克展开。1184年，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于维罗纳会面之后，教皇卢西乌斯三世（Lucius III）颁布了通谕《废止各

种恶毒异端》(*Ad abolendam*)<sup>①</sup>，宣布设立主教裁判所，废除主教在这方面做出的任何赦免权限，强调教会和国家有必要通力合作镇压异端，如果受审者不屈从，将移交给世俗军队加以惩罚。值得注意的是，曾猛烈抨击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拉尔夫·尼日尔(Ralph Niger)在1187至1188年间提出，不应该把骑士们送往海外，因为本土就需要他们来对抗异端。

英诺森三世用他一贯的充沛精力来处理了这个问题。他接连派遣了好几批使节前往法国南部。他采取措施改革状况糟糕的当地教会。在1198至1209年间，他废黜了七任主教。他还鼓励奥斯马的迭戈(Diego of Osma)和多明我的传教士团的传教活动，这最终奠定了多明我会的基础。但经过一番曲折之后，他终于渐渐认为，必须使用武力。1204年5月，他呼吁法国的菲利普二世调动王国的力量来帮助教会当局；他还比之前的教皇更迈出一步，为这种使用世俗力量的行动赋予完全的免罪权。但在召唤书中加入最重要的十字军特权，对一位其实仅仅只需要履行他应尽职责的国王而言却仍然毫无作用。1205年2月和1207年11月（这一次重申了免罪权的授予，还增加了在士兵离家期间保护他们财产的承诺）他对菲利普二世再次发出的呼吁也同样毫无效果。英诺森三世还把这封信的复本分送给法国各方的贵族、骑士和臣民。他似乎是在号召法国的整个政治社群起来保护教会。与此同时，为了使这项任务更有吸引力，他又授予了十字军特权。但菲利普二世的回信却大谈他在与英格兰的约翰争斗当中遭遇的重重困难，开出的出手干预南部事态的条件也是教皇根本无法达成的。

166

1208年1月4日，教皇派往朗格多克的使节卡斯特瑙的彼得遇刺身亡，而且相关的种种情境让教皇怀疑图卢兹伯爵雷蒙六世参与了此事。这位伯爵之前已经因为处置异端问题不力而遭绝罚。刚一接到彼得被刺的消息，英诺森三世就决定宣布发动一场针对异端及其教唆者的十字军运动。他的主张写在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被分发到了法国各地，可能还有西欧的其他地

① 谕令首句“*Ad abolendam diversam haeresium pravitatem*”的前两个词。——译注

区。他号召人们宣誓加入十字军。但此时很耐人寻味的是，他授予他们的是一种非常老式的免罪权，是以心灵获得赎罪感表达出来的赎罪权。可能此时他也还没有完全确立自己的立场。三位教皇使节得到任命，负责组织十字军运动的宣扬布道及其后的领导工作。教皇还宣布废除高利贷，暂缓偿付债务，这些都是使十字军战士们便于筹措经费参与征战的惯常手段。教皇还采取措施向十字军战士所出自的地地区的教会征税，以帮助远征经费的筹措。

英诺森三世宣布对阿尔比派发动十字军运动，这一举措的创新之处不在于他鼓励对异端使用武力。这一点的合法性在格拉提安的《教令集》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其引证了大量的历史先例和权威言论，一直能追溯到4世纪。他的新奇之处在于利用了十字军来完成这一使命，尽管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十字军运动所属的圣战范畴起初是针对外部的，是针对某种外部力量宣布的。但正如我们所见的，似乎有一种趋势，推动它迟早转为向内，转而针对社会内部的某些成员。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在1187年种种灾祸导致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定居点被夺去之后，这样一种观念开始盛行：针对外部的任何胜利最终都会因本土的腐化或分歧而抵消，因此，只有一个社会中没有了异类，大家都一致信仰同一种真正的宗教，为这种宗教而进行的战争才可能取得胜利。只要我们看看1200年前后的西方，无论哪个地方，我们都能看到一种清晰的迹象，人们想要把一致性强加给一个其实已经非常具有文化同质性的社会；而且，虽然名义上都借用了针对伊斯兰的战争，针对内部的十字军运动却开始纷纷出现，这也不是巧合。

167 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运动大约开始于1208年，可是，在针对外部敌人的圣战已经成为常态但又进展不顺利的情况下，类似的内向十字军运动其实随时都可能发生。这是一场内部战争，这一事实赋予了这场运动不同寻常的特点。法国南部不是巴勒斯坦，甚至也不是西班牙或利沃尼亚，这也是为什么宣誓来到朗格多克参加战斗的十字军战士们只说要来这里服役40天。如此短的服役时间必定会冲淡这次运动所具有的赎罪战争的性质。尽管这些

十字军战士有时候也会自称为“朝圣者”，但他们朝圣之旅的目的地却从没能明确下来，可能只是虚构。阿尔比十字军运动表明，十字军运动如何在缺失了某些组合因素的情况下，仍然独立地繁荣发展起来。

对英诺森三世的号召的回应是热情的，甚至有些狂热。到1209年春，一支庞大的队伍已经聚集起来准备袭击南部。图卢兹的雷蒙六世赶忙做出补救。1209年6月18日，在圣吉尔修道院的台阶上，在展示了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刻有耶稣受难石雕图的西墙前，他上演了一幕极富戏剧性的场景，借此与教会实现了和解。他随后在修道院的教堂里接受了忏悔赎罪的鞭刑；而由于围观人群人数过多，他只能被引导着从地窖出门，途经卡斯特瑙的彼得的新坟。十字军攻入了贝济耶与卡尔卡松子爵（viscount of Béziers and Carcassonne）特朗卡维尔的雷蒙·罗杰（Raymond Roger of Trencavel）<sup>①</sup>、阿尔比（Albigeois）以及拉泽斯（Razès）的领主的几块土地，这里是异端人数最多的区域。贝济耶于7月22日陷落，大批居民包括天主教徒和清洁派教徒均遭屠杀。当时的情形表明，这支包括了大量来自法国北部穷人的军队已经失控。卡尔卡松坚持了两个星期，陷落后的遭遇稍好于贝济耶。不过，这种严酷之举也起了威慑作用，其他各地的抵抗纷纷因此瓦解。

此时，应该选出一位世俗领导人来管理特朗卡维尔诸地，并建立起一个指挥接下来行动的常驻指挥部。被选中的是蒙福特的西蒙，七年前他曾反对进攻扎达尔及改变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宗旨。西蒙此时年近50，从1181年开始他一直是蒙福特和埃佩尔农（Epernon）的领主。1204年，他的一个舅舅过世，西蒙因此继承了莱赛斯特伯爵领地（the earldom of Leicester）<sup>②</sup>。西蒙充满勇气，意志坚定，信仰虔诚，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也是一位模范丈夫。但他又野心勃勃，固执己见，敢于做出恐吓人心的残忍行径。他一直坚持着

① 特朗卡维尔是10至13世纪时朗格多克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贵族家族。“Trencavel”可能源自法国南部奥克语中意为“胡桃钳”的词组 *trencia avelana*。最开始只是个译名，后来正式成了家姓。——译注

② 在英语中，欧洲大陆的伯爵被称为“count”，英国的伯爵则称为“earl”，相对应地，其领地也被称为 *earldom*。——译注

这项很少有人感激的孤独使命，直至于1218年夏天去世。每年夏天，来自法国和德意志的各路十字军人马就会在适合战斗的季节降临朗格多克。等40天的服役期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返乡，一般都在天气非常不好的时节。于是每年冬天，西蒙几乎完全是单枪匹马在绝望地努力捍卫夏天时获取的胜利果实。此外，让这种痛苦在十年间再次绵延不绝的是，1213年初，英诺森三世因为更想推动一次新的前往东方的十字军运动，取消了阿尔比十字军的大部分免罪权，他也就因此更加削弱了西蒙的行动依据，让其地位更显尴尬。

168

1210年，西蒙掌握了特朗卡维尔余下的领土，阿拉贡国王彼得二世之前虽一直拒绝承认他，此时也接受了他的进贡。图卢兹的雷蒙六世却仍然没有履行他在1209年与教会和解时许下的诺言；尽管他在这段时期看来并没有追求一种连贯的政策，但教皇使节们已经确认他不值得信赖。因此，西蒙接下来开始准备进攻图卢兹以及雷蒙六世的其他领地。1211至1212年间，他试图通过攻取周边要塞来围攻图卢兹城，尽管只要一到秋天等战斗季节结束之后，本来倒向他的城镇又会转投雷蒙。阿拉贡的彼得二世的威望因为其在拉斯纳瓦斯托洛萨（Las Navas de Tolosa）<sup>①</sup>大捷中所起的作用而大有增长，1212至1213年冬他代表自己在朗格多克的封臣和他的姐夫图卢兹伯爵直接觐见教皇；这肯定是英诺森三世以西蒙越权为由取消此地十字军特权的重要背景。1213年夏天，彼得二世率军援助图卢兹的雷蒙六世，但他的军队在穆雷战役中被西蒙少得多的兵力打得大败，他自己也在9月12日被杀，阿拉贡在比利牛斯山以北的扩张政策受到压制。到1214年末，西蒙已经控制了雷蒙六世大部分的领地。而1215年夏初，菲利普二世国王的继承人法兰西的路易八世挥师南征，也是高歌猛进。11月，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将西蒙占据的雷蒙六世的领土正式授予了他；余下的领土则由教会代雷蒙六世的儿子托管。

这是西蒙事业的巅峰期，但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个地区的贵族和城镇开始纷纷重新集结到被罢黜的雷蒙六世及其子麾下。1217年9月，雷

---

<sup>①</sup> 位于西班牙南部。——译注

蒙六世进入图卢兹。1218年6月25日，西蒙在该城城下被投石器掷来的一块石块砸死。继承西蒙领导权的是他的儿子阿马尔利克，当时年方26。然而，尽管英诺森三世的继任洪诺留三世于1218年重启了在朗格多克的十字军运动，阿马尔利克也无法挽回颓势。洪诺留三世积极鼓励那些没有宣誓参加十字军前往东方的人们参加这里的征战，他甚至还转移了一部分本用来支持东方远征的税收以支持法国南部的行动。但就连雷蒙六世在1222年8月去世这一点也没能帮到阿马尔利克：雷蒙六世的儿子雷蒙七世甚至比雷蒙六世更受欢迎。阿马尔利克已经无计可施，几将陷入绝境，此时，唯一挽救他的是法国王室的出面干预。1226年1月，法王路易八世宣誓参加南部的十字军。9月9日，王室军队在围攻三个月之后攻下了阿维尼翁，图卢兹以东几乎全境宣布效忠法王。法王把管理这些征服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个新的代理人博热的安贝尔（Humbert of Beaujeu）。虽然路易八世于11月8日在回程的路上逝世，但安贝尔仍采取了残酷而系统的毁灭措施来应对雷蒙七世夺回领土的尝试。1229年4月12日《巴黎和约》签署，这场十字军运动的结局终于来临。雷蒙七世得到了这些领地的西部和北部，这是他父亲在十字军运动开始时掌握的，但条件是图卢兹只能由他的姐姐琼及其继承人继承——琼当时正要嫁给法王路易九世的兄弟普瓦图的阿尔方斯（Alphonse of Poitou）——否则图卢兹就将交还给法王。该和约中也包括了有关异端事宜的条款，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各方将捐款设立一个基金，负责支付在图卢兹的下列人员十年的薪金：四位神学导师、两位教令专家、六位艺术导师以及两位语法代理导师。这标志着此地大学的起源。

《巴黎和约》的条款内容以及1229年11月在图卢兹举行的一次大公会议的谕令都表明，20年的暴力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因为这里的异端问题更甚以往。事实是，十字军运动本质上是间断性的，无法消除根深蒂固的异端。直到1233年异端裁判所在图卢兹设立，以及这类机构带来的持久压力，异端问题的处理方才有所进展。从1250年开始，清洁派首领们开始撤往伦巴第。到1324年时，法国南部的清洁派已经消亡。

## 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

英诺森三世还宣告在西班牙进行一场新的十字军运动。自12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这里战乱不断，但半岛上仅有几次十字军行动：一次是在1189年，当时两支由弗里斯兰、丹麦、弗莱芒、德意志和英格兰十字军组成的舰队，在驶向东方的途中帮助葡萄牙的桑乔一世夺取了锡尔维什（Silves）和阿尔沃尔（Alvor）；一次是在1193年和1197年，当时教皇塞莱斯廷三世颁布了十字军通谕。在第二次行动中，教皇昭告称，阿基坦的居民们如果宣誓前往耶路撒冷，可以将践行地转向西班牙；他设想的是这些誓言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许下的，此时尚未履行。1195年7月19日，阿尔摩哈德哈里发雅库布（Ya'qub）在阿拉尔克斯（Alarcos）大胜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使得基督教世界的舆论出现了一片恐慌情绪。雅库布被视为新的萨拉丁。而这份通谕正是对此做出的反应。到1210年时，阿方索八世觉得自己已经又强大起来，可以重启攻势了，于是劫掠重新开始。驻守要塞的是英诺森三世号召来的十字军朝圣者，而且，他们的大本营可能是在萨尔瓦铁拉（Salvatierra）的卡拉特拉瓦城堡，就在穆斯林的领地范围内。当时的哈里发穆罕迈德·纳西尔（Muhammad an-Nasir）决心要采取反击措施，9月初，在十个星期的围攻之后，他攻取了萨尔瓦铁拉。不过，这场胜利在一年中来得太晚，战争季节就要过去，他已来不及乘胜追击。

170 萨尔瓦铁拉沦陷的消息引起了西欧各地的焦虑情绪，促使教皇在1212年春启动一场新的十字军运动，相关号召体现在他写给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的手谕中。在罗马当地，斋戒和特地举行的祈祷仪式开始进行，目的是祈求基督徒的胜利。尽管在法国北部仅有一名重要人物——南特的乔弗里主教似乎宣誓接受了十字架，但法国南部的反响却十分热烈，这可能是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运动带来的副产品。1212年6月，一支庞大的军队已经到达托莱多，聚集在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麾下，其中包括来自法国、莱昂王国和



葡萄牙的骑士，阿拉贡的彼得国王带来的一支强军，当然还有卡斯蒂利亚的大贵族、骑士和市民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在 20 日出发。阿方索八世决定要展开遭遇战，把赌注下在一战定乾坤上。这支军队攻取了马拉贡（Malagón）和卡拉特拉瓦城堡，但在 7 月 3 日大多数法国人临阵脱逃，可能是因为高温天气，以及卡拉特拉瓦城堡的守军（穆斯林在阿拉尔克斯之役后夺取了这里）提出的优越条件。只有纳尔榜大主教阿诺德（Arnold of Narbonne）以及大约 130 名法国骑士留了下来，分享了随后的胜利。十字军又一路高歌猛进，夺取了一系列要塞，并与纳瓦尔国王桑乔七世会合。之后，他们在德斯皮娜佩罗斯山口（Despeñaperros Pass）匆忙遭遇了行军中的穆斯林。阿尔摩哈德人的军队驻扎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平原上，扼守着山口，但基督徒们找到一条密道穿越了山峰，突然出现在平原上敌军的面前。7 月 17 日交战开始，在卡斯蒂利亚国王亲自发起的一场英勇的冲锋之后，僵持状态被打破，穆斯林被击败了。这场胜利之后，基督徒们夺取了韦尔奇（Vilches）、费拉尔（Ferral）、巴尼奥斯（Baños）和托洛萨等多座堡垒，打开了攻入安达卢西亚的道路，他们还夺取并毁灭了拜萨和乌韦达两城。

与 25 年前的哈丁之战一样，这场战役也是敢冒风险放手一搏的结果，只是这次他们赌赢了。在罗马，人们用狂欢来庆祝胜利。这场胜利也鼓舞了英诺森三世写下了他最雅致的手谕之一。在信中，他赞颂胜利，感谢上帝：

上主，信仰者的保护神，没有他一切都不可能强大，不可能稳固。他将仁慈加倍赐予你们和基督徒民众，对抗那些不呼唤他最神圣之名的众王国。依据圣灵早已给出的预言，他让那些低声诋毁他的种族成为笑柄，让虚妄自大、思想空洞的人们显得可笑，让不信者的骄傲扫地。

像他一贯的作风那样，英诺森三世没有因这场胜利而赞扬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胜利仍然被归功于上帝，而不是十字军战士们；失败则从不是上帝的过错，却是源自十字军战士们的罪恶：

171

做下这一切创举的并非是陛下您，而是我主……因为这场胜利毫无疑问并非靠人力可为之，而是神圣的意志……所以，不要因为作恶者在那里失败就骄傲起来，而要把光荣和荣誉归于我主，谦恭地言说是预言“万军之主的热心”<sup>①</sup>成就了这一切。当其他人乘着战车和马匹狂喜炫耀时，你应当因我主、你的上帝之名而感到喜悦和荣耀。

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之战是再征服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不过当时的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像阿尔比十字军一样，至少在外人看来，1213年英诺森三世也把西班牙十字军运动搁置在了一边；而在众多场合，他的继任洪诺留三世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这里的行动不应该分掉十字军东征的资源。不过，在1217年，运送荷兰和莱茵兰十字军骑士前往巴勒斯坦的舰队，还是帮助葡萄牙人夺取了阿尔卡萨多萨（Alcácer do Sal）。1219年，洪诺留三世准备授予在西班牙战斗的十字军部分免罪权；但即使在此时，他也强调这只会授予那些因为某些原因实在无法前往埃及的人。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夺取了达米埃塔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221年，他为由莱昂—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九世领导的一次行动重新授予了免罪权。1224年，他又授予了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三世领导的行动同样的权利；尽管根据英诺森三世1213年的法令，这种免罪权仅限于授予西班牙人。全面地恢复西班牙十字军运动的免罪权要等到1229年，这一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颁布了一份相关手谕，而一批法国南部战士参加了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同年针对巴利阿里群岛的远征。

## 儿童十字军运动以及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宣道活动

我们所拥有的关于1212年的十字军运动的画面是另外一种全景式的画

---

<sup>①</sup> 语出以赛亚书9:7。——译注

面，虽然不像 1147 至 1150 年那么规模宏大。战斗同时在波罗的海沿岸、朗格多克以及西班牙三条战线上进行，但东方却相对平静。1211 年，耶路撒冷王国与穆斯林缔结了一份为期六年的停火协议。在前一个冬天，法国北部和莱茵兰地区都处于狂热之中，因为在那里，巴黎的威廉和维特里的雅克等人为阿尔比十字军运动展开的宣道活动点燃了民众的热情，并引发了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间或出现的一种动荡浪潮。这种被称为“民众十字军”的浪潮，反映了穷人的沮丧情绪。前往东方的军队日益经由海上运送，这就意味着普通民众根本承担不起一同前往的费用。加入陆上行军的队伍很简单，人们所需预备的只是健康，并用好自己的双腿，但筹集海上旅行所需的旅费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了。1212 年，一场自发的运动在儿童当中兴起，其中的两位领导人据说一个是来自科隆的小男孩尼古拉，还有一个法国牧童叫史蒂芬；后者声称自己看到了基督显灵，于是率领一群孩子和牧羊人一路行进到巴黎，不停唱诵：“上主，赞美基督教吧！把真十字架重赐予我们！”还有许多成人与他们随行，但其中一些后来由教士引导转而参加了阿尔比十字军行动。这支十字军中最庞大的一群人沿莱茵河而上，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伦巴第。但很多人到那里就散去了，尽管有一群人抵达了热那亚，还有一些人似乎到了罗马。在罗马，英诺森三世免除了这些人履行誓言的义务，尽管严格来讲他们的誓言本就无效。其他一些人往西到了马赛，接下来他们被两个商人骗上了船，很多人被卖到北非成为奴隶。

172

看到社会各个阶层都洋溢着对十字军运动的热情，也就难怪英诺森三世又在打算 1217 年东方的停火协议一期满，就要重启十字军东征了。1213 年 1 月中旬，他告诉派驻朗格多克的教皇使节们，他计划筹备一次东征。接下来在 4 月，他正式昭告天下，同时向在西班牙和朗格多克的人们发出呼吁：

因为……驰援圣地将会因此受到拖累或延迟……所以我们取消之前

授予出发前往西班牙对抗摩尔人或对抗普罗旺斯的异端的人们的免罪权，主要是因为授予这些权利时所处的境遇如今已完全消失，其特定原因如今基本上也已经消失。蒙上主之恩，这两个地方现在的情况都不错，因此已经不再需要直接动用武力。如果出现了突发状况，我们会谨慎关注出现的任何严重事态。当然，我们仍然认为这类免罪权应该对普罗旺斯和西班牙的本地人有效。

接下来的9月，他向手下一名在德意志的十字军传道者精确解释了他的用意：

对已经宣誓接受十字架，提出要前往普罗旺斯对抗异端，但还没有将意愿付诸实践的人们，应该积极规劝他们不辞辛劳地前往耶路撒冷，因为这样的行动更有荣耀。如果无法说服他们，那就应该强制他们实践自己尚未履行的诺言。

173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这让阿尔比十字军运动又延宕了数年，在西班牙也引起了误解。在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上，西班牙的主教们集体请求教皇恢复再征服运动以完全的十字军运动性质。教皇似乎安抚他们说，根据他的决议条款，完全的十字军性质仍然是具有的，但只针对西班牙人。甚至连波罗的海沿岸的十字军运动，虽然此时已经孤立并自行其是，似乎也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威胁。据说布克斯特胡德的阿尔伯特在这次会议期间成功地向教皇做了一次声情并茂的请愿，其论说则基于他将利沃尼亚视作圣母嫁妆的观念：

圣父啊，正如您关怀耶路撒冷圣地——圣子之地一样，您也不应忽略利沃尼亚这块圣母之地……因为圣子深爱其母。正如他不希望自己的

领地丧失一样，他也一定不希望自己母亲的领地受到威胁。

英诺森三世将阿尔比和伊比利亚十字军运动降级的决定，是在13世纪变得普遍的一种决定模式的第一批例证。罗马教廷并不乐意看到因为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而使战力分散；教皇们则能够决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哪个战场的战事最需要他们的支持。十字军已经越来越在经济上依赖于教廷通过向教会征税而给出的补助款，这一事实意味着随着这个世纪时间的逐步流逝，教廷干预行动的意愿也在增长。

英诺森三世及其幕僚们精心策划了新的十字军运动。新的通谕《事出紧急》(*Quia maior*)<sup>①</sup>，也可能是所有通谕中最伟大的一封，在1213年4月下旬和5月初几乎被送到了每一个教省。它以阐述十字军圣战思想开篇，大谈若干宣道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向他们的听众讲述的主题：十字军是基督慈善的举动；参加十字军的召唤是对个人意图的神圣测试，也是使个人得到救赎的机会。从这方面看，英诺森三世尽量在神学上做了拔高，将十字军不仅称作“获得救赎的机会”，而且还称之为“救赎的方式”。圣地是基督的领地，英诺森毫不犹豫地利用了将十字军视为类似于对上帝的封建义务的观念，还在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点。虽然这种观念已被教士们认为是一种危险的观念，因为封建关系表明上帝和人类之间存在着双向的责任义务，如同领主和封臣之间一样；可当然，上帝对任何人都不负有义务。英诺森三世以重申自己已经谈到过的免罪观念为结尾，另外还发表了关于强制履行誓言的一段重要讲话。他已经认定，作为教皇，他能授予延期权、抵消权和抵赎权（用支付金钱来解除誓言，金额大致等同于参加十字军可能导致的花费），但只有在誓言已经大部分严格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他才会正式赋予这些权利。《事出紧急》显示出一种政策上的转变，这部分是因为感到需要筹措资金，部分

174

① 本题目亦为拉丁原文首句开头的两个词。但译者未能找到拉丁原文，本中文标题系根据 Louise and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Crusades: Idea and Reality, 1095—1274* (London: E. Arnold, 1981) 中的英译所译。——译注

是为了限制不符合条件者前往而做出的举措。但已经有人指出，这也是将十字军的福利扩展给所有基督徒的一种方法。每个人，无论他或她境况如何，都被鼓励宣誓接受十字架，不符合条件者可以通过支付金钱来抵赎他们的誓言：

因为事实上，如果每个人在接受十字架之前都要被检验一番看是否各方面合适、能够履行这类征战誓言，那驰援圣地的行动就会大大延迟或耽误。所以我们认定，任何人只要有意愿，除了被宗教圣职束缚的人之外，都能以下述方式来接受十字架，即他们许下的誓言可以通过教廷许可而抵消、转换或转移，只要紧迫的情况或实际条件要求如此。

几个月后，英诺森三世向一位感到迷惑的宣道者做了一番解释：

从这份通谕中，你可以推断出，当面对妇女或其他一些宣誓接受十字架但并不适合或没有能力履行誓言的人时该如何处理。通谕中明白指出，任何人，除了教中人士，都能按自己的意愿以这样的方式接受十字架：如果紧迫的情况或实际条件要求的话，那通过教廷许可，他们的誓言可以以某种方式抵消、抵赎或转移。

当然，从这项政策里就衍生出了臭名昭著的“兜售赎罪券”行为。教皇使节们在法国推行这一政策引发了丑闻；这项政策极易被滥用，因此在整个13世纪不断招致批评。

英诺森三世对亲自参与组织工作的热情，或许还有他对1198至1199年和1208年招募工作困难重重的体验，导致他引入了非常精细的十字军宣道体系，在英格兰、法国和德意志等地都编制了传道者手册。他亲自督导在意大利的宣道活动。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教皇使节们直接负责招募工作。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教省，教皇都任命了一小群宣道者，其中大

多是主教；他们拥有使节的权限，有权在各自的教省招募副手。教皇为他们履职编订了详细的行为规范，而且显然对他们履行职责的具体方式非常关注。

与之前的《闻此严判》通谕一样，《事出紧急》非常强调有必要忏悔。它呼吁每月在基督教世界各地举行赎罪游行，并在弥撒的接吻礼（kiss of peace）之后、领圣体之前引入了一个新的过渡礼仪。其赎罪环节强调了这样一种确信，即只有伴随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重新觉醒，十字军运动才能取得成功。英诺森三世继承了其前任们的理念，认为需要以合理的方式进行普遍改革。《事出紧急》的颁布与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的召集令同时发出，这次会议的议程渗透着各种与十字军有关的主题。会议于1215年11月11日开幕，英诺森三世致布道词，强调了十字军运动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以及它们的振兴。在会议颁布的法令当中，有一项绝罚论证并勾勒了针对异端的十字军运动的规则，这引起了佩尼亚佛的雷蒙（Raymond of Peñafort）等教令专家的关注，他们担心这是否会被视作此类十字军运动的正式官方授权。

175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法令附件，名为《所谓自由》（*Ad liberandam*）。大会在12月14日通过了这个附件，它进一步阐明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筹备工作，并将出发日期定在1217年6月1日。布伦迪奇教授（Professor Brundage）指出，这是“教廷到此时为止列出的有关十字军权利和特权的最野心勃勃也最广泛的目录……在中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它的条款在大多数教皇通谕中时不时得到重现”。它为随军的神父制定了规则，并告诉他们如何在离开远行的情况下仍然受到眷顾。它涵盖了英诺森三世经典的关于免罪的概念。它宣布十字军战士拥有免除纳税和高利贷的权利，享有延迟偿付债务的权利，还保证教会会保护他们的财产。它禁止与穆斯林进行战争物资贸易，在三年内禁止举行比武大会。它宣布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基督教世界内需保持和平。这大多数条款出现在了《事出紧急》及其他教皇通谕中，但《所谓自由》还向教会征收了另一项收入税。尽管在《事出紧急》中英诺森

三世号召教士们捐助武人，但他没有引入 1199 年的征税条款，这可能是因为这一条款之前并不太成功。但如今他又下令在三年内向教会所有收入征收二十分之一的税，是之前的六倍。他还派遣教皇专员负责征收工作：1199 年时，他把征税工作交给了各级主教负责，但他们缺乏合作意愿，这使得他很快就开始从罗马派遣官员进行督管。与 1199 年不同，《所谓自由》没有保证这次征税不会创制为一个成例。确实，这一次它得到了大公会议的同意，因此，以下这一原则也就得到确立：教皇有权不征得进一步同意就向教士征税。但大公会议通过这次征税的决议，并没有提升征税的受欢迎程度。这项赋税在西班牙遭到强烈抵制，因为再征服运动被降级已经让他们很受伤，现在这更是让他们感到受辱。法国、意大利、德意志和匈牙利也出现了抵制。

176

1216 年 7 月 16 日，英诺森三世去世，此时他刚刚结束在意大利中部的十字军传道活动，正准备为了十字军宣道巡游意大利北部。在他的酝酿宣传下，各种与十字军相关的观念和定义臻于成熟，他的通谕也成为未来的教皇们遵循的范例。他扩展了十字军运动的范畴，但却是在一个传统的思维框架内，只是极少有人能像他或者他的文稿起草人那样，以如此透彻和辞藻优美的方式将这个框架表达出来。他是第一位为了十字军而向教会征税的教皇，是第一个组织起针对异端的大规模十字军的教皇，是第一个利用赎罪作为手段的教皇，是第一个建立起宣道十字军的精密复杂体系的教皇。对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或许引入了利用在欧洲招募的大规模雇佣军经海路远征埃及的想法；对于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如同鲍威尔教授（Professor Powell）所写的，“十字军被塑形为促进整个社会道德转变的工具”。然而，由于英诺森三世的任期中诸事纷扰，他的设想实在太过野心勃勃，而实际力量又实在有限。尤其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已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地位天然具有的弱点：教会法禁止神职人员参与军事指挥，而教皇也是一位神职人员。尽管英诺森三世渴望控制最有力的武器“教皇权”（papal monarch）为己所用，但事实上他却必须依靠俗世的显贵们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而这些人往往太容易犯错，通常也完全无能为力。



##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历程

英诺森三世的继任者洪诺留三世是一位年迈的老人，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其任期完全被笼罩在英诺森三世的阴影之下。但近期，将洪诺留三世描绘为一个野心勃勃、有独立思想的教皇的新画面正在浮现。他强力推动了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准备工作，尝试着处理经常出现的、阻碍这类远征实现的各种障碍。腓特烈二世，年轻的罗马人的国王，在其 1215 年 7 月于亚琛加冕时就宣誓接受十字架参与十字军，但在他还需为王位以及对西罗马帝国帝位的要求，须与布伦斯威克的奥托竞争时，他不可能真正践行前往。派驻法国的教皇使节，库尔松的罗贝尔（Robert of Courçon）和泰尔大主教西蒙，在穷人中间激发起了对十字军的极大热情，然而尽管勃艮第公爵和布拉班特公爵、法国王室总管、巴尔伯爵、拉马尔克伯爵、讷维尔伯爵、罗兹伯爵以及茹安维尔领主都宣誓参加十字军，但法国人在这次东征中的贡献从比例上讲却不如第三次和第四次中那么显著。朗格多克的事态——阿尔比十字军运动拖延不决，并且在 1226 年时还让国王路易八世赔上了性命；法国在 1214 年布汶战役中战胜布伦斯威克的奥托、英格兰的约翰和弗莱芒人；以及或许知晓腓特烈也打算参与其中，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相关的原因。法国人的投入程度不足让深谋远虑的教士们感到担忧，但这不是完全决定性的；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匈牙利、德意志、意大利和尼德兰，最优秀的传道者之一帕德博恩的奥利弗（Oliver of Paderborn）据说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在他身上上演了不少奇迹。

177

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Andrew II）虽然在 1196 年就已经宣誓接受十字架，但一直在教皇们的允许下一拖再拖。此时，他率先行动起来。他派出的代表与威尼斯人协商好派一支舰队在斯普利特（Split）<sup>①</sup>接他，但当他的

<sup>①</sup> 位于今克罗地亚南部，亚得里亚海东岸。——译注

这支包括了奥地利公爵和美拉诺公爵率领的军团，有考洛乔（Kalocsa）<sup>①</sup> 大主教和众多来自帝国以及匈牙利的主教、修道院院长以及伯爵随行的军队，于 1217 年 8 月末在那里集结时，却发现国王的使节们犯的的错误刚好与导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的问题相反。这次是来的士兵实在太多，船只根本不够，于是主力部队只好在那里等待好几个星期才能一一上船。在此期间，很多骑士选择返乡，还有一些人则决定明年春天再择机起航。

秋天的时候，一大支队伍集结在了阿卡。但储藏的食物实在没有办法供养这么多人，因为巴勒斯坦之前刚好因为歉收发生了饥荒，当地人甚至建议十字军就此回乡。在他们到来之前，耶路撒冷国王布里埃纳的约翰，与三大骑士团的圣殿骑士团、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的团长们就在考虑一个兵分两路同时进军的行动计划：一路进军纳布卢斯，目的是收复西岸的土地，另一路进军埃及的达米埃塔。但此时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把上面分两路进军的计划都搁置一边，决定进行一系列小规模远征行动，让敌军，当然还有阿卡的十字军都不断动起来，直到其余的十字军队伍到来。11 月初，一支武装侦察队劫掠了贝特谢安，在加利利海以南处渡过了约旦河，之后便沿着湖的东岸行进，取道吉瑟巴纳雅库布返回阿卡。短暂休整之后，十字军向加利利海沿岸的他泊山（Mount Tabor）<sup>②</sup> 行进，穆斯林就驻扎在那里；这里的要塞造成的威胁，英诺森三世在其通谕《事出紧急》中就提到过。12 月 3 日，他们在雾中攀上了这座山丘，但进攻却失败了；两天后的第二次进攻也以失败告终。12 月 7 日，他们返回阿卡。第三支远征队由不到 500 人组成，他们在圣诞节前不久出发去进攻西顿山地中的游击队伍，但却遭到伏击，全军覆没。

与此同时，匈牙利国王在第一次侦察行动之后就一直无所作为，这时他打算返回国中。1218 年 1 月初，他出发前往叙利亚，取道小亚细亚从陆路

---

① 匈牙利南部城镇。——译注

② 处于加利利海南端西面约 20 公里，海拔约 562 米，传统认为，耶稣在该山山顶改变形貌。——译注

返回欧洲，带走了麾下许多臣子。而留在阿卡的十字军在等待新的增援力量到来时，则专注于加固凯撒里亚的防御工事，并在阿特利特（‘*Atlit*，又称佩勒兰庄园 [ *Chastel Pèlerin* ]）<sup>①</sup> 修筑一座新的宏伟的圣殿城堡。后续部队从4月26日起开始从海路抵达阿卡。由于此时来了大量的弗里斯兰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能自由支配一支数量可观的舰队，十字军的领袖们于是决定，是时候进军埃及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现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计划。5月27日，先锋部队来到达米埃塔，这个城镇早在1199年时就被耶路撒冷的牧首确认为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最重要的目标。他们遇到的外围抵抗很少，十字军很快选择了一个地方安营扎寨。这是与城镇相对的一座岛屿，刚好位于尼罗河与一条废弃的运河交界处。他们在这里修筑了一道壕沟和防御墙。

但让达米埃塔陷落却花费了18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围城部队不断得到意大利、法国、塞浦路斯和英格兰十字军的增援。当然，也有人离开了，比如1219年5月奥地利的利奥波德。耶路撒冷国王约翰被授予了总指挥权，不过这似乎仅仅意味着他能成为一个作战委员会的头目而已。1218年9月，教皇使节阿尔巴诺的佩拉吉乌斯（*Pelagius of Albano*）抵达。佩拉吉乌斯个性强硬，国王约翰之前认为，如果埃及被征服的话会并入他的王国，但佩拉吉乌斯却打算加以反对。他的声音逐渐主导了作战委员会的方针，约翰则越来越变得无足轻重。

在围城战的第一个阶段里，基督徒们试图夺取链塔。这是一处非常壮观的防御工事，建在尼罗河中央的一个岛上，从塔上可以升起铁链，阻断河道上的交通。十字军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无法攻破链塔，直到帕德博恩的奥利弗亲自设计的一个浮动攻城器投入使用。这事实上是一个微型堡垒，有一架可以伸缩的云梯，架设在两根交叉的圆木上。1218年8月24日，十字军操纵这个攻城器划向链塔。在一场激烈的交战之后，他们在岛上站稳了脚跟。第

<sup>①</sup> 位于今以色列北海岸，距海法以南约13公里。——译注

二天，余下的防卫者投降。据说埃及的苏丹听闻战事反转的消息后震惊而死。但十字军并没有马上从这次攻势胜利中赢得多少好处，穆斯林很快就用大量沉船弥补了链塔陷落造成的防守空缺。10月，十字军经受了敌军对他们营地的两次严厉打击。他们还不辞辛劳地开掘那条废弃的运河，希望能让船只沿河而上绕过达米埃塔。运河在11月初凿通，可是冬季气候非常糟糕，洪水肆虐，冲走了他们的补给，毁坏了他们的帐篷，还把他们新建的一座更大更坚固、架设在六根圆木上的浮动堡垒冲到了穆斯林那一边的尼罗河岸上。不过，在1219年2月初，新任埃及苏丹发现有人阴谋推翻他，于是临阵脱逃。与基督徒隔岸对峙的穆斯林军队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人心惶惶，于是放弃了自己位于城镇附近的营地。等秩序终于恢复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基督徒们已渡过了尼罗河，占领了达米埃塔这一侧的河岸，还获取了大批补给资源。如今他们占据了尼罗河两岸，而且还在河上架起了一座桥。

179 此时，埃及政府提出议和，称只要十字军撤出埃及，他们将归还除外约旦之外所占的全部耶路撒冷王国的领土，还会遵守长达30年的停火协定。在伊斯兰世界里，人们认为与不信者达成的停火期限最长不应超过10年，考虑到这一点，30年停火协定实在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让步。耶路撒冷国王倾向于接受，但佩拉吉乌斯和各个骑士团却不愿意，即使埃及人后来又提出将为位于外约旦的卡拉克和肖巴克（Shaubak）每年支付15 000比桑的租金。而与此同时，穆斯林得到了来自叙利亚的一支军队的增援，整个3月、4月和5月，他们对基督徒的新营地不断发起攻击。十字军建起了第二座浮桥，架设在38艘舰船上，就停在达米埃塔城下。从7月8日开始，他们对该城发起了一系列直接攻击，直到尼罗河水位下降到让他们无法搭住云梯来攀缘该城沿河一面的城墙。城外的穆斯林一直在进行反攻，7月31日，他们甚至长驱突进了基督教的营地，冲撞一番后才被赶出来。

8月29日，十字军决定对穆斯林的营地发起一次攻击，但却被一次佯退引入了陷阱，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埃及苏丹立刻重启谈判，又在之前的条件上加上了新的承诺：愿意支付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和贝尔沃、采法特、托伦

三处城堡的费用。他还提出归还在哈丁被夺走的真十字架遗物。耶路撒冷国王，来自法兰西、英格兰和条顿骑士团的骑士都倾向于接受议和，但佩拉吉乌斯、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却仍然坚决地反对。事实上，达米埃塔的守军此时因为饥荒已经非常虚弱，根本没办法守住这座城镇了。11月4日晚，基督徒这边的四名哨兵发现，有一座塔楼似乎已经被放弃了。翻过城墙，他们发现塔楼确实已经被弃，于是十字军迅速占领了城市。驻扎在附近的埃及军队匆忙撤往曼苏拉（El Mansura）<sup>①</sup>。到11月23日时，基督徒们又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沿岸的蒂尼斯（Tinnis）镇。

阿尔巴诺的佩拉吉乌斯与耶路撒冷的约翰之间潜藏的不和，如今已经公开化。约翰离开了，十字军失去了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上层之间的冲突在下层演变为骚乱，又因为争抢瓜分城镇中丰富的战利品而愈演愈烈。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基督徒军队在此后的20个月中再无行动，让苏丹有足够的时间将自己在曼苏拉的营地加固为一处要塞。但他又再次提出议和，还再次增加了诱人的条件。而十字军再次拒绝。他们此时开始等待腓特烈二世的到来。腓特烈二世于1220年11月22日完成加冕后承诺，将于次年春天派部分兵力前来，而他自己将在次年8月亲自前来。

德意志军队在1221年5月抵达；终于，进军内陆的准备完成。7月7日，耶路撒冷的约翰在教皇的严令下重新加入队伍。17日，十字军开始沿尼罗河东岸行进。24日，他们不顾约翰的建议，进入了一块被尼罗河的两条分支夹住的狭窄地块，这里正对着曼苏拉。他们就停在了这里。可能他们认为尼罗河在此时应该不会泛滥，虽然它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未免太轻率，因为8月的时候尼罗河水开始上涨，虽然这比以往多少晚了一些。穆斯林利用一条小运河把船只驶入主河道，阻塞了返回达米埃塔的航路。这一意料之外的举动迫使十字军撤退，但穆斯林又派军队从陆路包抄他们，截断了他们的退路，并凿开水坝淹没了他们驻扎的狭窄地

180

① 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城市，距开罗东北方向120公里。——译注

块。十字军被困住了，只得议和。8月30日，他们同意离开埃及，条件是八年停火协定以及归还真十字架。但他们始终没有拿回真十字架，可能它根本不在埃及人手中。

## 腓特烈二世的东征

就在这个时候，腓特烈二世送来的援军抵达了。援军领导人强烈反对接受十字军之前已经同意的议和条件。等腓特烈听说了这件事的时候，他也非常愤怒，但他又没有立场加以指责。因为到1221年秋天时，他还没有履行自己参加十字军的承诺，因此，就像30年前的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一样，他自己正遭受着严厉的抨击。他始终没能成行并不表示他对此漠不关心。他当然可以很冷酷无情，但是，尽管在他的有生之年人们传播了很多关于他的丑闻——他的事业既让当代人迷惑，也让后来的传记者迷惑——他却毫无疑问相当传统、相当虔诚，对十字军运动有强烈的认同和参与意愿。1215年他立下誓言时才20多岁，而且，德意志的内战以及他回到意大利南部时看到的混乱无主的状况，都解释了为什么他会一拖再拖。虽则如此，本身也因十字军行动的失败而遭受谴责的教皇洪诺留三世，却还是忍不住要强烈地表达他对于此事的态度。1223年3月在费伦蒂诺（Ferentino），腓特烈当着国王约翰、耶路撒冷牧首和各个骑士团团长的面，再次重申自己的诺言。他将1225年6月24日定为他出发的日期，还与耶路撒冷王国的女继承人订下婚约，此时，她的父亲约翰正为她担任摄政。腓特烈为十字军提供了免费的运输和补给，但尽管有这样慷慨的经济条件作为诱惑，人们的反响并不热烈。腓特烈被迫建议推迟出发日期，以让传道活动能有时间取得更好的效果。1225年7月25日在圣日耳曼诺（St Germano），他同意将在1227年8月15日出发，而且接受了教皇对他提出的严苛条件：他必须承诺在东方自掏腰包供养1000名骑士两年，每少一人就须支付50马克的罚金。他还要

提供 100 艘运输船、50 艘武装大船，并提前分五期向巴勒斯坦定居点的领导人们提供 10 万盎司的金子，以此为他的战争花费做准备；但当他抵达阿卡时，这笔钱将归还给他。

腓特烈于 11 月 9 日在布林迪西娶了耶路撒冷的约兰德（伊莎贝拉），他自己也在福贾接受了一次特地举行的加冕仪式，继承了耶路撒冷国王的头衔。这使得他的十字军行动的目的地从埃及转移到了耶路撒冷。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招募活动在德意志和英格兰展开。到 1227 年仲夏，大批十字军战士集结到了意大利南部。他们在 8 月到 9 月初从布林迪西起航，虽然很多人在巴勒斯坦听到皇帝腓特烈根本没有加入他们行列的消息之后就散去了，主力部队还是沿着海岸行进到凯撒里亚和雅法，收复了两处要塞城镇；而其他人则完全控制了西顿并加固了防守（这座城镇有一半由大马士革控制），还在阿卡东北方修建了蒙福特堡。

此时，腓特烈正在生病，他停留在奥特朗托港，决定等身体好些再出发。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的回应是对他实施绝罚。我们很难判定，格列高利这么做，到底是因为他被又一次的延迟出发搞得震怒（这是他宣称的理由），还是他想借机为他侵占腓特烈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地找借口，因为如果腓特烈的十字军行动是合法的，他就不能这么做，教会必须保护十字军的财产。无论如何，当腓特烈于 1228 年 6 月 28 日终于踏上征途时，他被逐出了教门，是一位不被认可的十字军战士。9 月 7 日抵达阿卡时（途中在塞浦路斯还有一段插曲，我们后面会讲到），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开战。他麾下的军队规模很小，因为众多上一年抵达的十字军战士已经返乡；而且这支军队四分五裂，原因是，很多人由于他被绝罚了，根本不想和他扯上关系。不过，从 1226 年开始，他就一直在与埃及苏丹卡米尔互换使者。卡米尔想与他结盟，共同反对自己的兄弟大马士革的穆阿扎姆。到 1228 年，穆阿扎姆去世，卡米尔又被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打击得很惨，但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腓特烈的力量有多虚弱，所以仍打算利用耶路撒冷作为筹码来确保埃及自身的安全。

谈判马上开始了。为了展示自己的军力，腓特烈在 11 月间从阿卡行军

到雅法。1229年2月18日，一项条约签订，卡米尔交还了伯利恒和拿撒勒、从耶路撒冷延伸到海岸边的一块领土、西顿的部分地区（已经被基督徒占领）、托伦堡，以及最重要的耶路撒冷本身，不过圣殿区域将留在穆斯林手中，城市也不能设防。作为回报，腓特烈声称将面对所有敌人以捍卫苏丹的权益，即便这敌人是基督徒，并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停战协定；此外，他将不援助的黎波里或安条克或骑士堡、马卡布和萨非塔（Safita）的骑士团兵力。不过，耶路撒冷也不大可能设防，听到条约签署的消息后，耶路撒冷牧首对城市下了一道禁教权令。腓特烈在3月17日进入这座城市，第二天他在圣墓教堂接受了一场帝国加冕礼，应验了古代对最后一位德意志皇帝的预言，称他将在敌基督（这从一开始就是十字军运动思想中的一个元素）降临之前占领耶路撒冷城，这则预言可能当年也激励了他的外祖父。此后，耶路撒冷将留在基督徒手中长达15年时间，但它似乎并没有融入耶路撒冷王国，而是被腓特烈当作了私人所有地。

3月19日，腓特烈返回阿卡，在那里他遭到了牧首、贵族（他和这些人的关系我们会在后面讨论）以及圣殿骑士的强烈反对。城中一片混乱，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街上呼啸游荡。但教皇的军队侵入阿普利亚的消息迫使腓特烈无暇顾及这里的一切，只能匆匆返回故土。他试图在5月1日凌晨悄悄离开，但行迹还是暴露了。在去往港口的路上经过肉市时，有人朝他扔牛羊的内脏和肉块。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于是有了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尾声。耶路撒冷光复了，依靠的是由一名遭绝罚者争取来的和平协议。这位皇帝的十字军没有得到承认，他自己的领土还遭到教皇军队的入侵。耶路撒冷本身被自己的牧首设立了禁教权令。它的解放者没有凯旋，却是淋着动物的内脏离开的。



## 第七章

# 成熟期的十字军运动（1229—约 1291）

### 13 世纪中期的十字军思想

十字军思想诞生 150 年后，在教皇英诺森四世及其学生塞古西奥的亨利（Henry of Segusio，更常被人称为奥斯提恩西斯 [Hostiensis]）<sup>①</sup> 的作品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达。两人都强调，教皇是唯一的世间立法者，免罪权是只有他才能授予的权利，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的权威。圣地是因基督的出现和献身而变得神圣的，曾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因此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基督徒；穆斯林占领它是一种亵渎，对此，教皇作为基督的代理人和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应该下令对此进行纠正。十字军也可以发动起来防御不信者造成的威胁，并可延伸开来，针对基督教世界中威胁到基督徒灵魂的人。奥斯提恩西斯响应了受尊敬的彼得的观点，认为针对异端、裂教者和叛徒的十字军行动甚至比前往圣地的行动更加必要；但在论及基督徒与不信者之间的关系时，他的立场却比英诺森四世激进得多。英诺森四世打算持有的立场是，教皇在律法上（*de jure*）对不信者拥有权威，但在实际上（*de facto*）并不拥有，其权力在于命令他们允许传教士在他们的土地上传道，以及当他们违反自然法时可以最终下令惩罚他们。但他强调，基督徒不应仅因为他们是不信者就对他们宣

<sup>①</sup> 约 1200—1271，13 世纪意大利的一名教法学家，出生在古城苏萨（Susa），而该城在拉丁文中被称为塞古西奥。——译注

战，也不能为了让他们皈依而发动战争。而另一方面，奥斯提恩西斯却认定，教皇可以直接干预不信者的事务，他们拒绝承认他的统治本身就足以构成正当理由让基督徒攻击他们。他甚至还建议，基督徒针对不信者发动的任何战争都是正当的，仅凭基督徒本身的信仰理由就已充分。这实在有些太激进了，所以此后基督教的观点倾向于追随英诺森四世而不是奥斯提恩西斯。

184 英诺森四世和奥斯提恩西斯那种理性的法律观点听起来非常不鼓舞人心，也无法表达出十字军运动具有的那种激情澎湃的特质。确实，其最激进的方面，即它是个人苦行赎罪的举动这一事实，随着神学和骑士制度的发展已经逐渐被稀释，开始被作为基督武装服役的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400年前后的圣奥古斯丁）来看待。但我们绝不应夸大这种偏离苦行赎罪的转变。十字军运动仍然是一种赎罪活动，这反映在13世纪布道词中那种虔诚的语言中，其中将对十字架的依恋提到了核心位置。对经验丰富的传道者罗芒的安贝尔而言，正是十字架这一人类救赎的象征才将基督徒与穆斯林区别开来。它标志着十字军战士为基督服务的奉献精神，以及他致力于参与基督受难的渴望：

事情正是如此，我们在肩上佩戴[基督的]十字架是因为他，因为我们不仅通过信仰在心中拥有它，通过告解在口中拥有它，更通过承受痛苦在身体上拥有它。

当然，十字架始终是十字军运动思想中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在这场运动的前80年当中，（据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它的形象似乎在传道者的语言和十字军战士的思想中，都没有耶路撒冷的基督圣墓来得更重要。十字架在十字军运动思想中逐渐脱颖而出，从一个自我牺牲的潜在象征转变为让一切具有意义的正当凭据，这一切的发生首先是因为当时人们越来越关注基督受难，而且出现了不少与它相关的具有感染力的画面和形象。对十字架的强调反映了一种大众宗教日益盛行并取得中心地位。

到13世纪中期时，十字军运动已经变得非常普遍，许多致力于此的家族常常可以追溯出四代或五代十字军战士。规范十字军地位的各种特权也已经形成定式。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免罪权。此外，又附加了不少传统上由朝圣者享有的权利：当十字军战士不在家时其财产和依附者受到保护；在他离开期间，本来其所牵涉到的封建义务和法律审判都可延迟，或者在他出发之前让审判加快进行；如果遭遇盗窃事件，他可要求赔偿；可以延迟偿付债务直到他返乡，其间利息不予计算；无须缴纳人头税和其他税。对教士而言，他可以虽然不驻扎在当地但仍享受津贴，并可通过抵押这种权利筹集现金。对世俗之人来说，他可自由出手或抵押本来通常不可让渡的封地或其他财产。而另一些权利则让他身处极端环境中时在法律上居于特权地位：因为接受十字架，因此不能被绝罚；因为许诺参加十字军，可以免于履行其他诺言；可以与受绝罚者打交道，可以不受禁教权令的约束；可以不接受传唤，到他自己的教区之外应诉；享有特权而拥有一位私人告解者，能被允许宽恕他众多不寻常的罪行，比如通常只能由教皇做出裁决的自杀。

传道机制虽然再也不像1213年英诺森三世提出的那样系统，但已经稳固确立下来，只要能准允免罪权，任命教皇使节，就能迅速行动起来，而且这个系统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托钵僧，他们成了为十字军传道的的主力。在1266至1268年间，罗芒的安贝尔在数年前辞去传道团总团长之职并隐居在里昂的多明我修道院后，写下的《论针对撒拉森人的十字架传道》(*De praedicatione sanctae crucis contra Saracenos*)可谓传道者的指导手册。他希望传道者在踏上传道旅途之前能事先做好准备。他们应该熟悉世间的地理状况；十字军应该被引导前往特定的地域，尤其是圣经中提到过的地方。他们应该了解伊斯兰（他建议他们阅读古兰经）、穆罕默德的生平以及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过往战争，为此安贝尔提供了一个阅读书单。他们应该拥有为人提建议所需的技巧，与回答人们对发动了十字军的教皇通谕的问题以及免罪权、赦免权和豁免权的问题所需的技巧。为了帮助他们传道，安贝尔列出了138段摘自旧约和新约的经文作为传道文本，以“为神圣历史上的宗

教战争提供一种全景”(这是科尔教授的说法);还从另一些书中摘录了一些能够引起听众兴趣的逸闻。

他建议传道者们要个别会见某些大领主,因为他们能够引发很多人追随一道接受十字架。不过,私人会面仅仅只是大型公众传道会的补充,这种传道会要短,结尾一定要发出邀请号召(*invitatio*),促使听众们接受十字架。安贝尔列举了 29 个例子。以下是其中一例的开篇:

因此,很清楚,最受眷顾的人,那些加入了主的军队的人,将得到主的祝福。他们将有天使相伴,他们将在逝去时获得永恒的奖赏。

其他留存下来的 13 世纪的传道词中,也包含着类似的邀请号召。它们通常语句相当生硬,感觉像是精心写下来的范例,但事实上它们通常都是即席发挥的。从现存的关于 1200 年 5 月 3 日巴黎修道院院长马丁在巴塞爾的传道场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一睹这种传道会是何等激情澎湃。传道中时不时就会发出一些相当情绪化的呼吁:

那么,强壮的战士们啊,今天就来帮助基督吧,让自己名列在基督的骑士之列,赶快集结在一起共同保证成功的未来吧。今天,正是为了你们,我宣扬了基督的事业,我正是把这交到了你们手中;也可以说,是基督自己,交到了你们手中,于是你们可以奋力为他收回遗产,那是敌人曾如此残忍地从他这里夺去的。

安贝尔的邀请号召每篇都以 *cantus*<sup>①</sup> 一词结尾。他解释说,邀请号召应具有音律节奏。他提到了《来吧,造物主》(*Veni Creator*)、《来吧,圣灵》(*Veni Sancte Spiritus*)、《君王的旗帜》(*Vexilla regis*)以及《向圣十字架欢

① 拉丁文,意为音调。——译注

呼》(*Salve crux sancta*)<sup>①</sup>等几首圣歌，但也补充说，其他合适的曲子也可以使用。我们知道，有些传道者使用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安贝尔使用的旋律，两首献给十字架，两首献给常被视作十字军战士激励者的圣灵。当时一定已经开始使用合唱团了，因为人们会站出来公开表示自己的献身意愿。

如今，向教士征税已经常规化。其税率通常是十分之一，会向整个教会或者某几个特定教省的教士们征收，年限从一年到六年不等。税款通常是每年分两期均等支付。补助金被发放给了各色人等，从国王到小领主都有，通常由从他们自己的领地及其亲属领地上的教堂募集来的现金构成。我之前已经指出，这使得教皇拥有了在12世纪时无法想象的指导权。因为，在参与十字军变得如此昂贵而十字军战士们都急需资金的情况下，教皇就能够通过支配授权因此也支配了大部分的十字军拥有的资源，从而让事情服务于他们在特定时期内想要坚持的政策。不过，实际上，他们的控制力从来没有达到理论上表明的那种有效程度。如果某位获得资金授权者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按理来说他的补助金（此时被封存在宗教机构的库房中）将会被送到罗马；但特别是当情况涉及某位国王时，教皇往往很难拿回应得的归还款。而税款一般都是累积征收的，往往旧账未清而新的又开始征收了，因此一直就非常不受欢迎，在各种理论原则层面上不断遭受抨击。人们充满敌意地对待教皇使节，有时甚至公然反抗，因此，税款征收得往往非常缓慢，有时还根本拿不到。

然而，这项政策的好处在于，现金资助让十字军领导人不仅能雇得起雇佣军，而且能为手下的十字军战士提供资助。有可能是早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但肯定自13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是，国王和大领主会与追随者签订服务协议，通过授予他们补助金来换取他们派出特定人数进行特定服务。这个体系使得志愿者们能够像被领导人雇用一样获得报酬；而有了这层约束关系，也就更容易管束他们了。

<sup>①</sup> 这几首圣歌名均为拉丁文，与之前提到的教皇通谕一样，取的就是歌词的前几个词。——译注

## 伯爵们的十字军行动（1239—1241）

187 腓特烈二世与埃及苏丹签订的停火协议将在 1239 年 7 月结束，而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则预先在 1234 年就发布了新的十字军号召。他还特意命令多明我会为十字军传道。与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次法兰西各地反响热烈，以至于在 1235 年 9 月，格列高利不得不下令让法国的主教留心监督，不要让十字军战士在东方的停火协议还没失效前就出发。他本人一直在构想一个更加野心勃勃也更加实用的计划，以期在停火结束之后的十年间在巴勒斯坦保有一支军队；但最后他拿出来却是一个不太实际的提案。这个方案将在 1274 年由格列高利十世加以修订，所依据的应该是 12 世纪的国王们的十字军税法方案。每一位基督徒，无论男女，无论是教士还是世俗人士，只要没有宣誓参加十字军，就将每星期为这项事业捐献一便士（但这个数额实在超过大多数人生计能承受的范围），这笔钱将用来资助十字军战士和在东方修建工事，而捐助者们仅能获得有限的免罪权。因此，毫不奇怪，这一项税似乎从来没有实际开征过。

原先希望的是法国的十字军能在 1239 年 7 月之前抵达圣地，但军队渡海和补给都要依赖于腓特烈二世在意大利南部拥有的港口。而腓特烈坚持，在停火协议失效前，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延迟到 8 月才能出发。更为严重的是，教皇突然改变了主意。由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情况危急（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描述相关情况），教皇于是在 1236 年夏末提出，将十字军的目的地转移为君士坦丁堡。此时这支队伍由布列塔尼伯爵领导。教皇请求已经宣誓参加前往巴勒斯坦的十字军的香槟伯爵蒂博德帮助拉丁帝国。他告诉兰斯大主教德勒的彼得的兄弟，如果巴尔伯爵亨利决定前往君士坦丁堡，就给予他资助。他命令赛斯主教转移誓言针对的对象，前往相助拉丁帝国；还授权马孔主教允许 1226 年在朗格多克的战役中的铁腕人物博热的安贝尔，也将自己的誓言移向君士坦丁堡。事实上，人们预计，教皇可能转移了 600 名法国北部骑士的誓言。同

时，他还写信到匈牙利，鼓励那里的人们帮助君士坦丁堡。但在法国，有人抵制目的地的转移。到1237年5月末，格列高利似乎已经满足于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将会出现两支十字军。有赖于领导这支队伍的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的努力，当去往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于1239年夏末出发时，队伍的规模相当庞大，尽管据我们所知参与其中的法国大贵族仅有博热的安贝尔和马尔利的托马斯（Thomas of Marly）两人。1240年该十字军夺取了位于色雷斯的乔尔卢（Çorlu），他们的到来也为君士坦丁堡争取到了喘息的余地。

与此同时，前往圣地的法国十字军在里昂集结。这支军队可谓自1202年以来法国征募过的最群星闪耀的十字军队伍，由两名年龄相仿的人领导：香槟伯爵蒂博德四世（他还是纳瓦尔王国的国王，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早期领导人蒂博德三世之子）和勃艮第公爵于格。与他们同行的有法国王室总管（constable）蒙福特的阿马尔利克——蒙福特的西蒙之子（也是他在朗格多克的继承人），司膳官（butler）科特奈的罗贝尔，以及布列塔尼伯爵、讷维尔伯爵、巴尔伯爵、桑塞尔伯爵、马孔伯爵、茹瓦尼伯爵和格朗普雷伯爵。他们大多在8月从马赛起航，9月1日前后抵达阿卡。他们很快听到消息说穆斯林要对耶路撒冷采取行动，但就在他们到来的时候，东方定居者的领袖们之间正在进行一场争论，核心是到底要进攻大马士革的统治者还是开罗的苏丹，而这两方又互相不睦，可以各个击破。最终的决定是同时进攻两头。军队将沿海岸而下，重新布防阿斯卡隆主塔，然后再进攻大马士革。11月12日，由大约4000名骑士组成的一支非常强劲的队伍来到雅法，在那里他们听说加沙驻扎着一支规模很大的埃及军队。但不顾这些警告，甚至罔顾香槟的蒂博德、德勒的彼得以及各个骑士团领导人的反对，一支囊括了勃艮第公爵、巴尔伯爵、蒙福特伯爵和布里埃纳伯爵（他拥有雅法的领主权），以及西顿领主、阿尔苏夫领主、耶路撒冷王室总管蒙彼利埃的奥多在内的分队，整夜急行军，最后驻扎在了比阿斯卡隆更远的前沿阵地。或许这支分队的进攻计划并没有如今看来那么莽撞，因为当地的主要贵族也同意了

这项计划，而他们是最知晓自己敌人情况的，可是队伍的领导人却忽略了派遣哨兵打前站。最后他们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尽管勃艮第公爵和几块领地的领主逃脱，巴尔的亨利和蒙福特的阿马尔利克却拒绝这么做。在随后的交战中，他们被一次佯退引诱得脱离阵地冲杀过远，结果亨利被杀，阿马尔利克和大约 80 名骑士被俘。

基督徒军队的主力在抵达阿斯卡隆时听说了这次被伏击的情况，但埃及人不再恋战，已经撤走。十字军没有按照预定计划重建阿斯卡隆的主塔，而是沿海岸撤回到了阿卡。他们一直留在那里，甚至在外约旦领主纳西尔·达乌德（an-Nasir Da'ud）攻下耶路撒冷并毁掉了大卫塔之后也是如此。1240 年春，蒂博德率领他的队伍北上到达的黎波里，据说是哈马领主因为渴望得到帮助对付其他穆斯林王公，声称要皈依基督教。虽然这看起来不太像认真的，蒂博德还是受了引诱。当然，这次冒险最后一无所获，蒂博德在 5 月返回了阿卡。他随后与大马士革的萨利赫·伊斯玛仪（as-Salih Isma'il）谈判想建立一个同盟。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已让伊斯玛仪的侄子暨前任大马士革统治者成了埃及苏丹，这让他感到担忧，于是应允归还博福和西顿的腹地、提比里亚、采法特和加利利全境给基督徒，也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恒和巴勒斯坦南部的大部分领土，只要大马士革和拉丁人的联盟能战胜埃及。这项条约自然会遭到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反对（萨利赫·伊斯玛仪在交出博福之前，甚至还要先围城攻取它），拉丁王国中倾向于与埃及缔约的一派也当然会加以反对。但蒂博德率领军队与大马士革的军队在雅法会师。可是，随着埃及人向巴勒斯坦逼近，大马士革军中很多人丧失了士气，大批逃亡，使基督徒军队又陷入了孤立状态。于是，蒂博德终于被说服与埃及开始展开谈判。基督徒军队上下再次出现反对的声音，而且此时他的十字军行动开始显得非常荒谬。他最初开战的目标既有埃及也有大马士革，但现在他却与这两个对手都进行着谈判，而商议中的两个和平协定显然会相互抵触。虽则如此，他还是成功地从埃及人那里得到保证，可以得到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南部的土地，而这也是大马士革一方之前同意给予基督徒的。这就是



说，定居者们能够得到比自 1187 年以来所得更多的土地。耶路撒冷如今回到了基督徒手中，蒂博德在进城朝圣之后于 1240 年 9 月出发返回西方，留下勃艮第公爵和讷维尔伯爵来重建阿斯卡隆的主塔。他前脚刚走，第二拨十字军就抵达了。

英格兰对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发出的呼吁也响应积极。国王亨利三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earl of Cornwall）理查，在 1236 年接受十字架参加十字军。他必须应对他哥哥以及教皇想让他留在英格兰的种种尝试：1239 年，格列高利九世甚至建议他把本来打算用在十字军征途上的钱送往君士坦丁堡，直到最后才不情不愿地同意他使用在英格兰为拉丁帝国筹集的现金。1240 年 6 月，理查离开英格兰，随行的有索尔兹伯里伯爵（earl of Salisbury）威廉以及十几位贵族。莱赛斯特伯爵蒙福特的西蒙，也是阿马尔利克的弟弟，此时似乎也在十字军的征途中，且好像是单独前往东方的。这两支队伍中一共大约有 800 名英格兰骑士。理查在 10 月 8 日抵达阿卡。他发现，定居点的领导们仍然为如何处理与大马士革和埃及的关系而分歧严重。他决定遵循多数派的意见，他们倾向于与埃及缔约。他沿海岸行军到雅法，在那里会见了埃及的使节，随后前往阿斯卡隆完成主塔的建设工作。建成后，他不顾伯爵们的反对（将在下一章中描述），把主塔交给了国王的摄政——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代理人。1241 年 2 月 8 日，与埃及的停火协议正式确定。13 日，在加沙被俘的囚犯获释。5 月 3 日，理查起航回国。

## 圣路易的第一次东征

1244 年，联盟关系再一次发生变动，导致耶路撒冷被花刺子模<sup>①</sup>人占

190

① 位于中亚西部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今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的土地上。——译注

领，拉丁定居者在哈比亚战役（Battle of Harbiyah）中大败，而蒂博德和理查赢得的土地也大部分丧失。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可能促使法国的路易九世于次年12月决定接受十字架加入十字军，但他宣誓也有其他原因。他当时病得很重。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是为了对他那精明强干、掌控一切的母亲卡斯蒂利亚的布朗歇（Blanche of Castile）表示反叛。布朗歇在路易九世年少时担任摄政，在他成年后也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但路易九世现在已经30岁了。对于路易的举动，布朗歇感到非常难过，于是她在巴黎主教的帮助下试图说服，他病中发下的誓言是没有约束力的。他的回应是，等身体好了之后再次宣誓，这样他母亲说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了。18个月之前，与他关系非常亲密的姐姐伊莎贝拉拒绝了与皇帝的继承人联姻的提议（这项联姻得到了布朗歇、腓特烈二世和教皇的支持），就在他生病严重的时候，发下誓愿要永葆贞洁。她没有进修道院，而是在家里修行，穿着朴素，专心照顾穷人。有人指出，路易这次违背母亲的意愿宣誓参与一项神圣的事业，是在响应他姐姐的行为。两人行为之间有着不少共同点——患病、宣誓、拒绝母亲为他们的安排，可能绝非偶然。

路易选择这项事业作为他反叛的方式，对于一个他这样地位和性格的人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他继承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家族传统。在他的父系这边，从1095年以来几乎每一代都会贡献一名十字军战士。他的曾祖父和祖父曾分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人。他的父亲在结束了阿尔比十字军运动后的返程中去世，这也自然让布朗歇对这项事业非常敏感。而从布朗歇这个家系来看，路易也是一连串虔诚的十字军战士的继承人。卡斯蒂利亚的国王们曾是西班牙再征服运动的领导人，而布朗歇的父亲曾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中取胜。此时，家族参与十字军的传统所具有的沉甸甸的分量压在新一代的众人肩膀上，路易承受的也和他们相差无几：有三个兄弟随他一道前往东征。

起初，他似乎并没有后来那样对圣地如此狂热关心。他既支持了伯爵们的十字军所导致争论中的双方——教皇和他的表兄弟鲍德温二世，后者这位

年轻的君士坦丁堡皇帝在西方的生活费都由他支付；与此同时又为去往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提供了鼓励、授权和经济上的援助。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似乎将他的目光从此牢牢地锁在了圣地。1238年，急需资金和军事援助的鲍德温二世提出，要将基督受难最著名的遗物荆棘冠从君士坦丁堡运到法国以募集资金。路易一生都很执着于圣物：他热心地进行收集；他建造教堂来安置这些圣物，还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自己青睐的机构；他在旅行途中时不时就会去朝拜圣地。他很快就对鲍德温的提议做出了回应。他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但这个使团一到那里就发现荆棘冠已经归了威尼斯人。双方商定威尼斯人以13.5万镑的价格转购荆棘冠（当时王室每年的预算也就25万镑）。1239年8月11日，路易国王和他的兄弟们在阿什维克新城（Villeneuve-l'Archevêque）迎接圣物箱，然后光脚把它送到了桑斯。随后，它由船运到万塞讷（Vincennes），公开供众人瞻仰敬拜之后，再由他们亲自护送进了巴黎城，转而安置在皇宫里的圣尼古拉礼拜堂里。

可能从鲍德温二世那里，路易知道了君士坦丁堡其他的圣物已经转移到了巴勒斯坦，其中包括真十字架的一块碎片，这是圣殿骑士团花了大价钱购得的；另外还有一小玻璃瓶宝血<sup>①</sup>。这些也都以他的名义进行了赎买，并于1241年送到了巴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路易已经购得君士坦丁堡帝国宝库中著名藏品的主要部分。这里面几乎囊括了所有与基督在人间最后几个小时的每一个阶段相关的神圣遗物，以及很多其他的珍贵物品。这批圣物甚至可以与古代在罗马的收藏相媲美，但各件物品的流转源头到了13世纪时已不可追溯。比如，其中有几块真十字架的碎片，可能是一直藏在拜占庭皇帝的大皇宫中的那几块著名的碎片，也正是它们帮助君士坦丁堡自6世纪开始成为圣物流转的中心。鲍德温二世在1247年完全将这批藏品转给了路易。为了安置它们，路易之前就已经开始建造圣礼拜教堂（Sainte-Chapelle）<sup>②</sup>，但其完全建成则用了十年。路易的传记作者比尤利的若弗雷和

① 指耶稣被处死时流出的血。——译注

② 法国巴黎市西堤岛上的一座哥特式礼拜堂，专门为储藏基督圣物而建。——译注

圣帕修的威廉 (William of Saint-Pathus), 都证实了他对这些圣物异常虔敬。可是, 如果鲍德温本来以为转移这些圣物将有利于招募到拯救他帝国的十字军, 那他真就是适得其反了。巴黎并不能让人想起君士坦丁堡; 相反, 按照一位评论家的说法, 而是“如同另一个耶路撒冷”。考虑到耶路撒冷此时正被穆斯林占领, 这句评论所含的深意就很有分量了。

可能路易是在刚身染重病时听说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 因此, 有人说, 在病情最危急的时候, 卡斯蒂利亚的布朗歇曾命人将荆棘冠拿来让路易触摸。而且, 在此后他准备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 这些圣物发挥作用的频繁程度也是令人瞩目的。他精心掌控自己在第一次参与十字军东征之前巡游领地的时间节奏, 以便能刚好在 1248 年 4 月 25 日或 26 日圣礼拜堂的启用仪式上出现在巴黎。迟至 1270 年 6 月, 当他身在艾格-莫尔特 (Aigues-Mortes) <sup>①</sup> 为自己最后一次东征做准备时, 他还精心安排如何照看圣礼拜堂里的这些圣物的相关事宜。而当他在为第二次东征做准备时, 茹安维尔的约翰想要当面表示对此次行动的反对时, 到处找他, 最后也是在圣礼拜堂里找到他, “他走上了放置圣物的平台, 正要把真十字架的碎片取下来”。这些圣物回应了他内心的需求, 即他那种对这个如此广为人知的十字架有着夸张的甚至有些做作的虔诚。因此, 罗芒的安贝尔在给宣道者们的建议中这样提到: “法国国王在他的礼拜堂里将荆棘冠和主的十字架的神圣遗物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路易一旦决定要前往参与十字军东征, 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准备工作中。与他的曾祖父一样, 他在教皇正式宣战之前就已经主动开始准备了。当时教皇英诺森九世正深陷与腓特烈二世的激烈斗争中, 事实上对路易没有什么帮助。英诺森在斗争中处于劣势, 不得不逃离意大利。他向路易请求在兰斯避难, 遭到拒绝, 只好去了里昂。1245 年夏, 英诺森在那里召集了一次大公会议。7 月 17 日, 腓特烈被宣布废黜。就在十字军东征的前夕, 基督

<sup>①</sup> 今法国加尔省的一座城镇, 其位置可参考本书地图二, 在 13 世纪路易准备十字军东征时, 它是法国拥有的唯一一个地中海港口。——译注

教世界出现这样的分裂实在很糟糕；1248年，甚至有传言说腓特烈正在考虑进军里昂。但让情况更糟糕的是，征募十字军的努力现在出现了分散的趋势，因为教皇授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传道以进行一场针对腓特烈的十字军运动，另外，他又在西班牙授权了另外一次行动。这样一来，路易在法国边境之外的西欧地区几乎不能期望得到什么帮助。来自东欧的帮助也是没法指望的，那里正因1241年蒙古人的一场入侵而变得支离破碎。充分显示出他的宽容和克制的是，他居然还能与皇帝和教皇双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他现在只能自力更生了。为了维持法国的秩序，他付出了艰辛。在1241至1243年间，他镇压了严重的贵族叛乱，而且似乎还决心说服尽可能多的前叛乱者追随他前往东方：任何将要离开的十字军战士或朝圣者都渴望不在身后留下让人怨恨或记仇的因素。因此，按照惯例，他采取了一种新的管理王室及王室领地臣民的方式，对他自己的兄弟们的领地也是如此。在1247年的前几个月里，他派出一批调查者（*enquêteurs*），主要是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修士，前往各地调查对他及其手下管理者的抱怨情绪。这批人发现了许多不法的勾当，令国王大为震惊。这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各省的高级管理层中，至少进行了20项新的人事任免调整，尽管证据表明路易并没有换上什么新人，而只是利用一批有经验且值得信赖的官员。与他随行的茹安维尔的约翰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

我〔对我的臣民和封臣们〕说：“先生们，我要到海外去，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现在，往前一步吧，如果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我会依次补偿你们每一个人。”……我会依据我领地上所有人的判断来对他们做出补偿，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影响到他们在法庭上的决定，我也会毫不质疑地接受他们决定的一切。因为我不想带走任何一个不属于我的便士。但我将前往洛林的梅斯去宣称我对一大块属于我的土地的权利。

193

这次十字军相关的宣道活动于1245年初在法国开始。图斯库伦红衣主教

沙多鲁的奥多（Odo of Châteauroux）作为使节全权负责，而传道士也被派往了英格兰、德意志西部和斯堪的纳维亚。最终出发的队伍可能大约有 15 000 人，其中有 2 500 到 2 800 名骑士。这些十字军骑士大多数是法国人，不过也有一些挪威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苏格兰人和大约 200 名英格兰人。这次十字军的特点之一是，路易与贵族们签下保证书承包他们东征费用的方式，以及他以服务合同的形式资助相当数量的骑士的方式。路易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十字军领导人，但他是第一个大规模这样做的。他借钱给起领导作用的十字军战士，其中包括他的兄弟普瓦图的阿尔方斯；而且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他也不断在出借钱财。他还负责安排运输事宜，1246 年他签下 36 艘船从热那亚和马赛出发，尽管他手下的权贵们也更小规模地租赁了船只。他自己非常关注港口设施和补给情况。艾格-莫尔特之前就已经开始被建设成一个皇家港口，现在又进一步加以建设，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和一座雄伟的高塔，以作为他出发前的基地。大量的储备物资被提前送往塞浦路斯，正是因为他所采取的谨慎措施，虽然当时腐败和偷窃盛行，他的军队却基本上总是给养充足。如果我们再考虑到 1250 年时他被索要的赎金，以及他待在圣地期间的花费，那他随身携带的钱财实在非常巨量。令人吃惊的是，似乎直到 1253 年他的财务状况都还不错，从那一年开始他才被迫向意大利商人借钱。这可能有赖于他摄政的母亲 1252 年去世前在法国所做的一系列财政安排。

据我们所知，路易为他的十字军东征一共花费了超过 150 万镑图尔币，而当时他的年收入大概是 25 万镑图尔币。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少王室的开支，但事实上这笔钱主要来自日常收入之外的其他来源，这些在新的政策和管理者当政时期大为增长。1245 年，第一次里昂大公会议授予了他教会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为期三年，而法国的教士们自愿增加到了十分之一；1251 年，又另外授予了他为期两年的十分之一收入。确实，出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的原因，除了与他的王国接壤的洛林和勃艮第教区之外，法国之外地区的这笔收入路易几乎拿不到；但据估计，光法国教会本身就贡献了 95 万镑图尔币，也就是他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在教会税收和王室收入之外，还

有没收异端财产变现的收入（当时一直有这么做的动机）、从犹太人那里压榨来的收入，尤其是通过一场反高利贷运动的所得；从王室授权某些宗教社区选举他们自己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而获得的收入；以及分享部分已经空缺的领主职位的收益。另外，在王室领地内的城镇，人们还被期望“自愿”做出捐献，且不止一次，据估计这一举动大约带来了 27.4 万镑图尔币。

1248 年初，在国王路易出发之前，他巡视了一次王室领地，其核心举动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为圣礼拜堂落成典礼祝圣。在圣礼拜堂庄严地展示了圣物之后，路易在圣母院接受了朝圣者的经文和行囊，然后光脚行进到圣德尼教堂；在那里，他像他的前辈们一样，接过了法兰西的神圣战旗“金色火焰”。在访问了巴黎近郊的宗教场所之后，他开始南下，8 月 25 日到达艾格-莫尔特，9 月 17 日晚抵达塞浦路斯。他在该岛待了八个月，等待他的军队慢慢集结完毕，得到了从拉丁希腊和巴勒斯坦来的军队的补充力量。他似乎决心不能重蹈过去的覆辙，而要以最强大的兵力进攻埃及。1249 年 5 月末，他的十字军扬帆起航，于 6 月 4 日来到达米埃塔处的尼罗河河口。登陆从 5 日开始。再次证明他悉心准备的是，这支军队拥有大量的可在浅滩地区航行的小船，因此可以让大批军队迅速上岸。穆斯林的反抗很快被击溃，达米埃塔的守军士气全无，弃城而去。第二天，基督徒的军队进入该城。

路易必定起初还准备长期围城作战，因为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达米埃塔坚守了超过一年。毫不奇怪的是，在这次胜利之后，他的军队长期滞留，尽管他们也认真考虑了是否要马上沿海岸进军亚历山大城。因为尼罗河很快就开始泛滥，直到 11 月 20 日，水位开始下降，天气变得更凉，往内陆的行军才开始。而此时，恰好苏丹去世，埃及人乱作一团。埃及人的主要防御工事在曼苏拉，十字军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河对岸修筑工事。1250 年 2 月 7 日，一个当地居民告诉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过河，于是国王的兄弟阿图瓦的罗贝尔率领一支先锋部队在 8 日渡河。他们没有等待主力部队过河，而是直接杀入穆斯林的营地，甚至还直接进入了曼苏拉。在城中，他们被狭窄的街道困住，全军覆没，罗贝尔被杀。随后，与主力部队一道渡河的路易，与

195 伊斯兰军队整整激战了一天，之后穆斯林撤退，把这块地方留给了他。可是穆斯林不再士气低落、群龙无首，因为在2月28日新任苏丹图兰沙来到了曼苏拉。十字军处在暴露和孤立无援的位置，还遭受了肆虐的疾病袭击。伊斯兰军队不断进行游击骚扰，他们用骆驼把船只运送到包围基督徒的各个点上，从尼罗河下游发动进攻，切断了十字军与达米埃塔的联系，让他们无法获得补给。4月初，十字军再次渡河回到原来的营地。5日晚，开始撤回达米埃塔。但他们只挣扎着行进到半路就被迫投降。经过最精心准备和最细致组织的十字军东征行动就这样完结了，其领导人则成了敌人的阶下囚。

5月6日，路易获释。他的赎金是40万镑，其中的一半是当场支付的。他的王后刚在达米埃塔为他生下一个儿子，而此时这座城市已经重归穆斯林之手。大多数法国人返回了欧洲，但路易航行到了阿卡。他想确保自己的十字军同伴都能从埃及人手中获得自由，也决心帮助拉丁定居者抗击因他的失败带来的穆斯林对这里发动的新攻势。他又在巴勒斯坦待了近四年，有效地接管了耶路撒冷王国的管理工作，并在1252年与埃及谈妥了一项条约，其中包括结成针对大马士革的进攻同盟（但没有任何实质行动）；又在1254年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停火协议。他重新布防了阿卡、凯撒里亚、雅法及西顿，规模之大令人印象深刻。1254年4月24日，他起航回国，掏钱雇用了100名骑士留在阿卡驻防。这支队伍的力量相当强，其中包括的骑士数量超过了1255年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打算分别驻防在骑士堡（60人）和他泊山（40人）的数量，以及圣殿骑士团1260年将在采法特（50人）驻防的数量。当然，骑士只是队伍中所涉人员的一部分，与他们一同服役的还有弓箭手和步兵。如果我们假定每名骑士需要至少三名辅助作战人员，比如侍从，那这支军队就还需要一些指挥部人员，及其自备的马官和军械官，可能这要涉及多达1000人。路易在7月初抵达普罗旺斯的耶尔（Hyères）时，与当年已大不相同。1250年兵败造成的灾难被他解释为是对自己罪过的惩罚。他变得越发虔诚，赎罪心切。他衣着简朴，饮食简单。他致力于关心穷人。他渴求死亡。他努力当一个好国王，希望以此来赎



清他失败的进攻给基督教带来的耻辱和损害。

## 普鲁士和利沃尼亚的十字军行动

在教皇们的脑海中，与前往东方的十字军运动形成竞争关系的是十字军在欧洲的行动。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波罗的海沿岸已经出现了一种长期的十字军运动。在传教士们到野蛮人中间传教之后，小规模教会成长起来，以攻为守地支持这些新生的教会正是这种十字军行动的正当性所在。此外，尽管不局限于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但这里的行动主要由他们主导。到1230年为止，主要的突破是在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基督教的控制在这两地已经打下基础。虽然此后利沃尼亚的十字军运动还在持续，而且在这个世纪中期由瑞典人扩展到了芬兰，但主要地区已经集中到了这些地域以西的普鲁士。掌控这次运动进程的又是一位负责传教的主教。克里斯丁是波兰莱科诺（Lekno）修道院的一名西多会僧侣，他早年作为一名福音传道者非常成功，这让他获得了波兰贵族马索维亚（Masovia，即玛索夫舍 [Mazowsze]）的康拉德大公和波洛克主教戈斯拉夫（Goslav of Plock）的支持，还得到了英诺森三世的支持，并于1215年被擢升为普鲁士主教。但随着他的日益成功，当地人对他的敌意也在增加。在建立了几次功绩，其中包括创建了一个新的德意志骑士团——多布任骑士团之后，他开始遭遇失败。于是马索维亚的康拉德出面干预，1225年他在这个地区给条顿骑士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立足之地。而此后，普鲁士的发展和统治将一直与这个骑士团紧密相连。

条顿骑士团隶属于耶路撒冷的德意志人的圣马利亚医院，源自1189至1190年围攻阿卡时创建的一所德意志战地医院。1198年，它重组为一个德意志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一样，条顿的骑士们具有战斗和照顾病人的双重功能，但他们的团规却基本依据的是圣殿骑士团。到1291年为止，他们的总部都在巴勒斯坦，主要的关注点也是守卫东方。他们在阿卡附近有

一大块地产，以蒙福特城堡为中心；这座建筑物我们此前也已经提到过。另外，他们在西顿以及西里西亚亚美尼亚领地内也有重要的据点。不过，与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一样，他们也获赠了欧洲的一些地产，于是也与那里的各项活动有了关联。1211年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在其东部边界给了他们一块条形地带，期望他们帮他对抗钦察（Kipchak）突厥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让自己在当地很不受欢迎。他们坚持不受当地主教权威的管辖，而让自己的领土直接隶属于教皇。他们似乎利用多种方式增加了领土面积。他们引入了德意志的垦殖者。但国王安德鲁不想在本国的边界内出现一块自治的德意志宗教领地，遂取消了他们的特权；当他们进行抵抗时，就用武力驱逐了他们。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马索维亚的康拉德向他们发出了邀请，而此时的条顿骑士团团长是萨尔扎的赫尔曼（Hermann of Salza），他非常有能力，而且是皇帝腓特烈身边一位亲近的幕僚。他希望能送自己的骑士们去往东方之前，能有一块练兵场。克里斯蒂昂森博士写道：“在普鲁士的冒险是为将来的耶路撒冷十字军行动做准备，就像捕捉幼狐是为猎捕成年狐做演练一样。”而且赫尔曼决心一定要创建自己的骑士团曾在匈牙利想要创建的那种教权国家。第一步是赢得皇帝的授权。通过1226年在里米尼颁布的金玺诏书（Golden Bull of Rimini），赫尔曼获得了统辖库尔梅兰（Kulmerland，即赫尔姆诺 [Chelmno]）及所有未来在普鲁士征服领地的帝国王公地位。就这样，条顿骑士团就在众骑士团中第一个获得了此后会被视作半自治的地位。下一步是让这块新领地附属于教皇。1234年，格列高利九世将其纳为圣彼得的属地，由罗马教区直接保护，但作为一块教皇封地回赐给骑士团。与此同时，赫尔曼在1229年派出了第一支小分队前往维斯图拉河沿岸，征服之路就此开始。此举与主教克里斯蒂安的传教活动之间存在的冲突可能性在1233年得到先期解决，因为这一年克里斯蒂安被普鲁士人抓获。他被他们囚禁了六年，此后，尽管他极力抗议骑士团，认为他们更在意获得臣属而不是促进皈依，甚至还直接妨碍到皈依，但他已无力阻止普鲁士的教会归属

于骑士团。他于1245年去世，死时怨愤难消，感到绝望而幻灭。

在条顿骑士团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关注到的波罗的海十字军的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骑士团中几乎全部是德意志人，他们的定居政策脱胎于已经在德意志东进的殖民行动中能找到的政策。每个地区都由在俗骑士和市民垦殖，后者获得的关税标准是基于德意志马格德堡式的，这就为骑士团确立主权和与德意志人新城镇合作的基础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方式。而且，可能是由于骑士团的历任团长在欧洲待的时间相当长，能直接与教廷亲密沟通，因此，与在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同僚不同，该骑士团得以形成更加清晰的长期十字军的概念。从13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一股十字军浪潮开始涌入这个地区。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授予所有在普鲁士作战者完全的免罪权，无论他们是否响应了特定的教皇号召：

我们将授予德意志以下所有众人与前往耶路撒冷的众人相同的免罪权和特权，他们响应条顿骑士团的号召，虽然没有接受过公众传道，但佩戴上了十字架，想要前往帮助虔信者对抗普鲁士人的野蛮行径。

于是，和那些偶尔凭自己的权威在12世纪时授予免罪权的西班牙主教不同，条顿骑士团获得了教皇的授权，能不依据教皇的宣战令就授予免罪权，而就是这同一位教皇，也曾强调说免罪权只能由他本人亲自授予。北欧和中欧的教士们一直在得到指令，让他们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十字军运动布道。

198

条顿骑士团采取的政策是，利用普鲁士的强制劳动力修建城堡，在周边修建德意志市民的定居点，而其管辖的多明我会修士则努力促成周边一带的基督教化。该团似乎筹划过要沿维斯图拉河而下，从库尔梅兰一直挺进到维斯图拉潟湖（Zalew Wislany/Frisches Haff）<sup>①</sup>，然后沿湖岸东进去往利沃尼亚；在那里，从1237年开始，持剑骑士团已经归由其统治。在这之后，

① 前者为波兰语，后者为德语。——译注

对内陆的征服就开始了。他们在 1236 年抵达了维斯图拉潟湖。到 1239 年，湖岸已大部分由他们控制，骑士团遂开始向内陆渗透。但在 1242 年普鲁士人的第一次反叛中，骑士团丧失了之前征服的大部分领地，不得不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才重新夺回。1252 年，梅梅尔（Memel，即克莱佩达 [Klaipėda]）在利沃尼亚建立。1254 年，波西米亚国王奥塔卡二世（Ottakar II）、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和勃兰登堡的奥托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十字军征战。这两件事使得从利沃尼亚到普鲁士的陆桥得以建立。之后是利沃尼亚条顿骑士团在杜尔贝（Durbe）被立陶宛人击败，而 1260 年普鲁士人的第二次反叛应声而起。众多在普鲁士已经建立起来的驻防地和殖民地都遭到破坏，前往救援的第一拨十字军也全被消灭。教皇乌尔班四世，之前一直在筹划一场针对蒙古人的十字军行动，此时敦促所有已经宣誓接受十字架的人前往支援骑士团，无论服役多久都能得到完全的免罪权。一系列德意志十字军行动发生，尤其是在 1265 年、1266 年、1267 年和 1272 年。但这场叛乱直到 1283 年才被彻底镇压下去，此时残酷的战事已经让半个普鲁士变得荒无人烟。曾在第一次反叛后给所有皈依者以公民自由权的承诺如今已经被淡忘，大多数普鲁士人沦为农奴，在骑士团和德意志移民以及少数与他们合作者的庄园中劳作。到 13 世纪末时，德意志人对普鲁士的大规模殖民运动开始。

1236 年，持剑骑士团从利沃尼亚攻入立陶宛，但在血腥的对抗后被击退。而在那期间失去的德维纳河以南的领土直到 1255 年才重新夺得。不过，条顿骑士团和持剑骑士团的合并使得有人提议往东扩张，直指邻近的俄罗斯诸公国。1240 年占领普斯科夫（Pskov）<sup>①</sup> 标志着这类征服活动达到高潮，但最后被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终结。他重新夺回了普斯科夫，并于 1242 年 4 月 5 日在佩普西湖（Lake Peipus）<sup>②</sup> 战役中击败了条顿骑士团。骑士团的野心已经使之与将牵制其大部分精力的多股力量发生冲突：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但这时，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蒙古人。

① 位于今俄罗斯西部，距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国境线以东约 20 公里。——译注

② 位于今爱沙尼亚与俄罗斯交界处。——译注

## 第一批针对蒙古人的十字军行动

蒙古帝国发源于中国西北部一群突厥和突厥—蒙古部落的扩张活动。这些部落由名为铁木真的部落首领领导，他在1206年采用成吉思汗（意为四方的帝王）的称号，开始了其征服世界之旅。1211至1212年，他的手下攻占了在中国北方。1219至1220年，里海以东的区域被征服；之后，他们在俄罗斯南部各处发动劫掠袭击。1227年成吉思汗的去世并没有打断征服的节奏。在1231至1234年间，中国北方的金朝被灭，朝鲜被兼并，伊朗被占领。从1237至1239年，俄罗斯中部被征服。1240年是乌克兰。1241年，波兰和匈牙利遭到入侵，一支德意志军队在莱格尼察（Legnica）<sup>①</sup>被击败。不过，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在1242年的去世中断了对中欧的入侵，事实上这也拯救了中欧。面对如此令人恐慌的威胁，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在1241年发动了一场针对蒙古人的十字军运动。1243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再次确认要发动这场运动。1245年，抵抗蒙古人是里昂第一次大公会议的议题之一。1249年，威胁再次显得非常紧迫，英诺森四世于是允许要前往圣地的十字军战士转移誓言目的地，去参加抵抗蒙古人的战斗。到这时，他已授权条顿骑士团给予所有接受十字架对抗蒙古人的人以完全的免罪权，而他也明确指示由骑士团来捍卫基督教世界的东北部边界。

## 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

西班牙是十字军活动在欧洲的第二个传统活跃区域，不过，尽管对抗穆斯林的小型战役不断，那里却从来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十字军运动。阿尔摩哈德帝国此时已经衰落，而在1228年之后的20多年间伊比利亚半

---

<sup>①</sup> 位于今波兰西南部的城市。——译注

岛上的穆斯林一直没有得到来自非洲的援助，只能独自对抗基督徒。在两名伟大的领袖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和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三世的领导下，西班牙的基督徒取得了他们战史上最辉煌的几次胜利；不过，这段非凡的时期却从来没有从十字军运动的角度得到充分研究。十字军享有的特权被授予那些帮助西班牙骑士团的人们；骑士团的行动，尤其是在13世纪30年代占领巴达霍斯（Badajoz）地区和坎波德蒙蒂尔（Campo de Montiel）、谢拉德塞古拉（Sierra de Segura），都让人想起条顿骑士团的征服。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领导了数次十字军行动。1229至1231年夺取了马约卡，1232至1253年夺取了巴伦西亚王国，直达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在1179年划定的一条分界线。到1250年，葡萄牙的再征服运动已经完成。1230年，巴达霍斯被夺取。1231年，斐迪南三世领导了一次十字军行动，其间他的兄弟阿方索在赫雷斯（Jerez）战胜了穆斯林的最高统治者伊本·胡德（Ibn Hud）。斐迪南征服穆斯林古代的首都科尔多瓦，其道路如今已经打通。1236年6月29日，该城被攻陷。1248年11月23日，西欧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塞维利亚被征服。凭借这些成就，斐迪南很轻易地就可以成为他那个时代对抗穆斯林最成功的基督教战士。英格兰的公众舆论认为，他“独自一人作为基督的教会赢得的利益和荣耀，胜过教皇及其所有的十字军战士……以及所有的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此外，他的事业也表明，再征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民族国家的事业。针对塞维利亚的十字军行动在1246年获得教皇授权之时，恰值路易九世前往东方的十字军正在积极准备的阶段。当时，从海外来的十字军战士非常少，教皇们也认可伊比利亚十字军运动是王室的责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斐迪南能够利用西班牙的教会来为他的战斗服务，尤其是通过征收所谓的“王室三分之一”（*tercias reales*）税，使得原本应用于维修教会建筑物的什一税的三分之一越来越多地被他使用或占有。有人指出，再征服运动付出了代价，即造成了西班牙教会的贫困。这部分是因为教会必须承担相关费用；部分是因为人口向南流动到了被征服的土地上，断了它的财源。这就使得教会非

常依赖于像斐迪南三世这样的国王，但他却通过损害教会的利益来补偿自己；同时这也使得西班牙教会变得日益孤立，不愿意资助其他地方的十字军事业。

随后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从1252年直到1340年，再征服运动的节奏减缓，因为摩洛哥的新主人马林王朝（The Marinid dynasty）<sup>①</sup>不断输送军队进入仍然留在摩尔人手中的安达卢西亚。起初，基督徒的野心很大，在1252至1254年间他们甚至传扬说要发动一场直指非洲的十字军运动。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试图为此招募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后来又尝试招募挪威国王哈孔（Hakon of Norway）。1260年，反叛了马林王朝的城市萨莱（Salé），在基督徒手中保留了两个星期的时间。1264年，阿方索十世被迫应对一场穆斯林的大规模反叛。作为回应，他以其实已经过期的教皇授权为依据，宣扬发动了一次十字军行动，并在占领起义的发源地穆尔西亚之后驱逐了所有穆斯林。然而，他没能攻下格拉纳达，这部分是因为卡斯蒂利亚没有实力独立攻克它，部分是因为马林王朝的苏丹雅库布（Ya'qub，即阿布·优素福 [Abu Yusuf]）来到了西班牙，使得基督徒处于守势。

## 针对异端的十字军运动

波罗的海和伊比利亚的十字军运动分走了东方的行动的人员和资源，因为当地的教会都只为本地的事业服务，而一般来讲教廷都允许他们这么做。德意志发展出了长期的十字军运动，这是甚至连保卫圣地的使命都没能引发的；而这意味着人们的精力将长期被分散转移。在西班牙，国王们拥有的权力意味着，只要他们想，他们就能够在不让资源向东方输送。此外还存在一些没那么重要的地方性十字军运动。1232年，教皇授权了一场针

<sup>①</sup> 13至16世纪北非柏柏尔人（即北非除埃及人外的穆斯林）建立的王朝（1213—1554）。——译注

201 对斯特丁格农民的小型十字军运动，不来梅大主教指控这些人是异端。明登、吕贝克和拉策堡的主教受命在帕德博恩、希尔德海姆（Hildesheim）、费尔登（Verden）、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明登和不来梅众教区宣扬十字军。这次运动有来自低地国家以及德意志的十字军战士参加，开始于1234年初。属于相同类型的十字军运动还有1227年和1234年分别由教皇洪诺留三世和格列高利九世授权的针对波斯尼亚异端的战斗，其间也出现了十字军战士转移誓言战斗地点的情况。1238年针对保加利亚的约翰·艾森（John Asen）和拜占庭尼西亚的联盟的也属此类，这场运动的传道招募工作是在匈牙利进行的。这些十字军运动似乎并没有为教廷招来许多批评的声音，也没有带来许多问题，可能因为这些毕竟都是地方性的活动。

### 政治性的十字军运动

在意大利进行的十字军运动则属于非常不同的另一种类型。在某种程度上看，其开幕战役是1228至1230年由布里埃纳的约翰领导的教廷军队在西西里王国的内陆领土上进行的战斗。这是一场趁皇帝腓特烈二世在巴勒斯坦时发动的对其领土的进攻，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赋予其正当理由，称这是针对一个敢于压迫西西里教士且胆敢入侵教皇国的人的战斗。战士们得到了一般的“免罪”许诺，在经济上则依靠向教士征收的一项收入税来支持：瑞典、丹麦、英格兰和意大利北部的教会均在1229年缴纳了十分之一的税收；而法国的主教则被要求，将他们在1225年向所属教区征收的为期五年的十分之一税收中最后支付的那一部分送往罗马，以此来支持阿尔比十字军。但这些人没有得到完全的十字军免罪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战士们佩戴的标志是彼得的钥匙，而不是十字架。这场运动看起来更像是叙任权之争的13世纪版，而不是十字军。



然而，到了1239至1240年间，危机加剧，使得人们开始宣扬一场清晰可辨的十字军运动。教皇和皇帝再次陷入冲突。腓特烈控制着意大利南部，在意大利北部也差不多掌握了控制权。针对他的十字军于1239年开始组织动员，教皇授权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为此传道招募。到1240年初，腓特烈的军队已经威胁到罗马城本身。格列高利九世在罗马为十字军传道招募。而到了1241年2月，他的做法更是激进到了允许自己的使节改变本来要去往东方的十字军战士的誓言，鼓励他们前来与皇帝作战。尽管一开始没有直接与十字军相关，但他向教会上下寻求援助。虽然面对众多阻力，如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但相关经费还是筹措了起来。可是，这支十字军的成就只不过是遏制了腓特烈进军罗马，而它却启动了一系列事件的进程，这后来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主导了意大利的政治态势。

1244年，英诺森四世重启了针对腓特烈的十字军。从1246年（这一年，里昂第一次大公会议废黜了皇帝）开始，教皇发出一系列谕令，特别针对多王相争的德意志<sup>①</sup>，敦促大家进行十字军布道招募。1248年10月为其中一位僭称的国王——荷兰的威廉夺下帝国旧都亚琛的那支军队中，就有众多十字军战士在服役，但德意志对此项事业缺乏热情，根本谈不上持续专注地做出贡献。英诺森从教会募得大量资金，尤其是从跨阿尔卑斯山众国的意大利人以及英格兰、波兰、匈牙利和德意志的各个教区那里，虽然后者的大部分支持似乎都给了在德意志进行的战斗。另一方面，教皇的事业在意大利受到的支持相对薄弱，缺钱可能是导致1249年入侵西西里的战斗失败的部分原因。

202

腓特烈于1250年12月13日去世。德意志的十字军在次年2月重启，针对的是他的继承人康拉德四世，相关传道招募在1253年和1254年再次受命展开。但是，随着那位伟大皇帝驾崩，教廷的目光又重新转回到西西里王国，因为它毕竟是教廷的一块封地。但进攻这里需要有一支规模庞大、组织

---

① 1254年康拉德四世去世后，德意志陷入混乱的大空位期，荷兰伯爵威廉二世、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三世和英格兰康沃尔伯爵理查都曾有一部分封臣推举为国王，但整个德意志无统一君主。——译注

良好且经济上充裕的军队，这也是意大利的十字军运动开始以与东征行动相同的模式运作的原因之一。这支队伍需要有一位有分量、有威望的领导人，而教廷在13世纪50年代的政策就是致力于寻找到这么一个人。他们接触了康沃尔的理查、路易四世的兄弟安茹的查理、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他在1250年3月代表自己的小儿子兰开斯特的埃德蒙宣誓接受十字架）。在与亨利的商谈破裂之后（教廷要求亨利必须同意一条根本不大可能达成的条件，即承担教廷所有战争的费用，还必须接受他们在英格兰设立富丽堂皇的管理机构），教皇转向了安茹的查理。在1262至1264年间，条件敲定，西西里的王冠将归属于查理。

腓特烈的私生子曼弗雷德是斯陶芬王朝在意大利南部产业的持有者，第一场针对他的十字军行动于1255年初在意大利和英格兰开始传道招募工作。由佛罗伦萨红衣主教奥克塔维安·德利·乌巴尔蒂尼（Octavian degli Ubaldini）率领的一支军队进军后遭到惨败，之后曼弗雷德占据了主导权，并于1258年8月加冕为西西里国王。在十字军战事蔓延到意大利北部之时，布道招募的工作也仍在继续。在1255至1260年间，向特莱维索（Treviso）进军的一支十字军推翻了吉伯林党（Ghibeline）<sup>①</sup>的独裁者罗马诺的艾泽利诺和阿尔贝里克，还到达了撒丁岛。与此同时，教皇乌尔班四世批准了安茹的查理的请求，即在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北部及中部为一场征服西西里王国的十字军运动进行布道招募。这支十字军于1265年10月从里昂出发，在行军途中有意大利的若干兵团加入，全军在1266年1月中旬到达罗马，就在查理于圣彼得大教堂加冕为西西里国王几天后。在极度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查理立刻开启了战事，并于2月26日在贝内文托战役中击败并杀死了曼弗雷德。整个西西里王国很快就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不过，此次行动在1268年4月不得不再次延续，因为康拉德四世的小儿子康拉丁登陆意大利，前来夺回自己的继承权。8月，康拉丁在塔利亚科佐战役（Battle of

① 12至15世纪意大利的政治派别，又名皇帝派，同归尔甫党（Guelph，又名教皇派）相对立，成员多为大封建主。——译注

Tagliacozzo) 中被击败; 10 月, 他在那不勒斯被处决。1269 年 8 月, 斯陶芬王朝在卢塞拉(来自西西里岛的穆斯林的一块殖民地, 后由腓特烈二世创建据点) 的最后一个据点投降, 这结束了这场战事的第一阶段。

安茹的查理在地中海政治世界中的上升犹如彗星般迅疾。早在 1267 年, 亚该亚大公和伯罗奔尼撒(摩里亚) 的拉丁统治者维尔阿杜安的威廉(William of Villehardouin) 就已经承认他为宗主; 而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则授权他享有对希腊诸岛屿及伊庇鲁斯(Epirus)<sup>①</sup> 的拉丁人领土的宗主权。次年, 威廉率领伯罗奔尼撒的 1 100 名骑士到塔利亚科佐增援查理的军队。1278 年威廉去世时, 查理直接接管了亚该亚的管理权。1277 年, 在经历了漫长的谈判后, 在教廷的默许和支持下, 一个有权继承耶路撒冷王冠的人把王位卖给了查理, 那一年 9 月查理派出总督前往阿卡驻扎。显然, 教廷如今对巴勒斯坦的拉丁定居点存续的希望有赖于这样一个事实: 该地如今并入了一个庞大的东地中海王国, 在查理的近亲法国国王的支持下, 这个王国能够拥有长期防御能力, 而这从本质上是具有偶发性和暂时性的十字军运动所不能带来的。但是, 在 1282 年 3 月 30 日, 西西里岛起而反对安茹法国的统治, 这场反叛就是众所周知的西西里晚祷战争。岛民们请来了阿拉贡国王彼得, 他娶了曼弗雷德的女儿康斯坦丝, 而且拥有西地中海地区最好的海军。

彼得于 8 月 30 日在特拉帕尼(Trapani)<sup>②</sup> 登陆, 这激起了教皇马丁四世的愤怒。这位教皇是法国人, 在担任教皇使节时曾在 1264 年主持完成了教廷与查理的谈判, 在登上教皇之位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查理的政治运作的协助。不过, 撇开这些不谈, 无论是哪位教皇, 既然声称对西西里享有封建宗主权, 就必定会将阿拉贡人的行为视为对自身权威的挑战。马丁必然也察觉到了此举威胁到了教廷精心筹划的在黎凡特保存基督教势力的计划。1283 年 1 月 13 日, 一场针对西西里人的十字军运动发起, 但相关布道招募工作起初仅局限在西西里王国内部, 直到 1284 年 4 月才扩展到意大利北部。

① 位于欧洲东南部, 现为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分有。——译注

② 位于西西里岛西北部的港口城市。——译注

1282年11月，阿拉贡的彼得遭受绝罚。1283年3月，他被剥夺了对自己王国的统治权，其王国被宣布为另一块教皇领地。教皇派出一名使节前往法国组织一场针对彼得的十字军运动，而菲利普三世的二儿子瓦卢瓦的查理得到许诺可获得阿拉贡，条件与当年他的叔公安茹的查理得到西西里非常类似。教廷向法国教士及与法国相邻的多个教省征收了为期四年的什一税，以在经济上支持这次运动。1284年的前几个月，在法国的传道招募工作开始；2月，国王菲利普为自己的儿子接过了阿拉贡的王冠。

在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十字军运动一败涂地。1283年春，阿拉贡人主动将战事推进到意大利本岛，并充分展示了自己在海上的优势：1284年6月在那不勒斯进行的一场海战中，他们俘获了安茹的查理的继承人萨勒诺的查理。安茹的查理于1285年1月去世，紧随其后，马丁四世也于3月28日过世，削弱了支持这次运动的力量。萨勒诺的查理直到1288年10月才获得自由，可自主行事，条件是他必须致力于实现阿拉贡、法国、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和平。与此同时，法国的菲利普三世在1285年春天带领了一支至少有8000人的队伍入侵西班牙。赫罗纳（Gerona）<sup>①</sup>的阿拉贡人把这支十字军拖在当地长达一整个夏季。初秋，他们的舰队从西西里海域被召回，很快就摧毁了法国人的海军，让这支十字军没了给养。菲利普被迫撤退，10月5日，在撤退途中，他在佩皮尼昂（Perpignan）<sup>②</sup>去世。

攻入意大利本岛的阿拉贡人在萨勒诺以南的一条防线处被挡住，无法再推进。此时，似乎人人都想要和平，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于1291年沦陷之后，因为这使得再分散资源到其他地方这样的行为显得自私而愚蠢。教廷内部出现分裂，但1294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当选标志着主战派获胜。1295年夏天，卜尼法斯八世说服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二世从西西里撤兵，但国王的弟弟腓特烈作为该岛的总督却公然反叛，并于1296年3月在帕勒莫加冕为国王。因此，针对西西里人的十字军行动在1296年、1299年

① 位于今西班牙东北部的城市，地处加泰罗尼亚地区东北部。——译注

② 位于今法国南部的地中海西岸城市，地处法西边界。——译注

和1302年多次重启。而在1297至1298年，针对科隆纳（Colonna）家族<sup>①</sup>的红衣主教们（罗马一个反对卜尼法斯的派系，是腓特烈的盟友）也发动了一场十字军行动。在詹姆斯二世的帮助下，安茹人在1297至1298年扫荡了卡拉布里亚，1299年又在奥兰多角<sup>②</sup>战役中赢得了一次海战胜利。但西西里岛防御太强，无法重新攻克，1302年8月的《卡塔贝罗塔条约》（*Treaty of Caltabellotta*）承认了腓特烈对西西里的统治。尽管根据条约他只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控制这座岛屿，但该岛其实注定会继续留在阿拉贡人的手中。

这些“政治十字军”由教皇们以传统的方式赋予了正当性，教皇们也表现出其实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针对自己这些行动的种种批评，即认为他们在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滥用十字军运动，尤其是在东方的基督徒正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之时。教皇们强调了捍卫教会和信仰的必要性。他们将自己在意大利的敌人与穆斯林相提并论，提出这些敌人阻碍了前往东方的有效的十字军运动。他们还大费周章地建立了一套有效机制，以便让自己的谕令传遍各地。事实上，他们发出的呼吁收到了热烈的反响。1264至1268年在法国的传道招募工作尤其成功。1265至1266年以及1268年的队伍中，不仅包括了初次接受十字架参加十字军的人，还包括一些已经有相关经验的从东方回来的十字军战士，比如瓦莱里的埃哈尔（Érard of Valéry），他制订了塔利亚科佐战役的作战计划，还有彼得·比拉尔（Peter Pillart），他曾写信给菲利普三世，夸口称“我曾在您和您的先祖们去往达米埃塔的那年去往西西里，以及围攻……突尼斯的那年为你们服役”。

205

在意大利本土，最热烈的回应来自一向支持教皇的归尔甫党控制的地区，这也是我们能想见的。豪斯利教授（Professor Housley）主张，因为応募者够多，所以一般认为这类十字军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吸引力的想法

① 意大利贵族，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有很大的势力，该家族中出了许多教会及政界显要，其成员奥多内·科隆纳（Oddone Colonna, 1369—1431）系教皇马丁五世（1417—1431年在位）——译注

② 位于西西里岛西北部。——译注

是成疑的。在这一点上他当然非常正确。军中的士气是典型的十字军式的，教皇把很大一部分本来可用于东方战场的资源（尤其是来自教会税收的）转给了他们。从英格兰、法国、低地国家、普罗旺斯和帝国教省来的金钱资助了安茹的查理在 13 世纪 60 年代的行动。在 1283 至 1302 年间，从不列颠群岛到希腊的基督教世界，经常被征税以支持恢复安茹家族在西西里的统治。沉重的税负强化了教廷对这场运动的控制力度，并引发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创举，比如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在 1274 年把基督教世界划分重组为多个税区；教皇们越来越依赖信用机构和银行；而在 14 世纪，建立起旨在降低这种依赖程度的新税收体制。但可以理解的是，这种征税并不受欢迎，且一直受到抵制，尤其是在 13 世纪 50 年代的英格兰和 13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此外，毫无疑问的是，这对教廷与整个教会的关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政治十字军”的发展引发了热议。这算不算是对十字军运动的歪曲，目的只是要在意大利推广教皇的政策？这是不是激起了虔信者的重重敌意，让教皇的形象在其臣民眼中受损？头一个问题尤其充满争议，因为有一群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无论教皇们和教会法学家们会怎么说（而且这群历史学家也承认教廷对十字军运动具有全面的看法），虔诚的普通民众并没有把在欧洲开展的十字军运动与前往东方的十字军相提并论。因此，这群历史学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与他们对第二个的回答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假定公众舆论是不欢迎这种偏离正道的行动的。

毋庸置疑，前往东方的十字军最具威望，也最具号召力。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欧洲的十字军运动确实遭到了敌视。朗格多克人因此写了很多难听的话，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但法国北部和英格兰的人们对阿尔比十字军也多有抨击。在德意志、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和圣地，对于针对像腓特烈二世及其后裔这样的天主教基督徒而进行的十字军行动，批评之声四起。最强烈的批评意见是，这分散了原本给予拉丁东方的资源和人力。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定居者对此抱怨重重，这集中体现在一封谴责信中。这封书信显然是在 1289 年的黎波里陷落之后，由一名圣殿骑士

信使带给教皇尼古拉四世的：

您本来可以让国王们和其他虔诚的基督信徒的力量来帮助圣地，但您却让国王们武装起来去对抗另一名国王，打算攻击一名基督徒国王以及信仰基督教的西西里人，想要收复因受到刺痛才拿起正义的武器进行反抗的西西里岛。

正当路易九世的十字军被击溃而路易本人还留在巴勒斯坦的时候，英诺森四世却非常不智地下令为自己针对康拉德四世的十字军行动进行布道招募，结果法国官方和民众联合起来激烈地加以抵制。

法国对此的情绪之大也反映在牧羊人的十字军行动中。这是在听闻路易被击败且在埃及被囚的消息后人们做出的一种激烈回应。这场行动的领导人是一名自称为“匈牙利大师”（*Master of Hungary*）的煽动者。他宣称自己握有一封圣母马利亚写给他的信件。他散播的消息是，法国贵族和教士的傲慢已经在埃及受到了惩罚；而正如是牧羊人首先得知基督诞生的消息一样，正是他们——简单而谦卑的人们，将得到圣地。他麾下由穷人组成的队伍抵达巴黎，得到布朗歇王太后的妥善接待。此后，他们分散为几个不同的团体，变得更加具有激进暴力色彩，最终被布朗歇王太后宣布为非法组织，导师被杀，组织完全瓦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资源转移到德意志或意大利，法国人不太可能对此怀有善意。布朗歇采取了措施阻止针对康拉德的十字军在法国布道招募，还威胁说要没收所有为此接受十字架的人的财产。

历史学家们收集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回应，像罗芒的安贝尔等经验丰富的布道者也很认真地对待这一切。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广大民众对十字军东征和在欧洲的十字军运动做了明显区分。我们不应忘记，去往东方的十字军也招致了一定程度的批评。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些回应就描绘出一幅画面，称大众对此都深感幻灭。有人指出，相关批评者或者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教廷的人，因此不管教廷做什么他们都会加以抨击；或者是因为特殊原因而对分散了本可发往

东方的资源之举表达不满的人。法国官方在 1251 年强烈反对针对斯陶芬家族的十字军，但这种反对并不是出于原则上的不接受，因为其在 1265 年又支持安茹的查理进攻西西里。路易起初并不喜欢对西西里的征战，但他唯一表示的反对（且此后还消解了）似乎就是关注否认斯陶芬家族对西西里享有权利是否合法。作为一个最讲道德的人，他不大可能从原则上反对“政治十字军”。确实有人表达幻灭的情绪，也确实有少数彻底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对基督教暴力的整个传统都感到震惊。但他们的数量到底有多少，这有待讨论，很可能事实上人数非常少。此外，西贝里博士（Dr Siberry）指出，13 世纪的批评之声，从来没有达到过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失败之后那种激烈的程度。

事实上，无论是发生在哪里的十字军运动，其最让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就是它具有持久的受欢迎程度。十字军运动涉及的战场很多，如果没有十字军战士的话，这些战斗根本没办法打响。总体而言，教皇对各项具体行动的主张，无论是在欧洲的还是在东方的，都得到了足够的回应，因此都有足够的应募者。因此，我们无法表明，或者很难相信，教皇的权威会因为意大利的十字军运动就消失。教皇们是真的把意大利对他们地位造成的威胁看得很严重，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布道招募战士为此战斗。他们也相信，拉丁东方的未来取决于西西里王国的融入，因此也就取决于发生在西西里晚祷战争之后的十字军行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分散资源的行动确实让圣地蒙受了损失。假如教皇能让更多的资源为东方所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拉丁定居点或许就能存活得更久一些；但这无法假设。事实是，当时因为亚洲贸易航线发生改变，耶路撒冷拉丁王国从商业中获取的利润持续下降（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而定居者们又被剥夺了本可以获得的来自欧洲的金钱和物资支持。

## 圣路易的第二次东征

然而，如果认为在 1254 至 1291 年这段时期，拉丁定居点完全得不到



来自欧洲的资源，这也是不对的。法国王室在地中海的这一端花费了大量钱财。在路易九世统治期间，资源首先集中供给待在那里的法国雇佣军，这支队伍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不断有小规模的十字军队伍加入其间，直到大概在1270年初队伍撤出东方，被整合进了进军突尼斯的法国十字军。很难确定路易自己到底打算为此花费多少代价。根据留存下来的国王在1250至1253年间的账务记录，大笔资金被用作十字军战士的津贴和雇佣兵的工资。但通常的做法是，如果骑士们是以较为长期的方式驻扎下来，则支付的金额就会比较少。即使如此，我们如果认为路易准备倾囊相助，那离事实也差得不太远。尽管根据斯特雷耶教授（Professor Strayer）的说法，法国国库认为，在1254至1270年间，驻扎在阿卡的军团仅花费国王平均每年4 000磅图尔币（也就是其年收入的1.6%），但其总管大臣塞尔吉纳的若弗雷（Geoffrey of Sergines）在1267年估计，路易每年需要高达1万磅图尔币的庞大数额来供养他的骑士，而大约在127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写信说由路易送往圣地的钱财中大约有6万磅图尔币因为官员们照管不周而丢失，这毫无疑问是腐败的托词。捐献资金为保卫圣地提供军事力量是一项可以回溯到12世纪的传统，但路易的赞助仍然非同寻常，因为他的数额并没有上限。

他于1260年听闻巴勒斯坦几乎陷入一片恐慌的消息时的反应，体现了他的全心付出。蒙古人之前已经给西方的每一个人都好好地来了个教训，此时则攻入了黎凡特。圣地立刻向西方求助。求助信发出的紧迫程度，可以用一位圣殿骑士信使的例子来说明：他在6月16日带着写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和伦敦圣殿骑士团长官的信件抵达伦敦。他的行进速度打破了所有的记录，从阿卡到伦敦只用了13周的时间，又只用了一天就从多弗尔来到伦敦。一封来自驻扎在阿卡的教皇使节的信件被送到了所有欧洲统治者手中，此外还有来自东方其他重要人物的消息，比如保存下来的圣殿骑士团大团长的那封信件。这些信件称，许多穆斯林纷纷涌到沿海的基督教领地寻求避难。他们描述了蒙古军队的规模和力量，当地穆斯林统治者的反应，西里西亚亚美尼

亚国王和安条克一的黎波里大公求和的速度，以及拉丁定居点所陷的窘境。

法国官方的反应力度很大，宣布在法国全境为十字军庄严地布道招募。国王和贵族同意对自己的收入征收长达七年的六十分之一税，而法国教会将自我征收二十分之一税。国王路易在四名贵族和四名高级教士的协助下，将亲自统管征税事宜。所有年满15岁且租金收入值每年100镑图尔币的年轻人，以及所有年满20岁且租金收入值50镑图尔币的年轻人都将强制成为骑士。比武大会在两年内不得召开。为了保存马匹，所有人，无论是不是贵族，都得到允许可购买或拥有一匹价值超过100镑图尔币的战马或价值超过30镑图尔币的小马。任何教士，即使是高级教士，拥有的财产也不得超过15镑图尔币。据称，教皇在罗马召集了一次会议商量将采取什么举措。9月3日，马穆鲁克人（Mamluks）<sup>①</sup>在艾因扎鲁特战役中打断了蒙古人的进程，危机随之终结。于是，在1261年4月10日由国王路易召集的一次集会上，上述建议最终仅通过了一个缩水版：禁止举办比武大会以及实施为期两年的禁奢令。至于教廷要召开的会议，还没等召开，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er IV）就已经过世。

当然，关注拉丁定居点的不是只有法国国王一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同样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教廷组织了一系列小型的征战，送去了大量现金，而经由其代表耶路撒冷牧首付钱雇用了雇佣兵来补充法国军团的兵力；而且它还在继续筹划发起十字军东征。在1261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希腊人之手后，教皇乌尔班四世似乎曾想过要发起一次十字军东征让它重归拉丁人之手，但很快计划有变。1263年，这位教皇再次写信谈到要援助圣地，但直到1266年，安茹的查理攻入意大利南部的行动都居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与此同时，从埃及出发的马穆鲁克军队已经开始系统地重新征服巴勒斯坦。听到他们进军的消息后，法国的路易九世主动采取了行动，正如他在1244年

---

① 中世纪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的奴隶兵，主要效命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11世纪在萨拉丁的指挥下作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出现在了阿拉伯的政治舞台，并在埃及建立起自己的布尔吉王朝（1250—1517）。——译注

曾做的那样。1266年末，他告诉教皇克莱芒四世（Clement IV），自己有意再次东征。1267年3月24日，他在一次手下贵族的集会上接受十字架宣誓东征。这一次法国内部的反应显然没有那么热烈，不过茹安维尔的约翰对自己及其他人强烈反对此举的描述，可能导致人们夸大路易的行为不受欢迎的程度，因为最终出发的十字军的规模或许并不比1248年的小很多。如果不能说更加细致谨慎，至少路易以同样的程度筹划了这第二次东征。法国教会承诺给他为期三年的十分之一税，法国边境的教省承诺为期三年的二十分之一税；一旦为西西里所征的税缴完，这些税就会开征。路易也再次向各市镇求援。他的兄弟普瓦图的阿尔方斯募集了超过10万镑图尔币，大多数来自他自己的领地。路易与热那亚和马赛达成了航运契约，指明船在1270年夏初之前要到艾格-莫尔特就位。出于对他近乎偶像的地位以及出色的组织能力的敬意，一些十字军运动的忠实拥护者如勃艮第的于格，以及许多积极援助保卫圣地的人物如瓦莱里的埃哈尔，都参与进来。欧洲其他地方也进行了相关的十字军招募，尤其是在阿拉贡和英格兰，因为两国的国王都想参加。而安茹的查理虽然多少有些不太情愿，还是同意和自己的兄弟一道行动。

阿拉贡人最先出发。1269年9月1日，国王詹姆斯一世从巴塞罗那起航，但他的舰队在途中却遭遇风暴受损严重，他和大多数十字军战士不得不返航。一支由他的私生子兄弟“婴儿”斐迪南·桑切斯（Ferdinand Sanchez）和彼得·费尔南德斯（Peter Fernandez）领导的分队，则于12月底抵达阿卡。然而，他们的力量不够强大，当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拜巴尔斯（Baybars）率领一支劫掠队伍兵临城下时，他们无力与之抗衡，没立下什么功绩就很快返回了西方。在英格兰，亨利三世与蒙福特的西蒙之间的内战结束之后，布道工作最终招募起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十字军；其中包括亨利的长子爱德华，他在说服了自己的父亲（他打算亲自去，以实践自己在1250年许下的诺言）和教皇（他答应亨利要让爱德华留在英格兰）之后，于1268年6月接受十字架参加十字军。爱德华很可能是受到了路易的

影响，两人在1267年末之前一直有接触；而在1269年8月，爱德华到巴黎参加了一次作战会议。他答应加入路易的远征军，条件是获得一笔7万镑图尔币的贷款。他也广泛利用了路易与受雇人之间签订的这样的类似服务契约，从而使得随同自己前往的手下们都能获得资助。劳埃德博士（Dr Lloyd）提出，爱德华的十字军是“一支具备扩展家户（extended household）所有的应有特质的队伍”，但这当然使得其出行成本不菲，因此王室采取了一切可以找到的方式来筹措现金，包括在1269至1270年向大众征收为期两年的二十分之一税。教会在1272年也贡献了为期两年的十分之一税。爱德华于1270年8月离开英格兰，但此时，这次十字军东征已经注定要失败。

路易于7月2日从法国起航，比他预计的要晚一个月。他的原定计划是驶往塞浦路斯，但就在前一年中有了新的计划，目的地是北非的突尼斯。过去认为，安茹的查理说服路易采取了这种新行程，因为只要有人对抗突尼斯哈夫斯王朝的统治者，查理就可以坐收渔利。但查理准备工作留下的细节资料说明，他对进攻突尼斯的计划并不十分清楚，该计划应该是由法国宫廷共同决定的。路易可能相信突尼斯是埃及的主要供应商，如果攻击突尼斯的话，可以间接削弱埃及。果真如此，那他就错了。当埃及的当权者听到他打算这么做时，反而大大松了一口气。理查德教授曾建议我们再仔细看看路易的忏悔神父比尤利的若弗雷给出的解释。若弗雷说，突尼斯的统治者公开宣称，如果他能得到基督教军队的支持，他就可能会受洗；而让他皈依的可能性吸引了路易。事实上，在1269年秋，突尼斯派了一名使者到巴黎。

舰队在撒丁岛南部的卡利亚里沿海集结。7月18日，十字军战士们在没有遇到真正抵抗的情况下登陆突尼斯，在建于古代迦太基城旧址上的一处要塞安营扎寨。他们安顿下来等待安茹的查理到来，但暑热让痢疾及伤寒肆虐营地。国王路易的长子菲利普病得很厉害，而他当年在达米埃塔得到的幼子特里斯坦夭折了。路易自己也生病了，8月25日他去世时，躺在满是灰烬

的床上忏悔而逝。就在死前的一个晚上，有人听到他叹息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就在那天，安茹的查理抵达，并很快决定，十字军应该撤退。10月1日，他认可了与突尼斯统治者草拟的一份条约，从中他个人受益最多：获得三分之一突尼斯人被迫偿付的战争赔偿金，重新获得进贡和西西里的贸易权利，并得到承诺，突尼斯将驱逐不断给他惹麻烦的斯陶芬家族的流亡者。11月11日，十字军出发前往西西里。他们随身携带着国王的骸骨，因为他在过世后尸身很快就被肢解保存。路易的心脏与剩余的军队一起留在了非洲。应查理的要求，他的内脏被保存在了西西里的蒙雷阿莱大教堂。他的骸骨，则由其子菲利普三世带回法国。菲利普带着一大帮子人，迂回曲折地穿越意大利到阿尔卑斯山，又穿越萨伏伊、多菲内、里昂、勃艮第和香槟回到巴黎。在圣母院举行了一场葬礼弥撒后，路易的骸骨被转移到了圣德尼修道院。据说，在返乡的途中发生了不少奇迹：在帕勒莫、帕尔马、雷焦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sup>①</sup>以及离巴黎并不远的马恩河畔的博纳伊（Bonneuil-sur-Marne）。而到了坟墓这里奇迹更是层出不穷，乃至病人不断前往朝圣。茹安维尔的约翰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讲述了一个关于他方的朝圣者——亚美尼亚人想要来探访圣路易的故事，当时他必定也知道法国本土有多少朝圣者来朝拜：

他们问我是否能让它们看看“圣王”。我来到国王跟前，当时他正坐在沙地中的一项帐篷里，靠着帐篷的支柱，身下没有垫毯子，也没有垫任何其他东西。我说：“陛下，外面有一群从大亚美尼亚来的人，他们要去耶路撒冷，他们问我，陛下，我是不是能让‘圣王’会见他们。但我不想亲吻您的骸骨！”<sup>②</sup>国王大声笑了，告诉我传他们进来。

英格兰的爱德华在十字军打算离开的前一天抵达北非。虽然在这里看到

① 位于今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译注

② 亲吻骸骨的意思就是国王死后封圣，被当作圣人供人朝拜。——译注

的一切让他很不愉快，但他还是与安茹的查理及法国的菲利普一道乘船前往西西里。途中在特拉帕尼经历了一场风暴，舰队受损严重。1271年4月底，他航行到圣地，仅有200至300名骑士和约600名步兵随行。5月9日他们在阿卡登陆。埃及人夺取条顿骑士团的蒙福特城堡时，英格兰人没有采取行动；但在7月12日，他们攻入加利利；11月，与当地军队以及爱德华的兄弟埃德蒙领导的另一支十字军（在9月抵达巴勒斯坦）一道，他们试图夺取马穆鲁克人位于凯撒里亚附近的卡坤城堡。他们把附近的一支大规模的土库曼人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当他们得知一支穆斯林军队正在逼近后，选择了撤退。随后，在1272年4月，耶路撒冷王国与埃及之间达成一份为期十年的停火协定，他们于是无法再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现在爱德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他的兄弟在5月离开阿卡。6月16日，他的一个当地侍从试图刺杀他。爱德华受了重伤，很长一段时间病得无法行动，但最终慢慢复原并于9月22日踏上返乡继承王位之途。

212

## 教皇格列高利十世

路易九世的第二次远征收获很少，这成为1291年拉丁定居点陷落前最后一次规模宏大的十字军东征，但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缺乏热情。特达尔多·维斯康蒂（*Tedaldo Visconti*）在1270年夏天来到阿卡，第二年被红衣主教们选为教皇。主教们对他表达了这样的期望，希望他能尽自己所能拯救圣地。特达尔多采用了格列高利十世的封号。在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就职之前，他用圣经诗篇136(137): 5-6<sup>①</sup>的经文进行了一次布道：

① 目前大部分圣经版本都使用了由13世纪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史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的篇章划分和16世纪法国印刷师罗贝尔·埃蒂安纳（*Robert Estienne*）的节数划分。本篇诗篇在大部分版本中都是第137篇，但在由哲罗姆主持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中为第136篇。本书献词页上引用的经文亦属此情况。——译注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在一封写给仍然身处阿卡的英格兰的爱德华的信中，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匆忙直接赶往设在维泰博的教廷，甚至都没有在罗马停留，就是为了能马上着手为增援圣地而忙碌。在加冕之前，他送了一封信给法国的菲利普，提议准备一次远征。事实上，他像英诺森三世那样非常执着于十字军运动。他在维泰博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召集红衣主教及熟悉东方的人们开一次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决定要召开一次新的大公会议，以达成改革基督教世界和推动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双重目标，而他将亲自领导这次东征。他试图细致地为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做准备，于是号召教士们写下书面的建议先提交上来。而在会议期间，即在1274年5月18日，他颁布了《为热情的信者》（*Pro zelo fidei*），这是自1215年的《所谓自由》之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十字军运动文献。其中包含了在此前的谕令中可以找到的元素，尤其是在《所谓自由》中。但其中也有不少新东西，尤其是在募资方面：一种为期六年的十分之一税将面向整个教会征收，仅有极少数地区才能在严格的条件下获得豁免权。基督教世界将划分为26个税区，均设收税官和次级收税官。每位世俗统治者都被要求在自己的领地内施行每年1个银便士图尔币的人头税，这显然受到了格列高利九世在1235年尝试征收的赋税的影响。格列高利十世的目标是建立庞大的储备库。如果他活得长一点，一项大规模的重要行动可能真的就能实现。正如上面描述的，他的准备工作气概十足。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在大公会议上达到巅峰：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正式和解，拜占庭皇帝承诺将尽全力帮助此后来到的这支十字军。1275年，法国国王和西西里国王宣誓接受十字架。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在格列高利十世同意加冕他为西方皇帝之后也宣誓了。而原定计划是教皇于1277年2月2日在罗马为鲁道夫加冕。在接下来的4月2日，教皇和皇帝将一道出发前往东方。他甚至还和希腊人讨论过他们的提议：十字军将沿第一次东征的路线行进，以沿途重

新征服小亚细亚。格列高利十世筹划的十字军东征的规模，比之前设想过的每一次都更加宏大，但就在1276年1月10日，他去世了。对当时绝望的人们而言，“似乎神意就是不恢复圣墓，因为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似乎完全白费”。

## 1276年后没能再发动大规模东征

为格列高利十世的十字军筹集的大笔资金，最后分配到了意大利的各项行动上。尽管大规模远征的提议仍然不时有人提出，如英格兰的爱德华在1284至1293年间一直就此询问教廷，但在耶路撒冷王国最后的岁月里，仅有小规模队伍起航前往相助。1273年，法国兵团返回阿卡。尽管在1277年它被安茹的查理所资助的一支力量取代，但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于1286年安茹家族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崩溃之后，仍然继续负责维持这支队伍。该队伍英勇地参加了黎波里和阿卡的守城战，而这也是拉丁定居点历史的谢幕战役。1287年6月18日，布卢瓦公爵夫人爱丽丝带着一小支十字军在阿卡登陆，军中还包括荷兰伯爵弗洛伦。随后在1288年，格雷利的约翰（John of Grailly）也带来一支队伍。1290年又来了其他几路人马：格兰德森的奥多（Odo of Grandson）率领的英格兰人和黎波里主教率领的北部意大利十字军。

1272年后没能再发动大规模东征的原因之一，是西欧民族国家间争端日益复杂和激烈，且成本高昂。另一个原因是，认为大规模东征并没有多大用处的看法开始流行。这样大规模的队伍很难招募、供给和控制，而且从长期看没什么益处，因为他们只能征服但不能长期占领领土；一旦十字军队伍返乡，防卫新征服土地的任务就会给本已过度分散的拉丁定居点的资源造成新的压力。真正需要的是增强常驻军力，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年间教皇们和法国方面不断送钱到巴勒斯坦，而英格兰虽然没拿出这么多，但也这么做



了。在防卫方面，教皇们一直寄希望于安茹的查理，希望将耶路撒冷王国整合进一个有能力防护它的地中海东部帝国，况且这个帝国还有法国在背后支持。可惜这场赌博失败了。考虑到查理的关注点是如此之多，他想征服阿尔巴尼亚甚至拜占庭帝国，这种希望是无论如何都会落空的。不过，这一事实直到 1286 年才明确显现出来。此时，针对西西里人和阿拉贡人的战事进展不顺，查理去世，他的继承人成了阿拉贡人的阶下囚。到这时，拉丁定居点只剩五年寿命了。

^

■

▲

■

■

■

■

■

■

■

## 第八章

### 拉丁东方（1192—约 1291）

在 13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定居者们或许应该比他们 1187 年的先辈们更加安全。他们所控制的土地已大大小于他们的曾祖们在 12 世纪中期统治的领地。在腓特烈二世与埃及的卡米尔苏丹于 1229 年签订条约后，他们保有从雅法到贝鲁特的沿海地带，并有一块舌形区域沿拉姆拉伸向耶路撒冷，以及一块稍微宽一些的到达了加利利的拿撒勒的凸出地块。在贝鲁特以北，的黎波里伯国的领土基本与在 1187 年时的一致；但安条克公国如今仅局限在安条克四周以及南边沿海的一小条，从杰卜莱到圣殿骑士团的马卡布城堡。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不再是孤悬在黎凡特的前哨站，因为有一连串西方的定居点占据了东地中海北岸的大部分地方。这些到底算不算是一场殖民运动的表现，这个问题尚无定论。我已经反驳了任何一种将早期十字军征服理解为原始殖民的解释，并且认为早期的拉丁国家也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殖民国家，因为它们政治上独立于母国。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占领并开发其周围及沿海上游的领土，想要保住圣墓是绝不可能的；而大规模的移民和资源大量流入定居点，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使其臣服于西欧，但经济上却充满依赖性，因而很难完全否认其中具有的殖民色彩。此外，无论其形成多么无序而偶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以西的所有定居点都是在 1191 年以后创建的，并且其领土并非夺自穆斯林，而是基督徒同伴。其中有些，比如克里特、尤卑亚（Euboea）和希俄斯（Chios），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依

赖于威尼斯和热那亚。

##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

216 在安条克公国以北，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统治者利奥二世在 1198 年接受了西方皇帝赐予的国王头衔，同时也接受了一种形式上的对罗马的臣服，虽然这从未有过我们之前已经加以描述过的实质内容。西里西亚在各个方面都拉丁化了。利奥二世第二次结婚时娶了塞浦路斯的艾默里与耶路撒冷的伊莎贝拉之女西碧拉，因此他们的女儿及继承人扎贝尔（Zabel）就是耶路撒冷女王和塞浦路斯国王的嫡亲堂兄妹。利奥将城堡和领地赋予了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并授予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一些特权。各种官署开始采用西方的职能和头衔，它们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亚美尼亚宫廷亦发生了改变。土地所有制度和“男爵们”与国王之间的关系也拟照封建制进行了改变。西方人拥有某些封地，西方法律的权威逐渐增长，最终，在 13 世纪 60 年代，《安条克法令》（*Assises of Antioch*）的一份译本被亚美尼亚人采用为自己的法律。在 13 世纪 50 年代，国王海顿（Hetoum）作为臣属与蒙古人结盟，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西里西亚与定居者们的关系，他们的联系还在日益紧密。国王托罗斯（1292—1294 年在位）娶了塞浦路斯的玛格丽特为妻，他的姐妹伊莎贝拉嫁给了塞浦路斯国王的弟弟阿马尔利克，而在 14 世纪时亚美尼亚的王位传到了塞浦路斯王室家族次子的支系，他们一直保有王位直到 1375 年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灭亡。

## 塞浦路斯

我们之前已经提到，黎凡特沿海的塞浦路斯如何在 1191 年被英格兰的

理查一世征服，又如何于 1192 年被卖给了被驱逐的耶路撒冷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居伊始终没能偿清他欠理查的债务，于 1194 年末去世。随后继位的是他的兄弟吕西尼昂的艾默里。在香槟的亨利死后，艾默里于 1197 年 10 月娶了耶路撒冷的伊莎贝拉。大约在同一时期，艾默里向西方皇帝的代表表示纳贡臣服，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个王位头衔；因此，从那时起，他自己本身是塞浦路斯国王，而通过婚姻又成为了耶路撒冷国王。他于 1205 年死后，这两个王位便分离了。塞浦路斯的王位传给了艾默里的第一任妻子伊贝林的艾斯奇瓦为他所生的儿子于格一世。耶路撒冷的王位由伊莎贝拉与蒙费拉的康拉德所生的女儿玛利亚继承。塞浦路斯的于格娶了他的继妹——伊莎贝拉的第三个女儿香槟的爱丽丝，于是两个王位在他们的孙子塞浦路斯的于格三世（也是耶路撒冷的于格一世）那里再次合一了。于格三世在 1267 年继承了塞浦路斯王位，在 1269 年继承了耶路撒冷王位。

吕西尼昂的居伊在塞浦路斯创建了一个封建体系，其人员主要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移民，尤其是曾支持他争夺耶路撒冷王位的几个家族的成员。后来许多来自大陆的显贵也加入进来，毕竟于格一世的母亲属于伊贝林家族，因此乃是巴勒斯坦最富威望的家族的成员。到 1230 年，许多大贵族在这两个王国都拥有地产。定居者们从大陆引进了封建习俗，而在 1369 年，一份根据具体情况对它们进行的阐释的伊贝林—雅法的约翰关于法理的伟大著作，成为了尼科西亚（Nicosia）<sup>①</sup> 最高法庭的官方审判依据。

不过，差异还是存在的。正如一位塞浦路斯贵族的代表（他本人是雅法名义上的伯爵）在 1271 年强调的，塞浦路斯是独立的区域；当时他主张塞浦路斯的骑士不受其封建契约的束缚，即不需为外界服务、不需为巴勒斯坦服务。塞浦路斯拥有一段与巴勒斯坦不同的、属于拜占庭的过去。它的形成史是独特的，因为直到 1247 年它都是西方帝国的一块封地，而耶路撒冷则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某些重要的方面来看，塞浦路斯的封建主义赖以

217

① 位于塞浦路斯岛中部，是当时也是今天该国的首都。——译注

为基的农业体系与大陆不同。在被拉丁人征服之前，这个岛屿已经受到“庄园化”进程的影响，此前，这一进程已影响了拜占庭，许多塞浦路斯村庄的庄园化程度都远胜于巴勒斯坦的村庄，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众多农民需要承担繁重的劳役。

此外，塞浦路斯的拉丁教会采取了一种更为干涉的立场来对待当地的希腊人口和教士。东正教教区的数量从 14 个大幅减少到 4 个，而这四位东正教主教也变得要与四位天主教主教共治，对教会负有的责任主要在希腊仪式方面。希腊人进行了反抗，拉丁人偶尔会残忍镇压，有一些时期敌意还是公开的，但大多数时候愤恨情绪只是隐而不发。1260 年由教皇亚历山大四世颁布的《塞浦路斯谕令》( *Bulla Cypria* )，标志着塞浦路斯的希腊高级教士同意接受自身作为联合东方教会的地位。但按科里亚斯博士 ( Dr Coureas ) 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表现得越来越空洞。”尽管由于贫穷且没有庇护者，他们无法抵制拉丁文化的影响，但低级教士和民众对西方人毫无效忠之感。这最突出地表现在 14 世纪时法马古斯塔 ( Famagusta )<sup>①</sup> 以哥特式风格建造的一座新的东正教天主大教堂上。另一方面，文化涵化 ( acculturation )<sup>②</sup> 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大陆的艺术中已经变得明显的文化折中现象也在塞浦路斯发展起来；而越来越多的通婚现象则意味着从 14 世纪早期开始，天主教被吸纳入东正教已经越来越变得可能。

## 希 腊

在塞浦路斯西北方隔着克里特岛和爱琴海的是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它被分立的希腊国家尼西亚和伊庇鲁斯以及瓦拉几亚—保加利亚帝国包围。威尼斯人与其他各路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签订的条约，后来又由两个

① 塞浦路斯东海岸的海港城市。——译注

② 指异质文化相互接触后原有各自的文化模式发生变化。——译注

附加条约加以调整。这两个条约分别签订于1204年10月和1205年10月。希腊土地被征服的方式，以及各个领导人私下间订立的协议，也影响到了协议的修订。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拥有色雷斯东部一块三角形区域，以及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和爱琴海中的一些岛屿。威尼斯拥有马尔马拉海欧洲一边的部分海岸，以及一条通往内陆埃迪尔内的走廊、伊奥尼亚群岛（凯法隆尼亚 [Cephalonia/Kefallinia] 伯国终于还是被迫承认了威尼斯的宗主权）、伯罗奔尼撒南部的迈索尼（Methóni）和科隆尼（Koróni）、希腊东部沿海的尤卑亚岛和克里特岛。而基克拉底群岛和多德卡尼群岛（Dodecanese Islands）北部以及其他一些岛屿，由马可·萨努多（Marco Sanudo）合并成了一个半岛公国，以纳克索斯为中心，并被拉丁帝国承认为其名下的一块封地。西部色雷斯、马其顿的一部分以及帖撒利（Thessaly），组成了帖撒罗尼亚王国，由蒙费拉的卜尼法斯统治；其宗主权还扩展到了忒拜和雅典。在这些政权的南面是伯罗奔尼撒，拉丁人自1204至1205年冬开始征服这里，尚普利特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litte）被承认为亚该亚大公，臣属于拉丁帝国。威廉是香槟伯爵于格一世的孙子。于格一世的医生显然告诉过他无法生育子嗣，因此，他便拒绝承认妻子勃艮第的伊丽莎白为他生下的儿子——也就是威廉的父亲。

218

这一系列西方上层阶级（不仅来自欧洲，也来自巴勒斯坦）的定居点都试图实现希腊的安全，方式则是早已被尝试过的封地授予制。而因此产生的封建体系，在伯罗奔尼撒的例子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这里的定居点持续时间最长，而且还产生了一部法律集成，名为《罗马尼亚法令》（*Assises of Romania*）。其最后一次誊定是在1333至1346年间以法文写就的，此后又译为威尼斯意大利语并流传下来。在亚该亚大公之下还有一批封臣，分为臣属封臣（*liege vassal*，有权再分封自己的封臣）和纯封臣（*simple vassal*，不属于骑士阶层，比如兵团士兵，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封臣）。臣属封臣包括了公国内享有特殊地位的领主们，他们被称为“大公的同辈”，他们拥有根据官方和民间正义法则在自己的宫廷做出判决的权力。而其他臣

属封臣只有权根据民间正义法则裁定，纯封臣则只对自己辖下的农民拥有裁断权。与拉丁耶路撒冷一样，这个殖民社会具有高度的阶级意识。但希腊的领主们与耶路撒冷的不同，并不都住在城市里，而是住在高于城市的卫城或孤立的城堡和设防的大庄园中。仅在伯罗奔尼撒，我们就已经确认了 150 处这样的要塞的遗址，大多数是在 13 世纪初建造的。这一点当然凸显了他们与希腊人（两者通婚极罕见）的区别，而强化此区分的则是他们的骑士文化，这是当时最为闪耀的文化要素，体现在他们钟爱的比武大会和喜爱阅读的历史作品及法语罗曼史作品中。有人赞誉称，设在安德拉维达（*Andravida*）<sup>①</sup> 的亚该亚宫廷中讲的法语和巴黎宫廷中讲的一样纯正。

219 大多数希腊人起初都沦落到了屈从的地位，被西方的宗主们视为不自由的民众。主要的例外是一群统领（*archontes*），即在征服发生之前这里的大地主或帝国官员。对这些人，拉丁人试图加以安抚，承诺保留东正教教士以及拜占庭的法律和财政体系；尽管拜占庭法律在公共领域已经停止使用，而司法及税收权转移给私人封建领主则意味着旧日公共税收体系的消失。统领们被归入纯封臣，与西方兵团士兵并列。但到 13 世纪中期时，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得到了封地，并开始被称为骑士，因此也就有资格成为臣属封臣。这就为那些本来不是统领的希腊人提供了偶尔也能晋升到最高封建阶层的机会。到 14 世纪时，希腊臣属封臣已经出现；而一些拉丁化的希腊人，比如《摩里亚纪年》（*Chronicle of Morea*）的译者，稍早于 1388 年写作时，抨击君士坦丁堡和伊庇鲁斯的希腊人，还指责东正教会的裂教倾向。

征服者针对希腊教会采取的措施进一步羞辱了希腊人。1204 年，根据与其他各路十字军签订的条约，威尼斯人任命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主持。威尼斯人选定托马斯·墨洛西尼（*Thomas Morosini*）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他出身自一个威尼斯贵族家庭，但此前仅为一名助理执事。教皇英诺森三世不得不确认这种不合教法的任命，托马斯一下子就越过了各个教士阶层直达

①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城镇。——译注



神父和主教之位；但他也开始了漫长的试图使圣索菲亚大教堂摆脱威尼斯控制的过程。希腊人自然觉得难以接受新任牧首，尤其是在1208年后，流亡在尼西亚的拜占庭皇帝聚集起一班神职人员重新选举了一名新的东正教牧首之后。大多数希腊主教要不就放弃了教区，要不就拒绝承认托马斯；而在少数几个例子中，虽然他们承认了牧首，但却拒绝按照天主教礼仪重新给自己授职，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之前的授职仪式是不符合教会法的。拉丁人采取的政策是用天主教主教代替东正教的，不过他们没有足够人力完全重新替代拜占庭复杂的带有副主教的都主教教阶，以及不带副主教的独立大主教教阶。与在黎凡特和塞浦路斯一样，他们还引入了西方的修道院和修会。但在各个地方，东正教的修道院和当地已婚的教士都仍然保留了下来，尽管希腊人为了获得完全的什一税，还要被迫抽出三十分之一交给天主教教士。

根据1204年的条约，威尼斯人获得了八分之一的帝国。他们选出自己的地方长官（*podestà*），辅以按照威尼斯模式设立的行政机构，尽管不久母邦就逐步发现自己能够行使的权力实在有限。1205年的条约设立了一个集体决议制，让威尼斯人和其他民众共同决定所面临的军事威胁是否需要全民服役。一个由地方长官和帝国的各位领主组成的委员会将负责做这类决定，而且可以要求皇帝听从其建议。它还将监管所有法官，在他和他要求为之服务者之间进行仲裁。每一位新任拉丁皇帝加冕时，都要发誓遵守1204年3月和10月以及1205年10月的条约。对威尼斯人来说，尽管他们所掌控的范围很大，本可以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毕竟还是由这三大条约构成了帝国的宪法，这让他们在其中拥有坚实的政治地位。

220

这些条约给拉丁皇帝们施加了严苛的限制，这是他们无法规避的，也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在13世纪的上半叶，他们是东方的拉丁统治者中最不安全也最无防护的。他们必须面对瓦拉几亚—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庭希腊人（他们创立了伊庇鲁斯、特拉比宗 [Trebizond] <sup>①</sup> 和尼西亚三个流亡国

① 其领土包括安纳托利亚的东北角和克里米亚南部。——译注

家，最后一个由皇帝亚历克塞三世的女婿西奥多·拉斯卡里斯 [Theodore I Lascaris] 统治) 的威胁。一次又一次，拉丁人不得不在至少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虽然早期在小亚细亚取得了一些胜利，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位拜占庭皇帝亚历克塞五世被抓 (他已经被自己的敌人弄瞎，最后又被迫从君士坦丁堡提奥多修斯讲坛的圆柱顶端跳下身亡)，但保加利亚的统治者依奥尼查 (Ioannitsa) 在 1205 年初侵入色雷斯，并在那里肆虐了近一年。他俘获了皇帝鲍德温一世，而且很可能杀了他。无论如何鲍德温一世死在狱中，他的兄弟兼摄政亨利在 1206 年 8 月 20 日加冕为皇帝。亨利相当坚韧不拔，领导力出众，但他面临的是非常不利的局面，不单在色雷斯，也包括在小亚细亚：1207 年初，拉丁人那里仅拥有立足之地。可是这年夏天，依奥尼查去世，保加利亚人就继位问题闹得四分五裂；在这种情况下，1208 年 8 月 1 日，亨利击败了他们。在进一步取得对保加利亚人的胜利以及 1211 年对尼西亚希腊人的胜利之后，《尼姆菲翁条约》(Treaty of Nymphaeum) <sup>①</sup> 让拉丁人获得了马尔马拉海全部亚洲沿海地带以及爱琴海的一段海岸。

亨利在 1216 年 6 月 11 日去世，年仅 40 岁。他的继任者是姐姐约兰德的丈夫库特奈的彼得。但彼得还没抵达君士坦丁堡，就被皇帝艾萨克二世的一个表兄弟伊庇鲁斯的西奥多·安格卢斯 (Theodore Angelus) 抓获。彼得儿子库特奈的罗贝尔于 1221 年 3 月 25 日登上皇位，但很快就不得不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伊庇鲁斯的西奥多·安格卢斯推进到了帖撒利。1222 年他夺取了塞莱 (Sérrai)，1224 年是帖撒罗尼迦，1225 年则是埃迪尔内，并威胁到君士坦丁堡本身。很能说明当时形势的是，埃迪尔内并不是他从拉丁人手中夺取的，而是从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尼西亚希腊人手中夺来的。与此同时，在约翰·杜卡斯·瓦塔策 (John Ducas Vatatzes) 继承了尼西亚王位后，拉丁帝国与尼西亚之间的战事也再次爆发。到 1226 年，拉丁定居者们已经失掉了除伊兹米特之外的全部小亚细亚领土，伊兹米特则坚持到了

221

① 尼姆菲翁为当时尼西亚皇帝的冬季居住地，现处土耳其西部的伊兹米尔省。——译注

1235年。或许当时拯救了拉丁君士坦丁堡的因素只有一个，即依奥尼查的外甥兼继承人保加利亚的约翰·艾森（John Asen）的坚持：他想把这个帝国纳入自己囊中，因此伊庇鲁斯的西奥多才允许罗贝尔暂时不受打扰地继续拥有其领土。

罗贝尔娶了一个出身低微的法国女人，他手下的骑士们以此为耻，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叛乱。他们肢解了那个女人，淹死了她的母亲。罗贝尔则逃往罗马。1228年，他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去世。他的继承者是他的弟弟鲍德温二世，当时年仅11岁。约翰·艾森提出保护君士坦丁堡安全的条件是他女儿与年幼的皇帝联姻，但帝国的爵士们拒绝了这个提议，而选择求助于经验丰富的麻烦清理者布里埃纳的约翰（John of Brienne）。布里埃纳的约翰大约出生于1170年，是布里埃纳伯爵的第三个儿子。他大半生一直相对来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香槟地区，直到1210年被选为耶路撒冷的年轻女继承人玛丽亚的丈夫。他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国王，尽管我们之前看到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他在埃及遭到了教皇使节的压制。他的妻子在1212年过世，他担任自己的女儿约兰德的摄政直至她于1225年嫁给皇帝腓特烈二世。腓特烈拒绝让他继续担任摄政，而且有流言说，皇帝还引诱了他的一个为约兰德担任贴身侍女的侄女。布里埃纳的约翰为此非常愤怒，于是当教皇趁皇帝身在巴勒斯坦，派军队进攻腓特烈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土时，他答应担任指挥官。不过，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拉丁帝国的领主们提议让皇帝娶他新续弦的妻子卡斯蒂利亚的贝伦加利亚（Berengaria of Castile）所生的女儿，条件是他同意在有生之年都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共治皇帝。布里埃纳的约翰带着500名骑士和5000名武装步兵（他们获得了教皇授予的十字军免罪权），在1231年夏天来到君士坦丁堡。此时，本来就糟糕的军事和政治形势还在持续恶化。1230年，伊庇鲁斯的西奥多被约翰·艾森击败并俘获。艾森乘势扫荡了色雷斯、帖撒利和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布里埃纳的约翰希望保加利亚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牧首区，于是开始与尼西亚人谈判。1235年，他与约翰·瓦塔策达成一项条约，其中规定约

翰·艾森的女儿将与约翰·瓦塔策的儿子订婚，而保加利亚将得到自己的牧首区。约翰·瓦塔策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洗劫了加利波利，随后与保加利亚人合兵一处。但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他们却被仅带着 160 名骑士的布里埃纳的约翰彻底击败。

222 布里埃纳的约翰在 1237 年 3 月 23 日过世，此后暂时挽救了定居者们的因素有二：一是我们前面已经描述过的 1239 年西方发动的十字军运动；一是已经在欧洲站稳脚跟的尼西亚希腊人，此时正忙着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桥头堡，而且对从东方越来越威胁到他们的蒙古人非常忌惮。鲍德温二世极度依赖法国的资助，到西欧进行了好几次旨在筹款的旅程。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君士坦丁堡留存的最后一批圣物也变了现。鲍德温卷入了非常复杂的金钱交易，甚至还抵押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菲利普，让他在债权人的监护下在威尼斯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多亏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相助，菲利普才在 1261 年上半年赎回自由，但此时拉丁君士坦丁堡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了。7 月 25 日，君士坦丁堡大部分守军出动与威尼斯人一道进攻黑海中的凯弗肯岛（Kefken）；来自尼西亚的一支拜占庭军队趁机渗透入城中，没遭遇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城市。鲍德温逃走，威尼斯舰队也只能救出威尼斯居民的妻子儿女。8 月 15 日，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八世帕雷奥洛古斯（Michael VIII Palaeologus）举行入城仪式，并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为巴西琉斯（Basileus）<sup>①</sup>。

法国和威尼斯定居者仍然据守着希腊南部和爱琴海中的岛屿。在 13 世纪中期，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亚该亚是东方所有拉丁定居点中最出类拔萃的。骑士们聚集在尚普利特的威廉、若弗雷一世、若弗雷二世和维尔阿杜安的威廉各位大公，以及拉罗什的奥松和拉罗什的居伊各位雅典领主的周围，不断参与骑士行动，其中包括与北方的拜占庭希腊人打一些小规模战争。拉丁统治的繁荣鼎盛时期是 13 世纪 50 年代早期，但维尔阿杜安的威廉与威尼斯

<sup>①</sup> 希腊语，意为“国王”或“皇帝”。——译注

和拉罗什的居伊之间爆发的一场争论逐渐使半岛产生了分裂。不久，这种争论也结束了，因为 1259 年夏，威廉在佩拉格尼亚（Pelagonia）<sup>①</sup> 战役中被米海尔八世击败；他被希腊人囚禁，并在 1261 年被迫签署了一项条约，不得不交出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sup>②</sup>、密斯特拉（Mistra/Mistrás）<sup>③</sup> 和玛尼等要塞。首肯这项条约的议会，主要就是由与威廉一同被囚的各位领主的妻子们组成的。教皇允许威廉否认自己被困期间许下的诺言，但接下来的两年战争消灭了不少定居者，剩下的人也筋疲力尽，整个公国一片颓败。感觉到自己处境已不安全，威廉在 1267 年 5 月 24 日把亚该亚让给了新任西西里国王安茹的查理，条件是自己在有生之年能继续保有它。根据两人达成的协议，威廉的女儿伊莎贝尔将嫁给查理的一个儿子，后者将成为威廉的继承人；但如果这个儿子死了，那无男性子嗣的亚该亚就直接转给查理或他的继承人。三天后，正如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的，皇帝鲍德温二世确认了这项转让，还把对半岛、科孚岛和拉丁人在伊庇鲁斯的领地的宗主权也加给了查理，条件是查理派出 2 000 名骑士帮助他收复帝国。

拉丁希腊就这样臣服于西西里王国。查理显然还想要走得更远，想要征服君士坦丁堡，但首先他的资源集中用在了公国的防卫上，而且还借此想要在阿尔巴尼亚谋求立足之地。1271 年，他被承认为阿尔巴尼亚的国王。1277 年 2 月，维尔阿杜安的威廉的女婿和预定的继承人安茹的菲利普过世，威廉也紧随其后在 1278 年 5 月 1 日入了土。这个公国此时直接归属于查理统治，但在他的战略蓝图中居于次要地位，比不上阿尔巴尼亚，更比不上他对君士坦丁堡的谋划。在 1282 年西西里晚祷战争之后，拉丁希腊更是被置于只能自我防卫的地步。查理二世的第一批相关举措包括，在维尔阿杜安的伊莎贝尔于 1289 年嫁给皇帝鲍德温一世的曾孙埃诺的弗洛伦（Florent of

223

① 位于今希腊与马其顿交界处的平原。——译注

② 今希腊拉科尼亚州的一个城市，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海岸的一个小半岛上。这个半岛与大陆通过 200 米长的短堤相连。该城修建在岩石山丘的斜坡上，俯瞰海湾。——译注

③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译注

Hainault) 时, 把亚该亚公国的管理权交还给了她。查理此后又把对弗洛伦和伊莎贝尔及整个拉丁希腊的直接宗主权给了他最钟爱的儿子塔兰托的菲利普。弗洛伦死于 1297 年 1 月, 留下一个三岁大的女儿马奥特。1301 年, 伊莎贝尔第三次出嫁, 嫁给了皮埃蒙特伯爵萨沃伊的菲利普。但五年后, 查理罢黜了他, 原因是他拒绝向塔兰托的菲利普效忠, 还实施了有碍于安茹家族利益的政策。尽管伊莎贝尔表示反对, 但塔兰托的菲利普还是直接接管了拉丁希腊。

在前一章中我提到了安茹家族试图从阿拉贡人手中夺回西西里岛的斗争。而此时, 因为出现了一个意外的转折, 这场冲突又扩展到了希腊南部。1309 年, 一帮雇佣兵冒险家(加泰罗尼亚团 [Catalan Company], 由一些加泰罗尼亚人和其他西班牙北部的人群组成, 他们是当年受阿拉贡王公们雇用在意大利作战的各路雇佣兵团伙的残留力量) 侵入帖撒利。这个雇佣兵团之前主动受雇于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 为他抗击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但之后他们与他发生口角, 遂出走, 往色雷斯和马其顿大肆劫掠。有一段时间他们为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兄弟瓦卢瓦的查理 (Charles of Valois) 服务; 查理娶了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的一个孙女, 并对帝国皇位提出要求。由于被帖撒利的希腊统治者压迫着不断靠近雅典, 加泰罗尼亚人后来就在 1310 年开始为雅典公爵布里埃纳的沃尔特 (Walter of Brienne) 服务。可是, 此后他拒绝给他们封土, 还不付给他们应得的工资, 雇佣兵团就转而和他作对。沃尔特从整个拉丁希腊召集了一支军队, 于 1311 年 3 月 15 日在帖撒利的哈密洛斯 (Halmyros) 与雇佣兵团交战, 结果震动了各方。当时正是旧式骑兵逐步被新式职业士兵超越的时代, 而这场战役就很能代表这一趋势。沃尔特率骑兵突进, 直接进入了一片他误以为是草场的沼泽地。他和手下骑士几乎全部被杀。加泰罗尼亚人亲自占领了忒拜和雅典, 不过随后又被法国人夺走, 之后又让阿拉贡人得了去。经此一役, 伯罗奔尼撒的骑士损失了几乎三分之一。一个时代就此结束。

## 意大利人

自拉丁东方扩展为散布在地中海东部沿海的若干个国家之后，其所面临的问题就不再仅仅是为孤立的定居点保障一条通往西方的生命线了。此时，分布在一片广袤区域内的众多殖民群体之间的航海联系必须得到维持。定居者们一直都很依赖西方的商人们提供的海上力量保障，尤其是来自意大利港口城市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在13世纪，这些意大利人依然提供着这种海上力量，但由于他们在希腊大陆和希腊诸岛上获得了不少领地，他们自身也从政治上融入了其帮助维系的大框架之中。从此之后，东地中海贸易的历史，就与东地中海殖民和十字军运动的历史融为一体。

意大利人在十字军运动开始之前就作为商人与这个地区建立了联系。比萨和热那亚与这里伟大的商业中心联系较少，因为总体而言它们的活动局限在地中海西部。但阿马尔菲和威尼斯却很活跃，尤其是后者。威尼斯人得到了拜占庭人授予的特权，这部分是因为在拜占庭当权者看来，他们仍然是帝国的臣民。1082年由亚历克塞颁布的一份特许状授予威尼斯人在若干特定港口享有免除关税和市场税的特权，这成为后来拉丁定居点的统治者授予意大利商人权利的样板。教皇邀请意大利人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们分享了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征服成果。热那亚人在1098年来到，比萨人在1099年，威尼斯人在1100年。到相当晚的时候，来自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才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12世纪，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获得的权利可以概括如下。首先，他们得到了一些地产，通常是城中的特定区块，其中有行政大楼、教堂、公共浴室和炉子。不过也有更大的，比如热那亚的恩布里亚科（Embriaco）家族就在的黎波里伯国得到了整个城镇朱拜勒作为自家的封地；而在1124年，威尼斯人也得到了泰尔城的三分之一，他们把自己的一些同胞作为封地所有人安置在了那里。其次，他们得到了司法权，有权审判自己的同胞；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审判居住在他们的区块中的其他人。第三，他

们得到了一些商业特权：进入某些港口并停留或离开的权利，进出以及买卖税的减免，有时候还能拥有自己的市场。这些特权使得他们能够成立自己的工坊区（*comptoirs*）：他们自己的商人从西方随舰队来到后能自由待的地方。但这些区块在非商业航海季节是很荒凉的，只有少量定居人群（在13世纪阿卡的热那亚区大概只有300人）留在那里从事一些服务工作。

225

尽管意大利商人享有很多特权，但这带来的实际意义其实比我们认为的要小得多。因为在12世纪80年代以前，来自远东的大宗香料生意——当时最能轻易获取暴利因而最具吸引力的生意，并不经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港口，而是经由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不过，较小但也颇具规模的香料贸易也是有的，再加上当地商品比如糖和棉花的贸易，以及将西方的布料等制成品输入东方市场的贸易，也足以鼓励这些贸易城市在此地建立自己的工坊区，并设立行政管理机构、设立领事或代理人，有时两者兼而有之。但这些行政管理者在12世纪时却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耶路撒冷的国王们不久便开始对他们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旨在把他们的特权至少限制在特许状规定的范围内。国王们坚持，意大利人的法庭只能约束他们到访的同胞，如果哪个意大利人长期定居了下来，他就必须听从王室法庭的召唤。国王们还坚称，意大利人只能拥有低级司法权，高级司法权与涉及流血的司法权将由王室保留。国王们试图阻止自己的封臣将封地让渡给意大利人，有时甚至试图削减他们的特权。这种压力有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大，于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就会把某些工坊区和地产交给自己的封臣打理；这些人能够自行作战，比如恩布里亚科家族对朱拜勒的领主权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

不过，在12世纪的最后25年间，亚洲贸易路线发生了改变，原因至今未知。1180年之后，从印度和远东运来的香料越来越无须经过埃及而来到叙利亚；这里的贸易中心是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安条克。大马士革变得尤其重要，而它的主要港口阿卡和泰尔都在基督徒手中。阿卡开始作为东地中海沿岸的主要市场与亚历山大城相抗衡，甚至还超越了它；而西方的商人们早



就嗅出苗头，在这里扎根安顿下来，并获得了种种特权。

因此引致的贸易额的增长，也给耶路撒冷王室带来了好处。应该记住，当时的关税和买卖税都是打包起来一揽子征收的，通常表现为商品价值的一定百分比。当然，这是买卖双方都要支付的，因此，即使有一方可以免税，交易的另一方，通常是从内陆来的穆斯林商人，却不能免除。所以即使政府授权一方完全免税，它无论如何至少仍能拿到另一半税款。因此，政府的希望就在于，交易量的增长（如果本地商人不把货物运走，就不可能发生）能够弥补之前因为授予特权而带来的损失。东方的商人似乎从未得到过特权，当他们离开城门返乡时还需要支付离境税。而阿卡的威尼斯人和比萨人得到的拥有自己的市场的权利，虽然能让政府因此失去对他们的交易对象课税的能力，但实际上也意味着他们只能在这些市场中售卖自己从欧洲运来的货物。为了在返乡时填满船舱，他们还是要去王室市场买东西，而那里的商贩都必须老老实实缴自己的那份税。此外，政府似乎还严格地向在意大利人的市场购买东西的居民收税，并且采取措施防止意大利人摆脱它所设下的限制而自由地往返内陆与穆斯林交易。其结果就是，耶路撒冷王国变得非常富有，贸易带来的利润使得它能多赐封一些货币封土，从而弥补在1187年领地封土被穆斯林大量占据之后损失的封建服役。

226

但是，如果说王室变得相对富有了，那么意大利人就变得更富了。他们因此采取的增加贸易量和派出大批商人的举动，反映在他们强化对东部的工坊区的控制举措上。12世纪90年代，威尼斯任命了一名全叙利亚威尼斯总督（*bajulus Venetorum in tota Syria*），驻扎在阿卡。大约在同一时期，热那亚和比萨也分别任命了两名统管全叙利亚的领事，也驻扎在阿卡。1248年，比萨将权力集中到了一位比萨驻阿卡及全叙利亚总领事（*consul communis Pisanorum Accon et totius Syriae*）手中。此外，在1187至1192年间，吕西尼昂的居伊和蒙费拉的康拉德为了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赢得意大利人的支持，一直不断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比萨人获得了包括高级司法权在内的司

法权，可针对所有居住在他们的区块中的人行使；而热那亚人则得到特权，如果是涉及高级司法的案件，将由他们自己的法官与王室的法官共同出席裁定。香槟的亨利试图再次削减这种豁免权，但不太成功。不过从他开始，在13世纪时不时加在意大利人身上的压力就出现了。可是，由于国王长期缺位，而且事实上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意大利人作为航运商、货币兑换商和借贷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这种压力不可能持久。

### 阿尤布王朝

如果说是13世纪上半叶拉丁东方的繁荣和拉丁定居点在地中海东部沿海分布的广度和纵深，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定居者们更加有了安全感的话，这还是不够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没那么带有露骨敌意的邻人。萨拉丁在1193年3月4日过世，他的帝国的各个省份，如埃及、阿勒颇、大马士革、半岛、外约旦、哈马、霍姆斯和巴勒贝克，纷纷成为由他的亲戚或后裔控制的独立公国。在每一代人中，总有一人享有至高的地位：阿迪勒(al-'Adil, 1200—1218)、卡米尔(al-Kamil, 1218—1238)、萨利赫·阿尤布(as-Salih Ayyub, 1240—1249)。当然，阿尤布王朝除了与定居者们交界的边界外，还有其他边界地带需要关注。这也是他们及其臣民大繁荣的时期，部分是因为西欧在接收来自亚洲的货物，而这种接收取决于货物在基督徒的港口的转运。因此，尽管吉哈德圣战的观念还留存着，甚至还兴盛起来，但共存观念更加得到强调：这一时期以一系列停战协定的签署为特征。如同这一地区其他各个小国家一样，耶路撒冷和安条克—黎波里参与了一些同盟或反同盟；但其中的一个同盟及其带来的后果却表明，宁静的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1244年，耶路撒冷王国中的一派人撕毁了与埃及的萨利赫·阿尤布签署的停火协议（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反而与大马士革的萨利赫·伊斯玛仪以及外约旦的纳西尔·达乌德结成针对阿尤布的进攻同

盟。这使得基督徒们可以趁机扩展对耶路撒冷圣殿区域的控制。埃及转向花刺子模人：1220年蒙古人攻破了一个地处伊朗北部的国家，他们是该国的幸存者。花刺子模人曾在伊拉克北部当过雇佣兵，此时则从北方一路横扫而下，在7月11日涌进了耶路撒冷。8月23日，大卫塔的守军向花刺子模人投降。10月17日，在加沙东北方向的哈比亚（Harbiyah，即拉福尔比 [La Forbie]）进行的战役中，法兰克一大马士革同盟被他们和埃及人击溃。基督徒军队，大约由1200名骑士组成，是57年前的哈丁战役以来最庞大的队伍，大部分战死沙场。

### 定居者们对伊斯兰世界政治的了解

定居者们及其在西方的同伴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非常感兴趣，这毫不令人意外。在一定范围内，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很精确、很细致。例如，在1196至1202年间，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团长顿戎的若弗雷（Geoffrey of Donjon）给两名通信人一共写了四封信。在信中，他指引他们了解了阿尤布王朝政治生活中一段特别曲折的时期。在欧洲的通信人们时不时就能得到一些让他们非常感兴趣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精确需另当别论。若弗雷听说一个年轻的穆斯林牧羊人皈依了基督教，并在同胞当中发动了一场传播福音的运动，使得2000人皈依。圣殿骑士团大团长佩里戈尔的阿曼德（Armand of Peragors）写道，大马士革的萨利赫·伊斯玛仪的一个孙子皈依了基督教，随后取名马丁。圣殿骑士团的总指挥官巴桑维耶的居伊（Guy of Basainville）在1256年时得知，阿拉伯半岛发生了一场地震，引起火山爆发，毁坏了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坟墓。

这些作者的语气一般都比较克制。当然，很多信件都是私人的。但即使是打算写给更多受众看的，语气表达也比较中性，没有明显的臧否色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信件中蕴含的极端色彩，比人们在欧洲任何一场极小

的神学争论中能发现的还要少。这种相对而言比较中立的语言可能源于这样的事实：骑士团的团长们以及其他十字军暴力行动的组织管理者们，实在不能承受过于情绪化带来的后果。他们的职责是尽可能谨慎地护卫边界地带，而对东方各种状况的熟悉能够给他们带来笃定放松的感觉。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必定相信，接收这些信件的王、高级教士和大贵族应该比较喜欢这种陈述事实的语气；因为，如果他们确信这些通信人、这些他们寻求帮助的人更倾向于对浓墨重彩、情感丰富的语言做出回应的话，那么他们肯定就会转而采用那种语言了。西方给他们的回信大部分已经佚失，但一些间接的证据表明，这些回信采用的同样是这种克制、客观的语气。

这就自然让人感到好奇，到底哪种态度在西方更为典型呢？是许多刚来到黎凡特的人声称的那种热情满满的激进状态，还是这种更为冷静的立场呢？答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基督徒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东方的领袖们与西方的教皇和皇帝们留存下来的往来通信中，那种典型的冷静语气在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境况中是非常合理的。传道者们用来激发支持者的夸张浮华修辞有时候也会为十字军战士们所采用，而这一切必定会让真正肩负着守护圣地责任的人感到恼怒，因为这让他们面临着不切实际的期望，以致一旦为上帝而战的战事进行得不顺，他们就会受到多方责难。

## 安条克—的黎波里

在13世纪早期进行的一场继承战争后，安条克公国和的黎波里伯国开始由同一位统治者统治，不过，各自还保留了原来的行政体制和习惯法。的黎波里的雷蒙三世在1187年去世，没有留下直系继承人。他忽略了自己在欧洲的亲戚们的继承权，而选择他的教子雷蒙——安条克大公博希蒙德三世的长子作为继承人。不过，大公成功地用自己的幼子——未来的博希蒙

德四世取代了自己的长子。但长子安条克的雷蒙先于自己的父亲去世，留下的继承安条克公国本身的继承人是他年幼的儿子雷蒙·鲁朋（**Raymond Roupen**）。鲁朋有一半亚美尼亚血统，他的继承要求得到了他的叔公西里西亚亚美尼亚国王利奥的支持。博希蒙德三世把雷蒙·鲁朋和他的母亲送回了西里西亚。尽管美因茨大主教维特尔巴赫的康拉德（他从西方皇帝那里为利奥带回了王冠）向博希蒙德三世施压，要确保其手下的封臣宣誓支持鲁朋的继承权，但此举并不受欢迎，于是此时年轻的博希蒙德四世，作为的黎波里伯爵，决心要把公国夺过来。他进入安条克，废黜了自己的父亲。支持他的有一个公社组织，这是早已在城中成立的，自称其目的是抵制日益增长的亚美尼亚优势地位造成的威胁。圣殿骑士团对此也予以支持，他们当时因利奥阻碍他们在安条克与西里西亚边境的巴格拉斯（**Bagras**）一带行军而与他发生了争端。这次叛乱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在博希蒙德三世 1201 年去世后，博希蒙德四世在公社组织的支持下重新得到了安条克。尽管面临着一系列来自西里西亚的入侵行动、公国内一派人的反对，以及耶路撒冷王国的领导人和教皇英诺森三世（他开除了博希蒙德四世和利奥两人的教籍）的从中斡旋、力求和平，他还是一直控制安条克直到 1216 年。

229

这次冲突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从中反映出安条克融入近东的程度已有多深。1201 年，博希蒙德四世求助于阿勒颇的扎伊尔（**az-Zahir of Aleppo**）和罗姆的苏莱曼（**Sulaiman of Rum**）<sup>①</sup> 对抗西里西亚亚美尼亚。而在 1203 年 11 月，一支由安条克和阿勒颇的军力并辅以圣殿骑士团的骑士组成的队伍，洗劫了巴格拉斯附近的多个亚美尼亚村庄。1209 年，罗姆的凯霍斯鲁（**Kai-Khusrau of Rum**）替博希蒙德四世出头，入侵西里西亚。安条克公社带有强烈的希腊色彩，而博希蒙德四世由于严重依赖于它的支持，导致与天主教牧

① 罗姆意为罗马人，来源于阿拉伯语。在中世纪穆斯林用该词指称拜占庭帝国治下的小亚细亚。今天中东地区的安提阿牧首区和耶路撒冷牧首区的基督徒，尤其是阿拉伯的东正教徒也将自己称为罗姆东正教徒。此处指的是塞尔柱王朝旁支在小亚细亚建立的罗姆苏丹国（**Sultana of Rum, 1077—1307**）。——译注

昂古莱姆的彼得（Peter of Angoulême）的关系恶化。1207年初，博希蒙德四世默许名誉东正教牧首加冕；1208年，又与尼西亚皇帝西奥多·拉斯卡里斯结盟。昂古莱姆的彼得在城中领导发动了一场叛乱，博希蒙德四世把他扔进监狱，不给他水和食物。彼得喝下牢房里油灯的灯油后，怨愤而死。

到1216年时，博希蒙德四世已经与他在阿勒颇的穆斯林盟友疏远，又由于长期身在的黎波里而在安条克变得不受欢迎。贵族中青睐雷蒙·鲁朋的一派势力渐长，其中就有公社的社长萨敏的阿卡里（Acharie of Sarmin）。2月14日晚上，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利奥进入城中，没过几天就完全控制了这里。雷蒙·鲁朋被加冕为大公；由于当时他被视为利奥的继承人，因此人们觉得安条克和西里西亚有可能合并。事实证明，鲁朋也不受欢迎，1219年市民们又起而反对他。博希蒙德四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收复了该城，此后一直掌控着它；不过，他与教会和解却要等到1233年临终之前。他与西里西亚之间的和平始终不太稳固，并终于在1225年被打破。博希蒙德四世的儿子菲利普娶了利奥的女继承人扎贝尔，但却在一次亚美尼亚的叛乱中被谋杀，于是博希蒙德四世愤而联合罗姆的凯阔巴（Kai-Qobad）攻入西里西亚。

1233年以后，新的大公博希蒙德五世与他的父亲当年一样更愿意住在的黎波里。安条克的拉丁人社区和希腊人社区彼此孤立隔离。基督教领土的很大一部分，如巴格拉斯、马卡布、塔尔图斯、萨菲塔和骑士堡周边地区，都在骑士团手中；他们奉行独立的政策，对周边的伊斯兰小国采取激进进攻的政策。因此，博希蒙德五世治下的土地给人的印象就是四分五裂拼凑起来的整体，能够存在只是因为阿尤布王室的各支意见不统一，但他们都希望和平。

## 耶路撒冷王国内的制度性冲突

耶路撒冷王位的继承上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之前我已经描述过西碧拉和

伊莎贝拉及她们各自的丈夫之间的竞争是如何在 1192 年结束的，结果则是伊莎贝拉登上了王位。她结了四次婚，但存活下来的子嗣全是女儿。其长女玛丽亚嫁给了布里埃纳的约翰，但这次婚姻也只孕育了一个女儿约兰德，后成为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妻子。约兰德在 1228 年 5 月 1 日死于难产，留下一个儿子康拉德。但腓特烈和他的儿子康拉德都没有来过巴勒斯坦。因此，从 1186 至 1268 年，王国掌握在一个个女继承人手中，人们必须为她们找到合适的夫婿；要不就是掌握在身在地外的统治者手中，人们必须为他们准备摄政或代理人，如果事情至此还不算很糟的话。雪上加霜的是，又因为按继承法和选择摄政或代理人的习惯法继位的一直是幼童，因而一群好事又聪明的反对派领主们不断发明新的法律，并尽可能地操纵旧有的法律为己用。约兰德活着的时候，作为正统的女王，她能正当地任命代理人。但在她死后，她儿子尚年幼，任命摄政的法律就开始起作用，直到他能够来到东方正式履职。而腓特烈二世从 1228 年 9 月来到阿卡后就担任了他的摄政，并有权在自己返回欧洲时任命代理人。

腓特烈的摄政招致强烈的反对。1241 年，康拉德接近成年，反对派以此作为借口提出法律条款称，一位已经成年但无法到东方加冕的国王应该被视如再次处于幼年。根据这种解释，腓特烈的摄政期结束，权力被判定应转交给康拉德最近的继承人，即塞浦路斯的爱丽丝太后。她是耶路撒冷的伊莎贝拉的三女儿。1246 年爱丽丝死后，摄政权传给了她的儿子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一世；但他自己也在 1253 年去世，留下年幼的继承人于格二世。这个幼童被授予了代表新的幼童国王康拉德摄政耶路撒冷的权力。可他自己也是幼童，也需要一位摄政，这个职责就由他的母亲安条克的普莱桑斯（Plaisance of Antioch）承担，直至她于 1261 年去世。事实是，摄政们自己也常常不在当地，因此又要委派代理人驻扎在阿卡；而除了王室的代理及摄政之外，各个封臣也都有自己的代理和摄政；这就让本来就使人看得糊里糊涂的摄政和继承序列，以及这中间存在的种种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在 13 世纪 60 年代，摄政权以及在康拉德被处决后的王权都被

231 多方人马争夺：布里埃纳的于格，即塞浦路斯的爱丽丝长女的儿子；安条克—吕西尼昂的于格，即爱丽丝的小女儿的儿子；以及安条克的玛丽亚，即爱丽丝的妹妹梅丽桑德的女儿，因此是她的侄女。

耶路撒冷的这顶王冠不仅享有极高的威望，而且，只要贸易路线还对这里有利，它就还能带来丰厚的收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如腓特烈二世甚至安茹的查理这样的外人，也对它抱有浓厚的兴趣。腓特烈在巴勒斯坦的政策，以及王室残余的影响力，导致贵族们开始为自己的各种自由权利而担忧。而因为这群人中崛起了一派法学家，因此又为这一事件添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这个派别的形成，部分是因为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法律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这样一种惯例，即国王或某位领主作为封建法庭的庭长，可以任命一名封臣来协助他，或者任命另一名封臣提供咨询顾问（*conseil*），并且可以要求封臣们将此作为一项封建义务接受。这种咨询顾问被称为申辩人，但起到的主要作用是顾问而非辩护，而封建法庭里的程序是如此复杂，因此任何参与这场诉讼的人都有必要利用这样的咨询顾问：

申辩人大人……权威极大 [其中一人写道]，因为要是雇用了一名聪明的申辩人，你有时就有可能在法庭上挽救或保全自己的名誉和身体，或自己或朋友的继承权；而如果缺少一名聪明的申辩人，偏偏形势实际需要他，那你就可能失去自己的名誉、身体或继承权。

因此导致的就是对精通法律的人需求量很大，需求不仅来自领主们，也来自封臣们。拥有此类特长声誉的人经常在几块领地中都获得封地，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也使得他有机会在非常多的封建法庭中担当咨询顾问的角色。而我们要谈到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效忠法》（*assise sur la ligece*）。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这赋予了国王权利，可要求所有陪臣（*rear-vassals*）也效忠纳贡，因此他们也可以在国王自己的法庭中申诉。尽管有证据表明，在13世纪时许多封臣并不向王室效忠纳贡，一个半职业的法律咨询顾问阶层



却开始出现。例如，詹姆斯·韦达尔（James Vidal），一位在1249年4月时已经在巴勒斯坦拥有封地的法国骑士，并在1271年前经常进出最高法庭，而在某段时间内还在凯撒里亚、阿尔苏夫、伊斯肯德伦那，或许还有拿撒勒领地拥有封地。

申辩人在1187年以前已拥有权威，但那一年发生的灾难则使其大大加强。在13世纪，其正确与否尚有待争论，但有一点确实得到了主张，即：耶路撒冷的诸种法律，或至少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每一种都单独誊写在一张牛皮纸上，并由国王、牧首和耶路撒冷行政官加盖封印，保存在圣墓教堂的一个箱子里。在耶路撒冷落入萨拉丁之手时，这个箱子及其中的卷纸都下落不明。突然之间，法律的性质就改变了，因为它不再依赖大量书面文献，或至少具有重要的书面记录特征，而变为惯例至上。因此，王国中的律师们此时必须依赖他们对惯例和习俗的了解。正如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位所指出的：“王国的惯例和法律……没有记录成文，也没有编为法律集，也没有经由一致同意而获得权威，自从圣地丧失之后就一直如此。”因此，要进行裁决的封臣们自然会求助于申辩人，尤其是那些活跃在仍然记得旧日法律的圈子里的那一群人。

232

在这些暴露在危险中的边境领地里，却出现了一批充满学究气但威望极高的律师；法律知识和申辩能力比军事技能更得到推崇，并且成为获得名望的、更为确定的路径。这必定看来很是奇怪。然而，我们应该牢记，这是一群城市贵族，他们依靠租金活着，拥有闲暇去参与学识辩论；而必须要加上的一点是，他们还能参与政治派别纷争。而阿卡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成为了重要的文化中心。考古学的发现已逐渐揭示出该地的建筑品质之高。艺术史家们也开始承认这里的手抄本装饰绘图师和圣像绘画师工作室所具有的重要性。在这些地方，生产的作品具有绝佳的品质，不是那种行省或殖民地风格的，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融合了东西方的元素，只不过西方的尤其是法国的影响仍然是决定性的。

享有法律界威望的人来自很多不同的群体。有两位是统治者，即塞浦路

斯—耶路撒冷的艾默里和安条克—黎波里的博希蒙德四世。其他人，至少在某些时候是腓特烈的支持者。还有一些人凭借自己的法律技能从市民阶层升入了骑士阶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与较高层的贵族关系密切的人。在13世纪早期主要有三位。据法学家诺瓦拉的菲利普（Philip of Novara）所说，他们是“我在海的这边看到的最为明智的三个人”。提比里亚领主拉尔夫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伟大的，而他的威望又因他在1187年前的个人经历而得到增强。贝鲁特的“老领主”伊贝林的约翰（John of Ibelin, “the Old Lord” of Beirut），是此时主导了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的宗族的首领；而且作为伊贝林的巴里安与国王阿马尔利克的遗孀玛丽亚·科内玛婚后生下的儿子，他还是伊莎贝拉女王的同母异父兄弟。西顿领主巴里安，是此地最根深蒂固的贵族家系格勒尼耶的首领，也是贝鲁特的约翰通过其母伊贝林的埃尔维斯这一支推下来的外甥，尽管他与他舅舅的关系并非通常看起来那么亲密。这三位权贵处在一个由次级的领主、骑士和市民组成的圈子的中心，后来又让位给了新一代法学家，其中大多数是伊贝林家族的人及其亲属：贝鲁特的约翰的儿子阿尔苏夫的约翰；贝鲁特的约翰的侄子雅法的约翰，也是这批作者的著述中最有名的一本的作者；还有贝鲁特的约翰及其子巴里安的一名封臣诺瓦拉的菲利普。而这一代又被后一代取代，新一代的领袖是阿尔苏夫的约翰的儿子巴里安和雅法的约翰的儿子詹姆斯。

贝鲁特的约翰承认自己受教于提比里亚的拉尔夫，诺瓦拉的菲利普将自己的师承归于提比里亚的拉尔夫、贝鲁特的约翰和西顿的巴里安，雅法的约翰则归于贝鲁特的约翰和西顿的巴里安。因此，这个法律学派很大程度上局限在亲属群及其食客当中，这是千真万确的。处于这个关系网中心的是伊贝林家族。到这个世纪中期时，这个家族握有贝鲁特、阿尔苏夫、西顿、凯撒里亚、泰尔和雅法的领主之位（或与领主关系密切）。他们与耶路撒冷的王室共有一位女先祖玛丽亚·科内玛，而塞浦路斯的王室家族则传自贝鲁特的约翰的表姐妹伊贝林的艾斯奇瓦，系艾默里国王的第一任妻子。这种关系又因国王于格二世和于格三世与伊贝林家族的联姻，以及于格三世的姐姐玛

格丽特与蒙福特—泰尔的约翰（他的祖母出自伊贝林家族）的联姻而得到强化。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代法学家的领袖们与12世纪八九十年代反对居伊的吕西尼昂的领主运动关系密切。提比里亚的拉尔夫是黎波里的雷蒙的继子。贝鲁特的约翰是纳布卢斯的巴里安的儿子。西顿的巴里安是西顿的雷纳德的儿子。鉴于法律能力总是与政治影响力息息相关，因此毫不奇怪，我们能够发现这个学派中如此多人都公开表达了反对王室的政治观点。

他们的著述包括若干本法律书籍和历史书，就那个时代而言很有些不同寻常之处。其中勾勒了一种政治理论，与别地的领主运动倡导者所表达的有密切联系。而且这些著述大都建基于对某段过去、对某段传奇般的黄金时代的神秘化解读，而这通常指紧接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那段时期。其阐发点似乎是对1099年征服巴勒斯坦的一种历史解读。在这些法学家看来，巴勒斯坦是由十字军夺取的，因此是基于诸种权利中最基本的一项——征服权才得以保有。但巴勒斯坦不属于教皇，甚至也不属于国王们。他们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视为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这场运动没有公认的领袖。“这片土地被征服，征服它的，不是哪位大领主，而是一支十字军，以及朝圣者和聚集起来的各色人等的迁徙运动。”因此，从权利上说巴勒斯坦只属于上帝和这些人。而这些人随后选举出了他们的统治者，“他们通过订约和选举，选出了一名领主，他们赋予他王国的领主权”。

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统治者此后都要受这个管理契约的限制。法学家们自己强调，布永的戈弗雷的继承者们自上帝那里凭世袭权力得到王国；但他们相信在他当选之后，戈弗雷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考察其他地方的惯例。根据委员会给出的报告，再加上后来做的一些常规调查，戈弗雷编制了一个法律体系，“他和他的封臣以及人民……凭此而治理、维护、保有、维系、审判和裁决”。法学家们强调，这个法律体系是由戈弗雷的宫廷确定的。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里，雅法的约翰提出，起草记录了包罗万象的法律是由统治者和被治者立约通过的，换句话说，就是形成了某种成文的宪法。此外，

法学家们还主张，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一直，或应该一直宣誓，不仅坚持他们祖先的法律，而且，根据上述原则，只经由宫廷集体做出决策。而正是这最后一条信念，为法学家们提供了限制王权的依据。

法学家们打算主要从其封建性质角度而极少从其公共性质角度来看待国王的身份。对他们来说，国王首先是他们的封建宗主（*chef seigneur*），根据契约对他们负有责权，正如他们对他一样。随之而来的是，他们之间的争议作为显然会涉及他们契约关系的争议，只能在他的法庭上（这种事项应被讨论的地方）得到恰当的判决；而由于封建习俗中的裁决要求某一方不能充当自己的案件的裁判，因此这类案件的审判权属于法庭，在庭上，国王的封臣们——他们的同等级人一起坐下来给法官提供咨询建议，而不是给国王本人。这一原则首先适用于惩罚类的裁决，比如对身体的责罚或取消封地。“领主不能伸手触及他的封臣的身体或封地，除非是根据他的法庭的裁决（*esgart* 或者 *conoissance*）。”只要是存在封臣从封建关系上抵抗国王的地方就能找到这样的信条，但如若严格执行这类裁决将使管理根本无法进行。没有哪位西方的国王曾严格执行封建惯例，在这方面耶路撒冷的国王们与其他国王也没什么不同。他们的反对者比其他地方的更聪明，但要谈到把理念付诸实践，这些反对者也不怎么有效率，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反对者被自己的观点搞得盲目了。

这些反对者所选择的是利用《效忠法》，但这部法律原先是国王为了自己的利益颁布的。《效忠法》起初是因为西顿领主颁布了一项有问题的法令才促发的；在他们看来，《效忠法》强调了封建契约的这样一项条件，即：没有哪种情况，某位领主，甚至国王，能够不经自己的法庭的正式裁定就对某位封臣采取行动。如果一位国王没能遵守自己的契约职责，因此受损的封臣可以根据国王所颁布的法律要求得到正义；受损的封臣可以撤销服务，或者请其他封臣协助自己。他们首先会诉诸国王，要求恰当地庭审这个案件。如果国王拒绝的话，他们可以动用武力，把自己的同伴封臣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或重新占领他的封地，只要这不涉及对国王本人动武；或者他们可以郑重

地集结起来，各自撤销自己承担的义务，不再为国王服务。这听起来非常有力度，并且在像耶路撒冷王国这样一个依赖于封臣的武装服务的边疆国度，似乎应该很有用。但这当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只能在一个所有封臣都联合行动而国王又完全依赖于他们的空想国度中施行。在一个理想的封建世界中（法律著作构建的世界中）它或许能够奏效。而在13世纪上半叶的现实世界中，封臣们从来都不是联合一致的，而商业带来的收益又能够让统治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用依赖于他们的服务。

这一点在封建封臣们第一次求助于对《效忠法》的解释时变得非常明显。1198年，艾默里国王指控提比里亚的拉尔夫与一次危及其性命的行动有牵连，于是专断地将之从国中驱逐出去。拉尔夫的回应是，请其他封臣代表自己要求最高法庭裁决此事。当国王不加理会时，他们郑重地威胁称将不再为他服务，但却毫无效果。在艾默里去世之前，拉尔夫始终流亡在巴勒斯坦之外。

但这次惨败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法学家们对《效忠法》所具有的效力的信心，这或许是因为此后它成功地发挥了一次效用。1228年7月，腓特烈二世来到塞浦路斯。作为年轻国王的宗主，他一直要求获得这里的监管权及对少数民族抽取的收益。在触犯了布里埃纳的约翰一次之后，伊贝林家族就一直集中关注这座岛屿，因此也就可能滥用自己在岛上的地位。贝鲁特的约翰接替自己的兄弟菲利普，代表国王的母亲成为国王的监护人；而腓特烈行使自己权利的决心必然会直接触犯约翰的利益。在一场宴会上，腓特烈派全副武装的战士把宾客们团团围住，通过这样戏剧化的举动亲自重申了自己的要求。他还以耶路撒冷王室的名义，命令约翰交出贝鲁特封地，因为他坚持说约翰一家是非法占有了这块封地。这场较量在皇帝继续航往巴勒斯坦之前没有结果，但在接下来的5月，他把塞浦路斯的摄政权分包给了塞浦路斯一个对伊贝林家族怀有敌意的贵族党派的五位领袖，并命令他们不经最高法庭审判就剥夺自己的敌手的继承权。这引发了内战。

腓特烈在1228年9月抵达阿卡，并被承认为摄政。他通过条约得到耶

路撒冷城之后，立刻返回阿卡，决心要让王室恢复他认为他自12世纪中期以来就失去的应有的权威。为此，他采取了两项他实际上无力保障施行的措施：他剥夺了伊贝林家族及其支持者在阿卡周边享有的王室封地；他还试图强行保证条顿骑士团（他们是他最坚强的后盾）对托伦领主权的要求，而无视本来拥有继承权的世袭继承者。在动荡的几个星期之内，受到侵害的封建领主们采取了他们都认为可行的途径。他们以武力重新占领了封地，威胁要撤回对王室服务的义务，从而迫使腓特烈撤回了他原先有利于条顿骑士团的裁定。封臣们欢欣于自己的胜利，可是他们忘了腓特烈此时还处于被绝罚的状态，手下没有军队，很担忧教皇的军队对意大利南部的入侵，而且很渴望能尽快回国，因此实际上处在非常无力的位置上。

皇帝腓特烈回国后，内战在塞浦路斯爆发了。伊贝林一派拒绝承认占据了他们封地的五位帝国“摄政”的统治。贝鲁特的约翰自巴勒斯坦派出了一支远征军，于1299年7月14日在尼科西亚城外击败了帝国派来的军队。次年夏天，最后一个帝国派掌控的城堡投降。皇帝腓特烈配备了一支军队，由他的兵马元帅理查德·费兰杰里（Richard Filangieri）率领，并任命理查德为自己的代理副手。这支队伍在1231年秋天起航前往东方。他们没有试图在塞浦路斯登陆，而是占领了伊贝林的约翰在大陆上的领地贝鲁特城，围攻其主塔。理查德要求泰尔投降并如愿以偿，随后他在阿卡的一次骑士和市民的集会上出现。这次集会可能承认了他是一位不在此地的摄政名正言顺的代理副手；但会上还有人向他指出，他试图在贝鲁特以武力剥夺一位封臣的封地是违法的。理查德无视令他撤出的要求，贝鲁特的约翰于是率领一支军队从塞浦路斯出发，在1232年初前往为自己的城堡解围。到此时，一个在之前已经存在的帮会基础上建立的公社组织在阿卡成立，其目的似乎是聚集起反对皇帝的力量，并保证王室领地中最重要的部分阿卡不会落入他手中。虽然有多位重要的封建领主，包括西顿的巴里安（他与布里埃纳的约翰过从甚密，与伊贝林家族则很疏远）加入了贝鲁特的约翰这一派，但这个公社的成立及其长达十年的寿命都说明，领主运动为解释《效忠法》所设计的

精巧机制是失败的。约翰自己也根据《效忠法》向封臣们发出过呼吁，但得到的区区一点回应却与这个理论设想的宏大规模形成鲜明对比：只有北方的43名封臣前来驰援，他们也没有加入其军队而只是单独行动。约翰只能返回阿卡，在那里他被任命为这个公社的社长，以募集起足够多的人来威胁泰尔。这促使理查德离开了贝鲁特，不过留在阿卡以北的一小支领主派的力量在5月3日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与此同时，约翰不在塞浦路斯而且也没能把帝国派赶出巴勒斯坦，这都鼓励了岛上腓特烈的支持者再次争夺控制权。理查德·费兰杰里也加入了他们。伊贝林派在6月15日的安吉尔达战役中摧毁了他们的势力。1233年，凯伦尼亚陷落，塞浦路斯的内战结束。

237

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这个区域处于一种不太安稳的和平状态。塞浦路斯被牢牢地掌握在伊贝林家族手中，贝鲁特和巴勒斯坦的许多封地也是如此。在王室领地中，阿卡在公社的控制下，但泰尔和耶路撒冷在皇帝手中。1232至1241年这几年中，皇帝、教皇和贵族的代表之间进行了漫长但毫无结果的谈判。1241年，对腓特烈的支持似乎日渐增长，圣殿骑士团也倒向他这边；这一年，一场叛乱爆发，差点为他夺下了阿卡城。但领主派又创制了一个新的裁定，称年轻的国王康拉德在下一年就将成年，需要一名新的摄政。他们任命了塞浦路斯的爱丽丝，而领主派最终夺下了泰尔，不久又占领了耶路撒冷。继爱丽丝之后摄政的是塞浦路斯的亨利，在他的摄政期中最显著的是王室领地被大量授予了伊贝林派中的大人物（雅法给了伊贝林—雅法的约翰，亚革悉 [Achziv] <sup>①</sup> 给了伊贝林—贝鲁特的巴里安，泰尔给了蒙福特的菲利普）；而教皇英诺森四世在1245年剥夺了腓特烈的一切管理权，凭自己的权威以各种方式支持现任摄政，批准其颁发的授权（其中有些具有欺诈性质），并使塞浦路斯不再接受帝国的宗主权控制。

<sup>①</sup> 位于今以色列北部地中海沿岸、阿卡城与黎巴嫩交界处。——译注

## 马穆鲁克王朝崛起

在13世纪50年代，由于一些不受控制的因素，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定居者们的处境恶化了，这种恶化是决定性的：蒙古人到来了。1243年，他们在克塞山（Kös Dagi）战役击败塞尔柱人的罗姆苏丹国，此后安纳托利亚变为蒙古的保护地。1256年，他们摧毁了阿萨辛派在伊朗阿拉穆特（Alamut）的总部。1258年，他们攻取、洗劫了巴格达，并占领了上伊拉克。1260年，他们入侵叙利亚，洗劫阿勒颇，摧毁了北方的各个阿尤布王朝小公国，震慑了大马士革并使其臣服。

但就在那一年的9月，他们的势头在巴勒斯坦的艾因扎鲁特（‘Ain Jalut）<sup>①</sup>战役中被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打断。马穆鲁克人尤其指从伊斯兰边境地区来的受训奴隶战士，而在这次战役中主要指来自俄罗斯南部的奇普恰克突厥人，他们长期以来就是伊斯兰军队中的一大特色；而在埃及，作为苏丹萨利赫·阿尤布精挑细选的私人护卫队巴里亚（Bahriyah），其势力日益强大。尽管萨利赫·阿尤布在1249年11月22日去世，巴里亚在击败路易九世的十字军的战斗中还是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但新任苏丹图兰沙不信任他们，想用自己掌握的军户替代他们的职位。他们于是在1250年5月2日刺杀了他，并推举萨利赫的妃子沙贾尔·阿德杜尔（Shajar ad-Durr）为“女王”。她和他们一样都出身突厥奴隶，曾在萨利赫死后至图兰沙掌权的间隔期掌权。土库曼人马穆鲁克苏丹亚贝格（Aybeg）成为总指挥官并娶了沙贾尔·阿德杜尔，而年幼的阿尤布王子阿什拉夫·穆萨（al-Ashraf Musa）被立为苏丹，暂时作为他们统治的傀儡。其他阿尤布王公打着“正名复位”的旗号攻入埃及的行动都被击退。亚贝格的统治期间充斥着暴力和反叛，1257年4月10日他在浴室被沙贾尔·阿德杜尔派人谋杀，这段统治期结束。但沙贾尔自己也很快被推翻。亚贝格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阿里，但这只是马

① 位于巴勒斯坦北部，具体位置可参见本书地图三。——译注



穆鲁克苏丹国一种典型的权宜之举：一次有名无实的血亲继承后，一待众位埃米尔中涌现出下一位统治者，这名靠血缘上位的继承人就将下台靠边站。而对着蒙古人造成的威胁，傀儡阿里很快被废黜，他父亲的马穆鲁克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古突兹（Kutuz）在1259年11月12日被推举为苏丹。正是古突兹在艾因扎鲁特战役中击败了蒙古人，可是，1260年10月24日就在他凯旋返回埃及的途中，他被以自己的大元帅拜巴尔为首的一群埃米尔刺死。拜巴尔也是刺死图兰沙的主要刺客之一。拜巴尔随后篡夺了埃及的王位，不到三个月他就稳固了对大马士革的控制，随后又把马穆鲁克人的统治扩展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1261年，他在开罗立阿拔斯家族的一名成员为哈里发，让埃及成为哈里发的驻地。之后，他开始削弱拉丁定居点的势力。

## 亚洲贸易路线的变迁

艾因扎鲁特一役后，拉丁人发现自己的内陆腹地如今掌握在蒙古人和马穆鲁克人两股强大势力手中，而两方的边界线在伊拉克北部。巴格达已成为一片废墟，各条贸易路线都不再安宁。与此同时，中亚在蒙古人统治下实现了统一，提供了开发往返远东新路线的机会。其中两条变得重要起来，并一直持续到14世纪末。一条经过波斯湾沿岸的港口霍尔木兹，穿越伊朗到大不里士（Tabriz）<sup>①</sup>，之后就分成两条支路，一路去往黑海沿岸的特拉比松，一路弯到南方去往西里西亚的阿亚斯。在13世纪末，阿亚斯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与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有直接联系。另一条从里海以北穿越中亚，到达黑海北端的一系列港口：亚速（Azov，即塔纳 [Tana]）、费奥多西亚（Feodosiya，即卡法 [Kaffa]）、苏达克（Sudak，即索尔达亚

---

<sup>①</sup> 位于今伊朗西北部的城市。——译注

[ Soldaia ] ) 和巴拉克拉瓦 ( Balaklava, 即森巴洛 [ Cembalo ] ) 。

239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亚洲贸易路线发生的这第二次变迁所带来的影响甚至比第一次的更加深远。意大利商人们的目光开始从地中海东部转向黑海，相互间的竞争带来了冲突。君士坦丁堡控制着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狭窄通道，因此再次体现出了重要性。1261年7月它被希腊人夺去，自1204年以来一直在黑海一带很活跃的威尼斯人因此遭遇了重大挫折。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八世与热那亚人签订了一项条约，给予他们威尼斯人曾在拉丁帝国享有的相同特权。热那亚人从来没有完全享受过这些承诺给他们的权利，1264年他们还曾一度被逐出君士坦丁堡，但他们在隔金角湾与该城对望的佩拉港 ( Pera ) 得到了一块城区，还得到了进出黑海的权利。意大利商业城市的战斗舰队如今会被定期派往爱琴海，在13世纪60年代，他们之间的海战在东地中海各处爆发。他们直到1270年才议和，主要原因仅是路易九世坚持要由同一支舰队运送他正在筹建的十字军，而没有哪个城市的舰队能单独接下这个任务。可是热那亚当时正在进入扩张期，这就意味着战事仍不可避免：与比萨，它在13世纪80年代向东方渗透；与威尼斯，战事在这个世纪末爆发。

这种激烈对抗的一种早期表现是1256至1258年在阿卡的街巷中爆发的冲突。这场冲突被称为圣萨巴斯战争 ( War of St Sabas ) ，因为它首先是由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就圣萨巴斯修道院拥有的某些财产发生争端而引发的。其后卷入的人非常多，因此这场冲突逐渐表现出内战的某些特征。威尼斯和热那亚，还有起先支持热那亚而后来在1257年又倒向威尼斯的比萨，都派出了舰队和士兵。攻城器被架在了街道上，意大利街区重重布防。阿卡城的居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就被拉到了这一方或另一方的阵营。封建领主们四分五裂，很多情况都反映了各个领主及意大利社群之间长期以来的差异。以在1256年成为摄政的阿尔苏夫的约翰为首，大多数主要的贵族都倾向于热那亚；但一个重要的派系，以在战争爆发时正担任摄政的雅法的约翰为首，却倾向于威尼斯人。后者还发动了一次摄政权更替行动，请来了塞浦

路斯的幼主于格二世，而于格的母亲普莱桑斯由此掌握了政权，并让当局倒向了威尼斯人。这场战争直到1258年6月才告终结；这一年，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派出大规模舰队进行了一场大海战，结果热那亚人的大帆船损失过半，约1700人死亡或被俘。此后热那亚人决定放弃阿卡，将势力集中在泰尔；威尼斯人则占了他们原有的部分街区，并围着新占地盘修了一道城墙，其残垣断壁到今天还能瞥见若干。

黎凡特贸易模式的变化还意味着，经过沿海基督教港口的商品量大幅减少，因此导致的财政紧张迹象很快凸显。在13世纪50年代末，西顿领主尤里安开始将自己的部分领地分给条顿骑士团。1260年，他又把剩下的领主权租给了圣殿骑士团。敢于这么做说明他是个大胆的赌徒，但他确实也是出于无奈。他的领地在穆斯林手中确实损失惨重，而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似乎是艾因扎鲁特战役之前蒙古人发动的一次劫掠；这次劫掠渗入了西顿城内，毁坏了城墙，而他无力维修。1261年，阿尔苏夫的巴里安把他的领主权租给了医院骑士团。考虑到加固工事和布防驻军的高昂费用，这么多领主坚守自己的领地这么长时间实在让人有些惊讶；不过，正如蒂博博士（Dr Tibble）指出的，西顿和阿尔苏夫脱手了，仅仅说明这两地的领主权还有足够的资产作为支撑，还能够吸引潜在的占领者来接手而已。

240

## 马穆鲁克王朝的征服

一等苏丹拜巴尔确立了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地区的控制，他就开始系统地削减掌握在基督徒手中的土地。与萨拉丁一样，他是一名外来者，是奇普恰克突厥人；但与萨拉丁不同的是，他并不出自传统的伊斯兰领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始终像是一名突厥的战争领袖。他诡计多端，残酷无情，但却是一名极好的管理者和一位绝佳的统帅，比萨拉丁当年还出色得多。他对重新

征服沿海地带采取了有条不紊的步骤，这让他的继承者们能够在此基础上把西方人彻底赶出去。他的征服以 1263 年一场突入加利利的毁灭性劫掠拉开序幕；在这次进军中，他毁掉了拿撒勒大教堂。1265 年，他夺取了凯撒里亚和阿尔苏夫，并一度占领海法。1266 年，他占领了圣殿骑士团的采法特；1268 年，取得雅法、圣殿骑士团的博福，以及安条克城；1271 年，夺取圣殿骑士团的萨菲塔、医院骑士团的骑士堡以及条顿骑士团的蒙福特。他于 1277 年 6 月 30 日去世时，拉丁定居者的地盘已经局限在了从阿特利特到马卡布的一条狭长海岸地带，以及一块在更北的拉塔基亚的飞地。他发动的战役也并非一律都是毁灭性的。他似乎一方面注意不让欧洲人在他已经征服的海岸地带轻易建立桥头堡，另一方面也关注要为埃及的船只提供自 1197 年以来就被剥夺了的停靠取水的补给地点。阿尔苏夫、凯撒里亚、安条克和蒙福特都部分或完全被毁，但雅法得以幸免。阿尔苏夫和凯撒里亚领地中的领土被分给了他手下的埃米尔们，他还在卡昆堡设立了一个管理中心，但其间的乡野地带以及沿海地区则被放弃，任由游牧部落占领。骑士堡、博福和采法特得到修葺并重新驻军，胡宁（Hunin）和托伦也是如此。一圈要塞如今像一个收紧的索套一般围住了阿卡，但拜巴尔似乎从来没认真打算过要夺取这座城市本身。他对该城市发动了几次侵袭，但其实这些都仅仅是心血来潮想洗劫一把而已。如果他真要采取军事行动，肯定会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准备。他似乎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帝国的繁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卡作为一个商品转运口的地位。因此，他可能不太愿意冒着危及自己大片领土的经济状况的风险，贸然发动一次袭击。

##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定居点被毁

围绕着要对他们的敌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定居者们产生了分歧。安条克一的黎波里的博希蒙德六世在 1252 年继承了博希蒙德五世之位。他与自己

的岳父西里西亚美尼亚的海顿一道，寻求与蒙古人结盟，并在1260年3月与蒙古军队一同进入了大马士革。因为此项举措，他得以扩张自己在叙利亚的领土。另一方面，阿卡当局认为（可能他们是对的），对于蒙古人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抵制，因此他们允许马穆鲁克苏丹古突兹在艾因扎鲁特战役发生前的三天驻扎在阿卡城外，还为他的军队提供了给养。即使是在耶路撒冷王国内部，各块封地也是各行其是。在13世纪50年代，雅法的约翰似乎没有让自己的伯国加入与大马士革签署的一项停火协议，好让自己能对来自那里的穆斯林发动一系列的劫掠。1261年和1263年，他与贝鲁特的约翰以及医院骑士团管辖的阿尔苏夫一道，与拜巴尔议和，他甚至还准备把雅法作为一个补给点提供给埃及的陆军。1269年，贝鲁特的伊莎贝拉与拜巴尔独立缔约，这让她能够在1275年违背国王对她提出的“结婚的义务”。苏丹卡拉万在1279年反叛了马穆鲁克王室而自立，圣殿骑士团在1282年和1283年、泰尔的玛格丽特在1285年都与他独立签订了条约。当然，这些领主是在行使自己作为边疆领主的独立权，但与穆斯林缔结了如此多独立的条约，也说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已经薄弱到了何种程度。

事实上，拉丁定居点已经毫无希望地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的黎波里伯国内部分裂为几派，其中一派由意大利移民组成，被称为“罗马派”，是由博希蒙德五世的妻子瑟尼的卢西安娜（Lucienne of Segni）——教皇英诺森三世的侄孙女发起的，并由她的兄弟的黎波里主教保罗领导。在她的儿子博希蒙德六世统治期间，这个派系的影响力逐渐增大。1277年，博希蒙德七世从西里西亚前来接任时，发现自己的统治受到了这个派系及圣殿骑士团的抵制。不久，朱拜勒领主居伊·恩布里亚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之所以起异心是因为博希蒙德七世拒绝让他的一个兄弟与当地一名女继承人成婚。在六年的时间里，整个伯国陷入了一场内战，直到博希蒙德七世把朱拜勒的居伊、他的兄弟鲍德温和约翰，以及一个名叫威廉的亲属，关在一个坑洞里活活饿死后，这场争斗才告结束。

塞浦路斯的于格三世（安条克—吕西尼昂的于格）在1269年登上耶路撒

冷的王位（他是自 1186 年鲍德温五世以来，这条王室血脉中唯一一位真正在当地统治的国王），也同样遇到挑战。他姑姑辈的人物安条克的玛丽亚是耶路撒冷的伊莎贝拉的孙女，她声称自己作为约兰德（最后一位真正待在东方的统治者）最近的继承人，对王位享有继承权。玛丽亚的继承要求在法律上其实比于格的更有力，但高等法庭在集体决定到底要向谁尽忠而产生冲突时，却似乎更倾向于忽略这种法律支持而青睐那位已经是塞浦路斯国王的年轻人。玛丽亚向罗马申诉，这个案件在 1272 年当庭听审。在圣殿骑士团的建议下，玛丽亚提出把耶路撒冷王国卖给安茹的查理，这其中可能也得到了教皇的支持。1276 年这个案子从罗马教廷撤回，1277 年 3 月与查理的王位交易完成。

与此同时，于格三世发现要治理耶路撒冷王国余下的领土几乎根本不可能。他试图行使权威。他可能坚持自己的法庭对意大利区块之外的涉及意大利人财产的案件具有处置权。他决心不自动认可在之前的摄政统治期间赐予这些外来人的封地或部分王室土地。甚至还有迹象表明，其行政治理措施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内院法庭，他还使用了私人印玺来进行裁决。但在推进这一切的同时，他却遭遇了种种不臣服的行为，比如贝鲁特的伊莎贝拉就拒绝履行“结婚的义务”；而圣殿骑士团也表现出敌意，他们的新任大团长博热的威廉与法国王室有亲缘关系，因此也就当然和安茹的查理有联系。于格必定知道，查理此时在地中海东部的势力令人生畏，正准备强调其对王位的权利，还得到了教廷、圣殿骑士团以及威尼斯人的支持；而且更为重要的一股支持他的力量是驻扎在王国的法国兵团，自从他们 1254 年驻扎在阿卡以来，王国已经越来越依赖于这股力量，而他们的领导人也得到了王国的官位头衔，融入了这里的政治版图。对许多定居者来说，查理的力量似乎在于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生命线，而且或许教廷也是这么看待的。

1276 年 10 月，于格突然离开了巴勒斯坦，声称这个王国根本无法治理。11 个月后，在 1277 年 9 月，安茹的查理派出的总督塞奎里诺的罗杰（Roger of San Severino）抵达这里，宣称代表自己的主子行使统治权。这本来也可能遭遇腓特烈二世曾遭遇过的根据法律和习俗提出的不服申诉，何

况罗杰还威胁要流放敢于反对他的封建领主，并剥夺他们的财产。但结果是，耶路撒冷的领主们没怎么反抗，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罗马是怎么想的。曾产生过杰出的治理理论，并曾进行过顽强抗争的领主运动，就这样无疾而终。

耶路撒冷王国如今成了一个东地中海帝国的一部分，人们可以指望这个帝国拥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它。查理似乎也承担起了供养在阿卡的法国兵团的责任。但安茹政府也不是处处都受欢迎，1277至1286年间，基督徒控制的巴勒斯坦比以前更加分裂。泰尔的约翰和贝鲁特的伊莎贝拉都自行其是。希望收复王国的国王于格三世在1279年和1284年到访阿卡，在1283年到访贝鲁特。但1284年5月4日他在阿卡过世，继承他的首先是他的长子约翰。约翰一年后也去世了，其后接任的是于格的二儿子亨利。与此同时，西西里晚祷战争爆发，接着查理去世，安茹帝国开始崩溃。圣地的舆论风向再次倒向塞浦路斯王室，而它也得到了新任法国国王的强力支持。因为菲利普四世出于现实考虑，决定抛弃安茹家族转而支持塞浦路斯的吕西尼昂家族，并继续为法国兵团提供资助。1286年6月4日，塞浦路斯的国王亨利登陆阿卡，8月15日他在泰尔大教堂加冕，这座教堂已经成为国王的固定加冕场所。整个宫廷返回阿卡进行了一场为期14天的宴饮、游艺和表演活动，演出场景包括圆桌骑士的故事，以及出自《特洛伊罗曼史》(*Romance of Troy*)中的芬梅涅王后(Queen of Femenie)的传说。

243

这是阿卡举行的最后一次节庆活动，因为接下来马穆鲁克人又开始推进。1285年，医院骑士团宏伟的城堡马卡布和马拉奇亚(Maraqiyah/Marachea)市镇均告陷落。1287年，拉塔基亚被夺走。1289年，多年来一直支持着的黎波里伯国内部异见分子的苏丹卡拉万开始向的黎波里进军，而这个伯国此时仍然因内战的影响而闹得四分五裂。博希蒙德七世已于1287年10月19日去世，他的姐妹露西因为自己的继承权受到一个由热那亚人支持的公社群体的强烈反对，在经过了漫长的谈判之后，不久前才刚获得认可。的黎波里围攻战开始时，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都弃城而去，穆斯林在26日发动的一场大规模进攻没有遇到多少有组织的抵抗。国王亨利的弟弟阿马尔利克从塞浦路斯

带着若干增援力量前来，这位女伯爵随他一同逃离，但大多数守军遭到屠戮。马穆鲁克人的军队又继续前行占领了恩菲（Enfeh）和巴特伦（Batroun）。伯国仅余的领土是北方的圣殿骑士团要塞塔尔图斯和由安条克的约翰控制着的朱拜勒。约翰娶了朱拜勒领主的女儿，因此控制着该地。他和朱拜勒的拉丁居民们获准在穆斯林的监管下留在该地，可能一直待到1302年。

阿卡的基督徒们急忙向西方求援。20艘威尼斯的和5艘阿拉贡的大帆船带着一支由意大利北方十字军战士组成的差强人意的援军，在1290年8月抵达。拉丁人和卡拉万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停火协定，但意大利的十字军引发骚乱，屠杀了几名到阿卡城卖土产的穆斯林农民，这让卡拉万有了撕毁停火协定的正当理由。卡拉万在11月4日去世，但他的儿子阿什拉夫·哈里里继续准备进攻。1291年3月，他的军队从埃及出发，途中不断有来自马穆鲁克人其他领地的军团加入。4月5日，一支带着惊人的攻城设备的庞大军队来到阿卡城下。到5月8日时，外城的防卫工事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只能放弃。18日，一场大总攻决定性地战胜了守城的力量。国王亨利在4日抵达该城，城被攻破后他和弟弟阿马尔利克乘船逃往塞浦路斯，同行的还有若干贵族及其家人，但大部分基督徒没能逃过这次劫难。到傍晚时分，阿卡城中仍然还在基督徒手中的是圣殿骑士团位于海边的修道院要塞。骑士团守军本来打算议和投降，但当穆斯林开始骚扰前来寻求避难的基督教妇女和儿童时，谈判破裂。马穆鲁克人用土雷炸修道院；28日，修道院坍塌，守军和进攻的军队一同被埋。

泰尔早在5月19日就被放弃。6月底，西顿被夺取，但其海边城堡坚持到了7月14日。贝鲁特在7月31日投降。圣殿骑士团分别在8月3日和14日撤出塔尔图斯和阿特利特。圣殿骑士团在塔尔图斯沿海的阿尔沃德岛（Arwad，或鲁瓦德 [Ruwad/Ruad]）上的一处要塞支持到了1302年，恩布里亚科在朱拜勒还算是个影子统治者；除此之外，拉丁基督徒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势力已荡然无存。不过，在14世纪时，在穆斯林中间流传着一则流言，称塞浦路斯国王将在夜里悄悄渡海到泰尔，在那里天主大教堂的废墟中静静地举行了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的仪式。



## 第九章

### 十字军运动的多样化（约 1291—1523）

#### 可选择的范围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们对中世纪晚期的十字军运动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急剧的改变。衰落的景象已经被持续活动的景象所取代。教廷还是一如既往地热衷此事，至少是在 14 世纪，几乎没有哪年是不在某地进行某场十字军运动的。一如他们的先辈，充满热情的参与者可以有很多参与选择。维埃纳的安贝尔对参加去加纳利群岛的十字军行动表示出兴趣后，最终于 1345 年参加了土麦那十字军东征。法国的兵马总管约翰·布西考（John Boucicaut）年轻时曾三度参加普鲁士远征（*reysen*）。1365 年，他宣誓参加塞浦路斯国王前往亚历山大城的远征。1390 年，他又宣誓参与克莱芒的路易二世前往马赫迪亚的十字军东征；不过法国国王没让他去参加后一次东征，但他又去了普鲁士作为替代。1396 年，他正在前往尼哥波立（*Nicopolis*）<sup>①</sup>的十字军征途上；而在 1400 年前后，他又积极参与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各种行动。兰开斯特公爵亨利·格罗斯蒙特（Henry Grosmont），据说曾前往格拉纳达、普鲁士、罗得岛和塞浦路斯参与十字军征战。事实

---

① 意为胜利之城，位于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地区，由屋大维所建，以纪念他于公元前 31 年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圣经曾提到使徒保罗曾决定在此处过冬，并敦促提多在此与他会合。（提多书 3:12）——译注

上，很多英国贵族和绅士都参与了多次行动，比如其中地位较低的尼古拉斯·萨布拉汉（Nicholas Sabraham）就曾因此去过亚历山大城、匈牙利、君士坦丁堡和内塞伯尔（Nesebür）<sup>①</sup>。乔叟笔下的骑士事业包括在普鲁士、利沃尼亚和俄罗斯的远征，还有在西班牙、埃及和小亚细亚进行的十字军东征；就像一切典型的人物刻画一样，非常接近真实的情况。

在他君主的战事中表现英勇，  
 他南征北战处处都留下行踪，  
 在基督教世界或在异教之邦，  
 他都因为勇气而备受颂扬。  
 攻下亚历山大城时他在场；  
 他在普鲁士的多次庆功宴上，  
 比各国骑士优先，坐上了首席；  
 与身份同他一样的基督徒比，  
 他在立陶宛（利沃尼亚）、罗斯（俄罗斯）战功最大；  
 在赫尔纳德（格拉纳达）围攻阿尔赫齐尔（阿尔赫西拉斯）他也  
 参加，  
 并且驰骋在柏尔马耶（摩洛哥）作战；  
 他与人一起把萨塔尔耶（安塔利亚）攻占，  
 也把雷耶斯（阿亚斯）攻克；在地中海上  
 他率领大批高贵的战士出航。<sup>②</sup>

246

以前人们认为对十字军的兴趣此时越来越局限于贵族和职业士兵阶层，他们依据已经发展完善的骑士准则来行动，其中十字军的理念也有着很重要

① 保加利亚黑海沿岸的海滨古镇。——译注

② 译文参见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黄杲斫译，译林出版社，1997年，第5页。括号内为译者所加。——译注

的作用。但15世纪时对农民十字军战士的成功招募说明，大众对此还是有感觉的，而且还表达了出来。但更加传统老式的十字军队伍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职业化”（如果我们可以采用这个词的话），因为凭借着对雇佣兵和服务契约的运用，他们变得更加有纪律；而使这一切变得可能的是通过向教会征税而募得的大量资金，虽然西方的国王们为了染指这些钱常常会发一些虚假的声明。

不过，尽管农民十字军再次出现，我们还是可以在15世纪察觉到衰落的迹象。欧洲政治的错综复杂，尤其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乱象，让他们根本不可能一致对抗土耳其人。在并不处于对抗穆斯林前线的那部分西方世界中，倦怠、士气衰退和明显的热情消亡迹象已经出现。

### 十字军理论家

十字军运动在出现灾难时反而兴盛，因此，很典型的是，当阿卡陷落的消息传来后，人们的狂热情绪再次复苏。1300年，一则流言传遍了西欧，据说蒙古人征服了巴勒斯坦，把它交还给了基督徒。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把“这伟大而令人欣悦的消息”告知了英格兰的爱德华，可能还有法国的菲利普。他鼓励虔信者立刻前往圣地，他还命令流亡的天主教主教们返回他们的教区驻地。在欧洲各地，人们连忙宣誓接受十字架。在热那亚，有几位女士变卖自己的珠宝帮助筹建一支十字军舰队，不过最终这项计划流产了。

阿卡的陷落还激发了一批为十字军勾勒行动计划的作品的出现，这股潮流在整个14世纪时不时涌现。作者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此时必须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因为如今的情况不再是巩固桥头堡了，而是要组织一次全面的进攻。让军队从陆上经北非一路进军，那么再征服运动就能带来耶路撒冷的解放；这种古老的西班牙理论此时又得到了运用。有些作者受到了这样一种观点的吸引：与黎凡特之外的某股强大力量结盟共同抗敌，尤其

是与蒙古人。而这就激发了一系列与侧翼包抄伊斯兰势力相关的想法，并最终使得葡萄牙人和埃及舰队在印度洋上发生争斗，而西方开始探索一条通往印度群岛的路线。

247 有四种提案在阿卡陷落前夕已经在流传，之后又不断被提及。第一种建议是，各个骑士团应该联合起来重组为一个超级骑士团。当圣殿骑士团遭到镇压，其财产被转授给医院骑士团时，这个计划就部分地实现了。第二种与第一种相关联，但关注的是未来耶路撒冷王国的治理。一群理论家提出了“武士王”（*Bellator Rex*）的观念，即某个骑士团的团长将发动十字军圣战，随后将统治耶路撒冷。对其中的一位理论家彼得·杜波依斯（*Peter Dubois*）来说，这个职位应该始终由法国国王的一个儿子来担当。而这种梦想在将塞浦路斯的总理和督导之位交给法国的查理六世和梅济耶尔的菲利普（*Philip of Mézières*）的设想中达到顶峰。菲利普出自一个新的骑士团耶稣受难新教会（*Nova Religio Passionis Jhesu Christi*），其成员都要宣誓遵道安贫，但他们不要求独身，而是要求忠于婚姻，因为他们要负责垦殖、统治和捍卫圣地。在 1390 至 1395 年间，菲利普一边不知疲倦地力求让英格兰和法兰西和解，一边成功地募得了超过 80 名贵族的支持，尤其是在英格兰和法兰西，但也包括在苏格兰、德意志、西班牙和伦巴第。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克莱芒的路易二世和约翰·布西考。第三种建议基于这样一种确信，即如果能抵制与埃及（最富有的伊斯兰国度，也是此时巴勒斯坦的占领者）的贸易，让其经济力量遭到破坏，那么穆斯林抵抗进攻的能力就会大为削弱。第四种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十字军行动，即普遍性征战（*passagium generale*）——传统的国际性的宏大远征，以及特殊性征战（*passagium particulare*）——小规模的准备性的进攻，目的在于增强贸易禁运的强度、削弱敌人或达到其他特定的目的。令人瞩目的是，这些观点竟如此深刻地付诸了实践。在普鲁士和罗得岛，骑士团国家都得以建立，分别由条顿骑士团和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团长统治。对埃及的贸易禁运也确实进行了，特殊性征战也的确进行过很多次。

## 圣殿骑士团的瓦解

第一个骑士团国家建立之时，刚好就在中世纪晚期历史上最轰动的事件之一发生后。1307年10月3日清晨，在法国的几乎每一位圣殿骑士都被逮捕，罪名是被指控为异端。没过几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大团长莫莱的詹姆斯（James of Molay）以及他在西北欧的总代表派劳的于格（Hugh of Pairaud）都承认了他们的罪行。大多数被宗教裁判所、被教皇于1308年夏在普瓦捷审判，以及被各个法国主教在各地宗教裁判所和一个设在巴黎的教廷委员会审判的其他骑士团成员，也承认了上述指控。在其他地方，如在意大利半岛的许多地区受审的少数骑士团成员，提供了更多的证词。在不列颠，承认指控罪名的成员极少，但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证言还在不断出现。在卡斯蒂利亚、葡萄牙和塞浦路斯，以及在阿拉贡和德意志，少数骑士团成员拒绝被捕，坚持自己的清白。

248

针对圣殿骑士团的指控中，有些实在古怪至极。有指控称，他们积极地以不像基督徒的方式活动。在入团仪式上，他们被要求否认基督（有时他们会被告知基督只是一名无法救赎人类的假先知），并对着十字架吐口水，践踏它或是在上面小便。他们不相信教堂的圣事，他们的神父在主持弥撒的感恩经中被禁止说祝圣词。与此同时，他们尊崇各种各样的首级或偶像（甚或是恶猫），而他们习惯佩戴的饰带在拿给他们之前都曾在某个首级或偶像上放置过。他们极隐秘地掩盖了自己的不虔诚，他们不准告知外人自己的入团礼、他们在教堂内进行的辩论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团规，而且只能向本团内部的神父告解。他们的欺世盗名还体现在，虽然他们的长官都是在俗人士，却习惯于赦免本团成员的罪责，篡夺了神父的神圣角色和教会法赋予的职责。在入团仪式上，他们迫使妓女亲吻新入团者或被他们亲吻；不仅亲嘴，还要亲裸露的胃部、大腿根部，甚至生殖器。新入团者被告知，虽然他们许下的独身誓言规定他们不能与女人发生性关系，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与同团弟兄发生关系；且如果有弟兄需要的话，他们应该承受。他们没有见

期。他们被鼓励可以不考虑公正就拍卖骑士团的商品；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救济穷人方面非常吝啬，一点也不乐善好施。团中的长官们也毫不作为，不图改革骑士团。

对教皇克莱芒五世来说，逮捕这些骑士是对教会的攻击，是前所未有的对神学正义的宗教信仰的否定，如果被逮捕的骑士还是处在教皇保护下的一个武装修会的成员就更是如此。但他的处境非常微妙。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任期才刚结束四年，而他逝世的原因是被由法国王室的一名大臣率领的军队绑架而受到了惊吓。此后几年，教廷一直在试图安抚法国，但克莱芒是加斯科涅人，因此生来就是英格兰国王管辖的一名讲法语的臣民。他还必须不断与法国政府抗争，因为他们一直决心要让卜尼法斯在死后受到各种污名的谴责。因此，罗马看来非常不安全，克莱芒在1305年6月当选后一直住在普瓦捷，随后在1309年将教廷迁往阿维尼翁。与此同时，在圣殿骑士团的案子上，他试图掌握主动，于是设立了一个教会官方的裁判所来调查此事。1307年11月，他下令逮捕法国境外所有的圣殿骑士团成员。次年2月，他命令法国的宗教裁判所暂停所有活动，尽管这导致了与法国王室的冲突。最后达成的妥协是，法国教会负责调查某些个人，而教庭将派专人同时调查整个骑士团的情况。1311年，这些调查和专员审查的报告由一个维也纳委员会进行审查。虽然委员会大多数人希望圣殿骑士们至少自己可以出席听审，但迫于法国的压力，克莱芒在1312年4月3日镇压了骑士团。1314年3月18日，圣殿骑士团在诺曼底的长官莫莱的詹姆斯和沙尔内的若弗雷（Geoffrey of Charney）虽然推翻了之前承认的一切罪行，但还是被烧死了。

249

圣殿骑士团的毁灭可以作为一个绝佳的例子，展示了新生的民族国家机器在缺乏现金且找到了富有的猎物时能怎样控制宗教裁判所的行动，而教廷却只能处于守势。大多数圣殿骑士团成员都遭受了折磨。所有被逮捕的成员都承受了各种各样的压力。1310年，有一部分人试图反抗的行为很快被扼杀。当时，在王室的影响下，一个由桑斯大主教主持的法国教会法庭和一

个由兰斯大主教主持的教省法庭，烧死了 67 名坚称自己无罪的圣殿骑士团弟兄。很少有历史学家会相信圣殿骑士团真的犯下了他们被指控的那些罪行，尽管大多数对他们的指控都是诬陷，但在对他们的修会文献进行了仔细研读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某些管区，确实有一些新入团员被迫否认基督，并在刚入团或之后不久要被迫在十字架上撒尿。这种行为可能出现在法国的少数管区和少数人身上，但也不仅局限于这些地方和这些人。似乎一些相信这些要求已成惯例的成员又把这些仪式带到了意大利和黎凡特，而在这两个地方的圣殿骑士团中都有大量法国人。另一方面，德意志似乎没有这种情况，伊比利亚半岛（包括鲁西永）也没有，可能不列颠诸岛同样没有。

为什么这么奇怪的行为会悄然出现在教会下属的一个这么庞大而强有力的骑士团里？要做出解释非常难。但不能否认的是，对圣殿骑士团的调查表明，这个团已经变得多么需要改革和重组。医院骑士团的管区设定更小，因此有更多的高级长官，他们与东方有直接和常规的联系，而总代表们同时也是立法者，他们的法律体系也更具有统一性，选举时欧洲代表的比重也更大。相比之下，圣殿骑士团却一直保留着一种过时的、低效的体系，由大团长和他的总部实施独裁统治。其团规甚至从来没有当着众多骑士团成员的面宣读过，不过，即便团员们能读到，也不能指望他们能理解其他各种补充立法。所有这些法条都被统合编入了一本被称为《撤回》(*retraits*)的集子里，其中充满了重复、含混之处，常常显得陈旧，而且在法令、判例法和习惯法之间完全不加区分。因此毫不奇怪，它常常没有得到遵守。这个武装修会的状况已经变得如此糟糕，不管有没有这次丑闻爆出，都让人不由得好奇，它到底能被允许存在多久。

250

圣殿骑士团陷入了混乱状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阿卡陷落后它似乎就陷入了无所作为的瘫痪状态，尤其是在阿尔沃德岛于 1302 年失去之后。这个岛是它布防已久的，离叙利亚海岸只有一步之遥。而其最后一仗打得并不光彩。骑士团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全体大会上，法国的大首领维莱的热拉尔德

(Gerald of Villers) 受到指责，称他应对该岛的沦陷负责。大约在 1297 年时，骑士团采取了一些举措，当时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全体大会命令派 300 名成员前往塞浦路斯，但英格兰巡视官索罗德比的托马斯 (Thomas of Thoroldeby，据说是骑士团在东方的旗手) 却严厉抨击自己的同僚们没能密切联系其他基督教力量，共同对叙利亚沿海发动进攻。人们能感觉到，士气正在日益低落。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就说明这个骑士团的领导序列不够有力，无法再次凝聚人气。

在当时，受到严厉批评的不仅是圣殿骑士团。所有三个在东方活跃的骑士团都因那里的形势发生逆转而受到指责。将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合并的建议早在 1274 年的里昂大公会议上就已经提出。到 1291 年时，这些建议已经越来越具有说服力，能够说动教皇尼古拉四世下令在所有教省会议上加以讨论。条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必定觉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各种严厉的指控开始指向它们。在利沃尼亚，条顿骑士团无法像在普鲁士那样控制这里的教士，于是教士们对骑士团的种种行为发出了更为严厉的指责，包括骑士团剥削教会，残忍对待里加的大主教及市民，阻碍传教工作（这项指责不是第一次提出，人们指责骑士团过于残忍，结果让异教徒感到疏远不安全），而且内部存在腐败行为。到 1300 年时，教廷开始关注这些声明。1310 年，教皇克莱芒下令彻查相关情况，尤其是对骑士们联合异教徒对抗基督徒同伴的指控。条顿骑士团始终没能摆脱利沃尼亚的丑闻，1324 年教会颁布的最终教令对他们颇多指责。

251 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处境也不妙。尽管事实上在法国的菲利普准备解散圣殿骑士团的同时，他正在支持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团长领导的一次十字军行动。14 世纪期间，教皇们不断提出要求，要这个骑士团进行改革（1355 年，教皇英诺森六世甚至动作更大，威胁说如果他们不进行必要的变革，他就要亲自对骑士团进行改革），而 14 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的内部调查揭示出的状况也很不令人满意。虽然如此，这两个骑士团却都存活了下来。我们甚至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表明两团的招募工作出现了萎缩。这其中的一个重要



原因似乎是，这两个团一直都致力于照顾穷人和病人，因此虽然是个“军事”修会，但也一直谨守传统的宗教生活和思维模式。凭借对穷苦朝圣者的现实关注，它们可以援引古老的基督教慈善传统，而这却是圣殿骑士团不具备的。关于这一点，莫莱的詹姆斯本人也曾无意识地强调过。1305年，在一份备忘录中，他表示反对与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合并，他写道，医院骑士团“是为照顾病患而建立的”（除此之外它还参加武装行动），但圣殿骑士团“完全是作为一个骑士团体而建立的”。此外，从短期来看，条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都认为，人们必须要看到它们正在积极地行动。并非巧合的是，在同一年的1309年，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将驻地设在了普鲁士的马林堡（Marienburg，即马尔堡 [Malbork]），而医院骑士团则把总部迁到了罗得岛。

### 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

为了解条顿骑士团为什么迁移驻地，我们必须先就波罗的海地区持续进行的十字军运动做些介绍。当然，这里的运动并不仅仅由条顿骑士团承担。在遥远的北方，在天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之间处于芬兰的边境地带，局势非常不稳定。14世纪20年代，对十字军运动的热情普遍高涨，在瑞典和挪威发起了一场旨在保护天主教徒免受东正教裂教者之害的运动。1323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宣布在挪威发动一场十字军运动。尽管与诺夫哥罗德公国的战斗在14世纪30年代平息，但瑞典和挪威国王马格努斯在其表兄弟圣布里吉特（十字军运动的一名狂热推动者）影响下，在14世纪40年代再次发起了十字军运动。他在1348年率领一支十字军前往芬兰，可惜没取得什么成绩。1350年，他再次出征。次年，另一场十字军行动也以教皇的名义发动。但这次远征并没有实现，1356年国内发生政治动乱，马格努斯的十字军野心只得暂时搁置。挪威和瑞典此后落入外族统治者手中长达一个世

纪，这些统治者至少摒弃了教皇试图针对俄罗斯人发动的两次新的十字军传道运动，一次在 1378 年，一次在 1496 年。

252 在更南部的地区，十字军运动必须应对蒙古人的到来，以及强大的立陶宛国家的崛起：一个名叫名都（Mindoug）的大公崛起，他在 1263 年去世之前统一了自己的族群——一群由骑马的武士统治的农民，组成了一个强大且相对比较繁荣的国家。名都接受了洗礼，有一小段时间还公开宣称皈依基督教，甚至还从教皇英诺森四世那里接受了一顶王冠；但是自利沃尼亚的基督徒在杜尔贝战役中被击败后，他又重归异教。立陶宛是个异教社会，实施扩张主义和激进武力政策。其邻国之一的波兰，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无主状态之后，于 1320 年再次由一位国王完成统一。波兰坚定地致力于十字军运动，尽管它也不断与条顿骑士团发生摩擦。波兰的关注重点是乌克兰北部，它在那里发动了针对立陶宛人和蒙古人的战役；而针对后者的行动，最后因后者被黑死病消灭而告终。在 14 世纪，波兰经常收到教皇发动十字军的手谕，匈牙利人也是如此，他们也深涉其中。

这就是条顿骑士团所处的舞台，也是它决定集中力量的场所。我们应该还记得，在 1226 年，它的团长已经得到正式确认可以在普鲁士拥有一块边疆伯爵领地，而且还从西方皇帝那里获得了一个帝国王公的头衔。在阿卡陷落之后，它把总部移到了威尼斯，正处在巴勒斯坦和波罗的海的中途地带。但在 1309 年 9 月，大团长福伊希特旺根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 of Feuchtwangen）把驻地设在了普鲁士西部的马林堡，这里从此之后就成为了他的骑士团的核心修道院要塞。当然，他来到的是这个骑士团涉入最深的地区，但同时他接触到的也是一群因为利沃尼亚丑闻而弄得四分五裂且士气低落的成员。他的前任霍恩洛厄的戈特弗里德（Gottfried of Hohenlohe）在 1302 年试图让成员们更严格地遵循会规，但却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并因此不得不被迫下台。条顿骑士团面对此时的困境，采取的策略是，缩减撤入它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本营，扩张并加强对自己掌握的半自治国家的权威；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十字军行动，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十字军战士来参与它发动

的小规模战斗。在总部迁移之前，1308至1309年，它采用铁腕政策兼并了东波美拉尼亚和格但斯克。在利沃尼亚（在这里他们必须与三位主教分享权威）和爱沙尼亚（这里的骑士阶层非常强大），条顿骑士团确立了一个半独立的政权：在1438年之后，利沃尼亚的成员可以有效地选举自己的团长。另一方面在普鲁士，它控制了世俗教众，并以管理封地以及鼓励农民到这个由于众多大地主被消灭而产生乡村权力真空的地区定居的方式，建立了运转有效的经济体。教皇们始终对它的动机充满怀疑，但由于它自身拥有发动长期十字军运动的授权，并不需要仰仗教皇的权威来每次授予它免罪权，因此，它可以自行招募世俗骑士来短期与其一道并肩战斗。

在整个14世纪，来自欧洲各地的十字军骑士们来到这里参加条顿骑士团的战役（被称为 *reysen*），其形式是从边境的荒野地带发动突袭，攻入立陶宛人的定居点。例如，波西米亚人1323年与他们一道行动；阿尔萨斯人1324年与他们一道行动；英格兰人和瓦隆人（Walloons）<sup>①</sup>在1329年；奥地利人和法国人在1336年。波西米亚的约翰来了这里三次，约翰·布西考和荷兰伯爵威廉四世也是如此。兰开斯特的亨利在1352年去过。德比的亨利，也就是未来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在1390年和1392年两次前往。1377年，奥地利公爵阿尔伯特带着2000名骑士要来“与异教徒共舞”。次年，洛林公爵带着70名骑士加入了冬季的征战。此后不久，奥地利的阿尔伯特又来了，这次是和克里夫伯爵一道参加了一次特意为他们开启的征战，以便他们能在圣诞节前履行自己誓言。在1383至1400年间，格尔德兰（Guelderland）伯爵威廉一世七次来到这里。

冬季征战是骑士攻袭战，队伍大约在200至2000人之间，目的仅仅是尽可能快地蹂躏一个特定的地区。这种行动通常一年会进行两次，一次在12月，另一次在1月或者2月，中间的断档则是圣诞宴饮的时间。夏季征战的规模通常更大，目的是摧毁敌人的一个要塞或建立基督教的一个要塞

① 高卢罗马人与日耳曼法兰克人的后代，主要居住在今比利时境内。——译注

从而扩展领土，尽管劫掠也是其特征之一。这些征战其实有点类似于体育运动，就像今天的马术运动一样要受制于天气状况。参加了这些行动的人有权利在自己的盾牌上画上纹章，并留在马林堡、科尼斯堡或其他要塞。有时是在征战前，有时是在征战后，会在马林堡举行一场庄严的宴会；会上会设一张荣誉之桌，供出席的最显赫的 10 到 12 名骑士就座。1375 年，把这项骑士仪式发扬到至为光大的大团长科尼普罗德的翁里希（Winrich of Kniprode），为 12 位在荣誉之桌就座的骑士每人授予了一根绶带，上面写着金色的“*Honneur vaint tout*”<sup>①</sup>。一个由普瓦图人组成的骑士团蒂耶尔瑟莱骑士团（Order of Tiercelet），还特意为自己一名参加征战的成员举行了一场授予团徽（镀金的鹰爪）的仪式。

如果不是因为其残忍的性质以及困苦的情况，我们可能会禁不住想要把这种征战描写为一种为欧洲贵族准备的成套十字军服务。而其受欢迎程度也说明，如果这种服务被冠以骑士主义之名的话，将具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但这是由于存在着与异教接壤的边境，以及一股能够一直被描述为充满敌意的异教敌人。然而在 1386 年，这些正当理由都不复存在了。这一年，立陶宛大公亚盖洛接受了洗礼，在克拉科夫迎娶波兰女王雅德薇嘉，成为波兰的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在这次王朝联姻之后，基督教在立陶宛的进展仍然很缓慢，但立陶宛人毕竟现在是在受基督徒管辖。此外，这次联姻的条件之一是亚盖洛会为波兰收复东波美拉尼亚和库尔梅兰。在 1410 年 7 月 15 日的坦能堡（Tannenberg，即格伦瓦尔德 [Grunwald]）战役中，条顿骑士团的军队被一支波兰和立陶宛联军（也包括了捷克人、摩拉维亚人、瓦拉几亚人和克里木蒙古雇佣兵）击败。大团长、主要的官员以及大约 400 名成员战死沙场。马林堡守住了，而在 1411 年 2 月 1 日签署的第一次《索伦和约》，也使得骑士团保住了自己大部分的领土。但它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股强大的势力了，这其中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臣民中间暗中积聚的不满的声音已经开

① 法语，意为“荣誉战胜一切”。——译注

始浮出水面。这些德意志人、普鲁士人和波兰人正在渐渐失去各自的独立身份，而自觉地融合成一个普鲁士社会。这些士绅和市民开始联合起来，在骑士团试图铁血地重新加强控制之时保护自己的利益。15世纪50年代，这个联合体摒弃了骑士团的宗主权，转而投向波兰。

普鲁士在1414年、1422年和1431至1433年数次被入侵的军队蹂躏，最终在1466年10月19日签署的第二次《索伦和约》中被瓜分。这一条约也宣告了与波兰的13年战争终结。最终，条顿骑士团失去了马林堡，仅保有东部普鲁士，并且是作为波兰的封地。尽管骑士团在普鲁士还存续到了1525年、在利沃尼亚存续到了1562年，但波罗的海沿岸的十字军运动就此画上了句点。“基督教世界的中流砥柱”现在成了波兰；从15世纪开始，它将不得不面对奥斯曼土耳其人。非德意志的十字军前来普鲁士参加最后一次征战似乎是在1413年。在1415至1418年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Constance）上，条顿骑士团向与会的高级教士请求谴责波兰，在会上该骑士团在十字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讨论和捍卫。在利沃尼亚，还有一定数量的骑士参加了对抗俄罗斯人的征战。利沃尼亚的团长普莱腾贝格的沃尔特（Walter of Plettenberg），在俄罗斯人于1501至1502年的一次入侵期间，组织了英勇的抗击活动。但值得重点指出的是，虽然他在罗马的保护人为他多加请求，但他始终没能得到一封发动十字军的手谕：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希望俄罗斯人能够与天主教徒联手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

### 圣约翰骑士团在罗得岛

条顿骑士团利用了其在北方边地的独立地位，非常出色地创立了一种兴盛一时的十字军行动模式，既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又能最大限度地免受教廷的干扰。而医院骑士团的经历则非常不同，他们的任务也更加艰巨。

1306年5月27日，他们的团长维拉雷的富尔克（Fulk of Villaret）在已经将总部迁到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之后，与一位名叫维尼奥罗·德·维尼奥利（Vignolo de'Vignoli）的热那亚海军将领（他声称对多德卡尼群岛有所拥有权）达成一项协议，共同征服罗得岛及其延伸的半岛区域。6月23日，一支由两艘大帆船和四艘其他船只组成的医院骑士团舰队，载着包括35名骑士团成员在内的一支小规模军队，从塞浦路斯出发，与热那亚的帆船队会合后，开始了对罗得岛的入侵。然而，这场战斗比原先预想的花了更长的时间。罗得城可能一直到1309年8月才被攻陷；此后，尽管骑士团的核心修道院要塞立刻就迁往了那里，但整个岛屿要到次年才完全臣服，这还是有赖于一支由维拉雷的富尔克领导的于1310年从意大利驶来的小型十字军的帮助。根据1312年5月2日教皇颁布的谕令《这一个》（*Ad providam*），教皇将圣殿骑士团的大多数地产和财产都授予了医院骑士团。这从长期来看大大壮大了他们的实力，不过他们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占有哪怕其中一部分已经授予他们的土地。1317年，他们付出了大笔赎金才拿到在法国的大部分授予地。在英格兰，直到1338年他们也没有获得完全的所有权。在葡萄牙和阿拉贡，他们欲拿授权地的举动完全失败，那里的国王攫取了圣殿骑士团的资产并创建了新的骑士团——基督骑士团和蒙特萨骑士团。不过，到1324年，医院骑士团的地产已经翻倍，而圣殿骑士团的资产有助于他们增强罗得岛的防御以及积极参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即便如此，征服该岛、布防并在岛上建立行政机制，也让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中央修道院直到14世纪30年代都一直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之后，其财政状况也不怎么乐观；尤其是在14世纪40年代，当主要的佛罗伦萨银行崩溃之后，他们承受了巨大的损失。金钱上的忧虑，有助于解释医院骑士团为什么有动力相对有效地去管理经营他们在欧洲的资产。他们的财政状况，以及罗得岛远比普鲁士处境危险的事实，都促使教廷比对条顿骑士团更频繁地干涉他们的事务。这可能也会让他们常常妒忌条顿骑士团的自由状况。

罗得岛是一个富饶的大岛，接近 50 英里长、20 英里宽，离小亚细亚西南海岸仅 12 英里。它控制着东地中海一条相当重要的航海路线，并有一处良港。岛上本来有大约 1 万名希腊居民，如今又加入了被优厚的土地政策吸引来的西方殖民者。医院骑士团还占据着若干邻近的岛屿，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斯岛。此外，在大陆上，1408 年后，其在博德鲁姆（*Bodrum*）<sup>①</sup> 建起了一座很大的城堡，以取代它失去的士麦那（伊兹密尔）的城堡（后文会提及）。骑士团与希腊居民的关系似乎还不错，但在罗得城的中央地带是静修的团员们居住的封闭区域（*collacchio*，或者说是它的一部分），城中也有大量西欧人口。到 1356 年时这里的布防已经很严密，而且医院骑士团还在不断加强这里的防卫工事以及半岛其他地方的要塞防务。到 15 世纪早期时，罗得岛堪称当时世界上防护最为严密的地方之一，而因此带来的安全感则意味着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它还成为前往圣地的朝圣者们旅途中的一个主要停顿港口。虽然数量上少得多，但就如同在普鲁士的情况一样，一些世俗骑士会前来与骑士团一道战斗；而且就像在马林堡和科尼斯堡一样，他们会把自己的战甲悬挂在罗得岛作为荣誉展示（*maison d'honneur*）。

256

巴勒斯坦的大陆沦陷之后，医院骑士团开始营建自己的海军。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成为它为十字军运动所做贡献的最鲜明特征，因为这会帮助分散在爱琴海各处的基督徒定居点加固防务。因此，实际上它所做的不仅包括海军事务，还有陆上事务。在 1291 年之前，医院骑士团就已经有了若干舰船，但在教廷的催促下，它决定要拥有一些战斗用大帆船。尽管曾在阿卡遭受人力和物资上的损失，但到 1300 年时它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舰队，只不过舰船到底是其自己建造的还是租用的，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这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也说明其领导层有能力就人们对其提出的要求做出回应。在罗得岛上，骑士团的战场当然毫无疑问变成了海洋。它发现自己在保卫各条航运路线，对抗小亚细亚沿海的各个突厥埃米尔国，之后则是对抗奥

① 位于今土耳其爱琴海地区西南部的港口城市。——译注

斯曼土耳其人国度的快速扩张。它的武装帆船在航运路线上巡逻，保护欧洲的商人们，为与突厥人作斗争的航海联盟做出了贡献。它的舰队的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大，最多的时候可能有七或八艘大帆船，不过通常的时候可能只有三艘。划船的是希腊岛屿上的自由民，而不是不可信赖的奴隶。由于每位骑士团成员如果想要当上欧洲某地的长官或是舰队的舰长，就必须参加过三次航海征程（*caravans*）——至少长达六个月的航海远征，因此，每艘大帆船上都搭载有 20 到 30 名野心勃勃的征程参与者（*caravanisti*）。单纯的舰队维护费用相当高昂，因此，从 15 世纪开始，舰队之外还辅有一艘卡拉克帆船（*carrack*）<sup>①</sup>，再之后是加仑帆船（*galleon*）<sup>②</sup>。

罗得岛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防守，特别是针对在大陆上的门特瑟（*Menteshe*，即穆拉 [*Mugla*]) 和艾丁（*Aydin*）两个突厥埃米尔国。这两个国家在 14 世纪上半叶时一直威胁着基督徒们的航运。但医院骑士团的作用并不只是消极防守，它一直是策动十字军行动的一股重要力量，对这个地区所有拉丁定居点的防守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它在攻陷士麦那的战斗中作用显著，对 1344 至 1402 年间该地的防卫也贡献良多；确切地说，从 1374 年开始这里完全由它负责。罗得岛被穆斯林认定是对他们利益的一大威胁，因此，在 1440 年和 1444 年这里都遭到了埃及人的进攻。有关其在基督教世界中享有的盛誉，最震撼人心的证据今天可以在博德鲁姆的英国塔上看到。这座塔位于城郭的东南角上，那里的石头上刻有一排共 26 名英国人的战甲，居中的就是亨利四世及其家族另外 6 名成员的王室战甲。石刻上的人物中至少有 17 名是加特骑士（*Knights of the Garter*）<sup>③</sup>，其上记录的很可能就是对塔的建造做出了贡献的人的名单。该塔大约建于 1414 年。

毫不奇怪的是，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人势力的增长，罗得岛受到的威胁也

① 15 世纪由热那亚人发展起来的一种三桅或四桅商用帆船。——译注

② 一种大型的、多层甲板帆船，主要为 16 至 17 世纪的欧洲国家所采用。——译注

③ 由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仿照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于 1348 年创立的一个贵族兄弟会团体，由国王、威尔士亲王和 24 名骑士组成。入选的标准是他们的骑士精神以及在两年前法国的克雷西战役中表现出的勇气。——译注



增加了。到15世纪70年代末，医院骑士团已经预计迟早将遭到入侵，因此尽其所能地做了应对准备。从1480年5月23日至8月末，奥斯曼土耳其人派出大批军队围攻罗得城，但最后却只落得疲惫不堪、无功而返。这次成功的防卫战为医院骑士团赢得了奇迹般的威望。在法国，国王下令为它演奏《感恩赞》（*Te Deum*），举行欢庆游行，教堂纷纷鸣钟相庆。不到两年时间，一份对这次围攻战的英文记录就问世了——两年后，苏丹巴耶塞特（Bayazid）的弟弟杰姆（Jem）王子逃到了罗得岛，起初成为骑士团的阶下囚，后来又由教廷监禁直到他于1495年去世。这个事件使得人们对医院骑士团的敬意又增添了几分。但是，虽然罗得岛与他们已经征服的土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可在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这样的伟大征服者统治下的奥斯曼苏丹国，是不会容许有这样一个基督教前哨无限期存在下去的。1522年7月，一支由苏莱曼亲自指挥的大规模舰队开始运送军队在罗得岛登陆。到28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炮队已经在轰炸罗得城。这次进攻有着良好的筹划，规模也相当大。在长达数月的炮击、地雷轰炸和进攻之后，城墙已经支撑不住，给养已经不足，当地的希腊居民也已经无心恋战而只想投降。12月8日，大团长利勒亚当的菲利普（Philip of l'Isle Adam）投降。他获准体面地离开，于是在1523年1月1日乘船驶离罗得岛。

### 骑士团国家的特征

骑士团国家由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医院骑士团先在罗得岛然后在马耳他岛发展起来。这是一种新型的非常独特的政体。这是一个神权政体，由一个士兵精英阶层统治。他们都许下了完全献身宗教的誓言，来自这个国度之外，与本土的居民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不过总体来说他们对自己治下民众的态度是和善的。普鲁士分成若干个长官区，其下又进一步划分为瓦尔丹特区（*Waldämter*）和普弗莱杰兰特区（*Pflegerämter*），均由团中成员管理。最高

权威属于大团长和一个包括五名高级长官在内的委员会（Gebietigerrat）。罗得岛或马耳他岛上本来有资格为医院骑士团提供新成员的家族，也被禁止加入其中。

258 一个这样的骑士团国家创建在基督教世界的边境地区，它针对非基督徒邻居们的政策虽然按照基督教的战争理论应该是防御性的，但事实上他们却常常主动挑衅。这反映在条顿骑士团对立陶宛的劫掠，医院骑士团在东地中海的航海征途，以及它们经常采用的科索（*corso*）形式上——一种海上战役的补充行动，类似于获得准许的海盗行为，只是添加了圣战的成分。各种针对穆斯林的实际行动均由一个设在罗得岛（其后在马耳他岛）的特别法庭负责管理，由医院骑士团和其他各方提供资助，而最后获得的战利品的10%要归大团长所有。在1519年一年中，这种科索行动给骑士团带来了47 000杜卡特的收入。它还对罗得岛的经济做出了贡献。不过，科索行动弄来了大量的俘虏，他们不是被囚禁在岛上，就是被卖到别处做奴隶；而这惹怒了奥斯曼当局，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决定要在1522年进攻该岛。

##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王国坐落在罗得岛的东南方向。它由吕西尼昂王朝的统治者们——亨利二世、于格四世、彼得一世、彼得二世、詹姆斯一世、亚努斯、约翰二世、夏洛特和詹姆斯二世——统治着，直到1489年。这一年，由于威尼斯共和国之前耍了一个花招，以共和国的名义收养了塞浦路斯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威尼斯裔王后凯瑟琳·科纳罗（Catherine Cornaro），于是在她和她丈夫及其继承人均去世之后，共和国就继承了塞浦路斯。在这个王国的鼎盛时期，即14世纪上半叶，这里非常繁荣，法马古斯塔城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经由叙利亚北部的一系列较小的港口（尤其是西里西亚的阿亚斯，直到其于1337年被马穆鲁克人占领）与亚洲贸易路线相连。这个岛屿

此时是拉丁东方的文化中心；旅行者们描述说，其位于尼科西亚的王宫是世界上最美轮美奂的。那种奢华和宏伟的痕迹，在留存下来的教堂和其他神学建筑上仍然可以辨识出来。尼科西亚大教堂可以追溯到13世纪，但法马古斯塔大教堂、尼科西亚的圣凯瑟琳教堂、法马古斯塔的圣衣圣母（*St Mary of Carmel*）<sup>①</sup>教堂（伟大的圣衣会修士彼得·托马斯就葬在这里）以及普雷蒙特雷修会（*Premonstratensians*）<sup>②</sup>在贝拉派瑟（*Bellapaise*）<sup>③</sup>的修道院，都可跻身拉丁东方最美的建筑物行列。

大陆上定居点的幸存者中的许多人此时都在塞浦路斯。其中包括刺杀了彼得一世的刺客中的两名：阿尔苏夫名义上的领主伊贝林的菲利普，以及朱拜勒的亨利。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他们的名字。而这第三名，高雷勒的约翰（*John of Gauarelle*），似乎是吕西尼昂的居伊的一名普瓦图追随者的后裔。雷蒙·巴宾（*Raymond Babin*）协助了此事，他来自一个在12世纪时到耶路撒冷定居的家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里的封建体系以尼科西亚的最高王廷为至高，其在各方面都受到拉丁耶路撒冷的影响；而且就像在大陆上的情况一样，它嫁接在一个之前的行政体系（在塞浦路斯的例子中是拜占庭的体系）上。大陆的宪政体系得到维系，起初还非常强势，体现为常有别出心裁的创新之处，而伊贝林家族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1306年，国王亨利二世被赶下台，被他的兄弟阿马尔利克取代。阿马尔利克作为总督统治了四年。但这种传统逐渐式微，待到威尼斯接管这个岛屿时，最高王廷已经基本没什么作用。威尼斯议会设立了自己的行政官，他们没有立法权，所接到的上诉可在威尼斯得到裁定。

259

在1348年和1349年，这个岛屿遭受了黑死病的沉重打击。1369年，14世纪十字军运动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国王彼得一世遇刺身亡。

① 直译为迦密山的马利亚。——译注

② 1120年由圣诺伯特（后成为马格德堡大主教）创立的天主教修会，因创建于法国北部的普雷蒙特雷而得名。——译注

③ 位于今塞浦路斯北部的小村庄。——译注

此后，该岛遭受了一连串的灾难。从13世纪开始，其经济体制开始围绕意大利人的商业和商品需求改变，但这就使其对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紧张关系异常敏感。它一直倒向威尼斯，但在1372年与热那亚的战争爆发，一支热那亚大帆船舰队烧了利马索尔，夺取了帕福斯，围攻并最终占领了法马古斯塔，并抓住了国王本人。热那亚人不久又抓住了国王的叔父詹姆斯。1374年10月，塞浦路斯被迫同意向热那亚支付年贡，并为要回法马古斯塔支付了一大笔赎金。1378年，试图以武力夺回法马古斯塔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这座城市以及周边两里格<sup>①</sup>的区域被划给热那亚，以换回被俘的詹姆斯——他此时已成为王位继承人。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敌意时不时爆发，热那亚人常常取胜，然后就从塞浦路斯人那里榨取了更多的赎金。之后，在1425年，马穆鲁克人的埃及为了回击塞浦路斯对埃及和叙利亚海岸的入侵，对该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是役，拉纳卡至利马索尔间的海岸线遭到洗劫，许多塞浦路斯人沦为奴隶。这次袭击也暴露了塞浦路斯的虚弱状态，于是一支强大的埃及侵略军，可能在热那亚人的默许之下，于1426年7月1日在南部海岸登陆。7日，在基洛基提亚战役（**Battle of Khirokitia**）中，塞浦路斯军队一败涂地，国王亚努斯被生擒。尼科西亚遭到洗劫，亚努斯被带到开罗游街示众。埃及方面为释放他勒索了20万杜卡特赎金和5000杜卡特的年贡，并要求塞浦路斯承认埃及苏丹的宗主权。1448年，塞浦路斯在西里西亚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科里库斯（**Corycus**）丧失。

## 希 腊

处于塞浦路斯西面以及西北面的是威尼斯管辖的克里特岛、半岛公国以及爱琴海上的其他一些岛屿领地，其中最重要的有威尼斯所辖的尤卑亚、莱

---

<sup>①</sup> league，长度名，在英美使用，约为三英里或三海里。——译注

斯波斯 (Lesbos, 拜占庭于 1354 年将其授予热那亚人, 此时由热那亚的加蒂卢西奥家族统治着), 以及希俄斯 (世界乳香生产的中心, 1346 年被热那亚人占领, 一道被占的还有大陆上的福恰 [Foça/Phocaea], 那里是明矾的一个主要产地)。

在希腊本土, 各个定居点反映了意大利南部的政治分裂状况。它们有些承认安茹家族的那不勒斯诸王, 其他一些则承认阿拉贡的西西里诸王。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亚该亚公国的宗主是那不勒斯诸王。在 1315 至 1316 年间, 这个公国成为两个统治权争夺者兵戎相见的战场。这两人一个是勃艮第的路易, 他娶了女继承人马奥特 (Mahaut), 还得到法国王室的支持。他向属于安茹家族的塔兰托的菲利普 (此时娶了拜占庭的拉丁女皇) 以及马约卡的斐迪南 (马约卡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小儿子, 娶了维尔阿杜安的威廉的一个孙女) 表示效忠。斐迪南在路易到来之前占领了基里尼 (Killini, 即格拉伦萨 [Glarentsa]), 但在 1316 年 7 月 5 日的马诺拉达战役中被杀。而胜者自己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去世。1322 年, 马奥特被发现不经宗主同意就偷偷嫁给了一个勃艮第骑士, 于是被迫交出公国。那不勒斯国王罗贝尔安排自己最小的弟弟格拉维纳的约翰直接从塔兰托的菲利普处接管公国。但到此时, 这个公国已成了旧日一个苍白的虚影。在北方, 雅典的加泰罗尼亚人构成了经常性的威胁。在南方, 密斯特拉的拜占庭希腊人不断在扩展自己控制的区域。因此, 承认格拉维纳的约翰的只剩下西部和北部的沿海地区, 但在这些地区, 大领主们事实上拥有着近乎独立的权力。他的宗主权也得到了半岛公国的承认, 但凯法隆尼亚岛和桑特岛事实上在奥西尼家族的统治下处于自治状态。

塔兰托的菲利普在 1331 年去世, 继承其宗主权的是他的儿子罗贝尔, 而菲利普的遗孀凯瑟琳王后则为罗贝尔担任摄政直至她于 1346 年去世。格拉维纳的约翰很不情愿向自己的外甥效忠, 于是交出了公国, 使其因此直接由宗主管辖。但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人形成的威胁加剧, 并没有待在公国里的安茹家族成员 (罗贝尔, 然后是又一位塔兰托的菲利普, 然后是那不勒斯女王乔安娜本人) 根本做不了什么来帮助自己的臣民。他们只能变得越来越孤立无援, 越来

越陷入无政府状态。1376年，拉丁伯罗奔尼撒被租给医院骑士团五年，但医院骑士团发现这里的防务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378年它的团长埃雷迪亚的胡安·费尔南德斯在试图夺取伊庇鲁斯的城市阿尔塔时被俘，还被卖给了土耳其人。乔安娜的继承人们查理三世和那不勒斯的拉迪斯拉斯（Ladislas）的统治非常脆弱无力，而一系列公国的夺位者做出的各种努力更是不堪一击。实际有效的权力掌握在一群纳瓦拉（Navarre）<sup>①</sup>和加斯科涅骑士手中；他们起初受雇于医院骑士团，控制了伯罗奔尼撒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大公领地。1396年，国王那不勒斯的拉迪斯拉斯承认了现状，把大公称号授予这群骑士的首领圣苏佩兰的彼得·博尔多（Peter Bordo of St Superan）。彼得去世后，最古老和最富有的领主家族的首领森图里奥内·扎卡里（Centurione Zaccaria）说服拉迪斯拉斯把这个称号又转授给了他。森图里奥内非常有能力，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他成功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保存了拉丁伯罗奔尼撒。但致命的一击却是拜占庭在密斯特拉的专制君主托马斯·帕雷奥洛古斯（Thomas Palaeologus）发出的。托马斯迫使森图里奥内在1429年把女儿许配给了他。森图里奥内仍然保有大公的头衔直到1432年，在这之后托马斯取得了整个公国，只除了威尼斯人在西南和东北的一些领地。

在北方，加泰罗尼亚团在1311年的哈密洛斯战役之后控制了雅典公国。他们寻求并接受了西西里的阿拉贡国王腓特烈的宗主权。腓特烈任命自己的小儿子曼弗雷德为该地的公爵。雅典和底比斯由这个团中一系列颇有能力的大区将领分而治之，尽管西方对此非常不赞同，而且被该团推翻的布里埃纳家族积极搅动这种对他们的不满情绪，甚至有针对他们的十字军行动在宣传。曼弗雷德的家系直到14世纪50年代都一直保有这个公国，随后它直接传到了西西里王室手中。但此时内部的争端开始将加泰罗尼亚人的领地搞得四分五裂，1377年以后阿拉贡王室对西西里王位的归属也发生了争议，这更加剧了这种分裂态势。从1379年开始，雅典公国被并入阿拉贡王国；但

---

① 位于西班牙北部。——译注

就在那一年，纳瓦拉团在医院骑士团的默许下夺取了底比斯。随后在1385年，聂里奥·阿奇艾尤奥利（Nerio Acciaiuoli）进入公国，并在1388年占领了雅典的卫城，结束了加泰罗尼亚人的统治。聂里奥是科林斯领主，出身于一个佛罗伦萨金融世家。这个家族在佛罗伦萨为安茹家族服务，逐渐取得了显赫地位。聂里奥在1394年去世后，没有留下法定的男性继承人。他的女婿，拜占庭专制君主密斯特拉的西奥多，占领了科林斯。威尼斯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雅典，但之后被聂里奥的私生子安东尼奥·阿奇艾尤奥利赶了出去；他随后在1403至1435年统治了这个公国，这是一段相对来说和平而富足的时期。1456年6月4日，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雅典，安东尼奥的继承人的统治就此终结。

14和15世纪，拉丁人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体现为一系列相互争斗不休的小国家的历史。它们有些处于身居异地的王朝统治之下，唯一将两者维系在一起的除了宗教之外几乎再无其他因素。此外，它们还面临着来自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越来越强有力的威胁。它们的历史的一大特征是，旧的封建制度、骑士文化在面对独立的雇佣兵团体和意大利金融团体时不断走向衰落。我们能在各个阶段的历史中发现意大利人活跃的身影，他们的商业关注点促使他们与维持甚至管理这些定居点利益攸关，而他们的航船则为这里提供了交通运输的手段。我们还能发现，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是这个地区的麻烦清理者。

## 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1302—1354）

在1309至1310年，卡斯蒂利亚国王和阿拉贡国王发起了一场针对摩尔人的并无收益可言的十字军运动。正如我们能想见的，这肯定会阻碍医院骑士团在东方的特殊性征战。另外，在1318至1319年也有一些十字军运动发生。但总体而言，在14世纪早期，尽管常得到资金给予以及教皇的十字军传道授权，但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出现了停滞。教皇们对伊比利亚的国王

们心存极深的疑虑，认为他们似乎在利用十字军号召其积极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在1312年，阿方索十一世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的王位，之后，他将证明自己是这个半岛上自斐迪南三世以来最杰出的军事领袖。从1328年开始，一系列教皇关于十字军传道的授权以及什一税和王室的三分之一税的收取，见证了在格拉纳达的边境地区各种十字军活动的复兴。这也吸引了比利牛斯山对面那些国家的兴趣。在1326至1327年以及1331年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在1326年时还是瓦卢瓦伯爵），在1328至1329年波西米亚国王约翰和纳瓦拉国王菲利普，以及在1330年尤里希伯爵威廉（William of Jülich），都热情高涨地率领各方十字军来到这里。这是参与十字军的热情在西欧异常高涨的一个时期。在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半岛以外的人们已经很久没对再征服运动表示出这么大的兴趣了；尽管这种态势因1331年与格拉纳达达成的一项短命的停火协定而有所减弱。

1340年，马林王朝苏丹阿里开始从非洲派出部队跨过海峡。一支大约有67 000人的马林军队包围了塔里发（Tarifa）<sup>①</sup>。阿方索率领大约21 000人，大多数为卡斯蒂利亚人和葡萄牙人，像其先祖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曾做的那样，同样选择了大胆赌博，主动寻求交战。10月30日，他在一条小河萨拉多（Salado）的两岸赢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满载战利品返回塞维利亚。这些战利品数量如此之多，竟然导致巴黎的金价和银价均告下跌。1342年8月，他率领来自欧洲各地的士兵围攻阿尔赫西拉斯。这些士兵包括热那亚人及来自法国、德意志和英格兰的贵族，其中就有纳瓦拉国王菲利普、贝阿恩的加斯东、卡斯蒂彭的罗杰·贝纳尔和德比伯爵以及索尔兹伯里伯爵。该城在1344年3月陷落，直布罗陀海峡也被占领，非洲入侵者进入西班牙的洪流被堵上。不过，1350年，阿方索在围攻直布罗陀时感染黑死病去世；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再征服运动处于衰退状态。基督教西班牙饱受内部纷争之苦，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夺取格拉纳达。现实主义让位给了空想，正如卡

---

① 位于西班牙南部。——译注



斯蒂利亚的彼得一世在1354年提议要发动十字军征讨非洲一样；而类似的十年前，也有人曾计划要发动十字军讨伐加纳利群岛。

## 意大利的十字军运动（1302—1378）

从教廷的角度看，十字军各处行动之间存在的冲突仍然一如13世纪时那样真实。而且他们认为，其在欧洲的政治对手对基督教世界构成的威胁，有时比东方越来越浓重的阴影更加可怕。为支持那不勒斯的安茹统治者而进行的意大利十字军运动在1302年结束。此后，另有一些行动指向的是吉伯林派的支持者们，这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一度复兴。不过在新时期，第一次重要的十字军运动是在1309年针对威尼斯发动的，它根本不是一座属于吉伯林派的城市。纷争源于费拉拉的归属问题，因为这个地方对双方都具有战略重要性。威尼斯在1310年屈服。但费拉拉从1317年开始处在一个对教廷怀有敌意的政权统治之下，于是又卷入了下一次十字军争斗中。这一次行动是在1321年12月发动的，针对的是该城的统治家族埃斯滕西（Estensi），以及米兰的马修·维斯康蒂和蒙特费特罗的腓特烈（Frederick of Montefeltro），还有腓特烈的兄弟们及其在安科纳（Ancona）和斯波莱托（Spoleto）公爵领地的支持者们。蒙特费特罗的腓特烈被击败，米兰的维斯康蒂政权倒台，但吉伯林派持续的抵抗意味着教皇的权威在这个地区并没有得到恢复。1324年，十字军运动的范围扩展并涵盖了曼图亚，但相应的各次战役虽然代价巨大，却仅仅达成了并不稳固的力量均势状态。1327年，这种状态被出身德意志、来到意大利的国王路易四世打破。路易起初成功了，他罢黜了教皇并任命了一名敌教皇，还占领了罗马；但这一切都导致一次针对他的十字军运动在1328年发起。资金和补给的缺乏迫使他离开了意大利，吉伯林联盟瓦解，其众多领导人包括亚佐·维斯康蒂（Azzo Visconti）和埃斯滕西家族都转投敌营。

此时，前任皇帝亨利七世的儿子波西米亚的约翰，一位热衷十字军事业的战士，计划在伦巴第建立一个王国以作为教皇封地。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支持了这个计划。1332年9月，反对此事的费拉拉联盟成立，教皇想要主宰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愿望落空。教廷在1353年又做了一次尝试：教皇英诺森六世派遣红衣主教吉尔·阿伯诺兹（Gil Albornoz）前往意大利重新控制教皇国。作为托莱多大主教的吉尔曾在萨拉多战役前主持弥撒。他在西部诸省取得了成功，但却没办法征服罗马涅。1354年10月切塞纳的弗朗切斯科·奥德拉菲（Francesco Ordelauffi of Cesena）和法恩莎的曼弗雷迪（Manfredi of Faenza）被宣布为异端，1355至1356年的冬天，一场针对他们的十字军运动发起。1357年，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吉尔·阿伯诺兹完成了对罗马涅的重新征服。

然而，在1360年，教会与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开战，于1363年宣布贝内纳博·维斯康蒂为异端。十字军运动重启。尽管1364年和平降临，但在1368年运动再次复兴；这次，相关的动员传道活动在意大利、德意志和波西米亚进行。14世纪五六十年的这些战争的一大特征是，双方都使用了雇佣兵团。这些十字军运动为14世纪60年代在法国进行的针对结队雇佣兵的进一步十字军运动提供了样板；而当这些雇佣兵不受控制后，十字军运动又反过来开始针对他们。几乎在格列高利十一世（1371—1378）的整个任期内，教会都忙于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战事。尽管格列高利使用了让十字军战士们更改誓言的权力，动用了十字军的言辞，并挪用了某些为十字军开征的税费，但他似乎并没有为去那里战斗的人们授予完全的十字军特权，而倾向于只为因此牺牲的人授予有限的免罪权。

这场地方性的十字军运动，因为教皇们在1309至1378年间被放逐到阿维尼翁而更增添了动力。教皇们承受着要求他们返回罗马的巨大压力，但他们不愿这么做，除非教皇国恢复秩序。他们惧怕皇帝们，在看到路易四世入侵之后更是如此。因此，只要形势允许，他们就会奋力发动此类十字军运动。教皇们这么做难逃各方的批评，尤其是在法国。那里在14世纪20年代

到处充溢着对十字军运动的狂热情绪，无法接受旨在光复圣地的十字军运动竟然要为了意大利的形势而推迟行动。1319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甚至将一支原本要前往东方的十艘船组成的法国—教皇联合舰队调往意大利为自己的战事服务。法国的菲利普四世回应得异常激烈，他将维斯康蒂和吉伯林联盟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教皇们也无法避免为这些异常昂贵的战斗买单：约翰二十二世的收入有三分之二用在了这上面。引人注目的是，教皇们居然成功地买了单，而且一直没有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要达成这个目的，他们依据了自己在13世纪的经验，发展出了一个把税收用到极致的体系，尤其是博爱资助（“自愿的”捐助）、首年税（担任教职的第一年需要缴纳的税）以及间期收益（在教职空缺期间直接收取的收益），以补充他们对教士征收的收入税。这些举措最后形成了一直流传到中世纪终结的教会税收体系。

14世纪的教皇们倾向于把吉伯林主义与异端联系起来，或至少指称其是裂教者，此外，他们也按照传统的提法提及需捍卫基督教世界的母教会的权利，以此来为他们在意大利的十字军运动提供正当理由。教皇们当时也确实在为异端和裂教行为担忧。到14世纪20年代时，对异端的指控变得非常有力且繁复，而用以支持的证据是吉伯林派对教皇权威的否认以及他们与众所周知的异端——如方济各灵性派——的联系。1306至1307年间，在皮埃蒙特发生了针对神父多尔西诺（Fra Dolcino）的追随者的一场野蛮的小型战争。1327年，一场针对匈牙利境内清洁派教徒的十字军运动发动（当人们意识到这侵犯了宗教裁判所的权威时，运动又被取消了）。1340年则进行了一场针对波西米亚异端的小型战役。从前面提及的角度看，意大利十字军运动正是这些争斗所属的那种类型的十字军运动的扩大版本。

### 阿卡陷落后导致的十字军东征行动

一种危及欧洲自身的危险此时正在日益增长，比自8世纪以来任何一次

都更为严重。1369年，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来到罗马请求援助以抗击奥斯曼土耳其人，这让西方真正开始忧虑起来。因此，1291至1523年间的十字军运动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目标是夺回耶路撒冷（也包括击溃马木鲁克人的埃及，因为这是达成前一日标的必要条件），以及捍卫剩余的拉丁定居点，尤其是要抗击门特瑟和艾丁两个突厥埃米尔国的海盜活动。这意味着十字军运动的战场转移到了海上，在很大程度上变为了海军的活动。而在第二个阶段，保卫基督教欧洲免受奥斯曼土耳其人侵害成为了首要目标。

1291年后，西里西亚亚美尼亚仍然在坚持反对马木鲁克人，对埃及实施贸易封锁（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发动十字军的必要前奏），而且还组织对拉丁希腊的援助活动。教廷的政策则是对此提供各种援助。从卜尼法斯八世的任期以降，教皇们颁布了很多强调贸易封锁重要性的谕令。克莱芒五世授权罗德岛上的医院骑士团抓捕与马木鲁克人交易的基督教商人的船只，扣押他们的货物。自14世纪20年代早期，严格的禁运令开始实施，凡是触犯禁令的商人将会被绝罚。与这些措施相伴随的是：直接与西方商业团体接触，说服他们为团体内的商人立法，让他们按照教皇想要的方式行事。到底这种贸易封锁效果如何，还存在争论。诸如阿亚斯等可以作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中转站的港口的重要性增长了，但与伊斯兰世界各个中心之间的直接贸易仍在继续，即使规模有所缩减。14世纪40年代，横跨亚洲大陆的蒙古陆上商路暂时被打断，还影响到黑海上的航运，于是意大利人开始坚持要求重启与马木鲁克人的贸易往来。从1344年开始，罗马开始放弃光复圣地的希望，于是为这类贸易颁布了许可证。

卜尼法斯八世去世后，法国对教廷日益强大的影响力体现在对法国国王的兄弟瓦卢瓦的查理的支持上。他在1301年娶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女继承人库特奈的卡特琳，并希望光复这个帝国。1306年，为了查理，在法国、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宣布征收十字军什一税。1307年，教廷下令在意大利进行十字军动员传道。但查理迟迟不行动，结果他组织起来的对抗拜占庭

皇帝的联盟瓦解。可与此同时，克莱芒五世正在考虑发动一场大规模征战，旨在夺回巴勒斯坦。法国人的态度以及圣殿骑士团爆出的丑闻让这一切成为了泡影，仅能继续作为一种长期目标来仰望，于是克莱芒五世转而组织一场特殊性征战。这支队伍将由5 000人组成，在医院骑士团团长的领导下在东方停留五年，负责保卫塞浦路斯和西里西亚，并阻止基督教商人参与非法贸易。1309年春夏之际，英格兰、佛兰德斯、法国北部和德意志的大量城乡穷人接受十字架参加十字军，组成了各种混乱无序的队伍。据说其中有三到四万人到达阿维尼翁，要求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普遍性征战。这表明大众对东方的事业普遍充满热情。尽管如此，教皇却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阿拉贡国王詹姆斯发动的针对格拉纳达的十字军运动也在同一时间筹划，并吸走了许多潜在的应募者。而且正如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的，这些队伍在1310年从布林迪西起航远征后，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就，只不过是帮助医院骑士团巩固了其对罗得岛的占领罢了。

266

1310年后的若干年里，教廷仍然关注着拉丁希腊的未来，授予塔兰托的菲利普十字军什一税和免罪权，并授权倾向于有意夺取雅典公爵领地的布里埃纳家族进行对抗加泰罗尼亚团的十字军运动；直至1330年还有一次这类运动得到许可。但随着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在1316年继位，进一步前往东方的十字军运动再次成为教廷优先筹划的对象，以回应法国表现出来的高涨热情：1320年，牧羊人十字军战士运动再次显现了对十字军的热情在大众层面的爆发。在1312年的维埃纳大公会议上，菲利普四世同意筹备一次十字军运动，一项为期六年的什一税也被施加在整个教会头上，而其中法国的份额（征收期延长至七年）将直接交给国王。1313年的圣灵降临节，在巴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旨在见证国王的儿子们的骑士仪式。在这次集会上，菲利普四世自己，他的儿子们，还有他的女婿英格兰的爱德华二世，都接受十字架参加了十字军。菲利普四世不久就过世了，但他的儿子菲利普五世作为1313年那次接受十字架的众人中的一员，却致力于这项计划。为了帮助菲利普五世，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不仅确认向法国教会征收一项为期四年

的什一税，而且还授予了为期四年的首年税（*annates*）<sup>①</sup>。随后在 1318 年，他又加授了为期两年的什一税。从 1312 年开始，法国王室得到了 11 年的什一税和 4 年的首年税，光什一税一项就应该募集了 275 万镑图尔币。但佛兰德斯的叛乱绊住了法国国王的脚步；而随着西里西亚再次受到威胁，各方又开始考虑发动另一次特殊性征战，由克莱芒的路易来领导。约翰二十二世在 1319 年动用的参与意大利战争的航海先锋队正是属于这次行动的，但却折损在了意大利。法国对此的反应相当激烈，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身为一名至为执着的十字军战士，菲利普五世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他在自己的遗嘱中留下十万镑图尔币给未来的征战。而且，如果不是他在 1321 年病得奄奄一息的话，可能就已经去东征了。在 1319 至 1320 年的冬季里，他举行了一系列的集会，其中好几次他都召集了各省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为他提供建议，其中可能也包括格兰德森的奥多。

### 十字军东征行动（1323—1360），以及同盟的出现

1323 年 1 月，法国的新任国王查理四世制订了另一个详细的提案，这次是涉及了一场分成三个部分的十字军行动：当年起航，发动一次前导性征战（*primum passagium*）帮助西里西亚；次年或不久后发动一次特殊性征战；再长远一些，发动一次普遍性征战收复圣地。这项计划因经济问题而触礁。很明显，其大部分成本需要由法国教会承担，但当时的法国教会根本没办法做出这样的贡献。直到 1328 年，另一位热衷十字军运动的国王菲利普六世才重提这项计划。1331 年，教皇同意发动一场将于 1334 年 3 月前出发的远征。菲利普六世的计划起初让教皇大吃一惊，这项计划野心勃勃，再次涉及三个阶段的十字军行动；其中法国的贡献主要是在提议中将于 1336

① 指神职人员须将担任神职的第一年收入献给教皇。——译注

年8月进行的普遍性征战中，国王将作为教会的总司令来领导这场征战。1333年10月1日，在巴黎人举行的另一次大型纪念集会（在圣日耳曼德佩 [Saint-Germain-des-Près] <sup>①</sup> 附近的草地举行）上，菲利普和他手下的众多贵族都宣誓接受十字架。

前两次征战在1334年发动，构成了十字军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因为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些旨在对付门特瑟和艾丁两个海盗突厥埃米尔国的航海联盟。这是十字军运动经历转变的第一个例子，而且这种转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十字军运动一直有一个特征——超国界性，即使不总是在实践中，但在理论上始终代表着“基督教共和国”。另一方面，这些航海联盟却从未声称代表整个基督教世界。一位历史学家将它们称为“边境十字军”，它们是感到自己最受到威胁或其统治者最充满十字军热情的边境势力的联盟。但它们的战役都得到了教皇们的授权，它们的队伍也被授予了十字军特权。

这些联盟中的第一个建立于1332年，基于同年在罗得岛签订的一份三方协定。这三方是威尼斯、医院骑士团和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三方商定在五年的时间里，在这一地区维持一支20艘大帆船的舰队。1333至1334年秋冬，法国的菲利普六世、塞浦路斯的于格四世以及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同意提供更多的大帆船，将船只总数至少在纸面上增加到了40艘。这支舰队在埃德雷米特湾（the Gulf of Edremit）<sup>②</sup> 让土耳其人遭受了一场惨重的失败。

这个联盟也参与了第二次征战，一支由克莱芒的路易领导的80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组成的队伍打算在1335年入侵小亚细亚：400人将由法国和教廷派出，200人由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派出，塞浦路斯和拜占庭帝国分别派出100人，而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将提供额外的船只。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在1334年末去世，随着法国和英格兰之间的关系恶化，这次联盟无果而终。在约翰的继任者本笃十二世治下，第二次征战的计划被束之高阁；但他试图

① 位于今巴黎第六大区，塞纳河南岸。——译注

② 位于今土耳其西海岸的爱琴海海湾。——译注

振兴这个航海联盟，不过似乎没有成功，尽管有一段时间教廷、拜占庭帝国和法国都在准备舰船。1336年，本笃认识到，西欧的政治条件实在不容乐观，普遍性征战也必须取消。不过他还是给西里西亚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帮助。这引发了许多严厉的责骂并导致了人们的幻灭情绪。

1342年5月，克莱芒六世继本笃之后出任教皇。他曾是14世纪30年代早期代表菲利普四世谈判的法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克莱芒没有制订普遍性征战的计划，因为考虑到法英正在交战，而西欧正在遭受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萧条，组织这样的征战此时已经变得极不可能。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1334年的成功，一项新策略敲定：应威尼斯、塞浦路斯和罗得岛的请求，克莱芒派了一位使节前往威尼斯，旨在重组一个对抗突厥埃米尔国的新航海联盟。这些突厥埃米尔国此时正处在猖獗的时期。在这个联盟中，教廷和塞浦路斯将分别提供四艘大帆船，医院骑士团和威尼斯人各六艘。教皇为支付船费，征收了三年的什一税，之后又补充了两年，针对的是几个特定的教省；另外他还通过出售赎罪券进行十字军传道，以此筹集资金。1344年春，24艘大帆船在尤卑亚沿海集结。他们在海上击败了突厥人，10月28日夺取了艾丁埃米尔国的主要港口士麦那港。

士麦那港此后一直保留在基督徒手中，直到1402年被蒙古人攻陷。它的失陷导致西方爆发了另一次对十字军运动的狂热。为了应对1345年初的一次挫折，即十字军的领袖在与突厥人的一次交战中被杀，“维埃纳的多菲”（dauphin of Viennois）<sup>①</sup> 安贝尔二世自愿前往守卫这个新的滩头堡，在11月中旬率领一支远征军从威尼斯起航。安贝尔在1347年返回西方，这个联盟于1351年瓦解。此时威尼斯正与热那亚交战，而热那亚得到免罪权以在

---

① 即阿尔彭伯爵（Count of Albon），是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罗讷河谷一带的贵族。在吉格四世（Guigues IV）任伯爵时，他绰号“海豚”（Dauphin），纹章也为一条海豚的图案，而又因其统治区域在法国东南部的维埃纳一带，因此阿尔彭伯爵后来又有了世袭的头衔“维埃纳的多菲”，其领地则被称为“多菲内”（Dauphiné）。其头衔和领地后来在1349年都卖给了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条件是法国王太子要被命名为“多菲”。这一称呼自此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前夕。——译注



1345年对抗蒙古人，保卫自己在黑海沿岸的据点费奥多西亚。作为欧洲对抗黑死病的措施之一，在百年战争时期，教皇英诺森六世花费了自己十年任期的大部分时间试图复兴这个联盟，因为它在形式上依然存在，而且也还共同负有防守士麦那的责任。但直到1359年才出现切实的复兴举措。伟大的圣衣会传道士、外交家彼得·托马斯被任命为使节，与威尼斯和医院骑士团的舰船一道，于那年秋天在达达尼尔海峡一带的拉普塞基（Lâpseki）取得了一次胜利。

### 塞浦路斯的彼得一世

然而，在下一个十年中，经过塞浦路斯国王彼得一世的努力，旧的指向耶路撒冷的普遍性征战的观念再次复兴。1359年，也就是他继承王位的那一年，他利用从联盟中剥离的塞浦路斯的舰船占领了西里西亚的科里库斯。1361年，他占领了安塔利亚。1362年6月15日，他向西方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宣布他有意领导一支十字军解放耶路撒冷。同年10月他出发前往西方募集资金，并在1363年3月面见了新任教皇乌尔班五世。他计划在1365年3月发动一次普遍性征战。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狂热地表示支持并宣誓接受十字架，同样做的还有他手下的若干贵族。约翰二世获得征收六年什一税的授权及其他一些收入，并被任命为总司令。但他在1364年4月8日死于被英国囚禁期间——在普瓦捷战役被俘之后，数名代替他被俘的人质中有一名在假释期间逃跑，于是约翰二世只好投降，束手就擒。

269

考虑到法国的经济状况，普遍性征战的梦想根本不切实际。彼得一世作为起初设想为其先声的一次特殊性征战的领导人，于1365年6月27日率领他募集到的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这支队伍估计有大约1万人和1400匹马。彼得采取了旧的征战场线：进攻亚历山大城。有人提出，他的目的可能是通过毁掉至少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来加强塞浦路斯诸港的地位。他利用尼

罗河泛滥的时机发动进攻，预计此时埃及人派出援军的速度会延缓。10月9日，他驶入老港。次日清晨，在靠近城墙的一块海滩上登陆。与此同时，一支由100人组成的医院骑士团兵团乘坐四艘大帆船，在该团的海军元帅的指挥下于新港的海滩登陆，打算从背面攻击穆斯林守军。但其后发生的事情非常混乱。十字军找到了一扇防守不够严密的城门，放火烧门并成功突入城中。彼得怕控制不了此行获得的巨大收获和今后的征途，于是满载战利品于六天后撤回塞浦路斯。次年，萨伏伊伯爵阿梅迪奥带着另一支大约有三四千人的十字军分队从威尼斯出发。8月，他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加利波利。之后，他在黑海沿岸与保加利亚人对抗，因为他们阻止了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从陆上自布达返回：内塞伯尔和索佐波尔（Sozopol）两市镇已经重归帝国。塞浦路斯的彼得一世继续在1367年领导了一次对西里西亚和叙利亚的劫掠，但在他于1369年遇刺后，解放耶路撒冷成了一个次要目标，因为基督教欧洲开始担忧起自身的未来。

## 对土耳其人的关注

270

第二年，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上任，在他的任期内，对奥斯曼土耳其人力量的关注首次成为教廷思考的主要因素。奥斯曼土耳其人是在塞尔柱帝国的统治瓦解之后，从小亚细亚的混乱状态中崛起的。1243年败在蒙古人手下后，塞尔柱人的权威衰退，突厥政权开始分裂为各个公国；其中的门特瑟和艾丁埃米尔国虽然不是其中最强大的，却在一段时期内成为西方人最为关注的。在众多边境首领当中，有一人叫作埃尔托格鲁尔（Ertugrul），到1280年去世前为止他似乎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国家。他的儿子奥斯曼在14世纪早期崛起，正是为了对付他，拜占庭人才雇用了加泰罗尼亚团。在他去世前，也就是在1326年夺取布尔萨之后不久，奥斯曼已经将他的权威影响范围扩展到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一些重要地区，远至爱琴海、马

尔马拉海和黑海。之后在他的儿子奥尔汗（Orkhan）治下，奥斯曼的国家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军队训练有素，开始迅速扩张。1331年尼西亚被攻陷，1337年是伊兹米特，1338年是与君士坦丁堡隔黑海相望的于斯屈达尔。突厥人起初是作为雇佣兵被邀请进入色雷斯的，到1348年时他们已经在欧洲有了立足之地，还在1354年占领了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出口的加利波利。到奥尔汗于1360年去世时，他的统治范围从色雷斯西部延伸到埃斯基谢希尔（Eskişehir）和安卡拉。突厥人的汗国如今已经突入欧洲。1361年，埃迪尔内被夺取；1363年是普罗夫迪夫；1371年在玛丽特萨的胜利，让苏丹穆拉德一世得到了保加利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塞尔维亚人的马其顿。在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之后，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就在这场战役进行的当天早上，穆拉德遇刺身亡。他的长子兼继承人巴耶济德一世在1393年占领了保加利亚剩余的领土，在1394年侵入伯罗奔尼撒，将基督教领主们都降为自己的封臣，并在尼哥波立击败了1396年组织的那支十字军。

1402年蒙古的帖木儿在安卡拉取得的胜利，以及奥斯曼家族中持续到1413年的继承纷争，让土耳其人的扩张势头暂时中止了一段时间。但此后，尤其是在穆拉德二世（1421—1451）在位期间，土耳其人开始继续推进，在1422年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并在1430年夺取了帖撒罗尼迦。安纳托利亚东部被兼或屈服，1444年一支十字军在瓦尔纳（Varna）大败。1446年，伯罗奔尼撒遭到洗劫。在1448年的第二次科索沃战役中，匈牙利的军事力量被消灭。在麦哈麦德二世（1451—1481）治下，土耳其人开始着手准备颠覆君士坦丁堡。尽管教廷做出了种种努力，并且还包括最后一次统一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的尝试（希腊人自己对此意见不一），但西方做出的回应仍然不够。在被围攻了近两个月后，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5月29日陷落，最后一任拜占庭皇帝战死沙场，而他极具讽刺性地就叫作君士坦丁。1456年雅典被兼并。尽管贝尔格莱德一直到1521年都还在匈牙利人手中，塞尔维亚却在1459年屈服。伯罗奔尼撒的大部分地区也在1459至1460年间屈服。特拉比宗在1461年陷落。莱斯波斯在1462年。尤卑亚在1470年被拿下。而

在巴耶济德二世统治期间（1481—1512），勒班陀（Lepanto，即纳夫帕克托斯 [Návpaktos]）<sup>①</sup>、科隆尼和迈索尼在1499至1500年间均被攻陷。在塞利姆一世统治期间（1512—1520），主要感到土耳其进攻压力的是伊斯兰近东和中东地区；但随着苏莱曼一世（1520—1566）继位，奥斯曼土耳其人再次转向西方；然后，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描述过的，罗得岛在1522年陷落。

271

这种不可阻挡的进攻势头就构成了教廷从1370年以来做出各种努力的背景。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出身于一个拥有十字军传统的家庭，他考虑要发动一次普遍性征战，前往巴尔干半岛大败土耳其人；在此，对抗土耳其人保卫欧洲的概念第一次提上了台面。但英法之间的战争使得发动这样的征战根本不可能，于是教皇试图联合各股直接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力量，鼓励他们自救。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联盟。1369年建立一个新联盟的计划成形，并在1373年和1374年被再次提及。但由于所涉的各方力量威尼斯、热那亚、那不勒斯、匈牙利和塞浦路斯拒绝联合，计划泡汤。格列高利十一世在1376年试图组织热那亚人进行远征，也毫无成效。而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医院骑士团在1378年迫使他推动的另一次远征，在伊庇鲁斯也以灾难告终。

## 大裂教危及十字军运动

随后是大裂教（The Great Schism）。从1378至1417年，出现了两个序列的（之后是三个）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欧洲分裂成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的两派，甚至连罗得岛上的医院骑士团内部也因此出现分裂。由于大裂教，一些内部互相攻伐的十字军运动出现。1382年和1411至1412年对那不勒斯的十字军讨伐、1388年对法国的、1397年在意大利的以

<sup>①</sup> 位于今希腊西部的海港城市。——译注

及1413年在阿维尼翁的，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在14世纪80年代早期，支持罗马的乌尔班六世的英格兰举国上下被对十字军运动的狂热横扫，筹划了两次远征。一次由诺维奇主教亨利·德斯宾塞（Henry Despenser）领导，针对的是“克莱芒派”，即阿维尼翁的克莱芒七世的支持者，无论他们身处何地；另一次由兰开斯特公爵岗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领导，针对卡斯蒂利亚。诺维奇主教的十字军行动是失败的。它在1383年5月16日出发前往佛兰德斯，那里臣服于克莱芒派控制的法国。公众对此表现出极大的支持热情。在夺取了若干可作为通道的沿海市镇后，这支队伍包围了伊普尔（Ypres）<sup>①</sup>。8月初，由于一支法国军队逼近，围攻被放弃，英格兰十字军撤退。而岗特的约翰的战斗，则开始于1386年7月9日他从英格兰起航。出发前，他的侄子国王理查二世在一场仪式上承认他为卡斯蒂利亚国王。一年后，他撤回加斯科涅，但已收到一大笔赎金作为放弃王位的补偿。

### 马赫迪亚和尼哥波立的十字军行动

联合起来应对威胁应该是不可能的了，但这一时期的两次重大行动却表明十字军运动的势头相当强劲，足以战胜大裂教。1390年，支持教皇卜尼法斯九世的热那亚人向支持教皇克莱芒七世的法国国王查理六世提议，发动一场针对突尼斯哈菲兹王国治下的马赫迪亚市镇的十字军行动。这个市镇是后来被称为柏柏尔海盗的势力的大本营。一直以来，这些海盗都在打劫热那亚的船只。热那亚人、西西里人和比萨人都已经参与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并在1388年占领了杰尔巴岛。人们对这个提议表现出持久的浓厚兴趣。教皇克莱芒七世授权发动这次十字军运动，法国境内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尽管国王下令称骑士们必须自己掏钱购置相应的装备，而且参与的

272

① 今比利时西南部的一个城市，属于佛兰德斯地区。——译注

贵族绅士（gentilshommes）不得超过 1 500 人。热那亚贡献了 1 000 名弓箭手和 2 000 名战士，此外还有 4 000 名水手。参与其中的十字军战士也有来自英格兰、西班牙和低地国家的。人们视这次运动是超越大裂教的，这体现为最高司令部命令任何人都不得提及裂教之事，而应该本着弟兄情谊，联合起来共同捍卫天主教信仰。克莱芒的路易二世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被任命为领导人。1390 年 7 月，法国和热那亚舰队出发前往“孔西利埃拉”（Consigliera）<sup>①</sup> 之岛，可能就是古赖亚特岛（Kuriate），在那里停留了九天。当月晚些时候，他们在非洲大陆登陆，但北非人已经有了足够时间组织抵抗。在马赫迪亚围攻战进行了九或十个星期之后，双方都已经疲惫不堪。热那亚人偷偷与突尼斯人谈判，延续了他们先前曾达成的一项条约。克莱芒的路易二世于 10 月无功而返，回到欧洲。

可能是因为其中体现了基督教的团结，也可能是因为法国和英格兰都再次洋溢起了对十字军运动的热情，这次令人惊奇的插曲事实上却勾起了人们更大的热情。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本来于 1370 年就制订了一项针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土耳其人的普遍性征战的计划，之后一直搁置着，此时也开始重提。从 1392 年开始，法国和英格兰政府都在热烈讨论发动一次或前往东方或前往普鲁士的十字军运动。而在 1393 年，一小支英法联军被派往匈牙利。随后在 1394 年，来自英格兰、勃艮第和法国的大使也被派出。正是为了回应这些举措，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才派使节前来西欧请求帮助。法国，尤其是勃艮第，对此的反响非常热烈，许多主要的贵族都应募参加，其中包括讷维尔伯爵、拉马什伯爵和厄镇（Eu）伯爵；还有巴尔的亨利和菲利普，他们都是法国国王的表兄弟。德意志也有大批的人加入。法国的查理六世亲自写信给英格兰的理查二世，建议两个人都参加。这场十字军运动似乎被设想为一次先导性征战，之后将进行一场普遍性征战，由英格兰和法国国王共同领导。在罗马的教皇卜尼法斯九世在 1394 年宣布发动这次十

---

<sup>①</sup> 意大利语，意为“女性顾问”。——译注

十字军运动；阿维尼翁的教皇本笃十三世也有所动作，为法国的十字军战士们授予了免罪权。

1396年夏末，一支大约有1万人的军队在布达集结到了西吉斯蒙德周围，随后前往奥尔绍瓦（Orșova），并在“钢铁之门”（Portile de Fier）<sup>①</sup>处渡过了多瑙河。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他们来到尼哥波立城下。在那里，他们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舰船会合，还有一支由团长奈利亚克的菲利贝尔（Philibert of Naillac）率领的医院骑士团小分队；他们是沿多瑙河顺流而上到此处的。当十字军进军此地的消息传到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耳中时，他正在围攻君士坦丁堡。他立刻动身前往尼哥波立解围，并在9月24日抵达。第二天，法国骑士们尽管并不了解敌军和地形，却坚持要冲在最前线，这是一种愚蠢而无用的匹夫之勇。而这正是骑士制度衰落时期典型的行为方式。他们直接冲上土耳其人所在的一座山丘，那里设有木桩做防卫。受阻于这些障碍物，等他们冲到穆斯林的主力面前时已经筋疲力尽。在一片混乱中十字军开始退却，很快就演变为一场杂乱无章的大溃退；其间，讷维尔的约翰和许多十字军领导人被俘。

273

### 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行动（1397—1413）

欧洲骑士们在尼哥波立的失败，让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方也向土耳其人敞开了门户。在这个危难时刻，医院骑士团从拜占庭专制君主密斯特拉的西奥多那里接过了科林斯的监管权。西奥多甚至还考虑要将自己的整个专制君主国都卖给他们。1404年，当迫在眉睫的危险过去之后，他又从他们手中买回了科林斯。卜尼法斯九世在1398年、1399年和1400年都发布了为拯救拜占庭君士坦丁堡而发动普遍性十字军运动的手谕，不过最后一封却被仓

① 多瑙河上的一座峡谷，是今日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之间边境线的一部分。——译注

促撤了回来，可能是因为罗马教廷听说拜占庭皇帝向其阿维尼翁的对手发出了求救。法国国王查理六世指望着在尼哥波立被俘但又被赎回的约翰·布西考。约翰·布西考在1399年6月末带着大约1200人起航，随后有来自热那亚、威尼斯、罗得岛和莱斯博斯的舰船加入他的队伍。凭着这些兵力，他打破了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封锁；而仰仗着拥有的一支相当可观的舰队（21艘大帆船、3艘大型运输船及4艘其他船只），他洗劫了土耳其人占据的沿海地区。解了君士坦丁堡的围之后，他带着拜占庭皇帝一道返回西方求助。

然而，东欧的得救却仅仅是因为蒙古帖木儿此时入侵安纳托利亚。紧随其后，由于土耳其势力的暂时衰落，基督徒们的活动再次活跃起来。约翰·布西考已被任命为热那亚总督，于1403年6月率领包括10艘大帆船和4艘大型运输船在内的热那亚舰队抵达罗得岛，目的在于强调热那亚在塞浦路斯的权利，同时也劫掠一番伊斯兰势力占据的沿海地带。他洗劫了阿拉尼亚（Alanya）的港口区域；随后，因为遇上逆风无法抵达亚历山大城，他和医院骑士团一起进攻了黎波里，洗劫了巴特伦和贝鲁特。可大多数的战利品似乎是威尼斯商人的商品。在未能成功沿海岸线而下袭击西顿后，他返回了热那亚，在途中与威尼斯人打了一场海战。1407年，他可能还计划要再次攻击埃及。

## 针对胡斯派的十字军行动

1413年后土耳其势力的复兴，以及西方大裂教状态的结束，意味着十字军行动的筹划也开始复兴。1420年，教皇马丁五世试图组织一次帮助伯罗奔尼撒的拉丁人的十字军运动，但不太成功。1422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围攻之时，他试图安排医院骑士团、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米兰人结成联盟前往援助。这次碰到的问题是，西方帝国困在了针对胡斯派的十字军



行动中，这是针对异端的最后一系列大规模的十字军行动。扬·胡斯之前曾批评过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为那些对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拉斯发动进攻的人授予免罪权的行为。虽然他在1415年根据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裁定被作为异端处以火刑烧死，但胡斯派在波西米亚的势力却仍在增长。胡斯派的要求（在圣餐仪式中饼、酒同领；以非教会司法权在道德领域的威慑力公开镇压罪行，尤其是教士当中的；自由传道权；以及对教会现有财产的检查）因为与捷克民族主义相结合而变得更加激进。当时当选皇帝西吉斯蒙德正在要求得到波西米亚的王位。1418年，马丁五世（他似乎自始至终态度都很坚决）命令他手下一名红衣主教筹备一支十字军。1420年3月，西吉斯蒙德在布雷斯拉夫召开了一次帝国议会，会上，教皇使节公开宣读了教皇要发动一次针对威克里夫派（Wyclifites）<sup>①</sup>、胡斯派和他们的支持者的十字军行动。5月初，西吉斯蒙德率领一支约2万人的队伍进入波西米亚，但许多人开小差逃跑了。胡斯派在他们颇有能力的领导人扬·杰士卡（Jan Žižka）<sup>②</sup>的领导下，让西吉斯蒙德吃了不少败仗。

不过，这些十字军有一个特征就是，人们非常积极地组织他们。到西吉斯蒙德在1421年3月被赶出来的时候，又一支十字军已经在准备中了。两支军队进入了波西米亚，尽管他们在西吉斯蒙德于次年10月再度进入胡斯派控制的领土之前就撤退了。而西吉斯蒙德的二次进攻也再次遭遇惨败，并被迫于1422年1月再次撤离。接下来的秋天，又有两支军队朝这里进军，但没几个月就撤退了。第四拨十字军在1427年7月进攻波西米亚，但在塔霍夫（Tachov）<sup>③</sup>附近与胡斯派交战了一次后就乱作一团、土崩瓦解，损失惨重。此后，胡斯派主动进击到德意志的领地内。1428至1429年曾有一项计划要组织一支英国十字军，由红衣主教亨利·博福（Henry Beaufort）率

① 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31—1384），英格兰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先驱，因翻译圣经两次被英格兰教会斥为异端，其追随者遭到迫害。他的思想对胡斯运动和宗教改革都影响深远。——译注

② 约1376—1424，胡斯的追随者，绰号“独眼杰士卡”。——译注

③ 位于今捷克西部，捷、德边境线的城镇。——译注

275 领，他曾是 1427 年那支十字军中的教皇使节。但最终亨利的这支队伍虽然是靠十字军税收资助的，却归由贝德福德公爵在法国支配，最后消失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在这种屡遭失败的背景下，1431 年 2 至 3 月间，一次大规模的德意志帝国会议在纽伦堡召开，会上筹划组织了另一次十字军行动。夏季，三支队伍被动员组织起来。第一支专注于夺回失去的德意志领土；第二支由奥地利的阿尔伯特指挥，洗劫了摩拉维亚；但第三支在勃兰登堡的腓特烈的领导下，却在 8 月 14 日被胡斯派消灭。

这五次针对胡斯派的十字军行动，队伍中囊括了来自欧洲许多地方的参与者，可能是整场十字军运动中最无成效的。我们之前就已经看到，十字军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暂时性的，用来对抗异端的话则效果非常不确定；但也有人指出，这些队伍往往是一败涂地，而不是单纯地被击败，表明人们普遍士气低落。这些十字军行动仅仅强化了异端与捷克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胡斯派只是因波西米亚贵族自身采取的某些措施才得到一定控制，不过贵族们在 15 世纪 60 年代时对教廷也仍然充满疑虑。另一方面，这些十字军行动表明，为了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团结，所有一切可以服从到什么地步。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是煽动对尼哥波立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人。如果说有人对土耳其人造成的威胁拥有一手资料，那应该就是他了；但他却仍然准备要分散能量和资源去进行一场内部斗争。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个世纪后，尽管土耳其造成了威胁，但当拉丁基督教世界因教会改革运动和由此爆发的宗教战争而分裂得更加严重时，十字军运动只能渐渐走向瓦解。

## 瓦尔纳的十字军行动

到 1440 年，土耳其势力变得更加充满威胁，但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联合，这桩多年以来教廷一直努力促成的事业似乎充满了希望。1443 年 1 月 1 日，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颁布了一份新的谕令，号召所有信徒起而对抗土耳其

人，保卫基督教东方。波兰、瓦拉几亚、勃艮第和匈牙利等地做出了回应。其中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sup>①</sup>的统治者扬·匈雅提（Jan Hunyadi）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和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计划在1443年进行一场大规模远征。一些十字军战士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在尼什痛击了土耳其人并进入索菲亚，之后撤退。巴尔干半岛此时已经拿起了武器；尽管匈牙利国王受到诱惑，在1444年6月宣称要与土耳其人签订一项为期十年的停火协议，但之前他已经宣誓要重启对抗他们的战争。一支约2万人的基督教军队穿越保加利亚，保卫了沿海城镇瓦尔纳。与此同时，一个由教皇、勃艮第公爵菲利普、威尼斯、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即拉古萨 [Ragusa]）和拜占庭帝国提供的大帆船组成的新的海军联盟航向达达尼尔海峡。苏丹穆拉德急忙带着一支人数占优的队伍前往为瓦尔纳解围；有传言说，其中一部分人是由热那亚的船只运送到战斗地点的。10月10日，他们在—场战役中击溃了基督徒的军队，匈牙利的拉迪斯拉斯和教皇使节均在交战中—被杀。

276

## 对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多种反应以及农民军的再次出现

瓦尔纳之战铺平了最终围剿拜占庭帝国的道路。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消息造成了轰动。爱琴海沿岸剩余基督教定居点的人们都陷入恐慌之中。1455年11月，人们说服教皇向那些为保卫热那亚治下的希俄斯岛而战的人授予免罪权。接下来的70年间，教廷积极活动，宣传光复君士坦丁堡的理想，使其在教廷的言辞中变得与早期解放耶路撒冷类似。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是在1453年7月初传到罗马的；9月30日，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颁布了一份新的发动普遍十字军运动的通谕，并将相

① 位于今罗马尼亚中部的历史地名，该地在历史上曾被多个民族所占领。——译注

关呼吁送达西欧的各个宫廷。德意志的印刷出版机构第一次被用来为十字军运动做宣传，并被用作印发赎罪券和宣传册。1454年2月17日，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Duke Philip the Good of Burgundy）和他的金羊毛骑士们在里尔举行的一次大型宴会上宣誓接受十字架。在这次宴会上，一只穿金戴银的野鸡昂然上桌；在穿插的表演中，一头大象被描述为驮着圣地教会前来求救。几个星期后，德意志一系列十字军集会中的第一场拉开序幕，会上各种争论和意见分歧不断爆出。到了1455年，当与会者得知教皇去世的消息后，决定将商定发动的十字军行动延迟一年，就这样为这些集会画上了句点。

新任教皇卡利克斯图三世（Calixtus III）比前任更加热衷于十字军远征，据说他“总是在谈论、总是在考虑远征之事”。1455年5月15日，他确认了尼古拉五世的通谕，并将1456年3月1日定为十字军出发的日子。使节们与布道者们，尤其是从方济各会中招募来的，被派往欧洲各地；一个由希腊人贝萨里翁（Bessarion）领导的红衣主教委员会负责统筹工作。1456年2月14日，伟大的传道者卡皮斯特拉诺的圣约翰（St John of Capistrano）在布达宣誓接受十字架，并被赋予传道动员十字军的重任：据说仅在匈牙利一地他就招募了27 000人。土耳其正在打算对贝尔格莱德进行大规模进攻，圣约翰亲自率领一支2 500人的队伍来到该城，在那里与由扬·匈雅提率领的其他十字军战士会合。匈雅提是突破土耳其人的封锁来到这里的。在7月22日的一场战斗中，人数处于劣势的基督徒军队击退了庞大的土耳其军队，这使人想起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此类交战。土耳其人抛下他们的装备仓皇溃逃，而卡皮斯特拉诺的圣约翰则说得实在过火，宣称光复耶路撒冷和圣地的时机已经到来。次年夏天，一支有16艘大帆船的教廷舰队，在米蒂利尼岛（Mitilini）俘获了超过25艘土耳其船只，还占领了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áki）、萨索斯岛（Thásos）和利姆诺斯岛（Limnos/Lemnos）。为了保卫这最后一个岛，后来教皇庇护二世建立了一个新的伯利恒圣母骑士团。

卡皮斯特拉诺的圣约翰招募并带至贝尔格莱德的是一支穷人组成的队

伍。与过去那种乌合之众不同，这支平民十字军非常成功，而且表现出虔诚、纪律严明、内部组织井然有序的特征。匈牙利的农民们已经很习惯于在大众征召令发布时应征入伍，但贝尔格莱德十字军并不是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唯一一例招募穷人的十字军。一系列这样的例子最终在一场“十字军叛乱”（Crusade revolt），即1514年匈牙利的多斯扎（Dózsa）反叛中达到高潮：约5万名由方济各会修士招募的农民十字军战士起而反对贵族，指责他们是不信者。穷人在这场运动中的再次现身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发展，其出现可能是因为十字军已不再经由海路运送，而是在欧洲的土地上战斗。这些响应号召在自己的故土上战斗的平民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但真的已经出现得太晚，无法对这场运动做出多大贡献了，因为十字军运动此时正处在明显的衰退阶段。

## 庇护二世

当然，坚守住了贝尔格莱德并不足以阻挡土耳其人的脚步。欧洲的各股势力还没有准备好摒弃嫌隙，全心全意地支持一次十字军运动。卡利斯图三世的继任庇护二世（Pius II）的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庇护二世从一开始就是十字军运动的狂热支持者。他当上教皇后几乎立刻就在曼图亚召开了一次十字军动员大会。这次大会延续了八个月，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意志和法国的公使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授权，而且还姗姗来迟。但在1459年圣诞节时，总共已经有8万人宣誓。1460年1月14日，教皇宣布要发动一场为期三年的对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行动。但到1462年3月时，庇护二世已经近乎绝望：

如果我们想要召开一次大公会议，那么曼图亚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没用的。如果我们派出使节前往要求各个主权国家提供帮助，它们却只

是加以嘲笑。如果我们发售免罪券并鼓励贡献金钱以获取精神上的馈赠，我们却被指控为贪婪。人们认为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敛财。没有人相信我们说的话。如同无力偿债的商人，我们已经毫无信誉。

事实上，除了威尼斯宣布要对土耳其人开战外，教皇的所有外交努力都毫无效果。

278 虽则如此，庇护二世还是坚定地认为应该发动一次十字军运动。与两个世纪前的格列高利十世一样，他还想亲自指挥，作为一名神职人员“用言语而不是刀剑的力量”来作战。1464年6月18日，他在圣彼得大教堂宣誓接受十字架；同日，离开罗马前往安科纳，按照预期，一支威尼斯舰队将在那里与他会合。成群的西班牙、德意志和法国十字军战士也来到这里，人数比通常认为的更多些；舰队也如期抵达。但瘟疫暴发了，庇护二世于8月15日去世。

在继克里特岛之后，威尼斯最主要的海军基地尤卑亚岛陷落，新当选的教皇西斯图斯四世（Sixtus IV）在1471年12月31日发布了一份通谕，并匆忙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结盟，在一支由红衣主教奥利维耶罗·卡拉法（Oliviero Carafa）率领的教廷舰队上花费了多达144 000弗洛伦的资金。这个联盟的舰队确实非常庞大，由约87艘大帆船和15艘运输船组成，于1472年夏末在罗得岛沿海集结，袭击了安塔利亚和士麦那，并将后一个城镇付之一炬。安塔利亚港口入口处锁链的残片被作为战利品带回，直到最近人们还能看到它被悬挂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一扇门上面。

事情发生之后，土耳其人非常震惊，于是如今轮到他们展示力量了。1480年，他们围攻罗得岛；与此同时，他们的军队在意大利本土登陆，就在奥塔兰托附近。8月11日，奥塔兰托陷落。土耳其人在西欧取得了立足之地，而西斯图斯四世甚至想过要逃到阿维尼翁去，并马上四方求助。之后，他在1481年4月8日又发布了一份通谕。但在5月3日伟大的苏丹麦哈麦德二世去世，9月10日奥塔兰托向基督徒军队投降。

## 征服格拉纳达与进攻北非

在所有这些活动和宣传持续进行的时候，已经休眠了超过一个世纪的西班牙再征服运动也再次重启。自 1344 年以来，国王们一直没有把它放到优先考虑的地位，边境上的争斗被留给了当地贵族去处理。1475 年，教皇西斯图斯四世更是将一半的“王室三分之一”税都转用在了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上，因为这笔钱也很久没有被用于征服活动上了。但 1479 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结合，象征着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联合，以及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十字军理念的复兴，西班牙宫廷以伊莎贝拉为首开始迸发热情，无论是在国家主义方面还是在宗教方面。十字军运动的必备装备——教皇通谕与十字军特权——都明显具备。战斗花费了大量金钱，征募起庞大的军队，而且得到了全力以赴的推动，为此不惜牺牲王国的其他利益。而格拉纳达此时正因 1482 年国王之子发动叛乱闹起了内部分裂，加之它占领萨阿拉（Zahara）又为宣战提供了借口，这些对基督徒们有所助益。阿尔阿玛（Alhama）于当年陷落；而王国的西部，包括萨阿拉、阿洛拉（Alora）、塞特尼尔（Setenil）、贝纳梅希（Benameji）和龙达（Ronda），则在 1483 至 1486 年间被占领。马拉加在 1487 年被夺取；巴扎（Baza）、阿尔梅里亚和瓜迪斯则是在 1488 至 1489 年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 1490 年 4 月包围了格拉纳达城；在营地被毁之后，他们索性建起了一座城镇——圣菲（Santa Fe）。这让穆斯林防守者士气大伤。

279

格拉纳达在 1492 年 1 月 2 日投降，西班牙国王和女王在 6 日进入该城。2 月 4 日，在罗马，梵蒂冈和圣天使堡被火把和篝火点缀得透亮。次日举行了一场庄严的感恩游行，红衣主教罗德里戈·波吉亚（Rodrigo Borgia）组织了罗马的第一场斗牛比赛。有人夸大其词地说，夺取格拉纳达能抵消失去君士坦丁堡所造成的损失。而且还有人认为，这将是征服北非的序曲。对非洲的入侵开始于 1497 年占领梅里亚（Melilla），随后，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征服活动发生。这得到了教皇们的授权，而其正当性则源自取道非洲海

岸抵达圣地的古老理念。1505年征服凯比尔港（Mers el-Kebir），1508年是戈梅拉（Gomera，属加纳利群岛），1509年是奥兰，1510年则是阿尔及尔岩（Rock of Algiers）、贝贾亚（Bejaia，即布贾 [Bougie]）和的黎波里。

### 十字军行动筹划（1484—1522）

尽管教廷一直在竭尽全力，但西班牙在西部的进展却是教廷所有努力中唯一取得具体成果的。在1484年8月29日进行选举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 VIII）的程序之前，红衣主教们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包括要发布一份声明、召开一次大公会议以改革教会和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行动。而最后这项老议题将在16世纪再次得到复兴。英诺森八世刚一当选，教廷就开始制订计划，但直到1490年欧洲的政治形势才开始好转，而这却是具有欺骗性的。3月，一个旨在讨论发动十字军行动的大会在罗马召开，除威尼斯之外的各股主要势力的代表都参加了。会上通过了组建两支陆军的详细计划，一支由德意志、匈牙利、波西米亚和波兰的十字军战士组成，另一支由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纳瓦拉、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十字军战士组成；另外还有一支舰队，将由罗马教廷和意大利城邦国家负责。整个行动将由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或其子罗马人的国王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统筹指挥。一支军队将袭击匈牙利边境上的土耳其人，另一支将在阿尔巴尼亚登陆。舰队将在爱琴海行动。土耳其王子杰姆此时正由教廷囚禁着，也将随同十字军一起前往；每个人似乎都确信，带他前往将是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筹码。最终，这些野心勃勃的计划没有组建起任何一支十字军（尽管1493年前往保卫匈牙利的人们得到了免罪权）；1494年，对这些计划的讨论被法国入侵意大利这一事件盖过。但对十字军运动的关注仍然弥漫着，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虽然正在采取措施强调自己对那不勒斯王位的所有权，



却似乎也正沉浸在这样的梦境里：他对意大利南部的征服将成为攻入希腊的序曲，而他从罗马接手的杰姆将随行。杰姆不久就过世了，十字军的计划日渐黯淡。尽管1495年2月22日查理八世取得胜利，进入那不勒斯，并于5月12日加冕为国王，威尼斯和米兰的敌意使得他根本不可能长久在此地停留。11月，他撤回法国。

1499年，土耳其人正在进行大规模准备活动的消息传到了意大利，人们担忧针对罗得岛的进攻将迫在眉睫。但事实上，这次进攻瞄准的是威尼斯在希腊的领土。勒班陀在8月沦陷。一年之后，轮到迈索尼、派洛斯和科隆尼。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下令进行发动一场十字军运动的前瞻性研究工作，欧洲似乎再次沸腾，而英格兰的亨利七世也切实表示了意愿。教皇试图再次召开大会，1500年6月1日他颁布了一份通谕。一项为期三年的十字军什一税募得了相当可观的资金。1502年春，一支包括13艘大帆船的教廷舰队前往辅助威尼斯的舰队。但法国和西班牙正因为那不勒斯王国的事情，恨不得致对方于死地，所以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关十字军的讨论很多，实际行动却极少。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和利奥十世（Leo X）都孜孜不倦地进行了筹划和宣传，但意大利不断进行的战事、法国的入侵以及对威尼斯的康布雷同盟（the League of Cambrai）的形成，都让他们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英格兰的亨利七世、葡萄牙的曼努埃尔和苏格兰的詹姆斯都敦促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在某些时候，西班牙的斐迪南和法国的路易十二世（Louis XII）也准备投身于这项事业。在1512至1517年间召开的第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中，其第一次、第六次、第八次、第十次和第十二次集会都讨论了十字军的事宜，并以传统的改革与十字军的关联为强调重点。利奥十世在1513年为东欧的人们颁布了一封手谕，次年一支十字军队伍也肯定得以募集起来。利奥敦促各股政治势力有必要消弭分歧；1516年，他甚至说服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亲自担任领袖，召唤法国人参与由他们的国王领导的十字军。

之后在1516年和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公众舆

论再次沸腾，人们感到恐惧。教廷的反应是更进一步的积极游走。1517年11月11日教廷颁布了一项特定的十字军免罪权。教皇还成立了一个由八名红衣主教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首先强调要在欧洲实现普遍和解，所有王公都必须庄严宣誓加以保证，并结成名为教廷神圣兄弟会（*Fraternitas Sanctae Cruciatæ*）的联盟；然后提出要征募一支由6万名步兵、4000名骑士和12000名轻骑兵组成的军队，外加一支舰队。军队将兵分两路，一路应在都拉斯登陆，另一路则从北面向色雷斯进发。教皇将亲自与十字军一同前往。这份备忘录的复本被送给了西欧的各位国王。国王弗朗索瓦和皇帝马克西米连的回应强调，他们确信西欧的和平是先决条件。于是在1518年3月6日，教皇宣布在欧洲施行为期五年的停火，并派遣若干声名卓著的红衣主教作为使节，前往确保各方力量遵守停火协议。这一次人们都相当关注事情的进展，因此似乎教皇的呼吁真的得到了重视。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威尼斯同意了五年停火协议；10月，法国和英格兰签署《伦敦条约》，结成防御同盟，而且其他势力也可以加入。教皇在12月31日认可了这一条约，14天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也对之加以认可。1520年6月，金缕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sup>①</sup>见证了 this 新同盟的形成。募集资金和军力的计划都在进行，但随着苏丹塞利姆于1520年去世的消息传来，准备工作又开始变得时断时续，十字军也渐渐不再是人们的关注焦点。基督教王公们此时还不知道，塞利姆的继承人苏莱曼是一位同样令人生畏的征服者，因此又转而将自己的心思花在了离本土更近地方的政治利益上：西班牙的卡洛斯<sup>②</sup>与法国的弗朗索瓦争夺帝国和那不勒斯的斗争，以及德意志的路德宗暴动。

尽管在70年的时间里始终充满热情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教皇们和罗马教廷却没能将西方联合起来发动一次十字军行动，这让人想起了

① 法国北部加莱海峡大区的一个地点，在巴兰盖姆（Balinghem）和吉讷（Guines，1520年时属于英国）之间。——译注

② 即日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译注

1150至1187年以及1272至1291年这两段时期。国家间政治的本质以及意大利自1494年以来陷入的混乱状态，使得要说服王公们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摒弃嫌隙变得不太可能。他们总是会被说服，与某个邻国的争端或者一项有正当理由支持的权利声明，要比土耳其人对欧洲构成的威胁更加重要。十字军运动此时正处于严重的衰退期。鉴于这场运动已经与教廷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而教廷再也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真正的信任，在德意志，可能还包括在法国，教皇的呼吁再也得不到真心白发的响应。同样明显的是，知识界的意见正在越来越反对这场运动。不过，人们有可能夸张了其衰退的程度，有时真正的激情还是会迸发出来，不仅在贵族中间，也在大众层面；但我们还是能察觉到，在远离地中海和东欧的地区（在那些地方，必须对抗土耳其人的各方势力对此还是相当投入的），十字军理想正在退潮。



## 第十章

# 旧时代与十字军运动的消亡（1523—1798）

### 改 革

在经历了70年不懈的努力之后，推动十字军运动的力量在16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开始松懈。教廷因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的入侵而分心，而路德宗在德意志的暴动声势日益见涨，也让教廷对改革者们的活动开始担忧起来。1521年贝尔格莱德陷落，1522年罗得岛陷落；而教皇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VI）对这些消息的反应是宣布在欧洲施行为期三年的停火，以募集兵力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罗马教廷红衣主教团提醒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其王室家族的荣誉并非取决于与邻国的战争，而取决于其在对抗不信者的十字军战斗中所起的作用。但随着法国再次进攻意大利，这次游说计划破灭。阿德里安六世的接班人克莱芒七世（Clement VII）着手组织一个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泛欧洲联盟；而且毫无疑问，弗朗索瓦一世和皇帝查理五世于1526年缔结的《马德里条约》中表达的希望由教皇召集一次“普遍性十字军征战”，指的就是这个联盟。同年8月26日，一支由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Louis II）领导的军队在莫哈奇（Mohács）<sup>①</sup>战役中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消灭，路易也被杀。毫不奇怪，尽管帝国对意大利的威胁与日俱增，并且后来导致德意志军

<sup>①</sup> 位于今匈牙利南部，多瑙河右岸的城镇。——译注

队在 1527 年占领了罗马，但教皇仍然在探讨组建一个十字军联盟。皇帝查理五世的代表要求克莱芒七世召开一次大公会议，讨论改革教会并消灭路德宗，并将这些事项与准备“最必要的对抗不信者的征战”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相当传统的提案，在 1537 年呼吁在曼图亚召开一次会议的一项不成功提议中再次得到体现；1544 年号召召开塔兰托会议时也再次被重提。这后一次会议的召开，旨在解决“与消除宗教不和谐，改革基督教行为，并在最神圣的标志十字架的旗帜下发动一次针对不信者的远征”有关的事项。这样的议程除了提及新教外，与 13 世纪历次会议的议程并无不同。

天主教徒倾向于相信，新教徒所造成的威胁至少与土耳其人相当，甚至可能更严重。1524 年 2 月，克莱芒七世对于土耳其人对匈牙利的威胁以及马丁·路德的种种活动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担忧。而两年后，皇帝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缔结的《马德里条约》中提出的发动一次普遍性十字军征战的建议，也表达了双重目标：“驱逐并摧毁……不信者，消灭路德派造成的错误。”<sup>283</sup> 尽管出于政治原因，天主教会避免了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ldic War, 1546）中引入十字军的理念，但英国反抗亨利八世的叛乱者在求恩巡礼骚乱（Pilgrimage of Grace, 1536—1537）中采用了绘有基督五处圣痕（Christ's Five Wounds）<sup>①</sup> 的旗帜；同样的旗帜也出现在北非的十字军运动中。被流放的红衣主教雷吉纳德·波尔（Reginald Pole）号召开展一次针对英格兰的十字军行动，这最终在 1588 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行动中实现。这次行动得到了免罪权，而且有一部分资助来自十字军税款。1551 年，教皇尤里乌斯三世（Julius III）威胁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宣称要发动一场帮助新教徒和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行动。在法国 16 世纪 60 年代爆发的最初三次内战中，十字军团体的联系都非常明显。1566 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发言人称，土耳其人构成的威胁，还比不上异端和反叛者带来的“内部罪恶”。这很典型。我们一次次看到，教皇们，其实也包括大多

<sup>①</sup> 指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受难时留下的五处伤口。——译注

数天主教徒，几乎总是毫无例外更严肃地对待内部威胁甚于外部威胁。十字军的色彩晚至三十年战争（1638—1648）时期还有所浮现。

新教的理念传播迅速，到这个世纪末，虽然仍是少数派，但已有数量可观的西欧基督徒背离天主教，因此也背离了十字军运动。不过许多改革者们仍非常乐于听闻正义战争的观念。如马丁·路德虽然拒斥了训导权（*magisterium*）的观念，并且拒斥了通过诸如此类的著作来宣扬救赎的观念（他其实采取了一种否定的回应方式，将罗马的主教描绘得比土耳其人更坏），即宣扬基督徒应该拿起武器对抗伊斯兰势力，保卫自己的领土和家庭。但他的立场，正如豪斯雷教授指出的，“在很多关键的方面类似于天主教十字军的观念，主要是强调忏悔和祈祷”，而且这“路德派信众在危机时刻可以与他们声称的敌人携手”。信仰路德宗的王公和大地主也投票同意皇帝授权提供补给来抗击土耳其人。而在新教英格兰，在1565年成功守住马耳他之后，有六个星期的时间，路德宗的教堂中人们每周做三次感恩仪式。胡格诺派的军事领袖朗乌埃的弗朗索瓦（Francis of La Noue）在16世纪80年代初被囚禁在监狱时，写下了著作《军事政治对话录》（*Discours politiques et militaires*），其中包括了一个稍加变化的普遍性征战计划，即虽没有免罪权，但仍要收复君士坦丁堡。他希望这将使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结束宗教战争。但新教徒们自然会抛弃由教皇主管的圣战的观念，因此，十字军运动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消减得很快；尽管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我们仍然偶尔能够发现他们前往马耳他的医院骑士团服务。

虽然宗教改革明显削弱了基督徒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推进无论看起来多么无穷无尽、多么可怕至极，已经开始变得不太连贯了，至少在东部边界地区如此。在那里，一阵快速的推进之后，接下来就是一段相对和平的间隔期。到1541年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边界已在中欧确立，首府是布达。维也纳于1529年遭到围攻，1683年再遭此厄运。北非发生了一场严酷战争；之后，当地的穆斯林承认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宗主权，并在与西班牙人的斗争中获得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帮助。在地中海区域，奥

斯曼土耳其人横扫拉丁基督徒们占领的岛屿和残余的大陆领地。纳夫普利翁（Návrplion）<sup>①</sup>和莫奈姆瓦夏在1540年投降，希俄斯岛在1566年陷落，塞浦路斯则在1570至1571年间。尽管马耳他岛这个基督教从中欧到北非防线上重要的一环在1565年时得以成功守住，但克里特岛却将在1669年被攻陷。

不难理解的是，基督教各方势力不仅采取交战的方式，也尝试利用外交手段来限制土耳其人造成的损害。威尼斯和神圣罗马帝国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不得不做好准备与君士坦丁堡议和。威尼斯人做得更过分，甚至还祝贺苏莱曼攻克罗德岛以及在莫哈奇大胜。而法国事实上与土耳其人结盟，作为保护自身以对抗皇帝查理五世的势力的一种策略。当然我们也必须公正地说，1536年的盟约（此后又经塞利姆二世1569年的一系列条款得以巩固）使法国成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活动的天主教商人和朝圣者的保护者，而法国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有益的。更令人惊讶的是教皇保罗四世（Paul IV，1555—1559年在位）的态度。他热衷于处理异端事务，几乎无暇顾及十字军事宜，尽管他曾威胁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他对这两人又怕又恨）要发动一次。他甚至考虑与土耳其人结盟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而这也成为日后他的侄子红衣主教卡尔洛·卡拉法（Carlo Carafa，他碰巧曾是医院骑士团的一员）被判处死刑的罪名之一。

## 骑士团

各个骑士团事实上已经被严重削弱，而且不仅仅是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尽管在1562年时一个新的圣司提反（Santo Stefano）<sup>②</sup>骑士团由托斯卡纳

① 希腊的一个海港城市，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阿尔戈利斯湾北端，是现代希腊的第一个首都（1829—1834）。——译注

② 第一个以身殉道的基督徒，根据圣经记载，他在公议会上申辩后被人用石头砸死。（使徒行传6:8-7:60）——译注



公爵创建，团中骑士可以结婚，而且拥有一支以里窝那（Livorno）<sup>①</sup>为基地的组织完善的舰队；但在1500年以前，卡斯蒂利亚的众骑士团的国有化进程就已经基本就绪。1489至1494年间，斐迪南国王接手了它们的管理权，并设立了一个王室委员会对其加以管理。1523年，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将它们永久地归入王室辖下，将团长职位和收入都授予了斐迪南国王。蒙特萨骑士团之后并入阿拉贡王室；葡萄牙的骑士团，包括基督骑士团在内，也转归斐迪南国王管辖。其他一些教皇谕令，让骑士团的成员解除了宗教生活几乎各个方面的限制。武装修会就此转为纯粹的骑士团，骑士们被允许结婚（圣地亚哥骑士团的成员一直就有此权利），他们的聚居地被卖，他们的头衔意味着荣誉和威望。有人写道，他们如今的角色是“社会导向和界定方面的”，尽管有少量骑士仍然在与不信者的战斗中服务。教皇庇护五世（Pius V，1566—1572年在位）命令葡萄牙的骑士团在北非边界攻城掠地，甚至下令，除非已在该地服务三年，否则不能被称为该团弟兄；他希望在非洲成立一所神学院，专门用来训练年轻的骑士团骑士。从1552年开始，圣地亚哥骑士团就拥有三到四艘大帆船，此后并入西班牙的地中海舰队。在1489年尝试将圣拉撒路骑士团并入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未果后，该团剩余的力量已经大幅度世俗化。

285

剩下的军事骑士团则受到宗教改革运动的沉重打击。1525年，条顿骑士团大团长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Brandenburg）皈依路德宗，并受封于波兰国王，成为世袭的普鲁士大公。1562年，利沃尼亚骑士团的最后一任团长戈特哈德·凯特勒（Gotthard Kettler）也成为一名信仰路德宗的公爵。乌得勒支骑士团分支皈依加尔文派，至今在荷兰仍作为一个具有极高威望的慈善团体而存在。条顿骑士团的其他部分只在德意志南部还作为天主教的一个机构存在；在那里，基于其位于梅尔根海姆（Mergentheim）的总部，大团长借助一个小小的幕僚团继续进行管理统治。它还继续在哈布斯堡针对土耳其人和新

① 意大利西部的港口城市。——译注

教徒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从 1696 年起在哈布斯堡的军队中专门保留了一个兵团的建制。此时它的规模相对而言已经很小，1699 年时它只有 94 名骑士和 58 名神父；但它仍然还是一个在发挥功用的骑士团，并在 1809 年后把总部迁往了维也纳。直到今天它依然存在，但成员仅限于神父。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尽管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继续留存，甚至还发展壮大，但它失去了原先掌握的北部省份。德意志北部的成员们早在 1382 年就自行独立成一个教省，皈依路德宗，成立了一个新教徒的分支辖区，并最终从位于马耳他的最高总部那里赎买了自由权；至今仍作为一个新教组织留存于世。在丹麦，这个骑士团的分支在一段时间内也作为一个路德宗机构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此后逐渐停止活动。在英格兰、挪威和瑞典，其分支解体，财产被没收；不过，在玛丽女王时期，英格兰的分支曾短暂复兴。在苏格兰，最后一任圣约翰医院骑士团长官詹姆斯·桑迪兰兹（James Sandilands）皈依了加尔文派，并在 1564 年获准将骑士团的土地转为一个公爵领地。

## 北 非

286

此时，十字军运动局限在了三个地区。其中一个是非北非，在那里，西班牙人在北部沿海地区已经获取了若干滩头堡，作为皈依中心和控制海岸线的中心。在美洲获得的庞大的征服领土，吸引了卡斯蒂利亚王国上上下下的大部分精力，甚至有证据表明，十字军的观念漂洋过海被应用到了大西洋对岸；但投入到北非战斗中的精力和资源仍然是相当惊人的。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是一项由王室控制的国家事业，它能自给自足，比十字军东征更少受到欧洲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影响；但无论如何，迟早它也要与对抗土耳其人的目标绑定在一起，因为在占领埃及之后，土耳其人的目光投向了西面。

在非洲对抗西班牙人的一位早期领袖是一个叫阿鲁吉·巴巴罗萨（Aruj Barbarossa）的人。他在莱斯波斯岛本土出生，祖籍可能是希腊，控制

了米利亚纳（Miliana）、麦迪亚（Médéa）、特内兹（Ténès）和特莱姆森（Tlemcen）。他于1518年被杀，但他的弟弟凯尔丁·巴巴罗萨（Khair ad-Din Barbarossa）接管了他的事业，他使自己统治的区域臣服于土耳其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夺取了克罗（Collo）、安纳巴（‘Annaba，即波尼 [Bône]）、君士坦丁、舍尔沙勒（Cherchell）<sup>①</sup>；1529年，他又夺取了阿尔及尔岩，这里后来成为了他的大本营。他不久就声名在外，成为西地中海最令人畏惧的海盗头子之一，率领一支庞大的海盗舰队劫掠到远至意大利的地方。他实在构成了太大的威胁，于是在1533年，负责与奥斯曼当局交涉有关交还基督徒在1532年夺回的科隆尼的帝国公使，就提出要土耳其人交出阿尔及尔岩给西班牙人。

1534年8月，凯尔丁占领突尼斯，使自己拥有了一个离意大利南部近得让人很不舒服的行动基地。皇帝查理五世的反应是，组织一次远征以夺回此地。一场十字军运动发动，免罪权也被授予。皇帝以“十字架上的救主”的名义御驾亲征，并与他之前的许多十字军战士一样，先做了一次准备性的朝圣：去往蒙特塞拉特山（Montserrat）<sup>②</sup> 求取圣母马利亚的帮助。教皇保罗三世送来钱财和6艘大帆船；医院骑士团送来4艘；葡萄牙人也提供了一些船只。1535年6月16日，一支由74艘大帆船和330艘其他船只组成的舰队在皇帝的命令下将一支军队卸载在了北非的海岸，地点离法国的路易九世当年登陆的地方不远。十字军取得了一场大胜，查理五世声称解放了两万名基督徒囚犯，这就是7月14日夺取拉格雷特（La Goulette）要塞的战役。是役，北非舰队大半被俘，凯尔丁的军队被击败，21日，突尼斯遭到洗劫。其城门的锁和门被送往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查理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帝国凯旋仪式。凯尔丁撤退，取道马洪（Mahon）来到米诺卡并洗劫该岛，然后去往阿尔及尔。此后他成为土耳其的一名海军元帅，直到1546年去世之前，都一直是整个地中海地区基督徒们的眼中钉。

① 以上均为地处今阿尔及利亚的城镇。——译注

② 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附近的多峰山。——译注

1541年10月，查理率领他的帝国军队进攻阿尔及尔岩，但没有成功，因为一场大风把他的舰队吹得七零八落。这让他相信，自己根本没有办法为已经登陆的军队很好地提供补给。随同他前往并试图说服他坚持进攻的人中就有日后的墨西哥征服者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s）。此后在1550年6月，查理五世派遣一支舰队前往围攻马赫迪亚，这里曾是克莱芒的路易于1390年发动的十字军运动的进攻目标。它不久前变成了继凯尔丁之后新的柏柏尔海盗头目的大本营。此人来自小亚细亚，名为图尔古德·阿里（Turghud Ali，即德拉古特 [Dragut]）。基督徒们在9月8日夺取了这座城镇，但图尔古德·阿里溜走了，苏丹任命他为黎波里总督。这个地方本来在1530年给了医院骑士团，但它在1551年8月14日投降，将此地交给了土耳其人。

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当年对这个地方并没有尽心尽力防守，声望也没有因是役而提高（200名团员投降），但它现在却敦促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重新夺回这里。教皇保罗四世为此次行动授予了十字军免罪权，教皇庇护四世又再次确认了这种权利。1560年2月，一支至少由47艘单层甲板大帆船以及43艘其他船只组成的舰队（船只由西班牙、热那亚、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西西里、教廷和医院骑士团提供），载着一支由11 000到12 000人组成的军队（包括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意志人、法国人、医院骑士团成员和马耳他人）前往位于加贝斯湾（the Gulf of Gabès）<sup>①</sup>南面入口处的杰尔巴（Jerba）岛，并在3月13日夺取了岛上的要塞，作为重新夺回的黎波里的第一项行动。基督徒们知道，土耳其人肯定会反攻，因此倾尽全力加固工事，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感染了斑疹伤寒。5月，军队主力重新登船离去，只留下约2 200人的驻军，其中包括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但在土耳其舰队来袭之前，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有序地完成登船。11日，基督徒的舰队受创，损失了27艘单层甲板大帆船。杰尔巴岛上的守军缺乏淡水，

<sup>①</sup> 位于地中海的突尼斯东海岸。——译注

因为城堡中的两个蓄水池都几近干枯。但他们还是成功地通过海水蒸馏净化的方式，保证了每天大概 30 桶的供应。到 7 月 27 日，岛上用来为蒸馏器加热的木材用尽，人们大批渴死，或死于坏血病。到 31 日，围攻结束，大多数守军，包括受伤的，都被屠戮；7 000 名俘虏中有 5 000 名是舰队被毁时被俘的，被一道送往了君士坦丁堡。

比起东地中海，西班牙和葡萄牙更在意北非，教廷也明白这一点。在 1571 年勒班陀战役之前的一段时期，西班牙被说服暂时搁置自己的兴趣所在而关注东部的海上行动。但即便如此也没有改变以下事实：突尼斯，这个查理五世在 1535 年夺回后交给一个依附于他的伊斯兰统治者的地方，对基督徒在拉格雷特的前哨站构成了持久的威胁。1569 年，突尼斯被乌鲁吉-阿里（Uluj-Ali，他也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的海盗，并成为奥斯曼的海军元帅，而且还很不幸地成了勒班陀战役战败的一方）占领，这让西班牙人确信要采取一些行动了。随着神圣同盟的瓦解（我们将在下文描述），奥地利的唐·约翰（Don John）在 1573 年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突尼斯，并进而占领了比塞大（Bizerte）。土耳其人迅速做出了回应。1574 年 5 月 13 日，一支有 240 艘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庞大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柏柏尔海岸<sup>①</sup>。在经历了一个月的围攻之后，拉格雷特在 8 月 25 日被攻陷，突尼斯于 9 月 13 日再次被夺走。

288

基督徒们此时开始推进到远西部。土耳其人加强了他们对北非海岸的控制，介入当地谢里夫<sup>②</sup>之位的争夺，扶持傀儡，并于 1576 年夺占了菲兹（Fez），开始对基督徒在摩洛哥的据点施压。西班牙当局开始私底下与土耳其人议和；但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Sebastian）是一个迷恋十字军圣战观念的浪漫主义者，他独立发动了一场对抗穆斯林的、可能是最后一次老式十字军的行动（与整个同盟对立）。行动得到了免罪权，并有教皇使节随行。

① 16 至 19 世纪的欧洲人用于指称柏柏尔人所聚居的北非中西海岸地区，相当于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译注

② 谢里夫（sharif）系阿拉伯贵族头衔，字面意为“高贵”。在摩洛哥，王室成员被称为谢里夫。——译注

他在阿西拉（Asilah）<sup>①</sup> 登陆，率领着一支有 15 000 名步兵和 1 500 匹马的军队，包括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德意志人、荷兰人和一支原本要在英国人托马斯·斯图克雷爵士（Sir Thomas Stukeley）领导下前往爱尔兰的教皇军队，还包括数千名非战斗人员。到 1578 年 8 月 3 日，他行进到了凯比尔堡（Ksar el Kebir/Alcácer-Quivir），但此时他已经与舰队失去联系，补给也断了。4 日，他与一支兵力大大优于自己的摩洛哥军队相遇。在此后的三王之战中，塞巴斯蒂安、奥斯曼的傀儡谢里夫及被其替代的前任（塞巴斯蒂安的盟友）都战死了。斯图克雷和大约 8 000 名基督徒也被杀，近 15 000 人沦为阶下囚。

## 东部的场景

另两个战场的匈牙利和东地中海，在战略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可以放在一起看。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事实上教廷和西欧各股势力正因为新教势力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无力行动，但地中海一带的十字军活动仍然相当频繁。1529 年秋，苏丹苏莱曼围攻维也纳三个星期，对其持续推进的忧虑促使教皇克莱芒和皇帝查理五世结盟。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之前和查理五世正在交战，此时被迫议和。因此，在教皇看来，对中欧心脏构成的威胁促使他一直在努力达成的普遍和平成为现实，此时，基督徒的武器终于可以砍向土耳其人。1530 年 2 月 2 日，在皇帝查理五世由克莱芒七世在博洛尼亚为其加冕前的三个星期，教皇要求一些邦国（大多数是意大利的，但也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和匈牙利）的代表确保拥有足够的权威以推动他们的主人参与一场“对抗不信者的普遍性征战”。克莱芒授权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进行十字军动员招募，在随后的两年里竭尽全力促成一场远征。但他的努力却因为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敌意再起，以及路德宗造成的问题而化为乌有。

---

<sup>①</sup> 位于今摩洛哥西北端。——译注

查理五世在突尼斯取得的胜利重新燃起了人们对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希望。1536年1月，教皇保罗三世向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保证，他正在努力为收复君士坦丁堡而奔走。1537年9月中旬，教廷与威尼斯结成联盟，一个红衣主教委员会受命筹划后续行动。但与此同时，法国刚好与土耳其人不同寻常地结盟共同进攻意大利，只不过因为行动不协调，这次进攻以失败告终。1538年2月，查理五世加入联盟。盟友们达成共识，如果东征胜利，查理将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而医院骑士团将拿回罗得岛。查理将支付行动所需的一半费用，威尼斯人负责三分之一，教廷负责六分之一。教皇成功说服法国和帝国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和约，但在9月，同盟的舰队被一支由凯尔丁领导的土耳其海军在阿尔塔湾（the Gulf of Arta）<sup>①</sup>入口处的普雷韦扎（Préveza）沿海击败。教皇声称他将亲自参加东征，鼓励查理在次年春天再次行动。但同盟却渐渐僵死，1540年，威尼斯人与土耳其人议和，支付了30万杜卡特的赔偿金，还割让了纳夫普利翁和莫奈姆瓦夏；这是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后的两个据点。在1685年之前，他们在希腊本土未能再收复任何一个重要的据点。

普雷韦扎的惨败让地中海的十字军运动搁置了一段时间。在16世纪50年代末，保罗四世对此不感兴趣；而尽管庇护四世更加传统，对此也更感兴趣，他声称他愿意随另一个同盟前往远征，因为没有比战死在十字军征途上更加光荣的死法，帝国政府却迫切地想在东部边境保持和平。确实，停战和约在战争爆发的间隙时有签署，如在1545年、1547年、1554年、1562年、1565年和1568年。然而，到16世纪60年代末期，很明显土耳其人已经在准备要占领威尼斯辖下的塞浦路斯。1570年3月25日，他们要求其投降的要求被送到了威尼斯。这个共和国之前一直尽量避免与西班牙结盟，以免自己被卷入防卫西班牙在北非领地的事情当中，但此时，在绝望中也只能求助于国王菲利普二世。一支包括了教廷、热那亚、威尼斯、西西里和那不勒斯

① 位于希腊西北部的伊奥尼亚海海湾。——译注

船只的大规模舰队匆忙集结起来。但在抵达罗得岛之后，他们听到了尼科西亚沦陷的消息，于是退到了克里特岛。土耳其人在7月1日登陆塞浦路斯。尼科西亚在9月9日陷落。1571年8月5日，法马古斯塔在进行了一番英勇的抵抗后投降。

在之前的5月25日，由教皇、西班牙和威尼斯结成的一个神圣同盟，在经历了密集的外交努力之后终于形成。如同1538年那次一样，西班牙将承担一半的费用，威尼斯承担三分之一，庇护五世为六分之一。威尼斯人将帮助守卫西班牙占领的北非地区。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联盟，致力于每年在东地中海发动战役。奥地利的唐·约翰是查理五世的私生子，也就是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的同父异母兄弟，他出任了第一任总指挥。约翰在1571年8月9日抵达那不勒斯，并举行了仪式，接过之后飘扬在他战舰上的旗帜：上面绣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饰以三个盟友的纹章。在他麾下是16世纪以来基督徒们集结过的最为庞大的舰队，除几位盟友提供的之外，还补充了萨伏依、热那亚和医院骑士团提供的船只；一共有209艘单层甲板大帆船、6艘三桅帆船、27艘大型船只以及众多较小型的船只；一共装载了3万人，其中有28000名职业步兵。当时土耳其一支有257艘舰船的舰队一直在爱琴海南部和亚得里亚海一带劫掠，造成了极大损害。唐·约翰的队伍在9月16日从墨西拿起航，目标是寻求与这支舰队打一场遭遇战。10月7日，战斗打响，地点位于勒班陀附近的科林斯湾与帕特拉斯（Patras/Pátrai）湾交界的地方。约翰拥有的重型大炮更多，炮手也更训练有素。土耳其人完全被基督徒的炮火压制。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据说有3万人被杀或被俘，117艘大帆船被夺走，80艘舰船被毁。此前勒班陀战役一直被视为一个分水岭，如今人们虽然已不再这样认为，但它对基督徒们士气的鼓舞作用怎么说也不为过。在一篇被印刷出来并广为传播的布道文中，法国的人文主义者马克-安东尼·穆雷（Mark-Anthony Muret）宣称，现在，基督徒们必须推进到犹大，解放圣墓。在天主教会的传统中，至今这次战役胜利的纪念日仍作为玫瑰经圣母节（Feast of Our Lady of the Rosary）来庆祝。



这个神圣同盟在 1572 年 2 月 10 日再次得到巩固确认。教皇庇护五世尽了极大的努力来发展新的盟友。3 月 12 日，他发布了一份很长的声明，对象是所有虔信者。在其中，他再次重提十字军，其谈论的方式肯定会让近四个世纪之前的英诺森三世感到熟悉：

我们劝诫、要求和勉励每一个人做出决定来援助这场最为神圣的战斗，不管是亲自前往，还是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对那些不能亲自前往但却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状况，恰当地资助了人力的人们……以及同样地，那些依赖他人支持的经费亲自踏上征途、承担起战斗的艰辛和危险的人们……我们授予最完整和最圆满的宽恕、豁免和对所有罪责的赎清。而对这些罪责，他们已经以悔悟的心做出了口头的告解。这种免罪权也正是罗马圣座——我们的前任们一向赋予前往救助圣地的十字军战士们的。我们将接管前去战斗的人们的财物……将它们置于圣彼得和我们的保护之下。

一支规模庞大的先遣舰队在 8 月初与土耳其人遭遇。几场遭遇战都没有取得决定性战果，尽管它们再次显示出基督徒炮火的优越性。随后奥地利的唐·约翰与之会合，舰船的数量充实到 195 艘单层甲板大帆船、8 艘三桅帆船、25 艘盖洛船和 25 艘其他船只。基督徒们于是尝试夺取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索尼和派洛斯。可是他们失败了。其后，尽管教廷做出了种种努力，威尼斯人却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议和，西班牙人也将注意力转回北非，神圣同盟因此在 1573 年瓦解。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把自己任期余下的时间都用来重新组建一个同盟，却没有成功。

291

大家都普遍接受的是，在 16 世纪，如果说十字军的观念已经处于衰退中的话，但它仍然还具有生命力。这一共识要归因于塞顿（Setton）教授的著作，他发现了大量文献来支持这一观点。如今我们知道，传统的圣战言辞以及授予免罪权和十字军什一税的例子相当多（比如经常授予威尼斯），尽

管其中有些元素已经固化为形式上的，其原初的功能也已经模糊不清。西班牙的十字军税（*cruzada*）本来是一种通过购买十字军赎罪券以获得相应特权的税种，在16世纪时有一部分已经被转用来支付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重修的费用。事实上，十字军税其后已经越来越偏离原初的目的，因此作为一种以缴税换取特权的形式，它直到20世纪还留存着，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Pueblo）直到1945年才废除。因为免罪权授予给了所有与土耳其人作战的人们，不论他们是否宣誓接受十字架，而各个神圣同盟雇用的士兵大多数是职业士兵和水手，因此我们根本不清楚到16世纪70年代时到底能找到多少十字军战士，即宣誓接受十字架的志愿战士。尽管如此，十字军运动还是一股鲜活的力量，任何一名天主教统治者都不能忽视。考虑到人们对土耳其人普遍心怀恐惧，十字军无论如何也还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卡尔·布兰迪（Karl Brandi）认为，在《马德里条约》中，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就十字军达成的共识是，“它古怪地复现了中世纪法兰西和勃艮第已经过时的信念”。如今，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大可能再响应他的观点了。

另一方面，也没有人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这场运动此时正在迅速衰退。像威尼斯和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直接与奥斯曼土耳其人接触的国家，它们与穆斯林缔结的条约或和约并不能说明这一点（在本书的各处，我们都大量提及从最早期开始，那些对十字军运动具有无可争议的投入程度的统治者与穆斯林达成的停火协定），但法国与土耳其的盟约却属于另一种范畴。一个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十字军运动主要推动者的国度，现在却放纵地接受了这种现实政治的事实，这就是有力的证据，说明变化正在发生。尽管伊斯兰势力早在12世纪就已被基督教统治者引导用来对抗与自己同信仰的敌人，但这种手段在16世纪得到应用的程度仍是一种信号，表明对一种理想的投入程度已经不再如同往昔那般强烈。

总之，这项运动正在衰退但还没有消亡，尽管在1578年之后我们已经能明显地看见其余晖。少数几个例子说明，十字军运动仍然是一股存在着的力量，即使以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很难非常详细地论证这一点。

1645年，土耳其人入侵威尼斯所辖的克里特岛。战斗持续了近24年，直到伊拉克里翁（Iráklion，即干地亚 [Candia]）在1669年9月26日投降，威尼斯舰队在教皇和医院骑士团提供的舰船的帮助下，仍在爱琴海积极开展了一系列行动，目标是封锁达达尼尔海峡。1656年，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附近的博斯卡达岛（Bozcaada，即特尼多斯岛 [Tenedos]）和利姆诺斯岛被攻下并坚守了一年。

1684年3月，在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未果之后，教皇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 XI）与波兰、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威尼斯组建了一个新的神圣同盟。在战斗之外，同盟的活动还有传道动员、十字军什一税征收、热情的招募动员活动以及为本土势力间各种调停所做的祷告等各方面的支持，这让人想起之前若干世纪中的情形。同盟发动了一次战役，持续到了1699年，这让教廷的财政状况日益窘迫。1686年，布达被夺下。1688至1690年，贝尔格莱德得到坚守，基督徒们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征服也得以巩固。在1685至1687年间，威尼斯人几乎占领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1687年10月至1688年4月间，他们还控制了雅典，在攻城战中他们炸飞了帕台农。1684年，他们占领了莱夫卡斯（Levkás）岛。在1694至1695年间，他们占据希俄斯岛约五个月时间。

土耳其人在1715年再次开战，重新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并夺取了提诺斯岛（Tinos，威尼斯人统治该岛已超过500年之久）。1716年，皇帝查理六世与威尼斯结盟。一支由萨伏依大公尤金率领的基督教军队，在巴尔干半岛狠狠地让土耳其人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夺取了彼得罗瓦拉丁（Petrovaradin）<sup>①</sup>和蒂米什瓦拉（Timisoara）<sup>②</sup>，后者是穆斯林在当时属于匈牙利的领土上保有的最后一个要塞；1716至1717年则是贝尔格莱德。

防守克里特岛和维也纳的人们都获得免罪权。成千上万名“志愿者”在克里特岛和1684年战斗的神圣同盟军中参战。这个同盟比16世纪时的各个

① 今塞尔维亚北部城市。——译注

② 今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译注

同盟要成功得多。这些志愿者真是十字军战士吗？还没有研究者从十字军运动的角度考察过这些战争。但我们似乎有理由至少假设这一点：十字军运动在其中仍然有所体现。

## 圣约翰医院骑士团与马耳他

这项运动及其精神肯定在最后一个骑士团国家中留存着。撤出罗德岛还不到一年，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就开始与各方谈判以获取一个新的基地。1530年3月23日，皇帝查理五世将马耳他岛、戈佐岛和北非城市的黎波里授予该团，由此也把他们的放置在了防护西班牙在非洲的领土的最前线；一如他的前辈们卡斯蒂利亚诸王利用西班牙的军事骑士团那样。18个月后，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洗劫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索尼，试图表明其对更宏大的基督教事业的价值。但这并没让教皇觉得特别了不起；他还说，如果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而不只是洗劫一番的话，应该会更好。不过这次洗劫可能导致有人在1553年提出建议，让该团接管科隆尼这座不久前重新夺回的城镇。前文中已经提到他们在1551年把的黎波里拱手让给了土耳其人，但不论他们的声望因此受到多大损害，1565年土耳其人派出一支庞大且装备精良的舰队力图平定君士坦丁堡与北非之间的运输路线时，他们英勇地抗击了这样一支舰队，保卫了马耳他；这就足以补偿一切损失了。5月19日，25 000人的土耳其进攻队伍开始登陆该岛。大团长拉瓦雷特的约翰（John of la Valette）拥有的与土耳其人相抗衡的兵力是8 000到9 000人，包括约500名骑士团弟兄和若干武装的扈从，以及4 000名火绳枪兵和3 000到4 000名马耳他的非正规武装力量。进攻一直持续到了9月8日，之后，已经蒙受了惨重损失的土耳其人，在约12 000人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增援部队即将来到之前选择了撤退。土耳其人在大港的海滩上留下一片荒凉惨败的景象。在这一片狼藉中，最初的八九千名守军只剩下600名还能拿得动

武器。围攻开始前的那 500 名骑士团弟兄中，300 人阵亡，剩下的也大多受了伤。

医院骑士团对马耳他岛并不热心。这只是个荒凉的小岛，仅有 95 平方英里，防御工事也疏于维修。在其修建的各所教堂中，栩栩如生地保留下了他们对往昔的回忆（圣约翰教堂、圣凯瑟琳教堂、胜利圣母教堂），各教堂的守护者都与罗得岛上教堂中的一样。起初它也没有启动野心勃勃的修建计划：只建造了一些简单的修道院建筑和两个要塞。1565 年之后，随着其声望增强，为这个岛又已经花费了那么多精力、抛洒了那么多热血，骑士团的态度也改变了。一座由弗朗切斯科·拉帕雷利（**Francesco Laparelli**）设计，吉罗拉莫·卡萨尔（**Girolamo Cassar**）负责装饰，并以拉瓦雷特的约翰的名字命名的新城在岛上建立起来。它俯瞰着大港，该地曾是若干激烈战役的战场。这座城市的特点之一是修道院建筑与市镇融合在了一起，而没有形成单独的区域，因此，整座城市就如同一个大型的修道院建筑群。该城防守严密，而 17 和 18 世纪医院骑士团还在不断强大港周边的防御工事。但事实上，尽管 1614 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土耳其人劫掠，但在 1798 年前他们并没有认真进攻过这里。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该骑士团在早期现代的内部历史就得到了修正，得出的画面远远比之前的更加积极。骑士团弟兄们许下的誓言确实开始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实现，许多指挥官并不在岛上，其他一些人则在骑士团他处的地产上过着富裕乡村绅士的生活。而骑士团的征服已经变得越来越专制，越来越局限于少数管理阶层人士，因为内部的阶层已经开始意味着一切。尽管在 1526 至 1612 年间全体骑士大会平均每六年就举行一次，但在 1631 至 1776 年间却几乎没有召开过，除了因经济问题迫使大团长召集过一次之外。因此，在 17 和 18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骑士团的惯例完全取决于团长，而这一头衔在罗得岛时期已经又改为了大团长。但这个阶段它还远远没有衰退。在 1700 年时，它仍然在整个天主教欧洲拥有 560 个长官辖区。其宗教生活从反改革观念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充满着郑重地追求虔诚、慈善和

传道目标的行为；还常常与耶稣会合作，沿着其传统的路径，照顾病人，捍卫基督教世界。骑士团仍然吸引着应募者前来，在 1635 至 1740 年间骑士团弟兄的人数（主要是骑士）从 1 715 人上升到 2 240 人。安东尼·勒特雷尔（Anthony Luttrell）博士曾指出，尽管它是个贵族团体，但医院骑士团吸引了“大批新加入者，他们都拥有令人瞩目的和非常高超的符合当下潮流的军事、外交、科学和技艺方面的兴趣和能力”。骑士团在瓦莱塔拥有的很好的图书馆，仍然能够为众多骑士团弟兄的文化追求提供支撑。这些人中包括诸如路易·德·波瓦杰林（Louis de Boisgelin）和戴奥达特·德·多罗缪（Déodat de Dolomieu）这样的人物。当然，由此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启蒙的观念在其中传播，甚至也包括共济会组织。

医院骑士团始终是一个外来的精英团体、一个封闭的寡头种姓集团，他们甚至拒绝马耳他当地的贵族进入自身高阶兄弟的行列，只允许他们的孩子作为神父加入；尽管有些家族有时会安排让自己的孩子在西西里出生，期望这能让他们具备加入骑士行列的资格。历任大团长们作为仁慈的（如果不称他们为呆板的话）僭主统治着他们的骑士团国家。他们建造医院，鼓励艺术创作。在 1676 年创立了一所著名的解剖学学校以协助医院的运作。1768 年，他们还创立了一所大学。当地人口从 1530 年的大约两万人上升到了 1788 年的超过九万人，这主要是由于船坞和兵工厂提供了就业机会。而骑士团专门为当地人建立了一个医疗服务机构。1566 年之后，建造瓦莱塔新城的决定做出后，相应展开的修建运动吸引了来自乡间的劳工，以及来自西西里的大约 8 000 名劳工。大港周边的城区发展迅速。到 1590 年时，瓦莱塔有 7 750 名居民。而所谓的“三城”，到 1614 年时大约有 11 200 名居民，到 1632 年时约有 18 600 名。与罗得岛一样，马耳他岛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航运吞吐量日渐增长，成为东方的货物运往各地甚至远达美洲的转运港。早在 1783 年，美国就在那里派驻了一名领事。这里的检疫服务是在地中海地区公认最为有效的。马耳他岛与法国的商业联系尤其紧密，18 世纪时，造访马耳他岛的船只中有一半属于法国。部分出于这个原因，拿破仑对其起了心思。

马耳他在法律上并不拥有自治权，它是西西里王国的一块封地。迟至1753年，当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七世宣布自己对这里拥有主权时，一场政治危机就席卷了这里。虽然如此，历任大团长们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地行使了各种主权。刚一征服罗得岛，他们就开始自己铸币，而且从该岛派遣使节驻扎在欧洲各国的宫廷，其功能主要是捍卫他们的地产和特权免受觊觎者的侵害。他们从马耳他派出的大使得到了罗马、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正式接纳。可能早在15世纪，他们就设立了一些荣誉骑士头衔，授予与他们的工作密切相关的一切在俗人士。1607年，在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获封大公近400年之后，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他们对主权的要求获得了承认。但这个过程最终是由大团长曼诺埃尔·品脱（Manoel Pinto, 1741—1773）完成的，他采用了已经终止的王室称号，标志着获得了完全的主权。

医院骑士团继续有效地行使着其军事作用。他们几乎在所有对抗土耳其人的同盟和主要战役中都发挥了作用。直到现在，帕萨瓦（Passava）、勒班陀和希腊的帕特拉斯以及突尼斯的哈马迈特（Hammamet）要塞（在1601至1603年间被暴风般地夺走）的钥匙，都挂在瓦莱塔其修道院教堂中的菲勒莫斯圣母礼拜堂（the chapel of Our Lady of Philermos）里。1664年，他们进攻了阿尔及尔岩。1707年，他们帮助西班牙人守住了奥兰。他们的船只规律地出现在海上，沿着北非海岸并在一个往西抵达西西里和撒丁岛、往东至克里特和伯罗奔尼撒的区域内巡行，目标是荡平地中海的伊斯兰海盗。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该团拥有一支有七八艘单层甲板大帆船的舰队。1705年后，它又逐渐用由四五艘战列舰（各装备有五六十门炮）组成的小舰队取代了老式舰队。尽管维持这支军事力量花费不菲，17世纪时骑士团总部平均每年45%的收入要花在这个上面，但医院骑士团还是持续对伊斯兰船只进行激进且极具毁灭性的打击。土耳其人1551年对的黎波里的进攻，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报复医院骑士团对邻近若干伊斯兰港口进行的一系列进攻。从1722至1741年的这些年间，它的战列舰至少摧毁了1艘土耳其船只和

15艘柏柏尔海盗的船只，它的大帆船战舰又摧毁了从黎波里来的5艘船只。就在马耳他沦陷的1798年，它的舰队也仍然活跃。它为自己的骑士们进行的海军训练赢得了不少赞赏。当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想要在波罗的海建造一支大帆船舰队时，她寻求来自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一名骑士的帮助。骑士团弟兄中的著名法国水手包括17世纪的骑士图维尔（Tourville）、奥康科尔（d'Hocquincourt）以及瓦尔贝特侯爵（marquis of Valbette），还有18世纪伟大的拜里夫·德·萨福伦（Baillif de Suffren）。骑士团正式的海上行动又得到了科索劫掠的补充。这类活动在18世纪上半叶有38%是由医院骑士团负责指挥的，尽管马耳他当地人也倾力投入其中。迟至1675年，大约有二三十名活动频繁的海盗是以马耳他为基地的，不过此后这个数字开始下降。到1740年时，只剩下了大概一二十名，此后就湮没无闻了。

事实上，到18世纪中叶，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事正在绝迹，医院骑士团的角色也有些过时了。骑士团遭到法国大革命和其他革命战争的沉重打击，毕竟它是“古代政权”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1792年，它在法国的所有财产被没收。到1797年时，它失去了所有处在莱茵河以西、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地产。它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新任大团长霍佩什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Hompesch）开始与奥地利和俄国接近，这让法国感到警觉。1798年6月，本就因商业和战略原因已经盯上了马耳他岛的拿破仑，在前往埃及的途中，让自己的舰队闯入马耳他岛的水域，并要求进入大港。当骑士们尝试强调自己的中立权时，拿破仑发动了进攻。很能说明骑士团已经衰朽的是，他们根本无力抵抗他的进攻。此时在岛上的332名骑士中，50名因为太老或者生病而无法战斗，剩下的人就应当如何应对产生了分歧。指挥权握在因资历而非荣誉当选的骑士手中。枪炮都过于陈旧，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没有开过火了；骑士们发现，火药都已经腐坏，无法有效发射。城中的民兵没有战斗经验，不守规矩。而且很难说到底哪一方更加畏惧哪一方：民兵畏惧法国人？或者刚刚经历过一场民众起义的骑士团畏惧民兵？骑士团采用了过时的防守策略，不到两天，几乎没出现什么流血伤亡，分散在岛中各处



而没有集中在瓦莱塔的守军们就被征服了。霍佩什的斐迪南和他的骑士团弟兄们被轻蔑地驱逐出岛。

尽管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直到今天还仍然存在，其主权仍然得到许多国家的承认，仍然是教会的一个修会，甚至理论上讲仍然是一个军事修会，但它如今主要致力于看护穷人和病人；而十字军运动则随着 1798 年 6 月 13 日马耳他岛的沦陷而终结。与条顿骑士团一样，医院骑士团与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各个非天主教的分支有着联系，共享着同样的历史。它在马耳他岛的最后举动中充满着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东西。就在当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基督教骑士们起而服役的 700 多年之后，这群骑士也仍然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着迷于他们的地位，正如他们位于瓦莱塔的修道院教堂的地板上铺设的纪念马赛克画所描绘的那样。这些骑士团弟兄（他们是被圣贝尔纳鼓动起来的人们的后裔，许多人都是 12 世纪的十字军战士的子孙）组成的骑士团国家，是 14 世纪的神学家们提出的那种十字军政权的遗存，它却在一位法国将军率领的前往埃及的舰队面前瓦解了。当然，拿破仑并不是一名十字军战士，但他在埃及取得的胜利强过路易九世。而且这段故事最后还有一个曲折的情节。拿破仑没收了装饰着医院骑士团留下的各处遗址的宝石和贵金属，其中许多是他们一路从巴勒斯坦历经塞浦路斯和罗得岛而带到马耳他岛的。这批宝藏的大部分如今仍然躺在阿布基尔湾的海底，是在纳尔逊攻击法国舰队时沉落的。但拿破仑在亚历山大城和开罗的集市上也变卖了其中的一部分以充军费。于是，十字军运动的代表们当年在东方获取的贵金属，在六个世纪后以这样的方式回归了。

## 十字军运动的消亡

十字军运动在消亡时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到 15 世纪时，随着人们对教廷所怀希望的日益幻灭，德意志，或许还包括法国，都出现了对于十字军漠不关心的态度。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减少了欧洲的天主教人口，让每

一个人都卷入了身不由己的激烈斗争中。到 17 世纪时，坚持倡导十字军运动的仅限于教皇们、需要直接面对土耳其人的国家，以及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经常招募成员的那些家族。最后一批十字军运动包括葡萄牙的塞巴斯蒂安在 1578 年的行动，以及十年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行动。最后一个为十字军而组建的同盟，是 1684 至 1699 年间的神圣同盟。最后一批为接受十字架参加十字军而许下的誓言，可能出现在 17 世纪末或 18 世纪初。最后一个仍然发挥作用的骑士团国家，是 1798 年之前马耳他岛上的医院骑士团国家。

根据本书最后两章里列出的种种证据，早期对衰亡的解释已经不再令人信服。东方的失败不太可能造成过于严重的幻灭情绪，而如果这场运动还能持续五百年的话，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兴起也不太可能创生出让它无法存活下去的恶劣氛围。甚至连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也不会让它消亡。当然，到 16 世纪时，十字军运动本身已经发生了改变，但这只能表明它具有适应性。很显然，它的消亡是某种比情感因素或政治环境更为根本的因素的结果。它所建基于其上的道德神学在两个领域中已经过时。在 16 世纪，基督具有的使用武力的权威受到挑战，其催化剂之一是多明我会修士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对其同胞针对新世界印第安人犯下的暴行的谴责。对维多利亚及其追随者，尤其是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co Suarez）和费利佩·阿亚拉（Felipe Ayala）来说，暴力的主要合法证明不能是神圣计划，而必须是“共同善”（common good）；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概念，并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中得到了初步的阐发。对维多利亚、苏亚雷斯和阿亚拉而言，正是对共同善（每个社群的显著特征）的捍卫，才有了权威和某些合法性。由此，有关正义战争的争论很快从道德神学领域转移到了国际法领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一步由阿贝里克·根特利（Alberico Gentili）和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发展起来。上帝被从天平上移除，正义战争失去了神圣赞同的光环。近现代对暴力合法化论证的下一个进化阶段是在 19 世纪完成的，这可能是拿破仑战

争之后横扫欧洲和美洲的和平运动的成就。这项运动在 19 世纪 30 年代之后分裂为绥靖主义者和温和派两派。暴力天然就是恶的，这种不被早期战争理论家们认可的信条是从绥靖主义那里借来的；而随之发展出的主张是，武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变得不那么罪恶。

无论如何，到 18 世纪时，神圣战争已经不再时兴，而被认为是一个疯狂、愚昧、无知年代的产物。知识分子们怀着悲伤和蔑视各半的情绪来审视十字军运动。对百科全书派的德尼·狄德罗而言，“这些恐怖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后果，是“国家人口凋敝，修道院暴富，贵族贫困化，神学原则被毁，轻视农业，现金缺乏以及无穷无尽的烦恼”。对大卫·休谟而言，它们“此后一直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作为有史以来在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度出现过的最有符号意义也最持久的人类愚昧的丰碑”。爱德华·吉本的论断是，它们——

延迟而不是促进了欧洲的成熟。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命和辛劳都葬送在了东方，而这些本来可以更加有效地用于改善他们自己国家的状况：工业和财富的积累本可以从航海和贸易中源源不断地获得；如果以纯粹的友好方式回应东方当时的氛围，拉丁人本可以变得富有和开明。

由于受到流行舆论的鄙视，十字军运动的最后残迹实在无力再为继。拿破仑写道：“马耳他……当然拥有众多进行抵抗的物质条件，但却毫无士气可言。”



在 19 世纪早期，尽管启蒙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种尖锐观点还偶尔能够听到，但随着基督教圣战作为一股活生生的力量已经绝迹，于是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开始笼罩在欧洲的十字军历史之上。助长了这种浪漫气氛的是人们对谱系的普遍迷恋，是共济会及其据说源于圣殿骑士团的根源，以及条顿骑士团和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如今以马耳他骑士团之名而为人所知）的持续存在。十字军运动很快就开始吸引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弗雷德里希·威尔肯（Friedrich Wilken）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的《十字军史》（*Geschichte der Kreuzzüge*）在 1807 至 1832 年间分七卷推出。他是第一位综合利用东西方的文献撰写出一部以文献为基础的批判性描述作品的学者。该书一直叙述到了 14 世纪早期。冷静而谨慎的详尽叙述当时正成为德国史学的一大特征。这种特征在今天仍然可以找到，体现在威尔肯在美国的后继者们所称的“微观史学”形式中。在美国，他的学术风格很有影响力。然而，我们不能背离的一个事实是，微观史学可能非常枯燥无聊，而这个形容词却绝不会用来形容与威尔肯的著作同时期完成的另两部作品：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护身符》（*The Talisman*），出版于 1825 年；以及约瑟夫·弗朗索瓦·米肖（Joseph François Michaud）的六卷本《十字军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在 1812 至 1822 年间问世。

### 批判性的罗曼史

司各特的小说《护身符》的核心故事是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一位

看似很贫穷的苏格兰骑士与萨拉丁之间的友谊。同时他们各自也有很多传奇经历。这位骑士结果是一名王公，赢得了他所钦慕的女士的爱恋。而萨拉丁总是以各种让人分辨不出的乔装打扮出现，其中包括装扮成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还治好了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的病。令人震惊的是，小说始终把穆斯林的形象描绘得比十字军战士们好得多，而十字军战士们的性格从轻率、放纵、幼稚到傲慢和不诚实。在导言中，司各特写道：

好战的角色理查一世，狂野不羁又慷慨大方，体现了一种骑士精神，但又有其种种夸张的德行和同样荒谬的缺点。这个人物与萨拉丁相对。在书中，基督教和英国的王室成员体现了一位东方苏丹所有的残忍和暴力。而另一方面，萨拉丁则显示了一位欧洲君主的智谋与审慎。

300

司各特可能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但他同时也继承了18世纪的学术观点，代表着这样一个思想学派：既浪漫又批判性地处理主角。其对主角不赞同的色彩又得到一种清教信条的强化，即十字军运动乃是天主教的偏执和残忍的又一表现形式。要司各特和其他人将十字军战士描绘得勇敢而富有魅力但同时又落后而不开化，残忍地攻击更为通晓世情也更文明的穆斯林，这并不困难。且不管12世纪时西欧和近东的文化发展的真实状况分别如何（其实也几乎与罗曼史中设定的相差不远：将十字军战士置于中世纪中期的情境中，但将他们的对手置于另一种19世纪情境中），这样解读历史的方式绝对是时代倒错的。在其东方服饰的伪装之下，司各特的萨拉丁与其说是一个东方人物，不如说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欧洲绅士；而与之并肩而立时，中世纪的西方人当然总是显得表现不佳。

尽管如此，《护身符》却是司各特继《艾凡赫》(Ivanhoe，其中对十字军战士的刻画也并不留情)之后最受欢迎的十字军小说。它多次被改编成戏剧，并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它激发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画家们的灵感。它对萨拉丁的刻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政治家。萨拉丁在大马士

革的残破墓地开始成为欧洲人旅游观光的景点，但还要等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一次夸张的致敬举动（在1898年的一次旅途中，下面我们会谈到），才让萨拉丁得到了伊斯兰公众的全面关注，而在此前他们已经几乎完全忘记了他。

批判性浪漫主义立场所具有的潜能，在其继续进行的有关十字军的写作（无论是学术性的还是大众的）的程度上得到了体现。在英语世界上最广为阅读也最有声望的相关史学著作，即史蒂芬·朗西曼爵士（Sir Steven Runciman，又是一位低地加尔文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出版的那部；如果沃尔特·司各特再博学一点的话，写出来的应该就是他那个样子的。在那部书中，十字军战士的性格是英勇而丰富多彩的，但同时又很粗野而不那么光彩。而那段著名的结束语，司各特也很可能这么写：

勇气满溢但荣誉甚少，虔诚满溢但理解甚少。崇高的理想被残忍和贪婪玷污，事业心与坚忍意志被盲目和狭隘的自以为是玷污；而圣战本身无非是以上帝的名义做出的一场漫长的不宽容的展演，这是一种有违圣灵的罪行。

## 浪漫的帝国主义者

另一方面，约瑟夫·弗朗索瓦·米肖所著的史诗般的《十字军史》，在复辟时代出了四版，在七月党人当政期间又出了五版，这本书洋溢着热情四射的民族主义情绪。作者作为一名狂热的保皇派，却是在他所鄙视的拿破仑政权时期开始自己的研究。米肖相信，十字军运动让所有参与其间的欧洲国家都获益：

301

因这次战争而闻名的那些名字，时至今日还让其家族和家乡感到荣

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最为积极的结果，是我们父辈获得的荣耀，这种荣耀同时也是一个国家获得的真实的益处。

他又进一步坚持认为，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法国获益最多：

法国有朝一日将成为欧洲文明的典范和中心。圣战对这种令人愉快的发展贡献良多，我们能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的历史中看到这一点。

他的《十字军史》比威尔肯的带给欧洲公众更多冲击，而它在法国激发的民族主义气氛在凡尔赛宫的十字军大厅中得到了体现。这是国王路易·菲利普对这座宫殿的装饰计划的一部分，而这座宫殿将成为献给法兰西荣光的一座博物馆。大厅的五个房间中包括了 120 多幅描述十字军历史场景的绘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尤金·德拉克洛瓦的《十字军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进入君士坦丁堡》（现藏于卢浮宫）；还陈列着那些其祖先参加过东征的家族的纹章。法国贵族们为了纹章的入选资格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当大厅在 1840 年开放时共有 316 个家族的纹章得到展示，但其他也想入选的家族掀起了一股反对的声浪，并提供各种文献资料（很多是伪造的）来证明自己具有十字军传统。大厅只好关闭，一直等到 1843 年又加入了不少纹章之后才再次开放。

法国人是最先开始以十字军辞令描绘他们在当代的帝国主义事业的。他们 1830 年对阿尔及利亚的占领被比作路易九世 1270 年在突尼斯的登陆。在米肖的《十字军史》于 1838 年推出的一个缩写本中，他的合著者让-约瑟夫·波尤勒（Jean-Joseph Poujoulat）断言：“1830 年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以及我们最近在非洲的探险无异于十字军东征。”凡尔赛宫有两个房间献给了阿尔及利亚战役中的关键时刻，而在看到贺拉斯·贝内特（Horace Vernet）描绘 1837 年法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绘画时，当时有人宣称：



我们再次发现了这里，在 500 年的间隔期之后，法国再次用鲜血滋润了这片被伊斯兰的帐篷燃烧了的平原。这些人是查理·马特、布永的戈弗雷、罗贝尔·吉斯卡尔和菲利普·奥古斯都的后代，继续着他们的前辈们未完成的苦辛。传教士和战士们，他们每天都在扩展基督教世界的边界。

马耳他的法国骑士们脑海里充斥着不成熟的计划，想要帮助希腊的背叛者反对土耳其人并为自己的骑士团重新夺回罗德岛，提议法国把阿尔及利亚给他们作为一个骑士团国家来管理。在 19 世纪 50 年代，法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也完全被用十字军的辞令加以描述。当拿破仑三世的征服决定为马龙派出头而出兵干涉黎巴嫩时，确实有人讨论过是不是要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1860 年，拿破仑对出发前往黎凡特的法国军队讲话时，用的就是米肖式的语言：

你们将出发前往叙利亚……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充满了伟大的记忆……你们将表明自己是那些光荣地在那片土地上高举基督旗帜的英雄们当之无愧的后裔。

查理-马夏尔·阿勒曼-拉韦杰里 (Charles-Martial Allemand-Lavignerie)，1867 年开始担任阿尔及尔大主教，1882 年开始直至去世担任红衣主教。他满脑子都是十字军的意向，于是为一个专门在北非运作的新的骑士团制定了规则，还提议派仍留存的骑士团的成员（老迈的骑士，根本没办法再胜任战士之职）去保护东非的天主教传教士。

发展出国家性的十字军运动神话，并将其与帝国主义扩张的现状相联系，这样做的绝不止法国一个国家。比利时认领了布永的戈弗雷为本国的先驱。挪威的民族主义者望向了西格德国王。德国列举出了本国参与十字军运动的八位统治者，首屈一指的就是红胡子腓特烈。西班牙拥有再征服运动的

荣光，这是一场对抗摩尔人的民族解放战争，涌现出了像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三世这样的英雄人物；西班牙在19世纪50年代对摩洛哥的入侵也被描述成了一场十字军战斗。英格兰拥有“狮心王”理查一世。1876年，人们对据说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犯下的暴行愤恨异常，以致一位为英国天主教徒写作宣传手册的作者不得不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不能因此对土耳其人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36年前，理查德·希拉里爵士（Sir Richard Hillary），至尊圣约翰骑士团（the Most Venerable Order of St John，多个宣扬医院骑士团传统的非天主教骑士团之一）的前身组织中一位激情满满的成员，就曾公开宣扬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计划，他想要解放圣地，并由马耳他骑士团加以统治。

303 将十字军运动视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有的观点，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造成的后果而更加增强。一支英国军队攻入巴勒斯坦；在随后奥斯曼帝国解体的过程中，英国和法国堂而皇之地占领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被置于国际联盟的托管之下。尽管英国军队司令阿伦比将军从来没说过据说出自他之口的“今天，十字军东征的战争终结了”这句话，而且他还切实采取了措施避免造成冒犯，尤其是当穆斯林还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情况下；《笨拙》（*Punch*）杂志却发表了一幅名为“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的漫画：在画面中，理查一世从远处凝望着耶路撒冷，图题是“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1920年抵达大马士革时，有人听到法国驻叙利亚的第一任军事长官亨利·纪尧（Henri Gouraud）将军说：“小心点，萨拉丁，我们回来了。”

法国的托管统治的确立，激发了一波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潮。其主题之一就是，十字军的成就写就了一段历史的第一篇章，而其高潮则是现代帝国主义。让·隆侏（Jean Longnon）写道：“法兰克这个名字（在黎凡特）一直是高贵、勇气和慷慨的象征……如果我们国家应邀前来接管叙利亚的托管权，那也正是这种影响力的结果。”提及拉丁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终结，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这样为他的三卷本《十字军史》（*Histoire de croisades*, 1934—1936）做总结：“圣殿骑士团坚守托尔托萨

以南的卢阿德岛只到 1303 年，但从那里开始，有一天——1914 年——‘法兰克人’将重新踏足叙利亚。”威尔肯在美国的后继者们非常不赞同格鲁塞的论调，并计划要写一本美国式的通史与之抗衡。但这部作品却用了好几十年才完成。许多最初的作者还没完成各自的章节就都已经过世；若干名欧洲人，其中还包括格鲁塞的学生，都不得被纳为新的作者。

浪漫主义的帝国主义者相信，十字军的成就如今正在重现，落后的伊斯兰社会将从基督教的统治中获益。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 (François René Chateaubriand) 是米肖的朋友，也是另一位被十字军的历史勾起民族荣耀的人。他持这样的观点：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摧毁身为文明之敌的伊斯兰教，因为后者完全不懂什么是自由。爱德华·萨义德 (在《东方学》里) 写道，这样的观点需要“一种几乎让人难以忍受的、近乎无意识的、对欧洲写作的权威赋予”。对帝国主义的积极评价基调，则在克劳德·孔德尔 (Claude Conder) 爵士的《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1897 ) 一书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十字军并不是野蛮地入侵巴勒斯坦，仅仅造成痛苦和破坏。耶路撒冷王国是公正和仁慈统治的典范，正如我们所说的要给予印度的。它们所处的情况大致类似。

孔德尔的出版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 (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在为他的书做广告时这样唤起人们的记忆：“东方主义者所处的境况，几乎与欧洲在布永的戈弗雷和‘狮心王’理查的时代干预东方问题时的处境毫无二致。”

## 新帝国主义者：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锡安主义和穆斯林

304

在一个十字军运动已经绝迹的时代，浪漫主义的帝国主义却不恰当地用

十字军的外衣披挂在欧洲殖民扩张行动之上。随着帝国主义自身受到指责，这种举动注定要遭遇麻烦，也为诸如诺曼·丹尼尔这样激烈的批评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在他看来，认为伊斯兰教更加劣势的假设，乃是基于在十字军时期产生的一些不正当的观点。法国的帝国主义史与保守的天主教相连，强调观念的力量驱动着十字军；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去除其伦理色彩之后，十字军被自由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家从社会和经济层面进行了解释，但他们所有人都从帝国主义者那里继承了同一信条，即认为十字军运动乃是殖民主义的一个先例。

这种新帝国主义的和物质主义的解释很快成为流行的正典，尽管研究十字军运动的专家们并没有参与其间，也没有人哪怕稍微仔细研究并对其加以论证过。这股潮流似乎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在十字军史学家中间取得一定地位，急先锋是以色列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约书亚·普拉维尔（Joshua Prawer）。在他看来，将十字军描述为殖民主义者的前身，与锡安主义对自大流散时期以来应许之地的历史的解释相一致。普拉维尔极其有力地采纳运用了新帝国主义，这有助于使其对公众的思维产生影响。

在最热情地宣扬新帝国主义解释论调的人中，还有伊斯兰历史学家们的身影。他们对十字军史的书写始于 19 世纪 90 年代，此时奥斯曼帝国正处于危机之中。面对着巴尔干半岛上的叛乱和分裂活动，并承受着来自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压力，奥斯曼帝国被迫承认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独立，保加利亚的自治，并割让了一些领土给俄国人、希腊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这一连串灾难的反应是求助于泛伊斯兰主义。这是一种崇尚所有穆斯林在同一个普世权威的统治之下联合起来的意识形态。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身为哈里发的这个角色，尤其是在他拥有这个身份的权利受到挑战之时。但他做的比这还多。他公开宣扬自己的一种确信，认为欧洲人正在启动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他使用这个词组，实际上就响应了已经席卷欧洲达半个多世纪的那种辞令。他的说法被泛伊斯兰主义的媒体采用，并运用在了他为第一部由穆斯

林撰写的十字军运动史（出版于 1899 年）所写的导言中。这本书的作者萨义德·阿里·哈里里（Sayyid 'Ali al-Hariri）写道：“我们最荣耀的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已经非常正确地评论说，欧洲正在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对我们实施一场十字军运动。”

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我们往往认为，穆斯林从他们中世纪的先祖那里继承了关于十字军实施暴力的苦痛历史。但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事实的了。在此之前，穆斯林并没有对十字军表示出多少兴趣，只是很漠然且带些自得情绪地对其稍作回望。毕竟，他们相信，他们完全击败了十字军。他们把十字军从黎凡特赶了出去，在巴尔干半岛也取得了胜利；在那个半岛上，他们所统治的领土范围比西欧定居者们曾在东方统治过的要大得多。

伊斯兰世界突然开始对十字军感兴趣后，这一趋势又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 1898 年 11 月前往大马士革访问时做出的举动加强了。他在已经损毁的萨拉丁陵墓前敬献了一面绸缎旗帜和一个花圈，上有铭文：“献给英雄苏丹萨拉丁”。他还将掏钱重修这座陵墓，并为它加盖了一个非伊斯兰风格的大理石护棺，上面也摆着一个花圈，不过这次是青铜熔铸的，上面铭刻着“由一位伟大的皇帝献给另一位”。在此后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德皇表达了他踏足萨拉丁所在土地的喜悦之情。他认为萨拉丁是“历史上最具有骑士精神的统治者之一”；还补充说，他是“一位无惧无畏的骑士，教会了他的敌手们什么才是真正的骑士精神”。德皇的举动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响应了《护身符》的描述，萨拉丁就此以这种形象重新被引介给了黎凡特的穆斯林。一年后，埃及诗人艾哈迈德·绍奇（Ahmad Shawqi）质问人们，萨拉丁的伟大怎么会一直被伊斯兰作家们忽略，直到威廉皇帝提醒他们时才想起呢？

无论如何，哈里发发表了权威言论，称十字军仍在继续，而伊斯兰世界已经被他的这一权威言论唤醒了。而与此同时，西方正在构建着两种同样流行但却互相抵触的观点。在由沃尔特·司各特开创的批判浪漫主义观点中，野蛮并富有毁灭性的十字军战士在道德和文化上均处于劣势，面对的是文明开化和思想现代的穆斯林。而在发端于约瑟夫·弗朗索瓦·米肖的浪漫主义

的帝国主义观点中，同样是这批十字军，却为一个未开化的世界带去了启蒙之光；而如今，他们的后裔又回到这里完成他们开启的工作。人们很容易就为这种观点再添上这样的注释：欧洲输掉了十字军运动的第一轮，如今又启动了新一轮。这种阴谋论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观点中获得了共鸣，开始作为对英国和法国占领大部分北非和黎凡特以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回应而出现。

从第一种观点中穆斯林得到这样一种观念，西方是充满破坏性的、野蛮的，他们吸收了伊斯兰世界的文明价值观而获益，但之后却留下了大量破坏的痕迹。

306

[一位北非的历史学家问道] 我们能不能想象出伊斯兰世界从十字军东征中获得了任何的益处呢？的确，伊斯兰世界怎么可能从与一个更低劣、更落后的文明的接触中获益呢？

德皇到访后不到 15 年，一位阿拉伯作家警告人们提防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设立的定居点，还用了萨拉丁的名字作为笔名 (*non de plume*)，而一所以萨拉丁的名字命名的大学也于 1915 年在耶路撒冷创办。黎巴嫩小说家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Mahmoud Darwish) 对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描述非常类似于司各特对十字军的描述，他们的行为被用来与萨拉丁的有礼有节做对比：“我们的水源被这些代表十字军遗产的人们切断，然而萨拉丁当年却曾为敌人送去冰块和水果。”

而从浪漫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点中，伊斯兰作家获取了这样的观念：西方正在持续进攻他们。早在 1920 年，就有一位作家赞美萨拉丁挫败了欧洲征服东方的第一次尝试。在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经济史学家们的影响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十字军看作西方殖民主义用宗教外衣掩盖其贪婪本质的例证，并构成了欧洲殖民扩张的第一个篇章。1934 年，有人提出，“西方仍然在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的伪装之下向伊斯兰世界发动十字军运动”。其他人

则发展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输掉了第一轮征战之后，西方卷土重来企图报复；确实，在当年耶路撒冷王国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色列国正是一种恶意的报复举动。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将 1982 年以色列围攻贝鲁特描述成“为整段中世纪史复仇”。

## 新帝国主义史的伊斯兰化

对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为争取独立进行的斗争就是对一场仍然在针对他们进行的十字军东征的最主要反击。然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他们却受到一种复兴的军事化的泛伊斯兰主义的挑战。这种主义的追随者相信，伊斯兰是一个看不见的实体，是一种致力于敬奉关爱所有种族的主的弟兄团体。他们咒骂民族主义，因为那通常是世俗主义的，而且从本质上而言会带来分裂。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采纳民族主义者对十字军历史的解释，只是随后将其进行了全球化。民族主义关于十字军运动的过去和现状的解释强调阿拉伯要对抗殖民压迫，为争取自由而斗争；而对泛伊斯兰主义者来说，西方的敌意，而且首先是这些不信者对伊斯兰世界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渗透，都构成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吉哈德的正当理由。受到他们主要的精神领袖萨义德·屈特卜（Sayyid Qutb）的主张的鼓舞，他们坚持认为“十字军运动”这个词可以用来指代自称基督徒或属于基督教传统的人们在任何地方对伊斯兰做出的任何具有冒犯意味的行为，包括试图建立经济或政治霸权的动机，或者任何由他们的代理人（比如锡安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做出的具有侵略意味的举动。的确，他们认为，“国际锡安主义”和“国际马克思主义”都是想要殖民外部世界的帝国主义用来掩盖其“十字军主义”（旧日的基督教敌人想要颠覆伊斯兰并消灭虔信者的野心）的意识形态。

307

伊斯兰主义的军事激进派由所谓的吉哈德-萨拉菲派（jihadist-salafists）组成，也受到了一位中世纪人物的著作的鼓舞。他就是极具个人魅力的伊

本·泰米亚（Ibn Taymiyya）。对他而言，在他的时代，吉哈德的首要目的不是在边境以外发动战争，而是要清除逊尼派伊斯兰世界中的不和谐因素，比如异端和不信者。因此吉哈德就将转向内部，利用武力创建一个献给主的联合的、纯洁的社会，在这之后再将注意力转向外界。因此，吉哈德-萨拉菲派对不信者的渗透尤其敏感，他们相信后者污染了伊斯兰世界。

自从安拉创造这块平地，创造这片沙漠，并用诸海将其环绕，阿拉伯半岛从来没有被任何力量像被十字军那样如狂风般席卷过。他们在岛上像蝗虫般蔓延，食尽这里的财富，毁掉一切庄稼。

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美国在近东和中东的种种行动，都被同样用十字军的语言加以描述。

这是穆斯林对抗全球的十字军战士的战斗……真主啊，他给予我们支持，让我们坚不可摧直到苏联被打败；他将再次支持我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凭借同一群人，打败美国。

在一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战争中：

我们的目标是在面对基督徒的十字军时，让我们的民族联合起来……这是一场再次兴起的战争。最初的十字军把理查从英国带到这里，把路易从法国带到这里，把红胡子从德意志带到这里。今天，布什刚一举起十字架，十字军国家们就急忙赶来。他们接受了十字架的统治。

正是这样一种新帝国主义十字军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版本，如今正突然且大规模地在外部世界横行，因为它为采取极端暴力行动提供了历史的和道德的正当理由。



## 历史学传统面临的挑战

308

至此，我追溯了自 1800 年以来十字军历史研究中出现的批判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路径。最后一种立场由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锡安主义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分享，他们以物质主义的辞令来解释十字军运动；伊斯兰主义派也分享了这种立场，但没有以物质主义来加以诠释，因为他们倾向于认定十字军战士是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然而，在西方学术圈里，或至少在十字军史学家们出没的圈子里，自米肖以降的各种研究路径的起伏，如今正面临一种严峻的挑战。

这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术思想的发展，因为这导致了对基督教暴力史的重新检视。一种对正义力量理论重燃的兴趣，因围绕纽伦堡审判展开的争论以及有关核威慑与核制衡的争论而得到推动，又碰巧遭遇基督教暴力解放运动的激进派重新出现，作为一种富有吸引力且在神学上可提供替代理论的选择。有些基督徒认为，为了穷人的利益而使用武力是具有正当性的，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因为这是与基督为人类的意愿相符的一种慈善之举和道德驱动力。但随着相关学术兴趣的增长，没过多久，一个重要的问题就会被追问出来：到底什么是十字军？

要找到一种能够让人接受的关于十字军运动的普遍定义，一直都非常困难，因此人们常常认为最好还是将其搁置一旁。在 20 世纪写出多卷本十字军史的各位作者们，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勒内·格鲁塞、20 世纪 50 年代的史蒂芬·朗西曼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由肯尼斯·谢顿领导的团队，都没有明确说明其定义。而且一直有一个学派，以如今被称为普遍论派的派别为代表，他们相信任何做出定义的尝试，与其说是有所助益，不如说是画地为牢。他们坚持认为，任何为上帝而战的基督教宗教战争，或相信这些战斗是为了拓展上帝对人类的设计的基督教宗教战争，都能被描述为十字军。这个学派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是卡尔·埃尔德曼（Carl Erdmann），一位德国民族主义者。他憎恨纳粹主义；与此同时，可能是有意为之，他写下了一部关于

十字军观念发展的非常不具意识形态的研究作品。而另一群学者，主要是法国人，如今被称为民众论派，他们提出，十字军运动的本质并不能到教皇或骑士那里去寻找，而是存在于在农民及城市无产阶级中兴起的一种先知式的、末世论的集体兴奋情绪当中。

309 尽管近来也有复兴这些主义的尝试，但普遍论派和民众论派始终都只得到了一小部分人的拥护。今天的大多数学者都只是相当粗略地被分类为传统主义者和多元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只把旨在恢复耶路撒冷或防卫耶路撒冷而发起的战役视为正宗的十字军运动。因此，对他们来说，十字军运动本质上要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自7世纪以来开始间或爆发的战争背景下审视。另一方面，多元主义者则遵循中世纪诸位主教的立场，他们认为，尽管有很多行动是在其他战场上进行的，而且是在耶路撒冷早已不再是关注焦点的年代里发动的，但任何战役，只要是作为十字军运动来传道动员的，是由宣誓接受十字架并享有十字军特权的男男女女进行的，就与前往耶路撒冷或防卫耶路撒冷的战斗一样是正统的十字军运动。

多元主义具有非常大的潜力，能够让坚持传统主义的学者感到不悦。让·理查（Jean Richard）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立场的最后一位仍然在世的代表人物，不情愿地接受了多元主义，但他还是主张，去往东方的十字军具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对圣地的依恋”，这赋予了其独有的特点。这当然也就又把这一类运动放回到了其特有的范畴之内。汉斯·迈耶（Hans Mayer）公然摒弃了多元主义，而倾向于确信，只有目标直指黎凡特的远征才是正统的。奥托·斯梅尔（Otto Smail）至死都强烈反对多元主义。约书亚·普拉维尔也是如此。这些知名学者对多元主义的反感之强烈，表明所构成的挑战是艰巨的。这种挑战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多元主义者并没有分享这样一种确信：十字军运动是以其对伊斯兰的敌意及其战场在黎凡特来界定的。对多元主义者来说，穆斯林在其中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尽管穆斯林仍然是最主要的对手，但多元主义者也会考虑到其他的战场以及其他的敌人：信仰异教的文德人、波罗的海南岸居民和立陶宛人，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信仰东正

教的俄国人和希腊人、清洁派以及胡斯派异端，甚至还有也信奉天主教的教皇的政敌。

有迹象表明，那些年轻一辈的历史学者们，他们的优先考虑项都不尽相同，却正在背离这样一种有成为死结危险的争辩。让人感到振奋的是，这个自司各特、威尔肯和米肖发端的延续了 200 多年的十字军研究传统，正在受到质疑和挑战。



### 精选研究文献

#### 书 目

这方面最好的书目是：

H.E.Mayer, *Bibliographie zur Geschichte der Kreuzzüge*(1960)。

作为补充，如想要查找 1958—1967 年间出版的著作，可参考：

H.E.Mayer, "Literaturbericht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Kreuzzüg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Sonderheft* 3(1969)。

至于 1967—1982 年间的著作，参考：

H.E.Mayer/J.McLellan, "Select Bibliography of the Crusades", K.M.Setton(editor-in-chief),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6(1989)。

迈耶(H.E.Mayer)定期为《德意志中世纪研究档案》(*Deutsches Archiv für Erforschung des Mittelalters*)撰写的简短综述值得参考借鉴。《十字军及拉丁东方研究协会简报》(*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Crusades and the Latin East*)上刊登的近期出版物名录以及新近出版物评述，是对近期每年新出作品的极好指南。该简报如今已被并入名为《十字军》(*Crusades*)的期刊。该期刊从 2002 年开始发行，也收录有书评。

关于伊斯兰教的历史：

J.Sauvaget,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uslim East*, recast by C.Cahen(1965)。

《新剑桥中世纪史》(*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中载有现代的好书目。

#### 史学史

史学史方面最好的作品：

G.Constable,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rusades", *The Crusa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yzantium and the Muslim World*, ed.A.E.Laiou and R.P.Mottahedeh(2001)。

视野较局限的可见：

J.S.C.Riley-Smith, "Islam and the Crusades in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8 November 1898—11 September 2001", *Crusades* 2(2003)。

在其存续的最后两个世纪里,有关十字军的观念和形象:

E.Siberry, *The New Crusaders: Images of the Crusades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2000)。

提出“十字军史”乃是现代的构建:

C.J.Tyerman, *The Invention of the Crusades*(1991)。

## 通 史

两部大体量的英文通史为:

S.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3 vols(1951-4), 此书写就已经 50 年,对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评价较高,集中关注十字军的东征行动;

311 K.M.Setton(editor-in-chief),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2nd edn, 6 vols(1969-89)也有些老旧,各卷各篇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不过它对在欧洲本土进行的十字军行动做了一定考察。

至于单卷本著作:

H.E.Mayer, *The Crusades*, tr.J.B.Gillingham, 2nd edn(1988)

J.Richard, *The Crusades, c.1071—c.1091*, tr.J.Birrell(1999)包含了从传统主义观点来看拉丁东方的一流论述。

J.S.C.Riley-Smith(ed.), *The Atlas of the Crusades*(1991)

——,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1995)则是多元主义的代表。

有关晚期十字军运动的大量新材料可见:

K.M.Setton,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4 vols (1976-84),这部著作几乎完全不具可读性,也几乎没有分析。

有关晚期十字军运动的意义,可见:

N.J.Housley, *The Later Crusades, 1274-1580: From Lyons to Alcazar*(1992)。

最近几年研究界的一个特点,是涌现出了很多不错的涵盖了整场运动的文集,其中包括:

A.Sapir Abulafia(ed.), *Religious Violence between Christians and Jews*(2002)

M.Balard(ed.), *Autour de la Première Croisade*(1996)

M.Balard, B.Z.Kedar and J.S.C.Riley-Smith(eds), *Dei gesta per Francos*(2001)

M.Bull, N.Housley, P.W.Edbury and J.Phillips(eds), *The Experience of Crusading*, 2 vols(2003)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ed.), *Le concile de Clermont de 1095 et l'appel à la croisade*(1997)

P.W.Edbury(ed.), *Crusade and Settlement*(1985)

J.France and W.G.Zajac(eds), *The Crusades and their Sources*(1998)

L.García-Guijarro Ramos(ed.), *La Primera Cruzada novecientos años después*(1997)

- B.Z.Kedar, H.E.Mayer and R.C.Smail(eds), *Outremer*(1982)  
 B.Z.Kedar(ed), *The Horns of Hattin*(1992)  
 B.Z.Kedar, J.S.C.Riley-Smith and R.Hiestand(eds), *Montjoie*(1997)  
 H.E.Mayer(ed.), *Die Kreuzfahrerstaaten als multikulturelle Gesellschaft*(1997)。

## 十字军运动的观念

十字军相关的意识形态以两种方式得到考察，其中一种是通过教会法。对于这种方式，可见：

- J.A.Brundage, *Medieval Canon Law and the Crusader*(1969)  
 J.Muldoon, *Popes, Lawyers and Infidels*(1979)  
 M.Purcell, *Papal Crusading Policy 1244—1291*(1975)  
 J.S.C.Riley-Smith, *What Were the Crusades?*, 3rd edn(2002)  
 F.H.Russeli, *The Just War in the Middle Ages*(1975)  
 R.H.Schmandt, “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Just-War Theory”,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61(1975)  
 M.Villey, *La croisade: essai sur la formation d'une théorie juridique*(1942)。

另一种方式是在更广阔的神学背景下考察十字军运动：

- H.E.J.Cowdrey, “Christianity and the morality of warfare during the first century of crusading”, *The Experience of Crusading. 1: Western Approaches*, ed. M.Bull and N.Housley(2003) 312  
 E.Delaruelle, *L'idée de croisade au moyen âge*(1980)  
 C.Erdmann, *The Origin of the Idea of the Crusade*, tr. W.Goffart and M.W.Baldwin (1977), 该书重要性极高，于 1935 年首次出版。  
 J.Flori, *Le guerre sainte: La formation de l'idée de croisade dans l'Occident chrétien*(2001)  
 E.D.Hehl, *Kirche und Krieg im 12. Jahrhundert*(1980)  
 N.J.Housley, *Religious Warfare in Europe 1400—1536*(2002)  
 B.Z.Kedar, *Crusade and Mission*(1984)  
 J.S.C.Riley-Smith, “Crusading as an act of love”, *History* 65(1980)。

关于 12 和 13 世纪里对十字军运动的批评，可见：

- E.Siberry, *Criticism of Crusading 1095—1274*(1985)。

新的研究领域也正在开启。其中一种是对传道动员活动的研究：

- P.J.Cole, *The Preaching of the Crusades to the Holy Land, 1095—1270*(1991)  
 G.Dickson, “Revivalism as a Medieval Religious Genr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51(2000)  
 C.T.Maier, *Preaching the Crusades: Mendicant Friars and the Cros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1994)

——, *Crusade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Model Sermons for the Preaching of the Cross*(2000)。

另一种是对礼拜仪式的研究, 关于这一领域, 可见:

C.Dondi, *The Liturgy of the Canons Regular of the Holy Sepulchre of Jerusalem*(2004)

A.Linder, *Raising Arms: Liturgy in the Struggle to Liberate Jerusalem in the Late Middle Ages*(2003)。

关于 13 世纪末到 14 世纪的神学家们的研究, 可见:

S.Schein, *Fideles Crucis: The Papacy, the West,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Holy Land 1274—1314*(1991)

J.N.Hillgarth, *Ramon Lull and Lullism in Fourteenth-century France* (1971)

N.Iorga, *Philippe de Mézières(1327—1405) et la croisade au XIVe siècle*(1896)

A.Leopold, *How to Recover the Holy Land: The Crusade Proposals of the Late Thirteenth and Early Fourteenth Centuries*(2000)。

## 教皇与十字军运动

关于格列高利七世:

H.E.J.Cowdrey, "Pope Gregory VII's 'Crusading' Plans of 1074", *Outremer*, ed. B.Z.Kedar, H.E.Mayer and R.C.Smail(1982) and *Pope Gregory VII, 1073—1085*(1998)。

关于乌尔班二世:

A.Becker, *Papst Urban II (1088—1099)*, 2 vols(1964-88)

H.E.J.Cowdrey, "Pope Urban II's Preaching of the First Crusade", *History* 55(1970)。

关于英诺森三世:

C.R.Cheney, *Pope Innocent III and England*(1976)

M.Maccarone, "Studi su Innocenzo III: Orvieto e la predicazione della crociata", *Italia sacra* 17(1972)

H.Roscher, *Papst Innocenz III und die Kreuzzüge*(1969)。

关于洪诺留三世:

R.Rist, "Papal Policy and the Albigensian Crusades: Continuity or Change?", *Crusades* 2(2003)。

关于格列高利十世:

P.A.Throop, *Criticism of the Crusade*(1940), 该书的结论已不再为人所接受, 但仍包含一些对格列高利政策的绝佳处理。

关于克莱芒五世:

S.Menache, *Clement V*(1998)

L.Thier, *Kreuzzugsbemühungen unter Papst Clemens V, 1305—1314*(1973)。

对 14 世纪教皇们与十字军运动的最好研究可见:



N.J.Housley, *The Avignon Papacy and the Crusades, 1305—1378*(1986)。

关于教会征收的相关赋税, 可见:

P.Guidi(ed.), "Rationes decimarum Italiae nei secoli XIII e XIV. Tuscia. I: La Decima degli anni 1274-80", *Studi e Testi* 58(1932)

W.E.Lunt, *Papal Revenues in the Middle Ages*, 2 vols(1934)

——, *Financial Relations of the Papacy with England*, 2 vols(1939-62)。

关于 14 世纪早期教皇们颁布的商业禁令的最详细考察, 可见:

E.Ashtor, *Levant Tr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1983)。

## 十字军运动文献

可以从 M.Routledge, "Songs",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ed. J.S.C.Riley-Smith(1995) 开始, 另外可参见:

M.Böhmer, *Untersuchungen zur Mittelhochdeutschen Kreuzzuglyrik*(1968)

C.T.J.Dijkstra, *La chanson de croisade*(1995)

P.Hölzle, *Die Kreuzzüge in der okzitanischen und deutschen Lyrik des 12. Jahrhunderts: das Gattungsproblem 'Kreuzlied' im historischen Kontext*, 2 vols(1980)

M.de Riquer, *Los Trovadores: Historia literaria y Textos*, 3 vols(1983)

S.N.Rosenberg and H.Tischler, *Chanter m'estuet: Songs of the Trouvères*(1981)

D.A.Trotter, *Medieval French Literature and the Crusades(1100-1300)*(1988)

F.-W. Wentzlaff-Eggebert, *Kreuzzugsdichtung des Mittelalters: Studien zu ihrer geschichtlichen und dichterischen Wirklichkeit*(1960)。

314

## 西方的招募情况

关于西方对十字军招募的响应情况, 值得注意的研究可见:

M.Bull, *Knightly Piety and Lay Response to the First Crusade: The Limousin and Gascony, c.970—c.1130*(1993)

G.Constable, "The Financing of the Crusade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Outremer*, ed. B.Z.Kedar, H.E.Mayer and R.C.Smail(1982)

——, "Medieval Charters a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Crusade and Settlement*, ed. P.W.Edbury(1985)

A.J.Forey, "The Crusading Vows of the English King Henry III", *Durham University Journal* NS.34(1973)

M.Keen, "Chaucer's Knight, the English Aristocracy and the Crusade", *English Court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ed. V.J.Scattergood and J.W.Sherborne(1983)

S.Lloyd, "The Lord Edward's Crusade, 1270-2: its setting and significance", *War and*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ed. J.B.Gillingham and J.C.Holt(1984)

——,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1988)

C.J.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1988)。

关于女性与十字军运动, 可见:

S.B.Edgington and S.Lambert(eds), *Gendering the Crusades*(2001)

S.Geldsetzer, *Frauen auf Kreuzzügen 1096—1291*(2003)。

## 1274 年之前的十字军东征行动

对 1095—1274 年间十字军运动的研究做出贡献的著作包括以下这些:

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R.Chazan, *European Jewry and the First Crusade*(1987)

——, *God, Humanity and History: The Hebrew First Crusade Narratives*(2000)

J.Flori, *Pierre l'Ermite et la Première Croisade*(1999)

J.H. and L.L. Hill, *Raymond IV de Saint-Gilles*(1959)

H.E.Mayer, “Mélanges sur l’histoire du royaume de Jérusalem”,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NS 5(1984), 该书中包含了一些关于戈弗雷和布洛涅的鲍德温的有意思的研究。

A.V.Murray,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A dynastic history 1099—1125*(2000), 该书涉及定居点的早年岁月。

J.Phillips(ed.), *The First Crusade: Origins and Impact*(1997)

J.Prawer, “The Jerusalem the Crusaders Captured: A Contribution to the Medieval Topography of the City”. *Crusade and Settlement*, ed. P.W.Edbury(1985)

J.S.C.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Idea of Crusading*(1986)

——, *The First Crusaders*(1997)

R.Somerville, *The Councils of Urban II. I: Decreta Claromontensia*(1972)

——, “The Council of Clermont(1095) and Latin Christian Society”,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 12(1974)

315 ———,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and the First Crusade”, *Studia gratiana* 20(1976)。

关于强调隐修者彼得才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初倡导者的尝试, 可见:

E.O.Blake and C.Morris, “A Hermit Goes to War: Pete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Crusade”,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22(1984)

J.Flori, *Pierre l'Ermite*(1999)。

关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G.Constable, “The Second Crusade as seen by Contemporaries”, *Traditio* 9(1953)

M.Gervers(ed.), *The Second Crusade and the Cistercians*(1992)

J.Phillips and M.Hoch(eds), *The Second Crusade: Scope and Consequences*(2001)。

关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J.B.Gillingham, *Richard I*(1999)

P.Munz, *Frederick Barbarossa*(1969)

J.Richard, “1187: Point de départ pour une nouvelle forme de la croisade”, *The Horns of Hattin*, ed. B.Z.Kedar(1992)。

关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M.Angold, *The Fourth Crusade*(2003)

J.Longnon, *Les compagnons de Villehardouin*(1978)

D.E.Queller and T.F.Madden, *The Fourth Crusade: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2nd edn(1997)。该书的一些观点在 A. 莱欧 (A.Laiou) 教授主编的一本文集中的一篇文章里得到了纠正。

关于儿童十字军:

G.Dickson, “The Genesis of the Children’s Crusade(1212)” and “Stephen of Cloyes, Philip Augustus and the Children’s Crusade of 1212”, 二文都载于 G.Dickson, *Religious Enthusiasm in the Medieval West*(2000)

——, “Pope Innocent III and the Children’s Crusade”, *Innocenzo III : Urbs et Orbis* 1, ed. A. Sommerlechner(2003)。

关于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J.M.Powell, *Anatomy of a Crusade, 1213—1221*(1986)。

关于领主东征:

M.Lower, “The burning at Mont-Aimé: Thibaut of Champagne’s preparations for the Barons’ Crusade of 1239”,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29(2003)。

关于路易九世的东征:

W.C.Jordan, *Louis IX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Crusade*(1979)

J.Richard, *Saint Louis*, tr. S.Lloyd(1992)

D.Weiss, *Art and Crusade in the Age of Saint Louis*(1998)

D.Weiss and L.Mahoney(eds), *France and the Holy Land*(2004)。

## 后期的十字军行动，1274 年以降

316

除了 K.M.Setton,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and Housley, *The Avignon Papacy and the Crusades, The Later Crusades and Religious Warfare in Europe*, 可参见:

M.Barber, “The pastoureaux of 1320”,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2(1981)

A.C.He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its place in Mediterranean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57(1972)

J.J.N.Palmer, *England, France and Christendom, 1377-99*(1972)

P.Rousset, “Sainte Catherine de Sienne et le problème de la croisade”, *Revue Suisse*

*d'histoire* 25(1975)

——, “Un Huguenot propose une croisade: le projet de François de la Noue(1580—1585)”, *Revue d'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suisse* 72(1978)

S.Schein, “Gesta Dei per Mongolos 1300”,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4(1979)

K.M.Setton, *Venice, Austria and the Turk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91)。

## 十字军行动与拉丁东方的军事史

关于 12 世纪拉丁东方情况的权威著作 R.C.Smail, *Crusading Warfare(1097—1193)* (1956) 得到了 C.Marshall, *Warfare in the Latin East, 1192—1291*(1992)的接续。

J.France, *Victory in the East*(1994) 专注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军事史。另可参见:

J.France, *Western Warfare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1000—1300*(1999)

Y.Friedman, *Encounter between Enemies: Captivity and Ransom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2002)

P.Herde, “Die Kämpfe bei den Hörnern von Hittin und die Untergang des Kreuzritterheeres(3. und 4. Juli 1187)”, *Römische Quartalschrift für christliche Altertumskunde und Kirchengeschichte* 61 (1966), 该书是对哈丁角之战的最佳分析之作

D.C.Nicolle, *Arms and Armour of the Crusading Era 1050—1350*, 2nd edn, 2 vols(1999)

J.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1988)

J.S.C.Riley-Smith, “Casualties and the Number of Knights on the First Crusade”, *Crusades* 1(2002) and “The Crown of France and Acre, 1254—1291”, *France and the Holy Land*, ed. D.Weiss and L.Mahoney(2004)

R.Rogers, *Latin Siege Warfare in the Twelfth Century*(1992)

R.C.Smail, “The Predicaments of Guy of Lusignan, 1183—1187”, *Outremer*, ed. B.Z.Kedar, H.E.Mayer and R.C.Smail(1982)。

关于在东方的边境军队 (*milites ad terminum*), 参见:

G.Ligato, “Fra Ordine Cavallereschi e crociata: ‘milites ad terminum’ e ‘confraternitates’ armate”, *Militia Christie Crociata nei secoli XI—XIII* (1992)。

关于冲突, 参见:

J.S.C.Riley-Smith, “A Note on Confraternities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44(1971)。

## 拜占庭希腊人与十字军运动

如今人们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持的立场比以前大为实际。参见:

M.Angold,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2nd edn(1997)

C.M.Brand,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1968)

J.Harris,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2003)

R.-J. Lille,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r States, 1096—1204*, tr. J.C.Morris and J.E.Ridings(1993)

J.Shepard, “When Greek meets Greek: Alexius Comnenus and Bohemond in 1097—8”,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12(1988) 以及 “Cross-purposes: Alexius Comnenus and the First Crusade”, *The First Crusade*, ed. J.Phillips(1997)。

关于 1204 年之后的情况, 参见:

K.M.Setton,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M.Angold, *A Byzantine Government in Exile*(1975)

J.W.Barker, *Manuel II Palaeologus(1391—1425)*(1969)

D.J.Geanakoplos, *Emperor Michael Palaeologus and the West*(1959)

A.E.Laiou, *Constantinople and the Latins: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dronicus II, 1282—1328*(1972)。

## 穆斯林

此处的入门读物是 C.Hillenbrand,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1999)。此书首次尝试通过阿拉伯文献资料全面研究十字军东征。另可参见:

M.Brett, “The Near East on the Eve of the Crusades”, *La Primera Cruzada Noviecientos años Después*, ed. L.García-Guijarro Ramos(1997)

——, “Abbasids, Fatimids and Seljuqs”,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ed. D.Luscombe and J.S.C.Riley-Smith, 2(2004)

C.Cahen, *Pre-Ottoman Turkey*(1968)

N.Daniel, *Islam and the West: The Making of an Image*(1960; revised edn, 1993)

N.Elisséeff, *Nur ad-Din*, 3 vols(1967)

S.D.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6 vols(1967-93)

H.L.Gottschalk, *Al-Malik al-Kamil von Egypten und seine Zeit*(1958)

M.G.S.Hodgson, *The Order of Assassins*(1955)

P.M.Holt,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Near East from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1517*(1986)

——, *Early Mamluk Diplomacy(1260—1290)*(1995)

R.S.Humphreys, *From Saladin to the Mongols: The Ayyubids of Damascus 1193—1260*(1977)

H.Inalcik, *The Ottoman Empire*(1973)

R.Irw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The Early Mamluk Sultanate 1250—1382*(1986)

M.A.Köhler, *Allianzen und Verträge zwischen fränkischen und islamischen Herrschern im Vorderen Orient*(1991)

M.C.Lyons and D.E.P.Jackson, *Saladin*(1982), 是有关萨拉丁的最佳传记。

- 318 S.J.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1(1976)  
 E.Sivan, *L'Islam et la croisade*(1968)  
 P.Thorau, *The Lion of Egypt: Sultan Baybars I and the Near East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r.  
 P.M.Holt(1987)。

## 蒙古人

- P.Jackson, "The Crisis in the Holy Land in 1260"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5(1980)  
 D.O.Morgan, *The Mongols*(1986)。

关于针对他们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参见:

- P.Jackson, "The Crusade Against the Mongols" ,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43(1991)。

## 西班牙的十字军行动

- E.Bernardet, "Croisade(Bulle de la)" , *Dictionnaire de droit canonique* 4, ed. R.Naz(1949),  
 pp.773-99  
 R.I.Burns,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Valencia*, 2 vols(1967)  
 ——, *Islam under the Crusaders*(1973)  
 ——, *Medieval Colonialism*(1975)  
 ——, *Muslim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Valencia*(1984)  
 R.A.Fletcher, *Saint James's Catapult: The Life and Times of Diego Gelmirez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1984)  
 ——, "Reconquest and Crusade in Spain c.1050—1150"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37(1987)  
 J.Goñi Gaztambide, *Historia de la Bula de la Cruzada en España*(1958)  
 P.Linehan, "The Synod of Segovia(1166)" , *Bulletin of Medieval Canon Law* NS 10(1980)  
 ——, *The Spanish Church and the Papac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1971)。

从 1274 年开始的再征服运动, 由豪斯利 (Housley) 教授在 *The Avignon Papacy* 以及 *The Later Crusades* 两书中加以研究。再征服运动在 16 世纪扩展到北非的情况由塞顿 (Setton) 教授在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以及海斯 (Hess) 教授在 "The Battle of Lepanto" , *Past and Present* 57(1972) 中加以描述。有关西班牙武装修会的著作可见关于武装修会的部分。

## 波罗的海与东北部的十字军运动

处于这个主题核心位置的是条顿骑士团的历史。关于他们的著作包括在了关于武装修会的部分。豪斯利教授在 *The Avignon Papacy* 以及 *The Later Crusades* 两书中谈到了一

些值得注意的东西, M.Keen, *Chivalry*(1984) 也同样如此。另可参见:

H.Beumann, *Heidenmission und Kreuzzugsgedanke in der deutschen Ostpolitik des Mittelalters*, 2nd edn(1973)

E.Christiansen, *The Northern Crusades*(1980)

F.Lotter, *Die Konzeption des Wendenkreuzzugs*(1977), 尽管该书中的某些结论受到了挑战。

## 教会针对异端和反对者的十字军行动

319

迄今为止有关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行动的最佳研究著作是 M.Roquebert, *L'Épopée Cathare*, 3 vols(1970-86), 尽管 H.Roscher, *Papst Innocenz III*(1969) 也很有用。简明介绍可参见 M.Barber, *Cathars*(2000)。另可参见:

R.Rist, "Papal Policy and the Albigensian Crusades: Continuity or Change?", *Crusades* 2(2003)。

关于针对胡斯派的十字军行动:

F.G.Heyman, "The Crusades against the Hussites",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3, ed. K.M.Setton(1975)。

另见豪斯利教授的 *The Later Crusades* 以及 *Religious Warfare*, 还有:

G.A.Holmes, "Cardinal Beaufort and the crusade against the Hussite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8(1973)。

有关在意大利的政治性十字军运动的必选读物是 N.J.Housley, *The Italian Crusades*(1982)。豪斯利教授在 *The Avignon Papacy* 中做了后续研究。另可参见:

N.J.Housley, "Crusades against Christians: their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c.1000—1216", *Crusade and Settlement*, ed. P.W.Edbury(1985)

——, "The Mercenary Companies, the Papacy and the Crusades, 1356—1378", *Traditio* 38(1982)

S.Lloyd, "'Political Crusades' in England, c.1215-17 and c.1263-5", *Crusade and Settlement*, ed. P.W.Edbury(1985)。

## 黎凡特大陆上的拉丁定居点

没有什么关于埃德萨伯国的好研究作品, 而除了其他部分提到的综述性作品外, 专门关于西里西亚美尼亚的著作也没有太多好推荐的, 但以下这本是例外:

T.S.R.Boase(ed.), *The Cilician Kingdom of Armenia*(1978),

下列作品打下了研究安提阿—的黎波里的基础:

C.Cahen, *La Syrie du Nord à l'époque des croisades et la principauté franque d'Antioche*(1940), 该书开启了拉丁东方历史研究领域的革命。

J.Richard, *Le comté de Tripoli sous la dynastie toulousaine(1102—1187)*(1945)。

安提阿的历史在以下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探讨:

T.S.Asbridge, *The Creation of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2000)

H.E.Mayer, *Varia Antiochena*(1993)。

从很多方面来看，关于耶路撒冷王国的制度史的最佳入门介绍，仍然是：

J.Richard,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tr. J.Shirley, 2 vols(1979)，尽管它首次出版还是在 1953 年。

另可参见：

J.Prawer, *Histoire du royaume latin de Jérusalem*, 2 vols(1969-70)

——,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1972)

——, *Crusader Institutions*(1980)，作者是该领域的大师，该书是其最重要的文集。

J.S.C.Riley-Smith, *The Feudal Nobility and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1174—1277*(1973)。

近期迈耶教授引领了一种从政治和制度历史转回去详细研究各个领主领地的研究潮流。他的文章收录在若干文集中：

H.E.Mayer, *Kreuzzüge und lateinischer Osten*(1983)

——, *Probleme des lateinischen Königreichs Jerusalem*(1983)

——, *Kings and Lords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1993)

S.Tibble, *Monarchy and Lordships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1099—1291*(1989) 的结论也是如此。

有关耶路撒冷王国的政治、法律和行政历史，可参见：

P.W.Edbury, “Feudal Obligations in the Latin East”, *Byzantion* 47(1977)

——, *John of Ibelin and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1997)，可视作艾德伯里 (Edbury) 教授关于雅法的约翰的伟大律法书的研究著作 *John of Ibelin, Le Livre des Assises*(2003) 的先导研究

B.Hamilton, “The elephant of Christ: Reynald of Châtillon”,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15(1978)

——, *The Leper King and his Heirs. Baldwin IV and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2000)

P.Jackson, “The End of Hohenstaufen Rule in Syri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59(1986)

B.Z.Keder, “On the Origins of the Earliest Laws of Frankish Jerusalem: The Canons of the Council of Nablus, 1120”, *Speculum* 74(1999)

H.E.Mayer, “Jérusalem et Antioche au temps de Baudouin II”,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80)

——, “The Succession to Baldwin II of Jerusalem: English impact on the East”, *Dumbarton Oaks Papers* 39(1985)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Queen Melisende of Jerusalem”, *Dumbarton Oaks Papers* 26(1972)



——, “Kaiserrecht und Heiliges Land”, *Aus Reichsgeschichte und Nordischer Geschichte*, ed. H.Fuhrmann, H.E.Mayer and K.Wriedt(1972)

——, “Ibelin versus Ibelin: the struggle for the Regency of Jerusalem, 1253—1258”,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22(1978)

——, “The Concordat of Nablus”,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3(1982)

——, *Die Kanzlei der lateinischen Könige von Jerusalem*, 2 vols(1996), 是自 1980 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J.Phillips, *Defenders of the Holy L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 Latin East and the West, 1119—1187*(1996)

S.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in Twelfth-Century Jerusalem: a View from the West”, *Crusades* 1(2002), 在我看来, 并没有考察法兰克人的政府在巴勒斯坦建立后具有的实验性质, 以及定居者们在各种制度中体现出的对这种本质的自我认识。

J.S.C.Riley-Smith, “The motives of the earliest crusaders and the settlement of Latin Palestine, 1095—1100”,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8(1983)

——, “The survival in Latin Palestine of Muslim administratio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Lands in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ed. P.M.Holt(1977) 321

——, “Further Thoughts on Baldwin II's *établissement* on the Confiscation of Fiefs”, *Crusade and Settlement*, ed. P.W.Edbury(1985)。

关于耶路撒冷和安条克的拉丁牧首区教会的情况, 可参见:

P.W.Edbury and J.G.Rowe, *William of Tyre*(1988)

B.Hamilton, *The Latin Church in the Crusader States: The Secular Church*(1980)

K.Elm, *Umbilicus Mundi*(1998)

A.Jotischky, *The Perfection of Solitude: Hermits and Monks in the Crusader States*(1995)

B.Z.Kedar, “The Subjected Muslims of the Frankish Levant”, *Muslims under Latin Rule, 1100—1300*, ed. J.M.Powell(1990)

H.E.Mayer, *Bistümer, Klöster und Stifte im Königreich Jerusalem*(1977)

——, “Das Pontifikale von Tyrus und die Krönung der lateinischen Könige von Jerusalem”, *Dumbarton Oaks Papers* 21(1967)

J.Richard, *La papauté et les missions d'Orient au moyen âge(XIII<sup>e</sup>-XV<sup>e</sup> siècles)*(1977)

J.S.C.Riley-Smith, “Latin Titular Bishops in Palestine and Syria, 1137—1291”,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64(1978)

——, “Government and the indigenous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Medieval Frontiers: Concepts and Practices*, ed. D.Abulafia and N.Berend(2002)

J.G.Rowe, “The Papacy and the Ecclesiastical Province of Tyre(1100—1187)”,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43(1960-1)。

有关学校和教育状况, 除 A.Jotischky, *The Perfection of Solitude* 之外, 可参见:

P.C.Boeren, *Rorgo Fretellus de Nazareth et sa description de la Terre Sainte*(1980)

R.B.C.Huygens, "Guillaume de Tyr étudiant" , *Latomus* 21(1962)

B.Z.Kedar, "Gerard of Nazareth: A neglected twelfth-century writer in the Latin East" , *Dumbarton Oaks Papers* 37(1983)

R.C.Schwinges, *Kreuzzugs-idee und Toleranz: Studien zu Wilhelm von Tyrus*(1977)。

关于贵族们的文化，可参见：

D.Jacoby,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ans les états latins de la Méditerranée orientale à l'époque des croisades: diffusion et création" , *Actes du 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Société Rencensvals pour l'Étude des Épopées Romanes*(1982)。

关于艺术和建筑，可参见：

K.M.Setto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4(1977), 深入地探讨了这一主题。

关于艺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是：

J.Folda, *The Art of the Crusaders in the Holy Land*, 1 vol, 另一卷即将出版(1995— )。

另可参见：

H.Buchthal, *Miniature Painting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1957)

322 J.Folda, *Crusader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at Saint-Jean d'Acre, 1275—1291*(1976)。

关于铸币和印章，可参见：

H.E.Mayer, *Das Siegelwesen in den Kreuzfahrerstaaten*(1978)

D.M.Metcalf, *Coinage of the Crusades and the Latin East*, 2nd edn(1995)

G.Schlumberger, F.Chalandon and A.Blanchet, *Sigillographie de l'Orient latin*(1943)。

关于宗教建筑，除了 J.Folda, *The Art of the Crusaders*，还可参见：

M.Biddle, *The Tomb of Christ*(1999)

R.W.Edwards, "Ecclesiastical Architecture in the Fortifications of Armenian Cilicia" , *Dumbarton Oaks Papers* 36(1982), 37(1983)

R.Ellenblum, "Frontier Activit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uslim Sacred Site into the Frankish Castle of Vadum Jacob" , *Crusades* 2(2003)

C.Enlart, *Les monuments des croisés dans le royaume de Jérusalem: Architecture religieuse et civile*, 2 vols ( 1925-8 )

D.Pringle, *The Churches of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A Corpus*, 已出版两卷，另有两卷待出( 1993— )，这是关于耶路撒冷王国内所有教堂建筑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城堡，可参见：

M.Benvenisti, *The Crusaders in the Holy Land*(1970)

P.Deschamps, *Les châteaux des croisés en Terre Sainte*, 3 vols(1934-77)

R.W.Edwards, *The Fortifications of Armenian Cilicia*(1987)

R.P.Harper and D.Pringle, *Belmont Castle*(2000)

H.Hellenkemper, *Burgen der Kreuzritterzeit in der Grafschaft Edessa und im Königreich*

*Kleinarmenien*(1976)

H.Kennedy, *Crusader Castles*(1994)

W.Müller-Wiener, *Castles of the Crusaders*(1976)

D.Pringle, *The Red Tower*(1986)

——, *Secular Buildings in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An Archaeological Gazetteer*(1997)。

近期关于社会和经济史,包括贸易史的著作有:

C.Aslanov, "Languages in Contact in the Latin East: Acre and Cyprus" , *Crusades* 1(2002)

R.Ellenblum, *Frankish Rural Settlement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1998),该书十分重要。

M.-L. Favreau, *Die Italiener im Heiligen Land vom der ersten Kreuzzug bis zum Tode Heinrichs von Champagne(1098-1197)*(1989)

D.Jacoby, "L'expansion occidentale dans le Levant: les Vénitiens à Acr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treizième siècle" ,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3(1977)

——, "Crusader Acr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Urban Layout and Topography" , *Studi Medievali*, Ser.3, 20(1979)

J.H.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1988)

J.S.C.Riley-Smith, "Government in Latin Syria and the Commercial Privileges of Foreign Merchants" ,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Middle Ages*, ed. D.Baker(1973) 323

I.Shagrir, *Naming Patterns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2003)。

## 拉丁塞浦路斯

最佳介绍性著作是:

P.W.Edbury, *The Kingdom of Cyprus and the Crusades, 1191—1374*(1991)。

可辅以:

G.F.Hill, *A History of Cyprus* 2-3(1948)。

另可参见:

D. and I.Hunt(eds), *Caterino Cornaro*(1989)

D.Jacoby, "The Rise of a new Emporium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Famagusta in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 *Meletai kai Upommemata* 1(1984)

J.Richard, *Chypre sous les Lusignans: Documents chypriotes des archives du Vatican(XIV<sup>e</sup> et XV<sup>e</sup> siècles)*(1962)。

关于这里的拉丁教会,可参见:

N.Coureas, *The Latin Church in Cyprus, 1195—1312*(1997)。

关于艺术和建筑,可参见:

C.Enlart, *Gothic Art and the Renaissance in Cyprus*, tr. D.Hunt(1987)。

## 拉丁希腊

拉丁希腊的历史，以虽缺少系统分析但却非常详细的方式出现在塞顿教授的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2-3 以及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的一些章节中。

另可参见：

P.Argenti, *The Occupation of Chios by the Genoese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 of the Island, 1346—1566*, 3 vols(1958)

M.Balard, *La Romanie génoise( XII e-début du XV e siècle)*(1978)

A.Bon, *La Morée Franqu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topographiques et archéologiques sur la principauté d'Achaïe(1205—1430)*(1969)

N.Cheetham, *Mediaeval Greece*(1981)

G.Fedalto, *La chiesa latina in Oriente*, 3 vols(1973-8)

D.Jacoby, *La féodalité en Grèce Médiévale: Les "Assises de Romanie": sources, application et diffusion*(1971)

——, "The Encounter of Two Societies: Western Conquero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Peloponnesus after the Fourth Crusad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8(1973)

——, "Catalans, Turcs et Vénitiens en Romanie(1305—1332): un nouveau témoignage de Marino Sanudo Torsello", *Studi Medievali*, Ser. 3, 15(1974)

P.Lock, *The Franks in the Aegean, 1204—1500*(1995)

J.Longnon, *L'empire latin de Constantinople et la principauté de Morée*(1949)

F.Thiriet, *La Romanie vénitienne au moyen âge*(1959)。

## 武装修会

关于武装修会的总体状况的介绍可见：

A.J.Forey and A.T Luttrell i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ed. J.S.C.Riley-Smith(1995)。

另可参见：

A.Demurger, *Chevaliers du Christ: Les ordres religieux-militaires au Moyen Âge*(2002)

J.Forey, *The Military Orders*(1992)

——, "Recruitment to the Military Orders", *Viator* 17(1986)

——, "Novitiate and Instruction in the Military Orders during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Speculum* 61(1986)

L.García-Guijarro Ramos, *Papado, cruzadas y órdenes, militares, siglos XI—XIII*(1995)。

以武装修会为主题的研讨会已越来越常见，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论文集。

此类例子有:

M.Barber(ed.), *The Military Orders: Fighting for the Faith and Caring for the Sick*(1994)

H.Nicholson(ed.), *The Military Orders. Volume 2: Welfare and Warfare*(1998)

A.T.Luttrell and L.Pressouyre, *La Commanderie, institution des ordres militaires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2002).

关于圣殿骑士团, 值得信赖的通史有:

M.Barber, *The New Knighthood: A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the Temple*(1994)。

另可参见:

M.Barber, *The Trial of the Templars*(1978)

M.L.Bulst-Thiele, *Sacrae Domus Militiae Templi Hierosolymitani Magistri*(1974)

S.Cerrini(ed.), *I Templari, la guerra et la santità*(2000)

A.Demurger, *Vie et mort de l'ordre du Temple*(1985)

A.J.Forey, *The Templars in the Corona de Aragon*(1973), 该书是有关圣殿骑士团的教育结构最好的作品。

A.T.Luttrell, "The Earliest Templars", *Autour de la Première Croisade*, ed. M.Balard(1996)

H.Nicholson, *The Knights Templar: A New History*(2001)

J.S.C.Riley-Smith, "The Templars and the Teutonic Knights in Cilician Armenia", *The Cilician Kingdom of Armenia*, ed. T.S.R.Boase(1978)

——, "Were the Templars Guilty", *Medieval Crusade*, ed. S.Ridyard(2004)

——, "The Structures of the Orders of the Temple and the Hospital in c.1291", *Medieval Crusade*, ed. S.Ridyard(2004)。

有关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最佳通史, 参见:

H.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1994)。

另可参见:

H.Nicholson, *The Knights Hospitaller*(2001)

J.S.C.Riley-Smith, *Hospitallers*(1999)。

有关 14 世纪之前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情况, 参见:

S.Edgington, "Medical Care in the Hospital of St John in Jerusalem", *The Military Orders. Volume 2*, ed. H.Nicholson(1998) 325

A.J.Forey, "Constitutional 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Hospital of St John during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3(1982)

B.Z.Kedar, "A Twelfth-Century description of the Jerusalem Hospital", *The Military Orders. Volume 2*, ed. H.Nicholson(1998)

A.T.Luttrell, "The Earliest Hospitallers", *Montjoie*, ed. B.Z.Kedar, J.S.C.Riley-Smith and R.Hiestand(1997)

——, "The Hospitallers' Early Written Records", *The Crusades and their Sources*, ed.

J.France and W.G.Zajac(1998)

J.S.C.Riley-Smith, *The Knights of St John in Jerusalem and Cyprus, c.1050—1310*(1967)。

关于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如何管理其在欧洲的地产，已有不错的著作问世。尤其参见：

P.Bonneaud, *Le prieuré de Catalogne, le couvent de Rhodes et la couronne d'Aragon 1415—1447*(2004)

M.Gervers [他还编写了 *The Cartulary of the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in England: Secunda Camera Essex*(1982)] , *The Hospitaller Cartulary in the British Library*(Cotton MS Nero E VI)(1981)

——, “Pro defensione Terre Sancte: the 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Hospitallers’ Landed Estate in Essex” , *The Military Orders*, ed. M.Barber(1994)

A.-M.Legras, *Les Commanderies des Templiers et des Hospitaliers de Saint Jean de Jérusalem en Saintonge et en Aunis*(1983)。

有关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占领罗德岛的历史，我们应首先阅读全球关于这一研究课题的权威勒特雷尔(A.T.Luttrell)博士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些收录在了以下四本文集中：

A.T.Luttrell, *The Hospitallers in Cyprus, Rhodes, Greece and the West(1291—1440)*(1978)

——, *Latin Greece, the Hospitallers and the Crusades, 1291—1400*(1982)

——, *The Hospitallers of Rhodes and their Mediterranean World*(1992)

——, *The Hospitaller State on Rhodes and its Western Provinces, 1306—1462*(1999)。

另可参考：

A.T.Luttrell, “The later History of the Maussolleion and its utilization in the Hospitaller castle at Bodrum” , *The Maussolleion at Halikarnassos*(1986)

——, “English Contributions to the Hospitaller Castle at Bodrum in Turkey: 1407—1437” , *The Military Orders. Volume 2*, ed. H.Nicholson(1998)

——, *The Town of Rhodes, 1306—1356*(2003)。

还可参考蒙斯利教授的 *The Avignon Papacy* 和 *The Later Crusades* 中的评论，以及：

A.Gabriel, *La cité de Rhodes(1310—1522)*, 2 vols(1921-3)

J.Sarnowsky, *Macht und Herrschaft im Johanniterorden des 15. Jahrhunderts*(2001)

N.Vatin, *L'Ordre de Saint-Jean-de-Jérusalem, l'Empire Ottoman et la Méditerranée orientale entre le deux sièges de Rhodes(1480-1522)*(1994)。

326

关于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占领马耳他，参见：

D.Allen, “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World of a Knight of Malta in the Caribbean, c.1632—1660” , *Malta: A Case Study in International Cross-Currents*, ed. S.Fiorini and V.Mallia-Milanes(1991)

——, “‘A Parish at Sea’: Spiritual Concerns aboard the Order of St John’s Galley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The Military Orders*, ed. M.Barber(1994)

——, “The Order of St John as a ‘School for Ambassadors’ in Counter-Reformation Europe” ,

- The Military Orders. Volume 2*, ed. H.Nicholson(1998)
- R.Cavaliero, *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1960)
- J.O.Hughes, *The Building of Malt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1530—1795*(1956)
- A.Hoppen, *The Fortification of Malta by the Order of St John, 1530—1798*(1979)
- A.T.Luttrell, "Eighteenth-Century Malta: Prosperity and Problems", *Hyphen* 3(1982)
- V.Mallia-Milanes, *Venice and Hospitaller Malta 1530—1798: Aspects of a Relationship*(1992)
- , (ed.), *Hospitaller Malta 1530—1798*(1993)。

关于条顿骑士团以及其他德意志骑士团的情况,除了Christiansen, *The Northern Crusades* 以及 Housley, *The Avignon Papacy* 和 *The Later Crusades*, 还可参见:

- U.Arnold(ed.), *800 Jahre Deutscher Orden*(1990)
- F.Benninghoven, *Der Orden der Schwertbrüder*(1965)
- M.Burleigh, *P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erman Order*(1984)
- M.-L.Favreau, *Studien zur Früh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Ordens*(1974)
- K.Forstreuter, *Der Deutsche Orden am Mittelmeer*(1967)
- P.Hilsch, "Der Deutsche Ritterorden im südlichen Libanon", *Zeitschrift des Deutschen Palästina-Vereins* 96(1980)
- W.Paravicini, *Die Preussenreise des Europäischen Adels*, 2 vols(1989-95)
- M.Tumler, *Der Deutsche Orden im Werden, Wachsen und Wirken bis 1400*(1955)
- M.Tumler and U.Arnold, *Der Deutsche Orden vom seinem Ursprung bis zur Gegenwart*, 5th edn(1992)。

关于圣拉撒路骑士团,可参见:

- D.Marcombe, *Leper Knights*(2003)。

关于西班牙的武装修会,可参见:

- A.J.Forey, "The Military Orders and the Spanish Reconquest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Traditio* 40(1984)
- D.W.Lomax, *La Orden de Santiago, 1170—1275*(1965)
- J.F.O'Callaghan, *The Spanish Military Order of Calatrava and its Affiliates*(1975)
- L.P.Wright, "The Military Orders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Spanish Society", *Past and Present* 43(1969)。

关于英格兰人的阿卡的圣托马斯骑士团,可参见:

- A.J.Forey, "The military order of St Thomas of Acr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2(1977)。

## 一些翻译文献

许多中世纪的文献如今已有了翻译,尽管这类文献集与相关的二手叙述文献相比还

是很稀有。但有两本此类集子：

N.J.Housley, *Documents on the Later Crusades, 1274—1580*(1996)

L. and J.Riley-Smith, *The Crusades, Idea and Reality, 1095—1274*(1981)。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参与者留下的见证资料有：

*Gesta Francorum et aliorum Hierosolimitanorum*, ed. and tr. R.Hill(1962)

Raymond of Aguilers, *Historia*, tr. J.H. and L.L.Hill(1968)

Fulcher of Chartres, *A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to Jerusalem 1095—1127*, tr. F.R.Ryan, ed. H.S.Fink(1969)

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tr. E.A.S.Dawes(1928)。

另可参见：

E.Peters, *First Crusade*(1998)。

关于玷污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反犹屠杀的希伯来文献，可参见：

S.Eidelberg, *The Jews and the Crusaders*(1977)。

有关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两种主要文献，其一涉及在小亚细亚的战斗，其二关于在葡萄牙的情况：

Odo of Deuil, *De profectione Ludovici VII in orientem*, ed. and tr. V.G.Berry(1948)

*De expugnatione Lyxbonensi*, ed. and tr. C.W.David(1936)。

关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参见：

Ambrose, *The Crusade of Richard Lion-Heart*, tr. M.J.Hubert and J.L.La Monte(1941)

*Chronicle of the Third Crusade*, tr. H.J.Nicholson(1997)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and the Third Crusade*, tr. P.W.Edbury(1996)

Baha' ad-Din, *The Rare and Excellent History of Saladin*, tr. D.S.Richards (1997)。

关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参见：

A.J.Andrea,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the Hystoria Constantinopolitana of Gunther of Pairis*(1997)

——,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2000)

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r. M.R.B.Shaw (1963)

Robert of Cléry(Clari),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r.E.H.McNeal(1936)。

关于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亲历者见证，参见：

Oliver of Paderborn, *The Capture of Damietta*, tr. J.J.Gavigan(1948)

E.Peters, *Christian Society and the Crusades, 1198—1229*(1971)。

关于圣路易第一次东征的绝佳亲历见证：

John of Joinville, *The Life of Saint Louis*, tr. M.R.B.Shaw(1963)。

关于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行动，参见：

Peter of Les Vaux-de-Cernay, *The History of the Albigensian Crusade*, tr. W.A. and



M.D.Sibly(1998)

*The Song of the Cathar Wars*, tr. J.Shirley(1996)。

关于针对胡斯派的十字军行动, 参见:

*The Crusade against the Heretics in Bohemia, 1418—1437*, tr. T.A.Fudge(2002)。

关于 13 世纪的德意志十字军, 参见:

Henry of Livonia, *The Chronicle*, tr. J.A.Brundage(1961)。

关于拉丁东方, 参见:

*The Assizes of the Lusignan Kingdom of Cyprus*, tr. N.Coureas(2002)

*Crusaders as Conquerors: The Chronicle of Morea*, tr. H.E.Lurier(1964)

Fulcher of Chartres, *History*, tr. F.R.Ryan( 详见上文 )

Leontios Machairas, *Recital Concerning the Sweet Land of Cyprus*, ed. and tr. R.M.Dawkins, 2 vols(1932)

Philip of Novara, *The Wars of Frederick II against the Ibelins in Syria and Cyprus*, tr. J.L.La Monte and M.J.Hubert(1936)

*The “Templar of Tyre”*, tr. P.Crawford(2003)

Walter the Chancellor, *The Antiochene Wars*, tr. T.S.Asbridge and S.B.Edgington (1999)

William of Tyre, *A History of Deeds Done Beyond the Sea*, tr. E.A.Babcock and A.C.Krey, 2 vols(1943)。

关于穆斯林方面与定居者关系的阐述, 参见: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tr. P.M.Holt(1983)

Baha'ad-Din, *The Rare and Excellent History of Saladin*, tr. D.S.Richards(1997)

F.Gabrieli, *Arab Historians of the Crusades*(1969)

P.M.Holt, *Early Mamluk Diplomacy(1260—1290): Treaties of Baybars and Qalawun with Christian Rulers*(1995)

Ibn 'Abd al-Zahir, *Sirat al-Malik al-Zahir*, part ed. and tr. S.F.Sadeque(1956)

Ibn al-Furat, *Ayyubids, Mamlukes and Crusaders*, part ed. and tr. U. and M.C.Lyons, 2 vols(1971)

Ibn Jubayr, *Travels*, tr. R.J.C.Broadhurst(1952)

Ibn al-Qalanisi, *Chronicle of Damascus*, tr. H.A.R.Gibb(1932)

Usamah ibn Munqidh, *An Arab-Syrian Gentleman and Warrior in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tr. P.K.Hitti(1929)。

*Palestine Pilgrims Text Society*, 14 vols(1896—1907) 翻译了游方修士和朝圣者们对圣地的描述, 但可以 *Jerusalem Pilgrimage 1099—1185*, tr. J.Wilkinson, J.Hill and W.F.Ryan(1988) 中的描述取代。

关于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总部在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时各自内部的立法

规范情况，参见：

*The Rule of the Templars*, tr. J.M.Upton-Ward(1992)

329 *The Rule, Statutes and Customs of the Hospitallers, 1099—1310*, tr. E.J.King(1934)。

另可参见：

*The Templars*, tr. M.Barber and K.Bate(2002)

*The Fall of the Templars in the Crown of Aragon*, tr. A.Forey(2001)。

一份有关 1480 年围攻罗德岛战役情况的记述，将在两年内翻译推出：

William Caoursin, *The dylectable newesse and tythinges of the glorious victorye of the Rhodyans agaynst the Turks*, tr. J.Kaye(1482)。

另一个版本：H.W.Fincham(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Historical Pamphlets no.2, 1926)。

关于马耳他之国，参见：

Francisco Balbi de Corregi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 E.Bradford(1965)。

# 索引\*

(本索引中的页码为英文原书的页码,即本书边码)

## A

- Aachen 亚琛 176, 202
- 'Abbasid caliphs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 1-2, 26, 70, 106-7, 238
- Abdulhamid II, caliph, Ottomans 奥斯曼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哈里发 304-5
- Aboukir Bay 阿布基尔湾 297
- Abu 'Ali Ahmad ibn al-Afdal 阿布·阿里·艾哈迈德·伊本·阿夫达尔, 参见库塔伊法特 (Kutaifat)
- Achaea, principality of 亚该亚公国 203, 218, 222-3, 260; Barons 男爵 218, 260, 另见 Latin Greece
- Acharie of Sarmin, mayor of Antioch 萨敏的阿卡里, 安条克社长 229
- Achziv (Tel Akhziv) 亚悉革 (泰勒阿赫济夫) 237
- Acre ('Akko) 阿卡 xxix, 51-2, 66-7, 69-71, 73-5, 81, 84-7, 92-4, 102, 107, 109, 114, 129, 140, 142-7, 151, 177, 181-2, 188-9, 195-6, 203, 208-13, 225-6, 230, 232, 235-7, 239-44, 256; 'Ain el Bogor (Ox Spring) 牛泉 70-1; *Assises des Bourgeois* of 市民法令 84; *burgesses* 市民 66, 84-5, 87; *cathedral of Holy Cross* 圣十字大教堂 71; *chaine* 链官 86-7; *commune* 236-7 公社; *diocese* 教区 66; *Dominican stadium* 多明我学院 67; *fall of* (1291) 陷落 (1291年) 213, 243-4, 246, 250, 252, 256; *fonde* 市场官署 73-4, 86-7; *French regiment in* 此地的法国兵团 195, 207-9, 213, 242-3; *Genoese quarter* 热那亚人区 224; *Pisan market* 比萨人市场 226; *siege of* (1189-91) 被围攻 (1189—1191) 140-4, 146, 196; *Templar convent* 圣殿骑士团 xxix, 244; *town-planning* 城镇规划 84; *Venetian market* 威尼斯人市场 226
- Ad abolendam* 《废止各种恶毒异端》165
- Adana 阿达纳 36, 51
- Adhémar of Monteil, b. Le Puy, papal legate 蒙泰的阿代马尔, 勒皮主教, 教皇使节 3, 32, 39-41, 63
- al-'Adil, s. Egypt 阿迪勒, 埃及苏丹 145, 150, 178, 226

\* 以下缩写表示: ab. abbot of (修道院院长); archb.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b. bishop of (主教); c. count of (伯爵); ctess. countess of (伯爵夫人); d. duke of (公爵); e. emperor (皇帝); gm. grand master of (大团长); k. king of (国王); l. lord of (领主); kdom. kingdom of (王国); m. master of (团长); p. patriarch of (牧首); pr. prince of (大公); s. sultan of (苏丹); visc. viscount of (子爵)。

*Ad liberandam*《所谓自由》xxxiii, 175, 212

Adolf, c. Holstein 阿道夫, 荷尔施泰因 130

*Ad providam*《这一个》255

Adrian IV, pope 阿德里安四世, 教皇 125, 133-4

Adrian VI, pope 阿德里安六世, 教皇 282, 284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30, 32, 119, 154, 290

advocate of the Holy Sepulchre, title 圣墓守卫者, 头衔 50

Aegean Sea 爱琴海 120, 217, 220, 222, 239, 254, 259, 270, 276, 279, 290, 292

Afghanistan 阿富汗 307

'Afula 阿弗拉 110

Aghirda, Battle of 安吉尔达战役 236

Agnes of Courtenay 库特奈的阿格尼斯 100-1

Aigues Mortes 艾格-莫尔特 191, 193-4, 209

Aimery of Lusignan, k. Cyprus and Jerusalem 吕西尼昂的艾默里, 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国王, 150, 156, 215-16, 232-3, 235

'Ain-Jalut, Battle of 艾因扎鲁特战役, 209, 237-9, 241

'Ain Karim, church of St John 埃因-卡里姆, 圣约翰教堂, 53

Akşehir 阿克谢希尔, 33, 36, 39-40

Aksungur al-Bursuki 阿克松古尔·伯苏基, 104

Alamut 阿拉穆特 237

Alanya 阿拉尼亚 273

Alarcos, Battle of 阿拉尔克斯战役 169-70

Alaşehir 阿莱谢希尔 140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30, 119, 214, 221-3, 279, 另见 Epirus

Alberic of Romano 罗马诺的阿尔贝里克 202

Albert III, d. Austria 阿尔伯特三世, 奥地利公爵 253

Albert V, d. Austria 阿尔伯特五世, 奥地利

公爵 275

Albert the Bear, margrave of Brandenburg “大熊”阿尔伯特, 勃兰登堡边境总督 124, 130

Albert of Brandenburg, gm. Teutonic Order 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 条顿骑士团大团长 285

Albert of Buxtehude, b. Riga 布克斯特胡德的阿尔伯特, 里加主教 161-2, 173

Albert of Vercelli, p. Jerusalem 维塞利的阿尔贝, 耶路撒冷牧首 76

Albi 阿尔比 167

Albigensian Crusade 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行动 xxxii, 135, 163-73, 176, 187-8, 190, 201, 205

Alcácer do Sal 阿尔卡萨多萨 171

Alcántara, Order of 阿尔坎塔拉修会 122

Aleppo 阿勒颇 2, 38, 42, 50, 84, 91, 102, 104-9, 195, 225-6, 229, 237

Alexander II, pope 亚历山大二世, 教皇 9

Alexander III, pope 亚历山大三世, 教皇 80, 132, 134

Alexander IV, pope 亚历山大四世, 教皇 208-9, 217

Alexander VI, pope 亚历山大六世, 教皇 254, 279-80

Alexander Nevski of Suzdal, p. Novgorod 苏兹达尔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诺夫哥罗德大公 198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 109, 150-3, 155-6, 160, 194, 225, 245, 269, 273, 297

Alexius I Comnenus, Byzantine e., 亚历克塞一世·科穆宁, 拜占庭皇帝 1, 8, 19, 27, 30, 32-5, 37-41, 45, 50, 63, 118, 125-6, 158, 224

Alexius III Angelus, Byzantine e. 亚历克塞三

- 世·安格魯斯, 拜占庭皇帝 153, 157, 220
- Alexius IV Angelus, Byzantine e., 亚历克塞四世·安格魯斯, 拜占庭皇帝 153, 155-8
- Alexius V Ducas, Byzantine e., 亚历克塞五世·杜卡斯, 拜占庭皇帝 158-9, 220
- Alfonso I, k. Aragon, 阿方索一世, 阿拉贡国王 116-17, 133
- Alfonso VII, k. Castile 阿方索七世, 卡斯蒂利亚国王 123-4
- Alfonso VIII, k. Castile 阿方索八世, 卡斯蒂利亚国王 169-70, 190
- Alfonso IX, k. León-Castile 阿方索九世, 莱昂-卡斯蒂利亚国王 171
- Alfonso X, k. Castile 阿方索十世, 卡斯蒂利亚国王 200, 222
- Alfonso XI, k. Castile 阿方索十一世, 卡斯蒂利亚国王 262
- Alfonso of Castile, brother of Ferdinand III 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 斐迪南三世的兄弟 199
- Alfonso I Henriques, k. Portugal 阿方索一世·恩里克斯, 葡萄牙国王 124
- Alfonso Jordan, c. Toulouse 阿方索, 图卢兹伯爵 116, 124
- Algeciras 阿尔赫西拉斯 245, 262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301-2
- Algiers 阿尔及尔 286-7, 295, 301-2: Rock of 阿尔及尔岩 279, 286
- Alhama 阿尔阿玛 278
- \*Ali, s. Egypt 阿里, 埃及苏丹 238
- \*Ali, Marinid s. 阿里, 马林王朝苏丹 262
- \*Ali al-Harawi, traveler 阿里·哈拉维, 旅行家 71
- Alice, ctess Blois 爱丽丝, 布卢瓦女伯爵 213
- Alice of Champagne, q. Cyprus 香槟的爱丽丝, 塞浦路斯女王 216, 230-1, 235, 237
- Alice of France 法兰西的爱丽丝 142
- Allemand-Lavigerie, Charles-Martial, archb. Algiers, cardinal 查理-马迪尔·阿勒曼·拉韦杰里, 阿尔及尔大主教, 红衣主教 302
- Allenby, General Sir Edmund 埃德蒙·阿伦比将军 303
- Almería 阿尔梅里亚 124, 130, 132, 278
- Almodis of La Marche 拉马什的阿尔莫迪, 31, 143
- Almohads 阿尔摩哈德王朝 132, 169-70, 199
- Almoravids 阿尔摩拉维德人 7, 116, 132
- Alora 阿洛拉 278
- Alp Arslan, Selchükid s. 阿勒卜·阿尔斯兰, 塞尔柱苏丹 2
- Alphonse, c. Poitou 阿尔方斯, 普瓦图伯爵 169, 193, 209
- Alsace 阿尔萨斯 253
- Alum 明矾 259
- Alvis, b. Arras 阿尔维, 阿拉斯主教 125
- Alvor 阿尔沃尔 169
- Amadeus III, c. Savoy 阿梅迪奥三世, 萨伏依伯爵 124
- Amadeus VI, c. Savoy 阿梅迪奥六世, 萨伏依伯爵 269
- Amalfi 阿马尔菲 224
- Amalric, k. Jerusalem 阿马尔利克, 耶路撒冷国王 91, 93-4, 99-101, 106, 109, 131, 232
- Amalric of Lusignan, governor of Cyprus 吕西尼昂的阿马尔利克, 塞浦路斯总督 216, 243-4, 258-9
- Amalric, c. Montfort 阿马尔利克, 蒙福特伯爵 168, 188-9
- Amanus mts 阿玛努斯山脉 37, 76, 80
- America 美洲 285-6, 294, 297-9, 303, 307-8
- al-Amir, Fatimid caliph 阿米尔, 法蒂玛王朝

- 哈里发 96
- Anacletus II, anti-pope 安纳克雷图斯二世, 敌教皇 117, 121
-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2, 33, 35, 39, 46, 126, 237, 270, 273
- Ancona 安科纳 277-8; March of 边境 263
- Andalucia 安达卢西亚 117, 130, 170, 200
- Andravida 安德拉维达 (希腊) 218
- Andrew, St, visions of 圣安德烈显灵 39
- Andrew II, k. Hungary 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 177, 196
- Andronicus II Palaeologus, Byzantine e. 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帕里奥洛格斯, 拜占庭皇帝 223
- Andronicus III Palaeologus, Byzantine e. 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帕里奥洛格斯 267
- Angers 昂热 3, 115
- Anjou 安茹 98
- Ankara 安卡拉 46, 270
- 'Annaba (Bône) 安纳巴 (波尼) 286
- Anna Comnena 安娜·科内玛 33
- Anselm, b. Havelberg, papal legate 安瑟伦, 哈费尔伯格主教, 教皇使节 125
- Anselm, St, b. Lucca 圣安瑟伦, 卢卡主教 8-10
- Antalya 安塔利亚 33, 128, 245, 268, 278
- Antioch (Antakya), city 安条克 (安塔基亚), 城市 1, 19, 32-3, 36-43, 50-1, 61-3, 65, 67-8, 75-6, 80, 85, 96, 107-8, 111, 117-18, 128-9, 138, 140, 215, 225, 229, 240: *Assises des Bourgeois* of 市民法令 84; *Battle of* 战役 37, 39-40; *cathedral* 大教堂 39, 62; *citadel* 城堡 37, 39; *commune* 社群 229; *gate of George* 圣乔治门 38; *Greek (Orthodox) patriarchate* 希腊 (东正教) 牧首区 62-3, 68, 229; *Latin (Catholic)* patriarchate 拉丁 (天主教) 牧首区 50, 61, 63, 66, 68, 76, 229; *Mt Silpius* 西尔皮乌斯山 37-8; *Muslim governor* 穆斯林总督 39; *siege of* (1097-8) 围攻 (1097—1098年) 37-40; *tower of Two Sisters* 双姊妹塔 38. 另见各个牧首、拉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 Antioch, principality 安条克公国 50-1, 53, 64-5, 73, 88-91, 99, 102-5, 107-8, 110-11, 117-19, 121, 126, 128, 182, 208, 215, 227-30: *dukes* 公爵 85; *judges* 法官 85; *praetors* 行政长官 85, 另见各个大公、拉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 Anti-Taurus mts 反托罗斯山脉 37
- Antonio I Acciaiuoli, d. Athens 安东尼奥一世·阿奇艾尤奥利, 雅典公爵 261
- Antwerp, marquise of 安特卫普侯爵领地 29
- appeals to West 向西方求助 16, 104, 117-18, 120-1, 131, 208, 243, 264, 269, 272-3. 另见与西方的联系
- Apulia 阿普利亚 30, 95, 118, 182
- 'Aqaba 亚克巴 106; *Gulf of* 亚克巴湾 102
- Aquitaine 阿基坦 169
- Arabia 阿拉伯半岛 110, 307
- Arabic learning 学习阿拉伯语 75, 78
- Arab Nationalism 阿拉伯民族主义 305-6, 308
- Aragon 阿拉贡 xxvi, 130, 133, 164, 168, 170, 199, 203-4, 209-10, 214, 223, 243, 248, 255, 260-1, 271, 278, 284; *crusade against* 针对其的十字军行动 203-4
- Aral Sea 咸海 1
- Archipelago, duchy of 半岛公国 218, 222, 259-69
- Archontes 统领 219
- Armand of Peragors, gm. Templars 佩里戈尔的阿曼德, 圣殿骑士团大团长 227
- Armenia, Armenians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人

- 2, 36, 38-9, 50, 53, 61, 67-9, 73-4, 113, 121, 140, 211, 215-16, 229
- armsbearers 武人 3, 13-15, 17-21, 23, 28, 37, 39, 41, 47, 66, 79, 81, 93-4, 102, 110, 115, 118, 125, 135, 150, 157, 165, 168, 180, 188-9, 193, 195, 197, 208-9, 216, 218-19, 223, 232, 236, 245-6, 251-3, 256, 266-7, 272-3, 277-8, 280, 294, 296; equipment 装备 20; 'new knight' "新骑士" 79; supporters 随从 18, 195
- Arnold II, l. Ardres 阿诺德二世, 阿尔德雷领主 44
- Arnold, archb. Narbonne 阿诺德, 纳尔榜大主教 170
- Arnulf, b. Lisieux 阿努尔夫, 利雪主教 125
- Arnulf of Chocques, p. Jerusalem 绍克的阿努夫, 耶路撒冷牧首 52, 54, 62-3, 65, 95, 110
- 'Arqah 阿尔卡 42-4, 90
- Arrabi, family 阿拉比家族 66
- Arzuf 阿尔苏夫 51-2, 107, 144, 240-1; Battle of 战役 144; lordship 领主权 85, 92, 231, 233, 239-40
- Arta 阿尔塔 260; Gulf of 阿尔塔湾 289
- Artah 阿尔塔 62-3, 105; bishop 主教 62
- Arthur, d. Brittany 亚瑟, 布列塔尼公爵 142
- Artlenburg 阿尔滕堡 130
- Aruj Barbarossa 阿鲁吉·巴巴罗萨 286
- Arwad (Ruwad/Ruad) 阿尔沃德岛(鲁瓦德岛) 244, 250, 303
- Ascalon (Ashqelon) 阿斯卡隆 51-2, 80, 94, 96, 99, 102, 106-7, 109, 114, 119, 145-6, 188-9; Battle of (1099) 战役(1099年) 44, 113; lordship 领主权 85, 94, 96, 144
- Ashdod 阿什杜德 44
- al-Ashraf Khalil, s. Egypt 阿什拉夫·哈里里, 埃及苏丹 243
- al-Ashraf Musa, s. Egypt 阿什拉夫·穆萨 238
- el 'Ashtara 阿什塔拉 110
-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1-2, 12, 19, 28-9, 33-5, 37, 40, 42-3, 48, 51, 107-8, 126-9, 131, 140, 177, 213, 217, 220-1, 245, 255-6, 267, 269-70, 287
- Asilah 阿西拉 288
- Assassins, Shi'ite sect 阿萨辛派, 伊斯兰教什叶派, 104, 107, 146, 237
- Assimilation 涵化 xxv, 71-2, 217
- assise sur la ligece 《效忠法》99-100, 231, 234-6
- Assises des Bourgeois 《市民法令》84, 另见 Acree; Antioch
- Assises of Antioch 《安条克法令》216
- Assises of Romania 《罗马尼亚法令》218
- Athanasius, Orthodox p. Antioch 阿塔纳修, 安条克东正教牧首 68
- el Atharib 阿塔里布 50, 104
- Athens 雅典 218, 222-3, 260-1, 270, 292; duchy of 公国 223, 260-51, 266; Parthenon 帕台农 292
- 'Atlit(Chastel Pèlerin) 阿特利特(佩勒兰庄园) 177, 240, 244
- Audita tremendi 《闻此严判》134, 137, 174
- Augustine of Hippo, St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 8-9, 183
- Augustinian Rule and canons 奥古斯丁修会会规及持戒修士 53, 57, 70, 81
- el 'Auja', river 奥贾河 92
- Austria 奥地利 253, 295-6
- Authority, Legitimate 合法权威 xxx, 另见基督; 教皇
- Avignon 阿维尼翁 168, 248, 264, 266, 271-3, 278
- Avis, Order of 艾维斯修会 133
- Ayala, Felipe 费利佩·阿亚拉 297

**Ayas (Yumurtalik) 阿亚斯 (尤穆尔塔勒克)**  
85, 238, 245, 258, 265  
**Aybeg, s. Egypt 亚贝格, 埃及苏丹** 237-8  
**Aydin 艾丁** 256, 265, 267-9  
**Ayyubids 阿尤布王朝** 150, 226-7, 237-8. 另

见各位统治者

'Azaz 阿扎兹 50

**Azov (Tana) 亚速 (塔纳)** 238

**Azzo Visconti 亚佐·维斯康蒂** 263

## B

**Ba'albek 巴勒贝克** 105, 226

**Badajoz 巴达霍斯** 199

**Badr al-Jamali, vizir 巴德·贾马里, 维齐尔** 26

**Baeza 拜萨** 132, 170

**Baghdad 巴格达** 1-2, 26, 46, 237-8

**Bagnara 巴尼亚拉** 142

**Bağras (Gaston) 巴格拉斯 (贾斯通)** 229

**Bailiwick of Utrecht, xxxiii 乌得勒支辖区团**  
285

**Balaklava (Cembalo) 巴拉克拉瓦 (森巴洛)**  
238

**Baldric of Bourgeuil, archb. Dol 布尔盖的鲍德里, 都尔大主教** 48, 112

**Baldwin I, Latin e. Constantinople, c. Flanders 鲍德温一世,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 佛兰德斯伯爵** 135, 152, 155, 158, 160, 220, 223

**Baldwin II, Latin e. Constantinople 鲍德温二世,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 187, 190-1, 221-3

**Baldwin I, c. Edessa, k. Jerusalem 鲍德温一世, 埃德萨伯爵, 耶路撒冷国王** 18-19, 29-30, 34, 36-8, 50, 52-3, 63-6, 90-1, 94-6, 108-9, 114

**Baldwin II, c. Edessa, k. Jerusalem 鲍德温二世, 埃德萨伯爵, 耶路撒冷国王** 53-4, 79, 90-1, 95-8, 107, 109, 119-20

**Baldwin III, k. Jerusalem 鲍德温三世, 耶路撒冷国王** 91, 98-100, 109, 129

**Baldwin IV, k. Jerusalem 鲍德温四世, 耶路撒冷国王** 100-1, 109, 111

**Baldwin V, k. Jerusalem 鲍德温五世, 耶路撒冷国王** 101, 109, 111, 241

**Baldwin of Boulogne 布洛涅的鲍德温** 18, 29, 参见鲍德温一世

**Baldwin, archb. Caesarea, ab. St Mary of the Valley of Jehoshaphat 鲍德温, 凯撒里亚大主教, 约沙法谷圣马利亚修道院院长**  
54

**Baldwin, archb. Canterbury 鲍德温, 坎特伯雷大主教** 141-3

**Baldwin, c. Mons, c. Hainault 鲍德温, 蒙斯伯爵, 埃诺伯爵** 40

**Baldwin Embriaco 鲍德温·恩布里亚科** 241

**Baldwin of Le Bourcq 布尔克的鲍德温**, 58  
参见鲍德温二世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116, 171

**Balian Grenier, l. Sidon 巴里安·格勒尼耶, 西顿领主** 188, 232-3, 236

**Balian of Ibelin, l. Arsuf 伊贝林的巴里安, 阿尔苏夫领主** 233, 239-40

**Balian of Ibelin, l. Beirut 伊贝林的巴里安, 贝鲁特领主** 233, 237

**Balian of Ibelin, l. Nablus 伊贝林的巴里安,**



- 纳布卢斯领主 110-11, 142, 232-3
- Balkans 巴尔干半岛 19, 27-8, 33, 46, 126, 128, 139, 221, 270-3, 275, 292, 304-5
- Baltic: crusades in region 波罗的海, 该地区的十字军行动 xxx, xxxi, 123-5, 130, 132-3, 135, 161-2, 171, 173, 195-8, 200, 251-4, 309; Sea 波罗的海 72, 162, 171, 252, 295
- Baños 巴尼奥斯 170
- Baniyas (Syria) 巴尼亚斯 (叙利亚) 50, 107
- Baniyas (upper Jordan) 巴尼亚斯 (上约旦) 109
- Barada, river 巴拉达河 129
- el Barah 埃尔巴拉 62; bishop of 主教 42
- Barbary corsairs 柏柏里海盜 271, 295
- Barbastro 巴瓦斯特罗 9
- Barcelona 巴塞罗那 7, 54, 209; counts of 巴塞罗那伯爵 7, 124, 另见历任伯爵
- Bari 巴里 29, 32, 146; Council of 会议 16
- Ba'rin 巴林 104, 109
- Barons' Crusade 领主们的十字军 186-90
- Barres 巴雷 54
- Basel 巴塞尔 185
- Batroun 巴特伦 243, 273
- Bavaria 巴伐利亚 46
- Bayazid I, Ottoman s. 巴耶塞特一世, 奥斯曼苏丹 270, 273
- Bayazid II, Ottoman s. 巴耶塞特二世, 奥斯曼苏丹 257, 270
- Baybars, s. Egypt 拜伯尔斯, 埃及苏丹 210, 238, 240-1
- Baza 巴扎 278
- Beaufort (Qalaat esh Shaqif) 博福堡 (沙奇夫堡) 111, 188-9, 240
- Beauvais 博韦 54; bishop of 主教 143
- Beirut 贝鲁特 43, 91, 94, 106-9, 147, 215, 236-7, 241-4, 273, 306; diocese 教区 66; lordship 领主权 94, 144, 233, 235
- Beit Nuba 贝特·努巴 145
- Bejaia (Bougie) 贝贾亚 (布贾) 279
- Belek, ruler of Aleppo 贝莱克, 阿勒颇的统治者 91
- Belen Pass 贝伦山口 37
- Belgium 比利时 302
-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27, 270, 276-7, 282, 292
- Bellapaise, abbey 贝拉派瑟修道院 258
- Bellator Rex 武士王 247
- Belval, priory 贝尔瓦尔女修道院 16
- Belvoir 贝尔沃 80, 179
- Benameji 贝纳梅希 278
- Benedict, St 圣本笃 11
- Benedict XII, pope 本笃十二世, 教皇 267-8
- Benedict XIII, anti-pope 本笃十三世, 敌教皇 272
- Benevento, Battle of 贝内文托战役 203
- Berbers 柏柏尔人 7
- Berengar Raymond II, c. Barcelona 雷蒙德·贝朗热二世, 巴塞罗那伯爵 31
- Berengaria of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贝伦加利亚 221
- Berengaria of Navarre 纳瓦拉的贝伦加利亚 142
- Bergen 卑尔根 114
- Bernabo Visconti of Milan 米兰的贝尔纳博·维斯康蒂 263
- Bernard of Bré, family 布莱的贝尔纳家族 115
- Bernard, St, ab. Clairvaux 圣贝尔纳, 克莱沃修道院院长 xxxiii, 79, 115-16, 121-5, 131, 134, 136, 149, 162, 296
- Bertha of Sulzbach, Byzantine empress 苏尔茨巴赫的贝尔塔, 拜占庭王后 126
- Bertrand of St Gilles, c. Tripoli 圣吉尔的贝特朗, 的黎波里伯爵, 31, 90, 114

- Bessarion, cardinal 贝萨里翁, 红衣主教 276
- Bet Guvrin (Beit Jibrin/Bethgibelin) 巴塔·古夫林 80, 83, 107
- Bethany 伯大尼 135, 参见 St Lazarus of Bethany
- Bethlehem 伯利恒 43, 70, 73, 119, 181, 188:  
church of the Nativity 主诞堂 53, 56, 68-9, 98; Order of 修会 76; Order of Our Lady of 伯利恒圣母骑上团 277
- Bet She'an 贝特谢安 52, 177
- Béziers 贝济耶 167
- Bilbeis 比勒拜斯 109
- Birecik 比雷吉克 36, 105
- Bizerte 比塞大 287
- Black Death 黑死病 252, 259, 262, 268
- Black Sea 黑海 222, 238-9, 265, 268-70
- Blanchegarde (Tel es-Safi) 白丘 94
- Blanche of Castile, q. France 卡斯蒂利亚的布朗歇, 法国王太后 190-1, 193, 206
- Blois, count of 布卢瓦伯爵 141
- Bodrum 博德鲁姆 255-7
- Bohemia 波西米亚 xxxi, 24, 28, 120, 253, 263-4, 274-5, 279, 另见 Czechs
- Bohemond I, pr. Antioch 博希蒙德一世, 安条克亲王 18, 30-6, 38-42, 46, 50-3, 63-5, 91, 117-19, 141: crusade of (1107-8) 其十字军行动 (1107—1108) 51, 117-19, 130
- Bohemond II, pr. Antioch 博希蒙德二世, 安条克大公 91, 96
- Bohemond III, pr. Antioch 博希蒙德三世, 安条克大公 105, 228-9
- Bohemond IV, pr. Antioch, c. Tripoli 博希蒙德四世, 安条克亲王, 的黎波里伯爵 228-9, 232
- Bohemond V, pr. Antioch, c. Tripoli 博希蒙德五世, 安条克亲王, 的黎波里伯爵 229-30, 241
- Bohemond VI, pr. Antioch, c. Tripoli 博希蒙德六世, 安条克亲王, 的黎波里伯爵 241
- Bohemond VII, pr. Antioch, c. Tripoli 博希蒙德七世, 安条克亲王, 的黎波里伯爵 241, 243
- Bohemond of Taranto 塔兰托的博希蒙德 18, 另见 Bohemond I
- Boisgelin, Louis de 路易·德·波瓦杰林 294
- Bologna 博洛尼亚 16, 288
- Bonaventura, niece of Saliba 博纳文图拉, 萨利巴的侄女 66
- Boniface VIII, pope 卜尼法斯八世, 教皇 204, 246, 248, 265
- Boniface IX, pope 卜尼法斯九世, 教皇 271-3
- Boniface, marquis of Montferrat 卜尼法斯, 蒙费拉侯爵 152-3, 155-6, 158-60, 218
- Bonizo of Sutri 苏特里的博尼佐 9
- Bonneuil-sur-Marne 马恩河畔的博纳伊 211
- borgesies* 资产 84
- Bosnia (Bosna) 波斯尼亚 201
- Bosporus 博斯普鲁斯 27, 34, 45-6, 127-8, 156, 270
- Bouillon 布永 29
- Boulogne, county of 布洛涅郡 29, 97
- Bourges 布尔日 121
- Bourcq of Rethel, family 勒泰勒的布尔克家族 17
- Bouvines, Battle of 布汶战役 150, 176
- Bozcaada (Tenedos) 博斯卡达岛 (特尼多斯岛) 292
- Brabant 布拉班特 52
- Brandenburg, Hospitaller Bailiwick 勃兰登堡, 医院骑士团辖区 285
- Bremen 不来梅 161, 201; archbishops of 大主教 124, 201

Breslau (Wroclaw) 布雷斯劳 (弗罗茨瓦夫) 274  
 Bridget of Sweden, St 瑞典的圣布里吉特 xxxiii, 251  
 Bridiers 布里迪耶 54  
 Brienne, family 布里埃纳家族 261, 266  
 Brindisi 布林迪西 181, 266  
 British Isles 不列颠群岛 88, 130, 205, 247, 249, 300, 303-5, 307, 另见 England; Ireland; Scotland  
 Brittany 布列塔尼 22, 54  
 Broyes, family 布卢瓦家族 17  
 Bruno, St 圣布鲁诺 3  
 Bruno, b. Segni, papal legate 布鲁诺, 塞尼主教, 教皇使节 118  
 Buda (Budapest) 布达 (布达佩斯) 269, 272,

276, 284, 292  
 Bulgaria 保加利亚 45, 114, 127, 139, 201, 217, 220-1, 269-70, 275, 302, 304  
 Burgundy 勃艮第 3, 17, 45, 193, 211, 260, 272, 275-6, 291: counts of 伯爵 17, 119; dukes of 公爵 144, 152, 176. 另见各个伯爵和公爵  
 Bure 比尔 54  
 Bursa 布尔萨 270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1-2, 7-8, 12, 19-20, 27-8, 30-7, 40, 46, 50-1, 53, 56, 59-60, 63, 78, 85-7, 90, 94, 100, 104-5, 107-9, 118-20, 125-30, 139-40, 142, 153, 155-60, 191, 209, 213-14, 217-20, 222-4, 229, 238-9, 255-61, 265, 267, 269-70, 273, 275-6, 309, 另见 Nicaea

## C

Caesarea 凯撒里亚 52, 62, 93, 107, 177, 181, 195, 211, 240; lords of 领主 93; lordship 领主主权 85, 231, 233, 240  
 Cagliari 卡利亚里 210  
 Cairo 开罗 26, 42, 96, 109-10, 188, 238, 259, 297  
 Calabria 卡拉布里亚 142, 204  
 Calatrava 卡拉特拉瓦 133, 170: Order of 修会 133, 169  
 Calixtus II, pope 卡利斯图二世, 教皇 17, 115-17, 119, 121, 123: crusade of 其十字军行动 17, 115-17, 119-20, 123  
 Calixtus III, pope 卡利斯图三世, 教皇 276-7  
 Caltabellotta, Treaty of 卡塔罗塔条约 204  
 Cambrai 康布雷 29: League of 同盟 280  
 Campo de Montiel 坎波德蒙特尔 199

Canary Islands 加纳利群岛 245, 262, 279  
 Çankiri (Gangra) 昌克勒 46  
 Caolfe, niece of Saliba 卡奥菲, 萨利巴的侄女 66  
 Cape Orlando, Battle of 奥兰多角战役 204  
 Carafa, Carlo, cardinal 卡尔洛·卡拉法, 红衣主教 284  
 Carafa, Oliviero, cardinal 奥利维耶罗·卡拉法, 红衣主教 278  
 Carcassonne 卡尔卡松 167: Viscount of 子爵 116  
 cardinals, college and commissions of 红衣主教团 3, 212, 276, 279-80, 282, 289  
 Carmelites, Order of 圣衣会 76, 258, 268  
 Carthusians, Order of 加尔都西修会 3  
 Caspian Sea 里海 199, 238

- Cassar, Girolamo 吉罗拉莫·卡萨尔 293
- Castile 卡斯蒂利亚 130, 132-3, 170, 190, 199, 247, 261-2, 271, 278, 284-5, 292
- Catalan Company 加泰罗尼亚团 223, 260-1, 266, 270
-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7-8, 83, 116, 130, 223, 224
- Cathars 清洁派 164-9, 264, 309
- Catherine Cornaro, q. Cyprus 凯瑟琳·科纳罗, 塞浦路斯王后 258
- Catherine of Courtenay, Latin empress of Constantinople 库特奈的卡特琳,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后 223, 260, 265
- Catherine of Siena, St 锡耶纳的圣凯瑟琳 xxxiii
- Catherine the Great, empress of Russia 叶卡捷琳娜大帝, 俄国女皇 295
- Cause, Just 正义的事业 xxi, 253, 264
- Cecilia of England 英格兰的塞西莉亚 54
- Celestine III, pope 塞莱斯廷三世, 教皇 146, 161, 169
- Centulle of Bigorre 比格的森图勒 116
- Centurione Zaccaria, pr. Achaea 森图里奥内·扎卡里, 亚该亚大公 260-1
- Cephalonia(Keffallinia) 凯法隆尼亚 218, 260
- Cesena 切塞纳 263
- Chaine 链官 89, 参见 Acre; *Cour de la Chaine*
- Champagne 香槟 14, 79, 115, 211, 221: counts of 伯爵 3, 135, 141. 另见历任伯爵
- Chanson d'Antiochie* 《安条克之歌》44
- Chanson des Chetifs* 《弱者之歌》76
- Charles V, western e. 查理五世, 西方皇帝 281-2, 284, 286-9, 291-2; crusades of 其十字军行动 286-7
- Charles VI, western e. 查理六世, 西方皇帝 292
- Charles IV, k. France 查理四世, 法国国王 266-7
- Charles VI, k. France 查理六世, 法国国王 247, 271-3
- Charles VIII, k. France 查理八世, 法国国王 279-80
- Charles I of Anjou, k. Sicily, k. Jerusalem 安茹的查理一世, 西西里国王, 耶路撒冷国王 202-5, 207, 209-11, 213-14, 222-3, 231, 242-3
- Charles II (of Salerno), k. Naples 查理二世 (萨勒诺的), 那不勒斯国王 204, 214, 223
- Charles III, k. Naples 查理三世, 那不勒斯国王 260 I
- Charles VII, k. Naples 查理七世, 那不勒斯国王 294
- Charles, c. Flanders 查理, 佛兰德斯伯爵 96
- Charles Martel 铁锤查理 302
- Charles, c. Valois 查理, 瓦卢瓦伯爵 203-4, 223, 265
- Charlotte, q. Cyprus 夏洛特, 塞浦路斯女王
- Charroux, family 沙尔鲁 143
- Chartres 沙特尔 54, 97, 118
- Chastel Hernaut 艾尔瑙堡 107
- Chateaubriand, Francois Rene de 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 303
- Chaumont-en-Vexin, family 肖蒙-韦克辛家族 17
- Cherchell 舍尔沙勒 286
- Children's Crusade 儿童十字军 171-2
- China 中国 199
- Chios 希俄斯 215, 259, 276, 284, 292
- Chivalry: code and ethics 骑士: 规章与伦理 xxxi, 136, 153, 183, 223, 246, 253, 261, 273, 305; orders of 骑士团 284-5, 296, 302
- Chocques 绍克 54
- Christ: authority of 基督: 其权威 xxx, 48,

- 297-8; knights of 他的骑士 4, 47, 79, 117, 162, 185; Order of 他的 修会 255, 284; patrimony of 基督的授权 xxx, 23-4, 122, 173; Political 政治 xxx
- Christian, b. Prussia 克里斯蒂安·普鲁士主教 196-7
- Christian Republic, concept of 基督教共和国的观念 xxx, 267
- Christians, Eastern 基督徒、东方的 62, 151, 另见各个教派
- Chronicle of Morea* 《摩里亚纪年》219
- Cilicia 西里西亚 2, 36, 38, 50-1, 63, 67, 85, 107, 118, 140, 228-9, 238, 241, 258-9, 265-9
- Cilician Armenia 西里西亚人治下的亚美尼亚 67, 85, 146, 196, 208, 215-16, 229, 265-7: Feudatories 封地 216; laws 法律 216. 另见各个统治者
- Cilician Gates 西里西亚之门 37
- Cistercians 西多会修士 121, 123, 131, 133, 136, 153, 190
- Cîteaux, abbey 西多修道院 153-5
- Civitave, Battle of 奇维塔特战役 9
- Clairvaux, abbey 克莱沃修道院 123
- Clarembald of Vendeuil 凡都尔的克拉朗波 28
- Clement IV, pope 克莱芒四世, 教皇 209-10
- Clement V, pope 克莱芒五世, 教皇 247-50, 255, 265
- Clement VI, pope 克莱芒六世, 教皇 268
- Clement VII, anti-pope 克莱芒七世, 敌教皇 271-2
- Clement VII, pope 克莱芒七世, 教皇 282, 288, 292-3
- clergy on crusade 参与十字军的教士 47, 52, 54, 120, 154-61, 175, 另见各个教士和教皇使节
- Clermont 克莱蒙 3, 122: Council of 会议 3-4, 8, 12, 15-17, 19, 24, 26, 31, 45, 62, 117
- Cleves, count of 克里夫伯爵 253
- Cloth 布 225
- Cluny, abbey 克吕尼修道院 3, 6, 17, 54, 95, 117
- Collectorates 税区 205, 212. 另见 taxation
- Collo 科克罗 286
- Cologne 科隆 (德国) / 克洛涅 (法国) 24, 27, 172
- Coloman, Byzantine dux 科勒曼·拜占庭大公 105
- Coloman I, k. Hungary 科洛曼一世, 匈牙利国王 30
- colonial movement 殖民运动 xxv, 18-20, 215, 301-7
- Colonna family, crusade against 科隆纳家族, 针对其的十字军行动 204
- Comana 科马纳 37
- Compostela 孔波斯特拉 11. 参见 Santiago de Compostela
- Compiègne 贡比涅 152
- comptoirs of western merchants 西方商人的工坊区 224-6
- Conder, Sir Claude 克劳德·孔德尔爵士 303-4
- confraternities, crusading 十字军兄弟会 280, 283
- Conon of Bethune 贝蒂讷的科农 152
- Conques, abbey 孔克修道院 11
- conquest, rights of 征服者的权利 143-5, 233
- Conrad III, k. Germany 康拉德三世, 德意志国王 123-9, 131, 143
- Conrad IV, uncrowned k. Germany, k. Jerusalem 康拉德四世, 未加冕的德意志国王, 耶路撒冷国王 203, 230, 237:

- crusade against 针对其的十字军行动 202, 206-7
- Conrad, d. Masovia (Mazowsze) 康拉德·马索维亚(马佐夫舍)大公 196
- Conrad of Montferrat 蒙费拉的康拉德 138, 140, 153, 216, 226, 230
- Conrad of Wittelsbach, archb. Mainz 维特尔巴赫的康拉德·美因茨大主教 147, 228
- Conradin, k. Jerusalem 康拉丁·耶路撒冷国王 203, 230
- Conseil 咨询顾问 231-3
- Constance, Council of 康斯坦茨大公会议 254, 274
- Constance of Antioch 安条克的康斯坦丝 99
- Constance, q. Aragon 康斯坦丝, 阿拉贡王后 203
- Constance of France 法国的康斯坦丝 118
- Constantine (Algeria) 君士坦丁(阿尔及利亚) 286, 301
- Constantine, Roman e. 君士坦丁·罗马皇帝 56-9
- Constantine XI Palaeologus, Byzantine e 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格斯, 拜占庭皇帝 270
- Constantinople (Istanbul)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1, 7, 19, 27, 29-35, 39, 43, 45-6, 52, 118, 126-8, 139-40, 142, 153, 155-60, 187-91, 219-23, 238-9, 245, 270, 273-4, 276, 283-4, 287-9, 293; barons of Latin empire 拉丁帝国的领主们 220-1; Blachernae palace 布拉海尔蒙宫 45; Boukoleon palace 布科莱昂宫 159, 191; cathedral of St Sophia 圣索菲亚大教堂 158, 219, 222; crusades in favour of 对其友好的十字军行动 245, 273-4; crusades in favour of Latin empire 更偏向拉丁帝国的十字军行动 187, 189, 209, 221; fall of (1453) 陷落 (1453年) 276-9; feudal services in Latin empire 建立臣属拉丁帝国的封建制 158, 219-20; fiefs in Latin empire 在拉丁帝国的封地 158; Galata 加拉塔 157; Golden Horn 金角湾 30, 157, 159, 239; Greek (Orthodox) patriarchate 希腊(东正教)牧首区 8, 155, 157, 219, 309; Latin empire of 建立拉丁帝国 135, 158-60, 187, 189, 203, 217-23, 239; Latin (Catholic) patriarchate 拉丁(天主教)主教区 158, 160, 219; loss to Greeks (1261) 陷于希腊人之手(1261年) 209, 238; Pera 佩拉 239; sack of (1204) 遭洗劫(1204年) 159, 217, 另见 Latin Greece 以及各个皇帝和牧首
- Constitutiones pro zelo fidei* 《为热情的信者》 xxxiii, 212
- contracts for service on crusade 为十字军效力的契约 186, 193, 210, 246
- control by Church or lack of it 教会的控制与无法控制 47-9, 120, 148, 156, 160, 176, 186, 另见 papacy
- Conversions 皈依 61, 66-7, 72, 74, 85, 161, 188, 198, 210, 227, 252-3; by force 以武力强迫 24-5, 123-4, 162, 183, 另见 missions; Uniate churches
- Copts 科普特人 61
- Córdoba 科尔多瓦 7, 132, 199
- Corfu 科孚岛 119, 156, 222
- Corinth 科林斯 261, 273; Gulf of 科林斯湾 290
- Çorlu 乔尔卢 187
- correspondence with West 与西方的联系 227-8
- Corso 科索劫掠 258, 295-6
- Corvey, abbey 科韦修道院 125
- Corycus (Korgos) 科里库斯(科尔戈斯) 259,

268

Cos 科斯岛 255  
 Cotton 棉花 225  
*Cour de la Chaine* 铤官 86-7  
*Cour de la Fonde* 市场法庭 73-4, 86-7  
*Cours des Bourgeois* 市民法庭 84, 87, 89  
*Cours des Syriens* 叙利亚法庭 73-4, 87  
 Courtenay, family 库特奈家族 17  
 Crac des Chevaliers (Husn el Akrad) 骑士堡 (库尔德人城堡) 51, 80, 102, 111, 182, 195, 229, 240  
 Cracow 克拉科夫 253  
 Cretan Sea 克里特海 217  
 Crete 克里特岛 142, 215, 218, 259, 278, 284, 289, 292, 295  
 Crim Mongols 克里木蒙古人, 参见 Mongols  
 critical romantics 批判性浪漫主义者 299-300, 305-6, 308  
 criticism 批评 130-1, 205-7, 281  
 Cross, crusade as way of 十字架, 十字军作为高举其的一种方式 16, 47; taking the 高举十字架, 参见 vow; wearing of 佩戴 15-16, 79, 112-13, 116, 122, 138, 162-3, 183-4  
 Cross, monastery of the Holy 圣十字修道院 53  
*Crucesignati* 十字军 162  
 Crusade: of 1101 十字军: 1101 年的 17, 40, 44-6, 51, 118; of 1120 1120 年的 17, 97, 115-17, 119-20, 123; of 1129 1129 年的 97-8, 120, 129; of 1197-98 1197-1198 年的 146-7, 149. 另见 Albigensian Crusade; Aragon; Baltic; Barons' Crusade; Bohemond I; Calixtus II; Charles V; Children's Crusade; Colonna; Conrad IV; Constantinople; Estonia; Fifth Crusade; First Crusade; Fourth Crusade; Frederick II; Fulk of Villaret;

Henry Despensers; heretics; Hussites; leagues; Livonia; Louis IX; Mahdia; Manfred; Markward of Anweiler; Mongols; Nicopolis; peasant crusade armies; Perpetual Crusades; Peter I, k. Cyprus; 'Political' Crusades; 'Popular' Crusades; *Reconquista*; Schism; Sebastian; Second Crusade; Sicily; Smyrna; Stedinger; Third Crusade; Tunis; Varna; Wends 等词条

crusaders: as pilgrims 十字军战士: 作为朝圣者 xxxi, 8-16, 47, 112-15, 162, 167, 184, 192, 233, 256; iterative 多次参加的 115, 135, 160, 163, 245-6; performing service to Christ 为基督服务 183-4

crusading: as alternative to monasticism and life of religious 十字军运动: 作为隐修主义和宗教生活的一种替代方式 14-16, 47, 112, 135; as a penitential war 作为一场苦修赎罪战争 xxv, xxx-xxxi, 4, 8-16, 47, 136, 167, 183-4; definition of 定义 xxx-xxxii, 12, 47-9, 183-4, 203-7, 245-6, 267, 288, 291, 308-9; movement 整场运动 xxxii; thought 思想 xxix-xxx, xxxiii, 4-10, 12, 23, 47-9, 112, 120, 122-5, 134-7, 149-50, 158, 166-7, 173-6, 183-6, 204-7, 245-7, 291, 297-8; to the East and in defence of Christendom's eastern frontier 东征以及捍卫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境 xxxi, xxxii, 1-48, 112-60, 162-3, 166-9, 171-82, 186-96, 199-214, 246-7, 254-7, 262, 264-98, 308-9; treatises 相关条约 151, 246-7

*Cruzada* 十字军税 291

*curia Jesu Christi* 基督的元老院 139

Cuthbert, St 圣卡斯伯特 11

Cyclades Islands 基克拉底斯群岛 218

Cyprus 塞浦路斯 62, 74, 108, 113, 142-3, 146,

154, 178, 181, 194, 206, 210, 216-17, 219, 232-3, 235-8, 242-5, 247, 250, 254-5, 258-9, 265, 267-9, 271, 273, 284, 289, 297; agriculture 农业 217; architecture 建筑 217; Latin (Catholic) Church in 此地的拉丁(天主教)教堂 217; feudal law 封建法律 216-

17, 231; feudal system 封建体系 216; Greek (Orthodox) Church in 此地的希腊(东正教)教堂 217; High Court 高等法庭 216, 235, 258-9; regency 摄政 235, 237

Czechs 捷克 254, 274-5, 另见 Bohemia

## D

Daimbert, archb. Pisa, papal legate, p. Jerusalem, 丹波特, 比萨大主教, 教皇使节, 耶路撒冷牧首 50, 52-4, 62-5, 96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32, 154

Daman 达曼 86

Damascus 大马士革 42, 84, 96, 102, 104-11, 120, 129, 181, 188-9, 195, 225-7, 237-8, 241, 300, 303, 305

Damietta (Dumyat) 达米埃塔(杜姆亚特) 109, 171, 177-80, 194-5, 205, 210

Dandanqan, Battle of 丹丹坎战役 2

Daniel, Norman 诺曼, 丹尼尔 304

Danishmend 达尼什曼德 35, 46, 51, 53, 117

Danube, river 多瑙河 127, 272-3

Dardanelles 达达尼尔海峡 108, 126, 139-40, 220-1, 268, 270, 275, 292

Dartmouth 达特茅斯 130

Darwish, Mahmoud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306

Dauphiné 多菲内 211

Deir el Balah (Darum) 戴尔拜莱赫(达鲁姆) 94, 102, 145

Delacroix, Eugene 尤金·德拉克洛瓦 301

Demmin 代明 130

Denmark 丹麦 114, 124, 130, 132-3, 162, 169, 201

*De praedicatione sanctae crucis contra*

*Saracenos* 《论针对撒拉森人的十字架传道》185-6, 192

Derby, earl of 德七伯爵 262

Deserters 逃亡者 26, 39, 45

Despeñaperros Pass 德斯皮娜佩罗斯山口 170

Devol, Treaty of 《德沃尔条约》51, 119

*dhimmi* laws and status 伊斯兰第米法规及地位 72-5

Diderot, Denis 德尼·狄德罗 298

Diego, b. Osma 迭戈·奥斯马主教 165

Diego Gelmirez, archb. Compostela, papal legate 迭戈·赫尔米雷斯, 孔波斯特拉大主教, 教皇使节 116-17

Diego Velázquez 迭戈·委拉斯克斯 133

Dijon 第戎 150

*Dispensator* 管家 83

*Divina dispensatione* 《神圣豁免》124

Dobin 多宾 130

Dobryn, Knights of 多布任骑士团 196

Dodecanese Islands 多德卡尼群岛 218, 254-5

Dog river 狗河 43

Dolcino, Fra 多尔西诺神父 264

Dolomieu, Déodat de 戴奥达特·德·多罗缪 294

Dominic, St 圣多明我 165

Dominic, nephew of Saliba 多米尼克, 萨利巴



的侄子 66  
 Dominicans 多明我会修士 67, 70, 165, 185, 187, 192, 198, 297  
 Dorylaeum, Battle of 多利留姆战役 35-6, 44, 127  
 Dózsa revolt 多斯扎反叛 277  
 Dover 多弗尔 208  
 dragoman(*interpres*) 译员 86

Drogo of Nesle 内勒的德罗戈 28  
 Druzes 德鲁兹人 61  
 Dubrovnik (Ragusa) 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 275  
 Durazzo (Durrës) 都拉斯 29, 119, 280  
 Durbe, Battle of 杜尔贝战役 198, 252  
 Durham 达勒姆 11  
 Dvina, river 德维纳河 161, 198

## E

Ebro, river 埃布罗河 117  
 Écry (Asfeld-la-Ville) 艾克雷(阿斯菲尔德城) 152  
 Edessa (Urfa) 埃德萨(乌尔法) 36-8, 63, 102, 104-5, 109, 121, 126-9;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62; county of 郡 28, 36, 50, 53, 90-1, 94-5, 100, 102, 104-5, 107-8, 121, 另见各个伯爵的词条  
 Edirne 埃迪尔内 126, 140, 217, 220, 270  
 Edmund, earl of Lancaster 埃德蒙·兰开斯特伯爵 202, 211-12  
 Edremit, Gulf of 埃德雷米特湾 267  
 Edward I, k. England 爱德华一世, 英格兰国王 209-13, 246  
 Edward II, k. England 爱德华二世, 英格兰国王 266  
 Egypt 埃及 1-2, 42-4, 46, 65, 74, 85, 94, 96, 99, 104-9, 114, 119, 145, 147, 150-6, 163, 171, 176-81, 188-9, 194-5, 206, 209-12, 215, 221, 225-7, 237-8, 240-1, 243, 245-7, 256, 259, 265, 269, 274, 280, 286, 296, 306  
 Elbe, river 易北河 123, 130  
 Eleanor of Aquitaine, q. France, q. England 阿基坦的埃莉诺, 法兰西王后, 英格兰王

后 127, 129, 143  
 Elizabeth of Burgundy 勃艮第的伊丽莎白 218  
 embargoes on trade with Muslims 与穆斯林交易禁令 175, 247, 265  
 Embriaco, family 恩布里亚科家族 224-5, 244  
 Emeric, k. Hungary 阿梅里克, 匈牙利国王 154  
 Emich of Flonheim 弗隆海姆的埃米希 24, 28-9  
 Enfeh 恩菲 243  
 England 英格兰 23-4, 28-9, 43, 81, 89, 97, 101, 114, 117-18, 123-4, 130, 138, 141-2, 146, 153, 163-4, 169, 174, 178-9, 181, 189, 193, 201-2, 205, 209-11, 213, 245, 248, 250, 253, 255-7, 262, 266-9, 271-2, 274, 279, 281, 283, 285, 288, 302, 另见 British Isles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294, 298-9  
 Enquêteurs 调查者 192  
 Enrico Dandolo, doge of Venice 恩里科·丹多罗, 威尼斯总督 152, 154-5, 158, 160  
 Eperton 埃佩尔农 167  
 Ephesus 以弗所 128  
 Epirus 伊庇鲁斯 203, 222, 260, 271: Byzantine emigre state 拜占庭流亡王国 217, 219-20, 另见 Albania

Erard of Valéry 瓦莱里的埃哈尔 205, 209  
 Erdmann, Carl 卡尔·埃尔德曼 308  
 Ereğli 埃雷利, 46: Battle of 战役 36, 44  
 Ermessens of Melgueil 莫尔盖的埃尔莫森 31  
 Ertugrul, Ottoman prince 埃尔托格鲁尔, 奥斯曼酋长 270  
 Eschatology 末世论 10-11, 24, 139, 182  
 Eschiva, lady of Galilee 艾斯奇瓦, 加利利女领主 110  
 Eschiva of Ibelin 伊贝林的艾斯奇瓦 216, 233  
 Eskihsar 埃斯基海萨 128  
 Eskişehir 埃斯基谢希尔 270  
 Esseron 埃瑟隆 128  
 Estensi, family 埃斯滕西家族 263  
 Estonia 爱沙尼亚 132, 162, 196, 252: crusade 在该地的十字军行动 162, 196  
 Etampes 埃唐普 126  
 ethnic cleansing 种族清洗 61-2, 70, 84  
 Eu, count of 厄镇伯爵 272

Euboea 尤卑亚 215, 218, 259, 268, 270, 278  
 Eugene, pr. Savoy 尤金, 萨伏依亲王 292  
 Eugenius III, pope 尤金尼乌斯三世, 教皇 121-5, 127, 130-1, 134, 136, 149, 162  
 Eugenius IV, pope 尤金尼乌斯四世, 教皇 275  
 Euphrates, river 幼发拉底河 50  
 Eustace II, c. Boulogne 尤斯塔斯二世, 布洛涅伯爵 29  
 Eustace III, c. Boulogne 尤斯塔斯三世, 布洛涅伯爵 29, 52, 95, 97  
 Eustace of Flanders 佛兰德斯的尤斯塔斯 152  
 Eustace, son of Stephen of Blois 尤斯塔斯, 布卢瓦的史蒂芬之子 97  
 Evora, Order of 埃武拉修会 133. 参见 Avis  
 Evremar, p. Jerusalem 埃夫马尔, 耶路撒冷牧首 65  
 Excommunicamus 绝罚 175  
 Ezzelino of Romano 罗马诺的艾泽利诺 202

## F

Faenza 法恩莎 263  
 Faith, St 圣富瓦 11  
 Famagusta 法马古斯塔 217, 238, 258-9, 289: Greek cathedral 希腊大教堂 217; Latin cathedral, 拉丁大教堂 258; church of St Mary of Carmel 圣衣圣母教堂 258  
 families of crusaders 十字军战士的家系 17-23, 125, 135-6, 152, 184, 190, 301  
 Fatimid caliphs 法蒂玛王朝哈里发 1-2, 10, 26, 96-7, 106  
 Feodosiya (Kaffa) 费奥多西亚(卡法) 238, 268  
 Ferdinand III, St, k. Castile 斐迪南三世, 卡斯

蒂利亚国王 171, 199-200, 262, 302  
 Ferdinand V, k. Castile 斐迪南五世, 卡斯蒂利亚国王 II k. Aragon 二世, 阿拉贡国王 278-80, 284  
 Ferdinand of Majorca 马约卡的斐迪南 260  
 Ferdinand Sanchez, infant of Aragon 斐迪南·桑切斯, 阿拉贡的“婴儿” 209  
 Ferentino 费伦蒂诺 180  
 Ferral 费拉尔 170  
 Ferrara 费拉拉 263: League of 同盟 263  
 feudal relationships 封建关系 23, 33-4, 40. 参见 Latin Palestine and Syria  
 feudal service, delay in performance 封建义务,

- 延迟 184
- Fez 菲兹 288
- fideles beati Petri* 圣彼得的信徒 31
- Field of Blood, Battle of 血田战役 91, 96, 104, 108, 119
- 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 金缕地 281
- Fifth Crusade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5, 151, 154, 163, 171-82, 187, 194, 221, 235-6: leaders 领导人 178-9
- Finance 财政 19-24, 27, 36, 38, 45, 49, 54, 81, 93, 103, 125, 131, 135, 141-2, 150-5, 157-8, 166, 171, 173, 180-1, 184, 186-7, 189-90, 193-5, 201-2, 204-5, 207-10, 212-13, 215, 222, 226, 240, 255, 262, 264, 266-7, 295: pledges and sales 抵押与出售 20-2, 29, 121, 141, 184; renunciation of claims 放弃索赔 20-1, 另见 *taxation*
- Finland 芬兰 xxxii, 132, 162, 196, 251
- First Crusade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48, 51-4, 61-2, 76, 79, 88, 94-5, 104, 112-16, 118, 121, 123, 125-7, 134-5, 151, 160, 213, 224, 233, 276, 301: leaders 领导人 16, 19, 29-44, 51; numbers on 人数 17-18, 23, 37
- Fitero, abbey 菲特罗修道院 133
- Flanders 佛兰德斯 16-17, 24, 28, 114, 124, 138, 169, 176, 266, 271
- Fleury, abbey 弗勒里修道院 11
- Florence 佛罗伦萨 202, 255, 261, 287
- Florent, c. Holland 弗洛伦特, 荷兰伯爵 213
- Florent of Hainault, pr. Achaea 埃诺的弗洛伦, 业该业亲王 223
- Foça (Phocaea) 福恰 (福西亚) 259
- Foggia 福贾 181
- Foix, count of 富瓦伯爵 165
- Folkmar 福克马 24, 28-9
- Fonde 市场法庭 86, 参见 *Cour de la Fonde*
- foot soldiers 步兵 18, 27, 39, 144, 150, 157, 195, 272, 280, 288, 290, 293
- foraging 搜刮, 参见 *looting*
- Fourth Crusade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17, 135, 149-60, 163, 167, 176-8, 186, 188, 217: leaders 领导人 152-3, 158, 188; numbers 人数 150-1, 154, 157-9
- Fraga 弗拉加 130
- France 法国 3-5, 7, 10, 12, 16-20, 23-4, 26-9, 31-2, 34-5, 41, 45-6, 48, 54, 75, 83, 90, 97, 99, 101, 112, 114, 117-21, 123, 125-8, 130, 138, 141, 144-6, 152-3, 163-7, 169-72, 174-6, 178-9, 187, 190, 192-3, 201-11, 213-14, 221-2, 231-2, 242-3, 245, 247-9, 253, 255, 257, 260, 262-9, 271-4, 277-82, 284, 287-91, 294-7, 300-5, 307-9: constable of 王室主管 176
- Francesco Ordellaffi of Cesena 切塞纳的弗朗切斯科·奥德拉非 263
- Francis of Assisi, St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xxxiii, 163
- Francis I, k. France 弗朗西斯一世, 法国国王 280-2, 288, 291
- Franciscans 方济各会修士 67, 70, 76, 192, 276: Observants 招募者 277; Spirituals 灵性派 264
- Frankfurt 法兰克福 123, 126
- Fraternitas Sanctae Cruciatiae* 教廷神圣兄弟会, 280
- Frederick I, western e. 腓特烈一世, 西方皇帝 138-41, 146, 148, 165, 302, 307
- Frederick II, western e. 腓特烈二世, 西方皇帝 147, 163, 176, 179-82, 186-7, 189-90, 192, 196-7, 201-3, 215, 221, 230-2, 235-7, 242, 252: crusades against 针对其的十字军 201-2, 206

- Frederick III, western e.** 腓特烈三世, 西方皇帝 279
- Frederick of Aragon, k. Sicily** 阿拉贡的腓特烈, 西西里国王 204, 261
- Frederick I of Hohenzollern, margrave of Brandenburg** 霍亨索伦的腓特烈, 勃兰登堡边疆伯爵 275
- Frederick of Montefeltro** 蒙特费特罗的腓特烈 263
- Frederick, d. Swabia** 腓特烈, 施瓦本公爵 141
- Frisia** 弗里西亚 169, 177
- Fulcher of Chartres, historian** 沙特尔的富歇, 史学家 114
- Fulcher of Chartres, knight** 沙特尔的富歇, 骑士 28
- Fulk V, c. Anjou, k. Jerusalem** 富尔克五世, 安茹伯爵, 耶路撒冷国王 80, 91, 97-9, 107, 120, 135
- Fulk Doon of Châteaurenard** 沙托勒纳尔的富克·唐 14
- Fulk of Neuilly** 讷伊的富尔克 152
- Fulk of Villaret, m. Hospitallers** 维拉雷的富尔克, 医院骑士团团长 254-5: *crusade of its* 十字军行动 255, 265-6
- furta sacra* 圣物偷盗 159
- Fuwa** 福沃 156

## G

- Gabarret, viscount of** 加巴尔雷子爵 116
- Gabes, Gulf of** 加贝斯湾 287
- Galdemar Carpenel, l. Hebron and Jericho** 加尔德马尔·卡佩奈尔, 希伯伦与耶利哥的头主 52, 88
- Galilee** 加利利 69, 76, 88, 101, 106, 110-11, 177, 188, 211, 215, 240; *principality of* 公国 85, 90, 95, 109; *Sea of* 海 82, 88, 108, 110, 177
- Gallipoli (Gelibolu)** 加里波利 (盖利博卢) 140, 221, 269-70
- Garnier, c. Grez** 格雷伯爵加尼耶 52
- Gascony** 加斯科涅 54, 248, 260, 271
- Gaston IV, visc. Béarn** 加斯东四世, 贝阿恩子爵 116
- Gaston Phoebus, visc. Béarn** 加斯东·菲波斯, 贝阿恩子爵 262
- Gattilusio, family** 加蒂卢西奥家族 259
- Gaza** 加沙 68, 106-7, 188, 227: *Battle of* (1239) 战役 (1239年) 188-9; *Battle of* (1244) 战役 (1244年), 另见 Harbiyah
- Gaziantep** 加齐安特普 50
- Gdańsk (Danzig)** 格但斯克 (但泽) 162, 252
- Gelasius II, pope** 基拉西乌斯二世, 教皇 116
- Gelnhausen** 格尔恩豪森 146
- Generalists** 普遍论派 308
- general letters, papal** 教皇通谕 119, 121-2, 124, 131-2, 134-5, 137, 149-50, 166, 170, 173-6, 185, 187, 273, 275-6, 278, 280, 290. 另见 *papacy*
-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199
- Genoa** 热那亚 16, 37, 43, 51, 85, 104, 120, 123-4, 130, 138, 172, 193, 209, 215-16, 224-6, 239, 243, 246-7, 254-5, 259, 262, 268, 271-6, 287, 289-90; *privileges in kingdom. Jerusalem* 在耶路撒冷王国享有的特权 224-6

- Gentili, Alberico 阿贝里克·根特利 298
- Geoffrey of Beaulieu, biographer 比尤利的若弗雷, 传记作家 191, 210
- Geoffrey of Charncy 沙尔内的若弗雷 249
- Geoffrey Chaucer 杰弗里·乔叟 245
- Geoffrey of Donjon, m. Hospitallers 顿戎的若弗雷, 医院骑士团团团长 227
- Geoffrey III, l. Joinville 若弗雷三世, 茹安维尔领主 135
- Geoffrey IV, l. Joinville 若弗雷四世, 茹安维尔领主 135
- Geoffrey V, l. Joinville 若弗雷五世, 茹安维尔领主 135
- Geoffrey of Lusignan 吕西尼昂的若弗雷 143-4
- Geoffrey, b. Nantes 若弗雷, 南特主教 170
- Geoffrey Plantagenet, c. Anjou 若弗雷·普朗塔热内, 安茹伯爵 97
- Geoffrey of Sergines 塞尔吉纳的若弗雷 208
- Geoffrey I of Villehardouin, pr. Achaea 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雷一世, 亚该亚亲王 222
- Geoffrey II of Villehardouin, pr. Achaea 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雷二世, 亚该亚亲王 222
- 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 historian 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雷, 历史学家 149-50, 152
- George Arrabi 乔治·阿拉比 66
- George, nephew of Saliba 乔治, 萨利巴的侄子 66
- Georgians 格鲁吉亚派 73
- Gerald of Villers, Templar grand commander 维莱的热拉尔德, 圣殿骑士团大首领 250
- Gerard Grenier, l. Sidon 热拉尔·格勒尼耶, 西顿领主 99-100, 234
- Gerard of Nazareth 拿撒勒的杰拉尔德 75
- Gerhoh of Reichersberg 赖谢尔斯贝格的格尔霍 130
- Germany 德意志 3, 5-6, 12, 19, 24, 27-30, 45, 81, 88, 112-14, 119-20, 123-31, 138-41, 146-7, 149, 153, 159, 161-3, 167, 169, 172, 174-7, 180-1, 192-3, 196-202, 205-6, 248-9, 254, 262-3, 266, 274-9, 281-2, 285, 287-8, 297, 299, 302, 307-8: war against pagans on eastern frontiers 东部边境上与异教徒的战争 112-13, 另见 Baltic; western empire
- Gerona 赫罗纳 204
- Gesta Francorum* 《法兰克人事迹》118
- Ghibellines 吉伯林党 202, 262-4
- Gibbon, Edward 爱德华·吉本 298
- Gibelin, archbp. Arles, p. Jerusalem, papal legate 吉伯兰, 阿尔勒大主教, 耶路撒冷牧首, 教皇使节 54, 65-6
- Gibraltar 直布罗陀 262: Straits of 海峡 108, 262
- Gil Albornoz, archb. Toledo, cardinal, papal legate, 吉尔·阿伯诺兹, 托莱多大主教, 红衣主教, 教皇使节 263
- Gilduin of Le Puiset, ab. St Mary of the Valley of Jehoshaphat 勒皮伊塞的吉尔迪安, 约沙法谷圣马利亚修道院院长 54, 95, 98
- Gisors 日索尔 138
- Godehilde of Tosny 托斯尼的戈德海尔德 30
- Godfrey of Bouillon, d. Lower Lorraine, ruler of Jerusalem 布永的戈弗雷, 下洛林公爵, 耶路撒冷的统治者 29-30, 32-4, 36-8, 42-4, 50-4, 63-4, 87-8, 94, 96, 107, 233-4, 302, 304
- Godfrey, b. Langres 戈弗雷, 朗格勒主教 121, 125, 127-8
- Göksu, river 格克苏河 140
- Göksun 格克孙 37
- Golden Fleece, Knights of 金羊毛骑士 276
- Gomera 戈梅拉 279

Goslav, b. Plock 戈斯拉夫, 波洛克主教 196  
 Gottfried of Hohenlohe, gm. Teutonic Knights  
 霍恩洛厄的戈特弗雷德 252  
 Gotthard Kettler, m. Livonian Teutonic Knights  
 戈特哈德·凯特勒, 利沃尼亚条顿骑士  
 团团长 285  
 Gottschalk 戈特沙尔克 28-9  
 Gouraud, General Henri 亨利·纪尧将军 303  
 Gozo 戈佐岛 292  
 Granada 格拉纳达 117, 132, 200, 245, 262,  
 265, 278-9; Santa Fe 圣菲 279  
 Grandpré, count of 格朗普雷伯爵 188  
 Grant Secrete 大秘库 87, 92  
 Gratian, canonist 格拉提安, 教法学家 xxix,  
 120, 166  
 Graves orientalis terrae 《加重东方的负担》  
 150  
 Greece 希腊 302, 304, 另见 Byzantine empire;  
 Constantinople; Latin Greece  
 Gregory I, St, pope 圣格列高利一世, 教皇 21  
 Gregory VII, St, pope 圣格列高利七世, 教皇  
 2-3, 6, 9-10, 29  
 Gregory VIII, pope 格列高利八世, 教皇 137,  
 139  
 Gregory IX, pope 格列高利九世, 教皇 72, 171,  
 181, 186-7, 189-90, 197, 199-201, 212, 237  
 Gregory X, pope 格列高利十世, 教皇 187,  
 203, 205, 212-13, 242, 277  
 Gregory XI, pope 格列高利十一世, 教皇  
 263-4, 269, 271-2

Gregory XIII, pope 格列高利十三世, 教皇  
 291  
 Grenier, family 格勒尼耶家族 232  
 Grotius, Hugo 胡果·格劳秀斯 298  
 Grousset, René 勒内·格鲁塞 303, 308  
 Guadix 瓜迪斯 117, 278  
 Guelfs 归尔甫党 205  
 Guibert, ab. Nogent 吉贝尔, 诺让修道院院长  
 13-14, 48, 112  
 Guido, cardinal of San Chrysogono, papal  
 legate 奎多, 圣克里索戈诺红衣主教, 教  
 皇使节 125  
 Guitier of Rethel 勒泰勒的居提耶 98  
 Guy of Basainville, Templar grand commander  
 巴桑维耶的居伊, 圣殿骑士团大团长 227  
 Guy I of Dampierre-sur-l'Aube 奥布河畔的  
 丹皮耶尔的居伊一世 97  
 Guy Embriaco, l. Jubail 居伊·恩布里亚科,  
 朱拜勒领主 241  
 Guy of La Roche, l. Athens 拉罗什的居伊,  
 雅典领主 222  
 Guy of Le Puiset 勒皮伊塞的居伊 97  
 Guy of Lusignan, k. Jerusalem, l. Cyprus 吕  
 西尼昂的居伊, 耶路撒冷国王, 塞浦路  
 斯领主 101, 109-11, 140-6, 216, 226, 230,  
 233, 258  
 Guy of Rochefort 罗什福尔的居伊 45  
 Guy Trousseau 居伊·图索 45  
 Guy, ab. Vaux-de-Cernay 居伊, 沃德塞奈  
 修道院院长 155

## H

Hab 哈卜 105  
 Habsburg, family 哈布斯堡家族 284

al-Hafiz, Fatimid caliph 哈菲兹, 法蒂玛王朝  
 哈里发 96

- Hagenau 海格瑙 153
- Haifa 海法 52-3, 76, 88, 90, 93, 107, 240; lords of 领主 93, 142
- Hakim, Fatimid caliph 哈基姆, 法蒂玛王朝哈里发 10, 12, 56
- Hakon, k. Norway 哈孔, 挪威国王 200
- Halmyros, Battle of 哈米洛斯战役 223, 261
- Hama 哈马 104, 106, 109, 226: lord of 领主 188; Battle of Horns of 哈马角战役 106
- Hammamet 哈马迈特 295
- Harbiyah (La Forbie), Battle of 哈比亚战役 190, 227
- Harim 哈利姆 38, 105, 109
- al-Hariri, Sayyid 'Ali 萨义德·阿里·哈里里 305
- Hartmann, c. Dillingen-Kybourg 哈特曼, 迪林根-基堡伯爵 28
- Hartwig, archb. Bremen 哈特维希, 不来梅大主教 161
- Haternie (Hodierna), daughter of Saliba 哈特涅, 萨利巴的女儿 66
- Hattin, Battle of Horns of 哈丁角之战 110-11, 137, 144, 159, 170, 179, 227
- Hauran 浩兰 110
- Hebron 希伯伦 52, 70, 88, 94: diocese 教区 69
- Helena, St, Roman empress 圣赫莲娜, 罗马皇后 58, 60
- Helias, c. Maine 埃利亚斯, 曼恩伯爵 112
- Helvis of Ibelin, lady of Sidon 伊贝林的埃尔维斯, 西顿女领主 232
- Henry IV, western e., k. Germany 亨利四世, 西方皇帝, 德意志国王 6, 10, 29, 65, 120
- Henry VI, western e. 亨利六世, 西方皇帝 139-40, 146-8, 151, 153, 162, 215-16, 228
- Henry VII, western e. 亨利七世, 西方皇帝 263
- Henry of Flanders, Latin e. Constantinople 佛兰德斯斯的亨利,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 152, 220
- Henry I, k. Cyprus 亨利一世, 塞浦路斯国王 230, 237
- Henry II, k. Cyprus, k. Jerusalem 亨利二世, 塞浦路斯国王, 耶路撒冷国王 216, 243-4, 258
- Henry I, k. England 亨利一世, 英格兰国王 97, 117-18
- Henry II, k. England 亨利二世, 英格兰国王 103, 131-3, 138, 141-3
- Henry III, k. England 亨利三世, 英格兰国王 163, 189, 200, 202, 208-10
- Henry IV, k. England 亨利四世, 英格兰国王 253, 256
- Henry VII, k. England 亨利七世, 英格兰国王 280
- Henry VIII, k. England 亨利八世, 英格兰国王 283
- Henry II, k. France 亨利二世, 法国国王 283
- Henry Arrabi 亨利·阿拉比 66
- Henry, d. Brabant 亨利, 布拉班特公爵 155, 176
- Henry II, c. Bar 亨利二世, 巴尔伯爵 176, 187-8
- Henry of Bar 巴尔的亨利 272
- Henry Beaufort, cardinal, papal legate 亨利·博福, 红衣主教, 教皇使节 274
- Henry, c. Champagne, ruler of Jerusalem 亨利, 香槟伯爵, 耶路撒冷的统治者 146, 216, 226
- Henry Despenser, b. Norwich 亨利·德斯宾塞, 诺维奇主教 271; crusade of 其十字军行动 271
- Henry Grosmont, d. Lancaster 亨利·格罗斯蒙特, 兰开斯特公爵 245, 253

Henry of Jubail 朱拜勒的亨利 258  
 Henry of Marcy, cardinal-b. Albano 马西的亨利, 红衣主教, 阿尔巴诺主教 139, 165  
 Henry, b. Olmütz 亨利, 奥尔米茨主教 125  
 Henry of Segusio 塞古西奥<sup>①</sup>的亨利 183. 参见 Hostiensis  
 Henry the Lion, d. Saxony “狮子”亨利, 萨克森公爵 114, 124, 130, 132  
 Henry, b. Strasbourg 亨利, 斯特拉斯堡主教 139  
 Heretics 异端 xxxi, 30, 68, 120, 164-9, 172, 183, 194, 247-8, 263-4, 274-5, 284, 309: crusades against 针对其的十字军行动 xxxii, 135, 163-9, 175-6, 200-1, 209, 263-4, 274-5, 283. 另见各个异端教派及其教会  
 Hermann of Salza, gm. Teutonic Order 萨尔扎的赫尔曼, 条顿骑士团大团长 196-7, 252  
 Hernando Cortes 埃尔南多·科尔特斯 286  
 Hetoum I, k. Cilician Armenia 海顿一世,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国王 216, 241  
 Hijaz 汉志 110  
 Hildesheim 希尔德海姆 201  
 Hillary, Sir Richard 理查德·希拉里爵士 302  
 Hocquincourt, Chevalier d' 奥康科尔, 骑士 295  
 Holy Land, crusades in aid of 圣地, 为救助其展开的十字军运动. 另见 crusading  
 Holy Leagues 神圣同盟. 另见 leagues  
 holy places in Palestine, building programme 巴勒斯坦各圣地的修建计划 54-61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另见 western empire  
 Holy Sepulchre, Order of 圣墓骑士团 76  
 Hompesch, Ferdinand of, gm. Hospitallers 霍佩什的斐迪南, 医院骑士团大团长 296

Homs 霍姆斯 51, 104, 106, 226  
 Honorius II, pope 洪诺留二世, 教皇 66, 98, 120  
 Honorius III, pope 洪诺留三世, 教皇 76, 162, 168, 171, 176, 180, 201  
 Hormuz(Hormoz) 霍尔木兹 238  
 Horses 马匹 20, 36-7, 39, 44, 72, 128, 140, 144-5, 150, 155, 208  
 Hospitaller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 xxxii, xxxiii, 53, 55-6, 76-81, 85, 103, 107, 110-11, 133, 144, 177, 179, 182, 188, 195-7, 200, 215-16, 227, 237, 240-1, 247, 249-51, 254-8, 260-2, 265-9, 271, 273-4, 283-7  
 Hospitals 医院骑士团 76-8, 289-90, 292-7, 299, 302: fleet 舰队 256, 295; masters 团长 110, 177, 180, 228, 247, 249, 258, 285, 294-5; sovereign powers 主权 295-6. 另见各个团长  
 Hostiensis 奥斯提恩西斯 183  
 Huete 韦特 132  
 Hugh, I. k. Cyprus 于格一世, 塞浦路斯国王 215-16  
 Hugh II, k. Cyprus 于格二世, 塞浦路斯国王 230, 233, 239  
 Hugh III (of Antioch-Lusignan), k. Cyprus, k. Jerusalem 于格三世(安条克-吕西尼昂的), 塞浦路斯国王, 耶路撒冷国王, 216, 231, 233, 241-3  
 Hugh IV, k. Cyprus, k. Jerusalem 于格四世, 塞浦路斯国王, 耶路撒冷国王 258, 267  
 Hugh, c. Brienne 于格, 布里埃纳伯爵 230-1  
 Hugh IV, d. Burgundy 于格四世, 勃艮第公爵 188-9, 209  
 Hugh I, c. Champagne 于格一世, 香槟伯爵 115, 218

① 即苏萨的拉丁文名字。——译注



Hugh of Chaumont-sur-Loire, l. Amboise 卢瓦尔河畔肖蒙的于格, 昂布瓦兹领主 44  
 Hugh of Die, archb. Lyon, papal legate 迪的于格, 里昂大主教, 教皇使节 16, 45  
 Hugh, b. Jeble 于格, 杰卜莱主教 121  
 Hugh of Le Puiset, l. Jaffa 勒皮伊塞的于格, 雅法领主 95-6, 98-9  
 Hugh III of Le Puiset, vsc. Chartres 勒皮伊塞的于格三世, 沙特爾子爵 98  
 Hugh V, l. Lusignan 于格五世, 吕西尼昂领主, 31  
 Hugh VI, l. Lusignan 于格六世, 吕西尼昂领主, 31, 143  
 Hugh VIII, l. Lusignan 于格八世, 吕西尼昂领主, 105  
 Hugh IX, l. Lusignan 于格九世, 吕西尼昂领主, 143  
 Hugh of Pairaud, Templar visitor-general 派劳的于格, 圣殿骑士团总代表 247  
 Hugh of Payns, m. Templars 佩恩的于格, 圣殿骑士团团长 79, 98, 120  
 Hugh, c. St Pol 于格, 圣波勒伯爵 155, 157-9  
 Hugh, c. Vermandois 于格, 韦芒杜瓦伯爵

28-30, 32-5, 40, 45-6, 190  
 Humbert of Beaujeu 博热的安贝尔 168-9, 187  
 Humbert of Romans, Master General of Dominicans 罗芒的安贝尔, 多明我会总会长 xxxi, xxxiii, 184-6, 192, 206  
 Humbert II of Vienne, dauphin of Viennois 维埃纳的安贝尔二世, 维埃纳的多菲 245, 268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298  
 Humphrey, l. Toron 汉弗雷, 托伦领主 110, 142-3  
 Hundred Years War 百年战争 268, 271, 274  
 Hungary 匈牙利 27-8, 30, 126-7, 139, 154, 156, 175-7, 187, 196-7, 199, 201-2, 245, 252, 264, 270-2, 275-7, 279, 282, 286, 288, 292: kings of 国王 125-7, 275; Master of, preacher 匈牙利大师 206 另见匈牙利各国王  
 Hunin 胡宁 240  
 Hussites 胡斯派 274-5, 309: crusades against 针对其的十字军行动 xxxii, 274-5  
 Hyères 耶尔 195

## I

Ibelin, family 伊贝林家族 216, 233, 235-7, 258  
 Iberia, 伊比利亚, 另见 Spain  
 Ibn Hud, paramount Moorish ruler 伊本·胡德, 摩尔人的最高统治者 199  
 Ibn Jubayr 伊本·朱巴依尔 70  
 Ibn Tashfin 伊本·塔西芬 7  
 Ibn Taymiyya 伊本·泰米亚 307  
 Ida of Lorraine, ctess Boulogne 洛林的伊达,

布洛涅公爵夫人, 27  
 Île de France 法兰西岛, 17, 152  
 'Imad ad-Din, biographer 伊马德丁, 传记作家 70  
 Ilmad ad-Din Zengi 伊马德丁·赞吉, 参见 Zengi  
 immunity from taxation 豁免缴税 135, 175, 184  
 Indentures 契约文书, 参见 contracts

India 印度, 225, 303  
 Indian Ocean 印度洋, 246  
 Indulgences 特赦 xxx, xxxii, 9, 12-13, 121-2, 124-5, 133-5, 149-50, 161-3, 165-7, 171-5, 183-5, 187, 197-9, 201, 221, 252, 264, 266, 268, 272, 274, 276-7, 279-80, 283, 286-8, 290-2. 另见 remission of sins  
 Infantry 步兵, 另见 foot soldiers  
 Ingeborg of Denmark, q. France, Innocent II, pope 英诺森二世, 教皇 79, 117, 121, 162  
 Innocent III, pope 英诺森三世, 教皇 74, 147-77, 185, 196, 212, 219, 229, 241, 290  
 Innocent IV, pope 英诺森四世, 教皇 183, 192, 197, 199-202, 206, 237, 252  
 Innocent VI, Pope 英诺森六世, 教皇 251, 263, 268  
 Innocent VIII, pope 英诺森八世, 教皇 279  
 Innocent XI, pope 英诺森十一世, 教皇 xxxiii, 292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 169, 249, 264  
 Intention, Right 正确的意图 xxx, 9, 另见 love; merit  
 Investiture Contest 叙任权之争 3, 6, 8, 10, 53, 63, 113, 201  
 Ioannitsa, ruler of Bulgaria 依奥尼查, 保加利亚统治者 220-1  
 Ionian Islands 伊奥尼亚群岛 217  
 Iráklion(Candia) 伊拉克里翁(干迪亚) 292  
 Iran 伊朗 2, 38, 199, 227, 237-8  
 Iraq 伊拉克 2, 38, 41, 46, 104, 227, 237-8; Selchükid Sultanate in 此地的塞尔柱苏丹国 2, 26, 104, 108  
 Ireland 爱尔兰 201, 288  
 Irene Angelus 伊莲娜·安格卢斯 153  
 Iron Gate(Portile de Fier) 钢铁之门 272  
 Isaac II Angelus, Byzantine e. 艾萨克二世·安

格卢斯, 拜占庭皇帝 139-40, 153, 155, 157-9, 220  
 Isaac Comnenus, ruler of Cyprus 艾萨克·科穆宁, 塞浦路斯统治者 142  
 Isabel of Villehardouin, princess of Achaea 维尔阿杜安的伊莎贝尔, 亚该亚公主 222-3  
 Isabella, q. Castile and Aragon 伊莎贝拉, 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女王 278-9  
 Isabella I, q. Jerusalem 伊莎贝拉一世, 耶路撒冷女王 100-1, 109-10, 142-4, 146, 153, 215-16, 230, 232, 241  
 Isabella II, q. Jerusalem 伊莎贝拉二世, 耶路撒冷女王. 参见 Yolande, q. Jerusalem  
 Isabella, lady of Beirut 伊莎贝拉, 贝鲁特女领主 241-2  
 Isabella of Cilicia 西里西亚的伊莎贝拉 216  
 Isabella of France, St 法国的圣伊莎贝拉 190  
 Isabellona, niece of Saliba 伊莎贝隆娜, 萨利巴的侄女 66  
 Iskanderuna 伊斯肯德伦那 231  
 Iskenderun(Alexandretta) 伊斯肯德伦(亚历山德雷塔) 36, 39, 107  
 Islam 伊斯兰教 xxxi, xxxii, 1-2, 6-8, 12-13, 24, 26, 41, 55, 61-2, 70-1, 76-8, 80, 83-9, 96, 102-11, 129, 135, 151, 163, 166, 175, 183-5, 189, 191, 203-4, 208, 225-8, 237-8, 240-1, 247, 258, 270, 284, 288, 291, 299-300, 302-9. 另见 Shi'ites; Sunnis  
 Islamism 伊斯兰教教义 306-8  
 Israel 以色列 304, 306  
 Italy 意大利 xxxi, xxxii, 1, 3-4, 6, 8, 20, 27, 30, 32, 45, 53, 64-5, 67, 74-5, 83, 103, 114, 119, 123, 127, 130, 139, 147, 150, 153, 162-4, 174-6, 178, 180-1, 187, 192-3, 201-7, 211, 213, 221, 223-6, 238, 241-3, 246-7, 249, 259, 261-6, 271, 278-82, 286-9, 293, 296,

300, 另见 Genoa; Pisa; Venice; 'Political'  
Crusades

Ivo, St, b. Chartres 圣伊沃, 沙特尔主教 9,  
113-14

Jacob ben Nathaniel, traveler 雅各·本·纳撒  
尼尔, 旅行家 71-2

Jacobites 雅各派 50, 61, 67-9, 73-4: patriarch  
牧首 67

Jadwiga, q. Poland 雅德薇嘉, 波兰女王 253

Jaén 哈恩 132

Jaffa 雅法 43, 52, 64, 66-7, 94, 96, 113, 144-6,  
181, 188-9, 195, 215, 240: county of 伯爵领  
地 94-5, 144, 233, 237, 241

Jagiello, grand d. Lithuania 亚盖洛, 立陶宛  
大公, 参见 Vladislav II

James I, k. Aragon 詹姆斯一世, 阿拉贡国  
王 171, 199, 209

James II, k. Aragon 詹姆斯二世, 阿拉贡国  
王 204, 265

James I, k. Cyprus 詹姆斯一世, 塞浦路斯  
国王 258-9

James II, k. Cyprus 詹姆斯二世, 塞浦路斯  
国王 258

James I, k. Majorca 詹姆斯一世, 马约卡国  
王 260

James IV, k. Scotland 詹姆斯四世, 苏格兰国  
王 280

James of Ibelin, c. Jaffa 伊贝林的詹姆斯, 雅  
法伯爵 216-17, 233

James of Molay, gm. Templars 莫莱的詹姆斯,  
圣殿骑士团大团长 247, 249, 251

James Sandilands 詹姆斯·桑迪兰兹 285

Izmit (Nicomedia) 伊兹米特 (尼科米底亚)  
45-6, 221, 270

Iznik Golu (Lake Ascanius) 伊兹尼克湖 (阿  
斯卡纽斯湖) 35

## J

James Vidal 詹姆斯·韦达尔 231

James of Vitry, preacher, b. Acre 维特里的雅  
各, 布道者, 阿卡主教 xxix, 69, 74, 171

Jamma'il 贾迈勒 70

Jan Žižka 扬·杰士卡 274

Janus, k. Cyprus 雅努斯, 塞浦路斯国王 258-9

Jazira 半岛 107, 226

Jebble 杰卜莱 73, 215

Jem, Ottoman prince 杰姆, 奥斯曼王子 257,  
279-80

Jerba 杰尔巴岛 272, 287

Jerez 赫雷斯 199

Jericho 耶利哥 52, 88

Jerusalem, city 耶路撒冷城 xxxi, 6-8, 10-12,  
14-15, 17, 19, 21, 24, 26, 41-3, 45-6, 48,  
51-5, 61-4, 67, 70-1, 73, 76, 79, 88, 94-8,  
104-5, 107-11, 113-21, 126-7, 129, 131-2,  
136, 144-7, 151, 161, 165, 169, 172, 179,  
181-2, 188-9, 191, 197, 211-12, 215, 227,  
235, 237, 246, 268-9, 276, 303, 306, 308-9:  
el Aqsa mosque 阿克萨清真寺 70-1, 79;  
Armenian archbishops 亚美尼亚大主教  
68; Cenacle 最后晚餐的餐室 54, 57, 61;  
Herod's Gate 希律门 43; Gethsemane 客西  
马尼园 54; Greek (Orthodox) patriarchate 希  
腊 (东正教) 牧首区 7, 53, 56, 64, 68, 73,  
131; Holy Sepulchre (church, Calvary and  
Tomb) 圣墓 (教堂、骑士和陵墓) 2, 8,

10-13, 37, 41, 47, 53-61, 64, 67-70, 75, 98, 109, 114, 117-18, 182, 184, 213, 215, 232, 290; Hospital of St John 圣约翰医院 53, 55-6, 77-8, 111; Jacobite archbishops 雅各派大主教 67-8; Latin (Catholic) patriarchate 拉丁(天主教)牧首区 50, 61-2, 64, 66, 68-9, 75, 90, 96-8, 101, 107, 109, 143, 178, 180, 182, 209, 231; Latin patriarchal lordship 拉丁牧首区领主 64; liturgy 在此地的圣仪 55-61, loss of (1187) 失守(1187年) 111, 137, 232; loss of (1244) 失守(1244年) 189-90; miracle of holy fire 圣火奇迹 55-6, 68; Mt of Olives (and church of Ascension) 橄榄山(以及升天教堂) 43, 53; Mt Zion 锡安山 43, 57, 70; priory of Mt Zion (and church of Dormition) 锡安山修道院(与圣母安眠堂) 53, 57, 69-70; St Anne's 圣安妮教堂 54, 57; St Lazarus (leper hospital) 圣拉撒路(麻风病医院) 80; St Mary of the Latins 拉丁人的圣母马利亚 53, 69, 76; St Mary Major 主要的圣母马利亚祭祀圣地 53, 69, 76; St Mary of the Valley of Jehoshaphat 约沙法谷的圣母马利亚修道院 53-5, 68-70, 95; siege and liberation of (1099) 被围攻并获得解放(1099年) 4, 10, 14-15, 17-18, 26, 42-4, 47, 58, 112, 114-15, 120; Templar convent 圣殿骑士团修道院 70-1; Temple (and Dome of the Rock) 圣殿(与穹顶圣石) 43, 53-4, 56, 70, 79, 90, 111, 181-2, 227; 'Temple workshop' "圣殿工坊" 60; Tower of David 大卫塔 52, 188, 227; Viscount of 子爵 231-2; Western Wall 西墙 70, 另见历任牧首(拉丁及东正教的), 以及 holy places; Latin Palestine and Syria

Jerusalem, kingdom 耶路撒冷王国 xxvi, 36,

44, 47, 50-3, 63-6, 73, 75, 81, 84, 88-107, 109-11, 114, 121, 129, 132, 142, 150, 155-6, 171, 178-81, 189, 195, 203, 207, 212-13, 216-18, 221, 224-7, 229-37, 241-2, 244, 247, 258, 303, 306; apauages 属地 94, 144; baronial movement 领主运动 182, 189, 230-7, 242; Chancery 大法官法庭 98; coinage 铸币 93; High Court 高等法庭 91-2, 94, 100, 143, 231, 234-5, 241-2; jurists 法学家 88, 93, 231-7; political theory 政治理论 233-5; kings, powers of 国王的权力 91-4, 96, 98-100, 242; lawbooks 律法典籍 89, 233, 235; laws 法律 89-91, 230-2, 234, 236, 241-2; lieutenantancy 代理制 101, 111, 230, 236; parlements 议事会 92, 95; pleaders 抗辩者 231-3; regency 摄政 100-1, 109, 111, 180, 189, 221, 230, 235-7, 239, 242; royal domain 王室领地 92, 94, 100, 235-7, 242; seneschal 外务总管 92, 242; shared churches 共享的教堂 71; shipwreck 沉船 93; viscounts 子爵 85, 87; wardship 监护制 89, 另见历任国王, 以及 Latin Palestine, Syria

Jews 犹太人 25, 61-2, 70-4, 77, 83-4, 194, 305-6; persecution of in Europe 在欧洲受迫害 10, 19, 23-5, 28, 47, 123, 139; Samaritans 撒马利人 61, 70, 74

Jezreel, Valley 耶斯列谷 114

jihad 吉哈德 25, 104-6, 179, 227, 306-7

jihadist-salafists 吉哈德派—萨拉菲派 307

Jisr Banat Ya'qub 吉瑟巴纳雅库布 106, 177

Jisr esh Shughur 吉斯尔舒古尔 102

jiziya 吉子亚 72-3, 83

Joan of England, q. Sicily 英格兰的琼, 西西里王后 142, 145

Joan, cress Toulouse 琼, 图卢兹公爵夫人 169

- Joanna, q. Naples 乔安娜, 那不勒斯王后 260
- Johanniterorden 圣约翰骑士团 xxxiii, 285
- John XXII, pope 约翰二十二世, 教皇 251, 263-4, 266-7
- John XXIII, anti-pope 约翰二十三世, 敌教皇 274
- John II Comnenus, Byzantine e. 约翰二世·科穆宁, 拜占庭皇帝 119-20
- John III Ducas Vatatzes, Nicaean e. 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策, 尼西亚皇帝 220-1
- John V Palaeologus, Byzantine e. 约翰五世·帕里奥洛格斯, 拜占庭皇帝 264, 269
- John of Brienne, k. Jerusalem, Latin e. Constantinople 布里埃纳的约翰, 耶路撒冷国王,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 177-80, 201, 221, 230, 235-6
- John, k. Bohemia 约翰, 波西米亚国王 253, 262-3
- John I, k. Cyprus, k. Jerusalem 约翰一世, 塞浦路斯国王, 耶路撒冷国王 243
- John II, k. Cyprus 约翰二世, 塞浦路斯国王 258
- John, k. England 约翰, 英格兰国王 163-4, 166, 176
- John II, k. France 约翰二世, 法国国王 269
- John IV, Orthodox p. Antioch 约翰四世, 安条克的东正教牧首 62-3
- John of Antioch, l. Jubail 安条克的约翰, 朱拜勒领主 243
- John Arrabi 约翰·阿拉比 66
- John Asen, k. Bulgaria 约翰·艾森, 保加利亚国王 201, 221
- John of Austria 奥地利的约翰 287, 289-90
- John, d. Bedford 约翰, 贝德福德公爵 274
- John Boucicaut, marshal of France 约翰·布西考, 兵马总管 245, 247, 253, 273-4
- John of Capistrano, St 卡皮斯特拉诺的圣乔瓦尼 xxxiii, 276-7
- John Embriaco 约翰·恩布里亚科 241
- John of Gaunt, d. Lancaster 岗特的约翰, 兰开斯特公爵 271
- John of Gaurelle 高雷勒的约翰 258
- John of Grailly 格雷利的约翰 213
- John of Gravina, pr. Achaea 格拉维纳的约翰, 亚该亚大公 260
- John Hunyadi, ruler of Transylvania 扬·匈雅提, 特兰西瓦尼亚统治者 275-6
- John Hus 扬·胡斯 274
- John of Ibelin, l. Arsuf 伊贝林的约翰, 阿尔苏夫领主 188, 233, 239
- John I of Ibelin, the 'Old Lord' of Beirut 伊贝林的约翰一世, 贝鲁特的“老领主” 232-3, 235-6
- John II of Ibelin, l. Beirut 伊贝林的约翰二世, 贝鲁特领主 241
- John of Ibelin, c. Jaffa 伊贝林的约翰, 雅法伯爵 216, 233-4, 237, 239, 241: lawbook 法典 216, 233-4
- John, l. Joinville, biographer 约翰, 茹安维尔领主, 传记作家 135, 192-3, 209, 211
- John of Mantua 曼图亚的约翰 9
- John of Montfort, l. Tyre 蒙福特的约翰, 泰尔领主 233, 242
- John of Nevers, d. Burgundy 讷维尔的约翰, 勃艮第公爵 272-3
- John Tristan, c. Nevers 约翰·特里斯坦, 讷维尔伯爵 210
- Joigny, count of 茹瓦尼伯爵 188
- Jordan, river 约旦河 82, 102, 110, 177
- Joscelin I of Courtenay, c. Edessa 库特奈的若斯兰一世, 埃德萨伯爵 95, 107
- Joscelin II of Courtenay, c. Edessa 库特奈的

若斯兰二世, 埃德萨伯爵 100, 104  
**Joscelin III of Courtenay, titular c. Edessa** 库特奈的若斯兰三世, 名义上的埃德萨伯爵 101  
**Joscius, archb. Tyre** 乔西乌斯, 泰尔大主教 138  
**Juan Fernandez of Heredia, m. Hospitallers** 埃雷迪亚的胡安·费尔南德斯, 医院骑士

团团团长 260  
**Jubail** 朱拜勒 51, 224-5, 241, 243-4: diocese 教区 66  
**Judaean hills** 犹大山 107, 147  
**Julian Grenier, l. Sidon** 尤里安·格勒尼耶, 西顿领主 239  
**Julius II, pope** 尤里乌斯二世, 教皇 280  
**Julius III, pope** 尤里乌斯三世, 教皇 283

## K

**Kadiköy** 卡德柯伊 156  
**Kafartab** 卡法塔 42  
**Kafir Sabt** 卡费-萨布特 110  
**Kai-Khusrau, s. Rum** 凯-霍斯鲁, 罗姆苏丹 229  
**Kai Qobad, s. Rum** 凯阔巴, 罗姆苏丹 229  
**Kalavun, s. Egypt** 卡拉万, 埃及苏丹 241, 243  
**Kalocsa, archbishop of** 考洛乔大主教 177  
**al-Kamil, s. Egypt** 卡米尔, 埃及苏丹 178-9, 181, 186, 215, 226  
**Karak** 卡拉拉克 106, 179  
**Karaman** 卡拉曼 140  
**Kar Kannah** 卡尔卡纳 70  
**Katherine, daughter of Saliba** 凯瑟琳, 萨利巴的女儿 66  
**Katib** 卡提布(吏官) 86  
**Kayseri** 开塞利 37  
**Kefer Lata** 凯费尔-拉塔 105  
**Kefken** 凯弗肯 222  
**Kerbogha, governor of Mosul** 科伯嘉, 摩苏尔总督 38-9  
**Khair ad-Din Barbarossa** 凯尔丁·巴巴罗萨 286-7, 289  
**Kharaj** 卡拉吉土地税 72, 83

**Khirokitia, Battle of** 基洛基提亚战役 259  
**Khorezmians** 花刺子模人 190, 227  
**Khorasan** 呼罗珊 1-2  
**Kibotos** 基伯托斯 27  
**Kilij Arslan, s. Rum** 乞力奇·阿尔斯兰, 罗姆苏丹, 35  
**Killini (Glarentsa)** 基里尼(格拉伦萨) 260  
**Kin, Chinese dynasty** 金, 中国的王朝 199  
**Kipchaks** 奇普恰克, 参见 **Turks**  
**knights** 骑士, 参见 **armsbearers**  
**Königsberg (Kaliningrad)**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 198, 253, 256  
**Konya** 科尼亚 36, 46, 127-8, 139-40  
**Korea** 朝鲜 199  
**Korgos** 科尔戈斯, 参见 **Corycus**  
**Koróni** 科隆尼 218, 270, 280, 286, 293  
**Kös Dağı, Battle of** 克塞山战役 237  
**Kosovo, Battles of** 科索沃战役 270  
**Ksar el-Kebir (Alcácer-Quivir), Battle of,** 凯比尔堡 288  
**Kulmerland (Chelmno)** 库尔梅兰(海乌姆诺) 197-8, 254  
**Kuriate** 占利亚特岛 272  
**Kutaiyat, vizir of Egypt** 库塔伊法特, 埃及维

齐尔 96-7, 99

Kutuz, s. Egypt 古突兹, 埃及苏丹 238, 241

Kyrenia 凯伦尼亚 237

## L

Ladislav, k. Hungary 拉迪斯拉斯, 匈牙利国王 275-6

Ladislav, k. Naples 拉迪斯拉斯, 那不勒斯国王 260, 274

La Goulette, 拉格雷特要塞 286-8

Laity 俗世中人 5-6, 11, 13-16, 21, 45, 47-8, 69, 75, 79-80, 112, 135-6, 148, 150, 161, 187, 197, 252, 256, 295

La Marche, counts of 拉马什伯爵 143, 176, 272

Lambert, b. Arras 朗贝尔, 阿拉斯主教 17

La Noue, Francis of 朗乌埃的弗朗索瓦 283

Languedoc 朗格多克 xxxi, 11, 163-9, 171-2, 176, 187-8, 205, 224

Laparelli, Francesco 弗朗切斯科·拉帕雷利 293

Lâpseki 拉普塞基 268

Larnaca 拉纳卡 259

Las Navas de Tolosa, Battle of 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 168, 170-1, 190, 262

Latakia 拉塔基亚 38, 42, 50-1, 53, 64, 240, 243

Lateran Councils: 拉特兰大会议 First 第一次 116, 119; Third 第三次 165; Fourth 第四次 xxxiii, 168, 172-3, 175; Fifth 第五次 281

Latin Cyprus 拉丁塞浦路斯, 参见 Cyprus

Latin Empire 拉丁帝国, 参见 Constantinople

Latin Greece 拉丁希腊 74, 194, 203, 205-8, 217-24, 256, 259-61, 265-6, 270, 274, 276, 280, 284, 289, 292: feudal system 封建体系 218; feudatories 封建领地 218-19; liege

vassals 臣属封臣 218-19; Greek Church 希腊教会 74, 219; sergeants 军士 218-19; simple vassals 纯封臣 218-19

Latin Palestine and Syria 拉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25-6, 50, 52-3, 57, 63, 69, 73, 76, 79-81, 91, 96-7, 99, 114, 118-19, 125, 147, 151, 154-5, 177, 187-8, 191, 194-6, 203-6, 209, 212-17, 218-19, 224-6, 233, 237-44, 249, 303, 305: administration 行政管理 85-90, 92;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管理边界 85; agriculture 农业 82-4, 86; allods 绝对所有的土地 87-8; art and architecture 艺术与建筑 54-61, 68, 99, 232; burgesses 市民 83-5, 87, 100, 111, 232, 236; burgess jurors 市民市场官 87; castles 城堡, 参见 fortifications; courts 法庭 72-5, 83-4, 87, 89, 91-3, 99-100, 224-5, 231; defence 防御 xxxii, 80-1, 101-11, 132, 203, 207-9, 213, 228, 234; demesne lands 封地 84; education 教育 75-6; election of Latin bishops 选举拉丁主教 75, 94; family ties with Europe 与欧洲的家庭纽带 96-8, 127; feudal incidents 封建冲突 89, 90; feudal law 封建律法 89, 93; feudal relationships 封建关系 88, 92, 100, 111, 234, 241; feudal services 封建服务 89, 93, 226; feudatories 封臣 87-90, 94, 103, 110, 141, 145, 235, 239, 242; fiefs 各块封地 52, 86, 88, 92-4, 100, 141, 224, 231, 234-6; fortifications 要塞 102, 109, 111; general taxes 普遍税种 92; geography 地

理状况 82; Greek (Orthodox) Church 希腊(东正教)教会 53, 56, 61-4, 68, 71, 73, 74; hermits 隐士 76; indigenous 当地的 66-75, 82-5, 87; indigenous villages 当地村庄 82-3, 86; inheritance laws 继承法 89-90, 230, 241-2; labour services 劳役 83, 89; Latin bishops 拉丁主教 52-4, 62-3, 65, 67-70, 75; Latin (Catholic) Church 拉丁(天主教)教会 52-81, 94, 103; Latin parishes 拉丁教区 67, 83; lordships 领主权 70, 80, 88-9, 91, 93, 99, 240; manor houses 庄园 84; marches and marcher lordships 边境与边境领主 80, 88-9, 91, 96, 100, 110, 241; military service 军事服役 89, 90, 93-4, 99, 102-3, 235-6; money fiefs 货币封地 87-90, 92-4, 226; monks 僧侣 67; non-Catholics, legal inferiority of 非天主教徒。在法律上的劣等地位 66-7, 72-5; poll tax 人头税 72-3, 83; proprietary churches 私属教堂 75; popular religion 民间宗教 70-2; rabbinical tribunals 拉比裁判所 73-4; revenues 利润 70, 82-3, 86-7, 89, 94, 144, 225-6, 232, 235; serfs 农奴 82-4; sergeancies 军士 86; service abroad 海外服役 91, 96, 99, 103; service of sergeants 兵团服役 103; settlers 定居者 18-20, 53-4, 58-9, 61-2, 83-4, 130, 137, 149, 206-7, 215-16, 227-8, 237, 241, 243; tithes 什一税 73, 75; titular Latin bishops in *partibus infidelium* 在不信者占领土地上的名义拉丁主教 69-70; toleration 宽容 70-5; towns 城镇 84-5, 103, 232; translation of Latin bishops 拉丁主教们的翻译工作 75; western colonial villages 西方人的殖民村庄 83-4, 87, 89; western population and manpower 西方来的人口和人力资源

情况 66, 84, 88, 90, 102-3, 另见 Antioch, Edessa, Jerusalem, Tripoli  
 Latrun 拉特伦 145  
 La Valette, John of, gm. Hospitallers 拉瓦雷特的约翰。医院骑士团大团长 293  
 Lavedan, Viscount of 拉维丹子爵 116  
 leagues, crusading 十字军同盟 xxxii, 245, 256, 267-8, 271, 274-5, 278, 282, 287-92, 297  
 Lebanon 黎巴嫩 67, 114, 302-3, 306  
 Legnica (Liegnitz), Battle of 莱格尼察战役 199  
 Leicester 莱赛斯特伯爵领地 167  
 Lekno, abbey 莱科诺修道院 196  
 Le Mans 勒芒 3-4, 54  
 Leo IX, St, pope 利奥九世, 教皇 9  
 Leo X, pope 利奥十世, 教皇 280-1  
 Leo II, k. Cilician Armenia 利奥二世,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国王 215-16, 228-9  
 Leon 里昂 133, 170  
 Leonard, nephew of Saliba 莱昂纳德, 萨利巴的侄子 66  
 Leonardinus, nephew of Saliba 莱昂纳迪努斯, 萨利巴的侄子 66  
 Leopold V, d. Austria 利奥波德五世, 奥地利公爵 146  
 Leopold VI, d. Austria 利奥波德六世, 奥地利公爵 163, 177-8  
 Lepanto (Navpaktos) 勒班陀(纳夫帕克托斯) 270, 280: Battle of 战役 287, 290, 295  
 lepers 麻风病人 77, 80-1, 101  
 Le Puiset, family 勒皮伊塞家族 17  
 Le Puy 勒皮 3-4, 101  
 Lérida 莱里达 130  
 Lérins, abbey 莱林斯修道院 14  
 Lesbos 莱斯博斯 259, 270, 273, 286  
 levee en masse 全民征召令 94, 103



- Levkas 莱夫卡斯岛 292
- Liberation: Christian movement 解放: 基督教运动 308; wars of 相关战争 2, 4-8, 12, 117
- Liège 列日 29
- Lille 里尔 276
- Limassol 利马索尔 254, 259
- Limnos(Lemnos) 利姆诺斯岛 276-7, 292
- Limoges 利摩日 3, 45
- Limousin 利穆赞 17, 115
- Lisbon 里斯本 124, 130
- Litani, river 利塔尼河 82, 102
- Lithuania 立陶宛 198, 251-4, 257, 309
- Livonia (approx. Latvia) 利沃尼亚 (大致相当于拉脱维亚) xxx, xxxii, 161-2, 167, 173, 196, 198, 245, 250, 252, 254, 285: crusade in 此地的十字军行动 xxxii, 161-2, 196
- Livorno 利沃诺 284
- Livs 利夫人 161
- loans 贷款, 参见 subsidies
- Lombardy 伦巴第 45-6, 169, 172, 247, 263
- London 伦敦 208: Treaty of 伦敦条约 281
- Longnon, Jean 让·隆依 303
- looting 洗劫 19, 24, 27-8, 31, 38, 40, 140, 154-5, 158-9, 179, 253, 293
- Lorraine 洛林 16-17, 28-9, 35, 43, 53, 127, 193: dukes of 公爵 29, 253. 另见各个公爵
- Louis IV of Bavaria, western e. 巴伐利亚的路易四世, 西方皇帝 263-4
- Louis VII, k. France 路易七世, 法国国王 121-9, 130-1, 133, 141, 148, 190, 192
- Louis VIII, k. France 路易八世, 法国国王 163, 168-9, 176, 190
- Louis IX, St. k. France 圣路易九世, 法国国王 135, 169, 190-5, 202, 206-12, 239, 286, 296, 301, 307: first crusade 第一次十字军运动 135, 151, 154, 189-95, 200, 205-6, 237, 296; second crusade 第二次十字军运动 205, 207-12, 239, 286, 301
- Louis XII, k. France 路易十二世, 法国国王 280
- Louis Philippe, k. France 路易·菲利普, 法国国王 301
- Louis II, k. Hungary 路易二世, 匈牙利国王 282
- Louis, c. Blois 路易·布卢瓦伯爵 152, 158
- Louis of Burgundy 勃艮第的路易 260
- Louis I of Clermont, d. Bourbon 克莱芒的路易一世, 波旁公爵 266-7
- Louis II of Clermont, d. Bourbon 克莱芒的路易二世, 波旁公爵 245, 247, 272, 287
- love, Christian 基督徒之爱 xxxi, 48, 251; crusading as 十字军运动作为其表现 xxxi, 16, 25, 47, 112, 173
-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130, 141, 171, 177, 201, 205, 253, 272, 288. 另见 Frisia; Netherlands
- Lübeck 吕贝克 161-2: bishop of 主教 201
- Lucera 卢塞拉 203
- Lucienne of Segni, princess of Antioch 瑟尼的卢西安纳, 安条克公主 241
- Lucius III, pope 卢西乌斯三世, 教皇 165
- Lucy, ctes Tripoli 露西, 的黎波里伯爵夫人 243
- Lusignan, family 吕西尼昂家族 143, 243, 258
-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282-3
- Lydda (Lod) 卢德 68: diocese 教区 51, 69
- Lyon 里昂. 52, 185, 187, 192, 202, 211: First Council of 第一次大公会议 192-3, 199, 202; Second Council of 第二次大公会议 xxxiii, 212-13, 250

## M

- Ma'arret en Nu'man 迈阿赖努阿曼 41-2, 44, 50, 104
- Macedonia 马其顿 218, 223, 270
- Macon, bishop of 马孔, 主教 187: count of 伯爵 188
- Madrid, Treaty of《马德里条约》282-3, 291
- Mağaracik (Suwaidiyah/Port St Simeon) 马贾拉克西克 (苏威迪亚/圣西门港), 37
- Magdeburg 马格德堡 112, 130: customs of 关税 197
- Magnus, k. Sweden and Norway 马格努斯, 瑞典与挪威国王 251
- Mahaut of Hainault, princess of Achaea 埃诺的马奥特, 亚该亚公主 223, 260
- Mahdia 马赫迪亚 10, 271: crusades to 以此地为目标的十字军行动 245, 271-2, 287
- Mahon 马洪 286
- Mainz 美因茨 24, 28: archbishops of 大主教 147
- Majorca 马约卡 199
- Malaga 马拉加 117, 132, 278
- Malagón 马拉贡 170
- Malatya 马拉提亚 35, 53
- Malikshah, Selchük s. 马利克沙, 塞尔柱苏丹 26
- Malta 马耳他 xxvi, xxxii, 103, 257-8, 283-5, 287, 292-8: Great Siege 大围攻 283-4, 293;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主权骑士团, 另见 Hospitaller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 Mamluks 马穆鲁克人 209-11, 237-8, 240-1, 243-4, 256, 258-9, 265: Bahriyah 巴里亚卫队 237
- Manasses of Hierges 耶尔日的马纳塞 99
- Mandates, British and French 英国和法国的托管治理 303
- Manfred, k. Sicily 曼弗雷德, 西西里国王 202-3: crusades against 针对其的十字军行动 202-3
- Manfred, d. Athens 曼弗雷德, 雅典公爵 261
- Manfredi, family 曼弗雷迪家族 263
- Mani 玛尼 222
- Manolada, Battle of 马诺拉达战役 260
- el Mansura 曼苏拉 179-80, 194-5
- Mantua 曼图亚 263, 282: crusade congress of 十字军大会 277
- Manuel I Comnenus, Byzantine e. 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 拜占庭皇帝 68, 125-8
- Manuel, k. Portugal 曼努埃尔, 葡萄牙国王 280
- Manzikert, Battle of 曼奇科尔特战役 2
- Maraqiyah (Maraclea) 马拉奇亚 243
- Maraş (Kahramanmaraş) 马拉什 37, 50
- Marco Sanudo, d. Archipelago 马可·萨努多, 半岛公爵 218
- Margaret of Cyprus, q. Cilician Armenia 塞浦路斯的玛格丽特,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女王 216
- Margaret of Cyprus, lady of Tyre 塞浦路斯的玛格丽特, 泰尔的女领主 233, 241
- Margaret of Hungary, Byzantine empress 匈牙利的玛格丽特, 拜占庭皇后 159
- Margaret of Provence, q. France 普罗旺斯的玛格丽特, 法国王后 195
- Maria Arrabi 玛丽亚·阿拉比 66
- Maria Comnena, q. Jerusalem 玛丽亚·科内玛, 耶路撒冷女王 100-1, 110, 142, 232-3
- Maria of Antioch 安条克的玛丽亚 203, 231, 241-2

- Maria of Montferrat, q. Jerusalem 蒙费拉的玛丽亚, 耶路撒冷女王 215-16, 221, 230
- Marienburg (Malbork) 马林堡 (马尔堡) 251-4, 256: Table of Honour 荣誉之桌 253
- Marinids 马林王朝 200, 262
- Maritsa, Battle of 玛丽特萨战役 270
- Marjayoun 迈尔季欧云 106
- Markward of Anweiler 安维勒的马夸德 162-3: crusade against 针对其的十字军行动 162-3
- Marmara, Sea of 马尔马拉海 217, 220, 270
- Maronites 马龙派 61, 66-7, 85, 302
- Marqab 马卡布 80, 111, 182, 215, 229, 240, 243
- Marrakech 马拉喀什 7
- Marseille 马赛 115, 142, 172, 188, 193, 209
- Martin IV, pope 马丁四世, 教皇 203-4
- Martin V, pope 马丁五世, 教皇 274
- Martin, ab. Pairis 马丁, 巴黎主教 185-6
- martyrdom 殉道 9, 48, 79, 112
- Mary I, q. England 玛丽一世, 英格兰女王 285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304, 307-8
- Mastic 乳香 259
- Ma'sud 马苏德 104
- Mathilda of Boulogne 布洛涅的玛蒂尔达 97
- Mathilda of Bourcq 布尔克的玛蒂尔达 98
- Mathilda of England 英格兰的玛蒂尔达 97
- Mathilda, ctess Tuscany 玛蒂尔达, 托斯卡纳伯爵夫人 8-10, 29
- Matthew Visconti of Milan 米兰的马修·维斯康蒂 263
- Maurice of Porto, papal legate 波尔托的莫里斯, 教皇使节 64-5
- Maximilian, western e. 马克西米连, 西方皇帝 279-80
- Mecca 麦加 110
- Médéa 麦迪亚 286
- Medina 麦地那 227
- Mediterranean Sea, geography of 地中海, 地理特征 108
- Mehmed II, Ottoman s. 麦哈麦德二世, 奥斯曼苏丹 270, 278
- Meiron 梅隆 70
- Melilla 梅里亚 279
- Melisende, q. Jerusalem 梅丽桑德, 耶路撒冷女王 55, 58, 61, 97-9, 120
- Melisende of Lusignan, princess of Antioch 吕西尼昂的梅丽桑德, 安条克大公夫人 231
- Memel (Klaipéda) 梅梅尔 (克莱佩达) 198
- Mendicant friars 托钵僧 185, 另见 Carmelites; Dominicans; Franciscans
- Menteshe (Muğla) 门特瑟 (穆拉) 256, 265, 267-9
- Mequinenza 梅基嫩萨 130
- Merano, duke of 美拉诺公爵 177
- Mercenaries 雇佣兵 20, 80-1, 93-4, 103, 146-7, 149, 151, 153-4, 160, 176, 186, 195, 207-9, 223, 227, 246, 254, 260-1, 263, 270, 290-1, 另见 routiers
- Merit 荣誉 9, 115-16, 149, 172, 另见 love; Intention
- Mergentheim 梅尔根海姆 285
- Mers el-Kebir 凯比尔港 279
- Merzifon 梅尔济丰 46
- Messina 墨西拿 65, 142, 147, 290
- Messines 梅森 54
- Methóni 迈索尼 218, 270, 280, 290, 292
- Metz 梅斯 24, 127, 193
- Mexico 墨西哥 286
- Mezenc 梅津克 20-1
- Michael VIII, Palaeologus, Byzantine e. 米海尔八世·帕雷奥洛古斯, 拜占庭皇帝 222,

239

Michaud, Joseph François 约瑟夫·弗朗索瓦·米肖 299, 301-3, 305, 308-9

Milan 米兰 16, 45, 263, 274, 280;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45

Miles of Bray 布赖的米莱斯 14, 45

Miliana 米利亚纳 286

military orders 骑士团 xxxii, xxxiii, 69-70, 76-81, 93, 103, 110, 133, 136, 147, 161, 169, 177, 179-80, 182, 188, 196-9, 227-9, 247, 250-8, 284-5, 292-7, 302: sovereign powers of 自治权 197, 252; union of 联合 246-7, 250-1. 另见各个骑士团和各个骑士团国家

*milites ad terminum* 短期军事力量 103

Millenarianism 千禧年主义, 参见 eschatology

Minden 明登 201: bishop of 主教 201

Mindoug, pr. Lithuania 明都, 立陶宛大公 251-2

Minorca 米诺卡 124, 286

Misis 米西西 36, 51, 63: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62

missionary wars 传教战争, 参见 conversions by force missions 67, 132, 161-2, 165, 183, 196-8, 250, 285

Mistra (Mistrés) 密斯特拉 222, 260-1, 273

Mitilini 米蒂利尼岛 276

Mohács, Battle of 莫哈奇战役 282, 284

Moissac, abbey 穆瓦萨克修道院 11

Monemvasia 莫奈姆瓦夏 222, 284, 289

Mongols 蒙古人 192, 199, 208-9, 216, 221-2, 227, 237-9, 241, 246, 251-2, 265, 268-70, 273, 309; Crim Mongols 克里木蒙古人 254; crusades against 针对其的十字军行动 xxxii, 198-9

monks, religious communities 僧侣, 宗教社

群 5-6, 11, 14-17, 20-3, 47-8, 53, 69, 93, 113, 121, 132, 135, 174, 186, 194, 219

Monreal del Campo 蒙雷亚尔德坎波 133

Monreale 蒙雷阿莱 211

Monte Cassino, abbey 卡西诺山修道院 32, 53: Chronicle of 纪年 13

Montegaudio, Order of 蒙特高迪奥骑士团 133

Montenegro 黑山 304

Montesa, Order of 蒙特萨骑士团 255, 284

Montferrat, family 蒙费拉家族 153

Montfort (Qal'at al-Qurain/Starkenberg) 蒙福特 (卡拉特古赖因·施塔肯贝格) 181, 196, 211, 240

Mont Gisard, Battle of 吉萨山战役 106

Montlhéry, family 蒙莱里家族 17, 19, 95, 97-9, 119, 121

Montpélerin 蒙佩勒恩 51. 参见 Tripoli

Montserrat 蒙特塞拉特山 286

Mt Carmel 迦密山 76

Mt Tabor 他泊山 177, 195

moratoria on judicial proceedings, payments of interest and repayments of debts 司法审判、利息的支付和债务的偿还 121, 166, 175, 184

Moravia 摩拉维亚 254, 275

Morea 摩里亚, 参见 Latin Greece

Morocco 摩洛哥 200, 245, 288, 302: sharifs of 谢里夫 288

Mosul 摩苏尔 1, 38, 85, 104-7

Motivation 动机 xxv, xxx-xxxi, xxxii, 11-23

al-Mu'azzam, ruler of Damascus 穆阿扎姆, 大马士革的统治者 181

Muhammad an-Nasir, Almohad caliph 穆罕迈德·纳赛尔, 阿尔摩哈德哈里发 169

Muisse Arrabi 缪塞·阿拉比 66

mu'na “个人献礼” 83  
 Münster 明斯特 201  
 al-Muqtadi, 'Abbasid caliph 穆克塔迪,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 26  
 Murad I, Ottoman s. 穆拉德一世, 奥斯曼苏丹 270  
 Murad II, Ottoman s. 穆拉德二世, 奥斯曼苏丹 270, 275-6

Murcia 穆尔西亚 117, 200  
 Muret, Battle of 穆雷战役 168  
 Muret, Mark-Anthony 马克-安东尼·穆雷 290  
 Muslims 穆斯林, 另见 Islam  
 al-Mustansir, Fatimid caliph 穆斯坦绥尔, 法蒂玛王朝哈里发 26  
 Mutarjim 穆塔吉姆 86

## N

Nablus 纳布卢斯 52, 70, 73, 88, 92, 99, 110, 177: Council of 会议 75, 96  
 Nahr el Kelb 狗河, 参见 Dog river  
 Nahr el Mu'almetein 纳赫勒穆阿勒梅坦 91  
 Namur, count of 那穆尔伯爵, 29  
 Naples 那不勒斯 203-4, 280, 289: kingdom of 王国 259-60, 262, 265, 267, 271, 278-81, 287, 289  
 Napoleon Bonaparte, French e. 拿破仑·波拿巴, 法国皇帝 xxxii, 294, 296-8, 301  
 Napoleon III, French e. 拿破仑三世, 法国皇帝 302  
 an-Nasir Da'ud, ruler of Transjordan 纳西尔·达乌德, 外约旦统治者 188, 227  
 Navarre 纳瓦拉 260, 279  
 Navarrese Company 纳瓦拉团 260-1  
 Návplion 纳夫普利翁 284, 289  
 Nayme, sister of Saliba 纳姆耶, 萨利巴的姐妹 66  
 Naxos 纳克索斯岛, 218  
 Nazareth 拿撒勒 181, 215, 240: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69; cathedral 大教堂 60, 69, 75, 240; chapter of 宪章 69, 75; diocese 教区 69; lordship 领土 69, 231

Nelson, Horatio 霍雷肖·纳尔逊 297  
 neo-imperialism 新帝国主义 304-8: Liberal 自由主义的 304, 308; Marxist 马克思主义的 304, 308; Zionist 锡安主义的 304, 308; Muslim 穆斯林的 304-8; Arab Nationalist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 305-6, 308; Islamist 伊斯兰教的 306-8  
 Nerio Acciaiuoli, I. Corinth, d. Athens 聂里奥·阿奇艾尤奥利, 科林斯领主, 雅典公爵 261  
 Nesebur 内塞伯尔 245, 269  
 Nestorians 聂斯脱利派 61, 67, 73-4  
 Netherlands 荷兰 285, 另见 Low Countries  
 Nevers, counts of 讷维尔公爵 176, 188-9  
 Nicaea (Iznik) 尼西亚 (伊兹尼克) 17, 27, 32, 34-5, 42, 44, 127-8, 270: Byzantine empire in exile 在该地流亡的拜占庭帝国 201, 217, 219-22, 229  
 Nicholas IV, pope 尼古拉四世, 教皇 206, 250  
 Nicholas V, pope 尼古拉五世, 教皇 276  
 Nicholas Sabraham 尼古拉斯·萨布拉汉 245  
 Nicholas, boy preacher 尼古拉, 少年传道者 172

Nicholas, nephew of Saliba 尼古拉·萨利巴的侄子 66  
 Nicopolis (Nikopol) 尼哥波立 273: Crusade of 其十字军行动 245, 270, 272-3, 275  
 Nicosia 尼科西亚 216, 236, 259, 289: cathedral 大教堂 258; church of St Catherine 圣凯瑟琳教堂 258; royal palace 皇宫 258  
 Niklot, Wendish prince 尼克洛特, 文德人王公 130  
 Niksar 尼克萨尔 46  
 Nile, river and delta 尼罗河及其三角洲 108, 147, 151-2, 156, 178-80, 194-5, 269  
 Nimes, Council of 尼姆大公会议 4, 16  
 Niš 尼什 27, 126, 275  
 Nitra 尼特拉 28  
 Nivelof of Fréteval 弗雷特瓦勒的尼弗洛 21  
 Nizam all-Mulk, vizir 尼扎姆·默尔克·维齐尔 26  
 nobles 贵族, 参见 *armsbearers*, *Latin Palestine*

和 Syria  
 non-combatants 无战斗力者, 参见 *unsuitable*  
 Normandy 诺曼底 17, 35, 54, 63, 97, 113, 138, 249; Normans in England 诺曼人在英格兰 89; Normans in South Italy 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 6, 9, 30-1, 35, 43, 89, 117, 119, 124, 126  
 North Africa 北非 xxxi, 1, 7, 10, 108, 124, 130, 132, 172, 199-200, 210-11, 246, 262, 272, 279, 283-9, 291-3, 295, 301-2, 305-6  
 Norway 挪威 114, 193, 251, 285, 302  
 Nova Religio Passioris Jesu Christi 耶稣受难新教会 247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 162, 198, 251  
 Nur ad-Din, ruler of Syria 努尔丁·叙利亚统治者 105-7, 109, 129  
 Nuremberg 纽伦堡 275, 308  
 Nymphaeum, Treaty of 《尼阜姆条约》220

## O

Octavian degli Ubaldini, cardinal 奥克塔维安·德格里·乌巴尔蒂尼, 红衣主教 202  
 Oder, river 奥得河 132  
 Odo I, d. Burgundy 奥多一世, 勃艮第公爵 45  
 Odo III, d. Burgundy 奥多三世, 勃艮第公爵 176  
 Odo of Chateauroux, cardinal-b. Tusculum 沙多鲁的奥多, 红衣主教, 图斯库伦主教 193  
 Odo of Grandson 格兰德森的奥多 213, 266  
 Odo of Montbéliard 蒙彼利埃的奥多 188  
 Ōgodai 窝阔台 199  
 Oleguer, St, archb. Tarragona, papal legate 圣

奥莱格, 塔拉戈纳大主教, 教皇使节 116  
 Oliver of Paderborn 帕德博恩的奥利弗 177-8  
*Omne datum optimum* 《各样美善的恩赐》79  
 Oran 奥兰, 279, 295  
 order-states 骑士团国家 xxvi, 247, 257-8, 292-7, 302  
 Orderic Vitalis, historian 奥德里克·维塔利, 历史学家 118  
 Oriflamme 金色火焰 127, 141, 194  
 Orkhan, Ottoman ruler 奥尔汗, 奥斯曼统治者, 270  
 Orontes, river 奥龙特斯河, 37, 39-40, 82, 102  
 Orsini, family 奥西尼家族 260

Orşova 奥尔绍瓦 272  
 Osman, Ottoman ruler 奥斯曼, 奥斯曼帝国  
 统治者 270  
 Osnabruck 奥斯纳布吕克 201  
 Ostia 奥斯蒂亚 3  
 Othon of la Roche, I. Athens 拉罗什的奥松,  
 雅典领主 222  
 Otranto 奥塔兰托 181, 278  
 Ottakar II, k. Bohemia 奥塔卡二世, 波西米

亚国王 198

Otto, b. Freising 奥托, 福莱辛主教 131  
 Otto III, margrave of Brandenburg 奥托三世,  
 勃兰登堡边境总督 198  
 Otto of Brunswick, western e. 布伦斯威克的  
 奥托, 西方皇帝 153, 162, 176  
 Ottoman Turks 奥斯曼土耳其人, 参见 Turks  
 Oxeia, monastery 奥薛亚修道院 63

## P

Pacifists 绥靖主义者 207, 298  
 pack animals 驮畜 20, 37, 140  
 Paderborn 帕德博恩 201  
 Palermo 帕勒莫 204, 211  
 Palestine 巴勒斯坦 1, 10, 20, 26, 85, 111,  
 145-6, 183, 246-7, 265, 302-3, 305-6. 另见  
 Latin Palestine  
 palms 棕榈 44, 113  
 Pan-Islamism 泛伊斯兰主义 304-7  
 Pannonhalma 帕农哈尔玛 28  
 papacy 教皇 xxix, xxxi, xxxii, 2, 6, 8-10, 17,  
 29-31, 63-5, 67, 74-5, 81, 94, 98, 101, 117,  
 119-21, 131-5, 137, 148, 155, 157, 161, 173,  
 175, 177, 182, 186, 190, 195-7, 200-6, 209,  
 212-13, 221-2, 233, 236, 242, 245, 247-50,  
 252, 254-7, 262-8, 270-1, 273, 275-6, 279-  
 84, 287-90, 292, 297, 309: authority of 其权  
 威 xxx, xxxii, xxxiii, 9, 48-9, 98, 120, 122-5,  
 131-2, 134-5, 148-9, 173, 176, 183, 186,  
 251-2, 267; proclamation of crusades 号召  
 组建十字军 xxx, xxxiii, 49, 112, 119, 119,  
 121-3, 124, 131-2, 134-5, 137, 146, 149-50,  
 166, 170-1, 173-6, 185, 187, 192, 197-200,

204, 207, 251-2, 262, 265-6, 268, 272, 274,  
 277-8. 另见 taxation of Church 以及各个  
 教皇  
 papal legates 教皇使节 3, 45, 47, 63-5, 67, 98,  
 118, 125, 132, 143, 149, 165-6, 168, 172, 174,  
 176, 178, 185, 193, 201, 203, 208, 221, 268,  
 274, 276, 281, 288. 另见各个教皇使节  
 Papal Patrimony (Papal States) 教皇管辖地  
 (教皇国) 64, 163, 201, 263-4  
 Paphos 帕福斯 259  
 Paris 巴黎 172, 191, 194, 206, 210-11, 218, 247,  
 250, 262, 266-7: bishop of 主教 190; chapel  
 of St Nicolas 圣尼古拉礼拜堂 191; Notre-  
 Dame 圣母院 194, 211; Peace of (1229) 和  
 约 (1229年) 169; Saint-Germain-des-Pres  
 圣日耳曼德佩 267; Sainte-Chapelle 圣礼拜  
 教堂 191-2, 194  
 Parma 帕尔马 211  
 Paschal II, pope 帕斯卡尔二世, 教皇 10, 45,  
 646, 113-14, 116, 118  
 passagia generalia 普遍性征战 247, 265-9,  
 271-2, 283  
 passagia particularia 特殊性征战 247, 262,

- 265-7, 269, 272
- Passava 帕萨瓦 295
- Passion of Jesus Christ, Order of 耶稣受难骑士团, 参见 *Nova Religio Passionis Jhesu Christi*
- Pastoureaux 牧羊人的十字军, 参见 *Shepherds, Crusade of*
- Patras (Pátrai) 帕特拉斯 295: Gulf of 海湾 290
- Paul III, pope 保罗三世, 教皇 286, 288-9
- Paul IV, pope 保罗四世, 教皇 284, 287, 289
- Paul of Segni, b. Tripoli 瑟尼的保罗, 的黎波里主教 241
- peace movement (nineteenth-century), 和平运动 298
- Peace of God movement 上帝的和平运动 5
- peasant crusade armies 农民十字军 xxvi, 246, 277
- peccatis exigentibus hominum argument “人类除罪” 之争 48, 130-1, 137, 170-1
- Peipus (Chudskoye), Lake, Battle on 佩普西 (楚德) 湖战役 198
- Pelagius, cardinal-b. Albano 佩拉吉乌斯, 阿尔巴诺主教红衣主教 178-9, 221
- Pelagonia, Battle of 佩拉格尼亚战役 222
- 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 参见 *Latin Greece*
- Penance 苦行赎罪 xxx-xxxi, 4, 8-15, 113-14, 124-5, 132-4, 137, 157, 167, 174-5, 183
- penitential theology 赎罪神学 13, 113, 124-5, 149, 283
- penitential warfare 赎罪战争 9-10, 12, 80, 113, 120, 283
- peregrinatio religiosa 宗教之旅 11, 13
- Perpetual Crusades 长期十字军 xxxii, 161-2, 196-200, 252-4
- Perpignan 佩皮尼昂 204
- Persian Gulf 波斯湾 238
- Peter, St 圣彼得 9: banner of 其旗帜 119; Keys, sign of 钥匙标志 201, 另见 *fideles beati Petri*
- Peter of Courtenay, Latin e. Constantinople 库特奈的彼得,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 220
- Peter II, k. Aragon 彼得二世, 阿拉贡国王 168, 170
- Peter III, k. Aragon 彼得三世, 阿拉贡国王 203
- Peter I, k. Castile 彼得一世, 卡斯蒂利亚国王 262
- Peter I, k. Cyprus 彼得一世, 塞浦路斯国王 258-9, 268-9: crusade of 其十字军行动 152, 245, 268-9
- Peter II, k. Cyprus 彼得二世, 塞浦路斯国王 258-9
- Peter of Angoulême, Latin p. Antioch 昂古莱姆的彼得, 拉丁安条克牧首 229
- Peter Arrabi 彼得·阿拉比 66
- Peter Bartholomew 彼得·巴托洛缪 42
- Peter of Blois 布卢瓦的彼得 134
- Peter Bordo of St Superan, pr. Achaea 圣苏佩兰的彼得·博尔多, 亚该亚大公 260
- Peter Capuano, papal legate 彼得·卡普阿诺, 教皇使节 154
- Peter of Castelnau, papal legate 卡斯蒂瑙的彼得, 教皇使节 166-7
- Peter of Dreux, c. Brittany 德勒的彼得, 布列塔尼伯爵 187-8
- Peter Dubois 彼得·杜波依斯 247
- Peter Fernandez, infant of Aragon 彼得·费尔南德斯, 阿拉贡“婴儿” 209
- Peter the Hermit 隐修者彼得 17, 24, 26-9
- Peter Pillart 彼得·比拉尔 205
- Peter Thomas, Latin p. Constantinople 彼得·托马斯, 君士坦丁堡拉丁牧首 258, 268



- Peter the Venerable, ab. Cluny 受尊敬的彼得, 克吕尼修道院院长 117, 183
- Petrovaradin 彼得罗瓦拉丁 292
- Philibert of Naillac, m. Hospitallers 奈利亚克的菲利贝尔, 医院骑士团团长 273
- Philip of Courtenay, Latin e. Constantinople 库特奈的菲利普,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 222
- Philip I, k. France 菲利普一世, 法国国王 3, 28, 118
- Philip II, k. France 菲利普二世, 法国国王 138, 141-4, 146-9, 153, 164-6, 168, 180, 190, 302
- Philip III, k. France 菲利普三世, 法国国王 203-5, 210-13
- Philip IV, k. France 菲利普四世, 法国国王 213, 223, 243, 246, 250, 266
- Philip V, k. France 菲利普五世, 法国国王 264, 266
- Philip VI, k. France 菲利普六世, 法国国王 262, 267-8
- Philip, k. Navarre 菲利普, 纳瓦拉国王 262
- Philip II, k. Spain 菲利普二世, 西班牙国王 283-4, 287, 289
- Philip of Anjou (son of Charles I of Anjou) 安茹的菲利普 (安茹的查理一世之子) 223
- Philip of Antioch 安条克的菲利普 229
- Philip of Bar 巴尔的菲利普 272
- Philip III, d. Burgundy 菲利普三世, 勃艮第公爵 275-6
- Philip, c. Flanders 菲利普, 佛兰德斯伯爵 109, 131, 135, 138
- Philip of Ibelin (son of Balian of Ibelin and Maria Comnena) 伊贝林的菲利普 (伊贝林的巴里安与玛丽亚·科内玛之子) 235
- Philip of Ibelin, l. Arsuf 伊贝林的菲利普, 阿尔苏夫领主 258
- Philip of l'Isle Adam, gm. Hospitallers 利勒-亚当的菲利普, 医院骑士团大团长 257
- Philip of Mézières 梅济耶尔的菲利普 247
- Philip of Montfort, l. Tyre 蒙福特的菲利普, 泰尔领主 237
- Philip of Novara, jurist 诺瓦拉的菲利普, 法学家 232-3
- Philip of Savoy, c. Piedmont 萨伏伊的菲利普, 皮埃蒙特伯爵 223
- Philip, d. Swabia 菲利普, 施瓦本公爵 153, 155, 160
- Philip I, pr. Taranto 菲利普一世, 塔兰托亲王 223, 260, 266
- Philip II, pr. Taranto 菲利普二世, 塔兰托亲王 260
- Philippa of Toulouse 图卢兹的费丽帕 31
- Piacenza, Council of 皮亚琴察大会议 1-3, 6
- Picquigny 皮基尼 54
- Piedmont 皮埃蒙特 264
- Pilgrimage of Grace 求恩巡礼骚乱 283
- pilgrims, pilgrimages 朝圣者, 朝圣 xxxi, 7, 10-12, 15-17, 20, 27, 55-62, 70-1, 76-9, 86, 95, 97, 103-4, 108, 112-15, 121, 126, 132-3, 135, 161-2, 165, 184, 211, 251, 284, 286: armed 武装的 112-15; symbols of 其象征物 14-15, 127, 194
- Pilos (Navarino) 派洛斯 (纳瓦里诺) 280, 290
- Pinto, Manoel, gm. Hospitallers 曼诺埃尔·品脱, 医院骑士团大团长 295
- pirates 海盗 256, 258, 265, 267, 271-2, 286-7, 295-6
- Pisa 比萨 10, 16, 50, 104, 116, 130, 224-6, 239, 272: Council of (1135) 大会议 (1135年) 117, 162; privileges in kdom. Jerusalem 在耶路撒冷王国享有的特权 224-6

Pius II, pope 庇护二世, 教皇 277-8  
 Pius IV, pope 庇护四世, 教皇 287, 289  
 Pius V, St, pope 圣庇护五世, 教皇 285, 289-90  
 Plaisance of Antioch, q. Cyprus 安条克的普莱桑斯, 塞浦路斯王后 230, 239  
 Plovdiv 普罗夫迪夫 126, 139, 270  
 pluralism 多元主义 xxv, xxxi, xxxii, 308-9  
 Poitiers 普瓦捷 4, 247-8: Battle of 战役 269; Council of(1100) 大公会议(1100年) 45; Council of(1106) 大公会议(1106年) 118  
 Poitou 普瓦图 138, 143, 253, 258  
 Poland 波兰 124, 196, 198-9, 202, 252-4, 275, 279, 285, 292: duke of 公爵 124; king of 国王 252  
 Pole, Reginald, cardinal 雷吉纳德·波尔, 红衣主教 283  
 'Political' Crusades “政治性的”十字军 xxxi, xxxii, 117, 162-3, 183, 192, 201-7, 209, 262-4, 266, 271, 274, 283-4, 309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132, 162, 252, 254  
 Pons, c. Toulouse 庞斯, 图卢兹伯爵 31, 96  
 Pons, c. Tripoli 庞斯, 的黎波里伯爵 91  
 Pont-Echanfray, family 蓬特-埃尚弗雷家族 17  
 Poor 穷人 18, 26-9, 41-2, 44, 126-7, 167, 171-2, 176, 206, 246, 266, 277. 另见 unsuitable  
 'Popular' Crusades 民众十字军 26-9, 126-7, 171-2, 206, 246, 266, 276-7. 另见 peasant crusade armies  
 Popularists 民粹主义者 308  
 Porto (Oporto) 波尔多 130  
 Portugal 葡萄牙 124, 130, 133, 142, 169-71, 199, 246-7, 255, 262, 279, 284-8  
 Post miserabile 《在悲痛之后》149-50  
 Poujoulat, Jean-Joseph 让-约瑟夫·波尤勒

301

Prague 布拉格 24  
 Praver, Joshua 约书亚·普拉韦尔 304, 309  
 Preaching 布道 xxix, xxxi, 3-10, 14, 16, 23, 43, 45, 98, 120-5, 137, 139, 141, 146, 148, 152, 161, 166, 171-7, 180, 183-7, 192, 201-2, 204-6, 208, 210, 212, 228, 262-3, 265-8, 271, 276, 286, 288, 292, 309: handbooks 手册 174, 185  
 Premonstratensians 普雷蒙特雷修会 258  
 Prévanchières 普雷旺谢尔 54  
 Préveze 普雷韦扎 289  
 Priests 教士 15, 47  
 primum passagium 先导性征战 266-7, 272  
 prisoners, redemption or liberation of 战俘的赎回或释放 118, 144, 273, 286  
 Privileges 特权 xxxi, 117, 121, 135, 137, 165, 168, 175, 184, 199, 264, 267, 278, 309. 另见 immunity; indulgences; moratoria; protection; remission of sins  
 propaganda 传道宣传, 另见 preaching  
 Protection 保护 xxxi, 119, 121, 135, 154, 165, 175, 181, 184, 290  
 Protestants 新教徒 275, 281-5, 288, 296-7  
 Provence 普罗旺斯 14, 17, 60, 71-2, 84, 115, 172, 195, 205, 224  
 Provisioning 准备补给 19, 28, 30, 33-5, 37-8, 42-5, 126-8, 138-40, 155, 158, 160, 177, 180, 187, 193, 195, 204, 241, 286, 288  
 Prussia 普鲁士 xxvi, xxxi, xxxii, 103, 162, 197-8, 245, 247, 250-7, 272, 285; colonization of 殖民 197-8, 252; crusading in 此地的十字军行动 196-8, 252-4  
 Pskov 普斯科夫 198  
 Pueblo (Colorado) 普韦布洛(科罗拉多) 291

## Q

- Qadi 喀迪 73-4  
 Qalaat el Mudiq (Afamiyah) 穆迪克堡 (阿法米亚) 109  
*Quantum praedecessores* 《吾等之前辈》121-2, 134  
 Qaqun 卡坤 211, 240  
 Qubeiba 屈巴 83  
*Quia maior* 《事出紧急》173-5, 177  
 Quseir 古赛尔 111  
 Qutb, Sayyid 萨义德·屈塔布 306-7

## R

- Rabigh 拉比格 110  
 Radulf, Cistercian monk 拉道夫, 西多会僧侣 123  
 Rafniye 哈弗涅 42  
 Raimbaut of Vaqueiras, troubadour 瓦克拉斯的兰伯特, 游吟诗人 155  
 Raimbold Croton 兰博·克罗同 113-14  
 Raimundo, ab. Fitero 雷蒙多, 菲特罗修道院院长 133  
 Rainaldo 雷纳尔多 27  
 Ra'is 拉伊首领 82  
 Ralph, l. Tiberias 拉尔夫, 提比里亚领主 232-3, 235  
 Ralph Niger 拉尔夫·尼日尔 165  
 Ramle 拉姆拉 43, 52, 62, 88, 215: bishop of 主教参见 Lydda  
 Ratzeburg, bishop of 拉策堡主教 201  
 Ravanda 拉万达 36-7, 50, 62  
 Raymond of Antioch (son of Bohemond III) 安条克的雷蒙 (博希蒙德三世之子) 228  
 Raymond Babin 雷蒙·巴宾 258  
 Raymond Berengar I, c. Barcelona 雷蒙·贝伦加尔一世, 巴塞罗那伯爵 31  
 Raymond Berengar III, c. Barcelona 雷蒙·贝伦加尔三世, 巴塞罗那伯爵 116  
 Raymond Berengar IV, c. Barcelona 雷蒙·贝伦加尔四世, 巴塞罗那伯爵 124  
 Raymond of Peñafort, St 佩尼亚佛的圣雷蒙 175  
 Raymond of Poitiers, pr. Antioch 普瓦捷的雷蒙, 安条克亲王 76, 127  
 Raymond Roger of Trencavel, visc. Béziers and Carcassonne 特朗卡维尔的雷蒙·罗杰, 贝济耶与卡尔卡松子爵 167  
 Raymond Roupen, pr. Antioch 雷蒙·鲁朋, 安条克亲王 228-9  
 Raymond IV of St Gilles, c. Toulouse 圣吉尔的雷蒙德四世, 图卢兹伯爵 3, 31-6, 38, 40-3, 45-6, 50-3, 62, 90, 114, 143  
 Raymond V of St Gilles, c. Toulouse 圣吉尔的雷蒙德五世, 图卢兹伯爵 138  
 Raymond VI of St Gilles, c. Toulouse 圣吉尔的雷蒙德六世, 图卢兹伯爵 164, 166-9  
 Raymond VII of St Gilles, c. Toulouse 圣吉尔的雷蒙德七世, 图卢兹伯爵 168-9  
 Raymond III, c. Tripoli 雷蒙德三世, 的黎波里伯爵 101, 105, 109-11, 228, 233  
 Razès 拉泽斯 167  
*Reconquista* 再征服运动 xxxi, xxxii, 6-9, 31, 116-17, 119, 123-4, 130-3, 135, 163, 169-

- 73, 175, 190, 192, 199-200, 245-6, 261-2, 265, 278-80, 284, 286, 292, 302
- Red Sea 红海** 108, 110
- Recruitment 十字军招募** xxxii, 16-23, 120, 122, 161, 174, 200, 205, 207, 209, 252-3, 281, 292. 另见 *preaching*
- Reformation, sixteenth-century 宗教改革**, 16 世纪. 参见 *Protestants*
- reform councils and crusades 改革宗教会议与十字军** 137, 175, 212, 279-80, 282
- reformers, eleventh-century 教会改革派**, 11 世纪 3-10, 16-17, 29-32, 47, 53, 63, 73, 75-6, 113, 117
- Regensburg 雷根斯堡** 24, 126-7, 139
- Reggio Emilia 雷焦艾米利亚** 211
- Reims 兰斯** 192; *archbishops of* 大主教 187, 249; *cathedral* 大教堂 3, 29
- relics, Relics 圣物** 5, 11, 44, 47-8, 127, 159, 190-2, 211, 297; *Crown of Thorns* 荆棘冠 190-2; *Holy Lance* 圣矛 39, 42; *of Passion from Constantinople* 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圣物所引发的热情 190-2, 194, 222; *True Cross* 真十字架 11, 56, 58, 60, 98, 110-11, 144, 159, 172, 179-80, 191-2
- remission of sins 恕罪** 10, 12-13, 16, 47-9, 116-17, 119, 121-2, 124-5, 132-5, 137, 149, 161, 165-6, 172, 201
- Renier of Montferrat 蒙费拉的雷尼耶** 153
- Retrais 《撤回》** 250
- Reynald of Châtillon, I. Transjordan 沙蒂永的雷纳德**, 外约旦领主 109-10
- Reynald Grenier, I. Sidon 雷纳德·格勒尼耶**, 西顿领主 233
- Reynald of Montmirail 蒙米赖的雷纳德** 152
- Reysen 远征** 245, 253-4
- Rhine, river 莱茵河** 172, 296
- Rhineland 莱茵兰** 20, 27-8, 171
- Rhodes 罗得岛** xxvi, 103, 130, 142, 245, 247, 251, 254-8, 265-8, 270-1, 273, 278, 280, 282, 284, 289, 292-5, 297, 302: *city*, 城市 255, 257; *collacchio* 静修团员居住的封闭区域 255; *colonists* 殖民者 255
- Rhône, river 罗讷河谷** 3
- Richard I, k. England 理查一世**, 英格兰国王 138, 141-9, 180, 216, 299, 302-4, 307
- Richard II, k. England 理查二世**, 英格兰国王 271-2
- Richard, earl of Cornwall 理查**, 康沃尔伯爵 189, 202
- Richard Filangieri, imperial marshal 理查德·费兰杰里**, 帝国兵元帅 236
- Ridvan, ruler of Aleppo 里德万**, 阿勒颇的统治者 118
- Riga 里加** 161-2, 250: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250
- Rimini, Golden Bull of 里米尼的金玺诏书** 197
- Robert of Courtenay, Latin e. Constantinople 库特奈的罗贝尔**,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 220-1
- Robert, k. Naples 罗贝尔**, 那不勒斯国王 260
- Robert, c. Artois 罗贝尔**, 阿图瓦伯爵 194
- Robert of Cléry, historian 克莱里的罗贝尔**, 历史学家 157
- Robert of Courçon, papal legate 库尔松的罗贝尔**, 教皇使节 176
- Robert of Courtenay, butler of France 库特奈的罗贝尔**, 法国总管 188
- Robert I, c. Flanders 罗贝尔一世**, 佛兰德斯伯爵 118
- Robert II, c. Flanders 罗贝尔二世**, 佛兰德斯伯爵 10, 32-5, 37-8, 42-3, 51, 135
- Robert Guiscard, d. Apulia 罗贝尔·吉斯卡**

- 73, 175, 190, 192, 199-200, 245-6, 261-2, 265, 278-80, 284, 286, 292, 302
- Red Sea 红海** 108, 110
- Recruitment 十字军招募** xxxii, 16-23, 120, 122, 161, 174, 200, 205, 207, 209, 252-3, 281, 292. 另见 *preaching*
- Reformation, sixteenth-century 宗教改革**, 16 世纪. 参见 *Protestants*
- reform councils and crusades 改革宗教会议与十字军** 137, 175, 212, 279-80, 282
- reformers, eleventh-century 教会改革派**, 11 世纪 3-10, 16-17, 29-32, 47, 53, 63, 73, 75-6, 113, 117
- Regensburg 雷根斯堡** 24, 126-7, 139
- Reggio Emilia 雷焦艾米利亚** 211
- Reims 兰斯** 192; *archbishops of* 大主教 187, 249; *cathedral* 大教堂 3, 29
- relics, Relics 圣物** 5, 11, 44, 47-8, 127, 159, 190-2, 211, 297; *Crown of Thorns* 荆棘冠 190-2; *Holy Lance* 圣矛 39, 42; *of Passion from Constantinople* 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圣物所引发的热情 190-2, 194, 222; *True Cross* 真十字架 11, 56, 58, 60, 98, 110-11, 144, 159, 172, 179-80, 191-2
- remission of sins 恕罪** 10, 12-13, 16, 47-9, 116-17, 119, 121-2, 124-5, 132-5, 137, 149, 161, 165-6, 172, 201
- Renier of Montferrat 蒙费拉的雷尼耶** 153
- Retrais 《撤回》** 250
- Reynald of Châtillon, I. Transjordan 沙蒂永的雷纳德**, 外约旦领主 109-10
- Reynald Grenier, I. Sidon 雷纳德·格勒尼耶**, 西顿领主 233
- Reynald of Montmirail 蒙米赖的雷纳德** 152
- Reysen 远征** 245, 253-4
- Rhine, river 莱茵河** 172, 296
- Rhineland 莱茵兰** 20, 27-8, 171
- Rhodes 罗得岛** xxvi, 103, 130, 142, 245, 247, 251, 254-8, 265-8, 270-1, 273, 278, 280, 282, 284, 289, 292-5, 297, 302: *city*, 城市 255, 257; *collacchio* 静修团员居住的封闭区域 255; *colonists* 殖民者 255
- Rhône, river 罗讷河谷** 3
- Richard I, k. England 理查一世**, 英格兰国王 138, 141-9, 180, 216, 299, 302-4, 307
- Richard II, k. England 理查二世**, 英格兰国王 271-2
- Richard, earl of Cornwall 理查**, 康沃尔伯爵 189, 202
- Richard Filangieri, imperial marshal 理查德·费兰杰里**, 帝国兵元帅 236
- Ridvan, ruler of Aleppo 里德万**, 阿勒颇的统治者 118
- Riga 里加** 161-2, 250: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250
- Rimini, Golden Bull of 里米尼的金玺诏书** 197
- Robert of Courtenay, Latin e. Constantinople 库特奈的罗贝尔**,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 220-1
- Robert, k. Naples 罗贝尔**, 那不勒斯国王 260
- Robert, c. Artois 罗贝尔**, 阿图瓦伯爵 194
- Robert of Cléry, historian 克莱里的罗贝尔**, 历史学家 157
- Robert of Courçon, papal legate 库尔松的罗贝尔**, 教皇使节 176
- Robert of Courtenay, butler of France 库特奈的罗贝尔**, 法国总管 188
- Robert I, c. Flanders 罗贝尔一世**, 佛兰德斯伯爵 118
- Robert II, c. Flanders 罗贝尔二世**, 佛兰德斯伯爵 10, 32-5, 37-8, 42-3, 51, 135
- Robert Guiscard, d. Apulia 罗贝尔·吉斯卡**

- 尔, 阿普利亚公爵 30, 302
- Robert the Monk (of Reims) (兰斯的) 僧侣罗贝尔 48, 112
- Robert II, d. Normandy 罗贝尔二世, 诺曼底公爵 32-4, 42-3, 50-2, 54
- Robert of Paris, papal legate 巴黎的罗贝尔, 教皇使节 65
- Robert of Rouen, b. Lydda 鲁昂的罗贝尔, 卢德主教 51
- Robert of Taranto 塔兰托的罗贝尔 260
- Rodrigo Borgia, cardinal 罗德里戈·波吉亚, 红衣主教 279, 参见 Alexander VI
- Rodez, count of 罗兹伯爵 176
- Roger I, c. Sicily 罗杰一世, 西西里伯爵 6, 64
- Roger II, k. Sicily 罗杰二世, 西西里国王 117, 124-7, 129-30
- Roger Bernal of Castielbon 卡斯蒂彭的罗杰·贝纳尔 262
- Roger Borsa, d. Apulia 罗杰·博尔萨, 阿普利亚公爵 30
- Roger of Salerno, regent of Antioch 萨勒诺的罗杰, 安条克摄政 108, 119
- Roger of San Severino 圣塞韦里诺的罗杰 242
- Romagna 罗马涅 263
- Romania 罗马尼亚 304
- romantic imperialists 浪漫派帝国主义 301-6, 308-9
- Romanus IV Diogenes, Byzantine e. 罗曼努斯四世·第欧根尼, 拜占庭皇帝 2
- Rome 罗马 xxxii, 3, 6, 8, 11, 29, 32, 65, 114, 133, 138, 154-6, 161, 170, 172, 186, 191, 201-2, 204, 208, 212-13, 221, 248, 254, 263-5, 271-3, 276-7, 279-80, 282, 286, 295: Castel St Angelo 圣天使堡 279; council in (1099) 大公会议 (1099年) 16; Lateran Palace 拉特兰宫 11; St Peter's 属于圣彼得 202, 277-8, 286, 291; Vatican 梵蒂冈 279
- Ronda 龙达 278
- Rorgo Fretellus 罗尔戈·弗雷特鲁斯 75
- Rosetta 罗塞塔 156
- Rouen 鲁昂 54
- Roussillon 鲁西永 249
- Routiers 结队雇佣兵 164, 263
- Rudolf of Hapsburg, western e. 哈布斯堡的鲁道夫, 西方皇帝 198, 213
- Rügen 吕根岛 132
- Ruj 鲁耶 38, 41-2
- Rum, Selchükid Sultanate of 罗姆, 塞尔柱苏丹国 105, 107, 128, 229, 237
- Runciman, Sir Steven 史蒂芬·朗西曼爵士 300, 308
- Russia 俄罗斯 xxxii, 162, 198-9, 237, 245, 251, 254, 295-6, 304, 309: Orthodoxy 东正教 251, 309; Soviet Union 苏联 307

## S

- Saaremaa (Ösel) 萨雷马 162
- Sabaeans 塞巴人 72
- Safad (Zefat) 采法特 70, 81, 179, 188, 195, 240
- Safita 萨菲塔 182, 229, 240
- Sagrajas, Battle of 萨拉卡战役 7
- Said, Edward 爱德华·萨义德 303
- St Chaffre du Monastier, priory 莫纳斯捷的圣沙弗勒修道院 20-1

St Denis, abbey 圣德尼修道院 127, 141, 194, 211

St Gilles 圣吉尔 3-4, 31; abbey 修道院 167

St Jean-en-Vallée, abbey 谷中圣让修道院 97

St John of Jerusalem, Most Venerable Order of 耶路撒冷至尊圣约翰骑士团 xxxiii, 302

St John of Jerusalem, Order of 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 参见 Hospitallers of St John

St Lazarus of Bethany, abbey, nunnery 伯大尼的圣拉撒路女修道院 57-8, 61, 135

St Lazarus, Order of 圣拉撒路修会 80-1, 285

St Mary of the Germans of Jerusalem, Hospital of 耶路撒冷德意志人圣马利亚医院骑士团, 参见 Teutonic Order

St Nicolas d'Angers, abbey 昂热的圣尼古拉修道院 22

St Omer 圣奥梅尔 54

St Sabas, War of 圣萨巴斯战争 239

St Thomas of Acre, Order of 阿卡的圣托马斯修会 81

St Valéry, family 圣瓦莱里家族 17

Saladin, s. Egypt and Syria 萨拉丁, 埃及与叙利亚 苏丹 58, 106-7, 109-11, 114, 136, 139-40, 143-6, 150, 163, 169, 226, 232, 240, 299-300, 303, 305-6

Saladin tithe 萨拉丁什一税 131, 138, 141

Salado, Battle of 萨拉多战役 262-3

Salé 萨莱 200

Salerno 萨勒诺 78, 204

Saliba 萨利巴 66, 85

as-Salih Ayyub, s. Egypt 萨利赫·阿尤布, 埃及及苏丹 188, 194, 226-7, 237

as-Salih Isma'il, ruler of Damascus 萨利赫·伊斯玛仪, 大马士革统治者 188-9, 227

Salisbury, earl of 索尔兹伯里伯爵 262

Salvatierra 萨尔瓦铁拉 169

Samaria 撒马利亚 43, 92, 94

Samaritans 撒马利亚人, 参见 Jews

Samothráki 萨莫色雷斯岛 276

Samsat 萨姆塞特 36

Sancerre, counts of 桑塞尔伯爵 141, 188

Sancho III, k. Castile 桑乔三世, 卡斯蒂利亚国王 133

Sancho VII, k. Navarre 桑乔七世, 纳瓦尔国王 170

Sancho I, k. Portugal 桑乔一世, 葡萄牙国王 169

San Germano 圣日耳曼诺 180

San Julian del Pereiro, Order of 圣胡里安·德尔佩雷罗修会 133, 参见 Alcántara

Santarem 斯塔伦 124, 130

Santiago de Compostela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11, 116

Santiago, Order of 圣地亚哥骑士团 133, 284-5

Saragossa (Zaragoza) 萨拉戈萨 116-17, 133

Sardinia 撒丁岛 202, 210, 295

Sava, river 萨瓦河 27

Savoy 萨伏伊 211, 290

Saxony 萨克森 28, 123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174, 193, 196

Schism: between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裂教: 在拉丁和希腊教会之间 2, 8, 118, 158, 160, 213, 251, 270, 275; Great Schism 大裂教 271-2, 274; crusades of Great Schism 大裂教引起的十字军行动 271-3

Schmalkaldic War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 283

Scotland 苏格兰 193, 201, 247, 279, 285, 299

Scott, Sir Walter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299-300, 305-6, 309

scribani 主吏 86

scribe (scriba) 吏官 86

- Sebastea 塞巴斯蒂亚 71: diocese 教区 69
- Sebastian, k. Portugal 塞巴斯蒂安, 葡萄牙国王 288; crusade of 其十字军行动 288, 297
- Second Crusade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05, 109, 115-16, 121-31, 134-6, 138, 171, 207
- Secretes 秘库 87
- Sécs, bishop of 赛斯主教 187
- Segovia, Council of 塞戈维亚大公会议 132
- Seijar (Shaizar) 塞依扎尔 42, 104, 109
- Selchük 塞尔柱人 1-2
- Selchük Turks 塞尔柱土耳其人, 参见 Turks
- Selim I, Ottoman s. 塞利姆一世, 奥斯曼苏丹 257, 270, 281
- Selim II, Ottoman s. 塞利姆二世, 奥斯曼苏丹 284
- Sens 桑斯 191: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249
- Serbia 塞尔维亚 114, 139, 270, 304
- Sermons 训谕, 参见 preaching
- Sérrai 塞莱 220
- service de compaignons* 平等服务 93
- service de mariage* 结婚的义务 89, 241-2
- Sestus 塞斯托斯 126
- Setenil 塞特尼尔 278
- Settedar, sister-in-law of Saliba 瑟特达尔, 萨利巴的嫂子 66
- Setton, Kenneth 肯尼斯·塞顿 308
- Seville 塞维利亚 200, 262
- Shajar ad-Durr 沙贾尔·阿德杜尔 237-8
- Shaubak 肖巴克 179
- Shawqi, Ahmad 艾哈迈德·绍奇 305
- Shepherds, Crusades of 牧羊人的十字军 206, 266
- Shi'ites 什叶派 1-2, 26, 61, 71, 96, 104-6, 另见 Assassins
- shipping, fleets 运输船队 37, 43, 50, 52, 84, 108-10, 113-14, 119, 126-9, 138, 142, 144, 147, 151, 154-7, 159-61, 171-2, 176-8, 180-1, 187-8, 193-5, 203-4, 209-11, 224-6, 238-40, 243-4, 246, 254-8, 261, 264-9, 272-3, 275-80, 284-90, 292, 294-6. 另见 trade
- Shirkuh, vizir of Egypt 谢尔库, 埃及维齐尔 106
- Sibylla, q. Jerusalem 西碧拉, 耶路撒冷女王 94, 100-1, 109-11, 138, 140, 142-3, 153
- Sibylla of Anjou, ctes. Flanders 安茹的西碧拉, 佛兰德斯伯爵夫人 135
- Sibylla of Lusignan, q. Cilician Armenia 吕西尼昂的西碧拉,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女王 215
- Sicilian Vespers 西西里晚祷 203, 207, 223, 243
- Sicily 西西里 xxvi, 6, 89, 126, 138, 142, 147, 163, 203-6, 211, 214, 223, 265, 272, 294-5: Angevin kingdom 安茹王朝 202-3, 211, 222, 259-60, and Naples; Aragonese kingdom 与那不勒斯; 阿拉贡王国 203-4, 259-60, 287, 289; Bourbon kingdom, 波旁王朝 294; crusade against Aragonese kingdom 针对此地阿拉贡王国的十字军行动 202-3, 205, 207, 209; Norman kingdom 诺曼王国 124-5, 129, 142, 151, 153-4; Staufen kingdom 斯陶芬王朝 146-7, 163, 180-1, 187, 201, 207, 221, 236
- Sidon (Saida) 西顿 62, 68, 107-8, 114, 144, 147, 177, 181, 188, 195-6, 233, 239-40, 244, 274: diocese 教区 66; lords of, 93, 111, 142, 另见各位领主的词条
- Siegfried of Feuchtwangen, gm. Teutonic Knights 福伊希特旺根的西格弗雷德, 条顿骑士团大团长 251-2
- Sierra de Segura 谢拉德塞古拉 199



- Sigebert of Gembloux 让布卢的西吉贝 9-10
- Sigismund I, k. Poland 西吉斯蒙德一世, 波兰国王 288
- Sigismund of Luxemburg, k. Hungary, western e. 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 匈牙利国王, 西方皇帝 272, 274-5
- Sigurd, k. Norway 西格德. 挪威国王 114, 302
- Silivri 锡利夫里 30
- Silves 锡尔维什 169
- Simon, archb. Tyre 西蒙, 泰尔大主教 176
- Simon, l. Joinville 西蒙, 茹安维尔领主 135, 176
- Simon IV, l. Montfort, earl of Leicester 西蒙四世, 蒙福特领主, 莱赛斯特伯爵 152, 155-6, 167-8, 188
- Simon of Montfort, earl of Leicester 蒙福特的西蒙, 莱赛斯特伯爵 189, 210
- Sinai 西奈 110: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68
- es-Sinnabra 辛纳布拉 108
- Sixtus IV, pope 西斯图斯四世, 教皇 278
- Slaves 奴隶 72, 132, 172, 256, 258
- Smyrna (Izmir) 士麦那 (伊兹密尔) 255-6, 268, 278: Crusade of 其十字军行动 245, 256, 268
- Sofia 索菲亚 27, 126, 275
- Soissons 苏瓦松 152-3
- Sozopol 索佐波尔 269
- Spanish Armada 西班牙无敌舰队 283, 297
- Spain 西班牙 xxxi, 1, 7, 9, 19, 31, 62, 72, 81, 88, 114, 132-3, 167, 169-73, 175, 197, 199-200, 204-5, 223, 246-7, 249, 262, 272, 278-9, 285, 287-9, 291-3, 295, 297, 302: crusade in 此地的十字军行动, 另见 *Reconquista*
- Speyer 施派尔 24, 123
- spices 香料 151, 225
- Split 斯普利特 177
- Spoletto, duchy of 斯波莱托公爵领地 263
- Stedinger peasants, crusade against 针对斯特丁格农民的十字军 201
- Stenay 斯特奈 29
- Stephen, c. Blois 史蒂芬, 布卢瓦公爵 32-5, 39, 41, 45-6, 97
- Stephen of Blois, k. England 布卢瓦的史蒂芬, 英格兰国王, 97
- Stephen, c. Burgundy 史蒂芬, 勃艮第伯爵 45-6
- Stephen of Chartres, p. Jerusalem 沙特尔的史蒂芬, 耶路撒冷亲王 54, 96-8
- Stephen, boy preacher 史蒂芬, 少年布道者 172
- Stephen, brother of Saliba 史蒂芬, 萨利巴的兄弟 66
- Stukeley, Sir Thomas 托马斯·斯图克雷斯爵士 288
- Suarez, Francisco 弗朗切斯科·苏亚雷斯 297
- Subsidies 补助金 150, 173, 186-7, 193, 207-8, 210
- Sudak(Soldaia) 苏达克 238
- Suffren, Bailiff de 拜里夫·德·萨福伦 295
- sugar production 制糖业 84, 225
- Sulaiman, s. Rum 苏莱曼, 罗姆苏丹 229
- Suleiman I, Ottoman s. 苏莱曼一世, 奥斯曼苏丹 257, 270, 281, 284, 288
- sumptuary legislation 禁奢令 137, 209
- Sunnis 逊尼派 1-2, 7, 26, 61, 106, 307
- Sürüc (Saruj) 叙吕奇 36, 105
- Suriani 苏里阿尼 71, 73-4, 84-5
- Swabia 施瓦本 28
- Sweden 瑞典 162, 196, 201, 251, 285
- Switzerland 瑞士 296

- Sword-Brothers, Order of 持剑骑士团 161-2, 198
- Symeon, Orthodox p. Jerusalem 西美昂·耶路撒冷的东正教牧首 62
- Syncretism 折中主义 70-2
- Syria 叙利亚, 1-2, 18, 22, 26, 35, 40-2, 46, 85, 104-7, 109, 129, 225, 237-8, 240, 258, 269, 280, 303
- Syrian Gates 叙利亚之门, 参见 Belen Pass
- Szczecin (Stettin) 什切青(斯德丁) 130
- T
- Tabriz 大不里士 238
- Tachov 塔霍夫 274
- Tagliacozzo, Battle of 塔利亚科佐战役 203, 205
- Tallinn (Reval) 塔林(雷瓦尔) 162
- Tamerlaine 塔尔梅兰, 参见 Timur
- Tancred, c. Lecce, k. Sicily 唐克雷德·莱切伯爵·西西里国王 142
- Tancred, pr. Antioch 唐克雷德·安条克亲王 31, 33-7, 42-3, 51-3, 65, 88, 90, 108
- Tannenberg (Grunwald), Battle of 坦能堡(哥伦瓦尔德)战役 254
- Taranto 塔兰托 163
- Tarifa 塔里发 262
- Tarragona 塔拉戈纳 7;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7
- Tarsus 塔尔苏斯 1, 36, 46, 51;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62-3
- Tartus (Tortosa in Syria) 塔尔图斯(叙利亚的托尔托萨) 46, 51, 90, 99, 111, 113, 229, 243-4, 303; diocese 教区 66
- Tatikios 塔第吉奥斯 32, 40
- Taurus mts 托罗斯山脉 37
- taxation, by kings 税收·国王所收 125, 131, 138, 150, 187, 208-10, 212, 283; of Church by popes 向教会征收·教皇所定 150-1, 153-4, 160, 162, 166, 168, 173, 175-6, 186, 193-4, 201-5, 208-10, 212, 246, 262, 264-6, 268-9, 274, 277-8, 280, 283, 291-2; universal, by popes 教皇征收的普遍税 187, 212
- Tayma' 泰马 110
- Tell Danith 达尼斯丘 108
- Tell el-Hara 哈拉丘 106
- Templars, Order of Knights Templar 圣殿骑士, 圣殿骑士团 xxix, 70-1, 79-81, 109-11, 121, 128, 133, 146, 177, 179, 182, 191, 195-7, 200, 206, 208, 227, 229, 239-44, 247-51, 255, 299, 303; fall of 衰落 247-51, 265; masters of 团长 109-10, 177, 180, 188, 208, 228, 249, 254, 另见各个团长
- Temujin 铁木真, 参见 Genghis Khan
- Tènès 特内兹 286
- tercias reales “王室三分之一”税 200, 278
- Teruel 特鲁埃尔 117
- Teutonic Order 条顿骑士团 xxxi, xxxiii, 80, 103, 177, 179, 196-9, 211, 216, 235-6, 239-40, 250-5, 257-8, 285, 296-7, 299; masters of 历任团长 177, 180, 188, 197, 228, 247, 251-2, 257, 285, 295, 另见各个团长
- Thásos 萨索斯岛 276
- Thebes 底比斯 218, 223, 261
- Theodore Angelus Comnenus, despot of Epirus 西奥多·安格卢斯·科穆宁·伊庇鲁斯专制者 220-1

- Theodore I Lascaris, Byzantine e. (Nicaea) 西奥多一世·拉斯卡里斯, 拜占庭皇帝 (尼西亚) 220, 229
- Theodore I Palaeologus, despot of Mistra 西奥多一世·帕里奥洛格斯, 密斯特拉专制君主 261, 273
- Theodwin, cardinal-b. Porto, papal legate 提奥德温, 红衣主教, 波尔多主教, 教皇使节 125
- Thessalonica, kingdom of 帖撒罗尼迦王国, 218
- Thessaloniki 帖撒罗尼迦 30, 32, 220, 270
- Thessaly 帖撒利 218, 220-1, 223
- Thibald I, c. Bar-le-Duc 巴勒迪克伯爵蒂博德一世 152
- Thibald III, c. Champagne 蒂博德三世, 香槟伯爵 152, 188
- Thibald IV, c. Champagne, k. Navarre 蒂博德四世, 香槟伯爵, 纳瓦拉国王 187-9
- Thibald of Ploasme 普洛斯梅的蒂博德 22
- Thierry of Alsace, c. Flanders 阿尔萨斯的蒂埃里, 佛兰德斯伯爵 135
- Third Crusade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34-47, 165, 169, 176, 299
-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283
- Thomas Aquinas, St 圣托马斯·阿奎那 xxxiii, 48, 297
- Thomas Becket, St, archb. Canterbury 圣托马斯·贝克特, 坎特伯雷大主教 103, 132
- Thomas Morosini, Latin p. Constantinople 托马斯·墨洛西尼,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牧首 219
- Thomas of Marle, l. Coucy 马尔勒的托马, 库西领主 28
- Thomas of Marly 马尔利的托马斯 187
- Thomas Palaeologus, despot of Mistra 托马  
斯·帕里奥洛格斯, 密斯特拉专制者 261
- Thomas of Thoroldeby 索罗尔德比的托马斯 250
- Thomasinus, nephew of Saliba 托马西努斯, 萨利巴的侄子 66
- Thorn (Toruń): First Peace of 索伦: 第一次和约 254; Second Peace of 第二次和约 254
- Thrace 色雷斯 30, 140, 187, 217-18, 220-1, 223, 270, 280
- Tiberias 提比里亚 52, 71, 88, 109-11, 129, 188: diocese 教区 69; tomb of Rav Kahana 拉瓦·卡哈纳之墓 71-2
- Tiercelet, Order of 蒂耶尔瑟莱骑士团 253
- Tilbeşar 蒂尔贝沙 36-7, 62, 105
- Timișoara (Temesvar) 蒂米什瓦拉 292
- Timur, Timurid Gur-Khan 帖木儿 268, 270, 273
- Tinnis 蒂尼斯镇 179
- Tinos 提诺斯岛 292
- Tlemcen 特莱姆森 68
- Toledo 托莱多 6, 116, 133, 170, 263
- Tolosa 托洛萨 170
- Toron (Tibnine) 托伦 110, 147, 179, 181, 235, 240
- Toros III, k. Cilician Armenia 托罗斯三世,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国王 216
- Toros, pr. Edessa 托罗斯, 埃德萨大公 36
- Tortosa (Spain) 托尔托萨 (西班牙) 124, 130
- Toulouse 图卢兹 31, 168-9: counts of 伯爵 138, 164; Inquisition at 此地的宗教裁判所 169. 另见各个伯爵
- Tournai 图尔奈 43
- Tournaments 比武大会 152: prohibition of 遭禁 175, 208-9
- Tours 图尔 4
- Tourville, Chevalier 图维尔, 骑士 295
- Trade 贸易 74, 84-6, 93-4, 102, 104, 110, 138,

147, 151, 154, 172, 175, 193, 207, 211, 224-7, 231, 235, 238-40, 255-6, 258, 261, 265, 269, 273, 284, 294, 296; commercial privileges 商业特权 158, 224-6

Traditionalists 传统主义者 308-9

traditions in kindred 家族传统, 参见 families of crusaders

Transjordan 外约旦 62, 102, 106, 109, 179, 226; lords of, 93, 96, 99, 109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275, 292

Trapani 特拉帕尼 203, 211

Trebizond (Trabzon) 特拉比松 (特拉布宗) 220, 238, 270

Trent, Council of 塔兰托会议 282

Treviso, March of 特莱维索边区 202

Trier 特里尔 24

Tripoli (Lebanon) 的黎波里 (黎巴嫩) 42, 51, 75, 90, 111, 138, 140, 188, 206, 213, 229, 243, 273; bishop of 主教 213; commune 社群 243; county of 伯国 46, 50-1, 67, 89-91, 96, 99, 102, 104, 107, 110-11, 182, 215, 224, 227-30, 241, 243; diocese 教区 66; Montpèlerin 蒙佩勒恩城堡 51, 53, 另见各位伯爵的词条

Tripoli (N. Africa) 的黎波里 (北非) 124, 279, 287, 292-3, 295

Troubadours 游吟诗人 155

Trouvères 北方游吟诗人 152

Troyes 特鲁瓦 124; Council of 其大公会议 79

Tughrul, Selchükid ruler 图格鲁勒, 塞尔柱统治者 2

Tunis 突尼斯 124, 210-11, 286-8; crusades to 对其的十字军行动 205, 207-11, 271-2, 286, 288, 301; Hafsid ruler of 其哈夫斯王朝统治者 210-11

Tunisia 突尼斯 271-2, 295, 另见 Mahdia

Tur'an 图然 111

Turan-Shah, s. Egypt 图兰沙, 埃及苏丹 195, 237-8

Turcopoles 突厥之子 103

Turghud Ali (Dragut) 图尔古德·阿里 (德拉古特) 287

Turkomans 土库曼人 1-2, 211, 237-8

Turks 突厥人 xxxii, 1-2, 46, 53, 63, 117, 199, 237, 256, 265, 267-8; Kipchak 奇普恰克人 196, 237, 240; Ottoman 奥斯曼人 223, 246, 254, 256-8, 260-1, 264-5, 269-97, 302-5; Selchfik 塞尔柱人 1-2, 7-8, 12, 26-8, 33-6, 39, 42, 46, 104-5, 108, 127-8, 139-40, 237, 269

Tuscany 托斯卡纳 263; duke of 公爵 284

Tyre 泰尔 43, 73, 85-6, 92-4, 96, 102, 107, 111, 119, 138, 140-1, 146-7, 224-5, 236-7, 239, 241-4; archbishop of 大主教 110; cathedral 大教堂 243-4; dyeworks 水坝 84; ecclesiastical province 教区 66; glass industry 玻璃工业 84; lordship 领主 94, 144, 233; mosques 在此地的清真寺 70

## U

Ubeda 乌韦达 132, 170

Uluj-Ali, Ottoman admiral, 乌鲁古-阿里, 奥斯曼舰队上将 287

Ukraine 乌克兰 199, 252

Uniate churches 联合东方教会 61, 67, 74, 215, 2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294, 299, 303, 307  
 unsuitable 不合条件者 15, 19, 28, 36, 126-7, 174, 176, 288  
 Unur, Turkish commander at Damascus 乌努尔, 大马士革的突厥统治者 105  
 unworthiness of crusaders 十字军战士的无足轻重, 参见 *peccatis exigentibus hominum*  
 Urban II, pope 乌尔班二世, 教皇 xxxiii, 1-8, 10, 12-17, 19, 23, 28-9, 31-2, 45, 47, 63, 117, 120-1, 124, 134, 148, 224, 296  
 Urban III, pope 乌尔班三世, 教皇 137

Urban IV, pope 乌尔班四世, 教皇 198, 202, 209  
 Urban V, pope 乌尔班五世, 教皇 269  
 Urban VI, pope 乌尔班六世, 教皇 271  
 Usamah ibn Munqidh, commentator 乌萨马·伊本·蒙基德, 评论家 71  
 Usküdar 于斯屈达尔 156, 270  
 usury 高利贷 21, 166, 194  
 Utrecht, commandery of Teutonic Order 乌得勒支·条顿骑士团总部 285  
 Üxküll 于克斯屈尔 161

## V

Valbette, marquis of 瓦尔贝特侯爵 295  
 Valdemar I, k. Denmark 瓦尔德马尔一世, 丹麦国王 132  
 Valdemar II, k. Denmark 瓦尔德马尔二世, 丹麦国王 162  
 Valence 瓦朗克 45  
 Valencia 巴伦西亚 117, 199  
 Valletta 瓦莱塔 293, 296: conventual church of St John 圣约翰修道院教堂 295-6; Grand Harbour 大港 293-4, 296; library 图书馆 294  
 Valona (Vlorë) 发罗拉 119  
 Varna 瓦尔纳 270, 275; Crusade of 此地的十字军行动 270, 275-6  
*vasalli non casati* 非家族封臣 33  
 vendettas 报复, 参见 *vengeance*  
 vengeance 报复 23-5, 118  
 Venice 威尼斯 52, 60, 104, 119-20, 150-60, 177, 191, 215-20, 222, 224-6, 238-9, 242-3, 252, 258-9, 261, 263, 267-9, 271, 273-5,

277-81, 284, 289, 291-2: doges of 历任总督 119, 158; Lido 利多 154; 在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地方长官 *podestà* in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219-20; privileges in kdom. Jerusalem 在耶路撒冷王国的特权 119-20, 224-6; St Mark's 圣马可教堂 152. 另见各个总督  
 Verden 费尔登 201  
 Verdun, bishop of 凡尔登, 主教, 29: county of 伯爵领地, 29  
 Vernet, Horace 贺拉斯·贝内特 301  
 Verona 维罗纳 165  
 Versailles, Salles des Croisades 凡尔赛宫, 十字军大厅 301  
 Vézelay 韦兹莱 122, 138, 141-2  
 Victor II, pope 维克托二世, 教皇 31  
 Victor III, pope 维克托三世, 教皇 3  
 Vienna 维也纳 126, 284-5, 288, 292  
 Vienne, Council of 维埃纳大公会议 249, 266  
*vifgages* 活质 21

Vignolo de' Vignoli 维尼奥罗·德·维尼奥利 254  
 Vilches 比尔切斯 170  
 Villeneuve-l'Archevêque 阿什维克新城 191  
 Villeneuves 新镇 83  
 Vincennes 万塞讷 191  
 violence, moral neutrality of 暴力的道德中立性 xxx  
 Visconti, family 维斯康蒂家族 263-4  
 Visions 显灵 39-40, 42-3, 48  
 Vista, niece of Saliba 维斯塔·萨利巴的侄女 66  
 Vistula (Wisla), river 维斯图拉(维斯瓦)河 197-8  
 Viterbo 维泰博 121, 212

Vitoria,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 297  
 Vlachs 瓦拉几亚人 139, 217, 220, 254  
 Vladislav II, grand d. Lithuania, k. Poland 弗拉迪斯拉夫二世, 立陶宛大公, 波兰国王 253-4  
 vows 起誓 11, 34: crusade 十字军的 xxx, xxxii, 4, 8, 15-16, 22, 29-32, 34, 40-1, 45-7, 97, 112-13, 116-17, 119, 122-5, 132, 134, 138-9, 146, 148-9, 151, 153-5, 161, 163, 166-9, 172-4, 176-7, 180, 184-7, 189-90, 198, 202, 206, 209-10, 245, 266, 269, 276-7, 291, 297, 309: commutation 转移 161, 168-9, 173-4, 187, 199, 201, 263-4; deferment 取消 173-4; redemption 抵赎 173-4, 176, 189, 268

## W

Wadi Araba 阿拉伯谷 108  
 Wadi Faliq 瓦迪-法里克 92  
 Waldensians 瓦勒度派 164  
 Wallachia 瓦拉几亚 275, 另见 Vlachs  
 Walloons 瓦隆人, 另见 Low Countries  
 Walter III, c. Brienne 沃尔特三世, 布里埃纳伯爵 163  
 Walter IV, c. Brienne 沃尔特四世, 布里埃纳伯爵 188  
 Walter V, c. Brienne, d. Athens 沃尔特五世, 布里埃纳伯爵, 雅典公爵 223  
 Walter of Plettenberg, Livonian m. Teutonic Knights 普莱腾堡的沃尔特, 利沃尼亚条顿骑士团团长 254  
 Walter Sansavoire of Poissy 普瓦西的沃尔特·桑萨瓦尔 27-9  
 War, Holy 圣战 25, 48, 297-8

war, justifications of 对战争的合理化 xxix-xxx, 8-10, 120, 297-8, 308, 另见 Penitential warfare  
 Welf, d. Bavaria 韦尔夫, 巴伐利亚公爵 45-6  
 Wends 文德人 112-13, 130, 309: crusades against 针对其的十字军行动 123-5, 130, 132, 138  
 Wesseli 威瑟利 24  
 western empire 西方帝国 8, 20, 23, 67, 83, 101, 120, 139, 146-7, 153, 162, 164, 176-7, 202, 205, 213, 215, 217, 264, 274-5, 281-6, 288-9, 291-2  
 Wibald of Stavelot, ab. Corvey 斯塔沃洛的威波德, 科尔维修道院院长 125  
 Wieselburg 维瑟尔堡 28  
 Wilhelm II, German Kaiser 威廉二世, 德国皇帝 300, 305-6  
 Wilken,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威尔肯 299,

- 301, 303, 309
- William II, k. England 威廉二世, 英格兰国王 112
- William II, k. Sicily 威廉二世, 西西里国王 138, 142
- William IX, d. Aquitaine 威廉九世, 阿基坦公爵 45-6, 48
- William of Beaujeu, gm. Templars 博热的威廉, 圣殿骑士团大团长 242
- William of Bures-sur-Yvette, l. Galilee 伊维特河畔比尔的威廉, 加利利领主 95, 97-8
- William the Carpenter, visc. Melun “木匠”威廉, 默伦子爵 28
- William of Champlitte, pr. Achaea 尚普利特的威廉, 亚该亚大公 218, 222
- William Embriaco 威廉·恩布里亚科 241
- William I, c. Guelderland 威廉一世, 格尔德兰伯爵 253
- William II, c. Holland, German anti-k. 威廉二世, 荷兰伯爵, 德意志僭称国王 202
- William IV, c. Holland 威廉四世, 荷兰伯爵 253
- William Jordan, c. Cerdagne 威廉·若尔丹, 塞尔达涅伯爵 90
- William, c. Jülich 威廉, 尤里希伯爵 262
- William of Montferrat 蒙费拉的威廉 101, 138, 143, 153
- William, c. Nevers 威廉, 讷维尔伯爵 45-6
- William, earl of Salisbury 威廉, 索尔兹伯里伯爵 189
- William of Paris, preacher 巴黎的威廉, 布道者 171
- William of Ploasme 普洛斯梅的威廉 22
- William of St-Pathus, biographer 圣帕修的威廉, 传记作家 191
- William Tête-Hardi, c. Burgundy 威廉·泰特-阿尔迪, 勃艮第伯爵 17, 115
- William, archb. Tyre, historian 威廉, 泰尔大主教, 历史学家 75, 98, 100
- William of Villehardouin, pr. Achaea 维尔阿杜安的威廉, 亚该亚大公 203, 222-3, 260
- Winrich of Kniprode, gm. Teutonic Knights 科尼普罗德翁里希, 条顿骑士团大团长 253
- wives 妻子 148, 154, 参见 families
- women 女性 15, 17, 21, 165, 174, 参见 wives
- Worms 沃尔姆斯 24, 127, 146
- Würzburg 维尔茨堡 147: annalist 编年史家 130; bishop of 主教 120
- Wyclifites 威克里夫派 274

## Y

- Ya'qub, Almohad caliph 雅库布, 阿尔摩哈德哈里发 169
- Ya'qub (Abu Yusuf), Marinid s. 雅库布(阿布·优素福), 马林苏丹 200
- Yaqut, geographer 亚古特, 地理学家 70
- Yenişehir ('Imm) 叶尼谢希尔(伊姆) 38
- Yolande, q. Jerusalem 约兰德, 耶路撒冷女王 180-1, 221, 230, 241
- Yolande of Flanders 佛兰德斯的约兰德 220
- Ypres 伊普尔 271
- Yveta, abbess St Lazarus of Bethany 伊韦塔, 伯大尼的圣拉撒路女修道院院长 58

## Z

- Zabel of Cilician Armenia**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扎贝尔 215, 229
- Zadar (Zara)** 扎达尔 (萨拉) 154-6, 167
- Zahara** 萨哈拉 278
- az-Zahir, ruler of Aleppo** 扎伊尔, 阿勒坡统治者 229
- Zalew Wilany (Frisches Haff)** 维斯图拉潟湖 198
- Zante (Zakinthos)** 桑特 260
- Zemun** 泽蒙 27
- Zengi, ruler of Mosul and Syria** 赞吉, 摩苏尔与叙利亚的统治者 104-5, 107, 121, 129
- Zerdan** 泽尔丹 104
- Zionist movement** 锡安主义运动 304-8
- Zippori** 色佛黎 110
- Zoroastrians** 琐罗亚斯德教教徒 61, 72



11

12

13

14

15

## 译后记

历经数年，几经波折，这本《十字军史》终于要与读者见面了。作为译者，我的心情又忐忑又期待。忐忑在于，十字军的足迹从北欧一直到中亚，涉及广大地域的历史背景，而对十字军的理解又与对基督教的了解密不可分，两相叠加，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译者虽力求完善，仍难免有众多疏漏、不明之处。期待在于，对十字军的专题研究，在国内史学界仍然可算是一个空白领域，这本经典著作的引进出版，势必对改变这种状况、指引有兴趣者开拓新领域有所助益。

本书作者乔纳森·赖利-史密斯（1938— ）曾任教于剑桥大学伊曼努尔学院，是研究十字军史的权威。他是十字军与拉丁东方研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除本书外，另著有数十本与十字军史相关的著作，其中包括《牛津十字军史》《十字军地图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医院骑士团》等，其中不少已被译为其他语言。本书对十字军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历程、相关理念的演变、拉丁东方的兴衰都做了阐述，而且还对十字军史撰写（无论是通俗的还是学术性的）及十字军研究的流变都做了概括，正文后又按照各个子专题列出了详细的参考书目，对想要全面了解十字军运动的历史，尤其是想要对其深入研究探讨者，实为非常不错的指引。

最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为本书的问世做了大量幕后工作，对此，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虽然有这么多人的共同努力，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还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为本书的修订完善提出宝贵意见。译者邮箱：[manyant5@hotmail.com](mailto:manyant5@hotmail.com)。

欧阳敏

2016年3月19日于上海

##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首批出版书目

- |              |                              |               |
|--------------|------------------------------|---------------|
| 《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 | 〔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 乔 戈 译         |
| 《十字军史》       | 〔英〕乔纳森·赖利-史密斯 著              | 欧阳敏 译         |
| 《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 | 〔美〕理查德·W. 布利特 帕梅拉·凯尔·克罗斯利 等著 | 刘文明 邢 科 田汝英 译 |
| 《欧洲历史地理》     | 〔美〕诺曼·J.G. 庞兹 著              | 王大学 秦瑞芳 译     |
| 《希腊艺术导论》     | 〔英〕简·爱伦·哈里森 著                | 马百亮 译         |
| 《意大利文学史》     | 〔意〕弗朗切斯科·德·桑科蒂斯 著            | 魏 怡 译         |

##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十字军运动自11世纪始，直至18世纪末，历时数百年，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中东、北非的历史，然而我国读者却鲜能对这段历史有全面的了解。本书正是一部有关十字军的通史，作者为当今该领域最权威的西方中世纪社会史教授乔纳森·赖利-史密斯。

《十字军史》记述了几次主要的十字军东征、东征过程中的故事，以及十字军战士的经历等内容。本书还展示了十字军史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中国读者也能一览西方史学研究之前沿。

本书的英语版已多次再版，广受英语世界读者好评。对于十字军在不同背景下的不同理解，无论来自19世纪浪漫主义还是当今伊斯兰世界，都被作者纳入了考量的范围。因此无论是对历史专业的学者，还是对普通读者而言，本书都堪称一部了解中世纪历史的范本。

---

“这是一部来自世界最顶尖十字军史专家的大师之作，对于任何一个十字军研究者来说都是必读的作品，而对于想了解构成欧洲自我认知之元素的读者，这也是一部言简意赅而根基扎实的专著。”

——尼古拉斯·雅斯佩特（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

“最易读、最权威的十字军运动研究……写作极富激情和洞见。”

——诺曼·豪斯利教授（莱斯特大学）

“从各方面来看，本书都是对十字军现象的最新讨论……澄清了自司各特到本·拉登各个时代有关十字军的各种主要观点。”

——便雅悯·Z. 凯达尔（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http://www.cp.com.cn>

上架建议：历史 世界史

ISBN 978-7-100-12384-6



9 787100 123846 >

定价：98.00元